

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英] 桑德尔·吉尔曼、周迅 等◎著 汪方挺、高妙永、唐红、张薇◎译

吸烟史

对吸烟的文化解读

17世纪烟草的贸易

中美洲的烟草礼仪

吸烟的起源：近现代英国早期的吸烟

马德拉以南非洲的吸烟史

烟草在伊朗

吸烟和印度草药学

日本的烟草文化

明治时期中国的吸烟现状

我们如何吸烟：吸烟的配件和器具

鸦片的鼎盛时期

哈瓦那雪茄和西方想象

五年丁香烟

牙买加大麻

19世纪30年代的烟草

近现代中国的吸烟现状

现代日本的吸烟现状

烟草可卡因

吸烟与社会性

艺术与文学中的吸烟

符号和意象：17世纪以来绘画艺术中的吸烟

后宫里的歇卡：吸烟和东方主义艺术

戏剧中的吸烟

赞美尼古丁女郎：逝去的烟草文学时代

烟草中的香烟：从雅玛到好莱坞

《玛丽和安妮》中作为生活方式的吸烟

吸烟和艺术

吸烟、性别与种族

犹太人和吸烟

19世纪烟草艺术中被商品化了的非裔美国人

女性与19世纪的吸烟形象

目前同性恋者的吸烟史

赞美尼古丁

烟草中的香烟

《玛丽和安妮》——19世纪文学

烟草和香烟

烟草和香烟

烟草和香烟

烟草和香烟

烟草和香烟

烟草和香烟

烟草和香烟

烟草和香烟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大多数人……都将从此书中找到很多乐趣”
——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不管你是忠实的烟民还是维护公众健康的卫士，这本关于吸烟历史的画册都会令你着迷。”

——澳大利亚《时代报》

“这是一本精美的书，就如同一盒香烟一样，让人沉浸在吸烟的乐趣中。”

——英国《星期日邮报》

“吸烟是学术界和普通百姓共同关注的话题。本书包罗万象，可读性强，书中大量精美的插图亦是对现代印刷艺术的礼赞……”

——《悉尼先驱晨报》

“尽管反吸烟主义盛行，但作为一种文化标签，一种表达浪漫和反叛、内省和欢乐的重要手段，吸烟不会从我们身边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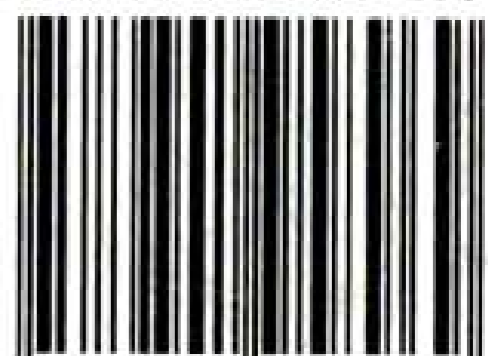
——诺亚·艾森伯格《银幕中的香烟：从魏玛到好莱坞》

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Smoking: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吸烟史
对吸烟的文化解读



上架建议 历史文化

ISBN 978-7-80195-896-9



9 787801 958969 >


定价：45.00元



[英] 桑德尔·吉尔曼、周迅 等◎著
汪方挺、高妙永、唐红、张薇◎译

吸烟史

对吸烟的文化解读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吸烟史：对吸烟的文化解读 / [英] 桑德尔·吉尔曼、周迅等著，汪方挺、高妙永、唐红、张薇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10

ISBN 978-7-80195-896-9

I. 吸… II. ①吉…②周…③汪… III. ①吸烟-历史-研究-世界 ②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C913.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6-0791 号

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Edited by Sander L. Gilman and Zhou Xun

©2004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Jiuzhou Press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吸烟史：对吸烟的文化解读

作 者	[英] 桑德尔·吉尔曼、周迅 等
译 者	汪方挺、高妙永、唐红、张薇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
插 页	6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896-9/C·15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桑德尔·吉尔曼*、周迅**

1492年11月6日，两名哥伦布的船员从古巴冒险归来。他们报告说遇到当地居民，这些人抽一种“干叶子”，这和那些一个月前（1492年10月15日）作为礼物送给哥伦布的东西是一样的。路易斯·德·托雷斯和罗杰里奥·德赫列斯吸入这些燃烧的叶子烟，成为欧洲最早的吸烟者。这标志着两种吸烟文化之间一系列接触的开端。

据一位在1514年编辑过哥伦布旅行手稿的牧师拉斯·卡萨斯说，他们遇到的居民用某些药草来吸烟，他们点燃药草一端，另一端则用来咀嚼或吮吸，抑或通过呼吸道吸入。烟草麻痹了他们的肌肉，使他们陶醉，所以他们说不觉得疲劳。^[1]这种干叶子来自烟草植物，西班牙人误听其本土名为“tobacco”，其实印第安人是用管子来抽这植物的。^[2]从北墨西哥到南加拿大，此种植物在美洲大陆广泛种植。

早在这种植物开始种植之前，即在公元前5000至公元前3000年期间，作为礼仪习惯的一部分，在北美和南美它是被当作烟来抽的。玛雅人、加勒比人以及其他无数生活在西半球的人，抽各种各样的烟草。尽管烟草可用来咀嚼，可作茶饮用，可制成液体摄入，可弄成粉末吸取，可做成胶冻食用，但只有作为烟来抽，燃烧药草产生烟雾，才使其迅速成为诊断和治愈疾病的方法，才能驱除被认为引起疾病的邪恶灵魂。吉罗拉·贝诺兹在他的《1565年新大陆的历史》一书中提到，吸烟令人陶醉，成为社交礼仪的一部分。烟草也是栖息在萨满身上的幽灵的食物。烟草如此难以言喻而又可以感知，如此真实而又虚幻，烟草掠获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起初并没有“烟草”这个词汇，而它一经存在，就开始不断寻求新的意义。

吸烟本是一种疗法，但很快它就变成一种激情，精英们很快开始为取乐而吸烟，这似乎也符合南北美洲人的个性。抽烟因为礼节和药用的需要而存在，变成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直至最后被整个社会所采纳。对欧洲人而言，抽烟，也就是借用一种器具吸入燃烧物质的残余物，被理解成某种新的东西。18世纪有一个关于瓦尔特·雷利先生（一个模范抽烟者）的故事。在一次回英格兰的路上，他静静地用烟斗抽着烟，他的仆人以为他脸上着了火，突然往他脸上洒了一品脱的啤酒。在那个时代，抽烟被认为是新思想、

*桑德尔·吉尔曼（SANDER L. GILMAN）：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文科和医药专业著名教授，并任人文科学实验室主任。其著作包括：《看见了荒唐》（1982），《犹太人的自我仇恨》（1986），《人文科学的财富：在新千年里教授人文科学》（2000），《新欧洲，新德国》（与特德·赫扎哥合著，2000）。获得过德国历史研究院默茨奖（1997）和亚历山大·冯·汗博尔特研究奖（1998）。

**周迅（ZHOU XUN）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近作包括《中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认识：一部犹太史》（2000）和《儒家的智慧》（2001）。



一个玛雅牧师在墨西哥一个寺庙的雕像处吸烟

新经历——主要为那些能抽得起烟的人即精英们而存在。

尽管如此，如此奢侈的东西很快连平民也可以享用到了。中南美洲土著所抽的一卷卷的烟草，为那些并非宗教信仰的人们提供了快速简单的方法，来享受烟草所带来的快感。除了烘干，不需做太多准备就可以抽烟。将烟吸入肺部组织里，意味着一剂的尼古丁及其他化学物质迅速沉淀到血液里。用鼻子吸、用做茶饮或制成烟草胶冻都没有直接吸入的传输速度来得快。尼古丁和烟草是根据吉恩·尼科特的名字命名的，他是法国派往葡萄牙宫廷的大使，在16世纪中叶将烟草及抽烟作为一种疗法带回法国宫廷。

尽管人们听到许多关于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的故事，但对于欧洲人第一次抽烟的经历以及他们对魔法般的抽烟的反应却知之甚少。拉斯·卡萨斯的叙述直到19世纪才出版。1557年，安德烈·瑟维特描述了“新大陆”的人们仍然热衷的吸烟惯习：

当烟草植物干了的时候，人们将一定数量的烟草裹进一大片棕榈叶里，然后卷成蜡烛长度的烟卷。他们点燃烟卷的一头，用鼻子和嘴巴吸起烟来。他们说吸烟感觉很棒，能让头脑清晰。此外，吸烟可以使人忍受一段时间的饥渴，所以他们经常吸烟，甚至在谈话的时候也会停下来吸烟，然后再继续讲话。战争时代他们经常这么一根接一根地吸烟，这对他们很有帮助。女性根本不吸烟，事实上如果她们吸入太多的烟，烟便会进入她们的头脑把她们醉倒，就如强劲的酒一般。^[3]

1571年，塞维利亚一位有名的医师尼古拉斯·蒙纳德斯向旧世界宣告这种“圣草”的“功效”及“伟大之处”：它能医治疾病，驱除邪灵；事实上，这种药草是人们的普遍需求，不仅因为它可以医治疾病，还因为它能让人保持健康。他还解释说，抽烟能缓解疲劳，让人放松。^[4]吸烟似乎还可以治疗梅毒（这是从新大陆引进的另一个东西），至少是减轻梅毒症状的一种药物。1535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军政府首长贡扎罗谴责当地人使用这种杂草，认为它使人们变得懒惰无用。尽管如此，他不得不承认一些基督



关于西方烟草和抽烟习惯最早的记载大概出现在 1570 年

地方脉络张开，打开身体所有的毛孔和通道：这意味着抽烟不仅能保护身体免受侵扰，还能使人们保持健康。但人们不知道英国很多严重疾病是会传染的。”^[5]

哈瑞尔特当初对那些有魔力的烟草如此着迷，以致后来他变成了瘾君子，死于鼻癌。^[6]对于能获得稀少而又昂贵的烟草的欧洲上层人士，如哈瑞尔特及其同时代的葡萄牙人及法国人而言，吸烟虽然危及生命，但它也是一种享受。1595 年，安东尼·苏特写了第一部完全关于烟草的英文作品，他引用蒙纳德的话，把烟草当成药草。但在 1626 年该书的第六版中，他指责抽烟若仅为取乐，则是一种既浪费又堕落的嗜好。^[7]

16 世纪末期，英国人第一次生产出白色球形的黏土烟斗，这标志着欧洲从新大陆引进了一种全新的系统，一般公认为是被瓦尔特·雷利先生带来的。瓦尔特先生在 1618 年

徒，特别是那些感染了梅毒的基督徒，已经养成了抽烟的方法。他们在烟草带来的迷幻中不再感觉到疼痛。抽烟能有效地传输强力的尼古丁，但抽烟本身也似乎有一种魔兆。1530 年，发现梅毒的法拉卡斯托罗·吉罗拉摩认为，如果细菌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疾病，或许烟草可以治愈它。

1586 年，陪同拉尔夫·雷恩到北美探险的英国科学家托马斯·哈瑞尔特在旅程中拿到一份蒙纳德斯的作品复印本，其中称赞了“圣烟”的治疗功效：

“他们通过由陶土制成的烟斗吸烟，将烟吸进胃部和头部；这两个

MONDO NUOVO.

Modo che tengono i medici nel medicare gl'infermi.



Nell'isola spagnuola, e'n tutte l'altre, quando i lor medici uoleuano curare qualche infermo andauano nel luogo dou'egli staua a dargli il fumo, & quando era bene imbracato era fatta la maggior cura: poi ritornando in se diceua mille materia, di essere stato al concilio de gli Dei, passando misfomi

吉尔曼·本泽尼《新世界的历史》中所展示的毒品尼古丁，威尼斯，1565-1572



加拿大词典中一个野人以他所崇拜的太阳神的名义在吸烟，约 1700

被砍头时，确实是带着一支烟管上的绞刑架。神奇的吸烟当时一下子迷住了欧洲人。1598年，有关烟的描述出现在欧洲的文献和艺术作品上，抽烟风潮很快传遍整个欧洲大陆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罗伯特·哈考特在1613年写道：“这种商品（即烟叶）将带来的巨大利润，将和西班牙人从所有印度群岛中最好、最富饶的银矿中获得的利润一样大。这是从两者的费用比较中得出的。”^[4]抽烟挖掘出烟叶的价值，从而使其成为商品。如果没有那一管烟，烟叶仍然只是一种治疗许多疾病的药草而已。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烟草这种植物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普遍种植。从西伯利亚到爪哇，从西非到西藏，地球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对这奇特的烟草着了迷。起先在美洲和加勒比海作为礼仪和医用的烟草，演变为人们喜爱的抽烟行为。烟草

用其魔力征服了世界。

如今，没有烟草的世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早在发现新大陆之前，魔力烟草的灵异就已掳掠了人类的灵魂和躯体。与人们对失去的世界的怀念相关，通过鼻子和嗅觉——人类最基本的感官之一——烟草满足了我们渴望的沁鼻的气味，温暖着我们的皮肤，抚慰着我们的心灵，抚平了我们的伤痛，带给我们儿时甜美的回忆。抽烟一直是文化的一部分。

埃及人、巴比伦人和印度人给他们的神灵上香，美洲土著通过抽烟和灵魂进行沟通。在耶路撒冷的庙宇中，至圣所外日夜不停地烧香。正是通过给上帝上香，犹太人才得以逃过危及生命的瘟疫。^[9]罗马天主教堂在每个大弥撒都有烧香的惯例，这一惯例盛行整个欧洲，并波及至“新大陆”。哥特式大教堂弥漫着浓厚的烟味。在哥伦布的航程中，香一直伴随着他。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人燃烧艾蒿来驱赶魔鬼，保持健康。在古希腊，吸入气体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受到推崇，而且也被用在仪式上。关于希腊人预言传统的近代读物说，特尔斐的神使吸入自然的气体后，就会变得很陶醉，以致他们能用一种嗑药后的朦胧说出他们的预言。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种仪式的吸气也是一种快乐的源泉。据希罗多德所说，古塞西亚人曾拿一些大麻种子爬进他们的帐篷，将种子掷于热石头之上，

石头上立刻冒出烟，并发出一种蒸汽，这种蒸汽毫不逊色于在希腊可以找到的任何蒸汽浴。塞西亚人是如此享受这种蒸汽，以致他们因欢乐而大叫。^[10]

欧洲人或许“发现”了新世界，但他们并没有“发现”吸烟，他们只是简单地记住了那个吸烟的世界。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烟草的传输方式，不再像儿时那样使整个房间充满烟雾，而是每个人用烟卷吸烟或者借助烟管吸烟。1535年，当雅克·卡提尔发现易洛魁族人（如今的加拿大人）抽烟时，他自己也尝试了一下，他觉得这烟“如同是放进烟管里的胡椒粉，非常刺激”^[11]。但欧洲人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抽烟形式。

吸烟人数的增加也与其公认的医疗功效有关。大部分吸烟史都只关注神奇的烟草植物，却忽略了吸烟的吸引力及其影响。毫无疑问，旧世界的人们因烟草而兴奋，对吸烟产生的神奇医疗功效产生信仰。同时，吸烟也让人产生舒适放松和安宁的感觉，特别是吸烟似乎可以减轻饥饿感，促使人们更加持久努

力地工作。也在一开始的时候，人们便知道这些。烟草以吸烟的形式征服了人们：从药草到熏香，从烟叶到鸦片，从麻药到杆烟等等，人类的生活从未离开过吸烟。

17世纪，欧洲商人认识到开发新世界时发现的烟草产品的无限潜能。一直与烟草共同生存的人类也不断地寻求廉价的万能药和快乐之源。因此，可以抽的、具有神奇治疗功效的药草市场持续增长。因为烟叶在世界范围内的种植，吸烟作为一种习惯、一种礼节变成了一种商品，烟叶为人们带来的财富比印度群岛所有的银矿还要多。抽烟蔓延且变得流行起来。在欧洲，烟斗烟的味道被看成是“绅士般的味道”。据一个大约于1600年在伦敦的德国旅游者保罗·翰哲尔所说，那时候几乎所有人，包括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都从长陶土制烟斗中喷出烟雾。^[12]大约在1618年，霍雷肖·布森和另一个去伦敦的游客对这个城市的烟管礼仪留下了深刻印象：



雅各布·伯德著作的雕版封面，纽伦堡，1658

人们如此频繁地抽烟，甚至在晚上都将烟管放于枕边以满足他们的烟瘾。他们有轮流使用烟管的习惯，极优雅、自然地把烟管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此外，贵妇及贞洁妇女则习惯把抽烟作为药用，但都秘密地进行，并以抽烟为乐。^[13]

身份不同的人抽不同的烟，不同的场合用的也是不同的烟管。随着抽烟文化的蔓延，抽烟用具变得更加精致，常常使用贵重的材料制成。一种抽烟的艺术文化形成了。虽然一般人都用普通的陶管抽烟，但有着昂贵雕刻和装饰的烟管，甚至银制烟管还是出现了。木制、金属或奇异材料（如象牙）制成的烟盒也成为随身携带的必备品，用来装纳所有的抽烟必需品。此外还有打火石、钢管、烟灰夹，当然还有烟草。烟盒迅速作为友谊或社交的象征，和“圣烟”、“圣草”一样广泛地流行起来。耶稣会传教士杰克勃·巴德在其1658年所写的反对吸烟的论文中说，到17世纪初，“干醉”（指抽烟抽醉了）一词已被发明出来了。“抽烟”一词花了近二百年的时间才得以确立。

欧洲以外，经土耳其到亚洲和非洲，抽烟迅速传播并成为最新的流行。在中亚和印度，在莫卧儿人的统治下，当地居民以卓越的独创性把抽烟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他们将烟草和其他更常见的树叶、香料、檀香混合起来，然后用一种水烟筒（也就是水烟袋）吸烟。烟通过水冷却下来，产生清凉的香气，这在天气热的时候最受欢迎。在葡萄牙和法国商人推动下，烟管抽烟迅速蔓延到整个非洲大陆。到16世纪末，产生了丰富的地方性抽烟文化，这种文化延伸至社会礼节（如婚礼）和宗教仪式领域。

根据日本的记录，用烟管抽烟在1600年4月随着英国旅游者威廉·亚当斯进入日本。仅十多年后，大约是1615年，据说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养成了抽烟的习惯。^[14]早期日本浮世绘艺术品“浮世的黎明”表现了抽烟作为妓女世界的一部分。在奥村渡边哲1740年代中期的画里，一个妓女手握烟管，放在对角线位置的长烟管将人物切成对半，把这个女人的感性刻画得十分深入。在更早期京都村上雅子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妓院的描绘，都提到使用烟管和烟草。

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也通过南海和日本将烟草带到中国。中国人很快就喜欢上这种新玩意，并发现抽烟是一种醉人的体验。从疟疾预防到治疗风湿和普通感冒，社会精英进一步赞扬了抽烟的医疗功效。^[15]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就形成了一种



水彩画《有烟管和烟袋的平静生活》，1789，水彩画



英国一个抽烟俱
乐部，约 1792

浓厚的抽烟文化。著名作家全祖望（1705-1755）在其著名的论烟草的短文中称，烟草的本质是提供单纯的快感及崇高的精神。沮丧时，烟能愉悦精神，引导人们打开精神通道；它能让醉意变为清醒，亦能让人沉醉；它能排解苦闷，排解烦恼，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16]烟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可能对身体、疾病及心态进行控制，西方和中国都曾如此标榜。一篇 1700 年的法国论文称，抽烟能使大脑和神经更干净更稳固。抽烟有利于形成更好的判断能力、更清晰更周到的推理能力以及更强的灵魂持久力。^[17]可见，东西方都认同抽烟的诸多效果。

作为一种日常必需品、一种流行的休闲活动和一种万能药，到 17 世纪中期，抽烟已普遍存在并迅速跨越国界。它也为吸食鸦片铺了路，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抽烟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欧洲人将美洲人的抽烟传统传播至世界各地，使之迅速成为全球的风尚。各个大陆的人们开始试验抽烟技巧、改进使用方法，他们将抽烟融入自己的文化中，赋予抽烟地方性传统和礼节的职能。在一个被地理距离、宗教、风俗以及社会地位广泛隔开的世界里，抽烟成为众多国家的共同习惯，并刺激着社会互动。

抽烟消除了文化和社会障碍，但同时也强化着文化和社会的障碍。随着抽烟越来越成为平民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和享乐有关的问题出现了。抽烟给人快感，但这是给皇室和有特权的精英享受的，而不是给卑微的劳动者群体享受的，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工作、生产和遵守纪律。对于声称抽烟能提高人们工作能力的回应是：抽烟是一种休闲活动，会导致工人忽视自己的职责。多数人的快感会对社会管理产生威胁，有一种“恐怖”可能潜在地导致不稳定，特别是当统治现状有危机或濒临垮台的时候。当抽烟被视作社会秩序的威胁时，它就变成一种应受惩罚的罪行。从 17 世纪早期起，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方，医生们都在争论有关抽烟和烟草的有害影响的问题。尽管如此，和酗酒一比，问题就摆到别处了。就如雅各布·博尔德的短文所说，喝酒和抽烟的消极影响经常看起

来是一样的：都把谦卑的、有秩序的工人变成只关心个人快乐的人。政府努力管制这种会带来快感的物质，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土耳其苏丹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执政）是第一个禁烟的统治者。因为抽烟看起来是对道德和健康的一种威胁，他甚至试图关闭烟民聚集的咖啡馆。在中国，崇祯皇帝（1627-1644年执政）自缢于万岁山顶的前两年，曾颁布一条法令禁止抽烟，那些违法的平民将视同通敌罪受到惩治。^[18]在接下来的王朝，类似的禁令重复颁布。清朝时，抽烟被看作比忽视箭术更为可憎的罪行。1634年，莫斯科主教禁止销售烟草，那些抽烟的男女将受到切开鼻孔或者狠狠鞭笞的刑罚，直到体无完肤。1642年，乌尔班七世在罗马教宗里谴责抽烟，因为不管男人女人，甚至牧师和传教士，在大弥撒的庆典中都没有停止过用嘴巴和鼻孔抽烟。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教派形成了烟草垄断，并在其势力范围内禁止反吸烟书籍的传播。

在英格兰，早在1604年，詹姆士一世便谴责抽烟行径，因为他或多或少地相信抽烟是来自野性的、对神不敬的、奴性的印第安人的野蛮的野兽般的习惯。因为抽烟，英格兰从先前的荣耀中堕落了。它使牧师渐渐变得松懈，从高贵沦为闲散，民众道德急剧下降。本·琼森在1621年说，那是魔鬼放了个屁，让所有人都迷醉了。^[19]尽管如此，一本当代的宣传册促成用真正的英国产品替换外来的杂草：“与其被印度烟草毒害，还不如被英国大麻窒息！”²⁰抽烟依然将是一种选择，即使对那些讨伐烟草消费的人。

那些认为抽烟威胁国家和损害身体的禁令甚至都不能让人们停止抽烟。民众并非如统治者想象的那样具有可塑性。如果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但至少可以愚弄一下他们。摩西给他们带来了十诫，但他们总遵循第十一诫：你应该找条出路。民众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不会轻易放弃。随着禁烟令的强化，人们抽烟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统治者无法禁烟，就改用国家垄断来进行控制。通过此种垄断，烟草和抽烟给他们带来了财富，缓和了社会的紧张状态，加强了他们的统治，于是便皆大欢喜了。彼得大帝甚至把抽烟当作驱使俄国封建国家进入西方的途径和教化的手段。不仅荷兰宫廷流行抽由朝臣带回来的烟，荷兰的浮世绘艺术如奥斯塔特·梵的作品或更正式的肖像画里，都能经常看到烟管的身影。携带烟管和香烟已成为中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出现的主要标志。毫无疑问，抽烟和烟草已加速国际贸易和联系，使世界提前步入现代化。

尽管如此，在18世纪，烟草作为抽烟的对象依然和前现代的传输系统相联系。它以吸烟的形式传入欧洲，之前欧洲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人们对烟草的狂热。那时候，抽烟不再是一种流行，而是一种规范。它迅速成为用鼻吸烟的对手（用鼻吸烟是当时的流行）。1782年，威廉·库比尔说烟管烟民的气息就如绽放的玫瑰一样芳香。

雪茄是烟草继续改造自身的最好例子。雪茄首先在西班牙流行起来，而后传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雪茄原先是古巴的构想，西班牙人将其投入菲律宾进行销售。18世纪被描述为鼻吸烟的世纪，到19世纪早期，雪茄的使用如此广泛，使得吸烟遍及了整个欧洲。拜伦勋爵1823年赞美道：“神圣的烟草！从东到西，鼓舞水手的士气，激起土库曼人的激情。给我根雪茄！它是个裸体美女。”^[21]在先进的文明里，古老的习俗和现代的精致从某种程度上通过烟草达到和谐。雪茄越来越成为贵族、特权人士、富人和



柏林城堡的烟民俱乐部，1701-1713



菲律宾马尼拉的一个鸦片烟馆，约 1924

社会精英的标志，而又脏又旧的烟斗则沦为大众的流行。除了雪茄和烟斗，欧洲人很快又提供了香烟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抽雪茄和香烟变成仅和男人有关，或那些在家庭享有罕见地位的特殊类型妇女的一种标记。抽烟和性别的关联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威廉·梅克皮斯·撒克里在其作品《费兹布铎烟纸》（1842-1843）中大胆地说：“事实上雪茄是女士的敌人，也是她们的征服者。”查尔斯·兰姆将他的烟蒂比喻为他婚姻的终结者：“或者，因为男人被迫离开 / 和他们最近的东西 /……对悲剧的离婚无悔悟的 / 为了你，我的烟草 / 至死也要捍卫 /……/ 虽然到处烟雾弥漫 / 但我们的敌人找不到我们……/ 烟草是被我们遗弃却又时常想起的爱人。”妇女很少抽雪茄，只有他们的配偶才抽雪茄。或许在文雅的英国社会，女士是不抽烟的，但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各个阶级的妇女都抽烟。两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烟草教科书》封面

和扎卡里·泰勒的妻子都在白宫抽烟！随着雪茄征服了抽烟，男人也开始抽起了雪茄。

在现代欧洲以外，中国人也同时完善了吸食鸦片的技巧。中国人早先从爪哇人那里学会了吸烟草和鸦片的混合物，后来却选择了鸦片，部分原因是统治者禁止抽烟。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吸食鸦片带来了更强烈的快感，且似乎更有益于吸烟者的健康。中国人将吸食鸦片变为现实的艺术。除了对鸦片的质量有高要求及其准备过程必须严格之外，鸦片管，也被称为“烟枪”，也有惊人的独特之处。烟枪是用来蒸馏而不是燃烧物质的，所以由两部分组成，即抽烟的管子和蒸馏碗（或者是节气闸）。灯芯必须适度地调整以产生适中的火焰；碗必须握在离热源适当的距离和角度；吸烟者必须正确地吸烟管，鸦片球才会慢慢蒸发而不是燃烧起来，然后会发出一种特有的在烟管碗里回响的吱吱声。随着鸦片逐渐蒸发，它转变成浓密的、蓝白色的烟，这些又浓又热的烟迅速膨胀，冲过鸦片球上的细孔进入烟管碗里，而后冷却，使固体物质从烟里沉淀下来，形成固体残余物，也就是无用的“渣滓”。现在剩下的仅包含鸦片最纯的、最芬芳的挥发性元素，这玩意儿进入吸烟者的嘴唇，芬芳而怡人，如天鹅绒般直落入肺部。纯净的烟带来的快感难以用笔墨描述。

在西欧，如伦敦和柏林的烟民俱乐部，抽烟礼节与个人吸烟者的社会化联系更为紧密。这些俱乐部供应咖啡和巧克力，这两种东西在18世纪和19世纪是消遣用的。尽管

烟管的填塞、刮擦、点燃和再点燃的动作成为大家的习惯，但正是在俱乐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可以交谈，有藏书和美食，抽烟便成了人们真正的习惯。工人阶级的酒吧、旅馆和酒水间也提供相同的服务。抽烟成为欧洲和北美工人阶级街区酒文化的一部分。1888年，保罗·高更画出了他非凡的《夜馆》，画里的主人公是阿勒斯通宵酒店的经理玛丽·基诺斯，她泰然地斜倚在吧栏上，整个房间都弥漫着她的顾客所抽的烟。

在穆斯林和印第安人世界中，烟民继续享受水烟袋产生的清凉所带来的乐趣。因为富有药草和药草植物方面的知识，他们使用的是各种各样的麻药、水烟和烟草，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实用性。值得一提的是，麻药和水烟在作诗、音乐、建筑、社会关系、婚礼和葬礼、幸运与不幸、家具、衣服、食物和性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抽烟空前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形式。开罗的麻药吸食馆就是一个例子，所有社会事件都在那里发生。

正如吃饭、喝酒以及其他娱乐活动一样，抽烟也是习惯所致。曾经我们的生存离不开食物，但现代社会需求的不只是面包和水。比尔·克林顿称，我们必须呼吸，但我们没必要吸入燃烧物质的残渣。人们对于吸烟的依赖，多是由文化决定的，或者是现代化的结果，因为它纯粹是一个生理上需要。虽然个人自由在民主中得以体现，但人类却更受制于一个“自由选择”的世界。商品不再仅是作为享受的东西，它们拥有一种转变人们生活的能力。在消费者的世界里，人们相信消费能丰富自己的生活，尽管在现实中人们因为花费变得更贫穷，特别是购买那些能带来及时和直接快感的東西。因此，和朋友一起抽烟不仅是一种快乐的分享，更是一种由时尚和艳羨驱使的魔力。此外，大部分人是从吸取某些物质，比如大麻、烟草或鸦片中找到快感的。随着金钱成为人类能力的关键衡量标准，花费在抽烟上的金钱很快变成界定烟民生活的一种潜在力量。因此，抽烟成为一种美好生活的标志，是工人阶级的“灰姑娘之梦”（1888年，W.D. 威尔斯和H.O. 威尔斯开办了英国第一个机器制造香烟的品牌，名为“灰姑娘”）。然而，这种允诺就和香烟本身一样不可名状，只可意会。

对烟草的依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由烟草工业和烟草贸易引起的。贸易产生的利润刺激着工业的增长。产业越大，产品和种类就越广泛，因此烟民也越多，利润也越大。到19世纪末，抽烟成为大买卖。1889年，詹姆斯·杜克花了八十万美元向全球行销香烟。正是他的美国烟草公司推动了人们对烟的狂热。他也是第一个认识到广告（包括可用来收集的烟盒）和产品本身同等重要的人。早在1885年，杜克就把烟盒柔软的包装压硬，使它们成为“可收集的”爱好。杜克通过新本萨克自动卷烟机使香烟的制造机械化，每天十小时可生产十二万支香烟，相当于四十个卷烟工人以每分钟卷五根烟的速度卷十个小时。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现代广告的诞生促进了烟草利润的激增。

1880年代，运输的改进、产量和包装质量的提高，使厂家能够将同一品牌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于是便产生广告，广告公司也如野花般绽放，几乎贯穿整个19世纪。烟草产品成为全球销售新媒介的主要目标之一。

现代广告的力量扎根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它利用廉价报纸和杂志的激增，以及公众对广告牌和广告形象的迷恋来传达信息。早期最引人注目的烟草广告载



刘易斯·卡罗尔所著《爱丽丝梦游仙境》(伦敦, 1865)中的毛毛虫

的追求中联合起来, 这个目标被定义为“每个人都需要”。因此, 通过抽相同品牌的烟, 烟民的所有希望便聚集在一起得以统一, 也因此而简单化。商标的形象不是用来定义烟草产品, 而是用来定义抽烟本身。每次购买时, 顾客都被提供了一种强烈但模糊、

体之一是《库珀的烟草植物》, 它是 1870 年至 1884 年间由库珀烟草公司在伦敦出版的一本期刊。无独有偶, 1875 年 10 月, 波德莱尔的短文《论麻药》在英国出版, 西奥菲勒·高提尔的《论鸦片》也在一个月后出版了。库珀烟草公司的期刊致力于描述绅士烟民沉溺于各种形式的吸烟的快感, 目标群体指向城外或省内的中产阶级, 至少它本身是这么宣称的。中产阶级的自我形象多么重要! 1865 年路易斯·卡罗尔出版的《爱丽丝仙境漫游记》一书包含了由约翰·坦尼尔画的几副非凡的图画, 画中毛毛虫和爱丽丝长时间无言地对视, 最后毛毛虫从自己嘴巴里抽出水烟袋……

在喧闹的资本主义时代, 广告已成为现代文化的生命和梦想。就连卷烟工人也依靠广告来销售他们生产的产品。通过广告, 所有的消费者在对同一目标的



约翰·里奇的卡通画《美国习俗》, 刊于 1851 年《庞奇报》画中一些美国妇女穿着束腰外衣和裤子出现在伦敦街头, 一派典型的厚脸皮形象



约翰·赫尔德的慢动作照片《翘二郎腿的女孩》，刊于1927年《生活》杂志

不可思议却又重复的保证：自己也可以和广告中的烟民一样豪迈。这些意向的怀旧之感不再是有关抽烟的温暖和个人的快感，而是控制当前、面向未来的能力。因此雪茄是以强大的古君主国的名义销售的，而香烟承诺一个“结婚蛋糕”。而在中国，鸦片剂则假借传统炼丹药丸之名担保人们长生不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广告也将妇女和儿童变为魔力烟草的潜在顾客。虽然人们争辩说妇女和男人一样可以在公众场合抽烟，但至少直至19世纪早期，整个世界都认为女人在公众场合抽烟的想法是不能接受、令人反感的。和19世纪晚期的男女淫乱和卖淫现象紧密相连，抽烟女性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同时期西欧（和美洲）及中东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和在欧洲、美洲作为基本议题的选举权的确立，人们的态度开始改变。妇女抽烟的争议成为争取妇女解放运动的舞台。在纽约举行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便是1840年代的幽默素材。尽管许多出席会议的女士也是烟草废除主义者和戒烟的提倡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居然要求妇女也有吸烟的权利。抽烟成为妇女的权利侵害了传统的男士活动，随着19世纪的到来，出现了一连串体现抽烟的影响的画像，甚至国际冲突都可以用一支雪茄来解决！平等对人们来说是件好事，平

等也意味着抽烟。

随着香烟取代了雪茄，各个社会阶层的妇女也开始抽烟。1900年，英国百分之八十的烟草以雪茄的形式消费，而到了1950年，百分之八十的烟草则以香烟的形式消费。香烟的消费者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私下里，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妇女抽的香烟越来越多，它成为1915年“新女性运动”的一个标志。T.S. 爱略特写道：“南希·艾莉科特小姐抽着烟 / 跳着各种现代舞 / 她的阿姨们并不十分清楚她的感受 / 但她们知道香烟是时髦的”。1928年，美国烟草公司主席乔治·华盛顿·希尔决定投入一个全新的活动，让妇女参加本公司的“好彩香烟”活动。在爱德华·博内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侄子）的帮助下，好彩牌香烟被誉为献给妇女的“自由的火炬”，她们必须和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愚蠢的偏见”作斗争。1929年，博内斯聘请的十个初涉上流社交场合的年轻女士抽着好彩香烟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她们建议女士“抓住幸运而非糖果”，这也强化了抽烟有助于减肥或至少是缓解饥饿的古老说法。纤细的、兼具两性特征的身体是“新女性”的另一标志。此次活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至少对公司来说是这样。“好彩”的销售额增长到四百三十点二亿美元，而三年前其销售额仅有一百三十点七亿美元。“好彩”承诺妇女自由，因此抽烟变成了“解放”妇女的一种“必需”。

同时，现代生活压力的增加，迫使许多烟民更热切地渴望通过抽烟来缓解压力。如果之前抽烟一直在被认为是一种快感或一种药方，或者是一种恶习和疾病的诱因之间游移，那么到了19世纪，医疗机构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了。与此同时，烟叶被视为一种治疗梅毒的药品。在15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虽然从第一次现代梅毒的流行开始，人们已意识到疾病的传播和性行为的关联，但直到20世纪早期，科学家才证明了二者的真正联系。人们认为，烟草在精神上的危害性更甚于生理上的。17世纪，詹姆士一世在牛津发起一场关于抽烟的辩论，反对者出示了吸烟者变黑的脑颅和内脏来证明吸烟的危害。但很明显，他的反对根本上不是精神层面的，对于抽烟的危害应该有别于对吸烟的精神攻击。1761年，约翰·希尔已明确地将抽烟和鼻道癌联系在一起，这很快地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22] 19世纪，科学家开始研究抽烟对健康的影响。1857年，J.B. 尼尔在兰溪特询问保险公司是否会“对成瘾的烟民采取有关的预防措施”。吸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健康问题，而烟民的反应则是无视有关“抽烟的危害”的怀疑。

尽管19世纪晚期人们对抽烟和各种细胞变化的认识逐渐增加，但抽烟仍然和道德沦落联系密切。1903年，健康改革家J.H. 凯洛格说：“抽烟用一种最确定的方式破坏了健康和精神……这是一种野蛮的行为，比美洲野人更没有任何赎罪特征。”^[23] 童子军的创建者巴登·鲍威尔也谴责吸烟，因为“童子军是不抽烟的。任何男孩都可以抽烟；做这件事情并非那么美妙。童子军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不是这种傻子”。伴随着所有的道德和科学的讨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1948年，理查德·多尔爵士才开始设法说服人们认识抽烟对健康的有害影响。他通过一连串的肺癌流行病学研究，使英国和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确信抽烟确实危害到人们的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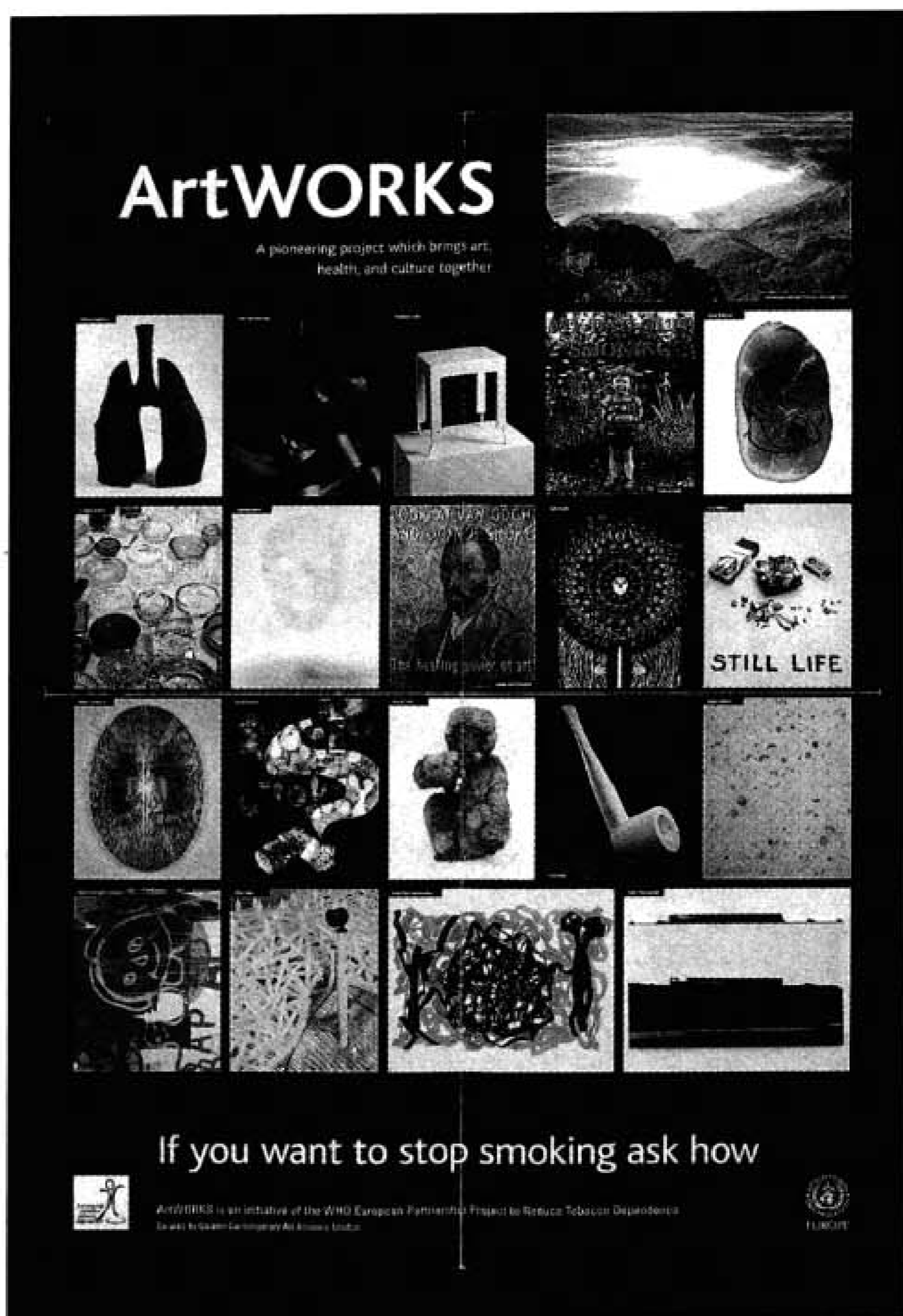
反对抽烟的公共卫生运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此运动和20世纪早期出现的反

毒品运动一致。到 20 世纪早期，反毒品法在欧洲和美国确立了。吸食鸦片被视为是一种祸害，而吸食大麻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则被认为是不道德且危及生命的。据 1953 年美国麻醉药局专员亨利·安斯林格所说：“根据用途，鸦片可以是一种祝福或是一种诅咒，但大麻始终只是一种害人的、使人们精神和道德沦丧的祸端……”^[24] 吸烟是有害的，无论吸什么东西。烟草、大麻和鸦片都是个人和民族健康危害的来源。

到 2000 年，全球有十一亿烟民。男性吸烟人数是女性的三倍。如今烟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有三亿四千万烟民，每人每年平均抽掉一千七百九十一根烟。1902 年，他们抽了三亿支烟，1924 年是四十亿支，到了 1928 剧增到两百八十亿支。1996 年中国预防医学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烟民（百分之六十一）相信抽烟没有多大

害处。尽管如此，1997 年 5 月，政府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抽烟。在政府颁布的法令下，通过电子媒介和印刷品发布的所有烟草广告确实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消失了。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为制订国际反吸烟条约而奋斗，该条约预定在 2003 年出台。

世界卫生组织驻欧洲办事处的新闻稿高呼“艺术能让你放弃吸烟吗？艺术家为世界卫生组织创作作品”的口号。^[25] 这是一个莫名的主张。“一百个美伦奴的玻璃烟灰缸（斯特凡诺作），一片加醋的火腿（由德尔瓦作），以及一尊巨大人肺的蓝色柔软雕塑（由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教授米列娜博士作），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2000 年至 2001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展览在伦敦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举办，旨在提高人们对抽烟的危害、戒烟的好处以及成功戒烟的困难的认知，还试图告诉人们如何求助医疗人员进行戒烟。艺术能成为健康政策的一种工具，具有治疗功效吗？展出的资料使答案变得清晰。在展出的艺术品里，没有主张飘逸的美，也没有主张神圣，有的只是数字确凿的论证：“研究表明，英国的一千二百万烟民，有百分之七十已准备戒烟。”艺术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作用是“减少上瘾的烟民因烟草而导致的死亡和疾病，防止不吸烟的人开



世界卫生组织赞助的香烟艺术展的海报



19世纪90年代卡通画《灰色星期三》的人物

始吸烟”。艺术意象让我们畏惧且远离香烟。那么，后现代艺术在这里充当的是广告代理吗？20世纪的艺术家用（如安迪·沃霍尔）模仿广告艺术，包括那些抽烟的广告艺术，目的不在于突出广告如何创造意象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意象让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参加此次展出的创作者给我们提供了“戒烟的好技巧”，并提倡“不要单独进行”，你需要找的人是“你的家庭医生、药剂师或其他专家”，而不是当地的艺廊、作画的人或表演艺术家。多么奇怪，艺术竟能用来治疗！

看一幅画能抑制人们晚饭后渴望一支 Uppman 牌雪茄的欲望吗？加文·特克说，一只吸烟猴娃娃的视频能说服观众这样几点：（1）就连猴子也会上瘾；（2）人和猴子一样，因为他们不能拒绝烟；（3）他们比猴子好多了，通过理性的选择，他们能明白戒烟的好处。这些艺术作品确实有和 20 世纪 50 年代菲利普·莫里斯专栏一样的力量吗？（那时早期的电视观众幻想他们能真正“时髦”起来，坐在一间昂贵的旅馆听“呼叫菲利普·莫里斯”。）他们能说服如今在世界烟草消费中遥遥领先，急切吐出“红塔山”烟云的中国人吗？（“红塔山”是中国最有名的香烟品牌，该公司股票名列中国股票市场的首位。）

艺术或许不能用来治疗，因为要使自己戒除任何东西（包括烟草）都是困难的。1535 年，拉斯·卡萨斯在《印度群岛的历史》中说：“在我斥责烟民，告诉他们抽烟是一种恶习之后，他们回答说自己无法停止吸烟……”抽烟既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恶习，是高度舒缓的来源，同时又是十分危险的。1923 年，伟大的意大利籍犹太小说家伊塔罗·斯维沃写了《齐诺的自白》，这是最伟大的叙述主人公戒烟的小说。“现在我老了，没人指望从我这得到任何东西，我继续从抽烟转到决心戒烟，然后又开始抽烟。现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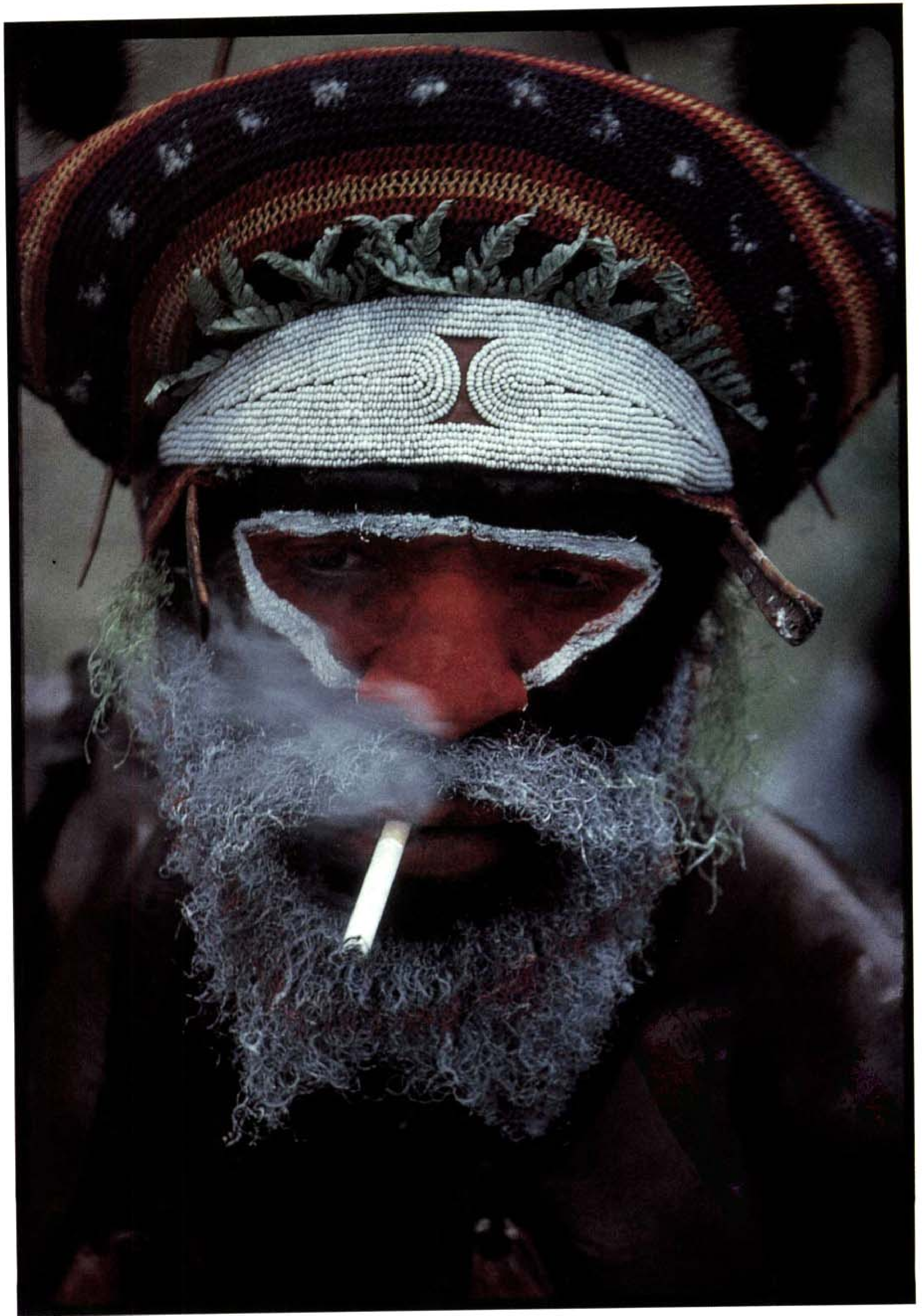
种决心有何意义呢？或许我就像长期消化不良的戈尔多尼，他一生都在患病却想健康地死去。”但仅仅再抽一口烟后，或许就能看到一些反吸烟的非凡作品！

支持或反对吸烟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管吸烟是出于礼节还是习惯，是为了快感还是治疗疾病，从一开始，对吸烟的争议就冲击着我们敏感的神经。根据1501年至1502年间哥伦布作于西班牙的《预言书》，发现美洲的航行是哥伦布受到自己奇妙幻想启发的行为，他认为航行会带他们找到黄金，从而资助西班牙进行一场新的宗教战争，夺回圣地巴勒斯坦。^[26]就连哥伦布也不大可能想到他的另一样进口物品——烟草——所拥有的财富、影响力和奥秘。尽管数千年来，吸食燃烧的药草已成为人类经历的一部分，但抽烟的历史同时形成了发明和文化，捕获着人们的想象力。这让我们想象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吸食一系列的植物和其他物质，它们究竟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还是痛苦之源？是偶像还是商品？吸烟的魔力和围绕着它的意象被持续塑造着，并随着我们不断变化着的对世界的理解而发生改变。

注 释：

- [1] 拉斯·卡萨斯的描述首次以哥伦布航海日记的形式出现（马德里，1825）。作为既定的事实，对它有多种解释，例如杰罗姆·布鲁克斯《烟草经历了好几个世纪》（伦敦，1953：12-15）。
- [2] 伊恩·盖特莱《烟草：烟草如何引诱世界的故事》（纽约，2001：1-20）。
- [3] 莎拉·奥古斯塔·迪克松《灵丹妙药或珍贵的祸根：16世纪关于烟草的文献》（纽约，1954：119）。
- [4] 同上，第95页。
- [5] T.布赖《维吉尼亚新发现的土地的简短和真实的报告》引述亚历山大·加内特《尼古丁的梦想：烟草在东北美洲史前和早期的历史》中的有关论述。参见乔丹·古德曼、保罗·E·乔伊和安德鲁·夏洛克编《消费习惯》（纽约和伦敦，1995：74-75）。
- [6] J.W.雪莉《托马斯·哈瑞尔特自传》（牛津，1983：432-434）。
- [7] 迪克松《灵丹妙药或珍贵的祸根》，1954：98。
- [8] 詹姆斯·沃顿编《烟草全书》（伦敦，2000：22）。
- [9] 《圣经》16：46-50。
- [10] 希罗多德著、德塞林科特译《历史》（伦敦，1927：295）。
- [11] 盖特《烟草如何引诱世界的故事》，2001：31。
- [12] 贾斯珀·瑞德利《都铎王朝时代》（伦敦，1988：333）。
- [13] 参见乔丹·古德曼《文化依赖：历史中的烟草》（伦敦和纽约，1993：66）。
- [14] 巴里·铃木《日本的第一个吸烟斗者和英国位于平岛的贸易机构（1600-1621）》（巴黎，1997：15）。
- [15] 李志勇编《张景岳医学全书》（北京，1997：1546）；方以智《物理小识》（台湾，1974：237）。
- [16] 引自郑天毅、许斌著《烟文化》（北京，1992：62）。
- [17] 引自沃尔夫·冈《天堂的滋味：调味料、刺激物、麻醉剂的社会历史》（纽约，1993：103）。
- [18] 叶梦珠《阅世编》（上海，1981：167）。
- [19] 沃顿《烟草全书》，2000：33。
- [20] 《对烟草商的警告》（伦敦，1936：书名页）。
- [21] 沃顿《烟草全书》，2000：60。

- [22] 埃德加·潘科编译《巴尔扎克：社会主义的病理学》（莱比锡，2002：176-184）。
- [23] J·H·凯洛格《生活史》（1993：453）。
- [24] 威廉·麦卡里斯特《20世纪的海外毒品交易：一部世界历史》（伦敦，2000）；杰克逊·威廉·哈瑞生《酒精和鸦片的社会学的历史》（海牙，2000）。
- [25] 由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赞助，2000年11月。
- [26] 斯蒂芬·芬尼《基督教传统的奥秘》（伦敦和纽约，2001：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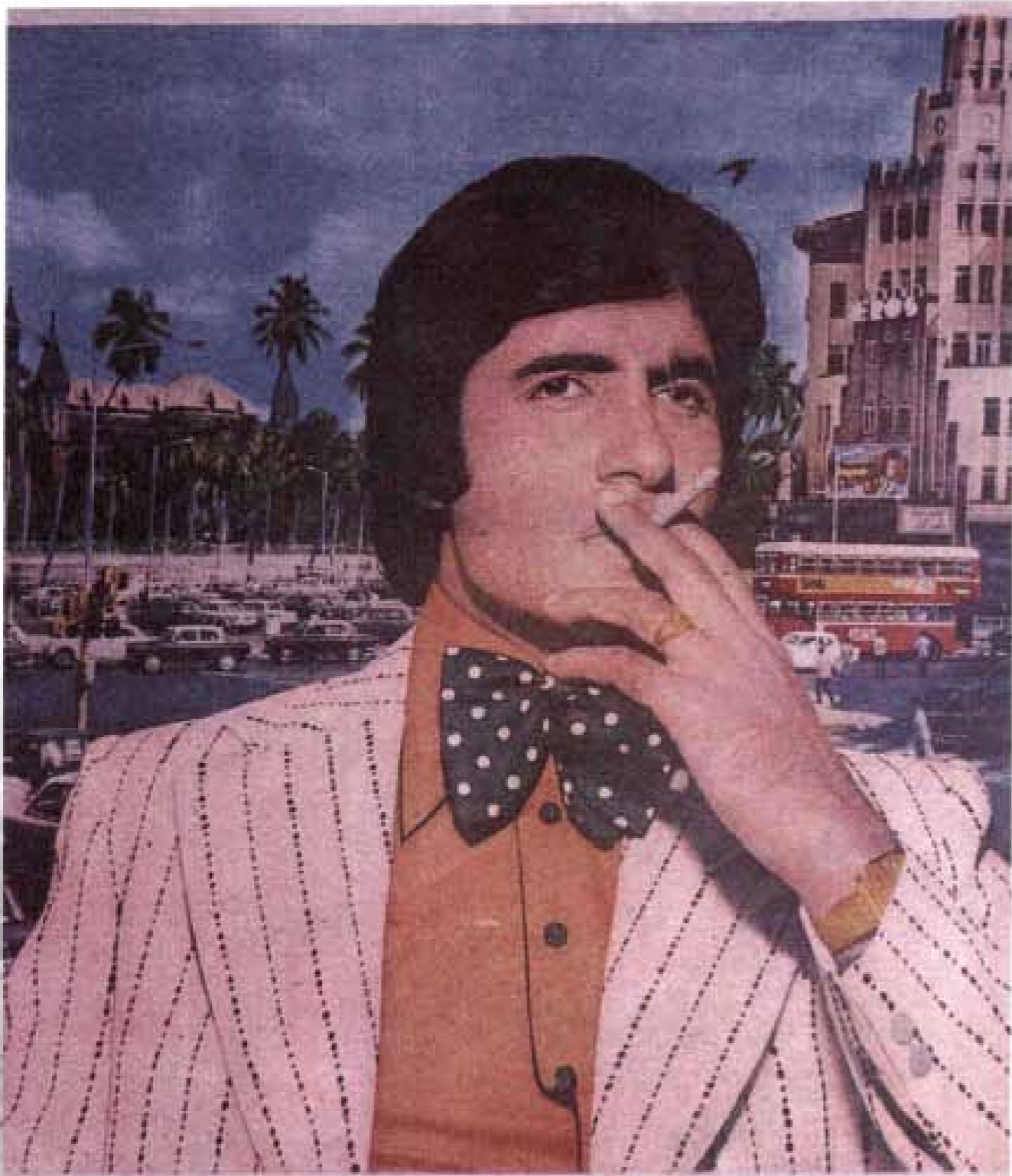






1870-1900 清朝末期の古い写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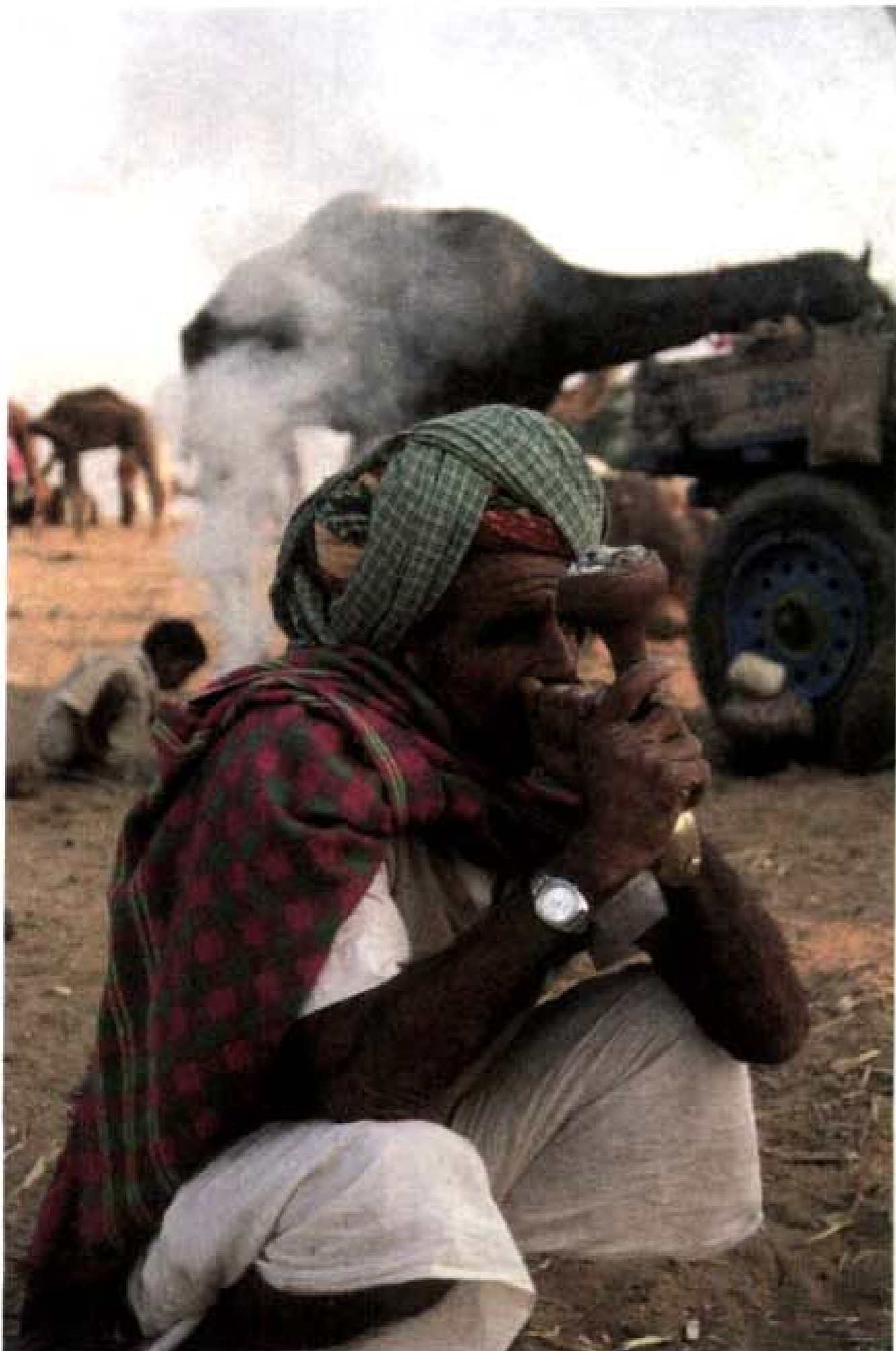


भरपूर शाप तथा स्वच्छ धुलाई के लिए । कोमत नही... बवालियो बेजिए कोन :

चेतक छाप साबुन प्राक्ति डिटर्जेंट टिकि

निर्माता : महेश सोप वर्क्स इध तलाई, उरजेन

निर्माता : गुजरात डिटर्जेंट्स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इस्टेट, मनसो रोड, 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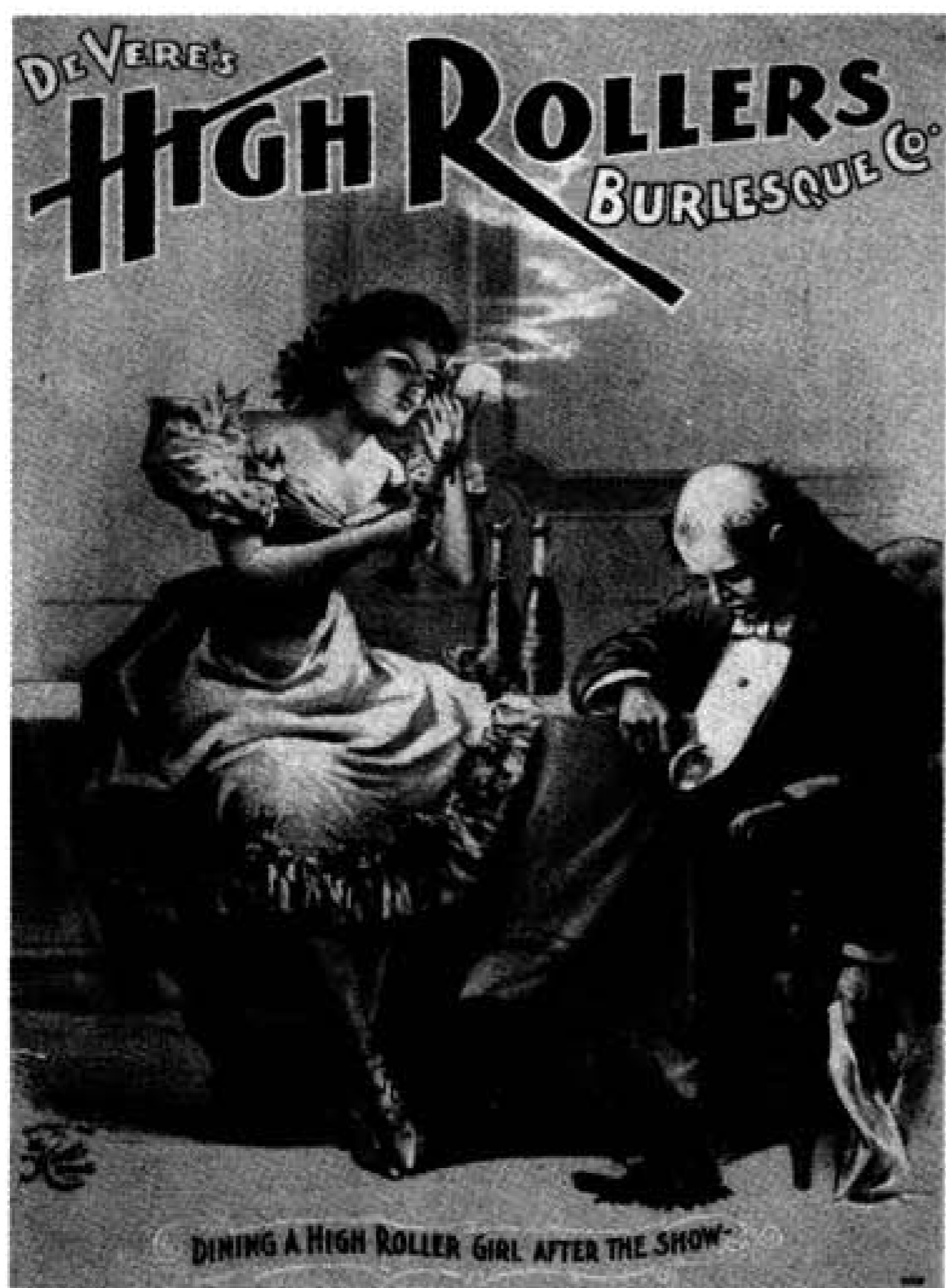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由全球三十余位作者共同写就，这些作者分别来自人类学、历史学、美术史、艺术史、医学史等各个领域，他们以通俗而生动的方式，为读者描述了吸烟的起源、传播及其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种族、性别等因素的互动过程，并就吸烟的生理学等焦点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对人类吸烟的历史作了深刻的文化解读。因此，本书既是一部吸烟史，更是一部文化史。

吸烟与广告

你能让别人产生吸烟的欲望吗？毫无疑问，烟草是19世纪末促进当代广告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香烟一定是有害的吗？吸烟让人上瘾或者产生依赖，是毋庸置疑的吗？欧洲的第一代烟民，1603年成为英格兰国王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相信以上的论断。1604年，他用很长的篇幅论述了反对吸烟的道理，他观察了当时的烟民，“吸烟……和祖先时代已经不同了，就像老酒鬼忍受长期的清醒一样……”即使在大众已经接受了吸烟的年代，个人有选择权的观点还是很与众不同。《奥赛罗》评论员埃古拉格在回复詹姆士一世的指示时明确说道，“身体就像苗圃，我们的思想就如园丁：我们种植荨麻、莴苣、牛膝草或者百里香，或者播种单性的草籽，或者用大量植株来分散种植……掌握这个变化的权力受人类意识的控制。”人类全部的活动，似乎恰当解释了吸烟现代自治的困境：我们要再次做摧毁我们选择能力的事情，还是接受吸烟的诱惑？

直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烟草广告的巨大胜利，美国知名品牌飞利浦·毛里斯在广告中提出了健康的理念：



演出结束后与滑稽剧女演员共进晚餐——德瓦尔老千滑稽公司的板画，约1898

一些杰出的医生发现并报道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将几种知名香烟加以对比：“吸其他四个牌子的香烟，产生的焦虑症状是平均数的三倍——焦虑持续的时间是平均长度的五倍——这与飞利浦·毛里斯牌的香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的竞争对手切斯特菲尔德随后提出“要提供科学的事实证据来支持吸烟”。一个负责咨询的组织不久后报道了一项医学专家的研究成果，专家们研究了吸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通过六个月的观察，吸烟者的耳、鼻、喉以及其他香烟经过的全部器官，并未发现不良影响。”吸烟既不会使人上瘾，对人体也没有害处——带给人的只有快活。到了19世纪50年代，烟草广告着眼于强调有益健康和惬意感受两个



好彩香烟广告，美国烟草公司，约 1932



好彩香烟广告，美国烟草公司，约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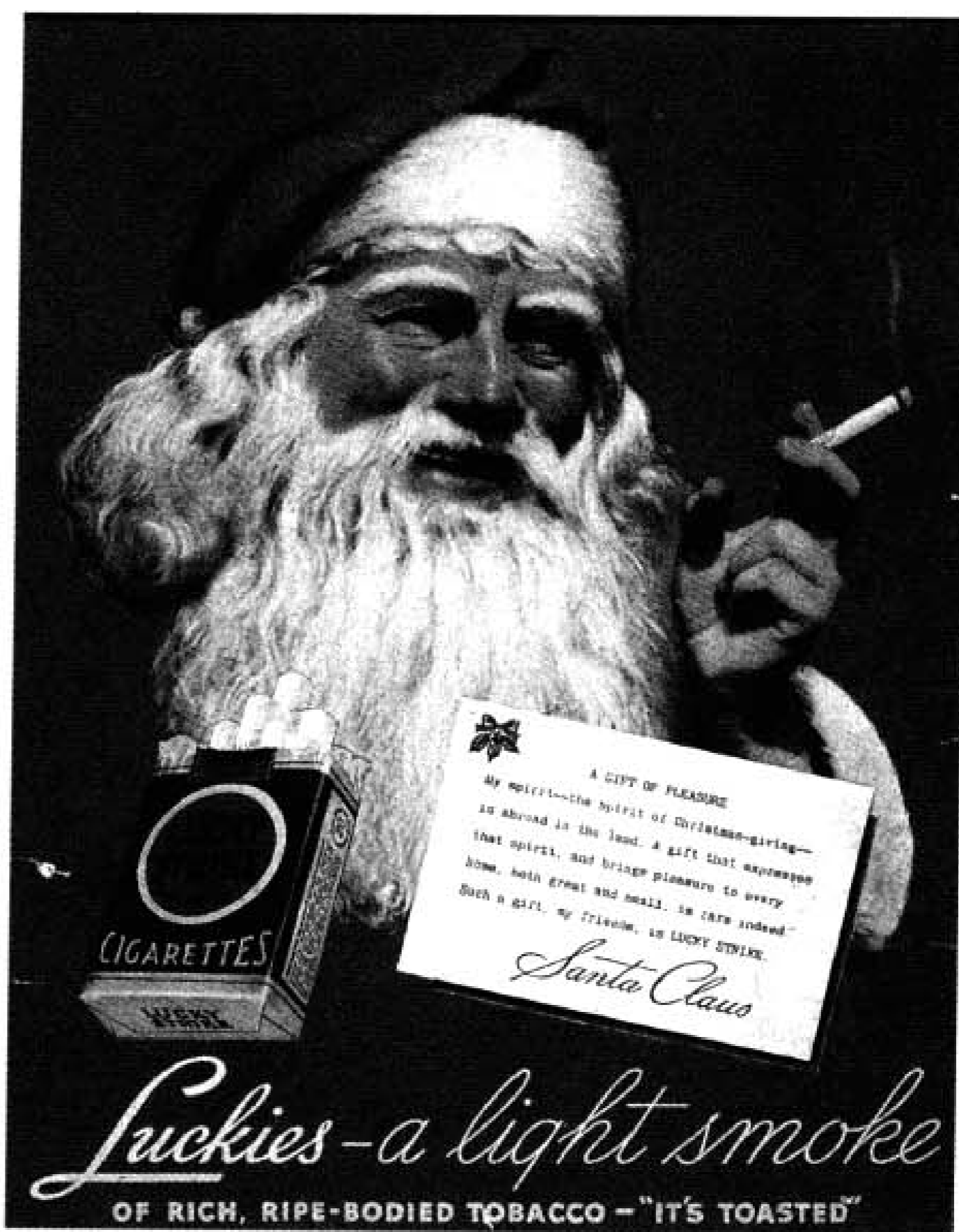
利吉特 & 迈尔斯烟草公司广告，约 1934



好彩香烟广告，美国烟草公司，约 1934



利吉特 & 迈尔斯烟草公司广告，约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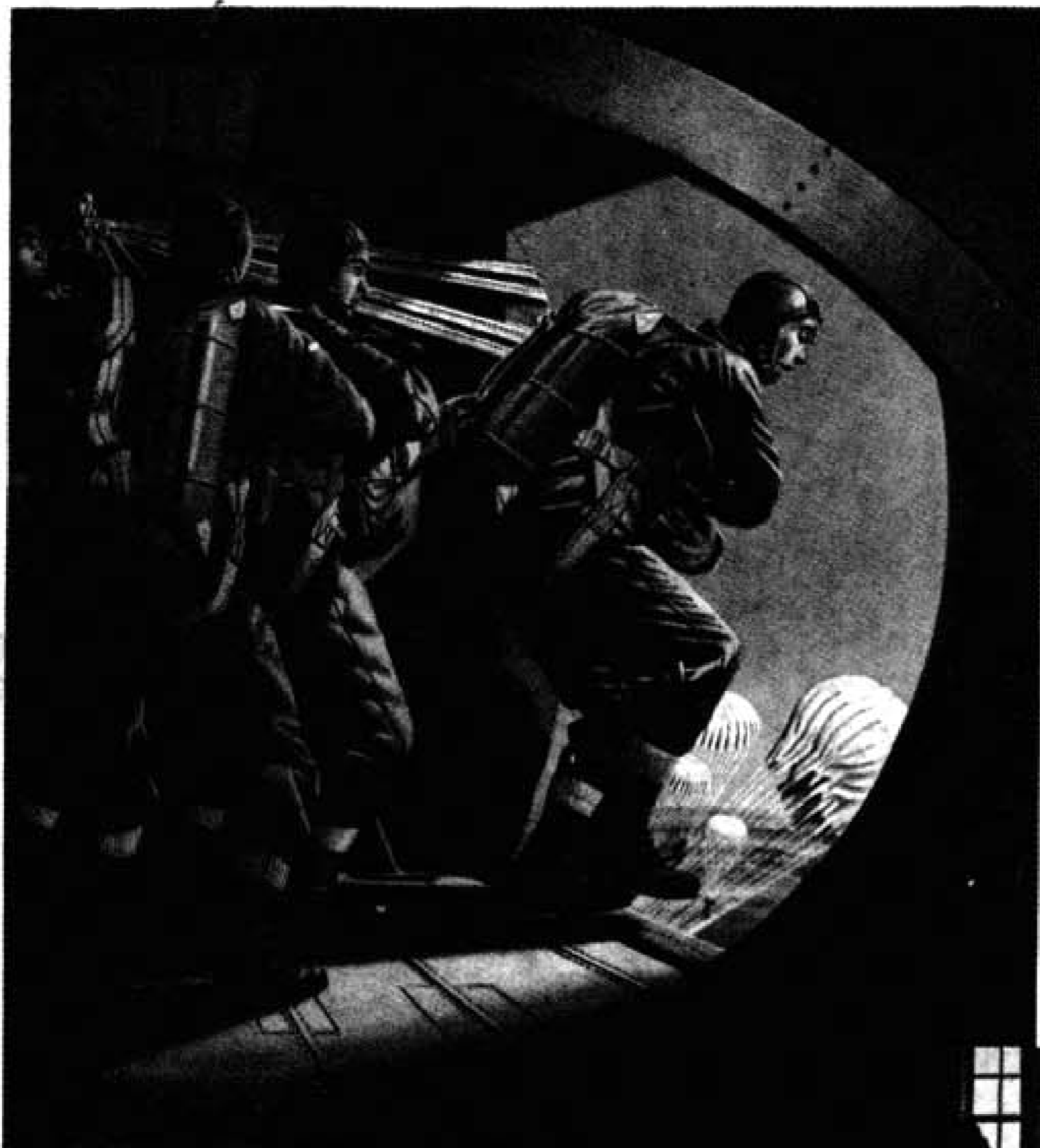


好彩圣诞香烟广告，美国烟草公司，约 1936



好彩香烟广告，美国烟草公司，约 1939

YOU WANT STEADY NERVES *to "hit the silk" in a paratroop attack*



"JUMP" is the command that starts you on that headlong earthward plunge through space, but the real order of the hour is *steady nerves!* For these soldiers of the sky—for every one of us! So take a tip from the men in the front line. Their favorite is Camel—the slow-burning, mild cigarette. Make Camel your cigarette, too—starting *now!*



YOU BET I SMOKE
CAMELS. THEY'RE
EXTRA MILD
AND THEY ALWAYS
TASTE GREAT



With men in the Army, the Navy, the Marine Corps, and the Coast Guard, the favorite cigarette is Camel. (Based on actual sales records in Post Exchanges, Sales Commissaries, Ship's Service Stores, Ship's Stores, and Canteens.)

*Important to Steady Smokers:
The smoke of slow-burning*

CAMELS

contains

LESS NICOTINE

than that of the 4 other largest-selling brands tested—less than any of them—according to independent scientific tests *of the smoke itself!*



"I HELP MAKE THOSE PARACHUTES," says Helen V. Lynch, Pioneer Parachute Company employee, "and I can tell you 'nerves' don't go in my job. Smoke? Yes, I enjoy smoking. I smoke Camels. They have the mildness that counts and Camels don't tire my taste." Yes, for all of us—front line, factory, farm, whatever your task—this is a "war of nerve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now, is your choice of cigarettes. Smoke Camels.

B. 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Winston-Salem, N. C.

二战时期的骆驼香烟广告

at every
port
of call

SENIOR SERVICE
Satisfy

1962年8月《环球生活》上的广告

**PALENIE TYTONIU POWODUJE
RAKA I CHOROBY SERCA**
Minister Zdrowia i Opieki Społecznej

West

Test it.

Ekonomiczne spalanie

West
Lights

“试试这个”，1997年5月波兰版《花花公子》上的广告



1966年6月《巴黎竞赛》上的广告



1976年6月《花花公子》上的广告



印度比迪香烟广告，约1992



“唱歌的胖女人”，
2002年2月时运牌香烟
标志着英国烟草广告
的终结



反烟广告海报，纽约，2001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录



前言 / 1

支持或反对吸烟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管吸烟是出于礼节还是习惯，是为了快感还是治疗疾病，从一开始，对吸烟的争议就冲击着我们敏感的神经。它们究竟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还是痛苦之源？是偶像还是商品？吸烟的魔力和围绕着它的意象被持续塑造着，并随着我们不断变化着的对世界的理解而发生改变。

历史与文化中的吸烟 / 1

对人类而言，吸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无论在什么场合，吸烟的行为都加强了我们在人际圈中的关系，我们把它称作交际。甚至独自吸烟也能加强人际关系，虽然它强调了远离他人。吸烟使一切变得完美，直到人们担忧它的危险——这个担忧从西方使用烟草之初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中美洲的抽烟礼仪 / 2

快感或是危险：近现代英国早期的吸烟 / 11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吸烟史 / 17

烟草在伊朗 / 29

吸烟和印度草医学 / 39

日本的烟草文化 / 46

明清时期中国的吸烟现象 / 54



CONTENTS

我们如何吸烟：吸烟的配件和器具 / 62

 鸦片的鼎盛时期 / 70

 哈瓦那雪茄和西方想象 / 82

 百年丁香烟 / 89

 牙买加大麻 / 93

 吸烟和爵士乐时代 / 106

 近现代中国的吸烟状况 / 113

 现代日本的吸烟状况 / 125

 体验可卡因 / 132

 吸烟与社会性 / 139

艺术与文学中的吸烟 / 145

缕缕轻烟虽是短暂的，却同样反映了艺术世界的美感。吸烟——不管是吸鸦片、烟草还是大麻——不仅仅关联着艺术，甚至成为艺术的替代品。吸烟既热烈又清爽，它的作用也多种多样，不仅代表着创造力，还代表着它所存在的社会。

 符号和意象：17世纪以来绘画艺术中的吸烟 / 146

 后宫里的忽卡：吸烟和东方主义艺术 /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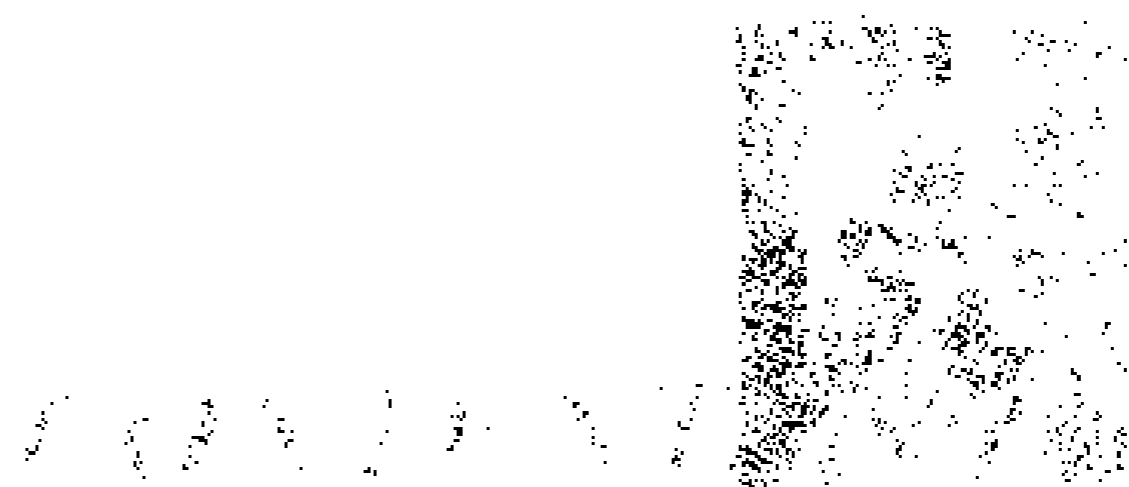
 歌剧中的吸烟 / 169

 赞美尼古丁女郎：逝去的烟草文学时代 / 175

 银幕中的香烟：从魏玛到好莱坞 / 188

 《妈妈和娼妓》中作为生活方式的吸烟 / 196

 吸烟和艺术 / 205



吸烟，性别与种族 / 216

在局外人的多重想象中，吸烟的妇女、异族和殖民者存在着强烈的世界感，吸烟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烟草在非西方的使用，尤其是在东亚，已经为一种和现代有关的新的意义搭建了舞台。

犹太人和吸烟 / 217

19 世纪烟草艺术中被商品化了的非裔美国人 / 224

女性与 19 世纪的吸烟形象 / 233

直面同性恋者的吸烟史 / 243

性别与种族 / 250

吸烟焦点谈 / 257

毫无疑问，烟草是 19 世纪末促进当代广告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 20 世纪中期，伴随着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人们对惬意感受的追求与 17 世纪并无大异。如今的烟草促销广告——当然是提倡吸烟的广告——被吸引人的反烟广告所威胁。然而它们并不是必然的反烟行动，因为它们强调的恰是吸烟的惬意所带来的危害。

我们为什么吸烟——吸烟生理学 / 258

吸烟、科学和医学 / 266

20 世纪消费者的信心 / 272

万宝路牛仔和吸烟恶名 / 281

吸烟与广告 / 291

历史与文化中的吸烟

Smoking in History and Culture

对人类而言，吸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无论在什么场合，吸烟的行为都加强了我们在人际圈中的关系，我们把它称作交际。甚至独自吸烟也能加强人际关系，虽然它强调了远离他人。吸烟使一切变得完美，直到人们担忧它的危险——这个担忧从西方使用烟草之初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中美洲的抽烟礼仪

弗朗西斯·罗比塞克*

哥伦布于 1492 年 10 月 12 日到达圣萨尔多（萨尔瓦多首都）海滩，他的航行日记是第一篇用欧洲语言描绘烟草的报告。他写道：“当地居民带着水果、木制渔叉和一些香味四散的干叶子（即烟草）。”当西班牙人用他们的剑劈开一条通向美洲大陆的道路时，在不经意间也开始向其所到之处散播着与烟草有关的习俗。

烟草作为新生事物，不仅是在中美洲社交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奢侈品，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耶稣会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加维亚·克拉维杰诺说，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饭后抽烟的习惯就很盛行了，阿兹特克领主“抽食烟草以便安然入眠。”^[1]

烟草与玛雅人

有关西班牙统治时期玛雅人如何使用烟草的早期记录，既让人质疑又让人费解。西方人胡安·迪扎·格里雅乐拉探险队的牧师迪扎是第一个记录玛雅人抽烟习惯的人。他所带领的探险队于 1518 年登陆濒临尤卡坦海岸的科苏梅尔岛，他曾描述到当地人向格里雅乐拉队长呈上“散发着迷人的焦味香气”的芦苇。

与玛雅人初次接触时，西班牙人发现他们用又长又厚的烟草叶制成简单粗糙的雪茄烟，与今天的拉坎顿印第安人抽的烟非常相似。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中美洲较受欢迎的雪茄烟一般都由三部分组成：烟草，烟皮和外卷烟叶。作为雪茄烟芯的烟草是形成烟身和雪茄形状的内部核心；烟



一个拉坎顿印第安人在吸烟

*弗朗西斯·罗比塞克（FRANCIS ROBICSEK）：卡罗莱纳州医疗中心心脏研究所心血管手术科主任，北卡罗莱纳大学临床手术教授，北卡罗莱纳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除了在其专业领域发表大量文章外，还出版过五本关于中美洲人类学和玛雅历史与文化方面的著作。

皮被认为是“雪茄棒”的叶子；外卷烟叶或外包装则是由带状叶子螺旋串联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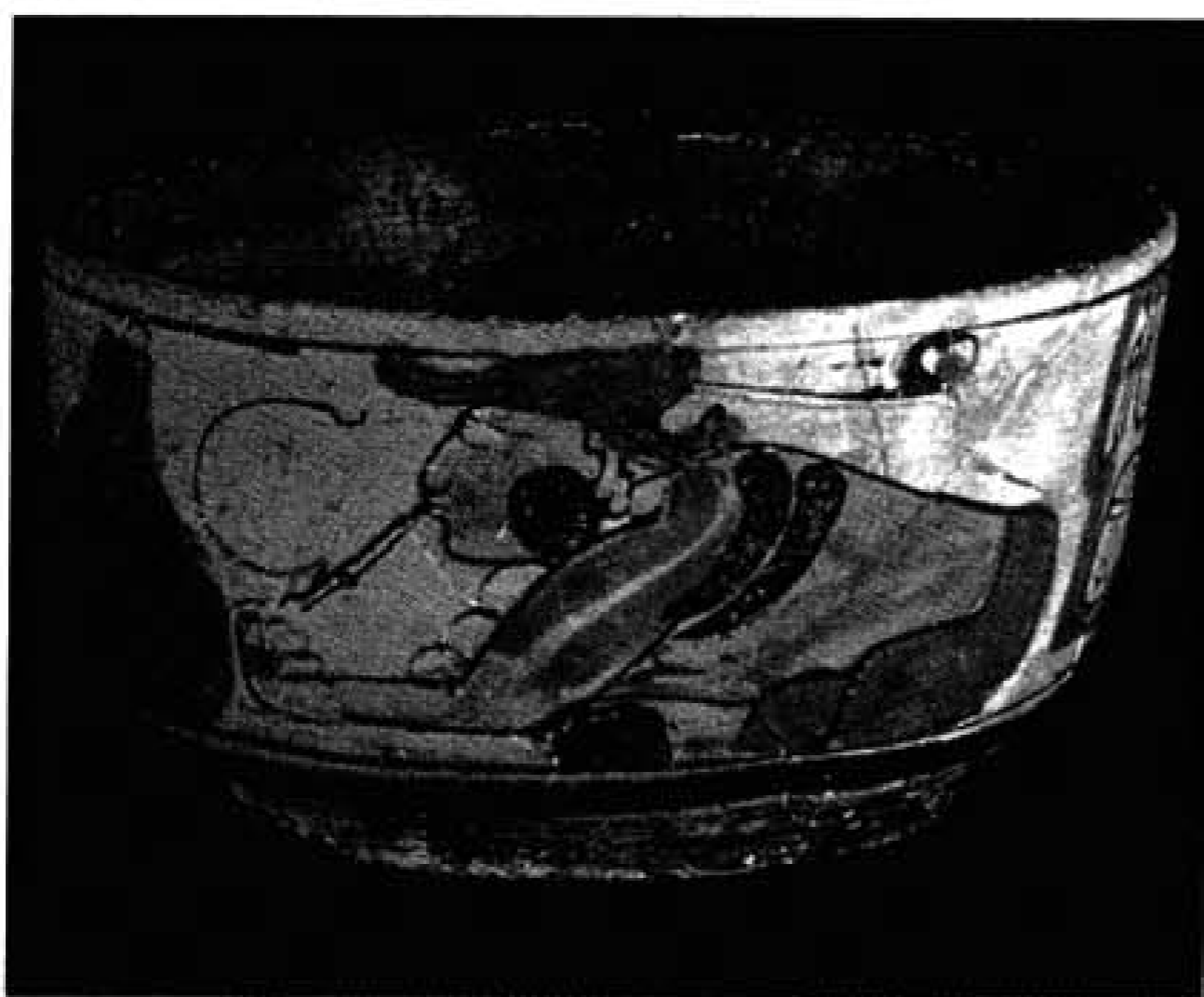
据猜测，古玛雅人抽烟的习惯，可能起源于祭司和巫医举行仪式时用的香。与用烟斗抽烟的北美当地人不同，玛雅人全都使用雪茄烟和卷烟，这一现象在艺术研究和考古发现两方面都值得关注。

早期的手抄本中已记载了不同种类的香烟，有些全用烟草制成，有些则由不同种类的植物的叶子卷成。烟可以算是古中美洲唯一能够引以为豪且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发展潜力的产品。在欧洲，早期烟草的使用方法从雪茄烟演化而来。一些陶瓷艺术品上的图画表明，玛雅人甚至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抽烟的习俗。

有一种原始香烟是用玉米叶子作烟皮包裹而成的，其使用方法在中美洲地区仍然随处可见；另一种原始香烟就是所谓的蔗烟，这种香烟在玛雅国土及其北部邻国阿兹特克较为流行，它由一小片芦苇或甘蔗和着烟草粉末填充后，再用一种织物或线绳绑住，最



来自后古典期（800-900）玛雅文明、危地马拉北碇地区的彩色花瓶，瓶身绘着一幅复杂的神话场景，其中有一位君王坐着抽着雪茄



来自后古典期（900-1000）玛雅文明、墨西哥尤卡坦的浅碗，碗上画着一个坐着抽雪茄的人



来自后古典期（600-800）玛雅文明、危地马拉蒂卡尔地区的彩色花瓶，瓶身绘着一位坐着抽雪茄的君王

后留一个封盖以便提携。有些人把这种蔗烟看成是介于简陋的雪茄烟和烟斗烟之间的一种香烟，不过它或许是某一地区特有的。

如今，玛雅人抽烟的习惯变化得非常快。越来越多的人抽着商品香烟，尤其是居住在城市或城市周围的人。然而有些居住在玛雅高地国家的人，现在仍使用烟斗烟。

中美地区的民间烟草和宗教烟草

新大陆的土著向来认为那些可以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的植物具有超自然能力，这里的“植物”就包括在礼仪和民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烟草。

首先，烟草用于宗教仪式是极其合适的，它的香气是宗教礼仪最恰当的点缀；其次，烟草的花异常美丽，能极大满足人们的视觉享受；再次，烟草能被火烧毁，可作为生活中的清洁剂；最后，烟草还会神秘地消失于真空（上帝



来自蒂卡尔（蒂卡尔博物馆）的彩色花瓶，属于后古典时期（800-950）的玛雅文化。图为一穿着暴露的玛雅国王在抽烟

和已故亡灵所在地），留下萦绕在空气中的芬芳的烟味。

一开始，烟草的传播范围较为有限，只限于萨满、祭司和巫医，后来烟草植物经由移民者的大量传播，从单纯地在仪式上使用发展到普遍使用。部落间风俗习惯的相互交流源于某些地区烟草的不足，但是来自欧洲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烟草在阿兹特克地区是一种很重要的祭祀物品，阿兹特克人把它奉为西华科蒂尔女神的化身。他们相信女神的身体由烟草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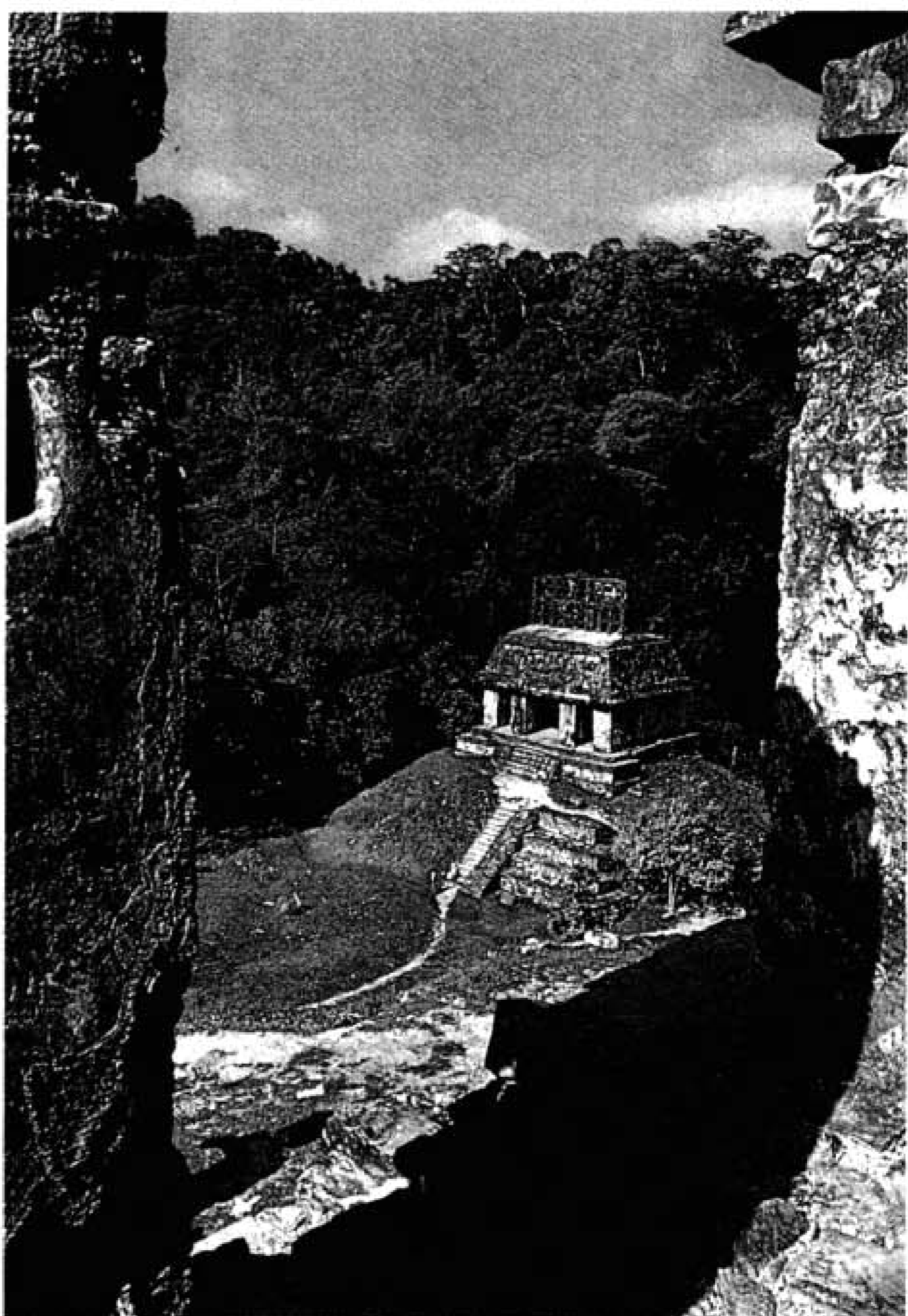


来自墨西哥的多彩盘，属于后古典时期（800-950）的玛雅文化。盘上画有一个玛雅女士在揉面团，她对面坐着一个看她揉面团的抽烟的人

成，并在祭祀战神威兹·罗伯蒂里时使用烟草。烟草、烟草葫芦和烟丝荷包一直被描绘成中美洲国家具有神性的象征。烟草葫芦是阿兹特克人把牺牲祭献给托斯女神时所用祭祀服饰的一部分。

在墨西哥，有个叫欧里盖茨的部落，该部落的宗教仪式上使用野生烟草。他们通常在洞穴或山顶上举行仪式，其间伴有对神灵的祈求。烟草在墨西哥战争的宣言典礼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另一个中美印第安国家马萨特克，库拉德诺人使用烟草粉末糨糊和石灰以化解孕妇所受的巫术。除了把烟草作为对抗巫术的工具，阿兹特克人还相信它能够用来破除咒语，保护族人不被野兽伤害。此外，烟草还被认为是解蝎毒和蛇毒的有效物质。

玛雅的民间烟草和宗教烟草



墨西哥恰帕斯州帕伦克城十字架神庙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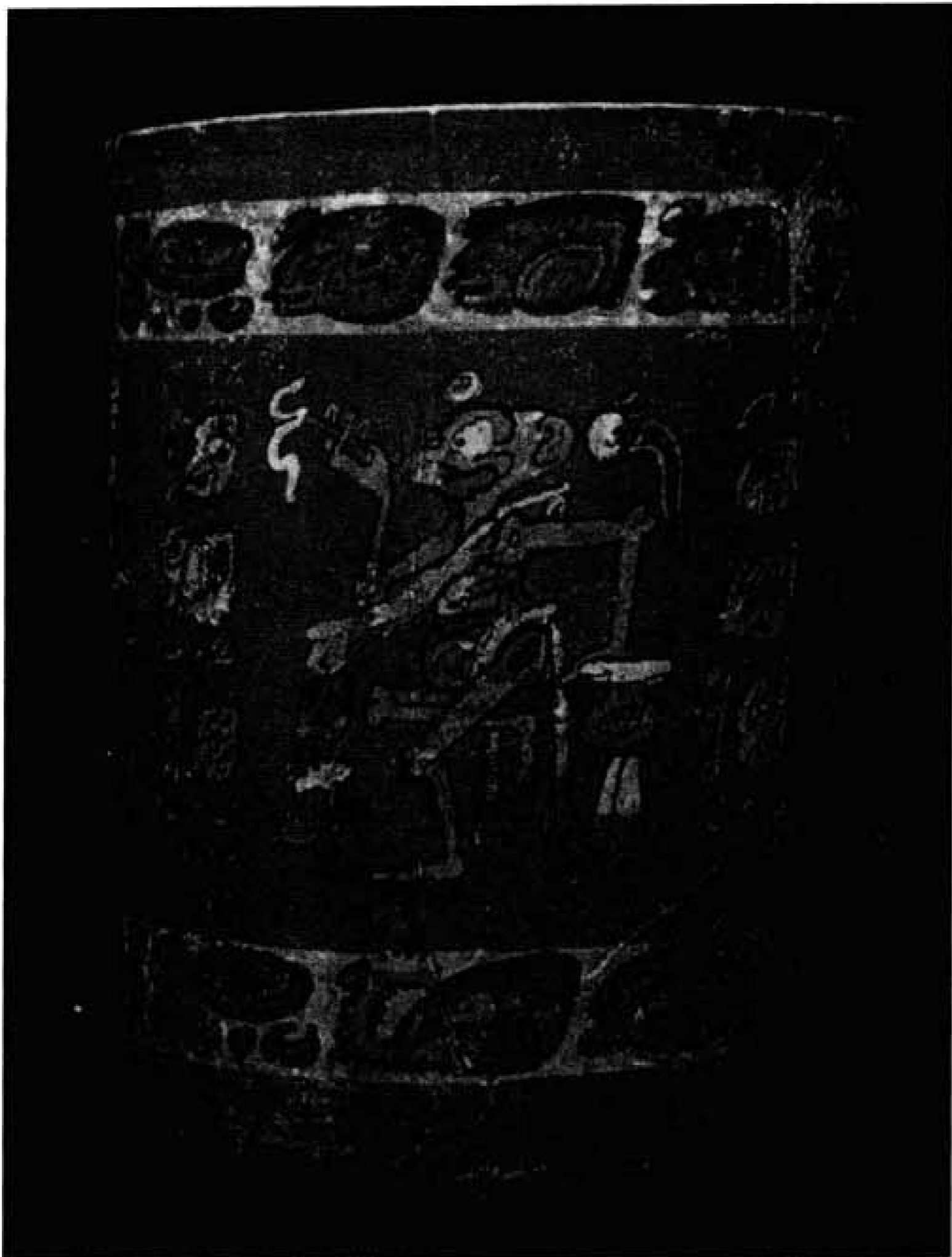
尽管我们对古玛雅宗教礼仪的认识不是那么全面，但可以肯定地说，烟草在早期玛雅历史上已被运用于宗教仪式。



后古典期（800-900）玛雅文明、墨西哥恰帕斯州帕伦克城的十字架神庙的东门边框。框上刻着一位年长的玛雅女神正在抽雪茄

它在拉坎邓尼斯的宗教仪式上有着重要地位，成千上万的玛雅印第安人将此古老方式完整地保存至今。他们种植烟草，用架子将它晒干，然后用漏斗状的容器储存起来。这些容器在柯蒂斯统治前曾被展示过，它们被献给奇花神——一位与神菇、烟草和其他珍稀物品紧密联系的重要女神。

拉坎顿玛雅人烟瘾很重，他们在邻邦城镇把自己包装的



来自后古典期（800—950）玛雅文明、危地马拉的北碓北部地区的红底彩色花瓶，瓶身的死神一面跳舞一面抽着雪茄

雪茄作为贸易品。在烟草丰收的季节，拉坎顿人会举办与烟草有关的仪式。他们摘取庄稼的第一片叶子，卷成一支雪茄，用晶片聚焦太阳光使其点燃。雪茄被供在象征土地的奥拉神面前，奥拉神的形象就仿佛在静静地坐着抽烟，之后将雪茄呈给面前摆着香炉的神灵。过去，查尔蒂地区的拉坎顿玛雅（一个与上述拉坎顿玛雅有着相同名字但居住在不同地方的部落）有庆祝西恩节（就是“雪茄节”）的习俗。这种仪式记载于1696年由三个传教士编著的西班牙语手抄本上，书中不仅记述了真实的节日盛况，而且提供了洞悉一个真正民主的土著社会的机会。^[2]

现在，不管是在拉坎顿还是乌卡特科，献给众神的烟草供品已大部分从仪式上消失了。然而在玛雅，民间烟草遗留的痕迹随处可寻：斗牛节的新年仪式上仍包含着这些古老的元

素，例如仪式上摆着十三支当地的葫芦烟；当地种植的烟草被认为是抵抗邪恶之神的力量；桑德斯人仍把神奇魔力归因于烟草，他们把烟草粉末撒在重症病人的胸部和脸上；查尔蒂人则把烟草和烟草用具视若珍宝，死后带着这些东西一起入土。

查尔蒂玛雅人（书面译为“斯比特人”）最早使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民间烟草治疗方法，他们把烟草用于治疗脑疾、防治眼疾或治疗血液病，特别是对儿童的治疗上。萨满咀嚼了不同种类的草药，如芸香、鼠尾草和蒿等——但大部分还是烟草，然后吐出来敷在病人的头部至脚趾。如果病情十分严重，他们会将唾液和烟草的混合物喷涂在头部、胯部及双肩处。这种疗法会一直持续下去，直至病人有所好转或不治而亡。类似这样的习俗存在于亚马逊印第安丛林中，那里的萨满治疗者饮用一种叫那提吗的药，此药由烟草汁和一种叫碧蕊的草药的提取物混合而成，那提吗可以让萨满“就像玻璃一般”地透视人们的病体，之后萨满便会让患者免于得病。

烟草也是查尔蒂占卜者的魔术工具。例如，阿沁就是一个用烟草预测未来大事的专

家。他被称为值得尊敬的从仁慈的太阳神处直接获取权力和信息的好人。他能找出遗失的物品或动物，判定病症的起因（是巫术还是自然引起的），然后提出最佳的治疗方法。人们求他破除巫师布下的恶毒的咒语，预测是否会降雨以及降雨量的多少，预言庄稼是否有好收成等等。为了神化自身的工作，阿沁有如神话中的阿拉丁，随身携带他的私人神仆萨霍林，并让它住在自己的右腿肚上。存在于奇查和哥伦比亚布伊那利的印第安人所用的法术与此相似，但他们并不是把烟草涂抹在身上而是口服，一旦身体的某一关节发生变化，则被认为是好运将近或厄运当头的征兆。^[3]

作为药品的烟草

在古人生活中——某程度上也包含现代人的生活——人类、宗教、迷信和医学的关系是不能被彻底否定的，这一观念很真实地体现在烟草上。

当西班牙人到达乌卡坦时，他们发现玛雅国家中有一种很丰富的药学知识。玛雅人相信当人犯罪时，超自然力量会把疾病传播在这些人身，而他们须向神灵祈求康愈。对玛雅人来说，宗教和医学、祭司和医师是不可分割的。

一种相当重要的医学文化被记载在玛雅医学中，不幸的是最早的手抄本只能追溯到18世纪。烟草作为身体或心理疾病的治疗物在《布里斯托》或更著名的《巴卡斯的礼仪》中均有提及。它包含咒语和简单的医药处方，可用来治疗牙疼、受寒、肺病、肾病、眼疾等多种疾病。对于疹子、发烧和脑疾，须和着两片胡椒、少许蜂蜜及烟草汁一起服用。另外一份著名的玛雅医学论文《雅卡坦的草药和魔咒》提到烟草（特别是其绿叶）能治疗多种痼疾，诸如乏力、骨头疼痛、蛇伤、腹痛、心悸、持续发寒、抽搐、失声、眼痛、横痃以及多种梅毒，也是治疗滞尿的药物中的成分。将烟草与石灰混合涂抹在腹部，加以按摩吸收，还可以用来预防流产。

难以解释的烟草功效

早期观察者记录的醉烟现象令人感到十分困惑。这种植物是如何让印第安人“醉了”，以致“行为愚笨”、“失去判断力”、“像死去一般倒下”以及“着魔了”呢？^[4]

为解释这一矛盾，必须考虑到以下几种可能性：

一、玛雅人可能吸食了一种比当今商业品种效用更强的烟草。由于用作商业种植，烟草的尼古丁含量极少超过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而深受玛雅人喜爱的路斯提卡烟草的叶子则含有高达百分之十的尼古丁。

二、玛雅人可能抽过与现在相同品种的烟草，但数量更大。据记载，印第安人抽的雪茄长度从三十四厘米到七十四厘米不等。

三、玛雅人可能使用非药物手段加强烟草的效果。充分的人类学证据表明，玛雅萨满曾使用（现在某些地区仍使用）敲击、唱赞歌、舞蹈和不同种类的音乐去催眠或加深人的昏迷状态。



一个戴着鹿形头饰的玛雅君王正在抽雪茄，来自后古典期（800-950）玛雅文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吉安娜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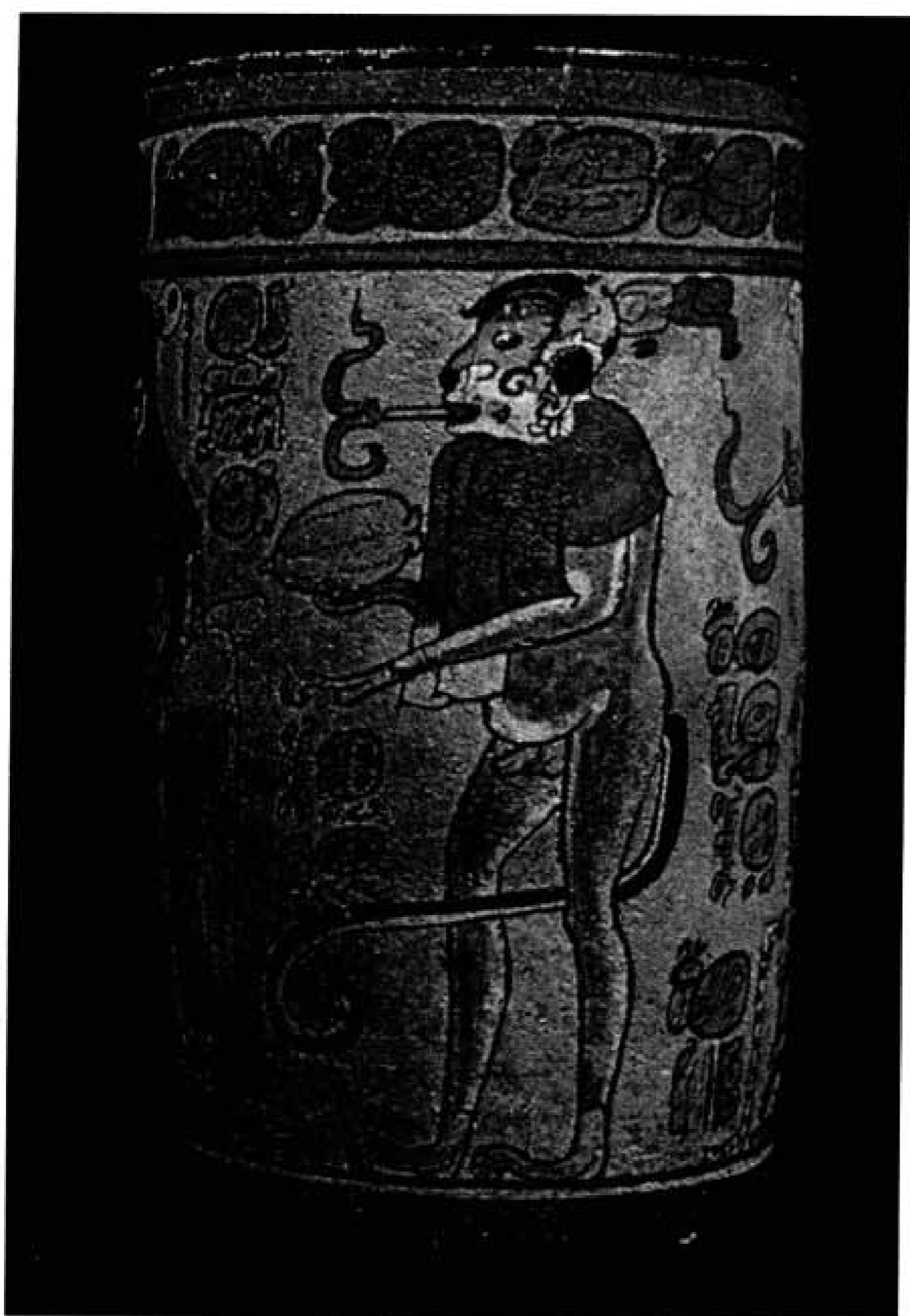
玛雅烟神

古代玛雅人是狂热的烟民，他们信奉的神灵也是如此。在考古发现中，一些抽着烟或拿着雪茄的高贵神像出现在手抄本的图画中，或雕刻在陶瓷容器和石碑上。长期以来，这些人物是否代表着超自然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且至今仍未得以解决。

四、最后也是最有可能的假设是，玛雅人可能使用草药而不是烟草作为精神药物，他们把草药与烟草一起使用或者替代烟草使用。早期西班牙人对这些草药的认识很模糊，但却从他们最初登陆的加勒比海岛上学会了使用烟草，他们认为玛雅人抽吸和咀嚼的每样东西都是烟草，并且一直这样称呼。我们很可能不那么公正地把早期历史学家评价为“差劲的观察者”，而实际上我们或许更该批判当代的一些学者：他们对当代某些西班牙手抄本的翻译不够严谨，随意地把诸如“smoking reed”（用来抽的烟杆）、“odoriferous herb”（散发着臭气的草药）以及“smoke”（烟）都翻译成“烟草”，这就很自然地给后人留下当地人只抽烟草的印象。



来自后古典期（800-950）玛雅文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吉安娜岛的贝壳雕刻，刻着一位戴着鹿形头饰的玛雅君王，该雕刻现由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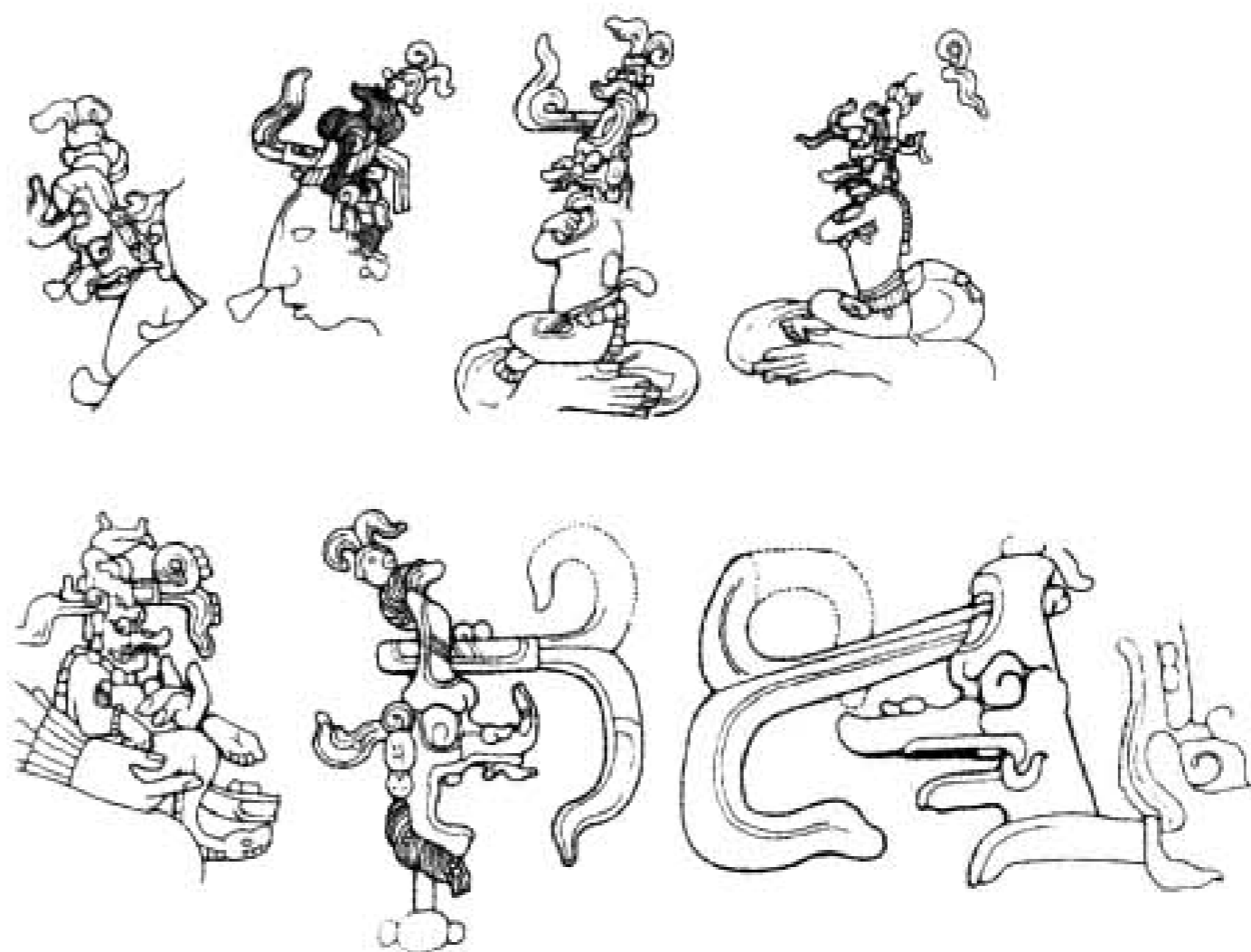
来自后古典期（800-950）玛雅文明、危地马拉的乌斯马辛他河河谷的玛雅彩色花瓶，瓶身绘着一只直立行走的猴子正在抽雪茄

但是这些手抄本中抽烟的人物是神明，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古代，不同石碑上刻着的一群特别的小神灵已被载入文献，其中火神（也就是色拉斯）由于生有长鼻首先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近来人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他前额上的管状盘动物，这可能代表雪茄，而从管子上升起的火焰状的附属物则是烟雾——这是宗教里象征权力和神威的东西。这个吸引人的雪茄理论中的一个困扰就是这些象征物的多样化——某些管状物很像现在的雪茄或其他漏斗状、长菱状的东西。神明（如火神）极有可能拥有很多装饰品，在不同情况下，神明前额上载有长短不一的雪茄、火把甚至是打火石等其他东西。有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前额装饰的形状、大小和特征反映了神明的不同身份地位。或许戴着短圆雪茄的火神代表一种含义，而戴着大凯尔特人形象的火神则代表着另外的含义？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5]

结 语

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证据表明，抽吸烟草在古玛雅宗教、民俗和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玛雅艺术和其他考古所发现的人工制品无疑证明，烟草和抽烟行为不仅在玛雅人生活中有着深刻的宗教意义，同时也创造了艺术，并



墨西哥帕伦克的耀斑神，画面显示了玛雅地区不同的设计风格



来自后古典期（800—950）玛雅文明、蒙塔古河谷、洪都拉斯或者危地马拉地区的小型器皿，刻着一位年长的女神手执烟草叶

在艺术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特权阶层的人物抽烟可能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行为，而不仅仅只是休闲消遣那么简单。古玛雅人普遍通过抽烟来寻求乐趣，这一看法或许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普通人的生活只是不足以载入史册万世流芳而已。

注 释：

- [1] 贝尔纳尔·迪亚斯著、J.M. 科恩译《征服新西班牙》（哈姆斯沃思，1963：227）。
- [2] 拉坎顿·时托泽《玛雅人比较研究》（纽约，1907）。
- [3] C·威斯顿《印第安人的危地马拉》（芝加哥，1940）。
- [4] G·本佐尼《烟草历史》（威尼斯，1568）。
- [5] 弗朗西斯·罗比塞克《玛雅艺术、历史和宗教中的烟草》（诺曼，1978：62）。

快感或是危险：近现英国早期的吸烟

坦亚·波拉德*

在英国，吸烟起源于16世纪晚期。尽管以当代的视角看来这似乎有些奇怪，香烟主要是凭借其医疗方面的功用而被花言巧语引入英国的。随后它迅速而疯狂地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主要归功于它能使人沉溺于吸烟带来的快感之中。烟草是国外进口的一系列新药从医用转为娱乐用途的第一剂药品，它为紧接着转娱乐用途的茶、咖啡、可可、蒸馏酒和鸦片奠定了基础。这种新物质不仅魅惑了人们，也引发了医学和道德两者之间的强烈矛盾。人们对烟草的医学疗效过分要求，引起了对其副作用的怀疑、嘲弄和担忧。尽管烟草在声誉上代表着男子汉气概和权势，但正如人们见到的，虽然吸烟给人们带来微醉的快感，然而攻击女性的消极状态和无能为力的暴力事件却由于吸烟成瘾和麻醉作用而下降。烟草的新奇和麻醉性质，同时也加强了人们对它的神秘而陌生特征的关注。香烟模糊了药品和快感之间的界限，让身体和意识产生了不安的新效果。

随着烟草的到来，吸烟在英国成为一种风俗。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烟草引起海员的注意以后，它于16世纪进入欧洲大陆，在16世纪50年代进入英国，并在90年代受到狂热的欢迎。英国人效仿了美洲人抽烟的习俗：最普遍的方式是先晾干烟草，放到烟管（通常是由黏土制成）里点着，再吸进去或者喝下去。烟草最初以药品的身份出现，购买需要先经医师开处方，再向药剂师购买。在《新大陆喜闻》^[1]一书中，塞维利亚的一位医师尼古拉斯·蒙那德斯写道：“身体或者健康方面任何形式的痛苦……烟草都能将其解除。”后继的论述重复着蒙那德斯的“明智”见解。1587年，吉尔斯·艾尔德提出烟草是人们长期以来寻找的能够医治任何疾病的万灵药。烟草被冠以近乎宗教一样的荣誉：“通过烟草，我们见识了上帝的神奇，他以人类难以理解的方式让事情变得神奇而伟大。”^[2]

吸烟有益健康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体液学的逻辑支持的，这种学说的主要医学原理继承于盖伦和古希腊医学。盖伦学说认为，身体由热、冷、湿、干的体液构成，健康的秘诀就是在于这些互相对立的元素之间的平衡。然而，一些平衡优于其他平衡：妇女体内冷和湿的体液的特点是缓慢、懒惰，特别容易引起健康问题。以极端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吸烟，火带来了干和热，从而可以认为吸烟加热、干燥了体内的冷、湿体液，因此使人精力充沛，可以驱赶体内的疾病。

*坦亚·波拉德 (TANYA POLLARD)：新泽西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英语助理教授，编有《莎士比亚戏剧资料》(2003)，著有《现代英格兰早期的毒品与戏剧》(将于2004年出版)。其关于现代早期的毒品、毒药和戏剧的论文见《莎士比亚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戏剧》等各类文集。



威雷姆·拜特维彻《快乐相随》(1617-1620), 帆布油画

在某种程度上, 吸烟的流行源于人们将早已存在的烟应用于医疗的想法。1614年医师威廉姆·巴克雷提出, 烟熏法和烟栅网并不是新发明的疗法, 它是一项古老的疗法, 并治疗过众多疾病。^[3]巴克雷提出用于医疗的是款冬、麝香、琥珀、朱砂这些物质的烟, 开普尼斯特斯增加了红砷、水银和雌黄。还有一些医学作家持这样的观点: 文艺复兴时期海波克莱特建议将烟用在妇女生殖器处来治疗瘕症; 意大利医师里欧纳多·费奥拉瓦蒂提出用烟熏毛孔来配置朱砂; 蒙那德斯提到了琥珀烟的医疗用法。烟, 被当作通过毛孔和孔口进入体内治病的有效工具。

除了医疗用处之外, 香烟在公共娱乐方面的用途是全新的, 有时显然是令人吃惊的: 早期的时候, 两个人看到理查德·塔尔顿吸烟, 后过来的人看到一缕缕烟从塔尔顿的鼻子里冒出来, 以为是着火了, 然后便冲着塔尔顿的脸泼了杯酒。此外, 烟草作为药品, 它的标签上标注着极热、干燥, 这也强化了它作为医药去平衡体液的观点。1621年, 医师图比尔斯·维那写道: “吸烟能帮助过度湿冷的大脑……能驱散头脑内的风湿和风痛, 对大脑和肌肉的冷因子有益处……通过干燥体内的冷因子, 烟能阻止体液的腐败, 同样对胃、胸和肺的冷和湿也有作用。”^[4]

烟草以高调姿态呈现出的医用功效很容易遭到嘲笑。很快, 各种英语的文学作品中

出现了傻呵呵的吸烟者。本·杰森和那些勇敢的股票投资商特别以嘲弄烟草和吸烟者为乐。开普敦·波拜迪尔在《每个男人的体液》中提出极其豪爽的观点：“它产生了一种解毒剂（在整个意大利，你吸收了最致命的毒品），应该驱赶它，澄清自己，正如我自己所说的一样容易……我将我知道的美德都说出来。”

乔瑟夫·豪尔在1601年说，“没有一种救济方法能医治百病，就像没有一双鞋能适合所有的脚一样。”^[5] 国王詹姆斯一世是烟草的热心支持者，他讽刺了烟草多种和矛盾对立的能力：

就是这些不可思议让我们强烈地体会到了烟草，在所有人 and 所有时间里，由于它治愈了各种疾病（这是以前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它治愈了脚上的痛风，而且当烟点燃的那一瞬间，它飞进头部，跑进小脚趾……它让一个喝醉的人从醉酒中清醒过来。它让一个厌倦生活的人充满活力，尽管会让人饥饿。睡觉前抽一根烟，它帮助人们睡得更香，而且当一个人正昏昏欲睡的时候，抽一根烟，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能够帮助大脑保持清醒，而且加强他们的理解力。^[6]

国王列出的所有对立的特征都指向烟草。因为国王抽烟，形成了许多和他有关的讽刺画（漫画）。由于使用了诙谐幽默的语言进行描述，关于医学本质的严肃问题在对烟草的诙谐幽默的批判中被明显地提了出来。怎样才能让医学服务于它的对立面呢？既能从头到脚地治疗疾病，同时又能满足饥饿的肚皮？既能增添活力同时又能使人安静地入睡呢？人们认为药物是强有力的替代品，但是正如詹姆斯所说，它既能使一个生病的人健康，也能使一个健康的人生病。^[7]

在没有病的时候使用药物，这是可能产生危险后果的行为。在这个历史时期滥用药品的背景下，新物种和新世界植物引起的疾病，对古典医学提出了新的解释。极具戏剧性的是，吸烟的普及意味着这些药品被完全健康的人吸食。正如巴那比·里奇所嘲讽的：“如果所有的人都病了，上帝将帮助英格兰，它也被感染了，万能的上帝生病了，但是几个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在他的全部神域下却是健康的。”^[8] 因此，药物被看作是危险、神秘而有能力的灾难的化身。

一个关于烟草的更加有争议的医疗诉求是它是否能够治疗忧郁症。烟草似乎很容易与忧郁匹配，痛苦地徘徊在身体和精神之间。巴克莱认为，“这样的敌意存在于香烟和精神抑郁之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由其性质所规定的药物……”。^[9] 霍尔认为，抽烟非常放松，它对改善身体对忧郁的印象和作用都有所帮助。维纳同意该观点，并建议忧郁疗法完全吸食烟草。^[10]

关于抽烟有缓解忧郁症作用的观点存在非常明显的矛盾。忧郁和黑胆汁、冷食品理论上应该回应暖气和干燥的烟雾。但是关于烟草其他方面的批评却强有力地指出了其影响，提醒人们别被它们麻醉而忽略吸烟的坏处。

有关烟草的麻醉效果，辩论夸大了其疗效方面的影响力，实际上对吸烟者来说，香烟比医疗更能使他们愉快。药物从药店迅速向社会传播。1599年，一位来自巴斯雷的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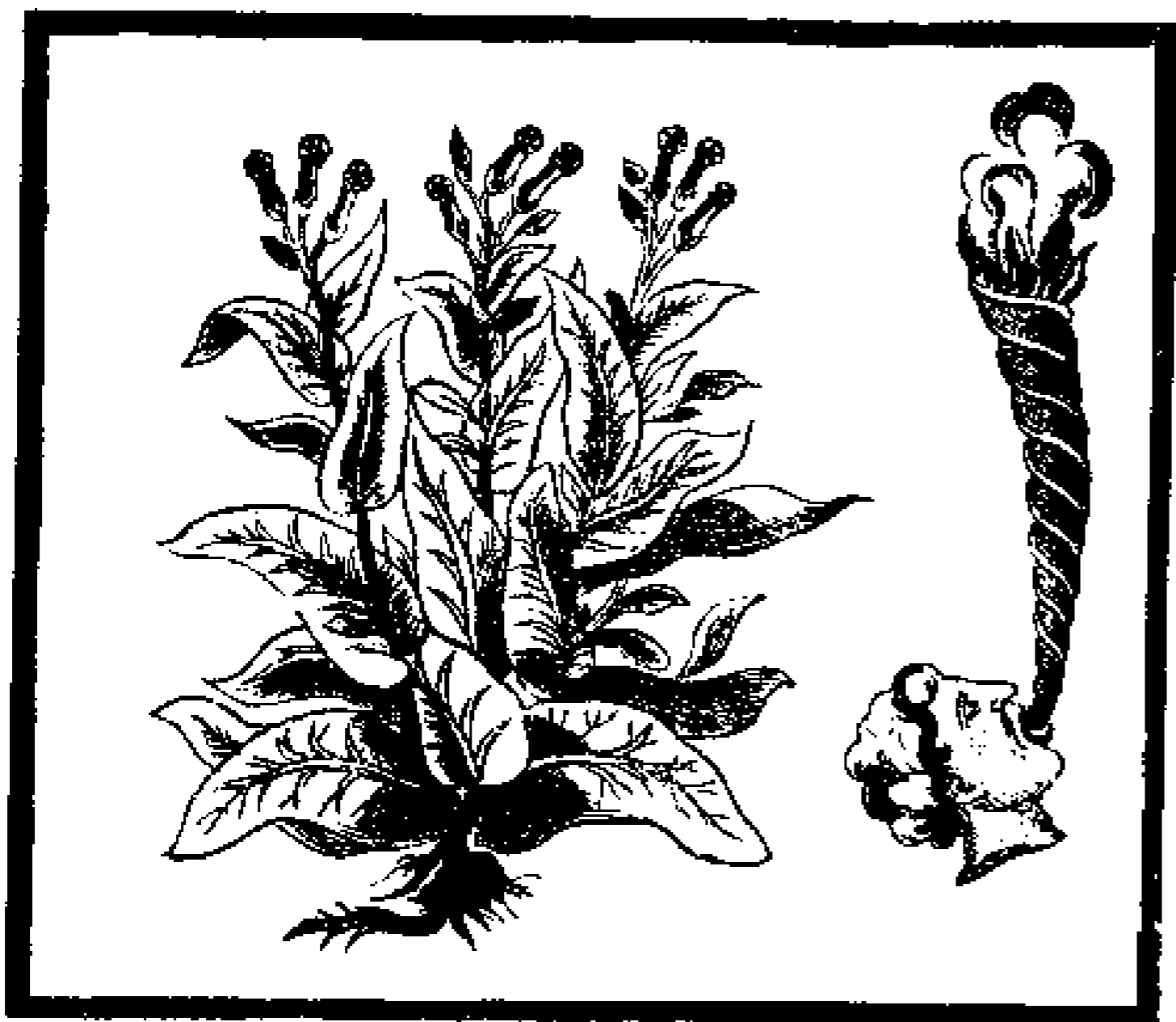
客托马斯·波拉特评论道：“在小酒馆，烟草或麦芽酒都是可以卖钱的，粉末盛在一个小管子里面，把烟点燃吮入嘴里，唾液能在上面自由奔跑，之后再喝一口西班牙酒。”^[11] 因为波拉特的建议，所有小酒馆里都能买到香烟。巴克雷也提出要求，烟草“要新鲜的在人们之间传递，就像是友谊和承诺一样”。^[12] 詹姆士一世就曾抱怨，“现在人们不一定热情欢迎朋友了，然而他们手中一定夹着一根香烟。”^[13] 詹姆士写道，“人们不断使用口味极佳的烟雾，现在无法禁止吸烟与禁酒是一样的，没有一个老酒鬼能够长期保持清醒……”^[14]

进一步详细地认识到这种趋势，人们更加担心烟草“迷人的魅力”。维纳说道，“吸烟的风俗，到目前为止产生了迷惑的效果……我们中的许多人常常以吸烟为乐，没有什么能带给他们比吸烟更大乐趣。”^[15]

与维纳的想法互相呼应，詹姆士宣称吸烟能产生迷人的魅力。诗人约翰·博蒙特爵士宣布香烟是唯一能使他愉悦的东西。巴克莱形容其影响力足以作为一个感官而存在，使他遗忘遭遇的所有苦难。1612年，医师约翰写道，“在一段时间里，吸烟能给我带来妖艳的感觉，舒缓并释放压力。”这些有趣的评论归因于香烟对消费者观感的影响和刺激，以及毒品实际的威力。

关于烟草麻醉效果的消息使医学和宗教的影响变得模糊起来。在马那德斯关于美洲人吸烟的叙述中，他认为吸烟应该由大祭司来决定，由他判定谁应该为寻找灵感而吸烟：

按照其吸烟的数量，他像一个死人一般倒在地上，并且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等他苏醒过来以后，开始回答人们的问题。这些回答是他和人们沟通的最好方式，他按照梦幻对人们作出解答。^[16]



一种烟草作物，其顶部仿佛天然冒着烟
(1570)

马那德斯的逸事的确对英国的烟草评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英国评论家引用了他的观点。吸烟者“像死人一般倒在地上”的形象，再次证明了香烟对人们精神的干预，而且为此提供了超自然的解释。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令人敬畏的说法，认为烟草是一种“神性”的药品。许多评论家把烟草描绘成由古希腊平民神拯救的永恒的精神灵魂；在理查德·布莱斯维茨关于药品起源的神论中，烟草是普洛塞尔皮娜的私生子。

烟草离奇的力量和其境外起源，在近现代早期的英国，成为其不断争论的根源。烟草清晰地标记了新世界“欧美印第安人”的特征，而且在野蛮人中得到欢迎，这些既带来了欢庆也带来了惶恐。烟草这个神秘、新奇且带有异域情调的来自新世界的产品，像其他所有新药一样，代表了来自异域的承诺和危险。吸烟，通过最初消费形式，平静地向边界渗透。吸烟带给人的愉悦是来自于异域的，因此对其的抱怨主要是强调其侵略和攻击性。正如詹姆士抱怨到的，人们“一根接一根地吸烟，闻起来很臭，臭味能跨过盘子，在空气中传播”。^[17]迪肯咆哮地对英国人发出类似的言论：“他们不远万里从印度带回来臭不可闻的、有传染性的、有毒的香烟，去赶走人体内的污秽……”^[18]

对烟草的强烈反对，加之一些看起来很早就被医学证实烟草能带来的危害——1599年，关于一个男人身体内被烟灰覆盖得像烟筒一样的文章，尤其是在1604年强行征收百分之四的烟草税后。这件事情迅速上升为无所顾忌的抱怨和讼费。然而，吸烟在英国早已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它能带给吸烟者“魔幻般的放松的感觉”，同时结合着来自异域新世界的时尚。和恶意的批评相比，这些吸引了更多的人。围绕吸烟产生的争论持续了四个世纪，在医学和文化方面都深深地扎根，它的遗产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威廉姆·马萧为理查德·布莱茨维特《吸烟时代》所做的木刻（伦敦，1617）

注 释：

- [1] 尼古拉斯·摩纳迪斯著、约翰·福兰普森译《新世界喜闻》(伦敦, 1577)。
- [2] 埃德蒙德·卡迪乃《烟草实验和价值体现》(伦敦, 1610)。
- [3] 威廉姆·巴克雷《忘忧草》(爱丁堡, 1614)。
- [4] 鲍比斯·维纳《关于烟雾的简明论述》(伦敦, 1621)。
- [5] 约瑟夫·豪尔《烟民的告诫》(伦敦, 1601)。
- [6] 詹姆士一世《强烈反对烟草》, 收入《为最尊贵的爱蒙斯公主工作》(伦敦, 1616: 219-20)。
- [7] 同上, 第 220 页。
- [8] 巴纳博·里奇《英国叫嚷声》(伦敦, 1617: 46)。
- [9] 巴克雷《忘忧草》。
- [10] 维纳《关于烟雾的简明论述》。
- [11] 克莱尔·威廉姆编译《托马斯·巴兰特 1599 年英国游记》(伦敦, 1937: 170-171)。
- [12] 巴克雷《忘忧草》。
- [13] 詹姆士一世《强烈反对烟草》, 1616: 222。
- [14] 同上。
- [15] 维纳《关于烟雾的简明论述》。
- [16] 摩纳迪斯《新世界喜闻》。
- [17] 詹姆士一世《强烈反对烟草》, 1616: 221。
- [18] 约翰·蒂肯《忍受烟草》(伦敦, 1616: 55)。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吸烟史

艾伦·罗伯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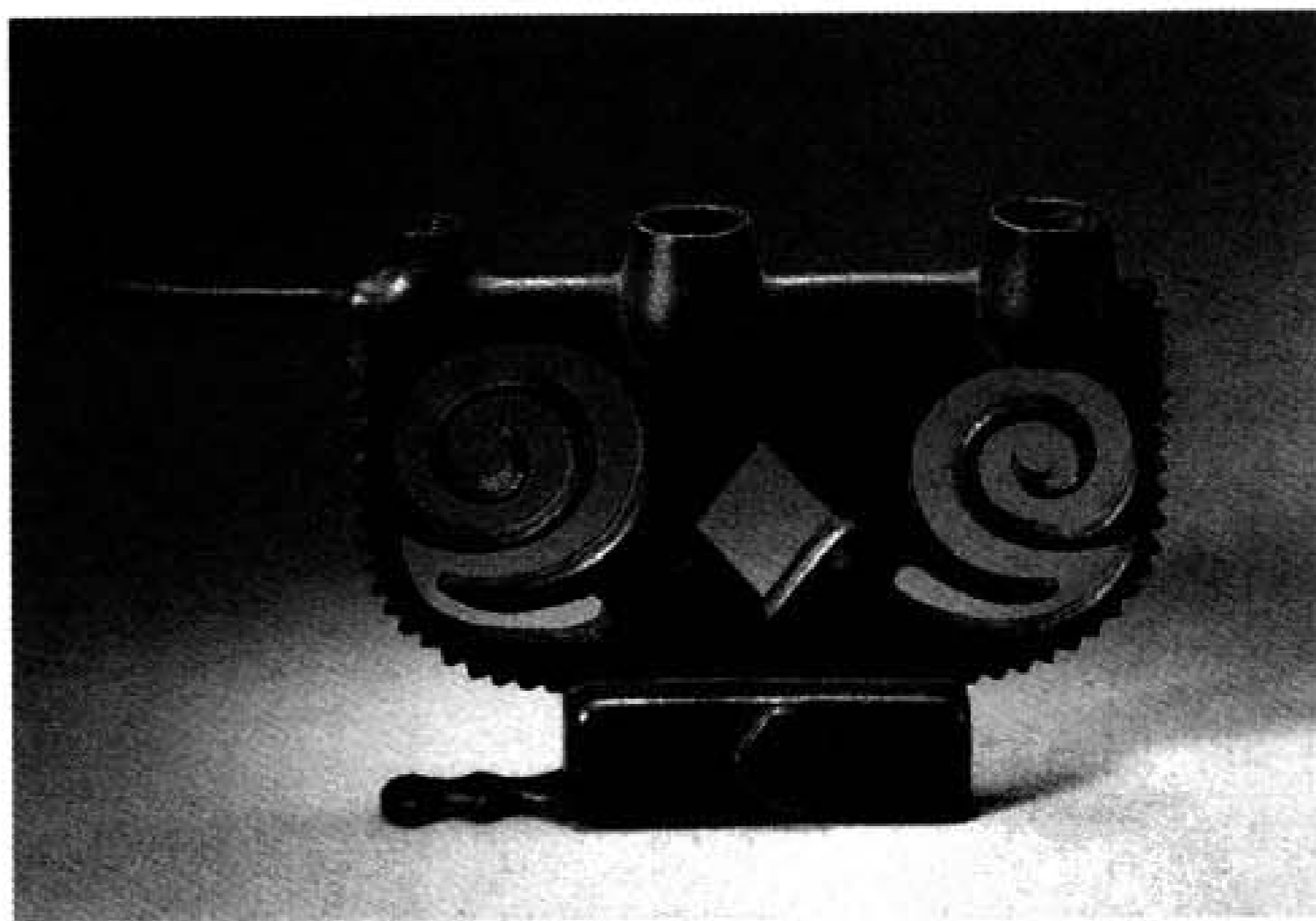
这不是一支烟斗。

——马格力特

近年来，非洲吸烟史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大量的人类学资料表明，草药烟、烟浴和熏蒸一直是许多古非洲社区的治病手段，同时长期以来，护佑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宗教仪式的一个特色便是吸食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并不一定出于其医学功效）。而且，一些非洲人还认为，吸烟深深影响着前殖民时期的某些生产活动，如打铁、制盐和治雨。不管吸的是什么烟，吸烟这种行为总是象征某些事件、活动、目的和志向，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因此，把马格力特的名言“这不是一根烟斗”放在非洲的背景下，就要多花些笔墨来解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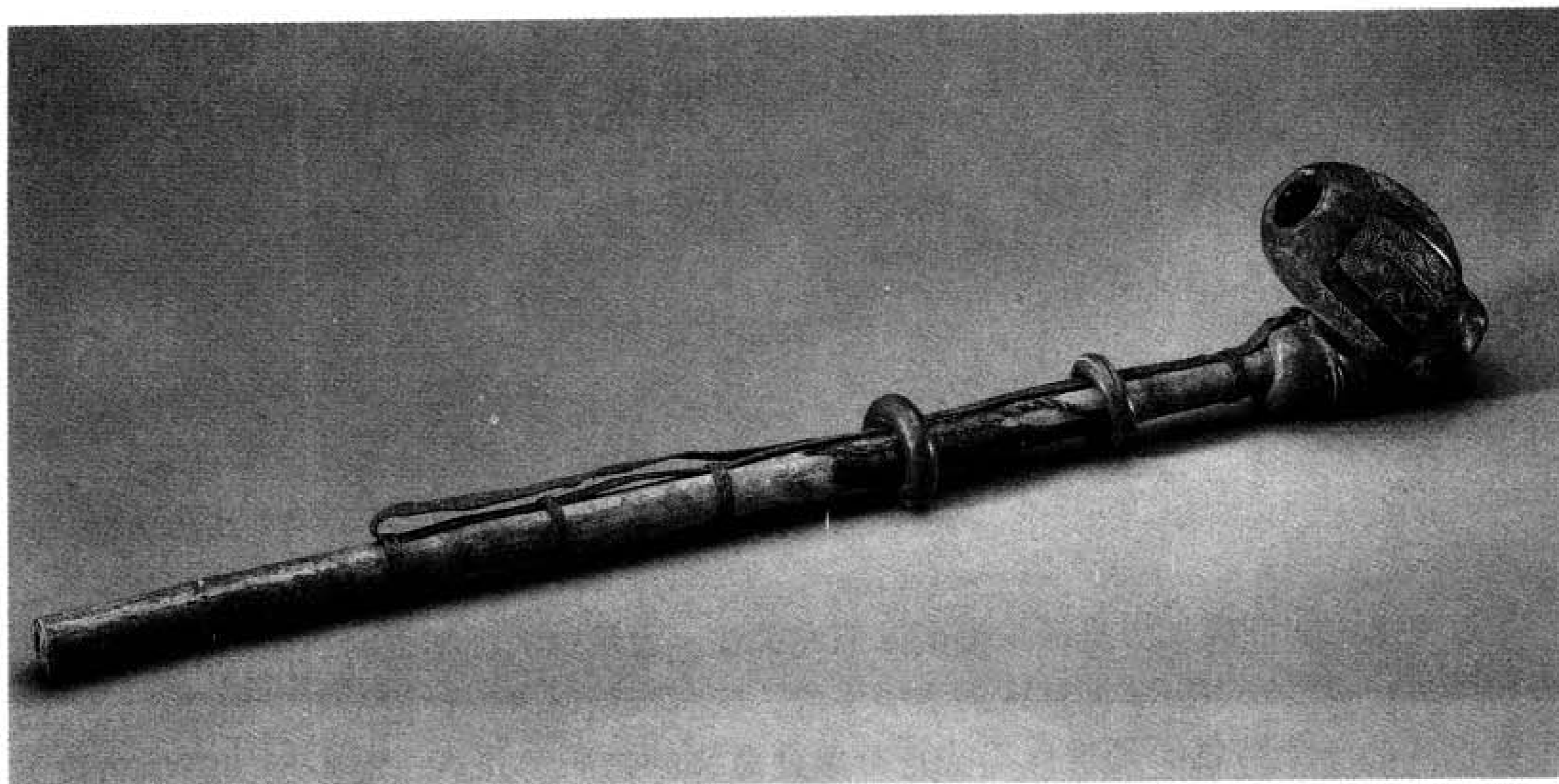
一个看起来、摸起来、闻起来、尝起来像烟斗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一个烟斗，因为“无论怎么看，我们都相信一件物体和他代表的东西之间没有一点关系。”^[1] 尽管马格力特在他 1952 年的作品《意象的背叛》中继续表达了“这仍然不是一支烟斗”的态度，但是看起来不像烟斗，也不用来吸烟的东西可能恰恰就是一个烟斗（见右图）。因此，在探究吸烟和其他思想行为的关系时，最好要记住“这个烟斗毕竟也是个烟斗。”确实，如果不是烟斗，怎么能发挥“象征”的意义呢？

13 世纪或更早时，古吉拉特人和环印度洋地区的人把大麻引入了现在的埃塞俄比亚，与此同时，阿拉伯航行家们把大麻带到了东非。那也是传说中辛巴达往返穿梭于印度洋的时期。人们不



祖鲁族人吸烟草或大麻的木制烟斗。这只花哨的烟斗带有三个烟钵，立在带滑门的、用于装烟草及烟雾的小盒子上

*艾伦·罗伯茨 (ALLEN F. ROBERTS): 加利福尼亚大学世界艺术与文化专业教授，詹姆斯·S·柯尔曼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非洲艺术》杂志编辑。与其妻玛丽·罗伯茨一起撰写了《回忆：卢巴艺术和历史的形成》(1996)，《城市中的圣人：苏非艺术和历史的形成》(2003)，他们目前开展的研究包括艺术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的觉醒、印度洋世界的视觉文化等。



禁遐想，传说中的神灵、巨人和大鹏鸟是不是也被忽卡罩上一层朦胧的烟雾。葫芦配以陶瓷烟钵制成的水烟枪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早期发明，在随后的中世纪通过咖啡（埃塞俄比亚另一大发明）的传播路线传入东、南和中部非洲。^[2]很快，各种各样的吸烟器具应运而生，四处传播。

一个十分有趣的发现是，大约在1600年，法国商人将烟草带到西非沿海地区，同时还把尼古丁和一种精制的带烟钵的烟斗带到了塞内加尔和冈比亚。这种“胳膊肘”样的烟钵棱角分明，底座平坦，同当时法国殖民地路易斯安那的印第安人的烟钵风格十分类似。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大量这种烟钵，而西非、中北非的许多地方还在生产此种烟钵。就在这段时间，烟草开始沿着沙漠旅行队在廷巴克图与摩洛哥之间行走的线路传播，并在非洲大陆的



带底座和“胳膊肘”式烟钵的加纳烟斗。上图中的烟钵始于1900年，为生黄铜制，带竹柄和皮饰；下图中为“人头像”陶瓦制烟斗，带木柄和皮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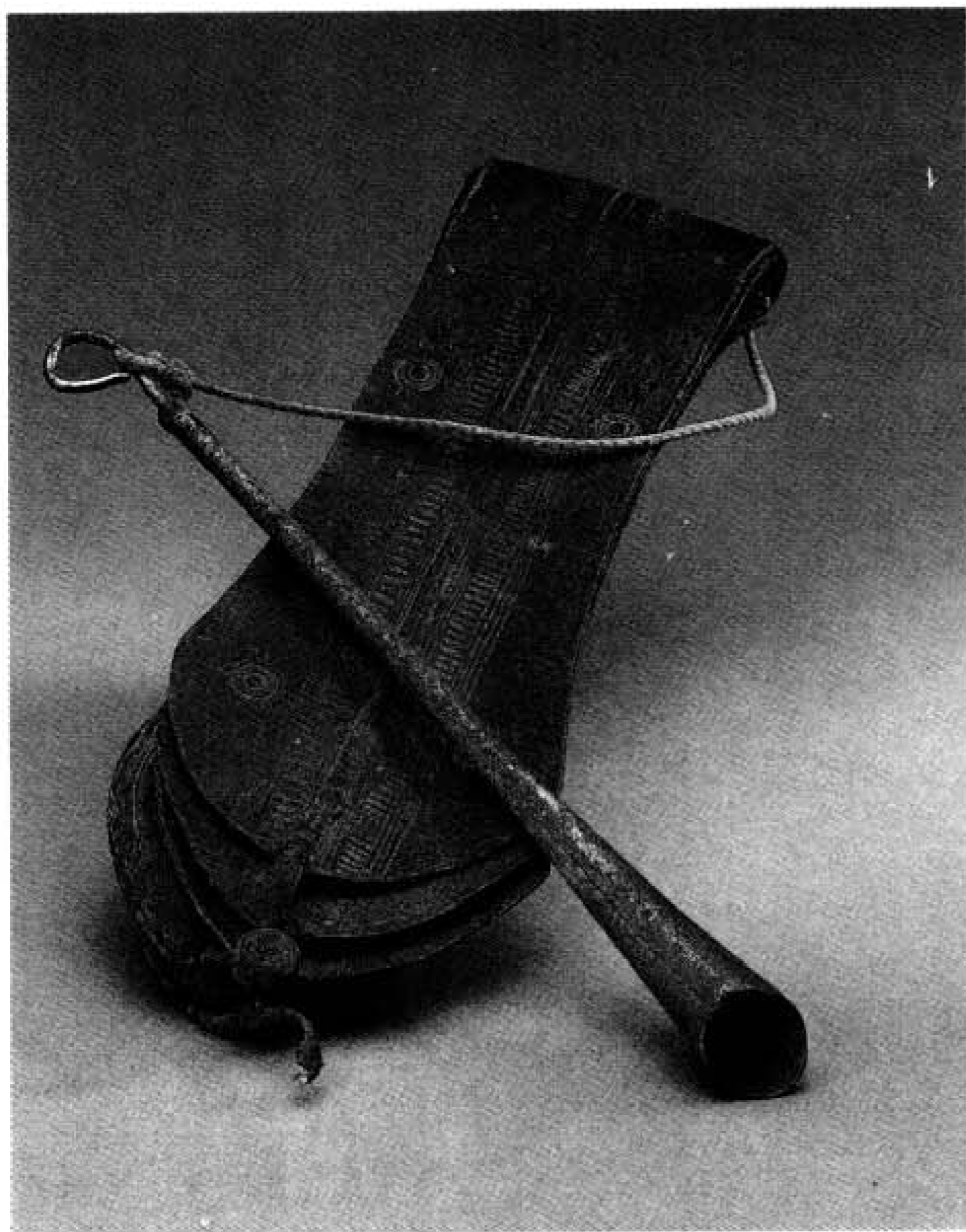
外围流行起来。这一点得到了语言学研究的证实：“taba”是许多西非语中“烟草”一词的词根。葡萄牙人把烟草带到南非，到了1650年，烟草已经风靡整个南非。

尽管人们在气候适宜的地区种植了烟草，但烟草仍然是西非地区间贸易的主要商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臭名昭著的“欧洲、西非和美洲三角”的奴隶贸易的一大特色也是烟草。来自西非沿海的商业信函中提到，“如果要做（奴隶）贸易的话，烟草是绝对必要的。”^[3]葡萄牙人靠进口巴西人用“糖浆略微加工”而独具风味的烟草建立了行业的垄断地位。效仿接踵而来，浸润过朗姆酒的烟草成了限量供应阿肯皇室的奢侈品。巴西烟草一直是沿海地区的主打进口产品，直到20世纪跨国烟草公司在非洲的连锁机构开始崛起。高岭土制的长杆荷兰烟斗也是殖民地早期的主要进口产品，这些都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有用的时间线索。^[4]

没用多久，非洲人就把大麻融入到本地文化中。在殖民时代早期，吸食大麻是南非男人的特权。水烟枪的形状模仿葫芦和兽角，并用一个中空的芦苇秆来镶配用石头、泥土或树叶制成的烟钵。直管或带烟钵的烟斗也十分盛行。很早以前去过非洲的人描述到，当地人在地里挖一个地道做烟斗，躺在地上吞云吐雾。^[5]在南非，烟草常常与斗争和放牧联系在一起，19世纪的人们也用它来进行一种娱乐活动：人们用一根管将粘有大麻的口水吹落在地，形成有趣的图案。刚果东南部的塔布瓦人认为吸大麻让人和动物变得更加好斗，例如，据说吃大麻的红眼非洲羚羊凶猛危险，人们像躲“巫师”般躲着它。^[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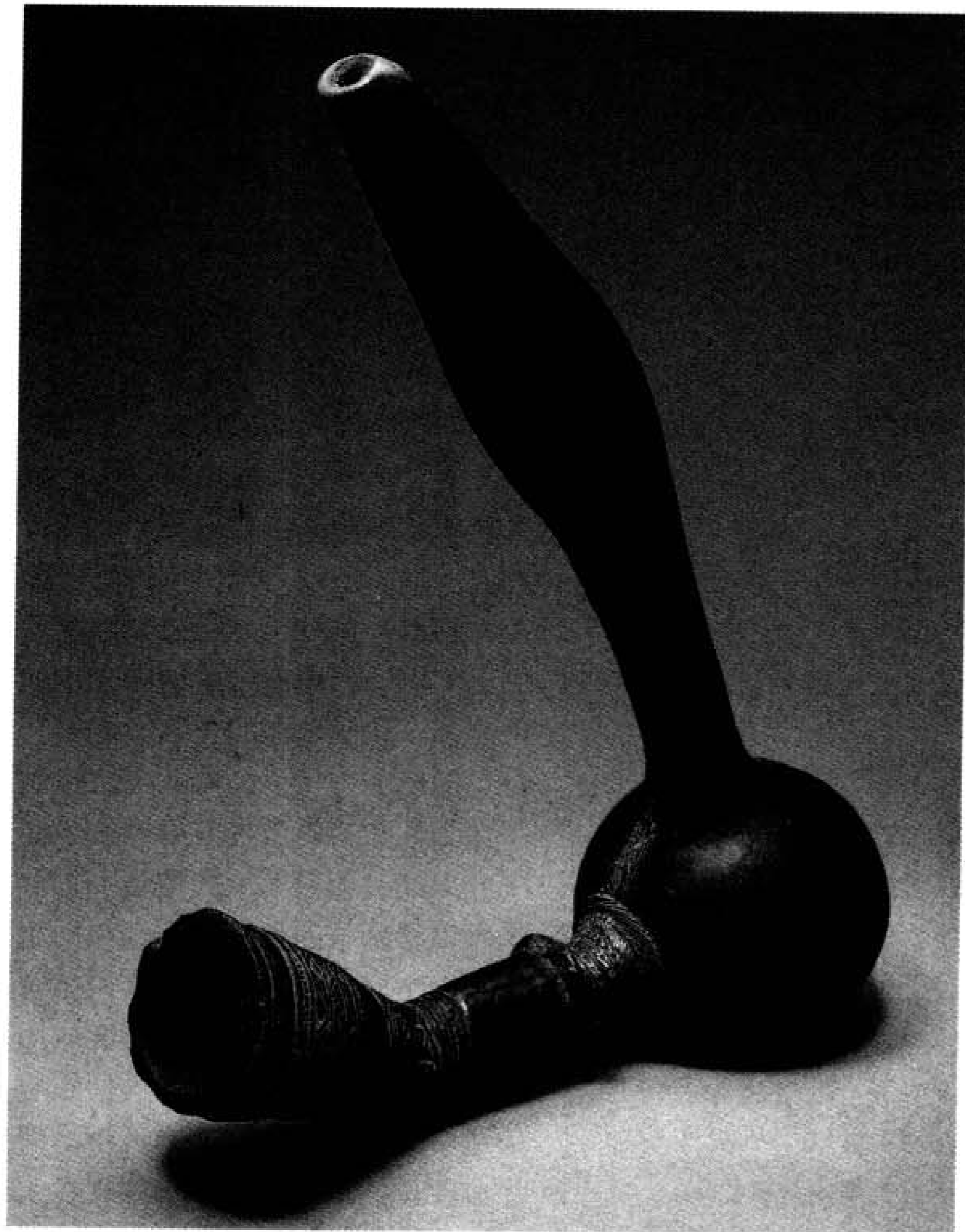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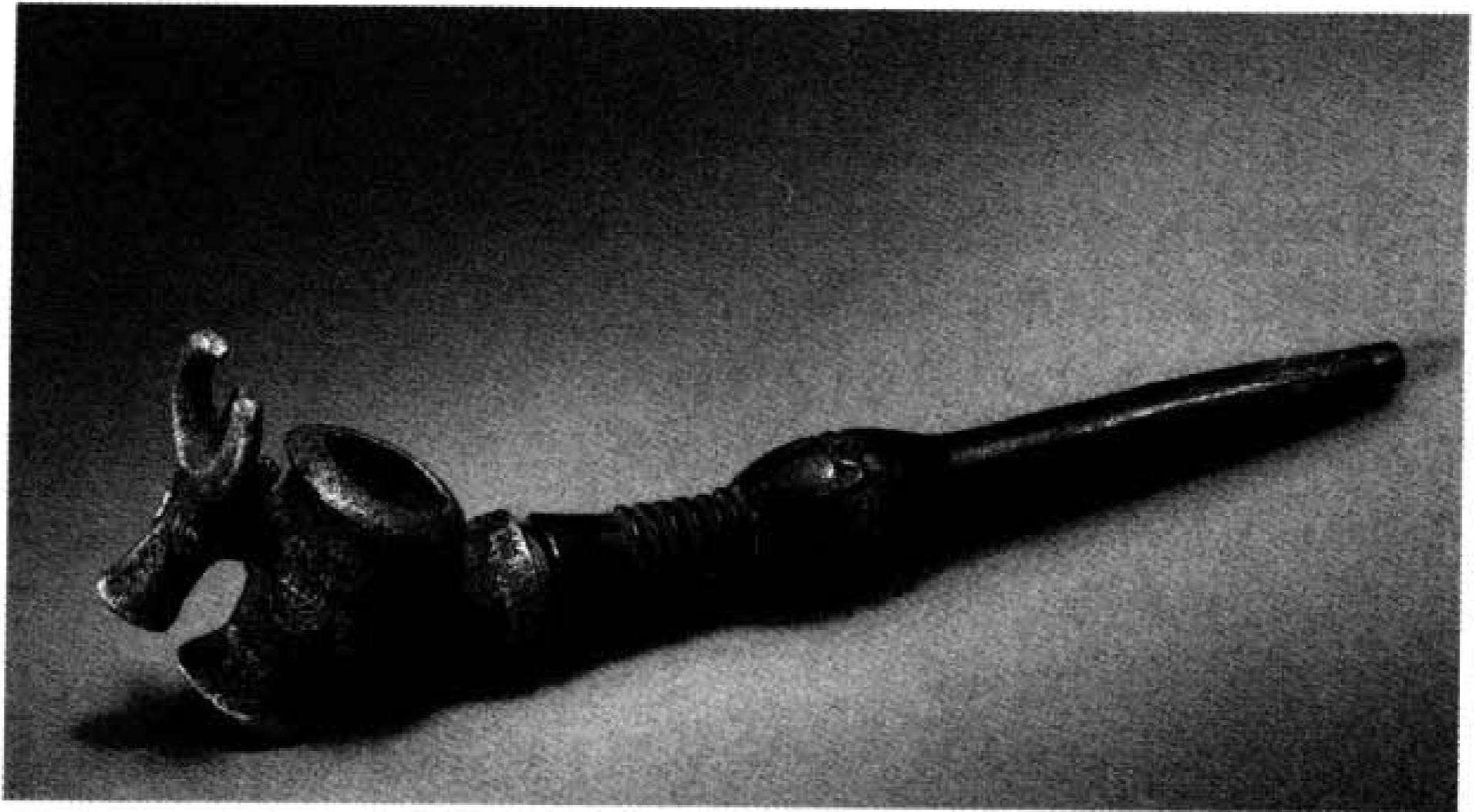
很快，烟草也融入到许多部落的经济、政治和宗教活动中。吸烟自然而然成为集体性的爱好，共用一支烟斗意味着彼此真诚信任，毫无恶意。好的烟草必须能把最强壮的人呛得咳不过来，但年长的塔布瓦人的最爱莫过于一帮朋友轮流吸一支水烟，丝毫不顾忌这样会使烟雾冷却，化解浓烈的焦油。

即使在古代，烟草业也已建立了在当地和地区市场上的地位。在中非大湖和大河区域的贸易中，常常可以看到长达十米的卷烟和马尾辫状的本地烟草。塔布瓦族人有时把烟草当作货币做嫁妆、赎金或用于其他的限制性贸易中。居住在坦噶尼喀湖南端的人们把本地烟草碾压成便于携带的球状。直到现在人



马里人吸烟草和大麻的铁烟斗和皮烟带

布基纳法索的羚羊头式
铝（回收铝）制烟斗，
带雕饰花纹的木柄



塔布瓦（刚果）人的葫芦
烟斗，周身以铜线装饰，
带芦苇和陶土制成的烟钵



乔奎人（安哥拉和赞比亚）的羚羊形木制烟斗。反过来可以用作头靠

们仍戏称之为“河马粪”，因为看起来实在太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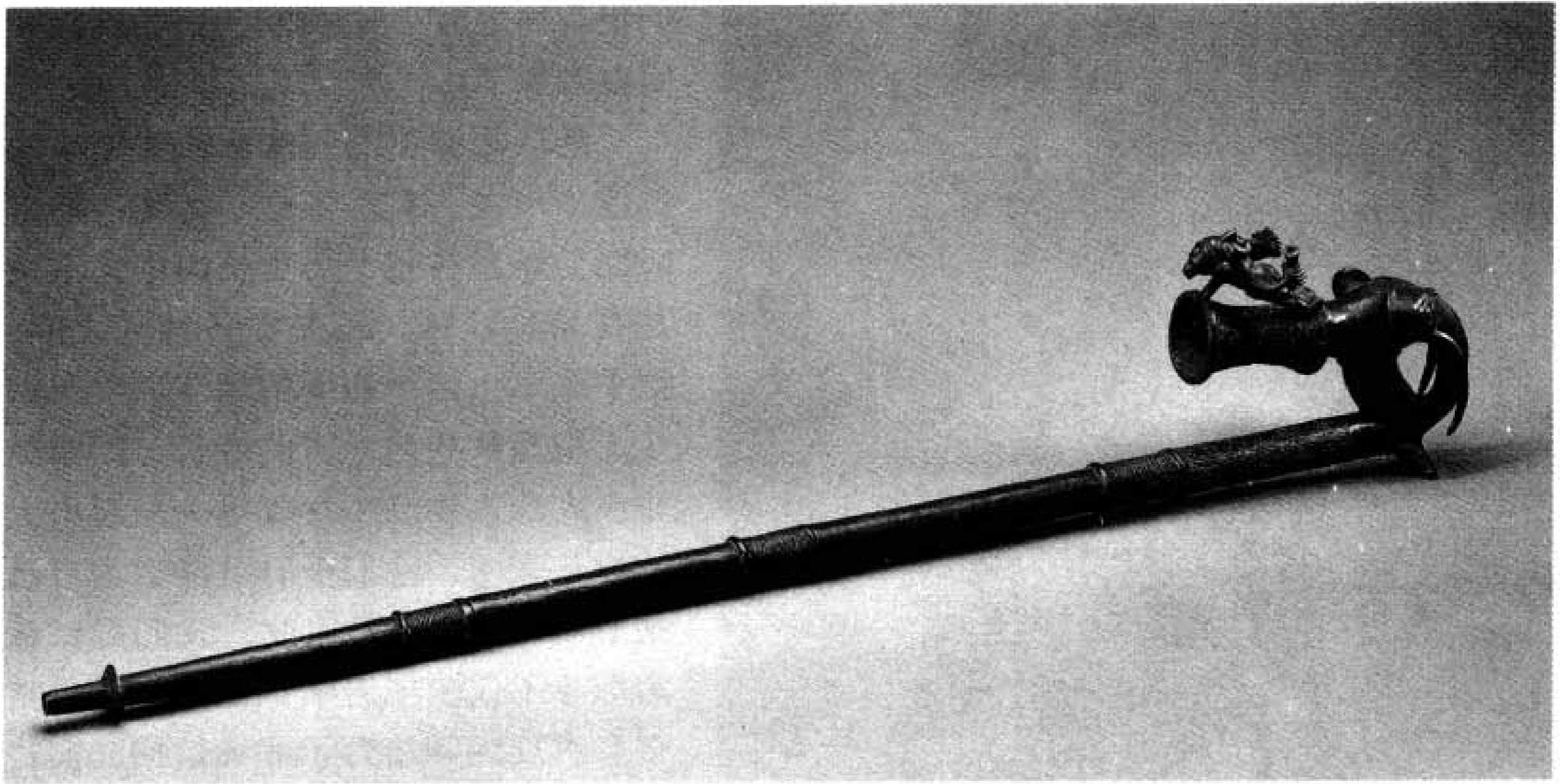
烟草非洲化的程度从非洲烟斗的辉煌中可见一斑。不论是在某一特定时期，还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论是在某一社区，还是在各社区之间，似乎找不出两个相同的烟斗。生产烟斗无疑是某些艺术家的专长，然而随非洲人个人物品（拐杖等）一起出土的烟斗表明，他们极有可能也为自己精心制作烟斗。^[7]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烟斗不仅象征着吸烟活动，其丰富多彩也反映和培育了非洲信仰、实践和环境的特性和共性。

由吉恩·雷科鲁斯编著的《非洲烟斗》一书提供了大量的素描图和照片证实了这一点：非洲人以树叶、藤条、竹子、芦苇、葫芦、种子、贝壳、干土、耐火土、软石、兽骨、皮革、兽角、象牙、木材、铸铁、生黄铜、

铝为原料，用编制、铸造和雕刻等工艺来制作烟斗，近年来回收利用的罐头盒和塑料瓶也成为制作原料。^[8]经颜料、贝壳、串珠等物品的装饰，烟斗不仅变得美观，而且其意义也得以提升。有的烟斗有叙事作用，上面的图案通常描绘了某种人际关系、奇闻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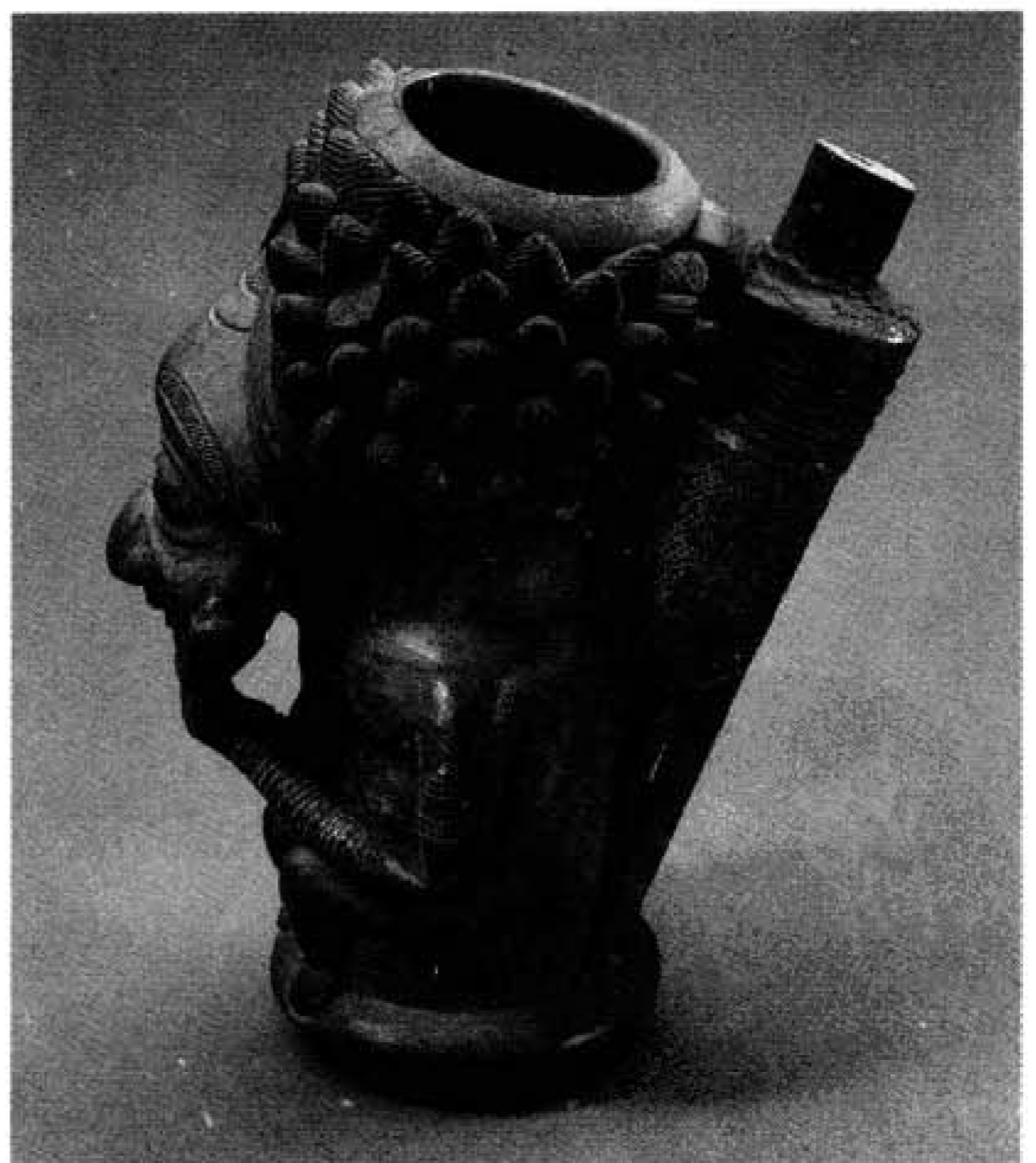
阿森特（加纳）鸟形陶瓷烟斗，可以作为婚礼或葬礼的礼物，约1900



蒂卡（喀麦隆）黄铜或青铜制烟斗，形象为站在大像头顶上的持枪猎人

动物形状、谚语、神话和宇宙现象。有些烟斗则以图案华丽繁复惊人，以此彰显主人财产的富足和地位的显赫。有些描绘和纪念祖先、文化英雄或其他神灵，还有些则描绘欧洲殖民统治者或他们的技术，或是为了分享他们政治经济权力的光环，或是讽刺他们的侵略。总之，非洲烟斗技艺精湛，风格独特，富有艺术性、创造性、幽默感和智慧，令人叹为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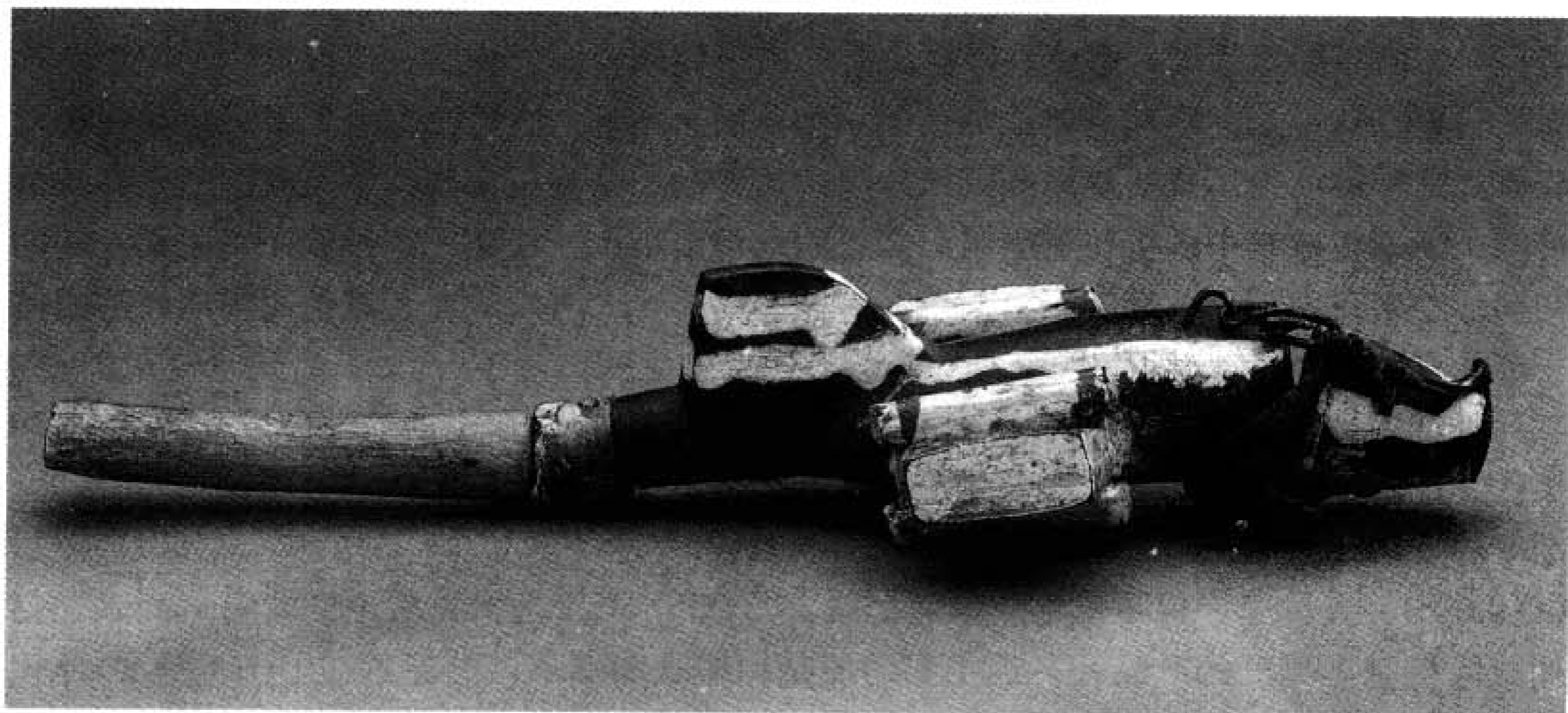
当然，个人才能、集体审美观、原材料的差异和民族间的交流也造就了烟斗的多样性。但很多时候，尤其是当你考察某一地区的发展史时，你就会发现多样性的背后还有社会学因素。布朗恩·薇薇安表示，从早期明显地模仿或复制进口的欧洲模型到晚期的本土原创，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17世纪早期烟草是稀缺商品；同欧洲的贸易受到严格监管；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将所有的商品和特权集中在国王的手里。但是到了19世纪，很多人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长途或本地贸易中富裕起来，更多的人消费得起曾经被限制的商品和特权——包括最优秀的烟斗制造商的精湛技艺。保罗·欧也尼提出的加纳南部的烟斗发展史也反映了同样的现实。^[9]



巴蒙（喀麦隆）的陶瓷烟斗，图像为一个贵族。现存于 Njoya 国王的王宫



来源于尼日利亚阿达马瓦省的一个不知名的部落的陶瓷烟斗，描绘了一个人站在内嵌有贝壳片的飞机上



加纳的木制烟斗，外部将锡涂成线条状，形似带活动鼻的飞机

在非洲，吸烟意味着某一部落或团体内的凝聚力，有时这种团结也会超越种族或其他社会界限。吸烟引发的文化交融和政治意义在 19 世纪后期居住在现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本那·迪姆巴人（又称“大麻人”）身上得以体现。最近，乔纳斯·费边在考察欧洲人在中非颇具戏剧性的殖民统治史时，重述了这段故事。多么疯狂的一群探索者啊！在非洲人眼里他们是多么的神秘！为了理解究竟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殖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把彼此当成学习的目标，费边曝光了殖民统治者在其旅行杂记和民族志中粉饰的生活真相：恐慌、狂躁、酗酒、吸毒、疾病、性、残忍和恐惧，当然也有欢乐、友谊、玩耍和嬉戏。^[10]

对于沙漠旅行队，尤其是从东非斯瓦其里海岸深入到内陆的旅行队来说，吸大麻是经常的事情。中非的欧洲旅行者也吸食大麻，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确实，当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异乡孤独寂寞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吸毒，大多数人偶尔吸一吸，而少数人则经常吸。”^[11]在缔结友谊的同时，野蛮行径也愈演愈烈。费边认为，不管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都趁着毒品的迷幻效应逃离清规戒律的严格束缚，这点也有助于彼此了解对方迥然不同的文化习俗。

探索中非的故事中最为神秘的莫过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本那·迪姆巴的故事。本那·迪姆巴是在现今刚果民主共和国西南部姆布吉马伊地区的卢卢人（又称“土格兰”）中兴起的一个政治宗教社会。当时，对长途贸易控制权的明争暗斗和对奴隶和象牙的抢夺充满了暴力，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颇具号召力的领袖木肯把大麻当作可以为手下树立身份感的政治文化象征，并以此让更大范围内的首领和头目俯首称臣。

木肯和他的姐姐以及一个亲信为杜撰习俗煞费苦心。例如，“友谊之地”的居民用“moyo”（意指“生活”）问候彼此。先前因血缘、宗族和政治联盟而形成的地位和关系，逐渐被以大麻为精神力量源泉的凝聚力所替代。虽然费边掌握的资料并不能明确这一点，但大麻显然已被视为一种真实的存在——神！本那·迪姆巴成了这片被内讧争斗弄得支离破碎的土地上的和平使者，他们甚至拒绝杀害动物。他们放弃棕榈酒和草药而投向大麻，他们行裸体礼、全身剃度，以示脱离旧的社会身份。房屋被改造了，以适合群居；村庄被重新组织了，围绕在吸食大麻的广场四周；旧的物质文化被摧毁了，巍然耸立的、直径约一米的用葫芦制成的巨型水烟斗成为本那·迪姆巴人本土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这种运动得了威斯曼恩和其他欧洲来访者的鼓励甚至参与。他们起初是抱有政治目的，渐渐也被其中的神秘所吸引。费边因此得出结论，在殖民地种族民主主义兴起的初期，刚果自由邦的欧洲统治者甚至授予这些迷惑于大麻而敌对于其他团体的政治团体一定的自治权，这种可怕的分裂一直持续到刚果独立四十余年后。

吸烟中固然掺杂着一些政治因素，但它也是非洲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 世纪 30 年代，在喀麦隆西南的格拉斯菲尔茨地区的昆姆王国，吸烟被当成“必需品”；在南非，烟草的“重要性可与啤酒和肉相当”^[12]；昆姆人祈祷上天保佑他们的后代、兴旺和特权，据传教士、人类学者保罗·戈保尔的记载，“兴旺”不仅是指物质上的富有，而且包括拥有维持基本尊严的产品——最主要的便是棕榈酒和烟草。戈保尔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还观察到，妇女们会享受“吸烟时间”来“驱除清晨的忧郁”、“缓减农活的繁重”；“最



乔奎人（安哥拉或赞比亚）雕刻成贵族的木烟斗

难忘的”是“—列草原妇女在草原山坡上鱼贯而行，身后飘着缕缕的蓝烟。”男人们每隔一小时便停工吸烟，“以便让灵魂跟上脚步”。人们常常把烟草种在房屋附近的垃圾堆上或废弃的住宅用地上，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觉得地下祖先的尸骨会为烟草添加滋味！”^[13]

吸烟和精神世界的联系或许比本文论述的意义更加重大。对于相当多的南非人来说，烟草是“共享”而非“独有”的东西，它由活人和死者的灵魂共享。莱索托的梭托人认为，“烟草可以提神醒脑，让你聆听到祖先的声音”，是一种重要的“精神食粮”。祖鲁人用烟草来祭奠祖先。科萨人认为烟斗是“同灵界友好的一种工具”。贝南共和国的人把烟草放在神灵雕像的嘴边以示讨好。^[14] 动词“吸烟”在塔布瓦语中的等价词是“kupepa”，意指“供奉神灵”。塔布瓦人过去把烟草和烟管当成陪葬品，还要哭诵“再也不能同亡者一同吸烟”。现在，人们会把香烟带到葬礼上共享，也有同亡灵一起分享的意思。

吸烟吸引灵魂也有别的目的，特别是占卜。塔布瓦人操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中的动词“kuvuta”（意为“拉”或“拽”）指吸烟，意指吸烟时“拉”或“拽”烟斗或今天的卷烟。这个动词也用来指引神灵上身，作为精神介质启发人们解决问题。安哥拉和赞比亚的卦师就是这样吸水烟，以迎接神灵帮他们诊断疾病，占卜运势。类似的是，多哥的卡布韦地神牧师一边占卜，一边在神龛前吸烟。南非的科萨神医的象征是用白珠装饰的烟斗。祖鲁族人视某一块特别的烟草地为“神灵之域”，所产的烟草用于招引神灵。人们还把所采的烟草和蜂蜜混合起来在田中燃烧，以祭奠先辈卦师。^[15]

人们也用其他草药或植物加工烟草。塔布瓦的萨满吸一种名为“路邦温”的菟，这种植物似乎没有什么迷幻效果，但据说却让一个凸轮嘎人“见到了”连神医都看不见的巫师。吸精神药物在非洲非常少见（不考虑近年来城市引入麻醉药的可能），因此乍得的科特科人吸曼陀罗是一种地区行为。零星的部落也会吸意识转换药，如加蓬的芳族人借助“伊波加”（黑升麻）和祖先会面，“在想象中让他们传授宗教的信仰和礼仪”，但是伊波加是口服而非吸入的。^[16]

在世俗的背景下，吸烟缔结的人与灵之间的集体感十分活灵活现。与很多非洲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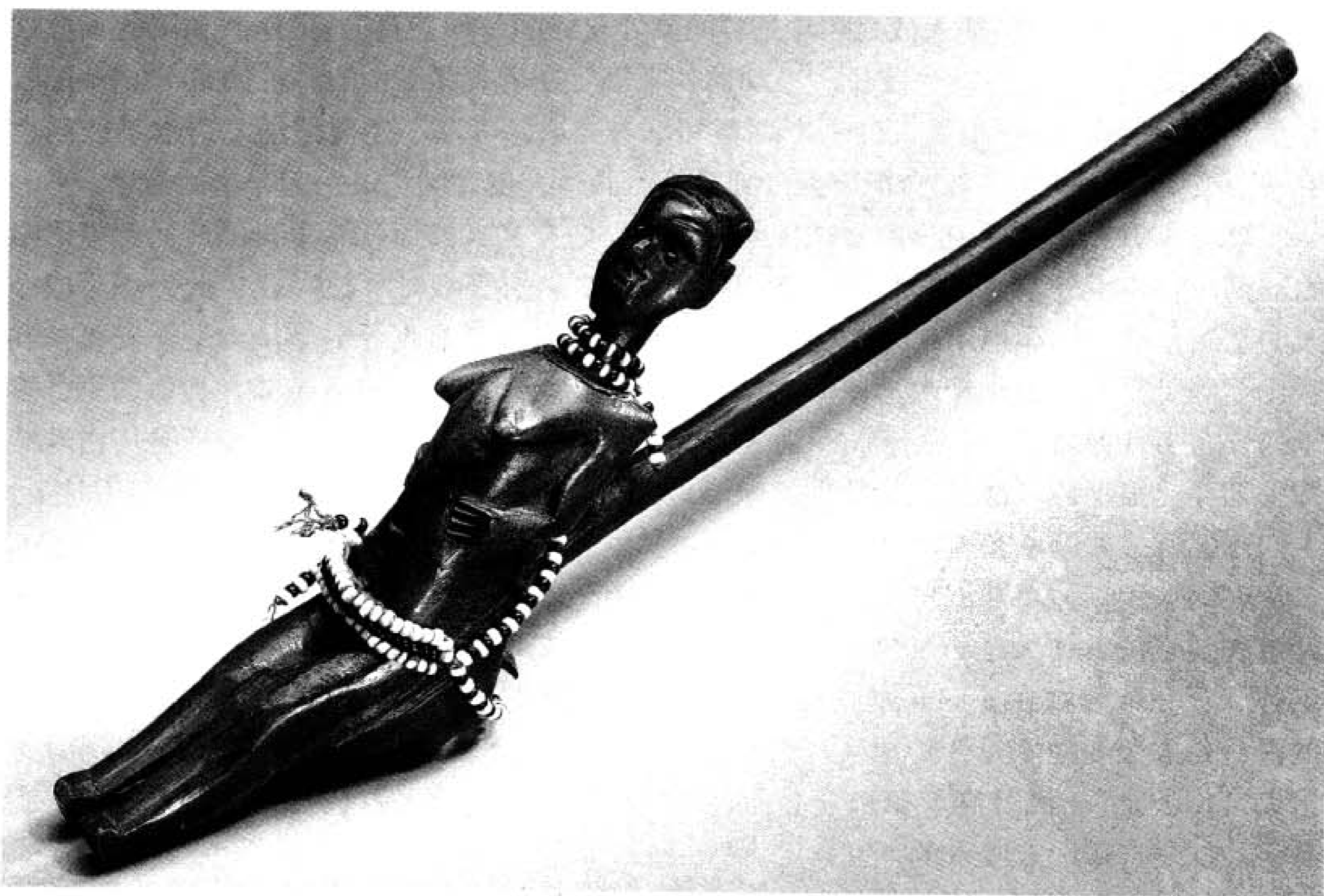
样，塔布瓦人把家庭凝聚力同吸烟联系在一起：经祖先的批准，一起吸烟的人便粘连在一起；离婚便是“切断烟”。烟草和吸烟还同生育联系在一起。梭托人说得很清楚：语言中表示烟草的词“kwae”也是“阴茎”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他们还有一句俗话说，“kwae 是夜晚女人吸烟的东西”。“Kwae”也指新娘嫁入婆家时宰杀的羊，暗示新婚夫妇同房。^[17]

某些非洲烟斗的拟人观念突出了吸烟、性和性别之间的类比性，体现得最具戏剧性的还数卢巴人、塔瓦布人和刚果人。无论是在实物收藏还是文献记录中，这样的烟斗都极少见。但是即使是用葫芦制的烟斗也用铜线编织着类似纹身的花纹，其中体现的拟人观念不言而喻。

有两件烟斗非常罕见。一件是 19 世纪 90 年代生产的、收藏于卢巴人和塔瓦布人部落边境的卢巴烟斗，另一件是 19 世纪的塔布瓦水烟斗。它们的象征意义不禁让人对马格力特生疑：这些怎么会是烟斗？然而，它们确实是。

卢巴水烟斗的姿态、头饰和纹身让人想起了几种风格特征，或更一般地说是支撑卢巴板凳的女像柱。此例中，跪立的大腿不是支撑于板凳的基座，而是靠在象征生殖器的延伸部分的烟斗水室。塔布瓦烟斗也是如此。为了表现女性的性感，卢巴和塔布瓦人突出了女性形象的外阴。但是这两个烟斗的意义更在于体现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和政治关系。

塔布瓦人和东卢巴人是母系社会，男人们深陷于人类学家所谓的“母系困惑”中。当亲属关系按母系血统确立时，一个男人的后代不是他的亲生子女，而是他的姐妹的子



莫桑比克或南非的木制烟斗，形为一个周身缠绕珠子的女子，她的头部用作烟钵

女。既要关爱自己家中的子女，又要教育、抚养外甥们到成年，双重的任务让男人们心力交瘁。在以男人为顶点、妻子和姐妹分为两个底点的三角关系中，争宠、猜忌和冲突层出不穷。

塔布瓦人通过文字叙述和物质文化来体现他们的社会结构。比如说有一种称为“halamwezi”（意为“新月的升起”）的等边三角形装饰物。公月亮有盈亏明暗，同时也处于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利益夹缝中；金星早晚在东方和西方投下的阴影代表了这两个女人。有时，这些相同的“星星”是一夫多妻制下月亮的两个妻子，但是叙述的结果却是相同的：一个男人受困于两个至亲至爱但角色相反的女人之中。

塔布瓦和卢巴人的水烟斗通常是“实例教材”，活生生地揭开了这些谜团的谜底。女性烟斗的水腔冷静、黝黑、谨慎和成熟。这种烟斗有两样主要部件：深插在水腔中的芦苇秆和芦苇秆另一端托起的烟钵。塔布瓦人认为芦苇秆代表“雄性的”，而烟钵代表“雌性的”。烟草（大麻）在烟钵中燃烧，这些“女性”火辣辣的，她们装载的烟草被烧成烟雾，由芦苇秆传送到水腔中冷却。以下的“三合一色”体现了大量非洲人的思维模式。女人是“红色”，意指变幻莫测的诱惑力，同时女人也是“黑色”，黑得神秘、智慧和丰饶，而永远被困在女人中间的男人如烟雾般“苍白”，缥缈却强悍。^[18]

本文虽是对非洲吸烟历史和文化的简单回顾，但显而易见的是，一直以来，吸烟对非洲人而言不仅值得一想而且值得一尝。那么，这些关于吸烟的风俗和作法是否留存至今呢？当然，农村地区仍保存着本文提及的一些习俗，但是在其他地区，吸烟已经随着全球化的脚步发生了变化。

早在殖民时代晚期，烟草制品的生产就得以工业化。尽管人均收入依然很低，但烟草市场的潜力却非常巨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香烟都依赖进口。在许多殖民地，香烟制造业是最早出现的工业之一，甚至在某些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工业。近年来，在健康意识日渐强烈的欧洲和美洲，烟草市场受到冲击，面对迫切想在非洲弥补欧洲、美洲市场利润损失的跨国公司，本土烟草商正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称，尽管目前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等病在非洲肆虐，但是到2020年，吸烟引发的疾病将成为非洲人的“头号杀手”。^[19]现在，非洲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正顶着跨国烟草公司甚至本地人的激烈反对，致力于了解并控制吸烟造成的死亡率。在非洲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吸烟显得很“现代”和“时尚”。关于烟斗的观点和假设虽是一家之言，但“这个毕竟也是个烟斗”。

注 释：

[1] 雅克·多贝格尼《马格力特》（巴黎，1977：9）。

[2] 约翰·爱德华·菲利普斯《非洲的吸烟和烟斗》，载《非洲历史期刊》1983年第XXIV期，第308、313、315页。其他学者认为古波斯人发明或至少发展或享用了烟斗，并将其传入东非（W·克里默，私人书信，2002）

- [3] 乔治·梅特卡夫《微观非洲人贩卖奴隶始末：18世纪70年代阿肯族人的消费模式》，载《非洲历史期刊》1987年第XXI/1期，第382页。
- [4] 见戴维·卡尔沃科雷西《欧洲人在加纳的烟草贸易》，载《西非考古杂志》1975年第V期，第195-200页；艾兰·沃克《西非考古研究中欧洲陶土烟斗的使用》，载《西非考古杂志》1975年第V期，第165-193页；吉恩·雷克鲁斯《黑非洲烟斗》，私人油印（比利时）。
- [5] 安·万利斯《集体娱乐：南非的吸烟及鼻吸烟》，收入《艺术和模糊性：透视布伦舍斯特非洲艺术藏品》（约翰内斯堡艺术馆，1991：128）。
- [6] 关于刚果共和国塔布瓦人的研究来自本人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的研究。关于塔布瓦人食大麻动物的传说，请参见爱伦·罗伯茨《非洲艺术中的动物：从稀奇古怪到精彩绝伦》（慕尼黑，1996：54）。
- [7] 见艾伦·罗伯兹编《生活的支柱：库德隆非洲艺术中的手仗、拐仗和权仗》（爱荷华，1994）；威连姆·杜威《睡美人：杰罗姆·杰丝特藏的非洲头饰》（洛杉矶，1993）。
- [8] 雷克鲁斯《黑非洲烟斗》。另参见爱尼德·希尔德克劳特和库特斯·凯姆《反思非洲：来自扎伊尔东北部的艺术》（西雅图，1990）等。
- [9] 布莱恩·薇薇安《种族、烟斗和烟草的生产》，未发表，美国考古学会年会论文（2001）；另参见保罗·欧也尼《阿克拉和塞阿族人的烟斗》，加纳大学考古系限量发行的复印版（雷哥，1964）。
- [10] 约翰内斯·费边《被我们遗忘的：探索中非的理性和疯狂》（伯克利，2000：9）。本人为即将发行的第14期《今日非洲》撰写了本书的长篇评论，本文中的这些句子即从这篇文章中改写而来。
- [11] 同上，第162、67、65页。
- [12] 保罗·加保尔《喀麦隆烟斗》，载《非洲艺术》1971年第V/2期，第28-35、28页；万利斯《集体娱乐》，1991：128。
- [13] 保罗·加保尔《喀麦隆烟斗》，1971：28-30。
- [14] 万利斯《集体娱乐》，1991：128-130。
- [15] 同上，第131页。
- [16] 爱伦·罗伯茨《艰难的决定，危险的行动》，收入约翰·彭伯顿编《非洲预言的洞察力与艺术性》第3卷（华盛顿特区，2000：83-98，86，95）；菲利普斯《非洲的吸烟和烟斗》，1983：314；詹姆斯·费尔南德斯《Bwiti：非洲宗教幻想的人类学研究》（普林斯顿，1982：4，383）。
- [17] 万利斯《集体娱乐》，1991：130。这个梭托人用语对应一个非常下流的法语词汇“faire une pipe”。
- [18] 参见安妮塔·雅各布森-威汀《红、白、黑代表的思维模式》，收入《乌普萨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I；爱伦·罗伯茨《洞察，或并不是眼见为实》，收入马丽·鲁特编《秘密：或隐或现的非洲艺术》（纽约，1993：64-69）。
- [19] K·斯拉玛《烟草为什么是当今非洲的紧要问题》，参见 <http://www.ingeat.org/html/slamai.html>

烟草在伊朗

鲁迪·马修*

烟草第一次传入伊朗是在萨非王朝统治时期（1501-1722），也就是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然而，其传播和扩散的来源至今依然不为人知。有些人坚称，伊朗人是在1609年萨非对奥斯曼的战争期间从奥斯曼人那里学会抽烟的。当时，阿伯斯沙王听闻自己的士兵沉迷于烟草，于是宣布禁止吸食烟草，违禁者处以削鼻唇的重刑。这些都是在阿伯斯的继承者——沙王萨非统治期间，由游访伊朗的德国旅行家亚当·奥里瑞斯所证实的。然而，亚当并未指出烟草是以何种方式传入伊朗的。不幸的是，并没有任何记录证明在阿伯斯沙王统治期间就有烟草使用，最早的记录出自1617年西班牙特使唐·嘉锡亚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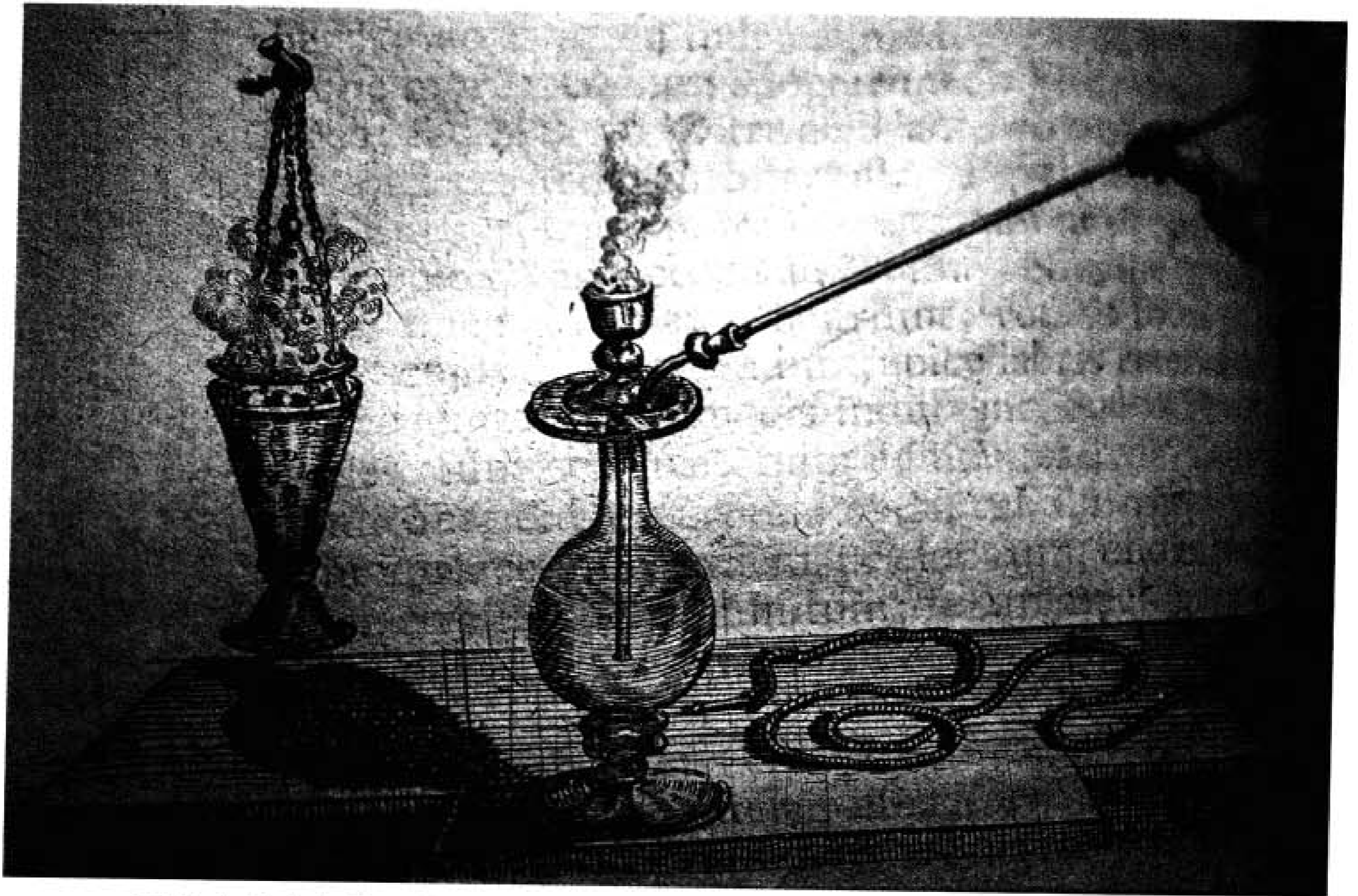
18世纪波斯药物学家马卡赞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他声称烟草是通过葡萄牙商人和水手传入伊朗的。而波斯文学最早对水烟的记载，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说法。这一记载来自一名匿名诗人的作品：

你从嘴唇吸取了水烟的乐趣，
芦苇棒在你嘴里变得如甘蔗一般甘甜，
围绕在你脸庞的不是烟草的雾气，
而是缭绕月亮的云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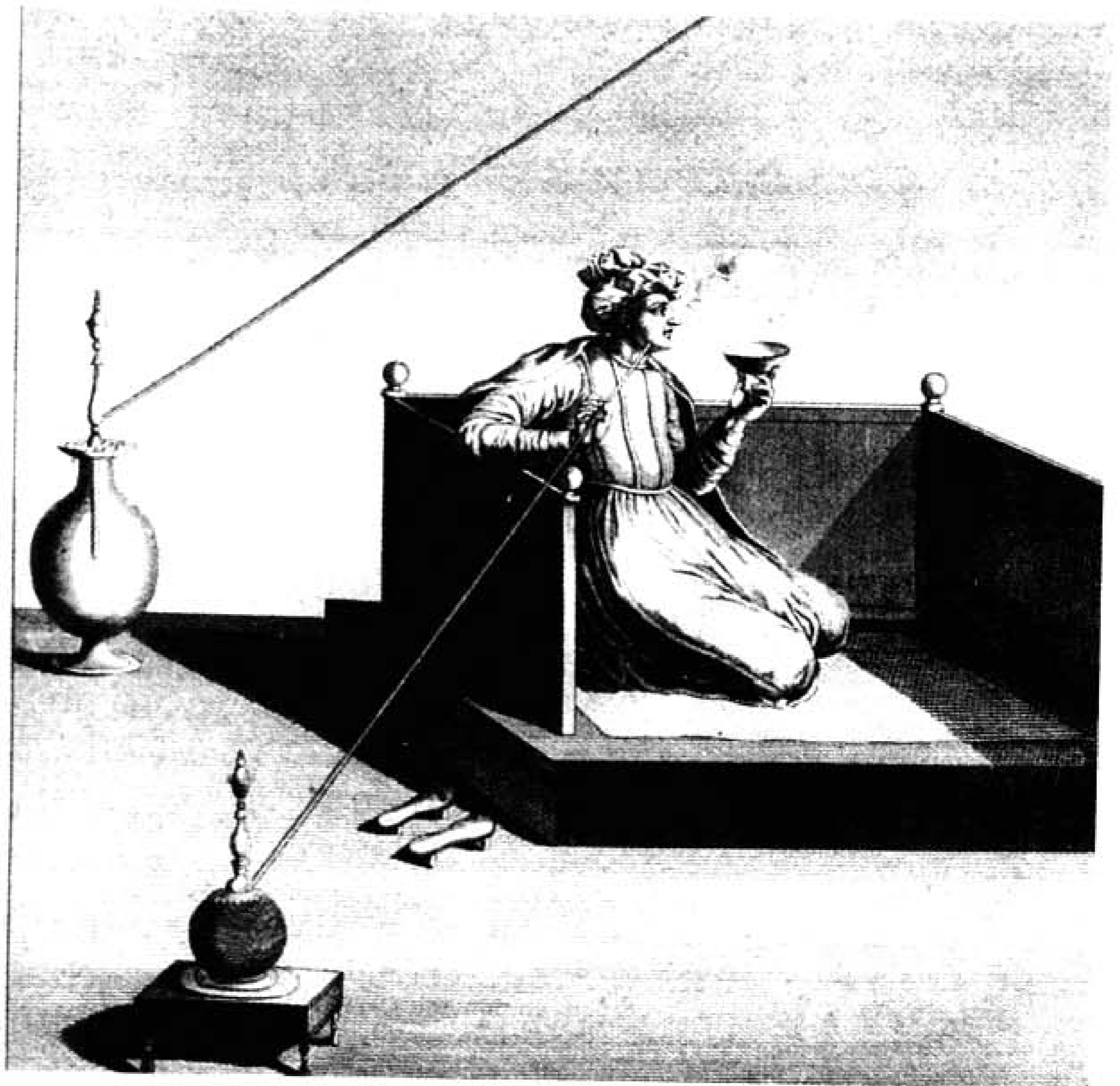
据推测，这首诗创作于1536年之前。然而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没有任何其他提及烟草的史料，而且有迹象表明，直到1600年后烟草才传入亚洲其他地区。尽管如此，人们也从未质疑过烟草是由葡萄牙人传入伊朗的。

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水烟——在伊朗最受欢迎的抽烟器具——的出处。该器具在波斯语中被称为“Qalyan”，印度语中称作“Huqqah”，在阿拉伯世界则被叫做“Nargliah”或“Shishah”。这个器具一般被认为是伊朗人的杰作，并从伊朗传遍整个中东。然而，除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烟在伊朗特别流行这一事实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起源于伊朗。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水烟更有可能最先起源于印度。波斯语“Qalyan”一词并不能表明其起源伊朗，事实上，它是“Ghalyan”的派生词，而“Ghalyan”则是从阿拉伯语动

*鲁迪·马修（RUDI MATTHEE）：特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丝绸换银元：伊朗萨非王朝的贸易政治（1600-1730）》（1999），《追求享乐：伊朗历史上的药品和兴奋剂（1500-1900）》（待出版）。合著有：《伊朗和伊朗以外：纪念尼基·R·克蒂论文集》（2000），《伊朗和周围的世界：文化和政治的互动（1501-2001）》（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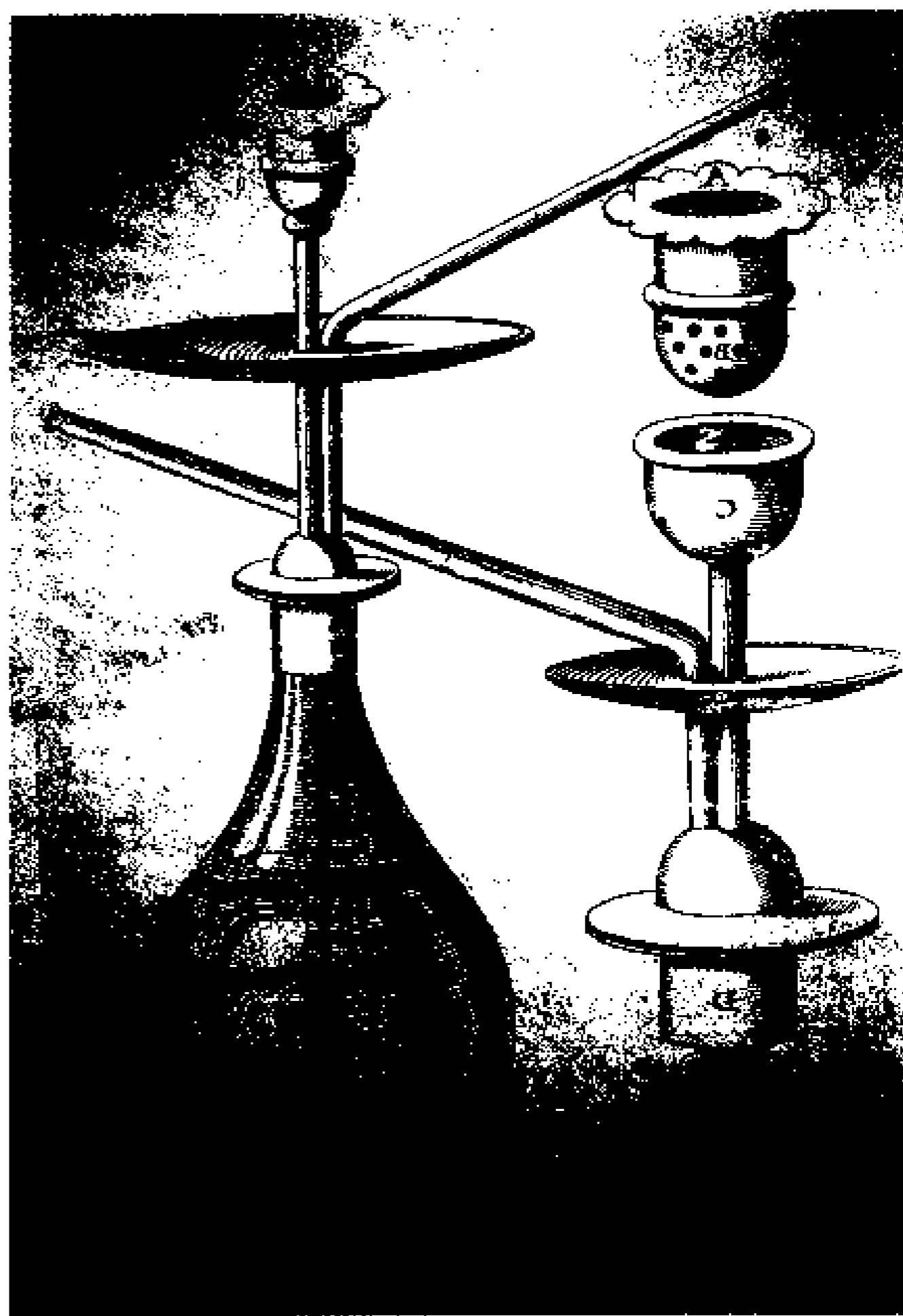
17 世纪的水烟筒，摘自英格柏·坎普佛《异域风采记》(莱姆葛，1712)



传教士所使用的长柄水烟筒，摘自贞德·查尔丁《查尔丁骑士在波斯和东方其他地方的旅行》(巴黎，1810-1811)

词“Ghala”（意为“沸腾”、“冒泡”）一词演变来的。最早的水烟是一个用掏空的椰子做成的简单器具，有一根作为过滤香烟的直芦苇插入椰子壳里。与这一模型相似的水烟被伊朗南部和印度的穷人们持续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梵语中表示椰子的词“Nargilah”也由此而来。因为椰子生长在印度南部而非伊朗本土，依此情形，水烟很可能来源于次大陆，据说首先使用它的是该地区某个伊朗内科医生。^[1]

下面是关于水烟进一步发展的最后一个相关问题。在这本由约翰·尼安德撰写，于1622年在荷兰出版的关于欧洲烟草的最早著作《烟草学》中，有一副波斯水烟的图画。^[2]图中呈现的并不是用椰子壳拼凑出来的简陋而粗糙的玩意，而是精心制作且构造复杂的器具。这高超的手工艺暗示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技术进步和审美改良进程。总之，烟草是在新世界和伊比利亚半岛传播并成为普通消费品的，而萨非王朝时期的伊朗，则是脱离新世界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最早的社会之一。



早期的水烟筒模型，摘自约翰·尼安德《烟草的医药化学功能》（莱顿，1622）

烟草的流行

对烟草在伊朗的早期传播进行考察，不得不关注17世纪中期以前这个国家许多与烟草及其流行有关的参考资料。1621年德国旅行家海德里希·冯在游访坎大哈时曾提过“过度吸食烟草”。十五年后，亚当记录了伊朗所有阶层的人都对烟草十分着迷，以至于他们无处不在地抽着烟，即便是在清真寺里。烟草在当时还都是进口的。“Inglis tanbaku”（意为“英国的烟草”）这一术语意味着17世纪早期的烟草是从英国进口而来的。伊朗也得到许多来自奥斯曼和印度供应的廉价烟草。直到17世纪中期，这种从外国进口的局面才大致得以扭转，烟草成为全伊朗的经济作物。这个国家的中南部地区主要生产水烟所使用的优质烟草，品质最佳的当属伊斯法罕省周边和法尔斯所种植的；而那些用于普通烟斗的较下等的烟草则种植在西部地区。不久，伊朗就向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出口它们自产的烟草了。



17 世纪在咖啡屋吸烟的伊朗人，摘自让·巴蒂斯特瓦涅尔的《托雷尼耶的六次航行》(巴黎，1676)

到了 17 世纪中期，烟草这一植物变得十分盛行，以至于士兵在作战期间、旅行家在旅途中都随身携带水烟。法国旅行家让·巴蒂斯特有记录：许多伊朗人宁愿放弃面包也不愿放弃烟草。在斋月期间，伊朗人在斋戒结束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燃他们的烟斗。^[3] 英国人约翰·福莱尔认为，“穷人如果有一便士，一半会用来购买面包、葡萄干或者奶油和牛奶，另一半则会用来购买烟草”。^[4] 而在 1703 至 1704 年间曾游访伊朗的荷兰人布来殷也坚称，烟草是“伊朗人最主要的美味和消遣”。大致和咖啡屋相似，水烟屋似乎已成为萨非王朝后期所有伊朗城镇的标志。曾于 1683 年路经吉兰省首府雷什特的凯普费尔记述：“这里的三分之一，或至少四分之一的地方都是水烟屋，在屋里既可以听到演说家的声音，也能听到乞讨者的声音。”在许多城镇，水烟屋就坐落在城镇的中心，常常是在主广场的两旁。除了水烟屋和咖啡屋，这里也有许多商铺，向过路人出售烟草。再者，伊朗似乎先于欧洲几十年就已完全把烟草和吸食烟草行为纳入其社会结构，烟草成为多数人的消费品。

伊朗人吸食烟草时是否使用其他的兴奋剂，这一话题得更加深入地探讨。试图找寻烟草在伊朗被迅速接受的原因，及其与同一时期引进的咖啡之间的表层关系，是没必要的。吸烟者对咖啡因的代谢速率比非吸烟者快得多，而这要求吸入更多的咖啡以达到相同的效果。然而，在寻求能解释其进程的努力中，将一方视为另一方的诱因只不过是回避正题罢了。烟草和咖啡都成为伊朗人生活中完全的附属品，相比较而言，烟草使人平静而咖啡使人兴奋。有句波斯谚语说道：“咖啡没有了烟，就如同汤没有了盐一样”。当然这一说法并没有什么内在的根据。伊朗人对烟草快速而全面的接受也许能被解释为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汇聚和融合，其中包括先前存在的其他麻醉药物。其中的一些麻醉药物早在烟草传入前就在伊朗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其中之一就是鸦片。鸦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鸦片吸食与烟草的融合，因为鸦片在 19 世纪以前是被当作食品食用而不



萨非晚期一位手持水烟筒的骑马人，阿姆斯特丹，1714

是用来抽的。但这种融合却不适用于印度大麻。印度大麻是一种很早就为伊朗人熟知并广为使用的麻醉品，而这种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对烟草的采用。烟草和印度大麻是高度互补的，且在很早前就在伊朗被同时使用。然而，这除了表明烟草和印度大麻之间的联系外，未能证实水烟斗在烟草传入之前是用于吸食大麻的。而这也对水烟斗是伊斯兰世界自发性的发明的可能性产生了质疑。^[5] 无论水烟斗起源于伊朗还是印度，认为水烟斗是种创新发明的想法是合理的。有人认为对烟草的快速接受和水烟斗的发展及改良是由于习惯了使用已存在和新引进的致幻性药物，这个观点也是合乎情理的。就此看来，水烟斗是否用来吸食大麻与此并不相关。17世纪将烟草和大麻共同吸食只不过是加强了假设的真实性。因此，17世纪70年代福莱尔就曾记录伊朗人“永远都将能令人麻醉的大麻叶和花混合烟草来抽食”。^[6]

在一些西欧国家，不同社会等级的人采用不同的吸烟方式。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伊朗，等级的差异并不表现在吸烟的方式上，而更多地表现在所使用的随身用具的精致和装饰程度上。刻在烟斗上的精致体面的饰物与其说是个人的需要，不如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无论富贫，无论高尚或平庸，人们有着相同的抽烟嗜好。不过，穷人的水烟斗是用椰子或葫芦的底部做的，而有钱人则用上色的玻璃或雕琢的金银来做。那些保留下来的水烟斗，不管来源于印度还是伊朗，都表明了其后来达到的设计的精密程度。地位高的人逐渐习惯雇佣一名水烟斗工携带各种吸烟用具跟随在马背后。身后携带烟具这一现象使得宗教和社会阶层的界限越发明显，因为在那个时期，亚美尼亚的基督徒不允许在身后携带烟具。在卡扎尔时期（1796-1925），富人也雇佣一名仆人，仆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清洁、移动、点燃和重新填充水烟斗。使用普通烟斗也有等级差异。在伊朗，抽“干烟”

使用的是带有小碗的长柄烟斗，这种烟斗与英格兰和荷兰使用的烟斗十分相似。这些烟斗最初是由陶土制成的，在土耳其语和波斯语中被称为“Chupuq”或“Chapuq”，是表示木头的波斯语“chub”的同源词，在英国则被译作“Chibouk”（土耳其长烟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逐渐习惯使用银雕镂的装饰富丽的烟斗，而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则使用木制烟斗。穷人通常用的是组装或者维修过的劣质烟斗。

与早期西方发达社会的情况不同，吸烟在萨非王朝时期的伊朗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性别之分。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记录的，“所有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夜以继日、一模一样地贪婪吸烟”。然而，吸烟的场所或多或少地把男人和女人分开了。萨非王朝时期有许多咖啡屋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在城市中心，男人们在这些地方享受着烟，而女人则鲜有冒险外出的，她们在私人场所恣意吸烟。

这种不同的汇聚和同化牵涉到当时的社会习俗、仪式及祭典传统。从一开始，吸烟对伊朗人来说就不单是种消遣，而是一种与好客及欢宴紧密交织的习惯。一位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21 世纪 22 世纪 23 世纪 24 世纪 25 世纪 26 世纪 27 世纪 28 世纪 29 世纪 30 世纪 31 世纪 32 世纪 33 世纪 34 世纪 35 世纪 36 世纪 37 世纪 38 世纪 39 世纪 40 世纪 41 世纪 42 世纪 43 世纪 44 世纪 45 世纪 46 世纪 47 世纪 48 世纪 49 世纪 50 世纪 51 世纪 52 世纪 53 世纪 54 世纪 55 世纪 56 世纪 57 世纪 58 世纪 59 世纪 60 世纪 61 世纪 62 世纪 63 世纪 64 世纪 65 世纪 66 世纪 67 世纪 68 世纪 69 世纪 70 世纪 71 世纪 72 世纪 73 世纪 74 世纪 75 世纪 76 世纪 77 世纪 78 世纪 79 世纪 80 世纪 81 世纪 82 世纪 83 世纪 84 世纪 85 世纪 86 世纪 87 世纪 88 世纪 89 世纪 90 世纪 91 世纪 92 世纪 93 世纪 94 世纪 95 世纪 96 世纪 97 世纪 98 世纪 99 世纪 100 世纪 的观察家曾指出，虽然伊朗人与土耳其人一



一个伊朗妇女和她的奶妈，卡沙尔时期晚期（巴黎，1887）



几个妇女在一个私人的房间里共用一根水管，摘自 H. 格路斯《Wanderugen 在波斯》（柏林，1910）

样经常抽烟，但伊朗人抽烟更多的是出于礼仪的需要，这涉及到伊朗人殷勤待客和善于交际的悠久传统，而水烟就是社交集合的道具之一。因此，烟草成为社交亲和力的标志。许多外国的游访者都记述到，一旦客人踏进伊朗人的房子，主人就会递上水烟和咖啡或者茶。福莱尔曾记录：“烟草是大众的伙伴，是健谈的好朋友。”^[7]卡扎尔时期伊朗的观察更关注伊朗人礼节化的吸烟，说这是一个充满社会地位和阶级法规的消遣。1882年至1883年驻伊朗的首任美国大使本杰明给出了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



19世纪早期一名卡扎尔的官员和他的水烟管搬运工，摘自G. 杜威尔于1812年和1813年创作的《波斯之旅》(圣彼得堡，1819-1820)



17世纪伊斯法罕一个抽烟的女孩

如果一个人的地位比在场的其他所有人都高，那么只有一个烟斗会带进去给这个人。在吸烟之前，他会佯装将烟依次提供给在场的人，但在此人抽烟之前，若是有人不小心接受了这杆烟，是很不合时宜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被波斯绅士投以轻蔑的讽刺。在波斯，地位仅次于国王的最高官员马莫雷克已经有四十年没抽烟了。他抱着坚强的决心不抽烟是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有一次有人当着他的面把烟先给了一个他认为地位没有他高的男人。当这把烟再呈给他的时候，他将烟猛摔在一边，并发誓再也不抽烟，以免再受此种侮辱。

到了20世纪，水烟就不再流行了，它的位置逐渐被香烟取代。最早使用香烟是在19世纪后期，香烟的使用传播迅速，到1890年，在德黑兰的集市上能看到商人嘴里叼着香烟。当时俄罗斯公司已经在里海边的吉兰开了香烟制造

厂。在近代，几乎所有伊朗种植的烟草都被制成香烟，至20世纪60年代，国内两家大工厂每年生产的香烟达到一百亿支。在所有的外国香烟中，温斯顿在当时直至今日都被看作最珍贵的品牌。

抵制吸烟：批判、禁止和放任

正如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烟草在传入中东之初便引起了医药界的兴趣，激起了牧师们道义的谴责，也引起了部分官僚对经济的担忧。与西方医生一样，穆斯林的内科医生谈论着吸烟对身体健康的作用，并对这种作用有所争议。因为烟草被认为是热而干的物质，将其做湿润处理被认为是有益人们身体健康的。与欧洲的信仰相似，香烟的烟雾被认为可以驱除瘟疫。然而，在伊斯兰土地上，所有的烟草从来也没像近代欧洲早期那样得到能治病的名声。

另一方面，穆斯林学者对这一新奇事物在虔诚和体统方面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在古兰经中找不到有关烟草的文字，他们就是通过推测来断定吸烟是否该被禁止或谴责。由于烟草不像古兰经和《先知》警言中提到的任何被禁物，这就宣告了烟草不是简单的事物。也就是说要证明烟草本身有害，或者对人体有害并不是一件易事。禁烟的一个理由就是将烟草等同于叙拉八世时宣布禁止的污秽之物，而在叙拉三世时期，烟草被等同于“要避讳的污邪之物”。而且根据圣训，先知赞美甜美的气味，那必然憎恶烟草这种污浊的味道。

在什叶派世界中，烟草也引发了类似的争议。由于部分内科医生反对宗教对烟草的批判，大批伊朗神学者撰写论文讨论吸烟的宗教地位，权衡烟草带来的潜在的健康利益。支持和反对烟草的争论常常在东正教代表人和苏菲派领导人之间进行。东正教的代表反对烟草，而苏菲派的领导却对吸烟着迷。在牧师的反对下，萨非王朝的当权者发布法令宣布烟草为禁品。穆斯林的统治者倾向于呈现并清楚地表达此禁烟措施为“回归真理”。不过，将禁烟与达到神圣的目标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因为真实的动机远远超过对虔诚的考虑。萨非王朝统治者如此热忱地禁烟是出于对利益的考量，而非出于对宗教的虔诚。



伊朗东阿塞拜疆的乡长和他的仆人们，卡扎尔时期晚期

阿伯斯沙王是在检查到士兵们这种浪费精力的嗜好后开始禁烟的。他的曾孙，也就是其继承者萨非沙王（1629-1642年在位）在1629年掌权后不久就废除了禁令，这是他用以建立其正统性、安抚领土内子民的系列措施的一部分。萨非沙王在其统治期间也曾几度禁烟，但原因都不详，且每次禁烟都收效甚微且时间短暂。

然而谴责和禁令都无法阻止烟草的继续发展，甚至连神职人员中的权威人士都渐渐意识到反对烟草是徒劳的。正如他们中的一员在萨非王朝时期行将结束时所记载的：“水烟在东部和西部是如此的有名，以至于将其除去已不可能。以前，掌权者在各处都禁烟，并对瘾君子处以死刑，确实也有人因此而被杀，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对这一纵容行为的最大刺激，无疑来自于那些屈服于这一嗜好的当权者。其中最好的例证就是有影响力的、直言不讳的反苏菲派人士神学家穆罕默德，他是当时最优秀的牧师，他认为吸烟应该被容许。和那些认可烟草的人一样，他自己也是狂热的烟民。他的父亲也是个烟民，甚至认为在自觉的斋戒期间抽烟是被容许的，所以只有在强制斋戒期间才克制自己不抽烟，以免引发争议。

容许甚至鼓励吸烟的另一个驱动力就是烟草所带来的税收。塔维尼埃曾记载：禁止是不会持续多久，因为禁止烟草的销售和使用会使伊朗王朝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他记述道，仅在伊斯帕罕，从对烟草的税收中每年就能获得四万土曼的收益，同时，大不里士地区收益两万土曼，施赫地区收益一万土曼，总共可以给王国带来将近六十万土曼的惊人效益。其他方面如批准烟草货币和“对烟草征收重税”，也表明政府参与了烟草贸易和消费的过程。

到19世纪中后期，烟草已经成为伊朗对印度、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出口的主要产品。到了1878年，其烟草总产量接近一万吨。因此，卡扎尔政府试图将这个赚钱的东西更多地纳入中央控制之下也就不足为奇了。1886年，艾德丁沙王以政府担忧并要限制吸烟对身体和思想的不利影响为幌子，发布了一条皇家政令，试图将烟草的种植和消费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虽然这条法令很快就被废除了，但它却成为沙王于1890年向英国人塔尔博特公司授予的声名狼藉的烟草特许权的先导，该公司得到了全伊朗烟草销售、分销和出口的特权。

该特许权激发了人们对政府长期忽视、错误管理和剥削国家资源的普遍厌恶，这也直接导致了1891年至1892年间著名的烟草叛乱。驻伊朗的俄罗斯代表表明了他们对特许权的反对，同时伊朗的烟草商们也迅速地进行了对特许权的抵制。但只有在领袖乌力马（穆斯林的学者和宗教、法律的权威）通过并发布了买卖和使用烟草的宗教禁令后，人们才明确表达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抵制。接下来的联合抵制非常成功——甚至沙王后宫的妇女们也停止了抽烟——于是沙王不得不废除该特许权。

19世纪烟草变得非常流行，已经牢固地扎根于伊朗的社会结构中。作为全国的消费品，烟草已然超越了社会等级和性别差异，虽然与吸烟有关的仪式和装备可能强化了这些差异。烟草重要的经济效益以及优质品种在伊朗的种植，加强了烟草及其使用在全国的流行程度。由于伊朗人长久以来对经济自立的重视和对进口货物的抵制，烟草特许权无疑触动了伊朗人的经济神经。



一群吸烟的男人

注 释：

- [1] C. 阿尔古德《萨法维药物实践》(伦敦, 1970: 41)。
- [2] 约翰·尼安德《烟草学》(荷兰, 1622: 247, 249)。
- [3] 让·巴普蒂斯特《巴普蒂斯特土耳其、波斯和印度的六次旅行》(乌得勒克, 1772: 598, 599)。
- [4] 约翰·福莱尔《东印度和波斯新纪要, 九年之旅(1672-1681)》(伦敦, 1909-1915: 248)。
- [5] 伯托·路冯《烟草及其在亚洲的用途》(芝加哥, 1924: 27); 乔丹·古德曼《文化的信赖: 历史中的烟草》(伦敦和纽约, 1993: 88)。
- [6] 福莱尔《东亚和波斯新纪要》, 1909-1915: 99-100。
- [7] 同上, 第 210 页。

吸烟和印度草医学

P. 莱姆·马诺哈尔*

许多古代文化都有一个共识：吸入某种精心制备的烟雾有益于身体健康。印度文化也不例外。印度医学文献中有一个传说，描述火神向圣人们揭示了吸烟的疗效，多亏他的恩典，人们才发现了多种制烟法，从而成功地保护了婴儿和孩童们免受煞星的侵扰。

吸烟的用途多种多样，如治疗疾病、履行宗教义务、娱乐、幻觉体验和戒除毒瘾等。传统医学如印度草医学推荐用吸烟来治疗和预防疾病，尤其是呼吸道疾病。吸烟也是宗教仪式不可或缺的步骤。有人仅仅是为舒缓压力而吸烟，有人则把吸烟当作引导意识变换的手段，而作为烟草、大麻的替代品，草药烟可以帮助瘾君子戒除毒瘾。

一个对古梵文文献的细致研究发现：在印度文化背景下，某些吸烟不仅对健康有益，而且能促进环境的和谐。吸食大麻和烟草以及吸烟装置“忽卡”（Hookah）于不同时期传入印度。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印度对吸烟发展的贡献是原创的，而且古文献中也没有广泛地记录这一点。印度文化的多元性和折中主义使得人们很难区别“本土的”和“外来的”，尽管研究古文献对此会有一些帮助。

在印度，有三种类型的吸烟得到认可，分别是 Homa（火祭）、Dhumapana（通常缩写为 Dhuma，字面意思为“吸烟”）和 Dhupa（烟熏）。Homa 是指燃烧圣树成火，并向火供奉纯奶油和粮食，大面积四处扩散的烟雾深刻地影响到环境及当地居民，据说还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Dhuma 是指用烟斗直接吸入某种混合物燃烧产生的烟雾，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个人。Dhupa 产生的烟雾扩散面较小，只对一个人或几个人以及他们身边的区域产生影响，主要用于冬天驱寒、雨天烘干衣物，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驱逐魔鬼。

在这三种方法中，Homa 有突出的宗教色彩，Dhuma 在传统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 Dhupa 的影响则涉及宗教、医学及社会等层面。Homa 产生的背景是神秘宗教医学，Dhuma 则基于经验合理的医学原则，而 Dhupa 兼有神秘宗教及经验合理的元素。Dhumapana 最接近现代“吸烟”，因此也是本文的重点。

Homa 和 Dhupa 风靡了三千年，Dhumapana 也有两千多年的实践史。在公元几百年前印度草医学的初期，人们已将吸烟系统化。从那时到现在，除了新配方和草药的加入，吸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草医学推崇吸烟为健康生活的必要元素。除了使用设计精良的烟斗和采用正确的吸烟方法，了解自己是否适合吸烟更为重要。吸烟前应先检查身体状况，挑选吸烟的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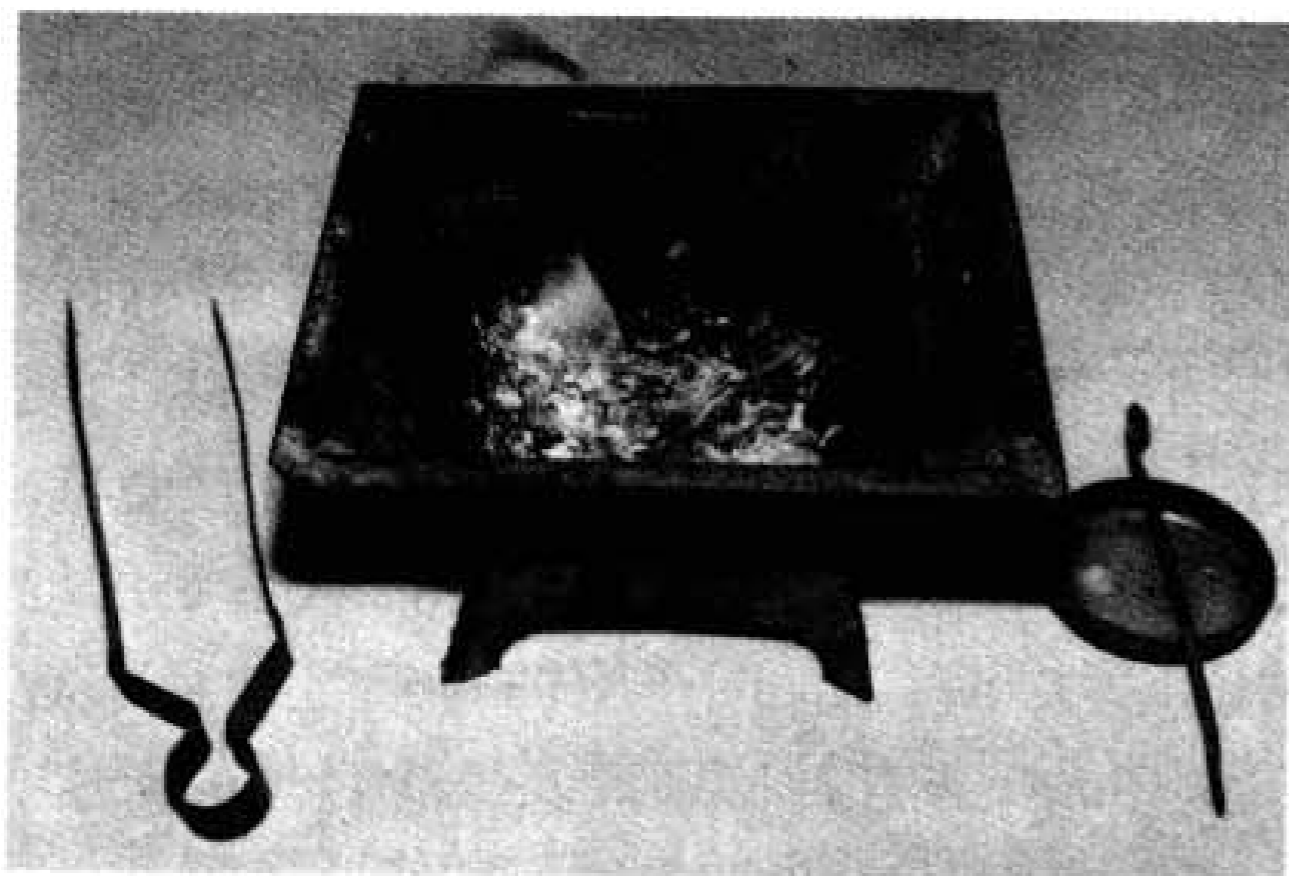
*P. 莱姆·马诺哈尔 (P. RAM MANOHAR): 印度草医医生，印度哥印拜陀 AVT 高级研究院 (AVTAR) 主任，发表了大量关于印度草医学和印度医疗史的论文与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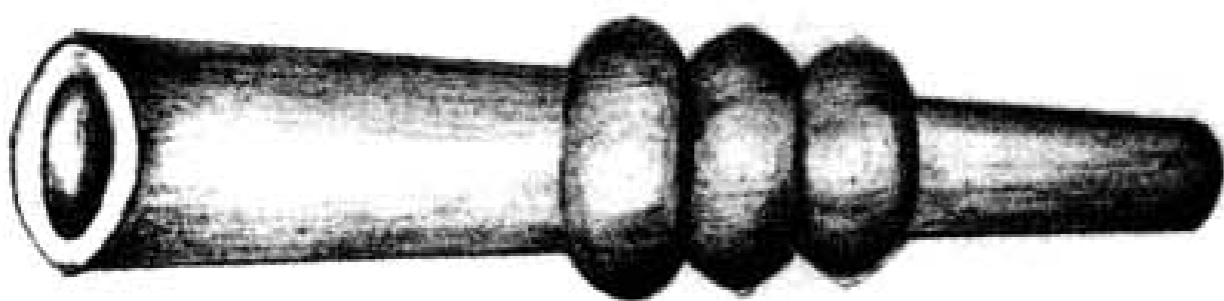
烟熏的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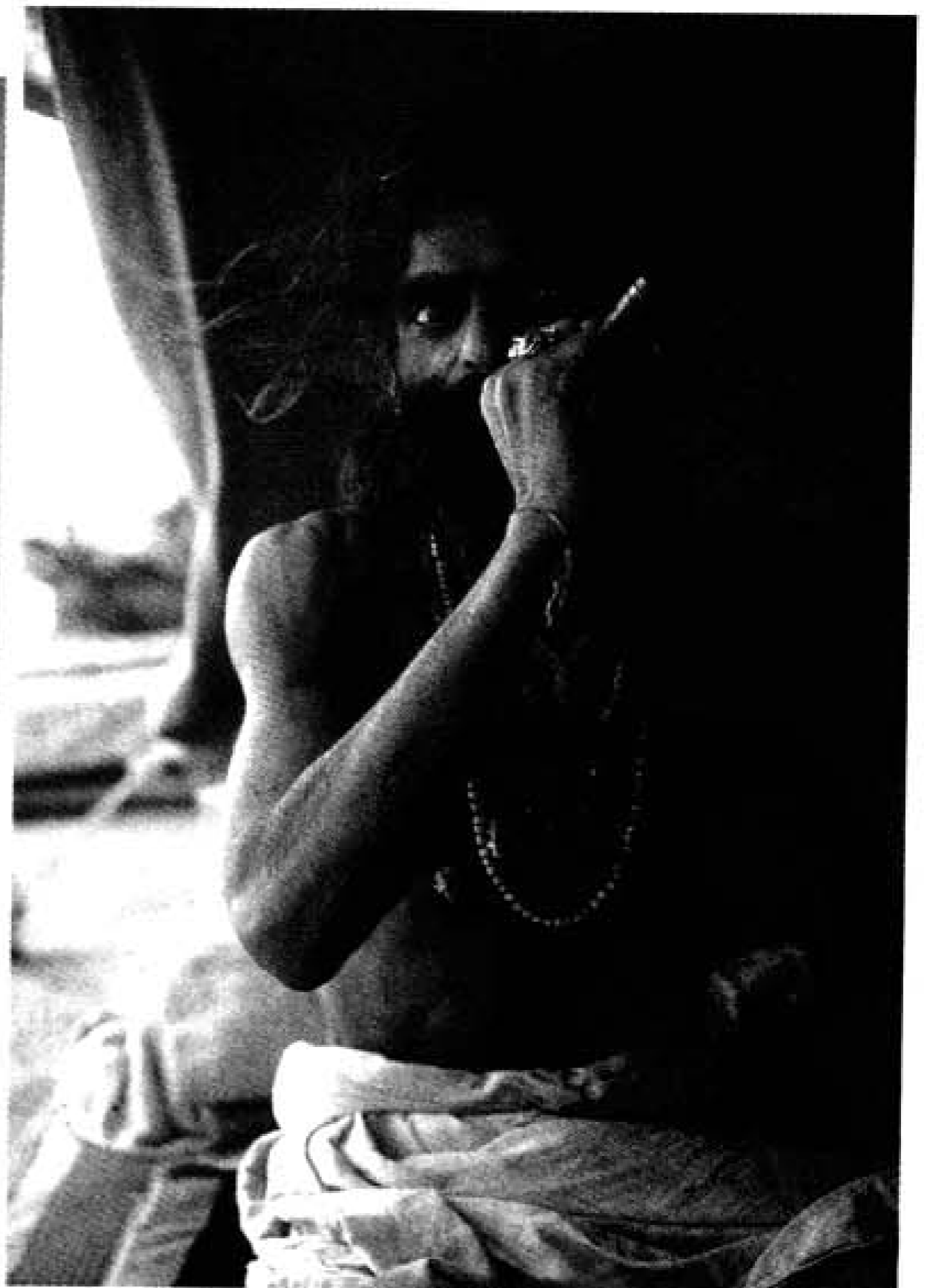
吠陀时期以后一直用作烟草的穆库尔树脂



操作“Homa”的器具



由 Hrishikesh damle 绘画的草医学烟斗，2001



印度圣人在吸“Chillum”烟斗，1992



用于催吐烟的牛筋、牛皮、牛角、牛蹄、牛肉和鱼

斗中点烟，要么是在密封的坩埚中点燃，然后通过烟斗引导。直接使用烟斗的为常规烟、油烟和清洁烟，而化痰烟、催吐烟和伤口熏疗则同时使用坩埚和烟斗。伤口熏疗被划分为 Dhuma 的一种，因为它直接作用于身体的某一部位。其他文献将之排除于以“吸入”为主要特征的 Dhuma 之外，因为伤口熏疗不是“吸”烟。在文献中，常规烟对身心的影响较为广泛，油烟滋养身体，清洁烟清理阻塞在身体通道内的废物。咳嗽要吸化痰烟，呕吐要吸催吐烟，烟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这三种方式可以系统地发挥烟疗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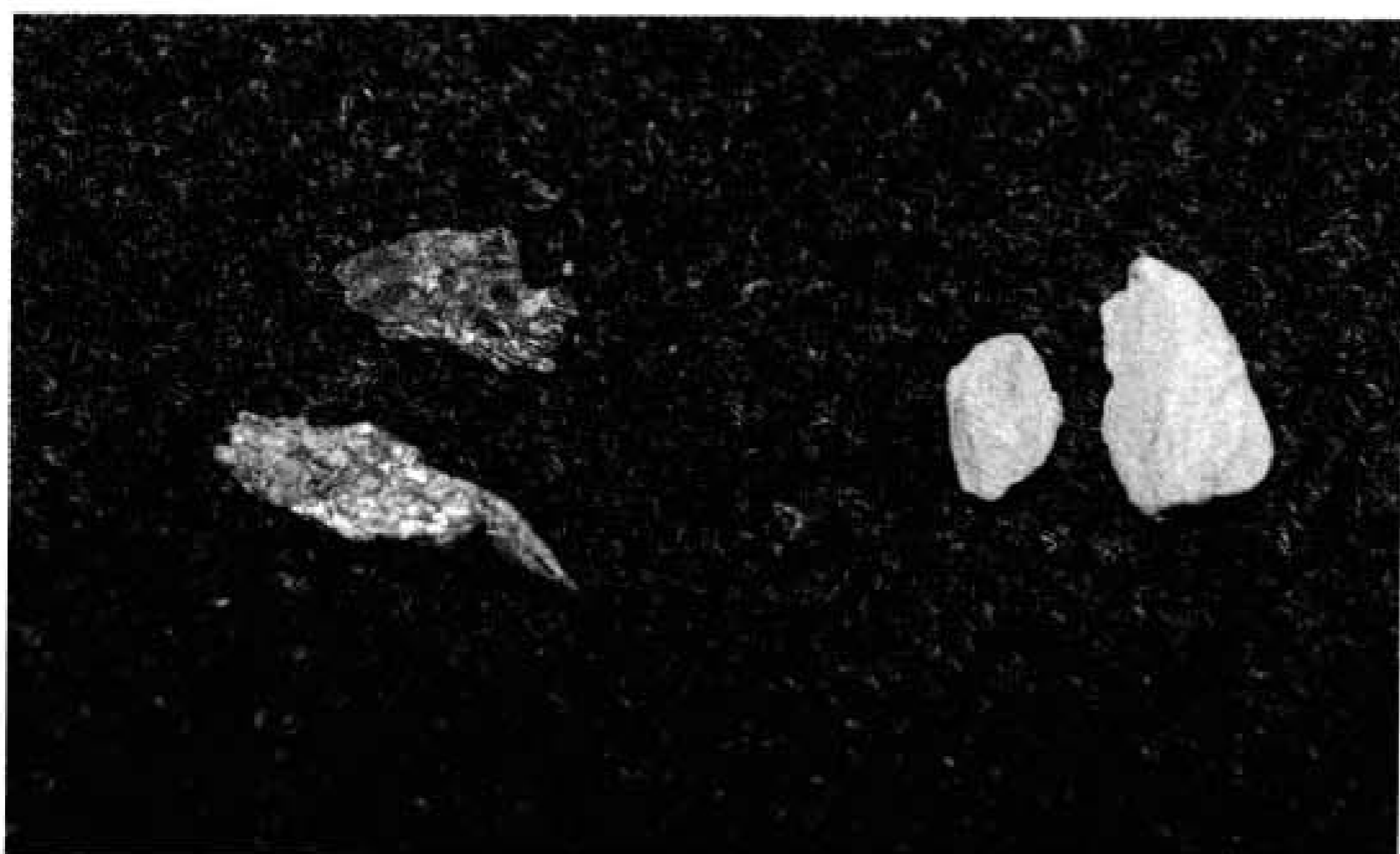
印度草医学指出，有下列状况或症状的人不能抽烟：悲痛、乏力、恐惧、愤怒、灼伤、中毒、血液失常、神志不清、头晕眼花、口干舌燥、呕吐、头部受伤、白内障、糖尿病和腹水。此外，老（八十岁以上）、少（十二岁以下）、弱、孕者不宜抽烟；服用泻

药、患失眠症以及食用蜜、纯奶酪、凝乳、鱼和酒精后不能抽烟。

印度草医学认为，吸烟的主要功效是治疗身体疾病，对精神疾病则影响甚微。草医学实践表明，适当的吸烟可以清理锁骨上方的器官通道和呼吸道，预防和治疗这些部位的疾病。吸烟的效果随烟草成分、烟斗长度以及吸烟方式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吸烟的方式要么是直接在烟

斗中点烟，要么是在密封的坩埚中点燃，然后通过烟斗引导。直接使用烟斗的为常规烟、油烟和清洁烟，而化痰烟、催吐烟和伤口熏疗则同时使用坩埚和烟斗。伤口熏疗被划分为 Dhuma 的一种，因为它直接作用于身体的某一部位。其他文献将之排除于以“吸入”为主要特征的 Dhuma 之外，因为伤口熏疗不是“吸”烟。在文献中，常规烟对身心的影响较为广泛，油烟滋养身体，清洁烟清理阻塞在身体通道内的废物。咳嗽要吸化痰烟，呕吐要吸催吐烟，烟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这三种方式可以系统地发挥烟疗的效果。

印度草医学指出，有下列状况或症状的人不能抽烟：悲痛、乏力、恐惧、愤怒、灼伤、中毒、血液失常、神志不清、头晕眼花、口干舌燥、呕吐、头部受伤、白内障、糖尿病和腹水。此外，老（八十岁以上）、少（十二岁以下）、弱、孕者不宜抽烟；服用泻药、患失眠症以及食用蜜、纯奶酪、凝乳、鱼和酒精后不能抽烟。文献中对抽烟有严格的规定。日常的抽烟应在起床、大小便、刷牙、发汗、鼻腔用药、吃饭、游泳和手术后进行。油烟适合饥饿时、同房后、大笑、久坐、打哈欠、大小便、刷牙、滴眼药水及手术后使用。清洁烟应用于鼻腔眼睛用药、呕吐、洗澡和



无机吸烟混合物常用的两种成分：雄黄（左）和雌黄（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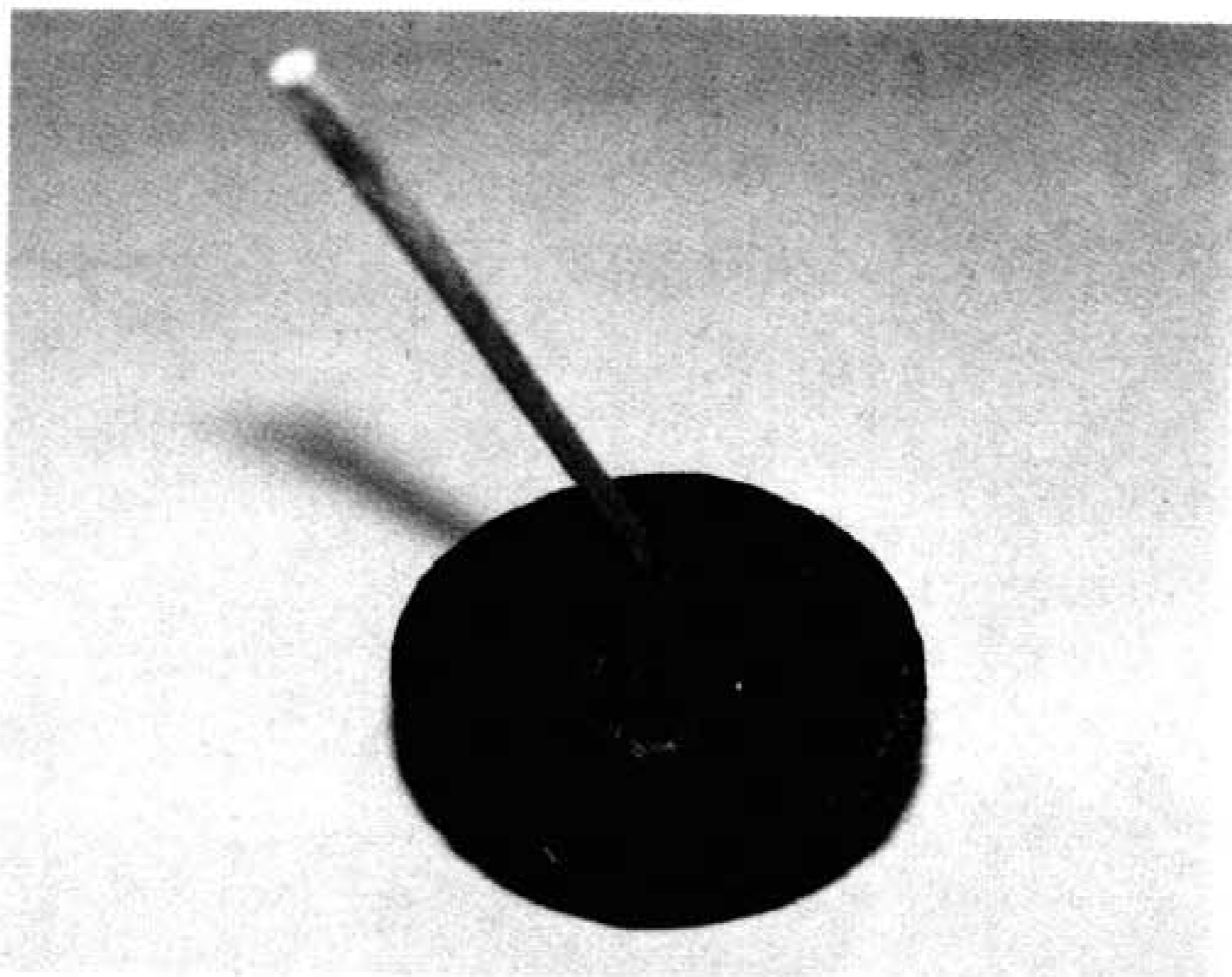
白天睡眠之后。

接着文献论述了抽烟的好处。草医学中记载，睡醒后立刻抽烟可以让积累的黏液变干，激活包括大脑在内的六感官，有利于体内气流畅通。烟有助于缓解身体上半部的疾病，驱除沉积黏液并能清新口腔、治疗齿龈病。游泳后吸烟可以快速祛除头痛、耳痛和流鼻涕的症状。饭后一支烟，能够平气醒脑，帮助消化。喷嚏后来一支烟，可以通畅气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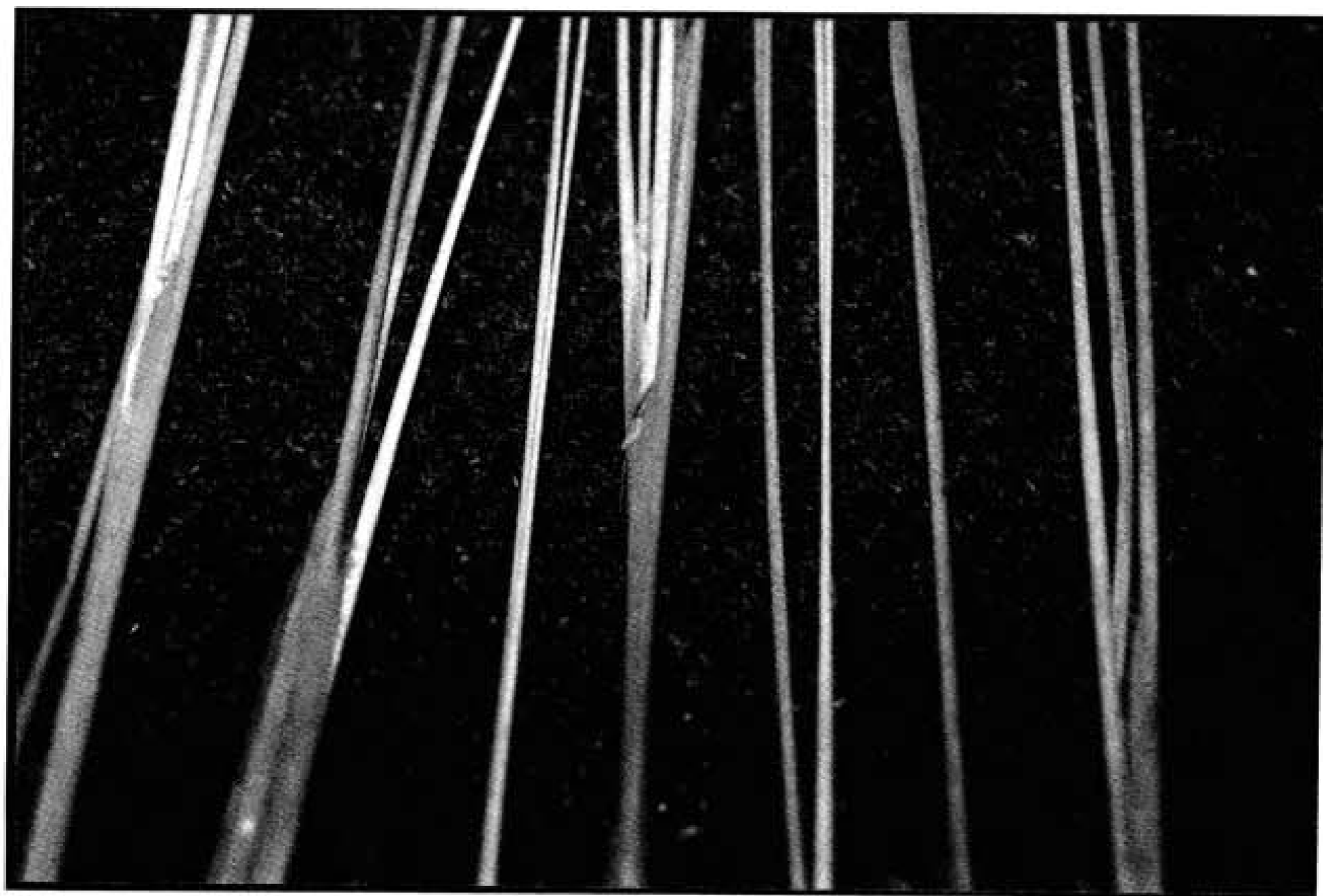
便后、同房后一支烟，可以缓解紧张、通畅气管和大脑内的气流。呕吐后一支烟，则能清洁、干燥身体通道，降低脑压。

草医学推荐使用植物、动物及无机物来配制烟草混合物。人们可以把多种植物混合成不同的烟草。云木香和颉草被归为吸烟原料的“芬芳族”，但因其热效高、气味刺鼻，可能伤害大脑，未被推荐为烟草原料。动物提取物也可用于配制烟草，如雌黄和雄黄。草医学为常规烟、油烟、清洁烟、痰烟、催吐烟和伤口熏疗等配制了不同的烟草混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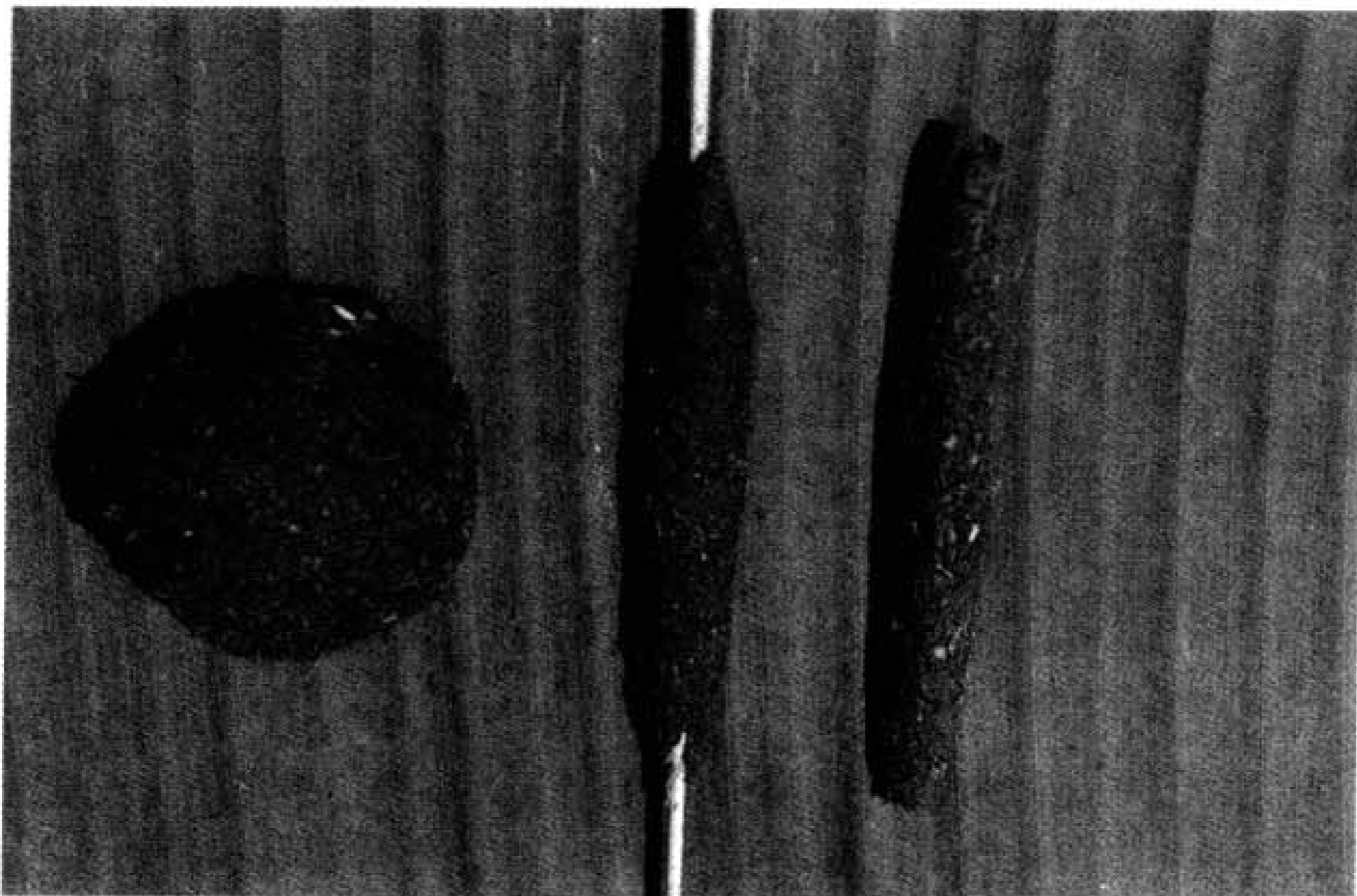
制造烟斗的材料一般是金属、竹子或篾麻叶的干柄。燃烧烟草要用金属烟斗。一般的烟斗是空心直管，中间有三个突起分别对应管内三个控制烟流速度的小室，每个孔的大小以一粒乌豇豆能通过为宜。用于常规烟、油烟、清洁烟、痰烟、催吐烟和伤口熏疗



燃烧吸烟混合物的坩埚和干蓖麻茎做的烟管



用于制备烟斗烟草的羽穗草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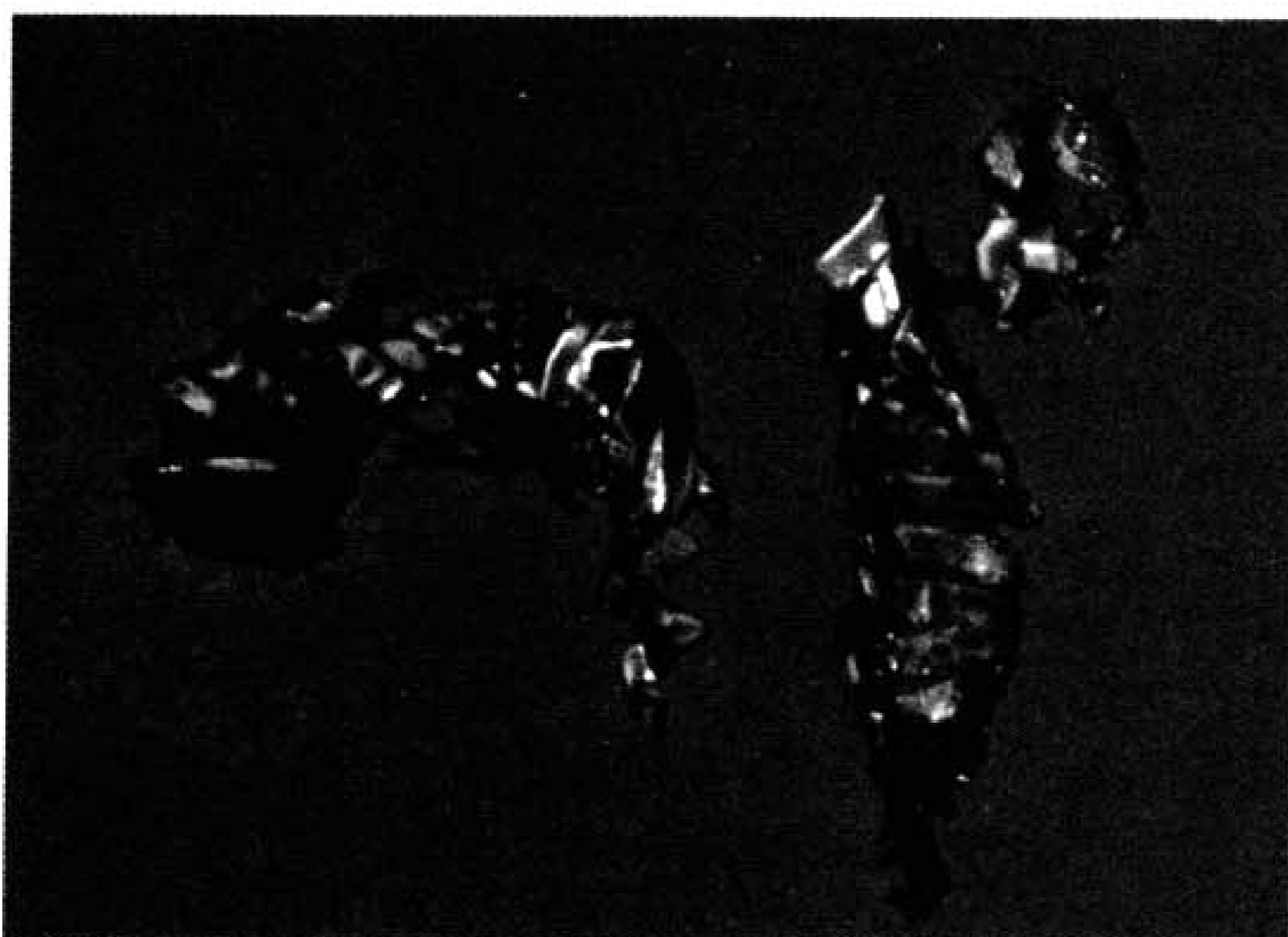


把烟草混合物碾成粉末，涂到茎秆上，待干燥后将茎秆拔出

的烟斗，长度分别为相当于四十、三十二、二十四、十和八个手指长度。烟斗的长度可以调节烟雾对口腔和鼻腔粘膜的作用力，烟斗越短，作用力大。专家们在烟斗长度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若直接在烟斗内燃烧，必须事先把烟草混合物研磨成细粉团。将纤毛甘蔗的秆或羽穗草在水中浸泡二十四个小时直到膨胀，然后在其表面分五层涂上十五克的细粉糊直到形成厚约大拇指、长约八到十二个指头长度的区域，在阴凉处晾干，抽出草秆。将晒干的草芯蘸上油点燃，然后放进烟斗中。如使用坩埚，则把粉状或块状的烟草混合物放到坩埚中燃烧，将另一个带孔的坩埚盖上，然后通过烟斗将烟雾导出孔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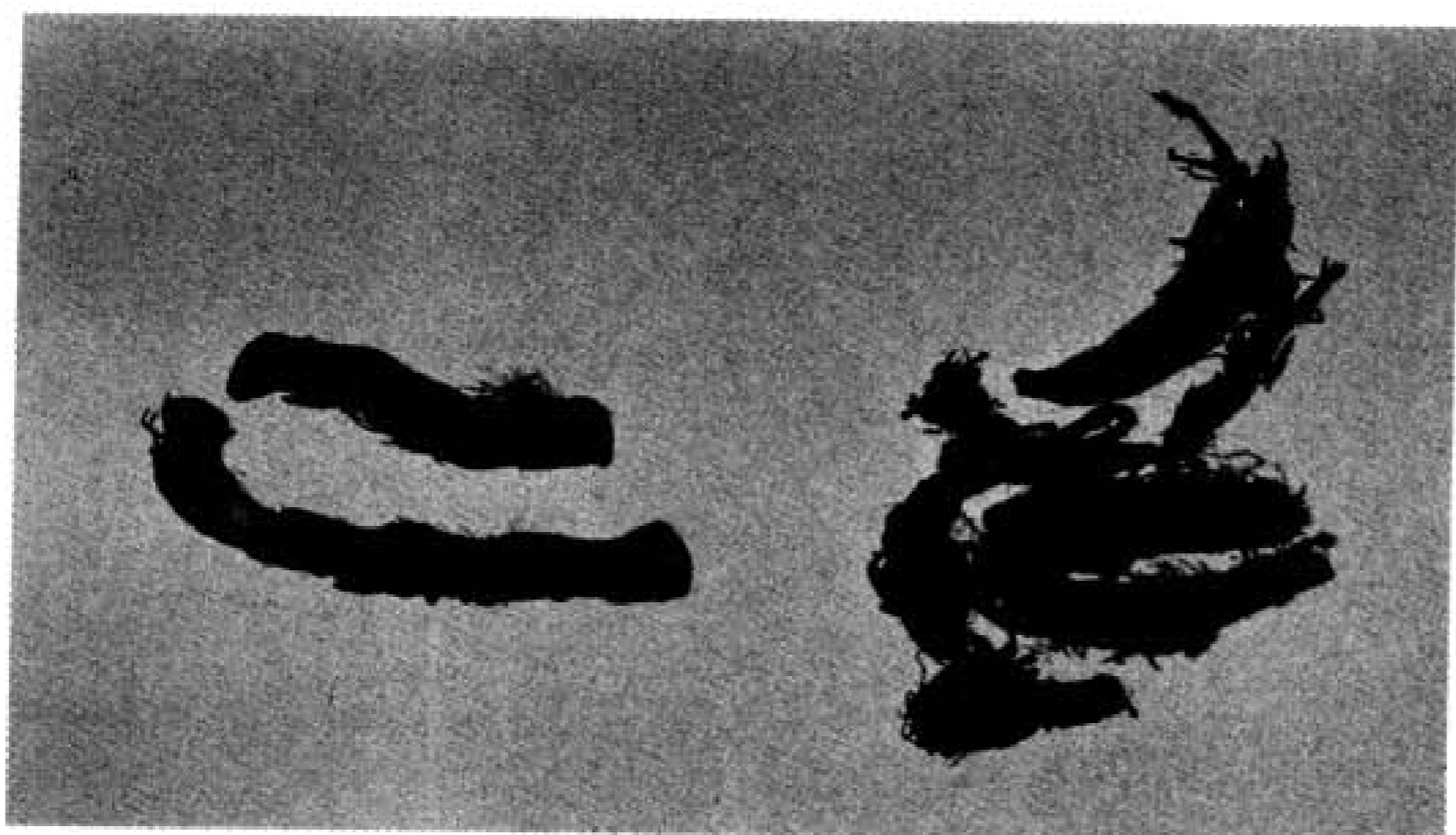
草医学建议口、鼻吸烟应伴有恰当的吐气。吸烟时，人应该抬头挺胸、心平气和。



烟熏法治疗痔疮时使用的蛇皮

一轮吸入、呼出之后，一个鼻孔吸入而另一个鼻孔闭合，然后用嘴呼出烟雾。另外一种方法是吸入和呼出同时由嘴进行。草医学文献强调，用鼻孔吸出烟雾可能会伤害眼睛。

常规吸烟一般是每日一次吸烟，通常一个鼻孔连续吸两到三次，然后用另一个鼻孔重复。也可以一天两次，只用鼻孔吸烟。油烟每天只吸一次，两只鼻孔交替吸三、四次直到



具有精神疗效的吸烟混合物中的菖蒲（左）和甘松（右）

眼睛流泪，然后用嘴吸。若是治疗咽喉以上区域的疾病，应先用鼻吸；治疗咽喉疾病，应先用嘴吸。清洁烟每天三到四次，只能用鼻吸，每次吸到头晕为止。化痰烟只能用嘴吸，这样才能将烟引导到胸腔。催吐烟应在服用催吐药（液）后用嘴吸入。

草医学文献还指出，吸烟方法正确与否会导致不同的

结果。方法适当，可以淡化并减少体内黏液，胸腔、咽喉和大脑会倍感轻松。吸烟量不足会导致声音嘶哑、咽喉痰多和头痛。过度吸烟会引起上腭、大脑和咽喉的灼热感，还会导致口干、出血、头晕、眼花、意识混乱等影响感观的症状。吸烟不当还会打破身体的热平衡，破坏血液，据说还会引起并发症如头晕、发热、头痛、感官失调、口干、呕吐、昏迷、面瘫甚至死亡。如果烟雾穿透了体内通道，灼热感、气胀、眼疾、哮喘、咳嗽、鼻炎、乏力、失声、胃酸增多便会接踵而来。要治好这些症状，可以食用医用纯奶油、葡萄、牛奶、干蔗汁、鼻药、药膏、洗眼剂，或通过洗澡来处理。这些方法可以冷却机体，净化血液，从而减轻症状。

更健康的日常吸烟法是先滴鼻剂再吸烟。鼻剂可以软化头部通道里的积淀物，改善吸烟效果。吸烟虽然可以随时进行，但一天不能超过两次。吸烟的好处包括使大脑冷静、强健头骨和感官，还可以预防一些疾病，如偏头痛、鼻炎、哮喘、流涎症、失声、咽喉炎、牙痛、斜颈、蚊虫叮咬、搔痒、嗜睡、少年秃顶、白发、脱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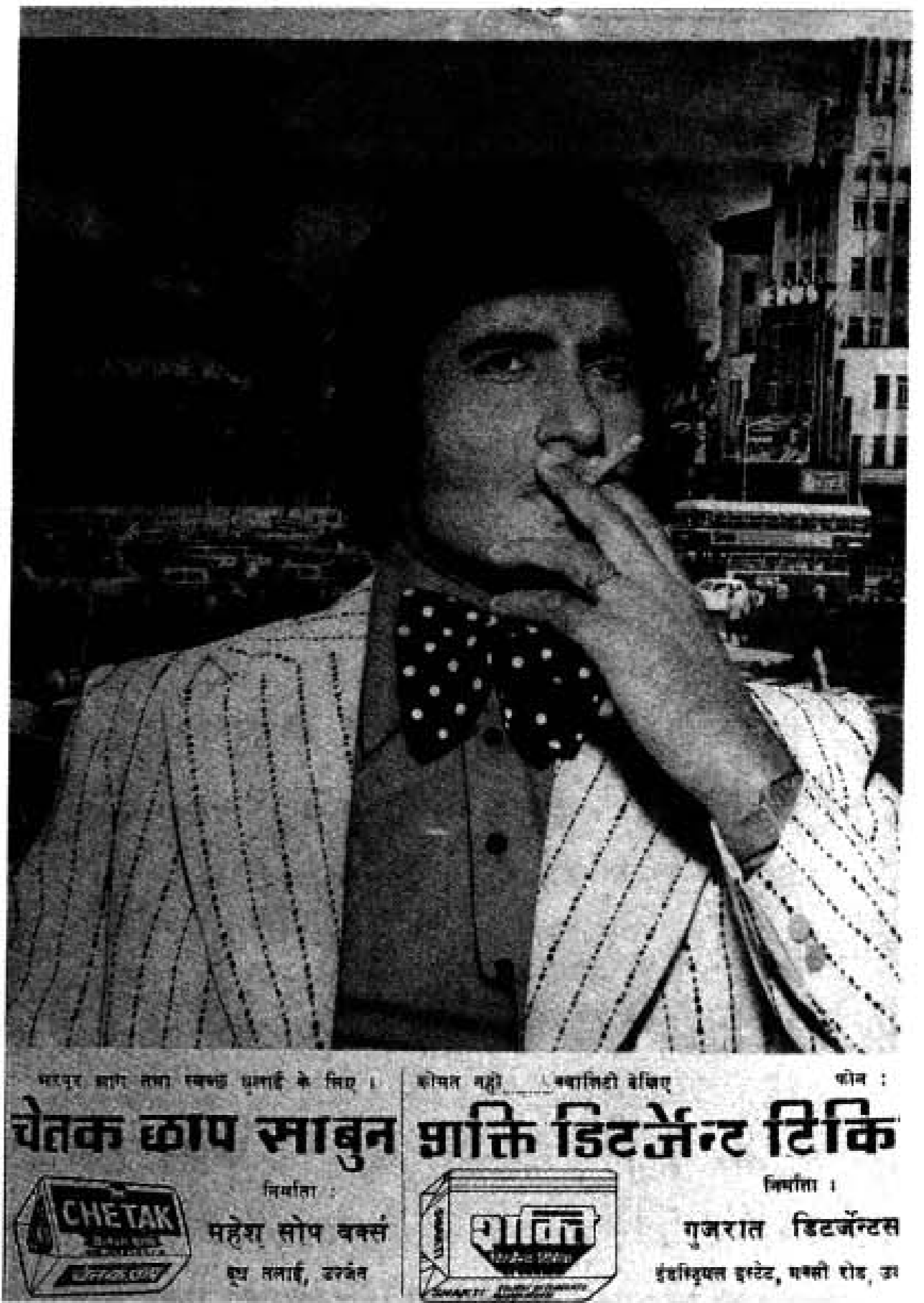
就吸烟作为治病手段而言，草医学的古典文献推荐 Homa 为针对疟疾引起的发热、间歇性发热、思维混乱和癫痫症的治疗手段，而 Dhupa 可以控制疟疾引起的发热、痔疮、中邪、思维混乱、癫痫症和外伤。Dhuma 则被推荐用于治疗发热、咳嗽、哮喘、精神病和癫痫症。治疗哮喘的烟草混合物的成分通常为姜黄叶、蓖麻根、葡萄干、雌黄、雄黄、雪松木和匙叶甘松叶。文献指出，要想通过吸烟治疗哮喘，必须在呕吐或清洁后吸烟。择机吸烟也非常重要，因为吸烟能诱发哮喘症状。人们还通过熏蛇蜕下的皮来治疗痔疮。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草医学的烟草中不添加任何精神药物，也从未推荐用吸烟来缓解压力。此外，情绪不佳或疲劳过度之人不适宜吸烟。各种烟草成分中，菖蒲和匙叶甘松有轻微的精神药物的作用。民间用吸烟控制哮喘时，用曼陀罗作为迷幻剂，而这些并没有在经典的草医学文献中被强调。

印度人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就认识了大麻，尽管大麻的医学用途很多，但草医学晚期的文献并未将大麻作为烟草原料。17 世纪的医学大典 Yogaratanakara 中第一次提到了烟草。同大麻不同的是，烟草在梵文中指一种名为“塔玛库”的烟树，上面长着灰色大叶子，开着棕红色的花朵，结满一串串带籽的果实，内用烟草叶可平痰祛风。草医学中

提到了烟草的许多好处，如可以治疗咳嗽和气胀，可舒缓大肠、减轻牙痛、杀虫、止痒、暖体；当然也会引起头晕、呕吐，损坏视力、增加月经量。作为一种催吐剂，烟草可以控制蝎毒以及用作泻剂控制由胃胀和痰多引起的疾病。据说，烟草对心脏有害，还会引起性功能衰退。同样著于 17 世纪的 Raja Nighantu 并没有把烟草同吸烟联系在一起，只是描述了它的药性性质。

Homa 和 Dhupa 仍然流行于今日的印度，但并没有严格地用于医学用途。但是，吸烟草已经取代了 Dhumapana。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迹象是，草医学烟疗正以草药烟的形式崛起，但草药烟和古典原始的方法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0 年一个流行香烟广告中吸着香烟的西化印度人

日本的烟草文化

巴尔纳伯·藤原铃木*

吸烟是如何传到日本的

最早到达日本的欧洲人是三个葡萄牙人，他们于 1543 年乘坐失事的中国帆船来到九州种子岛。一位名叫圣弗朗西斯·扎唯尔的耶稣教会牧师也于 1549 年来到日本并逗留了两年。1550 年，葡萄牙人与日本人建立起常规贸易，从中国带来了天然丝绸用以交换日本的银器。直到 1609 年荷兰贸易驻点在日本的平户建立以前，葡萄牙人一直是唯一的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人。紧接着，在 1613 年到 1623 年期间，英国的贸易驻点也在平户建立并运作起来。

1661 年的《菜远文集》最早提及日本吸食烟草的事情，这里的烟草指的是雪茄。1692 年《吉村夏之文集》中也提到雪茄，它是一本关于日本美食的百科全书。从这些原始资料来看，可能早在自己培植烟草和吸食烟斗以前，日本入就曾以雪茄的形式来吸食烟草，这种习惯是由葡萄牙人引进日本的。不幸的是，直接描述来到日本的南蛮子（日本人给食肉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取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手卷烟的原始资料都没有留存下来。只有一封日期标注为 1620 年 10 月 11 日（格列高利历 10 月 21 日），出自英国贸易驻点的理查德·考克斯手笔的信件保存了下来，信件中记载在两名葡萄牙囚犯身上发现了一些貌似烟草的卷烟。^[1] 这表明在日本的一些葡萄牙人当时有吸食雪茄或者香烟的习惯。

通过和中国的贸易以及交流，日本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化的元素。然而当欧洲文化即将被引进日本的时候，却被针对基督教的禁令和国家的封闭所阻碍。

为了避免基督教对日本文化的破坏，为了防止紧随传教士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入侵，自 1587 年起，日本为禁止基督教做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最终于 1639 年全面禁止了基督教的传播。到 1635 年，禁止葡萄牙和西班牙船只驶入日本和禁止日本商船出国的法令得以全面生效，日本的流放者也被禁止返回祖国。

只有中国和荷兰商人才能同日本进行贸易，但必须在政府严格的控制下进行。唯一的例外是从 1641 年到 19 世纪中期在长崎的人工岛从事贸易业务的荷兰“牌照商人”。

*巴尔纳伯·藤原铃木（BARNABAS TATSUYA SUZUKI）：国际烟斗学会会员，国际烟斗俱乐部会员，日本烟斗俱乐部主席和日本烟草史协会成员。撰写了大量关于烟草和烟斗吸烟历史方面的专题论文，包括《关于吸烟被引进到日本的历史研究》（1999）。

这个被称为长崎出岛的人工小岛是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唯一的联结点。从1549年到1642年这段所谓的日本基督教世纪^[2]，被引进日本的那些事物对茶道的仪态举止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社会上的吸烟习俗，这是在继喝茶和烟斗之后发展起来的。和茶道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烟斗、烟盘、烟袋以及其他设计独特、极其精致的小配件，都是从相当简单的欧洲吸烟工具进化而来的。除了几个写于17世纪后期或18世纪前期的传奇故事以外，那个时期没有资料表明烟斗是如何被引进日本的。^[3]

近来对三份被忽略了很久的文件的重新认识对这一研究有所启发。第一份是一本地税簿，这本关于某村庄1576年的土地税簿表明，一个小规模的烟草交易商曾在这里从事贸易业务。银锭从一个滨海岛屿上的矿井被带到这个小村庄，接着又被运到平户（1565年之前）和长崎（1570年之后），在那里葡萄牙商人接受银锭来交换中国的天然丝绸。1601年以前，日本商人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与葡萄牙人直接交易，所以他们很可能也运了少量昂贵的烟叶到奈良，卖给当地富有的矿工。第二份文件是由京都鹿寺神殿的牧师保存的日记，记载了烟草被作为礼物在一些重要场合被馈赠给他人，这最早可追溯到1593年。

这两份文件完成于吸烟在葡萄牙普遍盛行之前，因此人们对其可靠性仍存有怀疑。然而，以雪茄或烟卷的方式吸烟是行驶在巴西和葡萄牙之间的葡萄牙船只上的海员和商人们的惯例。“Fumo”（用于吸烟的香烟和烟草）一词出现在1548年一艘从巴西驶往葡萄牙的船只的货物清单上，这意味着海员已经开始习惯抽烟了。早在1534年，巴西的殖民者就已经开始种植烟草了。^[4]

第三份文件是由一位佛教僧人太初于1603年汇编而成的《琉球范义》^[5]，它是琉球王国（现今日本冲绳）一个朝臣孩子的教科书。太初以交换信笺的方式描述了他在京都的所见。在一个题为“关于烟草”的章节中，他指出烟草来自南蛮国家，是用来取悦客人的，还指出烟斗需要经常清洁。

除了这些早先未经考察的文献之外，还有一些散布于文学作品中的资料提及吸烟。一位医生写于1607年的日记中提到广为盛行的吸烟习惯和细碎烟草的使用。1612年，马修斯写了一封给罗马宗教团体领袖的阿奎维瓦的信，抱怨说尽管弗朗西斯于1607年和1608年颁布了禁令，但日本的学徒仍在使用器具吸烟。^[6]

另一个观点认为西班牙人经由菲律宾把吸烟引进了日本。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一篇关于一位圣方济各会修士的报告，这位修士于1601年把烟草种子和由烟草制成的药品带到了日本。这样的解释是不合理的，因为西班牙人并没有用烟斗吸烟，尽管事实上确实曾在墨西哥发现过烟斗。根据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墨西哥和南美考古学领域的馆长助理奥尔登·马森所说，在诺曼征服时期从墨西哥挖掘出来的陶瓷短管烟斗更具有托尔特克人的特征，而不是阿兹特克人的特征。^[7]西班牙人更多是抽香烟和烟管的，他们更偏爱用宽叶的红色烟草制成的雪茄，而不是塞满黄色烟草的烟斗——黄色烟草是一种较烈性的窄叶烟草。菲律宾人现今仍在生产16或17世纪由西班牙人引进的雪茄品种。

从菲律宾到日本的西班牙访客比从印度次大陆的热内亚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少得多。而且，来自马尼拉的首位西班牙圣方济各会修士于1584年乘坐一艘葡萄牙船只抵达日

本，因此，如果上述所提土地税簿的内容真实而精确的话，那么葡萄牙人就是首次把烟草引进日本的人，而且时间要早于1584年。

烟斗烟的传播

烟斗烟传遍了整个世界，从北美穿过英国、荷兰、日本、韩国、中国、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再到居住在美国西北岸的土著印第安人。土著印第安人从因努伊特人那里学会了用烟斗吸烟。烟斗吸烟的习惯是从日本传播到亚洲其他地区的。

1630年以前荷兰制造的黏土烟斗仅仅满足了当地的需求，因此，1642年之前驻扎在日本的荷兰商人航行前无法得到充足的黏土烟斗供应，黏土烟斗并没有被运到日本。1642年之前他们可能就吸烟斗烟了。当荷兰人于1609年到达日本时，烟斗烟已经在日本非常流行了，荷兰商人甚至为他们驻扎在亚洲其他殖民地或贸易驻点的同僚们提供银制烟斗和磨得十分精细的烟草。暹罗（现称泰国）的荷兰贸易驻点的日志里记载了烟草于1634年和1635年从日本引进。^[8]平户的荷兰贸易驻点日志中有些内容也记录了烟斗和烟草是在1639年和1641年出口到台湾的。^[9]荷兰商人就此广泛介入到烟斗向东南亚的传播中。

从16世纪后期开始直到大约1635年国家封闭时，日本牌照商船登陆亚洲各港口，商人和海员们把吸烟斗烟的习惯带到东南亚国家。那里的日本居民（当时有七个海外日本城镇）也吸食由日本商船引进的烟斗。即使1635年这些日本流亡者被禁止回国，他们仍从中国或荷兰的船商那儿寻找烟斗和切得精细的烟草。18世纪仍持续的烟草和烟斗供应表明，居住在国外的日本人更加偏爱日本的精细烟草，而并不怎么喜欢当地的品种。

日本烟斗烟的影响在中国、韩国、东南亚许多本土烟斗形态和风格中可见一斑，其中的一些烟斗还可能被荷兰或英国的黏土烟斗等影响。据说，烟斗在1622年之前（或1613年以前）就被引进中国，至少通过四个外来的渠道：从日本经由韩国，从菲律宾，从台湾以及从越南。^[10]从西班牙和菲律宾引进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地没有人吸烟斗烟，经由琉球到中国东南部是最有可能的传播渠道。

日本的烟草文化

人们相信烟斗烟首先是被日本的上等阶层引进的，比如日本陆军军官（武士）、佛教僧侣以及一些富有的商人。^[11]对于这些阶层来说，茶道、熏香以及文学作品和值得鉴赏的诗歌都是日本文化和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贵族而言，使用熏香和写诗更加重要。

茶叶的药用于公元739年开始记载于国库保存的备忘录中，但不甚清楚的是，这里记载的药草是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茶”。公元805年，当佛教僧人最澄和一个日本外交特使一起返回日本时，他从中国带回了茶种。日本晚期编年史（792-833）中记载，公元815年嵯峨天皇享用了第一杯茶。当禅宗僧人荣西于公元1191年从中国返回日本

时，他把茶粉也引进了日本。接着，喝茶粉成为佛教禅宗僧人的普遍习惯，并在 14 世纪初盛行于武士阶层，最终遍及整个贵族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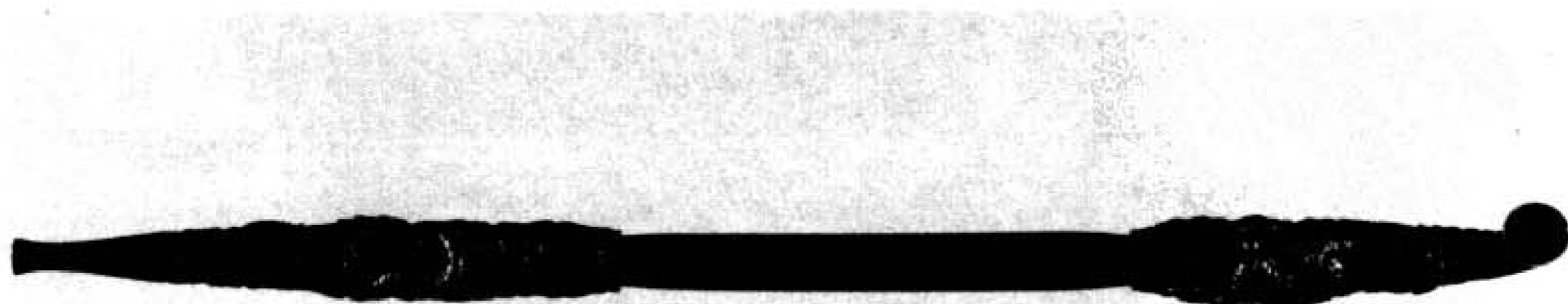
千利休（1522-1591）以最简单也是最简陋的方式建立了茶道。他拒绝使用奢侈的用具，反而使用在当地就能获得的茶碗和茶壶。人们相信千利休从罗马天主教弥撒中承袭了一些仪态举止，这些可能是他在京都或是坂井的耶稣会或圣方济各教堂观察来的。^[12] 尽管千利休不是一个彻底的基督教徒，但他仍有许多基督教追随者。在他去世后，茶道更受人们的欢迎，特别是在暴发户中。古田织部（1544-1615）——千利休的热忱信徒之一——开始进行茶道的改革，他更加注重那些从欧洲引进的东西，尤其是吸食烟草。他使用一个刻着十字符号的茶碗，这个十字可能源自基督教的标志。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托人按照他独有的设计制造瓷器烟斗。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把吸烟结合到茶道中去，但是由他引进的假说又与了茶道的时间相一致。

吸食烟草在日本变得流行起来，这时候的烟斗由三个部分组成：烟斗、金属咬嘴和用来联结的竹柄。通常来说，金属部分刻有装饰物或精美的嵌入式雕刻物，这些雕刻物与来自荷兰和英国的简单而又脆弱的黏土烟斗有着明显的差异。吸烟者的用具还包括烟盘、烟袋和烟盒，这些也都经过精心装饰展示了日本特有的吸烟文化。

烟盘是在茶道开始时用来备置烟草的盘子，它由熏香中使用的熏香托盘改进而来。熏香托盘是一个带有燃烧头的盘子，还附有一双用来挑拨余烬的筷子。熏香中的其他部件也像托盘一样转化为吸食烟草所用：熏香燃烧头变成装烟草余烬的壶；熏香的煤渣壶变成烟灰壶；熏香壶或浅盘进化成一个烟草盒或烟草壶。烟盘上摆放着两个烟斗用来代替筷子。竹制的烟灰壶通常被叫做“togeppoh”，这是以一座小山的名字来命名的。18 世纪中叶从一座寺庙中能看到这座小山，而这座寺庙是最早使用竹制烟灰壶的。早在古田织部死后的宽永时期，烟盘就出现在绘画里了。这导致了一个设想，那就是烟盘最先是为茶道所专用，然后才在烟草行业中流行起来。以后几年里，更多实用的烟盘被创造出来，附有一个手柄、一个烟斗存放架以及用来存放烟草和吸烟工具的小抽屉。

于 1815 年编写的《土曜日》一书中，有一个段落描述了正确的侍奉客人吸烟的仪式，这是从写于 1716 至 1736 年间的一本书中引用的：

早先没有人携带烟草，人们拜访他人时都吸食主人所提供的烟草，而且他们吸



一个 19 世纪的烟斗样式

烟的方式也与现在不同。直到主人进了吸烟房并拿出烟草之后，人们才开始吸烟。客人首先会拒绝并且提出应该由主人先吸烟，然后要重复客气两三次，和奉茶的规矩一样。接着，在提供烟草给客人之前，主人会拿出一小张纸，拿起烟斗，移开烟斗的保护罩（用来防止咬嘴触地），用纸擦净烟斗。于是客人便欣然接受，在吸食了一两斗烟后擦净烟斗，并把它放置在身前。在离开房间之前，他会再一次用纸张擦净烟斗，并把它放回烟盘。这时，主人会客气地对客人说：“让我来吧。”^[13]

能写下如此完整的规矩的确少见。上文所描述的规矩清楚地表明吸烟受到茶道的影响。

起初，烟草是以整片叶状的形式出售的，而不是磨成细碎状。按照顾客的要求，店家可以切碎烟草，或由吸烟者把烟叶拿回家里自己切碎。后来，在市场里就可以买到精细的碎状烟草，它们通常是装在一小片折好的纸张里以方便携带，在家里就存放在盒子里。平户的英国贸易驻点总经理理查斯·考克斯于1617年1月20日（格列高利历1618年1月30日）写的日记中提到，烟草盒是一件很受欢迎的礼物。^[14]

随身携带的折好的小片纸张叫做“tatoh”、“tatoh-gami”或是“tatoh-shi”。用这些纸张来写诗擤鼻子已经成为18世纪贵族们的惯例。这些纸张还可以用在茶道中，在俸茶前用来摆放甜点或在饮茶后用来擦净盖子。

武士阶层的人们通过坠子（用以悬挂烟袋的装饰纽扣）和佩剑把一个森嶋戴在腰带上。森嶋原来是用来携带印章和印墨的。在江户时期（1600-1867），它更常用来携带药物。当人们开始养成携带烟斗和烟草的习惯时，森嶋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更为普遍的



一个早期设计风格的烟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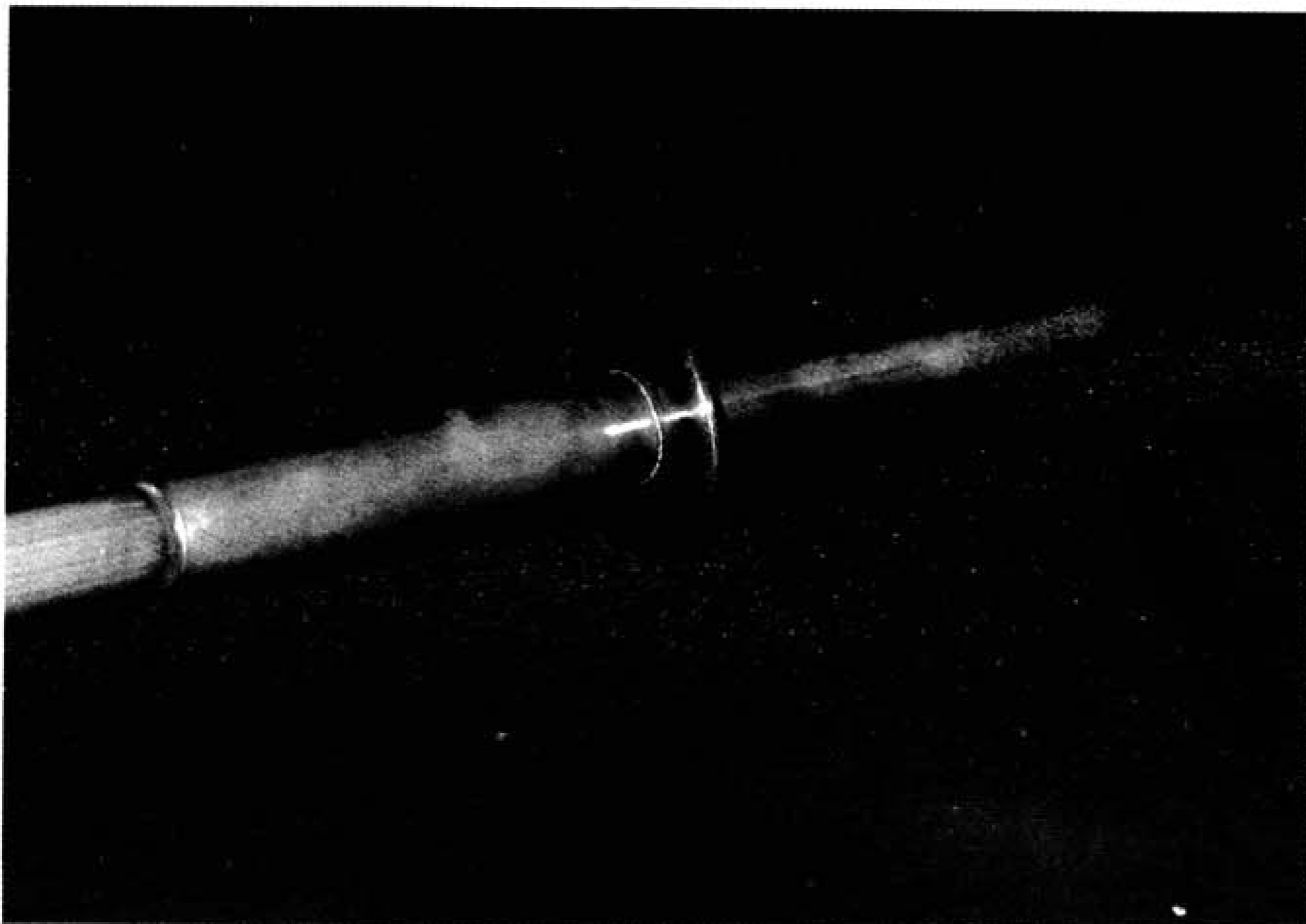
是携带一个袋子，里面盛放细碎烟草和由皮革或其他各种各样材质做成的烟盒，然后悬挂在腰带上。

在烟袋和森嶋变得流行之前，由油纸、绉纸或布料做成的钱袋是典型的烟草容器。然而，贵族阶层认为在腰带上佩戴一个烟袋是很不雅观的，改而使用传统的折纸钱袋。烟袋的概念可能来自石袋，后来烟袋又取代纸袋用来盛放烟草。有趣的是，在一幅描绘早期吸烟习俗的著名日本画里，一个陪伴着主人的仆人肩上扛着一个特别长的烟斗，烟斗柄上系着一个装着烟草的纸袋，纸袋后面出现了用皮革或布料做的钱袋和木制的森嶋。

当所有内乱被镇压下来后，德川家康将军于1600年统一国家。经济的稳定造就了一个新的富商阶层。当武士阶层仍被允许佩剑时，人民（包括商人）也在寻求显示自己财富的标志。许多人选择了吸



梅西的一幅插图，1815



一个烟斗柄上的保护罩



烟袋样式

来是在 1882 年姆莱兄弟在京都建立起香烟工厂，1890 年嶋田一夫在东京生产香烟。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烟斗才完全被香烟所取代。从分散的、早期的原始资料来看，很可能是葡萄牙人把烟草引进日本，且在早期以雪茄的形式吸食。吸烟斗则可能是由荷兰人引进的，并有一段悠久的历史，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香烟赶超。

烟工具，例如烟斗、烟盘、烟袋和烟盒。所有类型的工艺都被用来创造极其奢华的吸烟工具，通常用的是从荷兰商人那里进口的材料。1867 年，王朝复辟废除了武士阶层，原本制作装饰佩剑的工匠运用自己的手艺装饰烟斗并制造烟袋的扣环。烟斗和烟盘仍以小规模进行生产，主要为茶道所用。大部分现代的烟盘都是托盘的样式，手柄可有可无，不再是盒子的模样。今天，制造收藏专用的烟斗是一些能工巧匠的技艺，产量极为稀少，而为纪念品追逐者制造的便宜模型则大多是机器生产的。

据说 1869 年土田滋最早在东京制造香烟，然而并没有获得成功。吸食香烟变得流行起



钱袋样式

注 释:

- [1] 《理查德·考克斯日记(1615-1622)》，见《关于日本的外语历史文件》第3卷第2部分(东京，1980: 311)。
- [2] C.R. 伯克斯《日本基督教世纪(1549-1650年)》(洛杉矶，1974)。
- [3] 相关阅读材料请参考：拉赞·林梓《拉赞文集》(1661)；木瞳《日本食物百科全书》(1692)；进向井《烟草研究》(1708)；柏原《日本中草药》(1708)；泽冷一寺《中日插图百科全书》(1715)；誉赞大道寺《零星集》(江户，1728)；B.T. 铃木《吸烟引入日本的历史研究》(京都，1999: 13-25)。
- [4] 莎拉·奥古斯塔·迪克松《灵丹妙药或珍贵的祸根：16世纪关于烟草的文献》(纽约，1954: 78)；M. 弗莱尔斯《巴西历史纪要》(1940: 69, 76)。
- [5] 铃木《吸烟引入日本的历史研究》，1999: 68-82；铃木《琉球书信研究》，载《烟草史研究》第74号(东京，2000: 18-21)。
- [6] 铃木《吸烟引入日本的历史研究》，1999: 222-229。
- [7] J. 奥尔登·马森《墨西哥及南美的烟草使用》(芝加哥，1924: 8-9)；铃木《吸烟引入日本的历史研究》，1999: 212-213；铃木《众多疑问存在于烟草和吸烟是从马尼拉引入还是由西班牙人带回的观点中》，载《药草史研究》第73号(东京，2000: 17-26)。
- [8] 精一《新版贸易研究》(东京，1985: 293-294, 313)。
- [9] 《万商行日志，1638、1639、1640、1641》，荷兰、海牙的普通政府档案；《平户史实》(平户，1998、2000)。
- [10] 铃木《众多疑问存在于烟草和吸烟是从马尼拉引入还是由西班牙人带回的观点中》，2000: 17-26。
- [11] 日本在开始烟草种植之前，烟草的价格是相当高的。在1599年，一片烟草可以卖到3姆米(大约11克)银币。佛教僧侣和京都上层社会的人们使用的烟草或烟管在一些早期文件中就有描述，比如《寺院日记》(京都，1593)和《琉球书信》(琉球，1603)。可参阅太初《琉球书信》(1603)；横山茂《琉球神道史》(东京，1970: 144)；善之亮迁编《寺院日记》(东京，1961)；川石《对烟草的钟爱》(东京，1967: 19)；铃木《吸烟引入日本的历史研究》(1999: 118-119)。
- [12] 请参考T. 西村《基督教徒与茶道》(东京，1948)；彼得·米尔沃特《茶叶与大众》(京都，1995)；增渊《茶道及其磨难》(东京，1996)。
- [13] 寺泽优客《醒草本》(江户，1815)。
- [14] 《理查德·考克斯日记(1615-1622)》，见《关于日本的外语历史文件》第2卷第2部分(东京，1979: 238)。

明清时期中国的吸烟现象

蒂莫西·布鲁克*

人们怎样才能知道还有超越世间所有美味的如此值得品尝的东西存在？

——曹西宝

1573年，当一个九岁的小男孩成为明朝的万历皇帝时，除了少数一些在华南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的人外，中国还没有人品尝过烟草的滋味。然而不到一个世纪以后，当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在1662年成为清朝的康熙皇帝时，中国人已沦为烟民，中国的吸烟文化已经形成了。当时，烟草被视作无与伦比的享受，而现在，烟草只是人们每天消遣和享用的平常之物罢了。

万历皇帝从来没有尝试过吸食鸦片，但据我们所知，康熙在他七岁生日之前可能已经吸过烟斗。1676年康熙在皇宫中发表了禁烟令，这是17世纪中国皇帝发布的多项禁令之一，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康熙提到在他奶娘家中，他对吸食鸦片非常熟悉。在他孩提时，围绕在他周围的妇女们都吸食鸦片，男人们也如此。皇叔多尔袞曾经是他父亲顺治皇帝的摄政王，他是如此爱好鸦片，以至于韩国大使来到中国都特意为他带来他们最好的鸦片。^[1]1684年，由于康熙重新改写了禁令，要求皇宫里的人不该肆无忌惮地吸烟。

为了了解鸦片在中国的起源，我们可以考察17世纪的评论家们令人费解的想法。看看这位学者方以智（1611-1671）是如何根据其所推定的产地描述所谓的“南方药草”的到来的：

在万历皇帝当政时，人们把烟草带到了漳州和泉州。马家人对它进行加工，称其为单肉果（一种肉质果



一张19世纪末的明信片，画面中是一个正在吸烟的老式中国人

*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多伦多大学中国史教授，编撰了十二本关于亚洲的书，为《中国剑桥史》撰稿。2000年与鲍伯·塔达什·瓦卡巴亚什合编了《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一书。



一名满洲贵族，其皮带上系着烟草袋和烟斗。
1885，北京

实)。它逐渐在中国蔓延开来，以至于现在每个人都带着一个长长的烟管，用火点燃后吸下烟，一些人已经成为瘾君子。^[2]

烟草通过在马尼拉的中国商人和西班牙人进行贸易的船只运达中国，因此方以智正确地确定了东南沿海福建省的两个主要港口——漳州和泉州作为烟草进入中国的地点。尽管其他评论家提到菲律宾，但方以智却没有提到这个地点。17世纪中叶一位不知名的散文家姚旅说，漳州附近的农民积极地从事烟草栽培，结果“比起吕宋，现在有更多烟草，所以要把烟草运往菲律宾销售”。一两位评论家猜测说，这种植物不是菲律宾原产的，而是从世界远方的大西沿岸带来的。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3]

东南沿海只有一个通道，东北边境也有一个通道。那些聚集在边境并最终在1644年入侵的满族人，早在北方人之前就成为烟民。

关于满族人从韩国人那里学会吸烟这一点，我们有一些了解，但是，现在知道满族人是几经周折才得到烟草的。由于韩国人从日本人那儿得到烟草，日本人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中得到烟草，葡萄牙人则是从巴西种植园得到烟草的。因此，烟草沿着两条线路来到了中国，这两条线路都从南美洲开始，一条是通过葡萄牙人，另一条则通过西班牙人。

在中国，无论到了哪里，烟草的本土化都是立竿见影的。因此京城官员杨士聪（1597-1648）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里，很多人在北京种植烟草。他们种植一亩烟草的所得相当于种植十亩麦地的所得。说到底，便是没有人不使用烟草。”^[4]正如杨所说，福建保持商业优势最好的来源便是“烟酒”，满洲的烟草则是紧接其后。而京城的另一个旅居者报道说，烟酒在北京都以最好的价钱出售。^[5]人们评论哪些牌子是最好的，烟草在入境口栽培，便宜的品种也会在其他地方培育，然后运给北京的烟民。事实上，杨士聪在1642年第一次来到京城时就吃惊地发现“烟民遍布每个街角”，没有任何禁令能够阻挡这一趋势。

当中国人第一次在泉州、漳州和北京用烟斗吸烟时（与欧洲人的风格相比，它与美国土著的烟斗更为类似），吸食烟叶似乎是一件奇怪的充满异国情调的事。但那个光环很快就因为烟草的使用而消失了。叶梦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童年处在17世纪40年代贯穿着满族征服中国的时代。正如他多次在自己的文集《阅世编》中所写

的，在他的一生中，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吸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认为烟草首先来自福建：

我年轻的时候，听我的祖父说福建有烟草，抽烟都可以醉人。他们称这是“干酒”。不过，在我们地区并没有烟草。崇禎时期（1624-1644），上海一个姓彭的人得到一些种子，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他把这些种子种植到当地的土壤里。他挑选了一些叶子，放在阴凉处晒干，然后叫工人切成碎片。他委托日本旅行商人出售，但当地人仍然不敢品尝。

因此，在吸烟成为家庭消费之前，至少在上海它已是一种为服务其他市场而生产的商品。谨慎的上海人开始戒烟，吸烟在一段时间内被一名地方军官取缔，因为他认为烟是土匪才消费的东西。1645年，清王朝的部队抵达上海时，叶写道，“没有一名士兵不使用烟草”。这对于上海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突然之间，毒贩子从四面八方涌来，因此种植者也得到了双倍的利润。”^[6]同样的影响在扬子江三角洲也同样可见。王璞是上海西南邻近地区同时代的人，他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当我还是小孩时，我不知道烟草是什么。崇禎末年，人们在我家乡种满了烟草。习惯突然改变了，所有的人，甚至未满四英尺高的男孩，都在吸烟。^[7]

在王璞和叶梦珠生活的时代，上海地区已形成一个吸烟文化。

无论到哪里，人们对烟草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把烟草看作药草，像其他“中草药”一样。这是姚旅找到的吸烟的意义：“你用火把烟斗里的东西点燃，然后把烟斗放进嘴里”，他解释道，“烟通过烟柄进入你的喉咙，从而产生一种类似喝醉的效果”。因此，烟草流行的叫法之一就是“黄金醉剂”。烟草也有其他效用，对此，姚曾指出“它也可以阻塞疟疾的雾气”。^[8]他还宣称，烟草的叶子可以碾成糊状，揉入头皮，能够治愈头上的虱子。但是，姚旅并不是一个药物学家，对他来说，烟草只是一种令他好奇的东西，有趣、迷人而且可爱，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并为他那毫无创意的书找到了出路。他对烟草的兴趣后来延续到了檳榔，表现了他对植物的持续的好奇心。对姚而言，烟草可能具有一些药用的性质，但它最主要的还是能满足好奇心。

在他的《物理小识》中，方以智把烟草安排在关于植物和树木的章节里，这是他关于物理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方把烟草定义为自然界的一个物体，而不是珍品或是预兆。像其他植物一样，烟草用它的自然属性滋养、毒害和治疗着人体：

烟草的根像野芥菜，但叶片大如白菜。把它发酵后晒干，然后焚烧，可作为“火酒”，这就是所谓的“黄金丝烟”。它可以用来消除湿热，但长期使用会使肺部发热，其他药品则无此副作用。这种副作用会使人突然口吐淡黄色的液体或死亡。^[9]

方以智从视觉和医药的角度把烟草同其他植物归为同类。他假定虔诚的吸烟者会遭到死亡的召唤，但这个假定到 17 世纪后就被推翻了。认为吸烟有害身体的说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又流行起来这与方的看法是一致的。

到 18 世纪，吸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描绘出来。没有更多的禁令，没有更多的关于黄色呕吐物的警告，有的只是对烟草强烈的满足感和惯于吸烟的冲动。据一本食用植物手册的作者观察，“那些食用烟草而不是茶或酒精饮料的人，如果没了烟草，便什么都做不成了，无论时间多么短暂。他们从来不会对烟草产生厌倦。”^[10] 对于吸烟的乐趣，本世纪一位伟大的编年史家陈琮作了记载。他是上海西部的一个老士绅家庭里受宠的儿子，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很早就获得了声誉。他所在的县城有一个上层文化的世界，而他则是其中的核心人物。陈琮把他的成年时光都花在县城的教学上，还修建了一个宏大的私人藏书楼。他也成了一名烟客（“忠实的烟民”也许会更为理想的翻译）。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从二百一十部郡县地名词典、论文集、文集和诗集里收集了材料，加上朋友所写的著作，于 1805 年出版了《烟草谱》。陈的目标是创作一本关于烟书，从而完善消费的两大经典文化权威《茶经》和《酒史》。他成功了：他的著作是清帝国晚期出版的关于烟草的最大的一部手册，对烟草的乐趣作了最充分的证明。

在《烟草谱》中，超过半数的资料是诗歌，它的产生表明 18 世纪的中国精英们已经在文化上适应并接受吸烟进入他们的世界。这首由沈德潜（1673-1763）所作的诗歌表现了抽烟的虚幻，并颂扬了上瘾的刺激感：

八闽滋种族，九宇遍氤氲。
筒内通炎气，胸中吐白云。
助姜均去秽，遇酒共添醺。
就火方知味，宁同象齿焚。

何其伟把类似的图像编织成充满更为阴郁乐趣的诗文：

笑问今天下，何人可暂离。
亦知无甚味，只是若相思。
客至清淡后，愁来冷坐时。
茶囊和酒袋，亲狎弗如伊。

这些诗歌道出了一些 17 世纪被烟草评论家遗漏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参与吸烟，而抽烟是人们共同进行、共同分享，通过社会共同完成的互动。



陈琮《烟草谱》中的木板印制插图，图中是陈琮所说的烟草植物和一名年长的烟民，可能是陈琮自己

这些先生们沉浸在一个充满想象的世界中，在这里，人们适当享用烟草，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分开，是优雅的象征（与陈琮《烟草谱》标题页所画的其他优雅的象征一样）。

如果陈琮是 18 世纪关于吸烟的记载者，那么，陆燿便是对其口味的公断者。他在 1774 年所写的烟谱中宣称，“近来一个时期，没有一个绅士不抽烟”。然而，绅士们不应该不恰当地吸烟，陆继续列出了高贵的烟民们不得不遵循的所有规则。^[11]听琴（精英们偏好的乐器）、喂鹤（长寿的象征）、处理微妙而细腻的事务或是观看绽放的梅花时，绅士是不吸烟的。典礼进行时、有外国观众在场或与美女同床时，绅士也不应该把烟管放进嘴里。尽管陆燿有一些给烟民们的不那么精确的建议——比如咳嗽吐痰、呼吸困难或是你的主人不能为你提供烟草时，就不要吸烟了，他也提出了一些实践性的建议，比如走在落叶中、乘芦苇船或站在一堆旧文件旁时，不应该点燃烟管。康熙的祖母对此表示了认可。



慈禧太后的水烟管

精英们的吸烟行为已经把他们与低微的农民分开了，但是，吸烟跨越了在其他文化中同样能找到的身份界定，尤其是在性别方面。正如陆燿告诉我们的，“甚至妇女和小孩手里也都有一支烟管”。在欧洲，妇女可以自由吸烟。一个英国人在 1878 年写道：“对于甚至只有八、九岁的女孩来说，把烟管和烟草放在她们的丝制钱包或口袋里作为饰品是非常时尚的，即使她们并没有开始吸烟。”^[12] 尽管每个人都抽烟，但男性和女性抽烟的方式不尽相同，尽管区别十分细微。陈琮引用一位作家的描述，这位作家描写了华中地区文化和商业中心苏州的风俗，他观察到，苏州的妇女喜欢躺着吸烟。那些睡到中午的人醒来后，一定会先抽几口烟。而且，由于她们做发型和化妆可能会影响到抽烟的乐趣，有些妇女安排女佣们在她们睡觉的时候做发型。^[13] 这个场景有点让人难以想象。

中国吸烟文化牵涉到性别的地方，在于对作为药物的烟草的理解。妇女因为是阴性，和男人相比，不得不保护自己以免接触过多的洋烟。因此，她们被警告要抵制热烟。这意味着她们得吸长烟管。

到 18 世纪末，对于妇女们来说，吸烟时尚已经从长的竹制烟管转为水烟管。为了产生凉烟，这些烟管都设计简单，但其本身变成用来炫耀的物品，以及她们财富和地位



中国画家关联昌 1850 年所作的一副复制品《混血儿》，水粉画

中国职业画家们把日常生活的场景画下来，发给他们或让他们带回去作为纪念，关于吸烟的绘画才变得普遍起来。即使在那时，对于吸烟的描绘也经常是二手的。19 世纪中叶最出名的外销画画家关联昌画了中非混血的花花公子们手指间夹着雪茄漫步行走的作品。他简单地复制了菲律宾画家特里斯坦尼亚的画，画中的内容并不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能见到的。^[15]

随着照相机的投入使用，吸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镜头里。利用照相机，西方人对抽烟产生了新的看法。尽管早期快门的速度十分之慢，吸烟的形象依旧出现在日常生活的

的象征。当一位满族格格为她的关于慈禧太后的书挑选照片时，她选择了一张有特色的照片，上面标注着太后“最喜爱的烟管”。^[14]

慈禧喜欢拍照，但据我所知，她从来不允许自己吸烟的时候被拍到。在照相机发明之前，男女烟民的形象都不常见。偶尔会在一张风俗画中发现一个手持烟管的人像，但是吸烟并不是中国画家们感兴趣的话题。只有在 19 世纪中叶，欧洲人委托



一位烟民在院子里悠闲地抽烟。摄于 19 世纪晚期的照片



一对夫妇正在吸烟，丈夫吸的是鸦片，妻子抽的是烟草。天津，1910

各个角落，以至于被误解为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但是，一旦它们被照相机扫过，西方人最渴望看到的便是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不体面的景象。吸食鸦片上瘾的照片深受外国消费者喜爱，国人便开始策划图为吸食鸦片者的明信片。在明信片上，摄影师摆出某个姿势，乔装成吸烟者与烟民在一起，这些明信片卖得非常好。

19世纪末，鸦片不断处于政治和道德压力的之中，它的流行暗示着中国社会的弊端，它的彻底根除则是这个国家的目标。但是烟草摆脱了这些束缚，它仍然是一种纯粹的乐趣。19、20世纪交迭之际，袁世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并不是很适应吸烟形式的改变，至少那些在1916年安排他的葬礼的人还不适应这种改变。在那些摆在桌上将要成为祭品的供品中，有他的手枪、衣物和个人用品，还有一支旧式长烟管和一些外国烟具。袁的后代不想他在来世使用的是过时的吸烟方式，或者更糟，被完全剥夺吸烟的机会。康熙皇帝在天之灵将会理解他们的忧虑。

長城牌香煙

長城牌香煙

旅行之良伴

寄語旅行者

不為風雨阻

今茲侍旅客

昔年黎胡虜

客途有良伴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啓

共倚此長城

不虞盜賊侵

變幻類烟雲

青史久標名

其名曰長城

1920年《上海导游》中的长城香烟广告

注 释:

- [1]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 1980: 3755)。何灵秀所引用的《清初京师吸烟风等几个问题》, 见《清史论丛》(北京, 1999: 382)。
- [2] 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北京, 1995: 35)。
- [3] 见姚旅《露书》。
- [4] 见杨士聪《玉堂荟集》。
- [5] 见 L. 卡林顿·古德里奇《中国和满洲的早期禁烟》, 载《美国东方社会杂志》第 18 卷第 4 部分 (1938: 648-657)。
- [6] 见叶梦珠《阅世编》。
- [7] 见陈琮《烟草谱》。
- [8] 见姚旅《露书》。
- [9] 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 1995: 35。
- [10] 沈立龙《食物本草绘纂》, 转引自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 1995: 129。
- [11] 见陆燿《烟谱》。
- [12] J.H. 格雷《中国: 人类的法律、礼仪和习俗历史》第 2 卷 (伦敦, 1878: 149)。
- [13] 见陈琮《烟草谱》。
- [14] 明镜玲《旧佛像》(纽约, 1928: 226 页背面)。
- [15] 卡尔·克罗斯曼《中国贸易: 出口绘画、家具、银子及其他货物》(普林斯顿, 1972: 112-113)。

我们如何吸烟：吸烟的配件和器具

本·兰普鲍特*

四个多世纪以来，吸烟对全球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全球范围内的人们正在努力根除吸烟恶习，但是对吸烟者来说，吸烟仍然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无论是雪茄、烟斗还是香烟。对于不同社会地位和经济阶级的成年男女来说，吸烟曾经是一种复杂别致的社交礼节，不管当时人们的情感、经济、健康状况和政治斗争的状况如何，历史都将记录下这种让每一个吸烟者都叹服的创造艺术品的社会习俗。只要粗略地观察一下，甚至是不经意地一瞥，人们都会发现，对于吸烟信徒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吸烟器具更稀罕、更精美的了。如今，大部分的吸烟配件和器具已不再使用了，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如人们吸烟偏好的改变，对健康理念更进一步的认识，以及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等等。

人们持续不断地对烟草这一迷人主题进行探索，发明了无数器具用以准备、运输、储存和吸食烟草。正如柯林斯·菲利普所说的，“值得怀疑的是，其他的产业是不是作为同系列的消费品的衍生物。根据吸烟对健康影响的科学调查，这些消费品反射出一种被巨大产业永远改变的生活方式。”^[1]人们普遍而持久的使用烟草，因此吸烟器具的发展确实适应了每一个吸烟者的需要。

本章专门来谈这些司空见惯的吸烟的配件和器具，这些实用的东西可以在吸烟者聚集的地方看到或买到，它们是以前人们吸烟的必需品。一样东西一旦过时，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用途，许多过时的东西最终进入收藏品领域，烟草配件也不例外。吸烟者和非吸烟者都被与烟草相关的装置所吸引。罗伯特·克德尔在1930年论及近东水烟时指出：“我们可以预想，从现在起，这美丽的亚洲文化的一部分，将只能与古董交易商和收藏者联系在一起。”如果克德尔今天还活着，他会看到近东的人们仍然在使用这种类型的烟管，在世界其他地方，许多人已开始收集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烟管以及各类与吸烟有关的文物。

在讨论吸烟使用的器具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介绍各种烟草的简要年表。人们普遍认为，烟草曾经被磨碎了作为鼻烟，于16世纪传遍整个欧洲，在17世纪广受欢迎。

*本·兰普鲍特 (BEN RAPAPORT)：嗜好抽烟斗、收藏烟斗古玩和书籍，著有《烟草史料》(1972)，《烟斗古玩收藏大全》(1979)，《烟草文学总览》(1989)，《烟草艺术博物馆和历史指导手册》(1996)，《海泡石古玩收藏》(1999)。目前，正在筹划一本关于中国鸦片烟枪和相关用具的艺术和工艺方面的著作。

在 16 世纪，陶土烟斗传入欧洲，随后的 18、19 世纪，出现了各种各样以香木、瓷器、海泡石、玉米芯为材料的烟斗，而现在仍使用的烟斗则是风靡 18、19 世纪的石楠制成的烟斗。18 世纪 20 年代以后，雪茄得以大量生产。今天最受欢迎的烟草产品香烟诞生于 1832 年，当时埃及人被围赶在土耳其人控制的区域。许多人认为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期间，英国军人首次观察到土耳其、俄罗斯、意大利和法国士兵吸食用纸包卷的切细烟草，即卷烟。从那时起，香烟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大西洋和美洲。^[2] 吸烟的习俗取决于烟草使用的方式，通常都是需要一些设备的，只有 19 世纪下半叶引进的浸渍（湿的）的鼻烟，只需吸食嚼烟而不需要配件。

关于烟草器具传播的广度和范围，可以参考大约一百多年前那些烟草贸易提供给吸烟大众的器具。在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莎曼·格鲁斯坦有限公司成为英国最大的香烟零售商，其总部设在伦敦，在全国各省有超过一百二十个的零售分行。在 1899 年 1 月长达五十一页的附有插图说明的《吸烟者指引》中，该公司提供雪茄和香烟筒、烟盒、香烟制造机和卷纸、鼻烟盒、蜡火柴、火柴架子、烟草切割器和鼻烟磨床，以及预期商品组合包装和各种形式的管子、烟斗烟草和雪茄。1892 年左右，美国最大的烟草产品进口商和制造商乔治·佐恩出版的一份一百六十页的目录《烟管和吸烟者文摘》，有着更大的产品范围，包含繁多的装备，如吸烟者所用的托盘及桌子、烟灰接收器（就是今天的烟灰缸）、管道蒸汽清洁器、打火机、营业机、工作台面雪茄灯，甚至香烟时钟！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吸烟用具呢？现在普通的香烟只需要一根火柴或一个打火机来点燃，一个烟灰缸来放烟灰，但其他吸食烟草的方式就没那么容易了——那些吸食鼻烟或使用烟斗或抽雪茄的人需要辅助工具。首先，他们必须确保吸烟的礼仪正确进行，并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进行，其次才是从吸烟中获得最大的享受。于是，那些与香烟有关的器具便产生了。现在，有些器具仍然保持原来他们的样子或加以改良，而另一些已经不复使用了。

烟 斗

尽管烟斗的式样和材料有显著的改变，却从 16 世纪后期一直沿用至今。由于更加精美的手工雕刻的海泡石烟斗的出现，一度流行的欧洲陶土烟斗已经全然消失。只有那些和今天相对保守的烟斗相似的简单的海泡石烟斗，以及 19 世纪雕刻精美的烟斗的仿制品仍然存世，这两种烟斗都是从原产地土耳其进口的。

瓷制的烟斗以各种样式和品质生产已经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其领先的制造商如法国的尚蒂利、塞夫勒和温森纳，德国的拜恩、哥本哈根、迈森和宁芬堡。现在在德国和捷克共和国大规模生产的瓷质烟斗带有贴花彩釉，主要用来吸引游客。但由于原料的无孔性，瓷制的烟斗从未在法国和德国以外的国家流行开来。

在世界其他地区，烟斗的制造都是采用本土的原料，如金属、石子、骨头、贝壳、牛角和陶器，但其受欢迎程度却从来没有超出本国或本地区。19 世纪取代其他材料制成的石楠烟斗，现在依然为吸烟者使用。西欧各国、日本、以色列和美国几乎都对石楠



刻有浮雕的双色的烟筒（约 1895，巴黎）

除残烟丝（烟草残渣）和清洁烟斗的类似拨火棍的棒子、一个袖珍烟草袋以及一个储存烟草的烟草罐。最早的捣棒是用象牙、黄铜、锡、陶瓷、玻璃及其他材料做的，现在使用的是进口的木材、金属和丙烯酸酯。铅制的烟草罐最早在 17 世纪下半叶传入，后来烟草罐可以用许多其他材料来制作，包括铜、钢材、木材、玻璃和陶瓷等，并绘以各种主题的图案，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 20 年代非常流行。那些烟斗收藏家通常至少拥有一件经典的烟斗配件，包括量身定做的台子、架子、盒子、柜子等。

烟草最早的包装形式是纸或纸板，但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平版印刷术和锌板的并用使无数烟草品牌的设计改成适合西装口袋的锡制的垂直包装。此外还有锡桶装、箱装和午餐盒形状的家庭装，每一个都有独特的、丰富多彩的而且往往是幽默的商标名称。

烟斗的形状、风格、制作的完美程度及价格范围有详细的划分。20 世纪，人们曾尝试将其他的木材原料制成的烟斗推向市场——如紫檀木、橄榄木、乌木、山核桃木、石楠科常绿灌木和玉米芯——但并未太受吸烟者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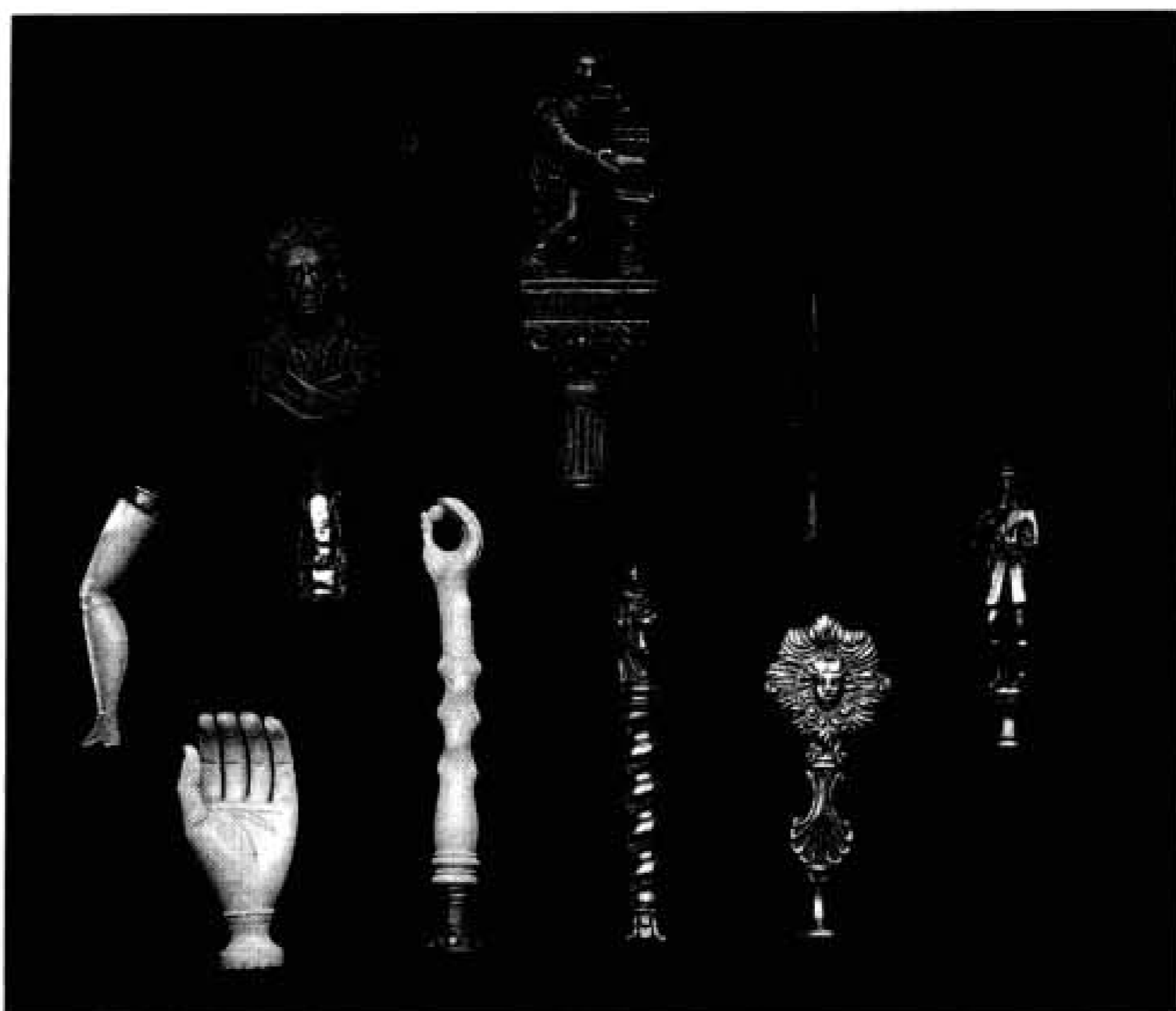
和三百年前一样，用烟斗吸烟还需要一些器具：一个点烟的工具、一个把烟草填入碗状斗里的塞子（或捣棒）、一个用以清



一个小狗形状的烟筒头，其筒弯部为银色和黄褐色的吹口象牙柄的储液槽（约 1800）

雪茄配件

抽雪茄是一种相当特别的乐趣。和香烟一样，雪茄也是几乎整根消耗殆尽，但却需要一些特殊装置：一个口袋穿孔机、剪钳或一个装饰性的桌面刀（一般是小而实用的切纸刀），和一个固定器。其他有用的物品，包括家用的或办公室用的雪茄柜或雪茄盒，用来存放雪茄以保持新鲜，还要有一个随时装有几根雪茄的袖珍盒子。最后，经常抽雪茄的人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或多个桌面雪茄打



早期由金属、木材、象牙和珍珠等材质制成的各种图形的烟斗。最上方的图形是一名学者，他靠在展有英国历代国王与王后头像的基座上，基座题词为“1777年七十四岁的赛尔宾刻”



一个富丽堂皇的拥有脚座的镀银黄铜雪茄设备，包括分发器、切割工具和配套设施（约1900，可能来自英国）

火机。为方便客户，所有最好的雪茄商店都有柜台的机械雪茄切割剪、煤油、煤气、电力或跳火花雪茄打火机。

雪茄产业的一个独特产物是雪茄品牌的包装和广告。随着1798年阿罗斯·塞菲尔德引进了石灰石平版印刷术，以及1836年法国的雍迪·戈弗雷改进了彩色石版（或锌版）套色印刷术，各种品牌和形状的雪茄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包装和标签。^[3]现在这些标签已经成为艺术品，并高价拍卖，成为珍贵的收藏。广告曾经比比皆是，俱乐部、秀场、杂志和书籍上都有，而当时热心于这些昙花一现的艺术品的雕刻师和平版设计师大概从来没想这些东西现在会如此火爆。不过这些已经不再生产的雪茄品牌的精美盒子确

实值得收藏。

香烟盒，固定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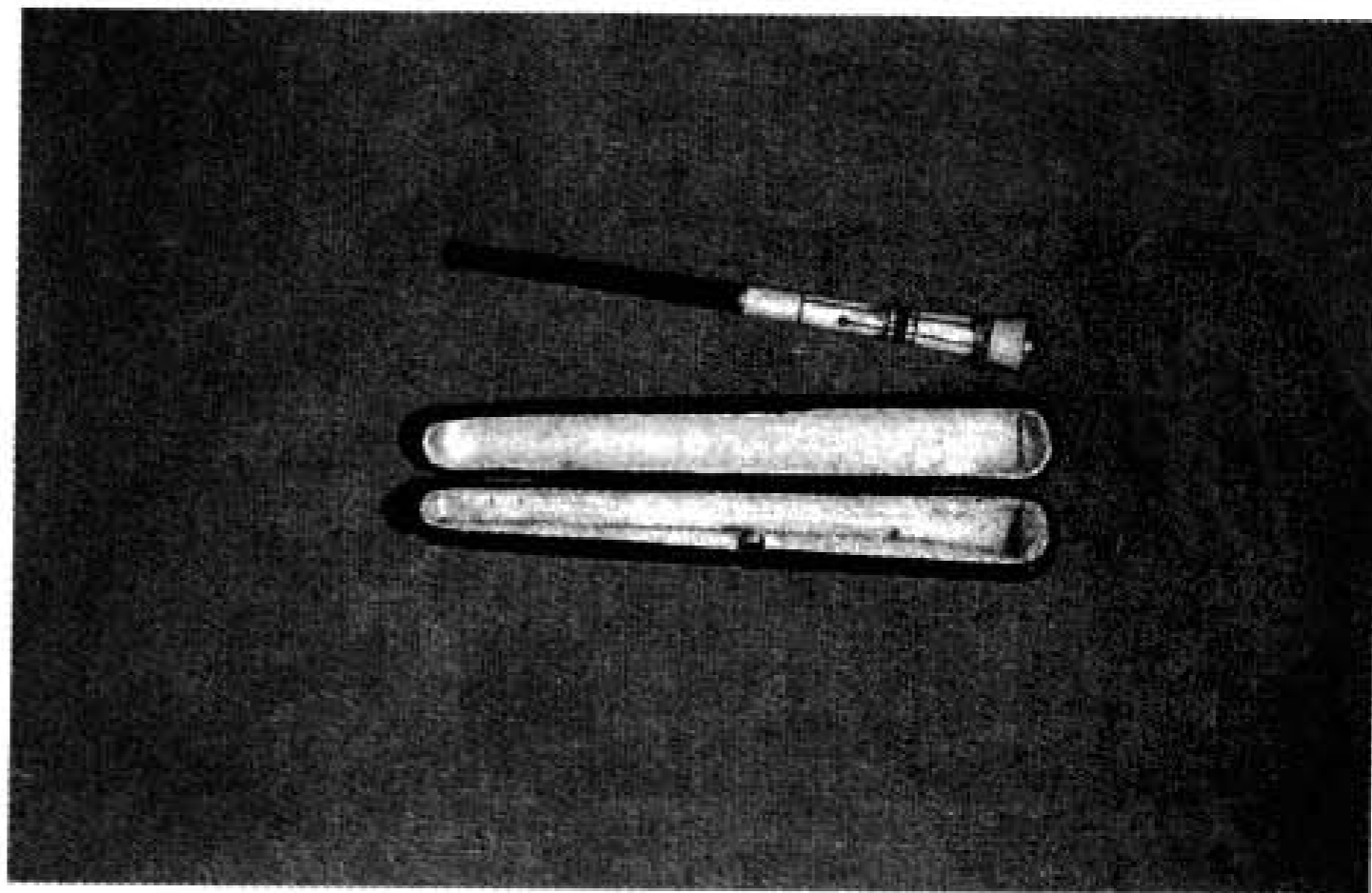
今天，吸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就是从软包装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然后点上。但在不久之前，吸烟被看作是显示个人才能、优雅气质和个性的事。香烟盒和固定架的演变发展最初是为方便女士，但最终男女双方都获益于这种改革，它们也成为男性的首选配件。为了配合欧洲、近东和美国生产的不同长度和直径的香烟，其他与香烟相关的配件也制造成各种尺寸。期中，香烟固定架是用金属、胶木和其他材料制成的，长度从最小的五公分到最大的十五公分。比较短的一类为男士专用，而女士专用的则比较长。这些东西已不再流行，但都成为收藏家的心爱之物。就像雪茄一

样，当时的香烟，不管是家用的还是在办公室使用的，通常都去掉外包装，放入装饰性的烟盒、烟筒、套盒（卷烟杯和火柴架）或专用展示架，以供客人使用。当然，所有这些过去的物品现在都不再使用了。

就像烟斗、雪茄罐、雪茄盒标签及雪茄镶边可作为收藏品一样，以前用纸张和纸板做的烟草包装、简单的圆香烟罐和其他样式的香烟包装，也同样吸引着收藏者。鉴于美国和其他地方一百二十多年的香烟生产历史，人们对所有这些已不再生产的香烟品牌可以有个总结归纳，其中包括未经过滤的和过滤的、含薄荷脑的、木炭的以及带各种香味的香烟；也包括各种混合的、伯莱芋叶做的、东方的、黑色的烟草，以及土耳其的、弗吉尼亚的和雅尔塔香烟；还有标准的、低焦油的、淡嘴的、标准尺寸、大尺寸和特大尺寸香烟；有软包装、硬包装、平装罐、精装罐及其他包装方式。我们现在所谓的雪茄包装艺术，在世界图像历史和烟草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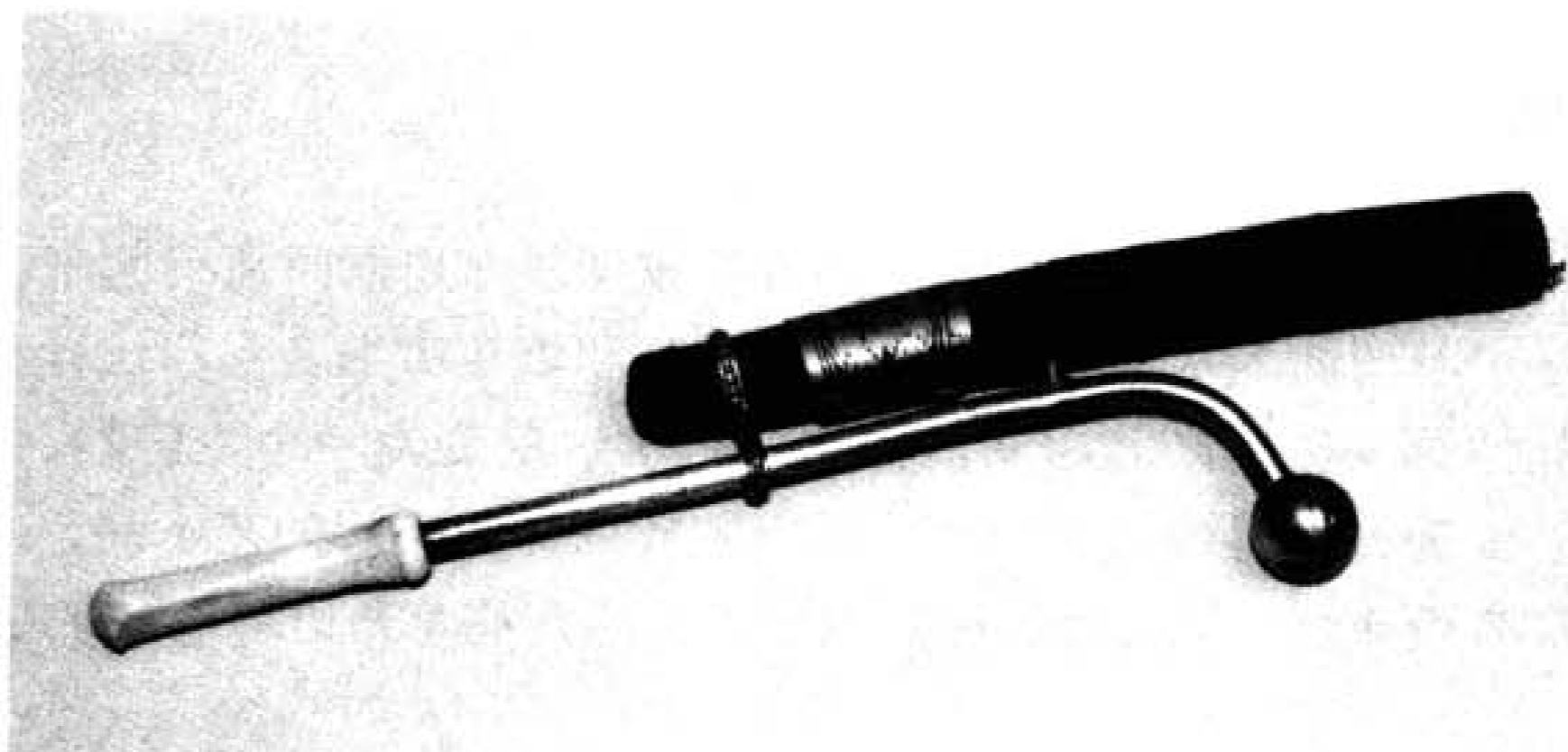


画有“纳达与天鹅”的附有珐琅的银质烟盒（约1910，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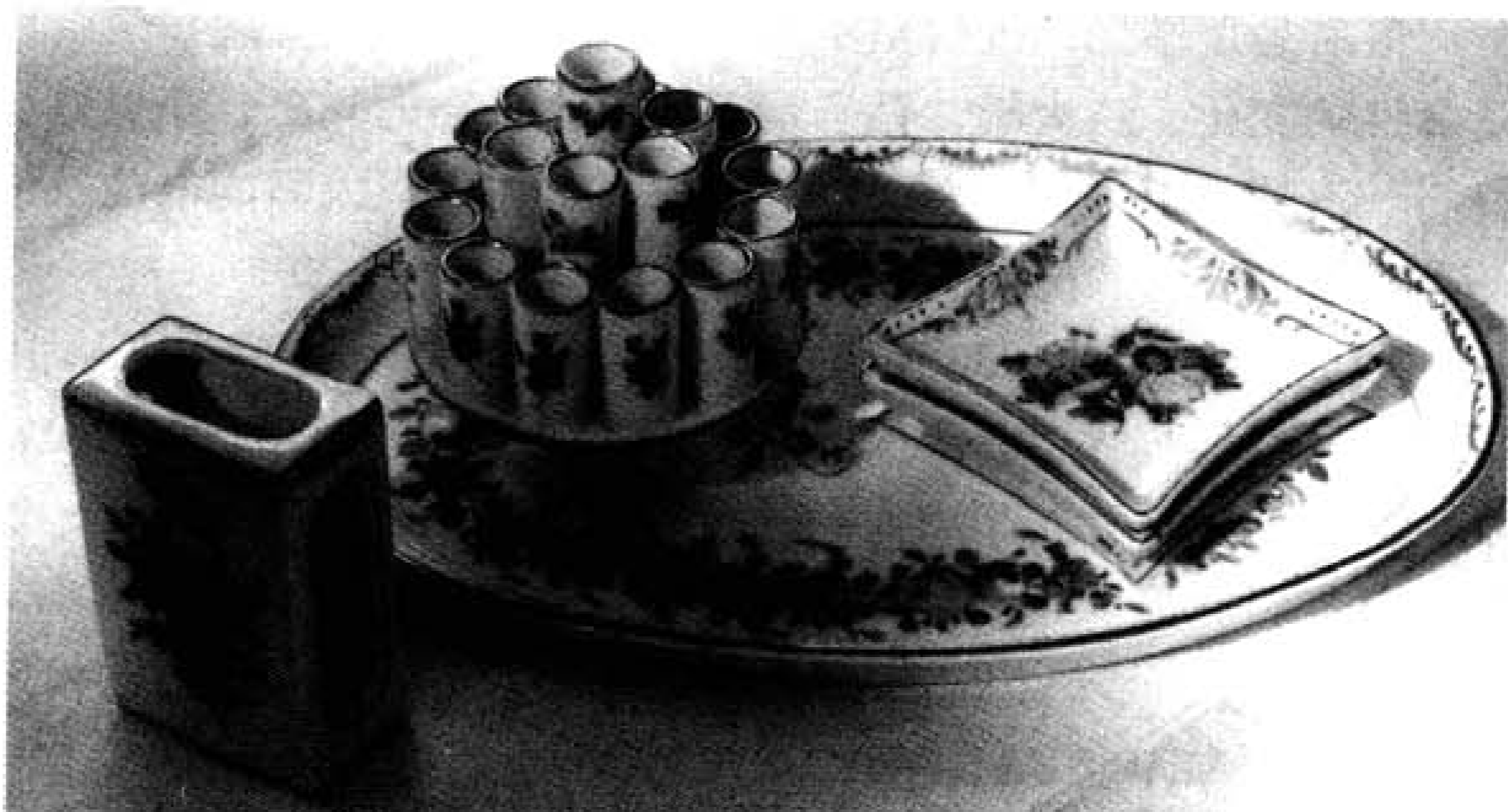


景泰蓝烟盒与烟枪，名为“双奥地利”，约1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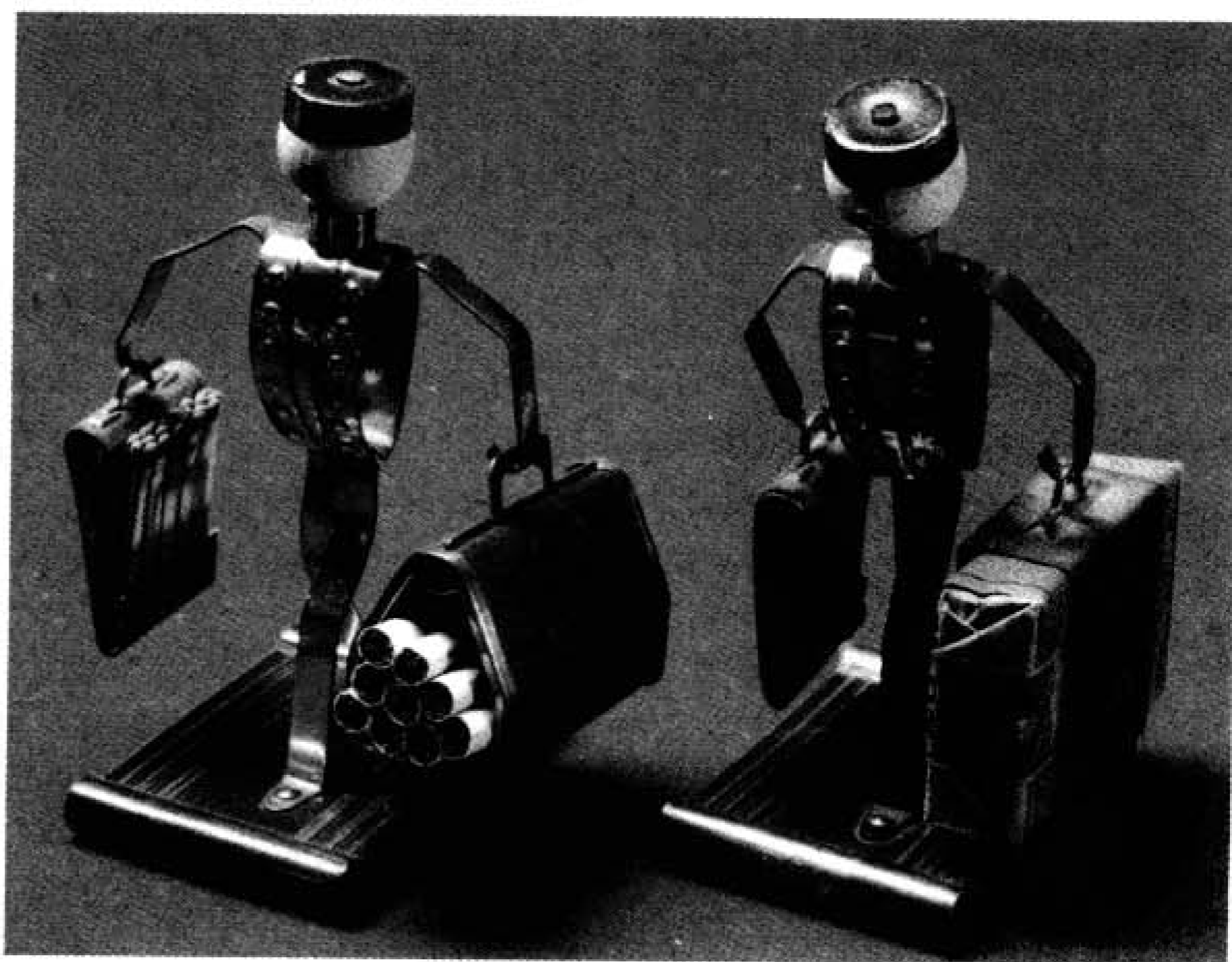
一个非常特别的镀铬金属加象牙吹口的烟盒，皮革上凸印着“F.F.Afabricant, Paris”的商标字样



瓷制的香烟伴侣，也可以作会客厅的摆设，手绘的花卉图案装饰，包括配套的碟子、分配器、火柴盒和烟灰缸



两个名为“旅馆服务员”的香烟架，涂以瓷釉外壳的人形金属架，用来转香烟和火柴盒（约1930）



烟灰缸

在人们普遍接受香烟时，烟灰缸或烟灰盘也同时流行起来。人们为各种不同的场所设计了不同的烟灰缸。此外，还为雪茄和烟斗吸烟者专门设计和配置了风格和形状略为不同的烟灰缸。随着时间的推移，烟灰缸演变为一个由陶器、瓷器、玻璃、水晶、银、铜、大理石、玛瑙和无数其他材料制成的简单实用的艺术品，而且还演变成新颖、形象的广告烟灰缸。凡是允许吸烟的地方，必定有烟灰缸。

点烟

最后是点燃烟，也就是赋予烟以生命。从人们发现并学会取火起，科学创造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从火罐、钻子、火绒箱、丢弃的粪肥、摩擦灯、硫和磷火柴的设计，到燧石、汽油、甲醇、乙醇、电池、电气、煤气、太阳能电池及压电打火机和打火台，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配置和外观都面世了。

19世纪中叶到1930年，用木材制成的摩擦火柴盛行；从1930年开始，安全火柴、纸板火柴和气体打火机开始受欢迎。为了改进这些火柴，人们设计了一个小储藏容器——在英国称为女灶神箱子或女灶神盒子，在美国则叫做火柴盒，这盒子本是用来保持火柴干燥并能将它安全地放在衣兜里的，但很快火柴盒也演变成不同形状、不同材质、不同设计的个性化物品。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前十年，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是最主要的火柴盒生产国。

从1856年到1930年，仅美国专利局就注册了超过一千个的火柴盒设计专利，而更多的成千上万的设计是没有注册直接生产的。^[9]珠宝商、银器匠和创意公司配合火柴制造商和众多默默无闻的个体生产者，生产出五花八门的火柴盒。根据辛普森的描述，小东西的魅力总是无法抗拒的，这些充满创意的小小火柴盒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迷你打火机和工作台打火机的历史演变，是科学与艺术、形式和功能相结合的动人故事。从经典的设计到登喜路（Dunhill）和蒂凡尼（Tiffany）的黄金制作，都是珍贵的、想象丰富的、艺术家气派的设计。以大众市场为基础的金属打火机有芝宝、朗森和埃文斯和随意使用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20世纪生产的打火机大部分都是配件式的，其设计和装饰受到这一时期艺术的影响。几乎所有早期的点火发明现在都已委托博物馆管理或由私人收藏。纸板火柴沿用至今，主要服务于香烟爱好者，而那些使用烟斗或抽雪茄的人，则选择木头火柴或控制火焰方向和强度的新型打火机。无论火柴、木胎膜或打火机，都与吸烟习俗密不可分。

结论

四百多年来，文明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不间断地消费烟草，



布鲁玛（“轻松一按”）配有活塞式机械装置的半自动打火机，带有手工雕镂和浮雕，由935银制造，1927年在德国和美国获得专利

也因此衍生出许多适应其目的的必要设备、器具、装备和配件。这些东西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因为这些独特巧妙的物品证明了吸烟对数百万人的重要性。总的来说，在象征意义上，它们代表了对过去优雅和迷人的香烟历史的微观洞察。

注 释：

[1] 飞利浦·柯林斯《经典烟草详释》（旧金山，1992：3）。

[2] H.F. 雷恩斯马《烟草及抽烟的乐趣图画册》（1960：79，81）。

[3] 参见 <http://64.21.33.164/cigarh.html> 及 <http://www.antiquere-sources.com/articles/stone.html>

[4] 蒂博拉·桑布森《火柴盒》（伦敦，2000：9）。

鸦片的鼎盛时期

若瑟·唐·贝格*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鸦片这个词总让人想起吸食鸦片的景象，其实在有关鸦片的大部分历史中，它并不是用来吸食的。早在新石器时代，鸦片就被人类发现，但直到三个世纪前，鸦片都只是被人们溶解后饮用，而不是被用来吸食。古希腊也有人食用鸦片，但他们除了对罗马人透露了鸦片的用途之外，对外一直都是保密的。直到17世纪，一群阿拉伯人才发现鸦片原来是种理想的药材。他们从中东途经波斯（现称伊朗）、印度、中国，带回了鸦片。这一时期，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发现了鸦片的用途，并把它当作药物和麻醉剂使用。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吸烟被发明了，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在16和17世纪，水手们从本土的北美人身上学会了吸烟，并养成了吸烟的习惯，还把它带到欧洲、印度、中国及东南亚。吸食烟草几乎在任何国家都遭到了反对，但在中国，即使使用最严厉的惩罚，也未能阻止吸烟的盛行。1644年，中国禁止吸烟，那些烟瘾大的人开始转吸鸦片，因为它经过正确的加工后可以用来解徐烟瘾。1969年，J.M.考克（鸦片方面的历史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鸦片的婚礼”。鸦片来自中东，而吸食方法来自北美，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1]鸦片方面的另一个历史学家马丁·布斯把这一时期称为历史上最邪恶的文化交流时期之一。^[2]尽管如此，直到两个世纪后，新的文化才缓慢地踏上了欧洲大陆。

11至12世纪期间，威尼斯商人和阿拉伯人进行了鸦片贸易往来，十字军士兵也从中东带回了鸦片，鸦片再次被引进欧洲。从16世纪一直到19世纪，鸦片一直被当作西方药材中的一种灵丹妙药。它通常是以鸦片酊的形式使用的——将生鸦片溶解在酒精里，这就是托马斯·德·昆西在1821年所作的赞美诗里提到的饮品。他是第一个肯定鸦片的人，同时也创造了鸦片的美梦和噩梦。他著名的《英国鸦片烟者的自白》中提到了鸦片吸食，但带有神秘色彩。他可能是根据东方人和旅行家的传说，用土耳其式的博爱情调来解读传说与吃生鸦片的种种联系的。^[3]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昆西提出了当时还无人知道，或者说还未被人们认识到的鸦片的用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欧洲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欧洲人怀着寻求刺激的心态开始走向吸食鸦片之路。

*若瑟·唐·贝格（JOS TEN BERGE）：阿姆斯特丹瑞杰大学艺术史助理教授，著有《艺术中的毒品：从鸦片到麦角酸二乙基胺（1798-1986）》（待出版）、《傍注：外行艺术的视角》（2001），并为奥拓罗某博物馆编写过两部关于奥迪伦·莱顿和文森特·梵谷的编目。

一个新纪元，一种新方式

在 19 世纪后期，吗啡的使用占据着主要地位。1871 至 1872 年普法战争后，吗啡主要作药用，许多士兵都对它产生依赖。而出于寻找快感和享乐主义的颓废，人们也开始使用吗啡。根据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巴黎的医生、记者和作家所说，女性似乎特别没有能力抵制吗啡的诱惑。这个主题迎合了对女权主义和那些颓废的“女性是弱势群体”的陈词滥调。1886 年，法国《费加罗报》指出很少男性是吗啡成瘾者，原因是男人可以通过工作和抽烟的形式更好地抵制吗啡。^[4] 大部分人认为，吗啡的出现是欧洲文明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

新旧世纪之交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许多人认为是清除所有的堕落和颓废的时候。这个清除吗啡的斗争采取了几种不同的形式。有人认为所有的吗啡都要永远根除，尽管它能作为药用。这些人经常引用马克斯·诺度在 1892 年发表的关于刺激性药物的论文



《新恶习：法国鸦片馆》，
1903 年 7 月 5 日《乐幼儿》
杂志的封面



亨利的《鸦片恶习》
(1909)

《变质论》。在论文中，诺度一视同仁地批判了所有他认为堕落和娇气的东西。其他人虽然也一样不喜欢堕落，但却因为不愿意放弃毒品所带来的快感，选择了吸食鸦片剂这种新的吸毒方法。在那个时代，吸食鸦片算不上新鲜事。在东南亚被殖民以后，相当多的欧洲水手和官员在东方养成了吸鸦片的习惯。19世纪50年代，第一批鸦片馆在法国、英国、美国的港口城市的亚洲移民居住区开业了。由于这些鸦片馆只接待亚洲客人，几乎没有人受到鸦片多大的影响。但是当从东方回来的欧洲海军官员和政府人员也进入鸦片馆，继续享受鸦片魔力的时候，鸦片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一些白人妇女也深陷其中。许多人开始认识到西方文明面临着一种新的威胁。^[5]

一开始，法国人并没有像美国人和英国人那样，对吸食鸦片感到不安，至少在1905年以前是这样。而当时在印度支那半岛殖民地，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人们都在吸食鸦片。到了1907年，法国因为鸦片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第一次是由于“欧牟事件”：一个有鸦片瘾的官员试图向德国人出售法国的军事秘密。第二次是另一个有鸦片瘾的海军舰长居然命令军舰去撞击图卢兹海港的码头围墙。鸦片似乎使这个国家开始丧失保护自己的能力的。当时的讽刺杂志《黄油盘》用了一幅两个吸食鸦片的官员的漫画来讽刺当时的情况。在漫画中，一个官员说：“我们在下沉吗？”另一个说：“嗯，那又怎样？”^[6]这些瘾君子可以轻易在法国的海港城市中找到鸦片馆，妓院也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客人的新需求。但如同之前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一些法国人认为这是印度支那半岛人通过鸦片对剥夺自己人身自由的侵略者进行的报复，从而得以控制这些侵略者的精神。^[7]

除了许多典型的吸食鸦片的亚洲人形象以带有异国文化氛围的方式介绍给西方读者外，许多插画家和艺术家也致力于塑造以鸦片馆中不安的西方人为主题的形象。例如亨利的画，用了像“邪恶的阿西”和“佛祖的毒药”这样夸张的标题来表达他们的想法。

在1909年的沙龙展中，他第一次展出了自己的画。画中描绘了鸦片馆中一个水手正在点燃他的烟斗，另一个绝望地用手抱着头，第三个则试图去触碰他脑海中浮现的影像。画的前景是一个欧洲妇女，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最生动的表现堕落形象是特别安排的亚洲鸦片馆的女老板，她带着魔鬼般的笑容，像是企图利用鸦片来统治那些侵略她国家的人的精神。

对文学的刺激

尽管在法国的文学圈和艺术圈中，苦艾酒、乙醚和大麻等其他药物仍然很流行，但在1900年左右，鸦片代替了吗啡。阿诺在他的著作《美女时代》中总结到：

在战争爆发前的十五年中，鸦片和鸦片馆预示着文学世界和毒品的联系是多样而且是丰富的。鸦片比吗啡更具刺激性，比大麻更变化莫测，比乙醚更有艺术感。“知识分子的快乐毒药”——鸦片，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8]

吸食鸦片成为新文学流派的一个焦点，就像注射吗啡在19世纪80年代那样。阿诺说，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吸食鸦片的作家不仅数量增加了，他们的天分也更高。^[9]

法国鸦片文学本身是从印度支那半岛开始的。那里的作家试图利用毒品来表达他们思乡情绪和对殖民地生活的厌倦。第一篇关于鸦片文学的小说是战争通信员保罗·贝尼丁写的，于1886年出版。小说强调鸦片的危险性，描述了一个堕落的年轻诗人沉溺于鸦片模糊又神秘、深刻又轻快的刺激感中。当他发现自己需要依赖这种药物去抵制噩梦时，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慢慢地走向了毁灭。^[10]贝尼丁的作品被认为具有真实性，它和其他许多鸦片文学形成鲜明对比——在其他鸦片文学中，总是推崇鸦片馆的神秘感和美感。

幻想曲——鸦片的魔力

这个时代出现的许多雕塑和著作都试图诱惑人们去尝试吸食鸦片这一“来自东方”的新恶习。而鸦片的魔力是多样的，第一次到鸦片馆通常是出于一种对异国风情和享乐主义的向往，与鸦片的药效无关。鸦片带有某种禁忌和地下的色彩，尽管当时并没有真正禁止鸦片的法律存在。鸦片是新奇的，带有异国风情的，同时又是具有危险性和威胁性的。就像其他毒品一样，它构筑了一个吸食者的圈子，这些人通常会被那些没有吸食鸦片的人鄙视，被认为他们改变了信仰。^[11]而许多人把鸦片视为一个真正的王国，真正的宗教，一个能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强有力的纽带，就像克劳德1904年的那本多次被翻印的著作《鸦片烟》中提到那样。^[12]

吸食者刚开始分享的是关于鸦片本身的神秘性，罗杰在他的《治疗和医药文学研究》中指出：吸食鸦片时，鸦片中的吗啡含量要尽可能地少，注射吗啡无法像天然鸦片那样

给人以纯粹的精神刺激。^[13]好的鸦片烟应该经提炼和溶解再加上芳香物质，使鸦片的烟雾中有种独特的香味。使用过的鸦片烟斗的残渣中仍然含有大量的吗啡，会被卖给那些买不起鸦片的人。

罗杰指出，在陶醉于鸦片的三四个小时内，神经中枢的感觉变得非常敏感，以至于无法忍受噪音和强光。只有在安静、灯光昏暗的鸦片馆中，思想的强度、速度、敏锐度才会被提升到一个不可预知的高度。吸食者还能进行逻辑思维的时候，想法和记忆会在脑海中浮现。用到八到十烟斗的鸦片，人就开始进入幻想状态，身体开始失去所有感觉，只能看到一个清晰的梦境。虽然这些过程都是自然发生而非人为控制的，但梦境仍然反映了人的性格和职业：

冒险家经历了惊险的旅行，数学家完成了复杂的计算，作家创作了深刻的作品，科学家发表了精辟的论文，浪子追求放荡的生活，演员赋予了角色生命，赌徒解释着总是赢的秘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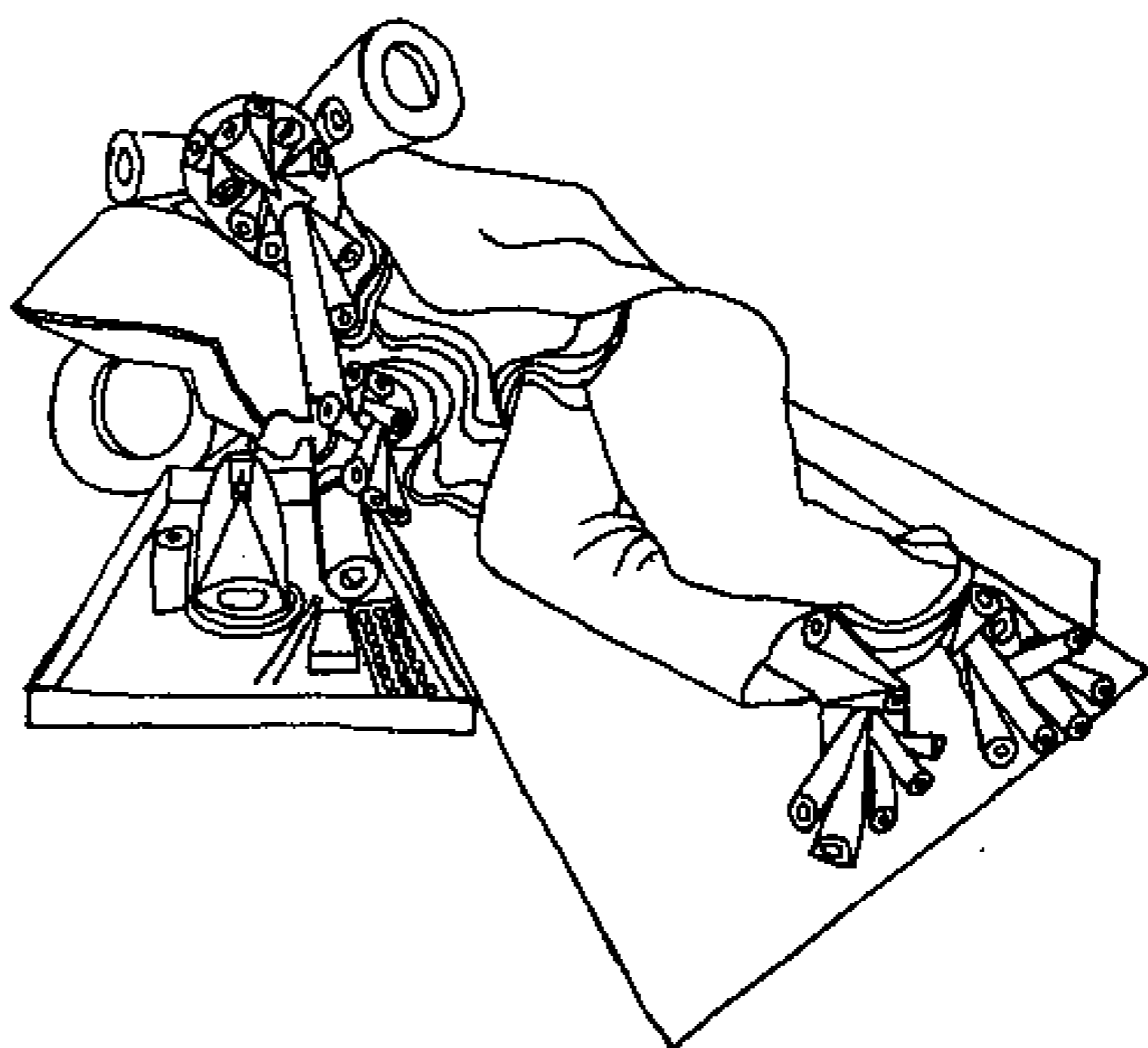
但是，正如罗杰自己所承认的，鸦片的这种魔力大都是主观和夸大的臆想，吸食者总是想象自己有能力去做大事，并且博学多闻。兴奋使人高估了自己，人们开始被自己超出现实的假想所迷惑。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罗杰举例说：在一个吸食鸦片的不眠之夜后，人开始变得冷漠，从而失去了对工作——甚至对自己幻想过的梦境——的所有热情。在鸦片的痴迷状态中，被实验的对象不但未能复述自己的经历，也不记得听到的故事。他们的梦想被记录了下来，然而当药效过后，吸食者本人和目击者都不相信这些与他本人大相径庭的记录。而这同样被罗杰的一个同事所证明。^[15]

然而，罗杰还是对此持有怀疑的心理。他认为，他的同事做了一个过于夸张的描述，因为他只和毒瘾很大的吸食者接触过，对于那些偶尔为之的吸食者，情况并非那么严重。罗杰更进一步地指出：一时的激情和沉溺应该有所区别，偶尔的吸食者很少会因为沉溺于他们的荒谬想法而碌碌无为。在有目标的前提下，积极的幻想可以通过意志促进事业的发展。那些诗人和艺术家想得到的并且可以从中获利的，正是这种积极而美好的幻想。罗杰说：通过吸食鸦片，他们可以发现独一无二的东西。^[16]但不幸的是，偶尔的吸食者往往会因此染上毒瘾。

鸦片的美学

除了鸦片本身具有的能使人产生美好想象和幻想的属性以外，吸食鸦片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魔力，这里也引用克劳德的话加以说明：

这一传承了亚洲美学的围绕着鸦片的神奇礼仪吸引着作家们。其优雅的姿势、吸食工具、灯、烟斗、注射针——总而言之，鸦片馆那如痴如醉的令人惊叹的环境，正是艺术天堂的另一个高度，一个完全被戈蒂尔和托马斯·德·昆西所忽略的地方。^[17]



法国画家让·考克多的一幅未命名的印度油墨画（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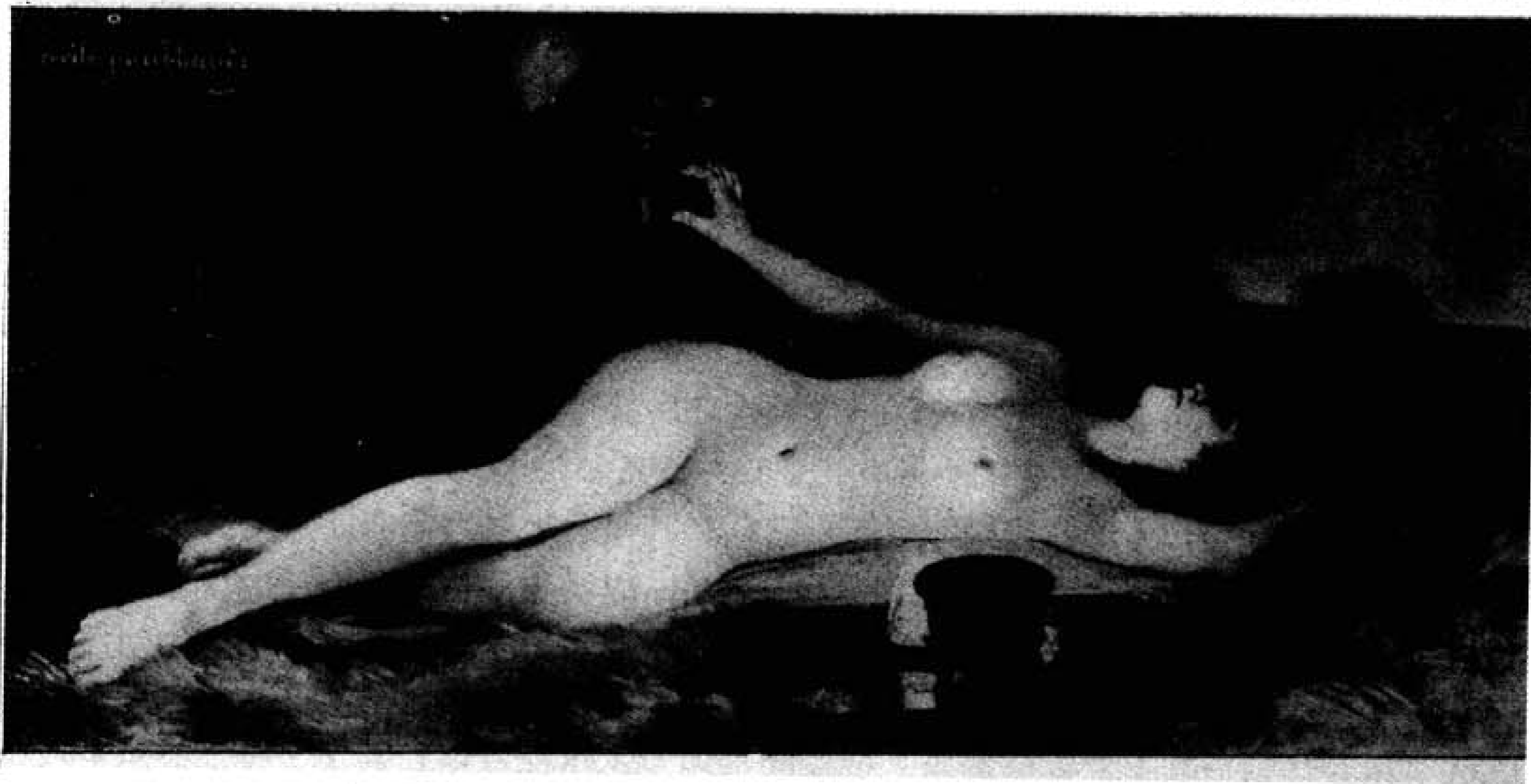
随着鸦片馆的营业，鸦片作为毒品的使用量已超过药用鸦片酊、吸食大麻和注射吗啡的使用量，它还变成了一种美的仪式，在为这一目的而专门设计的鸦片馆中，“由于它精密的提炼程式，它神秘的炼丹术，烟斗华丽精致的漆和光泽，伴随着昏暗的灯光和芳香气味，给诗人和作家一种无可比拟的致命的吸引力。”^[18]

从许多方面来说，鸦片并不仅仅只是吗啡之后盛行的另一种毒品，也是反抗吗啡的结果。吸毒者总是强调着其中的不同，正如让·考克多在1930年写的《戒毒者手记》中指出的：鸦片与皮下注射的注射针不同，它具有其他的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奢华，它的仪式，它的非药用性和精致的灯、烟斗槽、烟斗，以及这种古老风俗里的优雅姿态。^[19]鸦片馆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与世隔绝的、神秘的、烟雾弥漫的世界，一个为梦创造的圣地。在这个世界里，你永远不会生气或厌倦。墙上贴着带有中国佛祖、龙和灯笼图像的墙纸，还有特别为顾客准备的和服、低矮的烟榻、小吸烟桌和穿着东方服饰的小男孩服务生，这些都只是一个奢华的巴黎鸦片馆的一般的设计。这些鸦片馆与中国的吸食鸦片者挤作一团的惨淡情景形成鲜明对比。鸦片文学中的纯叙述性作品描写了鸦片馆的内部环境，以及用竹子、银器、象牙、玉石等其他外国材料制成的奇特美丽的吸食工具。但一些纯粹主义的艺术认为，对于真正的成瘾者而言，这些装饰都是无关紧要的。

接下来要谈的是吸食鸦片的艺术。正确地准备烟管吸鸦片是一项魔术般的仪式。“吸鸦片不能容忍心浮气躁或粗枝大叶的人，……根据考克多所说，许多人和他一样认为吸食鸦片是一种艺术形式，如果小心处理，它就会产生完美的杰作，因为它转瞬即逝。”^[20]首先，将鸦片的注射针穿过一个管状物，然后在旧灯芯上加热，直到它的尖端形成一个

柔韧的小球，这个小球在一个加热过的盘子上旋转形成圆锥形，然后把小圆锥放到烟管槽里，吸食者举起烟管在灯上倾斜出一个角度，吸入鸦片烟。这是一门需要细致、耐心和经验才能正确实践的艺术。但是它的效果会立刻显示出来，用考克多的话来说就是：吸食者开始像气球一样慢慢地上升，慢慢地旋转，再慢慢地降落到一个寂静的月亮上，微弱的地心引力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他的漫游。^[21]

吸食鸦片不仅比注射吗啡有更好的药用效果和美学效果，它也被认为是一件属于男人的事情。在《颓废手札》中，吸食吗啡被认为是女人和柔弱的唯美主义者才会干的事，真正的男人是吸食鸦片的。吸食鸦片的“男子汉气概”这一概念虽然被许多作家所认可，但并未反映在视觉艺术上。为了艺术效果，沙龙的艺术家们更倾向于表现女性，尤其是裸体女性。在表现吸食鸦片的艺术中，皮埃尔的作品《梦见鸦片》于1903年展出，描绘的是一个典型的沙龙裸女，她躺在枕头上，带着女妖般挑逗的笑容。一个叫塞西尔的女画家在1912年的沙龙展中展示了一个鸦片馆中的裸女，没有任何羞愧地沉浸于她的幻想中。阿尔伯特在1905年画了三个挑动情欲的女同性恋吗啡成瘾者后，一定是改变了他的观点，因为在1911年的沙龙展中，他的画反映了吸鸦片上瘾的恐怖景象，描绘了一个堕落的年轻妇女，她有着深邃的、吸毒者的眼睛，正试图从一个壁橱里站出来。



塞西尔·保罗的《鸦片烟》，刊于1912年的插图美术展

蒙马特：鸦片之都

罗杰认为，鸦片吸食者多是脑力工作者，那些爱幻想的人、诗人和艺术家，简而言之，就是那些梦想家。^[22]相对于吗啡来说，鸦片被当作是一种诗化的物质，例如让·多尔塞纳在1930年出版的《惬意的黑色》中写到的：吗啡属于那些匆忙急躁的人和商人，而鸦片则属于如艺术家一样感性的人。^[23]



阿尔伯特《忆鸦片》，刊于1911年的插图美术展

不光沙龙艺术家们寻找着感性的物质，许多前卫的时尚人士也被吸食鸦片的真实魅力所吸引。继法国各码头以后，巴黎很快也出现了不计其数的鸦片馆，尤其是拉丁区（巴黎的大学城）、蒙帕纳斯（巴黎的街区）和蒙马特（艺术家聚集区）。每一个鸦片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装

潢和常客。1919年，弗朗西斯敏锐地观察到了鸦片馆放荡的生活，并写出了他对蒙马特区这种新流行的质疑：

这些可怜无知的人啊，把自己交给这个带来严重头痛的竹烟斗。那我们又何必认真对待你们呢？这些读着鸦片馆中韵文的人，这些波德所赞扬的恶魔守护者，却没有提到他们创造出的一大堆可笑而幼稚的文学。蒙马特，鸦片之都？不！这不是蒙马特，蒙马特可以带给我们远比这些不健康的白日梦更好的东西。^[24]

撇开弗朗西斯的告诫不谈，鸦片是使蒙马特出名的原因之一。在阿美迪欧·莫蒂里安尼的传记中，安德烈·沙蒙宣称15世纪诗人弗朗西斯·维庸的追随者离开了他们所在的拉丁区的基地，去蒙马特贩卖毒品给波德莱尔等人，使莫蒂里安尼也成了受害者之一。^[25]莫蒂里安尼的赞助人保罗·亚历山大医生引诱他去尝试毒品，因为他认为大麻和



《蒙马特区的鸦片烟》，刊于查理·利郎的《毒品：鸦片烟和鸦片烟馆》，1910

鸦片可以刺激艺术想象。为了吸毒这个目的，保罗·亚历山大把他身边的艺术家们组织成一个特殊的团体。^[26]

不管怎样，莫蒂里安尼养成了吸毒的习惯，并且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经营大麻买卖、并在蒙马特开了一家鸦片馆的小康造船家。在吸毒方面，他跟上了由菲利比掀起的“时尚”，而菲利比自己则在1905年从一个海军军官那里学会了吸鸦片。由于菲利比这个多情的女孩不喜欢独处，她邀请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朋友来她私人的鸦片馆一起吸食鸦片，其中有沙蒙、保罗、雷内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可能还有立体派画家·乔治·布拉格以及帕布罗·毕加索。^[27]从1906年到1909年，蒙马特的大部分艺术家都在吸毒。这个新的时尚很快就在朋友圈中流行开来。很快地，如果他们还没有在自己的公寓或工作室中建立起专门的“吸食角”，他们便各自选择自己中意的鸦片馆去了。阿尔弗雷德·贾里和法尔格一起去吸食鸦片；达利兹在赛蒙家吸烟片；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和亨利熟知鸦片；格丽去沙蒙家吸鸦片，而她的丈夫保罗·让则在家写关于毒品的书——1911年的《鸦片烟》。马科斯·雅各是以服用乙醚出名的，他也不讨厌鸦片，并且和阿波利奈尔、达利兹以及弗朗西斯·比卡比亚一起去巴黎的鸦片馆。野兽派画家安德烈·德兰也和他的邻居阿波利奈尔一起去当地的鸦片馆，他们总是在那里交流当代诗歌和画作的最新发展趋势。^[28]

例子永远都举不完，同样的名字一再出现在不同组合里。沙蒙、毕加索和雅里的朋友阿波里内尔经常去同一个固定的地点，每个礼拜六他在那里吸烟，通常由秘书让·莫内特作陪。让·莫内特通过鸦片馆（很可能是菲皮利烟馆）进入了文学界。让·莫内特在回忆录里提到，一个人在那里可以待上八天到十天，超过八天的话，唯一补偿就是要带上一篮子牡蛎，还有两升浆果残渣。他说，有一天他借口自己带来了阿波里内尔而要求在那里待上超过十天。^[29]比卡比尔指出，在战争前两年里，他和阿波里内尔几乎每个晚上都去朋友的鸦片馆吸食鸦片。^[30]战争开始后，阿波里内尔到尼斯（法国港市）避难，他说在那里鸦片把战争变成了一个“虚假的天堂”，而他也在哪里为他钟爱的路易丝烟斗形象作了一组画诗（将诗文排列成与诗的主题相应的图画的一种诗）。诗文写到：拿这烟管，想象自己是要表现欲望的巨大怪兽，这是一门奇妙的艺术，一种在深夜里出现的艺术。^[31]

从1904年夏到1908年夏，毕加索一个礼拜吸两到三次的鸦片，这在他的女管家奥里维亚的回忆录里有记载。^[32]但毕加索很快就自己去购买吸食鸦片所需要的器材，并且随后就邀请朋友到他的工作室一起吸鸦片。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约翰·理查德森的说法，毕加索并不是由于相信鸦片可以扰乱人的精神而去尝试毒品的，而是出于一种天生的好奇心。鸦片在毕加索后期的作品中流露无疑。理查德森发现，毕加索1905年的画有好几副都是昏昏欲睡的表情，其中一副《流浪者》可能是受阿波里内尔的同名诗作的激发。1908年6月，毕加索突然戒掉鸦片，不只是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渴望进步，更是因为他被一个同居者因吸毒而自杀深深震撼了，他也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谴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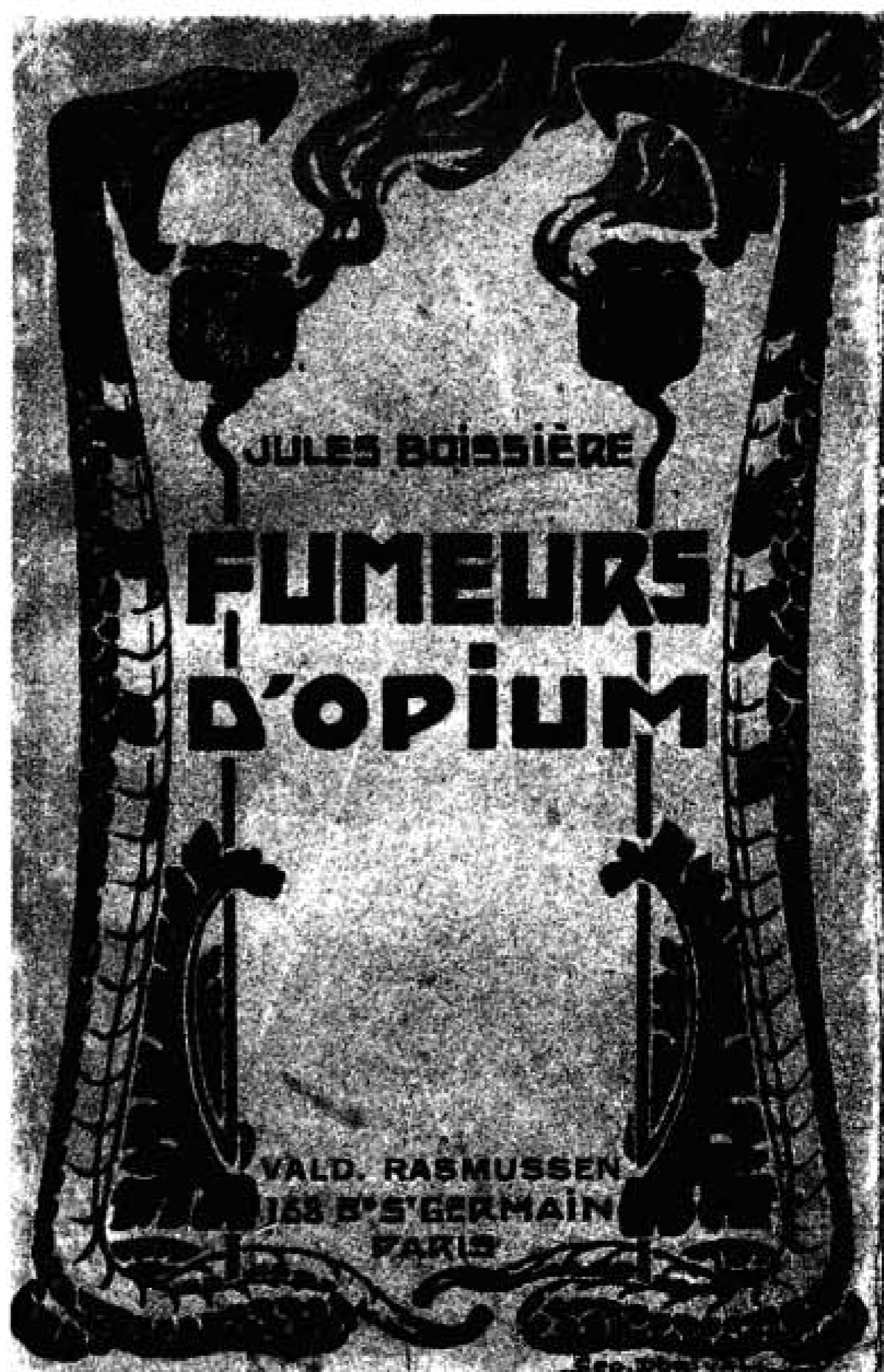
乔治《鸦片烟：最后的武器》，《鬼脸》杂志封面（1917年7月22）

明显是有利的。至少吸鸦片的人不会像喝酒的人一样殴打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他还认为可以从鸦片上赚钱，而出台法律禁止鸦片的行为是虚伪的。根据克劳德的说法，唯一可以禁止鸦片的理由是经济，因为葡萄酒商和啤酒商的经济利益受到了鸦片的威胁。

尽管如此，公众的看法还是站在了法律的一边。人们想起“欧牟事件”，鸦片对这个国家确实是一个威胁，它降低了国家抵御敌人的能力。1917年，《鬼脸》杂志的封面阐述了这种观点。在封面上，一个长发的穿着东方服饰的吸鸦片者在准备一支新的烟斗，他的眼神中流露出恶魔般的疯狂。背景的阴影部分隐约出现一个德国士兵。吸食鸦片就像画面中的文字所解释的，是敌人的“最新型武器”。好几条国际协议也强调了反鸦片运动。战后新一代人通过超现实主义的目标，把空想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因而迷上了鸦片。他们受到新书的影响，比如1913年路易斯·拉

世界大战

随着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鼎盛的鸦片时代也开始走向尾声。享乐主义的吸毒被当成是社会的污点，与当时的战争时代不相时宜。鸦片国际供给线的中断使瘾君子们的生活潦倒起来。1916年，法国政府出台了禁止鸦片的法律，并在1918年以后开始查封鸦片馆。1920年，克劳德专门发行了一本标题为《鸦片还是酒精》的小册子来谴责法国政府。他争辩道，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拿喝酒和吸烟相比，鸦片



《朱利的鸦片烟》(1925)封面插图，初版于1909年

鲁的《鸦片馆的生活》，当然他们也受诸如让·考克多这样的艺术家的影响。让·考克多从1925年开始就不断地引诱年轻的仰慕者去尝试鸦片。但“鸦片的鼎盛时期”不会重现。新一代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更喜欢其他毒品，不再有耐心花那么多时间在鸦片的仪式上。吸鸦片渐渐退回了唐人街时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真正销声匿迹。吸烟和鸦片的结合被证明是不可能长久的，它消逝了，随之而去的还有关于它的文学、技艺和灯。

注 释：

- [1] J.M. 考克《白罂粟：鸦片史》（伦敦，1969：11）。
- [2] 马丁·布斯《鸦片史》（伦敦，1996：105）。
- [3] 格雷维尔·林德《鸦片吸食者托马斯·德·昆西的一生》（伦敦，1981：249）。
- [4] 阿诺德·里德卡克《鸦片佳丽世纪》（巴黎，1984：97-98）。
- [5] 弗吉尼亚·巴利治、格里菲斯·爱德华兹《鸦片与人类：19世纪英格兰鸦片制剂的使用》（伦敦、纽约，1987：195-205）。
- [6] 保罗·贝泰罗《鸦片：历史之恋》（巴黎，1955：352-353）。
- [7] 里德卡克《鸦片佳丽世纪》，1984：146。
- [8] 同上，第170页。
- [9] 同上，第171页。
- [10] 保罗·贝尼丁《鸦片》（日内瓦，1980：281）。
- [11] 里德卡克《鸦片佳丽世纪》，1984：147，151-154。
- [12] 克劳德·法瑞勒《鸦片烟》（巴黎，1906：146）。
- [13] 罗杰·杜破逸《吸食鸦片者：隐士，饮酒和吸食鸦片》（巴黎，1912：59-60）。
- [14] 同上，第96页。
- [15] 同上，第101-110页。
- [16] 同上。
- [17] 里德卡克《鸦片佳丽世纪》，1984：171。
- [18] 同上，第172页。
- [19] 让·考克多《鸦片：戒毒日记》（巴黎，1930：86）。
- [20] 同上，第32，119页。
- [21] 同上，第158页。
- [22] 杜破逸《吸食鸦片者》，1912：71-72。
- [23] 让·多尔塞纳《黑色的偶像》（巴黎，1930：19）。
- [24] 参见弗朗西斯·卡克《拉屏敏捷纪念馆》（巴黎，1919）一书的前言。
- [25] 安德烈·沙蒙《莫迪里阿尼的生命激情》（巴黎，1957：84-88）。
- [26] 约翰·理查森《毕加索的一生》第1卷（伦敦，1991-1996：320）。
- [27] 萨尔蒙《莫蒂里阿尼的生命激情》，1957：81-82。理查森《毕加索的一生》第2卷，1991-1996：62-63。
- [28] 理查森《毕加索的一生》第1卷，320；第2卷，68。里德卡克《鸦片佳丽世纪》，1984：161-165。
J.P. 克里斯比尔《毕加索的蒙马特日常生活（1900-1910年）》（巴黎，1978：134-136）。

[29] 让·莫内特《莫内特男爵的回忆》(巴黎, 1963: 93-94)。

[30] 弗兰西斯·皮卡比尔《纪尧姆·阿波里内尔》(1924)。

[31] 见阿里内奈尔 1915 年 1 月 4 日写给 S. 菲伦特的信和 1914 年 12 月 21 日写给 F. 弗里雷特的信。

[32] 费尔内德·奥里维亚《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巴黎, 1954: 56), 可与 165-166 页做比较;《亲切的纪念品》(巴黎, 1988: 185-186)。

哈瓦那雪茄和西方想象

詹妮·斯塔布斯*

抽上一支哈瓦那雪茄，是举世公认的欢娱放纵的最高境界……^[1]

1997年，20世纪90年代雪茄炒作的巅峰时期，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题为《燃着的香烟》和《玩酷的愚人》两篇关于雪茄的文章。后一篇文章谈到了时髦的名牌服饰、饮料、咖啡和雪茄，前一篇则这样写道：

“雪茄气味难闻、昂贵且对人体有害，而它却是最炙手可热的消费品。上到社会名流，下到普通百姓，无不踊跃追求雪茄消费。这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也许你永远都不会想到，事实上的确还有那么一些从未抽过雪茄的美国人。也许你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2]

哦，对，我不是美国人，可我曾经是个从未抽过雪茄的人。这样的身份结束于2001年1月的古巴阿瓦奥乡村农场之旅。那是所有雪茄行家向往的胜地，那一年雪茄种植喜获丰收，获得当年“哈瓦那雪茄绅士”称号的雪茄种植者、年近八旬的亚雷汉德罗·罗柏纳老人请我抽了一支用雪茄叶卷的雪茄。当我们一边摇晃着走在他家长廊上一边闲聊时，他又赠给我一支有他亲笔签名的银白色雪茄留作纪念。后来，为了存放这支雪茄，我特地在与邻镇雪茄厂交界的一家哈瓦那雪茄商店里买了一个铁盒——我自己的独特的雪茄盒。如今，这个雪茄盒依然骄傲地陈列在我书房的书架上。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抽过雪茄了，但我对研究古巴烟草的热忱和撰写有关古巴烟草文章的痴狂却有增无减。

最理想的雪茄之旅，莫过于一月或二月去游览古巴了：感受那碧波万顷的喜阳烟草田，体会阿瓦奥那银装素裹、波涛翻滚的喜阴烟草园。然而，哈瓦那这座雪茄名城，总能吸引特殊的雪茄爱好者，并能从渴望折价烟的游客身上获得不菲的利润。20世纪90年代雪茄炒作引发了关于数量与质量的争论，因为用于加工雪茄的烟草生长在条件不适宜的区域、年轻的工人缺乏经验、优质外销品牌——如可喜巴、奥约·德·蒙特雷、基督山伯爵、帕得嘉斯、阿万斯以及新特立尼达均产自哈瓦那城以外的非出口加工厂。如今，这种现象已经减少，哈瓦那国会大厦和翻修了的雪茄酒店的新老员工都已摒弃了那

*詹妮·斯塔布斯 (JEAN STUBBS)：伦敦城市大学加勒比研究中心主任、加勒比史教授。著作包括《周边的烟草：古巴劳动史个案研究 (1860-1958)》(伦敦，1985) 以及关于古巴烟草的其他文章。最近，她正在编辑一本探讨近一百五十年来外海和岛上哈瓦那香烟方面的著作。

些旧习俗。这种做法被一位最近退休的古巴烟草专家描述为属于：

“魔力现实主义”的世界。根据名震世界的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说法，指的是哈瓦那雪茄所属的拉美文化。“现实主义”是指维尔他以及古巴其他烟草种植地区的农民、工人结合当地气候、季风和日照条件，因地制宜，推陈出新，“魔力”是指其中的享乐主义，是他们献给吸烟族的精美礼物……^[3]

魔力哈瓦那

古巴人有着丰富的雪茄知识。据说，他们纺线时也要讲上一箩筐的烟草故事。毫无疑问，烟草在古巴和古巴人的心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其所有的烟草产品中，雪茄生产占相当大的比重，且长久以来被誉为天下极品，世界其他地区纷纷仿效生产。早期的雪茄为美洲印第安人所有，但自1492年哥伦布征服美洲后，人们开始抗衡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野蛮掠夺和非法走私，因为其暴利，雪茄便成了德国、英国、法国和北美资本积累的猎物。这些国家烟草混合物的主产地远在喀麦隆、土耳其、爪哇和苏门答腊，其主要贸易地在伦敦、阿姆斯特丹、不来梅和纽约。从1868年对西班牙的第一次独立战争的爆发到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20世纪90年代的雪茄炒作，烟草是主要的政治动乱和流亡犯人产生的核心原因，也是经济竞争的原动力之一。

五百多年前，当西班牙使者将一群手握火把的男人载入编年史册时，哈瓦那雪茄的神秘就随之孕育而生了。即便勤劳的人们以将其明确地命名为“烟草”，哥伦布当时却一心谋财，无视它的价值。后来古巴民族志学者 Fernando Ortiz 奉烟草为印第安人不可分割的民族情感。他认为这种情感涵盖了神话、宗教、魔幻、医学、仪式典礼、集体进程以及政治和战争。对于那些当年如货物般被贩卖来的非洲奴隶而言，烟草既亵渎又神圣——直至今日这种观念依然影响着非裔古巴人的宗教信仰。烟草穿梭于新旧两个世界，之后又以历史商品的身份返回到现代社会。在这个以哥伦布视角审视的古巴事件中，奢侈的香烟消费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主流。同时，“烟草”或“puro”（纯净）这两个直译词，成为西班牙众所周知的名词，但人们更喜欢用哈瓦那雪茄或哈瓦那作为烟草的统称，毕竟是哈瓦那这座传奇城市孕育了那享誉全球流芳世界、久负盛名的香烟。

雪茄影像文化的出现为新兴传统、想象社区和文化争论提供了成长的沃土。19世纪后期，烟草艺术点燃了视觉想象空间。从维克托·帕特



19世纪哈瓦那雪茄标签上宏伟的卡利斯托·洛佩兹烟草工厂

里西奥·朗德鲁兹的不朽雕刻作品中叼着香烟的女医生，到带有金色压纹的华丽雪茄标签，色彩在彩色石印术中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历史学家 L. 威斯特法在对 19 世纪后期佛罗里达州国民“清洁雪茄”工业的评论中这样写道：“雪茄，是身份地位的代名词，男人功成名就的晴雨表……雪茄销量随印刷技术的完善而激增……生产商们极力推销西班牙风格图案的香烟品牌。”然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化，雪茄生产的机器化，使这种西班牙主题风格的香烟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失宠，但又在 20 世纪后期卷土重来。

反攻

20 世纪 90 年代的烟草繁荣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总部设在纽约、针对市场的《烟草爱好者》杂志，该杂志首次创刊于 1992 年，由马文·山肯编辑。这份杂志首先象征着烟民反对“反吸烟改革运动”，正如一位纽约人在本杂志创刊号中所表述的：

每天晚饭后，牵着我的两只狗，吸着烟沿着公园散步。我的许多朋友在近些年以来热忱的反吸烟运动的影响下游离着。这使我有时很抵触，爱与人争论，甚至成了一个反对美国反吸烟议会的激进分子……。^[4]

他继续追忆威斯顿·丘吉尔 1940 年手持哈瓦那香烟向民众的挥手（他甚至让一种烟以他的名字命名）；20 世纪 50 年代在精英男士中，吸烟时尚已得到公众的容忍与尊敬；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肯尼迪吸着一种哈瓦那香烟说道：“当美国不再战争，惩罚人的渴望就不得不在家中释放。”^[5]

一年之后，山肯的一条名为《起来》的社论申诉道：“烟民们正在意识到一些比受鄙视、被孤立的少数族群更多的东西。要让世界明白怎样使得这次攻击更有力。”此社论附有展示丑闻的连环画，与下层烟民有关，这些下层烟民中最伟大的是卡斯托似的人物（见下面的漫画）。也许卡斯托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戒烟了，但他仍然是被封杀的对象。毕竟他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央情报局暗杀失败的人，其中涉及一支有毒香烟，在那之后，他抽的是绝对安全的专门为他定做的 Cohiba 雪茄。尽管几年来倡导女性抽雪茄的舆论盛行，但该杂志的副标题仍为“为男人的美好生活而存在的杂志”，杂志上刊登了极具刺激的广告，其中包括现代卡门在大腿上卷雪茄的广告。此杂志的发行量连连高升，基于网络的改革催生了网站 www.cigaraficionado.com，其中的“名誉堂”和“雪茄之星”栏目，表彰那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引领工业繁荣的人。

酷烟时代

1997 年一份新闻周刊的印刷品插图题为：“烟草仍将火爆吗？怎样继续这种时尚？”副标题是：“所有的趋势——烟草、盖印、文身——走向酷的舞台”。一旦成为主流，趋

势或是死亡、突变成边缘趋势，或是巩固成民族消遣。^[6] 四种阶段分别是外缘期（前酷时期），流行期（酷时期），主流期（后酷时期）和突变期（新酷时期）。前酷时期，1995年之前的银行家、投资商和律师在外出吸烟的夜晚嘲弄政治的正确与否；1995年的酷雅皮士、谦和的酒宴者和大学生使《雪茄爱好者》的发行量越来越多，他们在烟吧和允许抽烟的特色餐馆里吸；1996年后酷时期，“合作美国”趁机获利，乔和简把雪茄带到郊区；1997年新酷时期，城市少年和非法的古巴走私者制造各种麻烦，美国雪茄销售将会在来年锐减，但是其他地区的雪茄，尤其是来自古巴的雪茄，继续繁荣发展。1998年，英国刊物《经济学人》出版了一篇文章，题为《古巴雪茄：让美好时光持续》：



迈阿密广告：在大腿上卷雪茄的摩登女郎，《雪茄爱好者》中的一张图片

当卡斯特罗于1985年戒烟之后，世界其他人也是如此。它看起来好像会使古巴工业停滞，但是它还会卷土重来。香烟对于富人来说是一个有说服力的附属品，且是政治正确性的反击波……在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者在酒吧里团结起来。^[7]

哈瓦那雪茄成为时尚，正如《古巴导报》1997年4月报道的那样：“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七百多人（其中一百三十七人是否认我们的美国人）参加了这个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热带盛宴。”^[8]

雪茄之城

这些起源于古巴的进程被国外所效法。马克·达克林提出：“奖金雪茄是完全手工制作的，采用完整的烟叶，而只有在古巴才是手工的，不是用机器……古巴发明了长填充器的手工雪茄，我们欠古巴人情。”^[9] 在古巴以外，标准化实践要求便宜的雪茄（例如美国的雪茄）被很短的香烟过滤嘴密实地包裹着，压成同样的细卷装成一捆放入纸袋。尽管如此，对于高质量古巴雪茄和烟叶的追寻使大批人从19世纪后期饱受战争蹂躏的古巴和20世纪后期革命战争爆发的古巴流亡到周边加勒比海地区和美国中部地区，其中到佛罗里达的流亡者最多。他们途径基韦斯特、坦帕、波城，穿过今天奥克拉所在地马丁城，到如今的阿姆斯特丹、苏门答腊和哈瓦那。

如果古巴哈瓦那是一座烟城，那么当时的基韦特则是“美国烟城”，坦帕城（西坦帕城和波城更具代表性）则是“世界烟都”。两者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1892年被放逐的革命领袖朱斯·马丁在坦帕城寻求古巴革命党的支持。波城最有名的雪茄在1895年被走私进古巴城，雪茄中藏有朱斯·马丁发动暴乱命令。这两个城市或许已经灰飞烟灭，

但是工人们记录了过去的理想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和吸烟文化（这经常被遗忘）。1972年，《佛罗里达人》的一期将波城描述为“一颗充满历史、罗曼史和诗歌的燃烧的棕色鱼雷”，此外，还写到七十六岁的雪茄制造商塞文德·洛皮兹，他是现存不多的雪茄制造商之一：

他点燃一支自己制造的雪茄，目光闪烁。阳光透过窗缝，在他的头发上跳跃，然后反射回来。他仔细观察，想看看这烟是否能连贯地燃着，因为他知道，这是鉴定雪茄优劣的方法之一。他盯着长长的烟蒂，就像任何一个香烟行家那样。洛皮兹的快乐就是从那些衣衫褴褛、行动迟缓的老人身上赚到烟钱。那些老人穷得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但却喜欢把钱花在购买好雪茄上面。^[10]

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雪茄的销售量处于低谷，雪茄的神秘已经成为好莱坞的思乡幽情——坦帕城的历史仅仅保留了被开发者袭击后的模样。路易斯·波比在一次哈瓦那雪茄工人罢工之后于1912年来到坦帕城，不久就成为1931年大罢工的组织者。下面是来自于一篇拉库兹的文章，它记录了20世纪20、30年代的热情：

一股长长的沉默在你我之间穿行，唐·琼斯吹出一股股无形的灰白色的烟雾，直至天棚。时间在他那徘徊的烟雾与破旧的钟摆中流逝，夹杂着快要失去的年华……“我们赢了，要知道，我明白历史将要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我要让你明白不是如此了事。”^[11]

1995年，古巴裔美国作家格斯特沃写道：

被替代的放逐，如果你不能在哈瓦那生存，就在迈阿密好了……放逐的生活由其想象而被提升。就像是唐·吉珂德，每一次放逐都是想象的使徒。有人在创造一个世界后又对他的报复和梦想进行更改，对于二十年来都生活在哈瓦那的人来讲是最流行的说法，一切都是烟雾和镜子。^[12]

媒体战热浪奔腾。在迈阿密的一本刊物上，忧郁作家马丁在他的专栏中写道：“当问到世界上最好的雪茄是什么时，大多数回答（包括《雪茄爱好者》）告诉我们答案是古巴雪茄……但是我们发现许多其他地方的雪茄



切·格瓦拉——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的偶像人物，人们通常以抽雪茄的形象来表现他



20世纪90年代古巴的另一位偶像人物——电影《乐满哈瓦那》里的高龄古巴歌手，手中夹着雪茄

质量更好，比如多米尼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牙买加……很可能这些是古巴的先人所做，或者向他们所学。”住在迈阿密的年轻古巴裔美国人是在禁烟州佛罗里达长大的，他们发行了《第N代人》杂志，并且重新发现了古巴雪茄。此杂志1997年8月刊发出呐喊：“雪茄……终于来了！血浓于水啊！”^[13]他们后来经常光顾巴尔的摩酒店，这个酒店建于1920年，复兴于20世纪90年代，酒店里还举行“雪茄沙龙”，就是周五晚上的“群星下的雪茄”活动和雪茄晚餐，人人都系着黑领带。雪茄节日在西部再度流行起来；雪茄店和棒球一样随处可见；雪茄店卖“哈瓦那 Roller Pens 雪茄”、“哈瓦那可可大雪茄”和“Habaneros”蜡烛，还有普通烟灰缸、酒杯和棒球帽。^[14]

于是，有利于新传统和想象空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竞争在相同或相似品牌的平行生产和营销中产生。这些品牌来自服务于欧洲市场、也被欧洲市场服务的小岛，并且已经脱离小岛，逐步融入美国的雪茄行业。然而，用雪茄酒吧企业家伏特的话来说，“美国文化进入了自己的时代。我们吸好的雪茄，我们喝好酒。美国文化正在逐渐成长并趋于成熟。”如果真是如此，也许华盛顿那个视抽正宗的哈瓦那雪茄为非法享受的长达四十年禁运令可以终止了。

注 释：

- [1] 萨基欧·莫拉、西蒙·切斯和比尔·考伯特《哈瓦那：太阳、土壤和技艺的结合体》（伦敦，1993）。
- [2] 肯达·哈米尔顿《燃着的香烟》，载《新闻周刊》1997年7月21日。
- [3] 阿德里亚诺·马蒂尼兹·瑞斯 *Habano el Bey*（巴塞罗那，1998：11）。
- [4] 盖伊·塔尼斯《雪茄漫步》，载《雪茄爱好者》1992年秋，第37页。

- [5] 同上，第 41 页。
- [6] 《雪茄会一直流行吗？如何追随潮流》，载《新闻周刊》1997 年 7 月 21 日，第 59 页。
- [7] 《古巴雪茄：让好日光继续》，载《经济学家》1998 年 5 月 2 日，第 59-60 页。
- [8] 弗朗西斯科·依莉《古巴拥有全世界》，载《古巴导报》1997 年 4 月，第 13 页。
- [9] 马克·达克林《世界最好雪茄品牌指引》（纽约，1997：8）。
- [10] 艾伦·高恩《一支好雪茄不只是抽烟》，载《佛罗里达》1972 年 11 月 26 日，第 24 页。
- [11] 路易斯·皮瑞兹《追忆坦帕城》，载《唐帕湾历史》1985 年秋冬卷，第 170-71 页。
- [12] 加斯塔·皮瑞兹-非马特《来年在古巴：在美国的古巴老人》（纽约，1994：82）。
- [13] 见《年代》1997 年 8 月刊。
- [14] 见《年代》1997 年 12 月刊。

百年丁香烟

马克·哈努兹*

设想一下这样一个情形：在胸疼几天后，你终于决定要想点办法了。于是你走进附近的一家药店，让药剂师帮你推荐祛除病痛的药物。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从药柜中拿出一包烟递给你，并告诉你：一天抽三次，坚持一个星期。

当今，用香烟治病没有那么受欢迎了，因为香烟广告上面都说抽烟对人体有害。但大约一百年前，在爪哇中部一个叫古突士的小镇上，香烟却被当作缓解一般咳嗽最常见的疗法。但这种烟绝不是普通的香烟，而是丁香味的印尼烟。如今，这种丁香烟已成为两亿多印尼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

大约 1880 年左右，一个叫哈季·加玛利（哈季是给予那些已到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人的尊称）的古突士人患了轻度哮喘病。为了解除病痛，他在前胸上抹了点丁香油（丁香油酚）。几世纪以来，丁香油酚一直被用作止血药——应用最广的就是现今的牙科了。丁香油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病痛，他进而设想，丁香油酚能否更进一步地解除他肺部的病痛，获得更加灵验的疗效呢？如果将丁香和烟草混合起来吸食，又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据说他的确就这么做了，他的咳嗽也马上停止了。他通过当地的 Apotik（药店）销售他的产品，很快，他的 rokok cengkeh（丁香烟）就被用作止咳药，就像今天的止咳糖浆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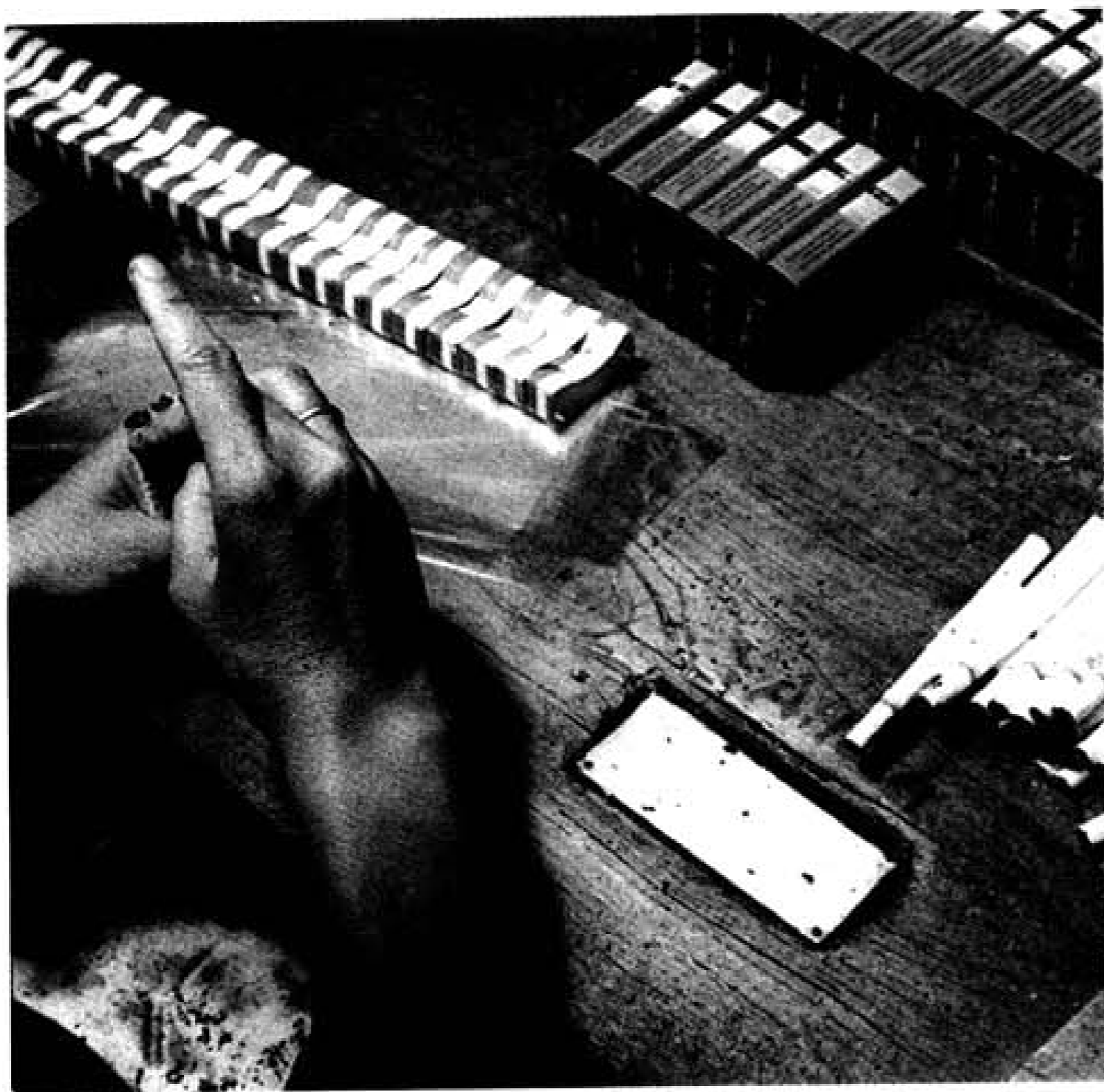
19、20 世纪之交，这种新的抽烟方式赢得了更广大的拥护者——他们抽这种丁香烟不是为了治咳嗽，而是为享受这种烟草和丁香混合的滋味。这种新产品在燃烧时发出噼啪声，所以被重命名为 Kretek 烟 (kreh-TEK)。但是，哈季·加玛利并没有抓住这项发明的商业契机，这个机会被另一个古突士人抓住了——他就是丁香烟之父尼提茜米多。

多尼提茜米那时正在古突士做零工，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吸食混有丁香的烟草上瘾。那时，所有的丁香烟都是手卷的，而且烟料也不能一次买齐。尼提茜米灵机一动，决定自己混合成分，包装成品并作为一种品牌进行销售。他试用了好几个品牌名称，最后选用了 Bal Tiga（三球牌），最终于 1906 年创立了以三球尼提茜米多命名的公司。

尼提茜米多在当时的荷属安地斯（印度尼西亚的旧称）以独特的方式推销他的产品。他在爪哇每一个集市摆摊销售他的丁香烟，并向购烟者赠送礼品，如茶壶、烟盒甚至自行车，上面都标有尼提茜米多的标志。

*马克·哈努兹 (MARK HANUSZ)：当过银行家，著作有《丁香香烟：印尼丁香香烟的文化与遗产》(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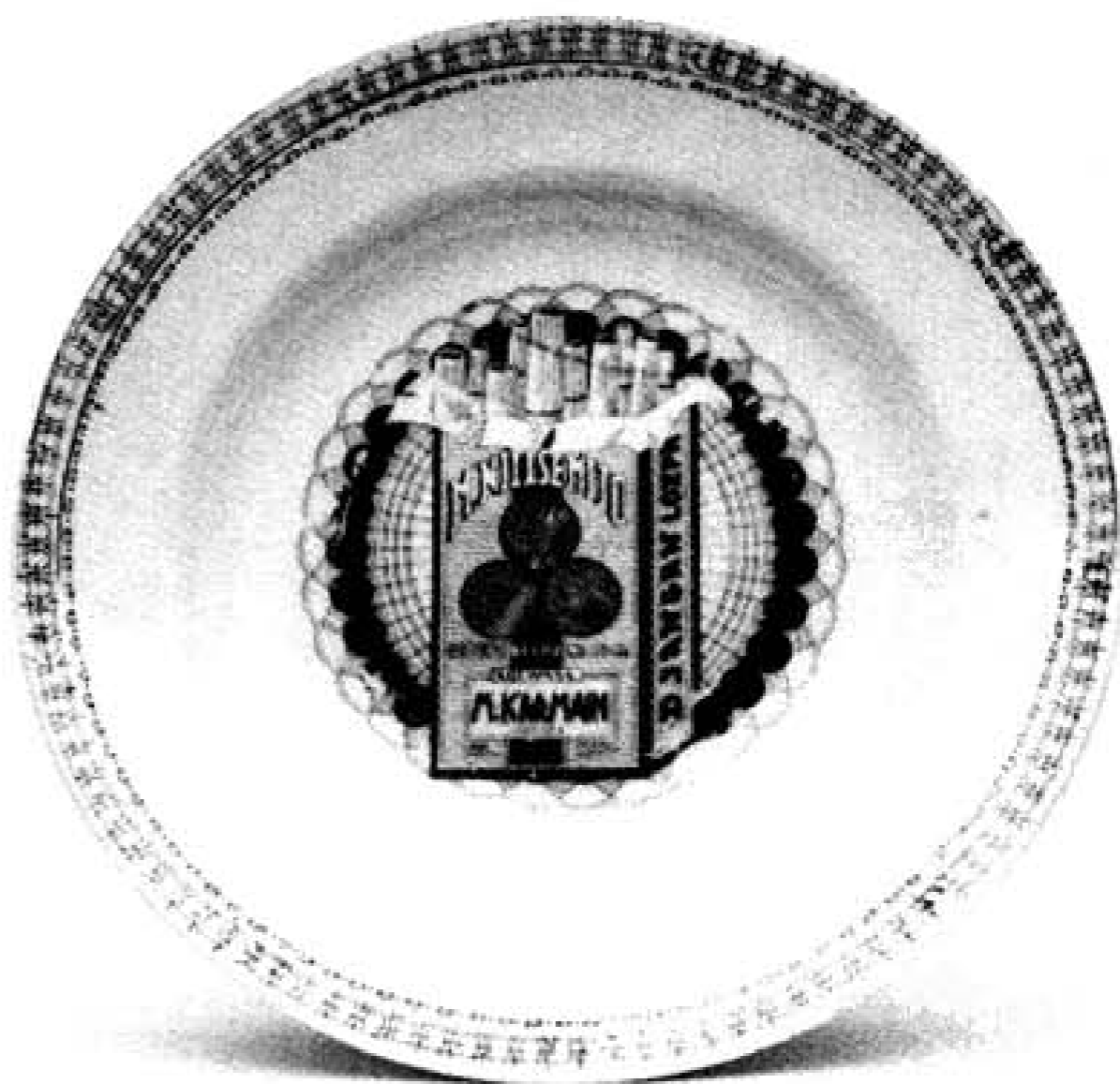


手卷丁香烟

虽然传统的“白烟”（如由英美烟草公司和乐富门公司制造的香烟）仍是多数消费者的吸烟选择，但是三球牌香烟的成功促使其他公司也在古突士建立公司或在爪哇岛设立销售点。多数丁香烟是以玉米壳包卷的，但索罗的 Mari Kangen 和苏腊巴亚的三宝麟两家公司则用纸包卷他们的丁香烟。即便今日，由三宝麟公司出品的 Dji Sam soe 牌香烟依然是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产品之一。有趣的是，每个 Dji Sam Soe 牌烟的包装盒后面都有一份声明，指出烟内有特别止咳的成分——无疑，这是对丁香烟在药房销售的时代的追忆。

1920年至1930年，丁香烟的产量迅速提高，但它们并未取代白烟的市场主导地位。丁香烟成为中产阶级的香烟，而白烟给人时髦和权威的感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侵略使丁香烟由于缺乏烟草和丁香而停止了生产。二战结束不久，印尼获得了独立，丁香烟又恢复了生产。

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丁香烟由一种有香味的香烟上升为国家的象征。丁香烟的产量和消费量不仅在爪哇岛，而且在整个印尼群岛都急剧上升。这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20世纪70年代初，原油产量的激增使政府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从而带动国内工业的高速发展，丁香



底部印着丁香烟烟盒图像的瓷碗



一家印度尼西亚商店陈列的香烟

烟产业即是其中的龙头。其次则得益于移民政策。因为政府强制将居民从爪哇岛、巴厘岛和马都拉等人口过密的地区迁移到其他岛上，移民在新家定居，自然把他们最喜爱的丁香烟也带去了，从而拓展了丁香烟的新市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允许有资格的公司购买机器，使丁香烟的制造工艺实现自动化。在此之前，所有的丁香烟都是手卷的，与机器制成的白色烟卷放在一起

显得十分粗糙。当玛琅的班图于1968年购买了第一台机器来大规模生产丁香烟时，这种情形就彻底改变了。英国制造商毛林机械公司与班图达成协议，向他提供一台机器来生产丁香烟，于是，由班图·毕鲁国际公司生产的第一批机制丁香烟于1974年上市了。

下面将从数字的角度说明1974年香烟生产的情况：手卷丁香烟，二百七十亿支；白烟，二百四十亿支；机制丁香烟仅五千一百万支。三年后，手卷丁香烟达到三百八十亿支，白烟二百三十亿支，机制烟丁香烟产量增长了四十倍以上，达到四十亿支。当其他公司开始购买机器开发他们自己的品牌时，机制丁香烟的产量已在1985年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手卷烟。^[1]

到20世纪末，丁香烟大约占领印度尼西亚整个烟卷市场的百分之八十五至百分之九十。^[2]如今印度尼西亚有超过五百家的丁香烟生产厂家，直接雇佣了十八万以上的劳动力，而间接使用的劳动力则超过了一千万。^[3]烟草工业成为印度尼西亚政府海关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国内仅有的几个在金融危机中幸存下来且几乎毫发无损的行业之一。用独特的风味招待每一位客人，是印度尼西亚最负盛名的文化象征——这从一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注 释：

[1] 印度尼西亚印度烟制造商联盟1999年年度报告。

[2] 同上。

[3] 马克·汉苏《丁香香烟：印度尼西亚的烟草文化和传统》（雅加达，2000、2003）。

牙买加大麻

爱德华·钱伯霖*、巴里·钱芬尼**

1967年，我作为一名耶稣教会教士，在一次训练中有机会与一名训练有素的牧师前往穷人区生活。我们在罗斯镇找到了住所，在那里我们得到许多拉斯塔法里教人的帮助，其中一位邀请我们晚上去他老家玩。我们到的时候好多人还没下班回家，在家的人都对我们十分热情。我们坐在大石头上，聊着日常琐事。不久，他们备好了一些大麻，圣餐杯也点上了。我们是他们尊敬的客人。我仿照弟兄们点烟的样子也点起了大麻，左手端着杯子，将烟卷置于右手指圈中吮吸着。没什么感觉。于是我继续吮吸着，仍然没什么感觉。没有看到亮光，也没有听到种子爆裂般的声音。主人拿回了圣餐杯，不断地吮吸着。他用他的努力和肢体语言作了展示，举起杯子点上火。他可能不知道和香草一起点可能是不对的，况且谁也没有告诉过他。他弹掉杂物，又重新开始。看着他的准备过程，我渐渐明白了我也应该和他们分享圣餐杯。接着其他人举起点燃的大麻烟卷递给我，其他的人们也相互传递着圣餐杯。到第二次吐出烟雾时我已经眩晕了，不得不请求一个朋友的帮忙。

我很迟才发现我已经弄湿了香草，因为我不知道水印上那个微小的洞在吸烟时必须用手指堵上才行。所以烟雾还没有漂过水面，水却渗透到草叶里了。拉斯塔法里教的信徒们的确是很好的主人，他们并没有指出我做得不对，这减少了我的负罪感。

——巴里·钱芬尼

没有任何东西能浸透，
乔兄弟强硬的说教，
他的头肿胀，
充斥着确信。

当他点燃一卷烟，
你无法阻止他，
而那通常关闭着的通向上帝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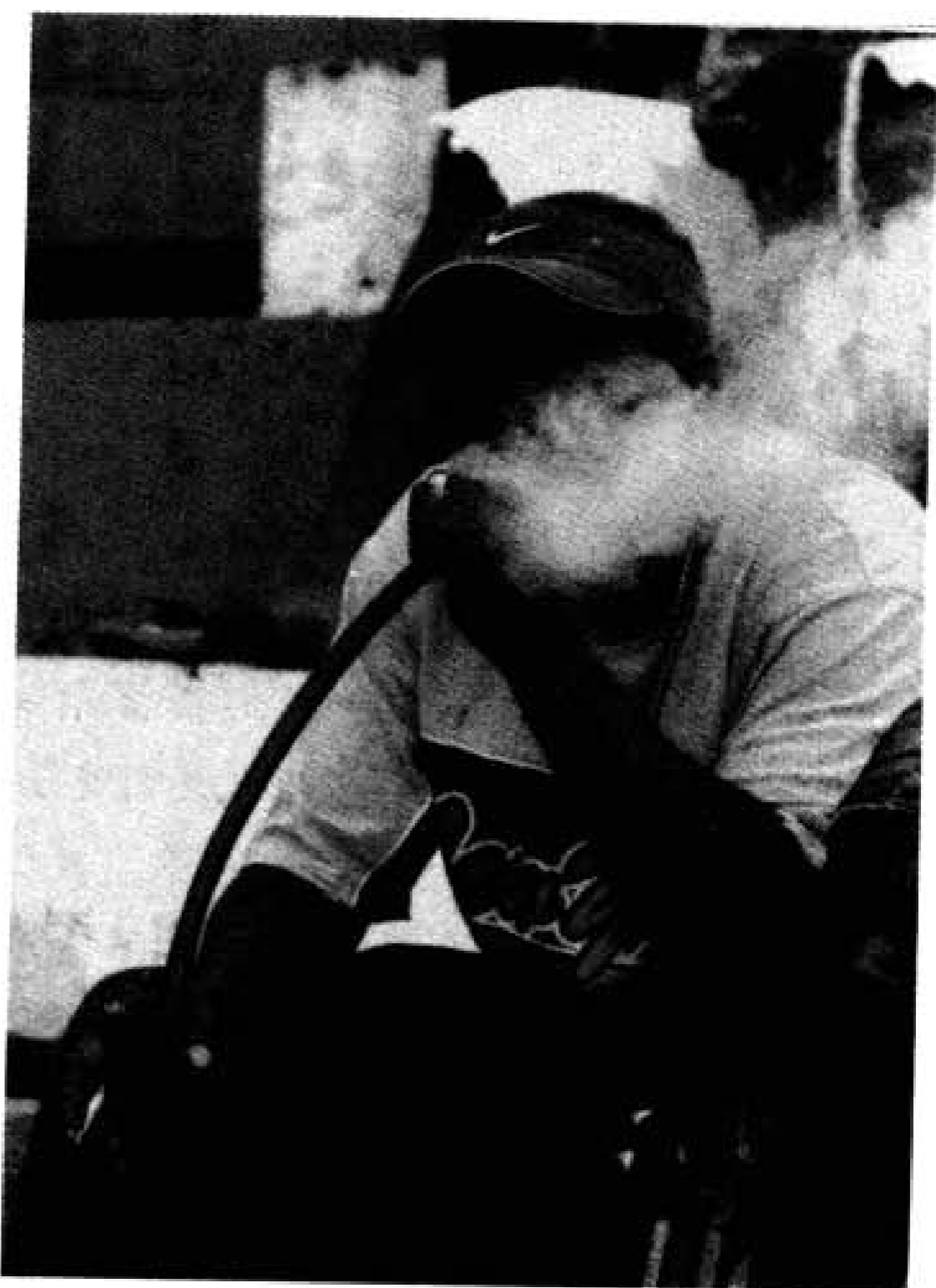
*爱德华·钱伯霖 (J. EDWARD CHAMBERLIN)：多伦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专业教授，著有《伊甸园的苦恼：白人对土著美洲人的态度问题》(1975)，《令人昏昏欲睡的成熟时刻：奥斯卡·怀尔德年代》(1977)，《归来吧我的语言：诗歌与西印度群岛》(1993)，《如果这是你的土地，你的故事在哪儿：寻找共同点》(2003)。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一直在指导一项关于口语和写作传统的国际研究项目。

**巴里·钱芬尼 (BARRY CHEVANNES)：西印第安大学社会人类学专业教授，并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著有《瑞斯特法雷部落：根系和意识形态》(1994)。最近，他当选为牙买加全国大麻研究委员会主席。

如彩虹般敞开了。

到了抽烟管的时间，
烟管已经装了水，
带着祝福交给了他，
他俯身抽烟管，
开始冗长的仪式，
阵阵鼓声也响起了。

鼓声响起，
海尔·塞拉西一世，
拉斯塔法里教的上帝出现了，
房间里充满着黑暗的力量，
黑暗的美丽，
这是乐观主义的熔炉……^[1]



在牙买加，抽烟指的就是抽大麻。当被问起“你抽多少？”时，鲍勃·马利回答说：“很多。”他并不是指万宝路、克雷文、登喜路或者雪茄烟，他指的是大麻。^[2]

与本文一开始一样，本文将诗歌、音乐以及作者和拉斯塔法里教徒的个人叙述结合起来，以展现牙买加抽大麻的历史和精神的各个方面。瑞格——拉斯塔法里教强有力的音乐表达，具有贯穿世界的影响力。许多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作家，特别是那些诗人，已经将抽大麻定位为拯救和抵御的中心。渐渐地，抽大麻演变成了一个不仅可以提高意识状态，还可以成为反社会行为的象征，并联合年青一代拉斯塔法里教徒向公民社会挑衅。在文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抽大麻变成了圣人和罪人的徽章，是庙宇的禅房和监狱的牢房的分界，本文即试图将此矛盾引入人们的视野。

巴贝多诗人卡穆·布拉斯维特的诗《白鸽之翼》，描述了大麻对穷人、绝望者和流浪

者的意义，该诗拥有圣经般的语言和伤感的语句，并指出大麻对先知的冥想的意义，表现了一个牙买加拉斯塔法里教徒带给新世界燃烧（像烟雾一样）的希望，从极度渴望和绝望中解脱的心情。卡穆致力于当代小说的创作，以及流行歌曲和宗教诗歌——类似于乔治·赫伯特和亨利·沃恩所创作的17世纪神话，又类似杰勒德·曼雷·霍普金斯和T.S. 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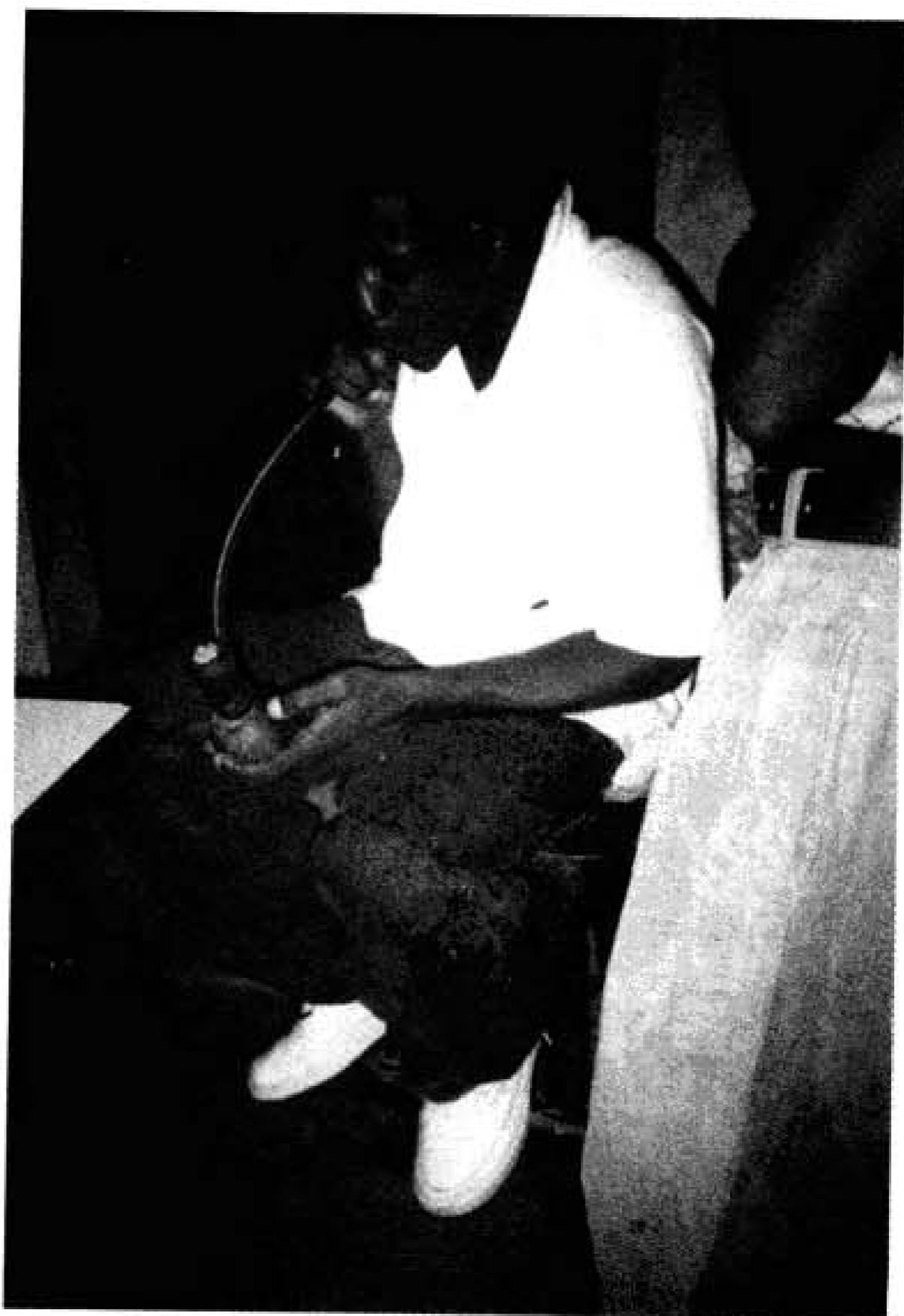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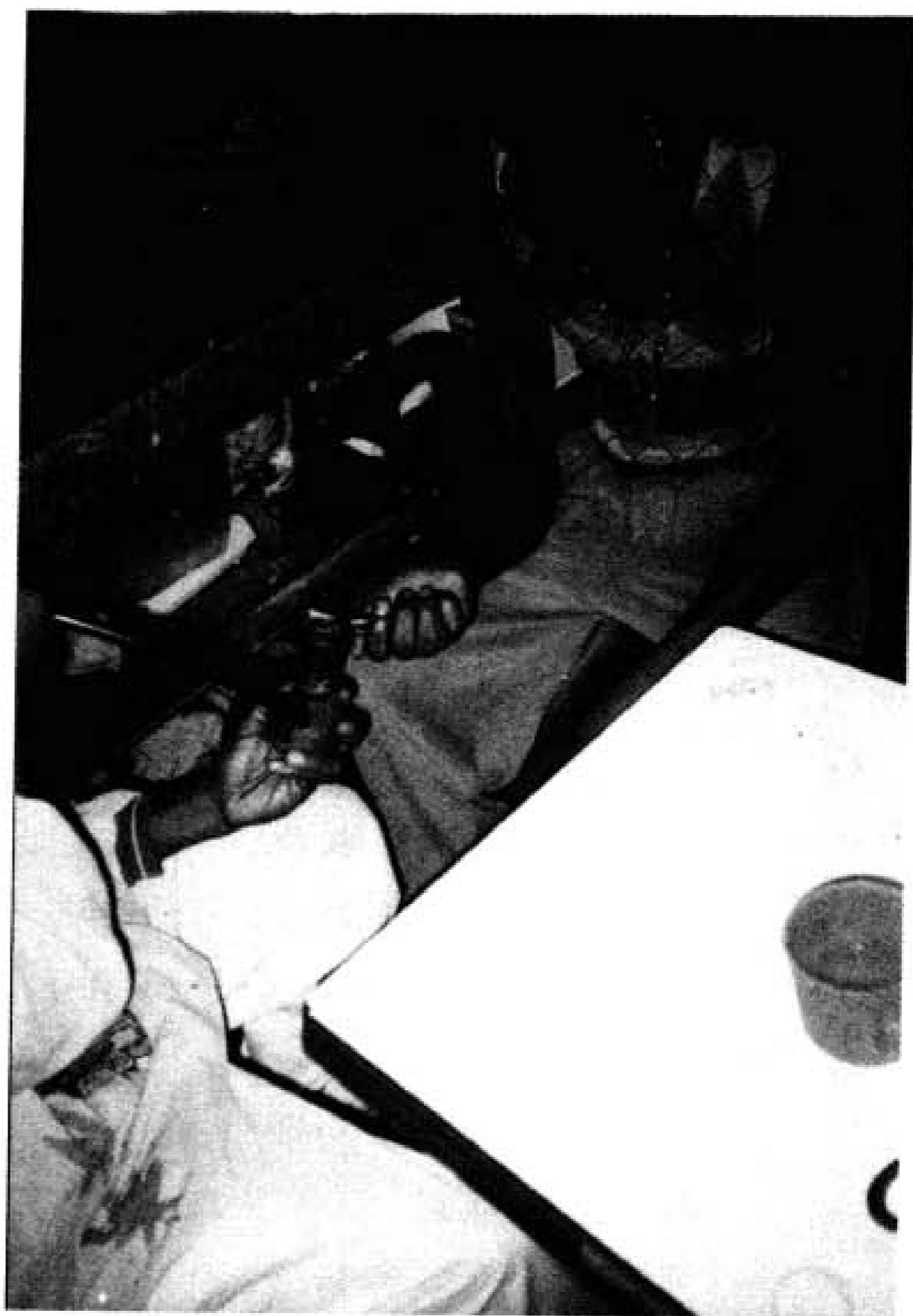


略特的现代主义祈祷：

拉斯塔法里教徒是我们的兄弟，
他胡须上布满烟渣，
头上长满虱子，
看着老鼠爬过市区的地板，
和贫民窟的厨房，
他仍然面带微笑。
穷人的健康被保佑着，
他喃喃自语，
财富该由他们继承。
谦恭热心的人们被保佑着，
他抱怨着说，
留给他们的是秘密行动。
拉斯塔法里教徒是我们的兄弟，
他头发上粘满头屑，
滚烫的头如冰块般麻木，
看着老鼠爬进他破烂的小洞，
侵犯他的宁静之地和大麻烟管，
微笑地看着老鼠的眼睛，
和滚烫的一块块浮石，
像红宝石般，
又像水晶，
突然间又如钻石一样，
在他的房间里闪闪发光。^[3]

霍普金斯在其伟大的双十四行诗《自然是赫拉克里特之火，是复活时的惬意》中，描述人类陷入苦思冥想进行的一场神秘之旅。在霍普金的诗中，对“转变”的瞬间是如此描述的：

在一瞬的闪光中，
在一声喇叭的爆裂声中，
我立刻成为圣主基督，
于是爱开玩笑的穷人，
他的陶瓷碎片、烧的柴火，



和不朽的钻石……

啊，果真成了不朽的钻石。^[4]

受到启示的这一刻是颇具宗教性的，毕竟宗教是拉斯塔法里教的核心。但是对人类而言，仍然有着长期的“压迫”，这是一个颇具代表性且严肃的拉斯塔法里教双关语，在这里，压迫的意义和呼声是一致的。

而我，
一个拉斯塔法里教徒，
在这个大而富庶的巴比伦城市，
在月亮和圣餐杯的和平感染下
变得狂热，
我，作为预言家和歌唱者，
贫民窟的蹂躏，
守卫着丘奇城和杨城，
带着痛苦起身走过现在安静的
街道，
鹰的双眼锐利中透着恐慌和友爱，
我听到我的子民在哭泣，
在呼喊：
那就击起鼓来吧，
展开翅膀，
飞翔起来，
滑入云霄，
消失在上帝的荣耀中。^[5]



大麻作为抽烟的对象和文化意义，在牙买加仅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一般认为大麻是被印第安人的契约佣工带来牙买加的，这些佣工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前叶开始移民。在此之前，无论是在历史记录还是口头传播中，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大麻已为众人所知并使用。^[6]

在印第安人眼中，抽烟是一种有性别区分的活动，只有男人才抽大麻，他们用“Kochi”和“Saapi”来抽。“Kochi”是指漏斗状的容器，里边可以填满东西，最后用一块木炭卡住。“Saapi”是指潮湿的抹布，放在漏斗口小的一端，从这中间吸食大麻。女人可以抽烟草，但是她们用的是比较精致的装置，叫“Huka”，由一个装了一半水的容

器组成，上面放着“Kochi”，外边有根管子，通过这根烟管来吸入烟草。¹⁷¹

这两种方式的不同在于烟本身。使用“Huka”时，烟是通过水带来水蒸汽，而从“Kochi”出来的烟则是干燥的。“Huka”可能不是很粗糙，更接近于上流社会的使用方式。然而，一个将去蔗糖种植园工作的劳工带着“Kochi”和“Saapi”比再加上盛水的装置和烟管的“Huka”简易方便得多。

在与非洲人的文化交流中，大麻的使用很可能也随之而来。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在这样的状态下一起生活，一起工作。那些印第安人依照他们的契约得到或者买到了土地，在邻近或闲置的非洲人村庄里建起了房子。涌入的印第安人数量极其庞大，因此很难像他们在圭亚那的居住模式那样，在那里，整个村庄都是印第安人。因此，不管在蔗糖生产教区、城镇的高密度人口区，还是在金斯敦的偏远地区科克本湾，印第安人和非洲人都逐渐相互影响。

尽管如此，20世纪抽大麻仍然与印第安人的生活紧密相关。非洲人拥有大麻是20世纪的事，从种植园到农村，通过国内人口的流动，最后终于蔓延到城市。非洲人可能也已经相信了追随上帝赐予的神圣药草（大麻）的印第安神话，在民间传说的影响下，大麻成为药物和刺激物。¹⁸¹而抽烟的模式似乎有所改进，非洲只有少部分人，也就是埃及基督创建的拉斯塔法里教的一族，仍然沿用“Kochi”和“Saapi”，大多数拉斯塔法里教徒使用的是“Huka”。

抽大麻不仅有“Kochi”和“Huka”两种方法，事实上，许多人也将大麻放在今天众所周知的雪茄或香烟卷中成为大麻烟卷。这种方法是通过欧洲人传入牙买加而流行起来的，因为烟草业长期以来就是为欧洲人服务的。郊区的小农比较青睐于这种最简单的抽大麻的方法，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在小农场文化中，农民早早起来，喝过茶（一种草药），或许再吃上一片面包，就来到他种植的“灌木丛”地里。他们一直工作到凌晨，直到妻子带给他们沉甸甸的装有粮食和咸鱼或咸肉的早午餐（早餐午餐合为一餐），之后他又返回田地干活，到傍晚时分才回家。有时，农民们不是单独干活，而是和同伴以一种合作劳动的形式工作，这样的方式有好多不同的名称，比如“借一天”、“早晨运动”、“挖掘”等。当有一个大的队伍时，活动形式就会发生转变。那些在旁边做饭的妇女和出力的孩子们把玉米和豌豆的种子颗粒洒入男人们挖好的小洞中。这个时候，男人们就会唱起挖掘歌，在喊叫和回应中干活也成了娱乐，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也要讲讲故事，说说笑话。

在农民们准备重返工作前，会卷起烟卷抽一口当作休息。他们需要大麻来刺激他们更卖力地干活。大麻和卖力干活的关联受到文化条件的影响。鲁宾发现，那些重返工作前吸烟的小农确实更有力气干活。今天的工人们随意地抽着大麻烟卷，这样的情景出现在建筑工地上、码头区、车间内。这样的工作氛围引导着牙买加工人们继续抽着大麻。有人认为大麻使他们注意力更集中，因此经常会看到工人嘴上叼着烟安静地干着活。

在大麻与拉斯塔法里教徒结合、拉斯塔法里教徒与瑞格舞结合之前，只有印第安男人是为了娱乐而抽烟。下班后，他们享受着香烟，在小提琴、鼓和铃等乐器伴奏下，唱着民族歌曲和宗教歌曲。这样的聚会使人们重新确认他们的文化遗产，把人们作为一个

社会团体结合在一起。非洲人赋予大麻一个完全不同的、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交用途，其专有意义确信无疑。现在，人们为了娱乐使用的大麻很大一部分限制在露台使用，而在政治性的集会和舞会中，有人也会公然地将其加入烟卷里享用。

20世纪50年代早期，第二代人开始沿袭上一代的作风，他们不再像拉斯塔法里教徒那么有远见，而是变得容易妥协、唯唯诺诺。他们首先掀起一股冲着白人殖民统治者挑衅的热潮，这些白人压迫非洲儿童，令人发指。在运动中，他们成为众所周知的“英勇战士”（Warriors），也就是肯尼亚当地语言中“Maasai”的意思。运动之余，他们满意地接受了流浪者的头衔。态度很快变成了角色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一篇新的演讲和恐怖的谈话很快出来了。“我”（I）这个主语取代了“你”（You），所有上帝的孩子叫做“I an’ I”，他们把大麻当作圣餐。所有的这一切发生在他们论证的循环中，印第安人的习惯慢慢转变成牙买加人的习俗。

2000年9月，牙买加举行了一场全国大会，探讨个人使用大麻是否是非刑事行为。在大会收到的众多提议中，一位代表拉斯塔法里教的发言人适当地概述了大麻在宗教典礼中的礼节功能。从他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拉斯塔法里教已经把娱乐活动中普遍使用的大麻发展成盛典般的优雅和力量。拉斯塔法里教坚持认为大麻对于本教正如面包和酒对于基督教一样，用酒是酒精饮品的事实为自己辩护。基督教徒通过消耗面包和酒来与上帝进行密切联系，拉斯塔法里教徒则通过消耗烟草达到与上帝的连接。然而，这样的连接是神圣的认知，或者是通过由烟草导致的个人冥想所传输的见识。若没有反省和内心的搜索，烟草在盛典中的力量就毫无意义，也就不存在魔力，不存在信念的飞跃——如留意面包和酒的圣餐的变体。每一个仪式中的抽烟行为必须使信徒变得更有见识，从而更有力量、更接近上帝。^[9] 鲍勃·玛尔说：“如果没有烟草，你仍然可以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但是即使你走进森林，还是有飞翔的鸟儿的声音干扰。如果你有烟可以抽，那就好了，鸟叫声也会听起来更悦耳动听，烟草可以帮助你冥想。”^[10] 他在这里指出用大麻来提升意识和注意力的想法。

因此，论证在一场无止境的改革中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拉斯塔法里教徒使未揭晓的外在事件和进程开始



循环，通过这些上帝的意愿和构思体现了出来。通过论证，一个每日反思的马赛克式模式被建立起来，每个小格子拼凑起来从而产生一幅蕴涵态度、姿态和原则的图画。

还有另一要素，即利用大团结对抗社会的腐败。正如鲍勃·玛尔在1976年6月的一次采访中所说的：

烟草就像水果，让你保持健康、思维敏捷……
因为魔鬼不愿让人类一直思考，所以它让抽烟非法化。
我的朋友和我一起抽烟说他也有同感，
你知道吗，我们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巴比伦所害怕的，
是人类的想法如此一致。^[11]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麻的非法行为是它力量的一部分，它代表着对权威的挑战，并且通过当代社会狭窄的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进行价值传递。鲍勃·玛尔还说：

权威人士告诉你禁止抽烟缘于吸烟有害健康，
甚至一旦他们抓住你吸烟，
就会把你关进监狱。
我认为自由地抽烟好过被关进监狱。^[12]

但事情并非总是如人所愿，在安东尼·麦克尼尔所作的关于乔兄弟的诗中，涉及到了巴比伦。整个房间可能充斥着“黑色的力量和黑色之美，以及乐观主义的大熔炉”，但是，

法律可不这么认为，
这个夜晚巴比伦把乔兄弟抓走了，
把他送入囚犯工厂。

谁来拯救乔兄弟啊？
海尔·塞拉西一世远在千里不能前来关照，
许诺的船只远在百万光年的自由港。

房屋里的鼓声比往常更悲哀，
兄弟们用力地吸着管子里的烟：
黑夜结束之前乔兄弟变成了一名烈士。

但他仍然在监狱里；

只有赏识他为人的女人，
在今夜拒绝了睡眠，
雇佣一位律师展开真实斗争。

同时，乔兄弟在发霉的牢房里，
出于习惯，
竟喊出魔力的咒语：
海尔·塞拉西一世啊！上帝啊！
但那扇牢房的门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始终紧闭着。^[13]

牙买加的诗人和小说家都被两个关于大麻的故事所吸引，其中一个令人欣慰的、带有赎罪性质的，另一个则是忠实于现实世界的，其中有坏事发生，有烈士牺牲，还有监狱的存在。这揭示了存在于庙宇的禅房和监狱的牢房之间的矛盾，以及存在于精神的退却和罪恶的限制之间的矛盾。有趣的是，大麻在牙买加人的生活里协调了这两者的矛盾，它不仅和反社会行为，而且和宗教启示都有着强制的关联，提出了长久以来存在的关于这一切从本质上是否一致的问题。在一首描述牙买加的埃塞俄比亚教堂长老、直觉派画家布朗的诗中，古迪荪描述了他居住的种植大麻的地方，其风景的真实就像艺术家想象中的那样：

一位长者，一位艺术家，
一位潜心研究默里山脉圣安娜的拉斯塔法里教徒，
那里到处都是小羊面包屑。
他描绘着生动的梦境，埃塞俄比亚科普特人的风景，众多的山脉，停留的云彩，
顷刻间雨下起来了，并带来了天使。^[14]

这首诗也歌颂了大地的青春，这种祝福是复杂的：一方面有呼吁加入流浪者的声音，这些流浪者居住在巴比伦法律之外，避免了世俗的责任，这是古老的呼声；另一方面，大麻提供了隐秘的解脱，古迪荪在汉诺威教区的公牛海湾捕捉到这样一个场景，伴随着每天的喧嚣，抽烟和梦想合二为一：

这里有一位母亲，
在给婴儿沐浴。
婴儿浑身湿透，
伸展着手臂，
顺从的身躯，
在盐水中若隐若现。

一个孩子用沙子盖房子，
在指间测试着沙子的纹理。
有时她停下来，
充满幻想的清澈的眼睛，
凝视着大海。

有一个青年，
刚刚从一间仅一人高的房间里，
走了出来。
他坐在一棵，
可可梅低压的枝杈上，
抽着烟……
以至房间的顶部可以触碰到天空，
仿佛他的梦境，
活泼地在眼前呈现。^[15]

在一首题为《没有受难者》的诗中，另一个牙买加人丹尼斯·斯科特描述了受难者的境况和对他们的慰藉。受难者在牙买加语中指那些黑人中的穷苦人，主要居住在金斯敦肮脏的贫民窟里。许多西印第安人的诗的韵律和措词与传统的英国抒情诗有联系，但在语言和句法方面却显然是牙买加风格的。“Mabrak”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黑色闪电的，也是早期拉斯塔法里的诗人杰瑞所作的著名诗篇的题目。虽然“恐怖时刻”对非牙买加人意味着令人恐惧的时刻，但对于牙买加人来说，却有它的特殊意义，即巴比伦的启示录和拉斯塔法里教的启示录。“血鼓”在由大麻引发的恐惧和迷恋的交锋间响起。“异文”一词指诗人用自己的语言对故事进行叙述，但这个词在牙买加语言中有个特定的含义，即用乐器对瑞格舞进行诠释。现在的DJ则常用自己的独特语言取代乐器的敲击。“自我认可”这个短语在当地语言中有着丰富的联想：可以指所有加入拉斯塔法里教、崇拜上帝的人的“尊严”，可以指上帝“意识”到了受难中的子民，还可以指大众的集体存在和相互之间的“认可”。



没有受难者

在我淌着汗水的骨子里，
天国似乎很遥远，
我有我的解读：
血鼓是如此的坚持不懈，令人振奋。
让我有活下去的希望，
正如你一样。

我们有无尽的贫困，
当自我将爱耗尽，
心灵在燃烧，
就像篱笆后面熊熊燃烧的火焰，
饥肠辘辘地在城市中
荒凉的街道上游荡。

在我生命中的恐惧时刻，
任由人性捆绑着我，
远离强光，
远离黑色闪电和我渴望的安全之岛，
找回了自我。^[16]

斯科特的诗体现了抒情诗的文学特点——生动，也体现了如同生活般平淡的演说的可信度。诗中用到诸如“dread time”（恐怖时刻）的词语，这是拉斯塔法里教的牙买加人反映宗教、政治和哲学信念的一种原始形式的秘密语言，它对真正的信徒构成了限制。目前，恐怖语言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牙买加年青一代中。在20世纪60到70年代间，在伴有瑞格舞的抒情诗中，恐怖言语的使用逐渐明显且流行起来。现在，恐怖交谈在正统教育中与较为早期的当地方言拥有同等的地位。“去年，中产阶级的父母流着汗祈祷不要再有儿子变成拉斯塔法里教的人，满嘴恐怖语言”，牙买加语言学家维尔玛·波拉德指出，“现在对恐怖语言的反对主要是在审美、虚伪的教育的层面上”。^[17]一首题为《我的儿子，拉斯塔法里教徒》的诗再一次从某种程度上涵盖了同样的主题。诗的语言表现出了拉斯塔法里教徒的语言，呈现出一幅独立的画面，同时也传达了一位母亲目送儿子远行的场景，呼唤中的声声嘱咐此起彼伏，特别令人感慨的是那彼此分别的遥远距离：

我的儿子，你现在成了拉斯塔法里教徒，
就像十八年前你所期待的那样。

叫你一声以马利，
你必须忘却曾经拥有的自豪，
当你的祖父用手轻拍你的头，
并赐予你他的名字！
现在你却说你叫罗斯！
耶稣基督给你取的是以马利，
哪里是罗斯？

当我请求你梳理你的头发，
然后回去工作，
你把你的母亲叫做“女儿”，
还说我吝啬！
你禁锢了你的大脑啊我的儿
子！

你呼唤着海尔·塞拉西一世，
一位上帝，
他赐予你一切！

你梦到了埃塞俄比亚！
你做梦的时候，
是否在寻找年幼时候的你？
我知道母亲的乳汁是甜美的食物啊！
你却这样禁锢了你的大脑，
学校里的孩子都这么邪恶！
啊！你给他们教育，
让他们出色，
正如上帝给予你的一样！
你说上帝指引你到了山颠，
是为了在那野草上冥想，
多么神圣的词汇！
当他呼唤你，我的儿子，
我会走上某个地方，
某个你能看到我的地方，
我会说：“亲爱的儿子，带着爱前进吧！”
然后我声声叫骂！^[18]



在《上帝的动物园故事》中，圣卢西恩诗人肯德尔·西波里特使用了拉斯塔法里教

的语言和肖像，其中包括犹太的狮子，拉斯塔法里教的红色、绿色和金色以及当地词汇，如“Jamdung”（牙买加）和“Dungle”（污秽物的一种译法，金斯敦现在被毁坏的贫民房的名称。），这些词汇是用来指拉斯塔法里教徒在 20 世纪 70 年代恐怖时期的经历，从宗教意义上说，那是一段没有黑色闪电的黑色困难时期。

阴间的污秽物恐怖地说：
“狮子！”
闪现出不同的颜色，
头上带着轰隆的雷声；
任何心死的弱势力，
试着动摇他的信念，
或者打破他的正义之根，
他谴责地震；
阴间的污秽物恐怖地怒吼：
“拉斯塔法里教！”
红色、绿色和金色的彩虹，
从牙买加升起；
驱散天空白色的薄云，
停留在埃塞俄比亚……
但是现在，就是现在，
神秘的土地上的造物令人恐慌，
它改变了颜色……
红色、绿色和金色的彩虹。^[19]

一开始的时候，拉斯塔法里教的运动并没有追求大麻的刺激。他们开始追求大麻的刺激是在接管牙买加之后。拉斯塔法里教谴责牙买加对非洲人及其后人的诽谤，驱除了种族歧视和偏见的魔鬼，在存在论的基本问题上与之辩论。他们升华了马科斯·加维泛非洲主义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反抗的核心问题就是自我，黑人的自我，大写的“*I*”，以及“我非我”。于是“自我”重新评估、重新融合了，抛开了原先的“自我”和“上帝”。正因如此，拉斯塔法里教徒有了无穷的力量，形成了艺术和哲学意识。谁会说这一切人世和出世的觉悟不是在大麻的烟雾中形成的，崇拜者升华成了万能的“自我”？

注 释：

感谢本文所引用的诗歌的版权所有者。

[1] 安东尼·麦克尼尔《歌颂哥哥乔》，《生命的电影》（金斯敦，1975：29）。

- [2] 鲍勃·马利《用他自己的话说》(伦敦, 1993: 82)。
- [3] 卡穆·布拉斯维特《白鸽之翼》, 收入《在到达之际: 一个新的世界三部曲》(牛津, 1993: 42)。
- [4]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自然是一个复苏的安适和赫拉克利特之火》, 收入 W.H. 加德纳、N.H. 马肯西编《杰拉德·曼利·霍普金诗集》(牛津, 1970: 105-106)。
- [5] 卡穆《白鸽之翼》, 1993: 42-43。
- [6] 维拉·鲁宾、蓝卜斯·科米塔《牙买加的大麻》(穆顿, 1976: 15-16)。
- [7] 巴里·钱芬尼《牙买加药物使用的背景》, 载西印度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第 34 号工作报告》, 第 10 页。
- [8] 阿加·曼辛格、拉客米·曼辛格《印度教对拉斯塔法里教的影响》, 载《加勒比专题论文季刊》(莫纳, 1985)。
- [9] 巴里·钱芬尼、韦伯斯特·爱德华兹、安东尼·富兰克林、罗玛·林顿、迪马里奥·麦克道尔、阿依莲·戈尔德松、芭芭拉·史密斯《关于全国大麻犯罪的报告》(牙买加信息部, 2001)。
- [10] 鲍勃·玛尔《用他自己的话说》, 1993: 82。
- [11] 同上, 第 81-82 页。
- [12] 同上, 第 82 页。
- [13] 《歌颂哥哥乔》, 第 29-30 页。
- [14] 洛娜·古迪荪《布朗哥哥》, 收入《体验悲悯》(多伦多, 2001: 63)。
- [15] 洛娜·古迪荪《卢西, 公牛湾》, 收入《对我们来说, 所有的花都是玫瑰》(芝加哥, 1995: 66-67)。
- [16] 丹尼斯·斯科特《没有受难者》, 收入《时间叔叔》(匹兹堡, 1973: 53)。
- [17] 维尔玛·波拉德《恐惧交谈的社会历史》, 收入《加勒比季刊》XXVII/4 (1982: 25)。
- [18] 安妮玛丽·杜瓦《我的儿子, 拉斯塔法里教徒》, 载《太平洋莫亚那季刊》VII/3 (1983)。
- [19] 肯德尔·西波里特《上帝的动物园故事》, 收入斯图尔·特布朗、默文·莫里斯等编《声纹》(1976: 62-68)。

吸烟和爵士乐时代

斯蒂芬·科特雷尔*

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地下俱乐部，一个小型爵士乐队在为—群不太专注的观众演奏，一阵阵细小的谈话声时常被玻璃杯碰撞的叮当声打断，这恰好为音乐家们提供了低和弦，让他们编制出即兴的旋律。整个过程中笼罩着浓厚的烟幕，这些烟幕并没有因空调徒劳的吐气而有丝毫减少。钢琴家的前额挂满了汗珠，嘴角总是叼着香烟，鼓手也是如此。由于他们都不需要用嘴巴工作，所以烟灰缸被小心地放置在他们的乐器上，夜晚来临之时，缸里的烟灰逐渐填满。萨克斯手和号手也同样吸烟，但是他们得等到另一个人单独演奏时才能吸上一口。他们的香烟嵌在乐器里，离双手很近，似乎准备在中场休息时随时迅速拽出来。

这副景象虽然看起来有点像陈词滥调，却在无数熟悉的电影里、照片上以及其他媒体中出现过。要表现一个爵士乐手时，人们的脑海里自然就会浮现出与以上情景相似的画面。就像所有的模式—样，这些景象会被美化或者被夸大，甚至掩盖了真相的核心部分。爵士乐的进化历程是 20 世纪音乐风格的典范。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它是与逐渐广泛使用的烟草制品密不可分的。香烟、雪茄甚至烟斗烟都对爵士乐手形象的产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 1920 年到 1930 年间，大麻烟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此外，烟草工业不仅通过其产品消耗影响了爵士乐的早期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吸烟相关的随身用品吸引那些拥有初级乐器的音乐家们。爵士乐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与爵士乐有关的奇闻轶事以及有关蓝调音乐家使用香烟的趣事。辛蒂·贝切特十三岁的时候，因为拥有一个时尚的乐器并在俱乐部演奏而出了名。^[1]布鲁兹向艾伦·托马斯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我跟在那个老乐手身边，直到我弄明白他的吉他的提琴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去了杂货店，他们给了我一个雪茄盒和一个木头做的大箱子。我的搭档路易斯用大木箱做了一把吉他，我则用雪茄盒做了一把小提琴。然后我去了树林，砍了一块山胡桃树的大枝干，并偷了我母亲的棉纱做了琴弓。为了得到琴弦，我和路易斯去野餐桌地和简顶房等待那个老乐手弄断琴弦。我们把断了的琴弦系起来，连到我们自己做

*斯蒂芬·科特雷尔 (STEPHEN COTTRELL)：伦敦大学黄金艺术学院音乐讲师，研究方向主要是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将于 2004 年发表其关于伦敦专业音乐制作的专题论文。已出版的著作有《乐队，音乐演奏之友和英国人种音乐学》。他还当过专业的萨克斯手，专攻当代音乐，发行过大量萨克斯独奏和四重奏的 CD 专辑。



1947年3月爵士乐之父海恩斯在纽约

的乐器上。^[2]

在美国南部贫穷的下层阶级中，雪茄盒无疑是一种值钱的资源。它可以被用在很多地方，远远超出制造商的想象。

爵士乐的起源一直饱受争议，但对于爵士乐在20世纪最初十年在新奥尔良逐步形成这一点，大家似乎看法一致。还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即认为爵士乐起源于一个位于某个小镇红灯区的妓院。那些爵士乐手之前都受雇于那家妓院，为客人表演。但这一说法也颇具争议。

当时的著名乐手本切特的影响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一样重要。他反对人们关于爵士乐起源于妓院的观点，在自传里他写道：

人们一直认为爵士乐起源于妓院，其实音乐家们只在没有固定演约或特约演出时才会去那里。也就是没有聚会、野餐或舞会时，他们才会去妓院演出。所以人们的想法绝对是错误的。对一家妓院来说，需要的根本不是真正的爵士乐手吧？^[3]

尽管本切特这么说，然而早期组成爵士乐同盟的乐手们的确一直被所谓的娱乐产业玷污，这些娱乐活动要么是违法的，要么是不道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那里的人赌博、滥交、酗酒。他们酗酒特别严重，即使在禁酒期间（1920-1933）也经常饮酒过量。这些现象都经常让人联想到当年的乐手们，这并不是什么好事。酗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毁掉了很多人的职业生涯，特别是伟大的乐手彼得斯·彼德贝克。尽管如此，对于早期的爵士乐手来说，避免这些不良风气的引诱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非法交易大多都发生在乐手们工作的地方。这些地方指的不仅是新奥尔良的妓院和其他声色场所，后来还有堪萨斯、芝加哥和纽约的俱乐部，因为许多乐手在1920年到1930年间移居到了这些地方。

当然，香烟本身并未被禁止，它的前身——大麻烟也不例外。因此，随着爵士乐风由南向北的转移，这种温和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毒品也逐渐在爵士乐手中流行起来。与黑人乐手相比，这种毒品在白人乐手中更加普遍，但它迅速在两者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4]它相对比较便宜，因为可以在自家庭院中栽培，它已被墨西哥移民和南方黑人引进到芝加哥。^[5]它因此还有了一堆绰号，如“前菜拼盘”、“麻瓜”、“茶”或“野草”，还被当成



约 1946 年 11 月，迪加哥·海哈特在纽约水族馆

雪茄来吸，美其名曰“大麻烟卷”。无论在街头、俱乐部还是在舞会上，乐手们都在抽烟。吸烟的人被叫做“响尾蛇”，诸如此类的俚语还有很多。

当时的音乐作品，如《肥仔沃勒的毒药》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傻瓜》，以及《黄金叶》、《杂草呼声》和《大麻烟》，都证实了大麻在当时非常流行，连音乐人都纷纷把它用在自己的作品中。

事实上，关于可否在表演时吸烟或抽大麻已成为音乐家集会或参加活动时广泛探讨的话题。一些偶尔在表演前吸食大麻或香烟的音乐家承认，他们的表演实际上受到了吸烟的影响。比如霍依基·卡迈克尔，他只在社交聚会中使用大麻。^[6]很多音乐家指出，使用药物会扼杀人的创造性，即使没有这么严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的

音乐表演能力及才能逐渐退化。^[7]这种观点可以从众多书籍中得到论证。但不可思议的是，仍然有一些音乐家在某些表演中不会受到药物的影响。麦兹·麦茨洛就是这样一个特例。大麻对于他来说，不仅没有影响到表演，反而使他的演出更加淋漓尽致。

20 世纪 20、30 年代，麦茨洛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他也成为爵士文化和大麻之关联的中心人物。人们当时甚至把他的名字等同于大麻，以至于人们委婉地称大麻为“麦茨洛”。麦茨洛那种阴郁而神奇的天赋也备受争议。流行乐队福斯特的低音吉他手后来这样描述麦茨洛：“麦茨洛只是站在那边发出嘟嘟的声音。我个人很喜欢他，但从音乐人的角度来说他是不会演奏爵士乐的。”^[8]也许麦茨洛让人记住的更多的是其独具个人风格的自传《真正的布鲁斯》，而不是他的音乐表演（尽管他出了很多专辑）。《真正的布鲁斯》以一种滑稽的鲁尼恩式的语言来描写他的生活时光，向人们传达他丰富多彩的奇特的人生故事。尽管麦茨洛一生都在试图根除影响他表演的民族习性，但作为白人中的犹太人，他确实很难作出有色人种音乐人那样的作品。他的作品曲调生硬怪异，缺乏自然纯美和灵魂之美，这种杂乱的噪音与令人心情舒畅的作品背道而驰。

麦茨洛经常出入酒吧和妓院，对于下层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喜好。他和大麻以及其他音乐人士的公开关系着实很炫目。他最终阐释了他对毒品的信仰，这里他把毒品称作“茶”，认为其能启发音乐人的表演：

茶使音乐人处在一个真正神秘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爵士乐者热衷于抽

大麻。你瞧不起同乐队的其他音乐人，就像一只老母鸡审视她自己孵的小鸡一般。最棒的事情就是你在弹奏的时候，你自己的伴奏在你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就像一个人的乐队一样表演。你听着主题的基本调子，自己的即兴表演酣畅淋漓……所有的调子你都一次性全听明白了。你有个这个能耐和确信，你就处在最佳状态中了。^[9]

麦茨洛对毒品的青睐显而易见，他甚至把自己对毒品的偏好与酗酒的其他音乐者相比较，不只是比较各自的生活方式，还宣称吸毒者能比酗酒者取得更多的音乐成就：

和那些总是抱着酒瓶，一喝醉就到处卖乖的酗酒的音乐人相比，我们吸毒者便是处在不同层次的人。我们喜欢毒品的简单轻松，味美温柔，不会嘈杂和土气……而且，酒鬼弹不出好的音乐，他们的调子变得难听而邪恶，不自然、不轻柔、没有灵魂。我们吸毒者就不会这样，我们弹奏的音乐很吸引人，充满灵感和想象。酒鬼的弹奏很快就变味了，而且变得肮脏，因为他们的大脑被浸泡了。^[10]

不幸的是，麦茨洛的大麻有益说与其自传的细节有些不符。他在自传中形象地描写他染上鸦片毒瘾并挣扎着要戒除的经历，但是他所说的诸多宣言都是牵强附会的。作为每天出现在照明灯下的音乐人，他所说的话是片面的。毋庸置疑的是，他在向同时代的音乐人输出大麻的行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地位更加重要。他对毒品的偏好变得众人皆知是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尽管他后来宣称要戒掉毒品，但是有人认为他仍保留着对毒品所产生效果的强烈喜爱。1971 年他去世之前发生的一些事使事实得以澄清。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用他特有的方式称毒品为“Gage”，也称其为“Mary Warner”，他在被强制戒毒时说道：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gage”更多的是一种药物而非毒品，但当毒瘾发作时，没人能控制得了它。终究，这些毒贩子在我生病时都离开了我，而我已经老得经不住毒品的打击了。因此，我不得不戒掉毒品。但如果都像 Methusela 一样的话，我们对“gage”的回忆应是充满美好和温暖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并不会因它而惭愧。亲爱的“Mary Warner”，你确实很棒，我已经充分享用过你了。但我也为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开始你只是一个“坏东西”，但经过数年，你不再是坏东西了，只是变得越来越吝啬。所以我要与亲爱的你分开，再见了！^[11]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 1930 年代逐渐成名，他也更加关注自己的形象和名誉，尤其是在他成为国际巨星之后。他决不会忘记因为使用大麻使他于 1931 年 3 月在加利福尼亚被拘留了十天，以等待审讯的到来。实际上，那时他因为这件事情成为芝加哥报纸的头版人物，并有一些记者推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将面临六个月的牢狱之灾。最终他仅仅被判了缓刑。也许这样的宽慰得归功于抓他的侦探。在后来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详细叙述中，逮捕和拘留对他来说是奇异快活的经历。他是在竞争对手的乐队老板的怂恿

下开始吸毒的。这个老板因为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表演过于走红影响到他的生意而想破坏他的声誉。警察也承认这个乐队老板在被质询时确实承认了自己也是一个大麻吸食者。^[12]

吸食大麻变得如此普遍，已经成为爵士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号手布克·克莱顿回忆了这样一个场景，当他问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如何用小号表演滑音时，阿姆斯特朗在后台的洗手间进行了一堂即兴教程：

他给了我一支烟。这是一支棕色的烟，不是我平时常见的那种。我盯着它，他知道我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所以他说“我们一起享用吧”。于是，他坐在凳子上点了火，然后吸了一口，对我说“现在我来教你”。接着他又吸了一口，面带微笑地递给我。我拿起烟来吸了一口，后来又吸了一口，才还给他。他也再吸一口，然后又递给我。我们就这样轮流把整根烟都吸完。^[13]

这些音乐家不但把吸食毒品作为社交手段，而且还会给不吸毒的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贝司手巴斯特·威廉姆在开始职业生涯前，他的父亲把他带到一边，教他如何抽大麻而又不真正吸食进去。这样他才能做到既不冒犯爵士音乐人，又不使自己染上他们的恶习。^[14]另一位匿名音乐人也有同感，认为爵士文化里有来自同行的吸毒压力：

我不会和别人出去玩或吸食毒品。我记得曾经有个鼓手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出去放松呢？你把自己和大家隔离了。”我说：“我不得不和你们一起演出，这是我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和你们有同样的喜好，和你们做同样的事情。”在一个群体中，没有人喜欢与自己没有共性的人，并且因此感觉很舒服；但如果我为了让别人看我舒服而吸食毒品，我自己将会受到诅咒。^[15]

这种压力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同样显著，那时海洛因已取代大麻成为毒品的首选。例如，查里·帕克的许多追随者为了模仿他而分享其对毒品的喜爱——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盲目偶像崇拜导致的悲剧。尽管大家常说大麻和其他许多无害的以娱乐为主的药品一样不会上瘾，但是爵士乐人与毒品的关系以及毒品让音乐人产生兴奋感的描述证实了吸毒是会成瘾的。

实际上，从爵士乐的进化方面来看，在任何特定的时期，爵士乐人都在使用甚至滥用毒品。新奥尔良传统的活跃和乐天被酒精这个中间角色传承了下来。而像里斯特·扬这样的吸毒者能即兴弹奏出更柔、更梦幻的曲子，是因为受到大麻引起的美好幻想的影响。波普爵士乐不和谐和狂乱的曲风是使用海洛因导致精神错乱的产物。海洛因在战后几十年间破坏了爵士乐人的生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勒瑞·戴维斯还有约翰·柯川，他们后期的作品都退步到清洁工的水平。音乐人和艺术家也开始批判以前滥用毒品和酒精的生活，转而寻找一种不那么依赖毒品的生活方式（尽管柯川一直使用毒品直至去世）。

爵士乐人使用毒品的现象越来越少，因为音乐人越来越有健康意识了。^[16]但是，偶



卡托尼在吹萨克斯，右手拿着一支香烟

尔还是会有人在爵士乐俱乐部的后台吸毒，烟雾上升，在小爵士乐队的观众席上方浮散开来。

注 释：

- [1] 大卫·佩里《伟大的爵士乐》(伦敦, 1994: 77)。
- [2] 艾伦·托马斯《蓝调的发源地》(伦敦, 1994: 428)。
- [3] 转引自罗伯特·戈特利布编《品读爵士乐: 1919年至今的自传、报告文学和批评文集》(伦敦, 1997: 139)。
- [4] 伯顿·瓦特《爵士乐的发明: 美国城市的音乐、宗教与文化》(以色列乌巴纳, 1992: 139)。
- [5] 同上。
- [6] 霍依基·卡迈克尔《星尘道》(纽约, 1946: 53)。
- [7] 瓦特《爵士乐的发明》, 1992: 140-141。
- [8] 波普·福斯特、汤姆·托马斯《波普·福斯特: 一位来自新奥尔良爵士音乐人的自传》(伯克利, 1997: 167)。
- [9] 麦茨·麦茨洛、伯纳德·沃尔夫《真正的布鲁斯》(伦敦, 1993: 74)。
- [10] 同上。
- [11] 马克斯·乔安、约翰·克林顿《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故事》(圣阿尔本斯, 1975: 138)。
- [12] 同上, 第133页。
- [13] 引自戈特利布编《品读爵士乐》, 1997: 139。
- [14] 保尔·伯利纳《爵士乐的思考: 无边的即兴艺术》(芝加哥, 1994: 40-41)。
- [15] 同上, 第438页。
- [16] 同上, 第4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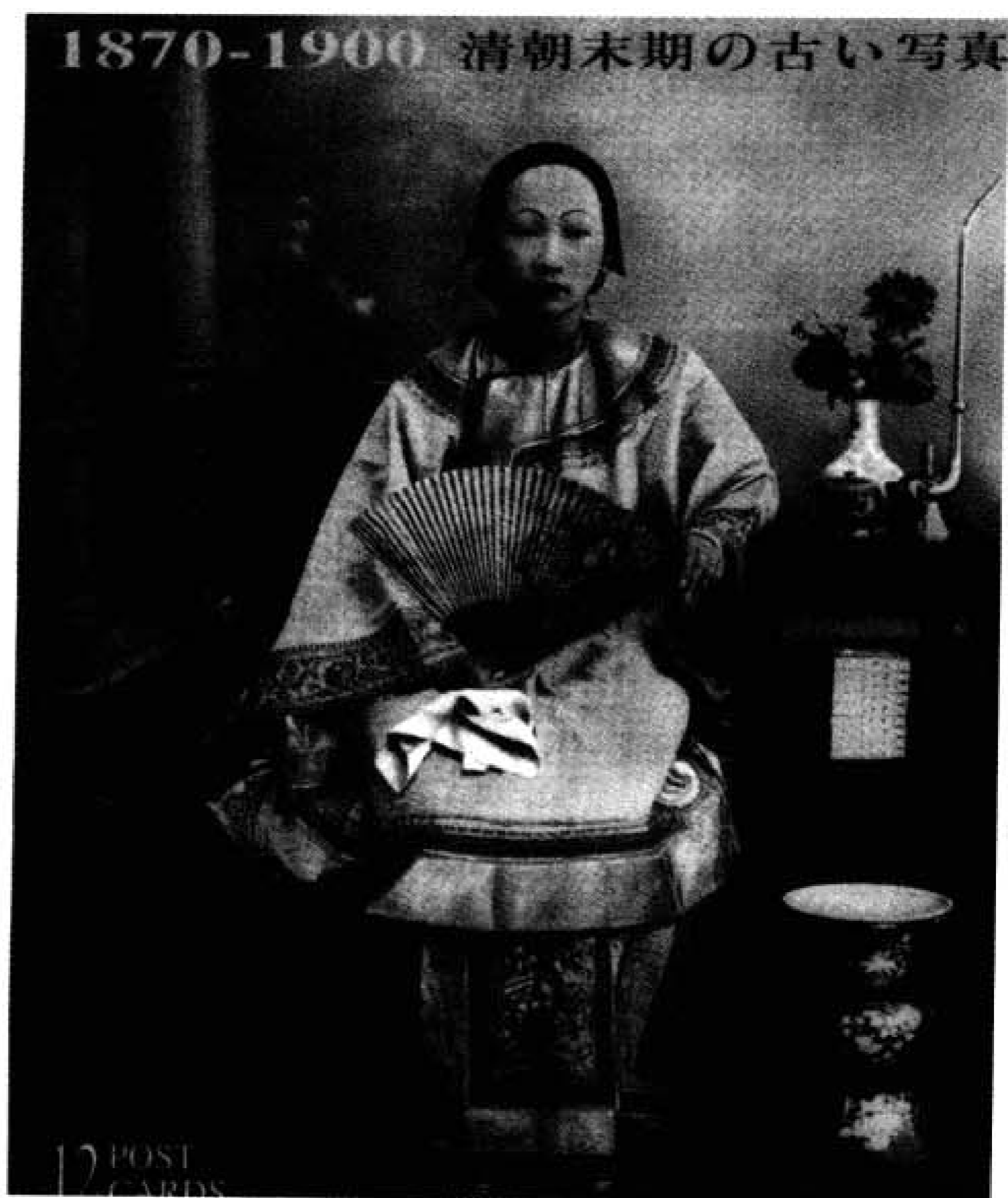
近现代中国的吸烟状况

周 迅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逐步转向消费社会，而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消费市场，这一切严重动摇了这个封建帝国的统治根基。^[1]在这个帝国近乎瓦解的时候，过多的鸦片消费成为帝国灭亡的致命因素。吸食鸦片是使国家崩溃和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也使得军队萎靡不振、士兵精神涣散，导致产生了太多闲置而又没有足够劳动力的人。^[2]吸食鸦片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恶疾，一个与国家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话题。但是，这一恶疾不是西方殖民者传染的，^[3]而是病恹恹的中国社会的一项综合症。把它和危险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吸食鸦片已由纯粹的娱乐转变成恶习。消费者已由特权者、富裕阶层扩大到苦力、穷人、妓女、罪犯以及社会底层的人们。一个新名词——“吸毒魔鬼”——出现在中国大陆上，随着吸食鸦片者的变化，鸦片的用途和意义也随之改变。

尽管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和1860年，但是19世纪后期中国吸食鸦片的程度更加严重。据官方统计，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吸食鸦片者的数量已达到三千万。^[4]但是，这不能仅仅认为是经济后果或者权利和特权的结果，也不能简单地用社会拷贝理论来解释。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时还得考虑它的原因及后果。鉴于现代消费不断改变的模式，有许多因素必须考虑在内。同时，它既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基本变革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发生在外部世界的变革。铁路的发明不仅是一个标志，同时也使鸦片、烟草以及其他商品由国内市场向外传送。殖民扩张创造了新的共存主义并改变了世界，政治以及欧洲工业革命的联合效应赋予消费业“现代化的生命”。

和所有的商品一样，消费者的品味是决定商品质量以及种类的一个重要因素。品味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嘴巴上的感觉。19世纪末期，随着新城市中心的中产阶级的兴起，“高品位”常常与此类词汇联系在一起，如“净化”、“培养”、“高质量”或者“高贵”，而“低品位”则意味着便宜。过去，鸦片被看成是财富和权利的象征，而此时，每个人对鸦片的品味成为衡量其社会地位的尺寸，因为不同阶层的人会在价格档次和对鸦片室的选择上有所区别。清朝（1644-1911）晚期，存在清晰的鸦片消费者的等级区分，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等级状况：满洲贵族、政府高官以及富商构成上层阶级的消费者；中等阶层的消费者由中低层官员以及新城市的中坚分子如律师、银行职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构成；下层阶级的鸦片消费者包括苦力、戏子、妓女、乞丐以及罪犯。也有关于乡村地区鸦片吸食者的记载，主要是一些生产鸦片的农民们，但他们大部分是把鸦片用于医疗，同时也有出于娱乐目的的。上层以及中上阶层的消费者抽的烟是由外国进口的，也是最贵的，可想而知，其质量也是最好的。而国产货中质量最好的是云南烟。中下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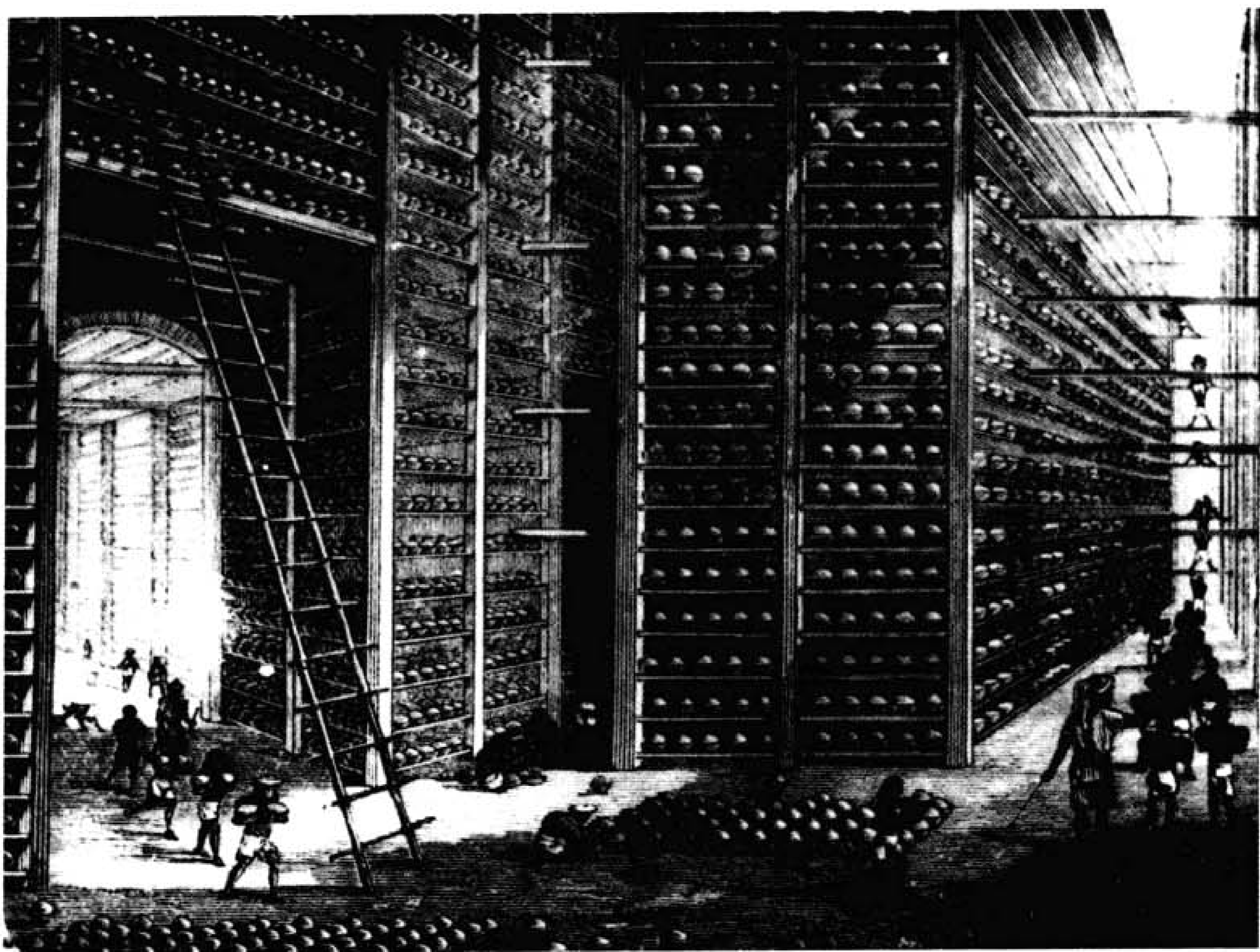
19 世纪末一个满族女和一个水烟筒

层的人一般抽的是四川烟，而更下层的人则往往吸食煮过的烟渣。

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力量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鸦片消费者选择鸦片的质量和价格上，同时也表现在鸦片的数量及消费形式上。当快乐的理念继续在一些鸦片吸食者中风靡的时候，它也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的娱乐方式。工业社会赋予“奢侈”新的概念，它是定义时光隧道和随之形成的新型城市社会的一种新方式。19 世纪后半期中国一些海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化，过去那些社会精英和新兴资产阶级有额外的收入可支配，但现在他们必须通过工作来挣钱。过去那些中坚分子渴望快乐，他们需要在休闲与工作之间分配时间，对于这种刚萌芽的新阶级，工作是和纪律、秩序、组织等积极上进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休闲也代表着自发性、无秩序、放松和自由。休闲是伴随人们个性发展，衡量其财富和地位的一把尺子，也是导致浪费、自甘堕落的原因。它成为休闲的自由的表現，也暗示着甚至工薪阶层的成员在允许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参与进来的。

休闲与工作的分离也意味着娱乐活动必须在工作场所以外的地方表现。当老精英们以及富人们继续在他们的私家花园以及豪宅放松娱乐时，19 世纪中期市政厅的出现给专业人士提供了娱乐场所和聚会地点。同时，寺庙、公共花园是城市社会的新标志，很快，剧院、茶屋以及鸦片馆也成为新的公共娱乐场所。^[5]就这样，吸食鸦片已成为 19 世纪后半期娱乐和休闲的一种普遍方式。

抽烟文化在中国为什么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性密不可



19世纪中期印度的一个鸦片仓库

分。为了维持对它的控制，政府以儒家思想作为其施政的基础，鼓励民众不要参与政治，只有好好待在家里，才不会挑起祸端。^[6]当教育、运动以及艺术被绅士们看成是必要的追求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资格参加此类消遣。对于大众来说，他们唯一的娱乐就是赌博、喝酒和抽烟。赌博和酒精能引起兴奋，并导致危险的活动，比如打架。而鸦片是一种镇静剂，烟草也被称做“和平草”，人们都相信它能产生美好的幻觉，达到镇定的效果，并且能起到催眠的作用。^[7]人们躺着边聊天边抽烟，烟雾在烟管中萦绕，直至人沉睡过去。确实，吸食鸦片能让许多人在家中或者鸦片馆中享受平静。

鸦片馆和鸦片窟，就像其他公共娱乐场所一样，成为公众交流的场所。不同层次的鸦片馆和鸦片窟用来迎合不同的人。当大多数上等的鸦片被储存起来供给那些“新的鸦片鉴赏者”时，留给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的就只是一些廉价的东西。鸦片窟成为他们的家，一个用来吸食鸦片和逃避生活苦难及城市生活压力的避难所。“那些在地狱中挣扎着生存下来的人，只要他们能得到鸦片，能把鸦片送至他们的嘴中，他们就会立即忘却所有的疼痛和苦难。”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鸦片给痛苦的人们带来了解脱，也给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工薪阶层的生活带来了变迁：“人们回复到平静状态，战胜了不安以及对贫穷的恐惧，扼杀了对痛苦往事长久的记忆，告别了煤灰色的脸和犁。妇女们对碾磨的贫穷生活已经麻木，她们生活并工作着，在挣扎中养着家和丈夫。”^[8]对于中国清朝末年的许多苦力来说，为了重新振作起来，吸食一点点鸦片粉也是必要的。



约 1900 年在广州的一个鸦片窟里

和经过设计的鸦片窟一样，许多旅馆也设有类似设施，甚至临时的旅馆和咖啡馆也有。事实上，这两者几乎已不易分辨了，因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经常，人们对鸦片窟、旅馆以及饭店之间的选择是考虑他们是否能够提供其他服务。在重庆，大部分澡堂为客人设置抽烟房，虽然那儿的鸦片比较贵。妓院也是如此。

每笔交易都有自己的集会场所和拍卖中心，在哪儿吸食鸦片都一样，只是没有任何交易可以脱离鸦片而正



约 1900 年一个男子在院子里一面抽烟一面让人打理头发



雙鶴牌



20世纪30年代双鹤牌香烟的广告

常运转。在往返重庆和泸州的客船上，男孩们不断地来回提供茶水和鸦片。甚至著名佛教圣地峨眉山也是如此，和尚也卖鸦片给朝圣者、旅游者以及苦力。处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人，人们都把鸦片作为家里必要的招待物品。客人来了，不点鸦片灯是不合适也不礼貌的。许多有钱人经常鼓励儿子们抽鸦片，抽不来或者抽得不好的，都被认为是有失社会身份的。^[9]吸食鸦片也被誉为管理丈夫的一种秘方，是家庭的救世主，更是经济地阻止年轻人挥霍家产的方式。^[10]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步入了现代化进程，出现了一些现代的娱乐场所，比如电影院，游泳池等。住在城市的中国人，如上海人，会把西方的任何东西都视为现代，认为



20世纪30年代三杯牌香烟的广告

是来自异国的珍品。结果，西方商品大量涌进中国市场。很快地，投资者便发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城市居民喜欢罐头食品、奶粉、橡皮糖、洋烟和西药。对于他们而言，抽洋烟、吃西药、上电影院、购物都是很好的活动，因此鸦片的吸食以及传统的娱乐已经成为中国落后的标志。消费者偏爱外国香烟，因为老外吸烟很优雅，香烟取放很方便，很时髦，味道也很新鲜。这是现代生活的象征。自从旅游业逐渐流行起来之后，一些品牌的香烟被认为是现代旅游者最好的伴侣。一些人也开始抽起雪茄。现代城市的生活压力被认为是促使许多人追求刺激的原因。城市居民通过听节奏欢快的音乐、喝烈酒、抽雪茄来刺激他们的神经。对于那些买不起昂贵雪茄烟的人，一些厂商在烟中增加了吗啡及海洛因的含量，从而改进“淡”烟的效能。史料表明，1936年上海市场上含有吗啡和海洛因的烟就有五十多种。麻醉剂中也增加了一部分吗啡和海洛因，以减少成本、增加利润。那时的中国，粗吗啡和海洛因非常便宜，这也是吸引消费者的一种手段。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麻醉品消费市场。麻醉品的罪恶使许多人将海洛因和吗啡藏在管子里，或者通过混合的烟草放在香烟的前端。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毒害”自己而又不被人发现。香烟制造商开拓了这个市场，最终导致了官方的禁毒行动。

也有一些促销活动，例如可以先品尝后付款，或者买一送一。举个例子，买香烟经常送打火机，这在当时可是件时尚的新鲜事，收集香烟卡片也十分流行。自从香烟器皿给现代生活方式带来诸多方便后，人们开始将其视为古董宝贝。香烟卡片通常是成套的，人们经常成打地购买，一个人需要购买数百包烟才能收集到一整套卡片。小孩也轻易地成为目标人群，朱湘（1904-1933）是中国一位著名的悲剧文学家，他指出自己刻画的抽烟形象就是源于幼时收集的香烟卡片。^[11]外国香烟、打火机以及香烟卡片使传统的抽烟变成现代的追求。

由于抽烟越来越流行，香烟品牌也越来越多。为了和外国品牌竞争，中国产品被赋予爱国的口号。作为回应，外国公司（如英美烟草制造公司）使他们的设备本土化。^[12]为达到规模消费的目标，国内大规模的生产和营销被鼓动起来。聪明的促销人员通过广告来促进香烟的销量。^[13]像那些有专利的药材一样，香烟也是中国广告业的先驱者。香烟以及专利药材的广告促进了现代城市报业的发展。从上海到成都，现代城市被巨大的广告条幅所覆盖，比如“请吸一口烟吧”或“美女可爱，香烟更可爱，国内产品更加可爱。”^[14]的确，在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的语境中审视这些广告非常重要。当吸食鸦片和国家兴衰、家庭不幸联系在一起时，它就会被看成是种族堕落的一种威胁，于是香烟广告求助于提倡健康现代的生活方式以及民族主义。举个例子，有这么个广告画面，一位穿着时髦的家庭主妇递给丈夫一根金龙牌香烟，丈夫坐在现代沙发上，穿的是传统服饰。腊耶巴娜香烟的特色在于图面有个健康的黑肤美女，声称能恢复活动，减少疾病。^[15]

许多广告在使用妇女形象上十分引人注目。一看到古典的中国美女，人们就把她与现代女性赤裸的身体联系在一起。这些形象不仅仅作为一种神秘的物品来吸引男性消费者，在现代中国还代表一种新的美学趋势。她们是肉体的化身，是中国现代作风的一种新的形象。人们响应这种观点，即中国的现代化会反映在新城市妇女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根据中国现代一些男性精英的说法，中国妇女在传统社会是受压迫和压榨的一类人。她

们是纯洁的，但是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在现代中国，一个新女性必须远离家庭，成为一个公民。她不再牺牲自己来拯救她的家庭，但可以拯救国家，为社会作贡献。换言之，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每个中国公民都必须具备传统妇女的美德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美德被看成是现代化的根基。^[16] 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妇女几乎不抽烟。传统的信念是妇女拥有美德，而男子保留的是恶习。在传统中国，妇女们在家中抽烟，更进一步地体现了她们的无聊和受挫。抽烟被认为是一种奴役的象征，而独立的现代女性必须摆脱抽烟的枷锁。她们要离开牢笼似的家庭，全副武装来服务社会，建立舒适的家庭，养育健康的孩子，并且为国家的进步作出贡献。

除了妇女形象，流行的传统风格的新年图片被广泛地使用在广告上，以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忘记国家的遗产，同时吸引更多的吸烟人群。香烟制造商也最早认识到广告标语、标志性图标、商标、名人效应的力量，以及社会地位的吸引力和保持永久吸引力的必要性。随后铁路、蒸汽船、电报以及电信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国内甚至国际市场显著增长。战争以及经济移民的风波给国家带来了新的消费者。举个例子，上海的人口从 1937 年的三百万迅速增加到 1938 年的六百五十万。刚到上海的人没有太多钱，但是他们也经常挤出点钱抽香烟。批量生产使得香烟卖价便宜，人们支付得起。与鸦片相比，香烟是合法的，且随处可买到：在每条街道的店里、茶馆、电影院、剧院等地方均有销售。如果在 20 世纪早期香烟仍是现代精英人士的商品，那么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香烟就变成了大众消费品，其消费者不仅仅包括颇具现代都市风格的人，也包括传统农民。有个中国记者在 1934 年写道：“中国许多农村地区仍然不知道究竟谁是孙中山，但是却很少有人不知道露比女王牌香烟。”^[17]

虽然在 1949 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废止了许多古老的陋习，但是仍然鼓励人们抽烟，鼓励烟草工业的发展。如今，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吸烟者生活在中国。经过政府的整顿，香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正常化。1949 年到 1979 年期间，政府宣称香烟上虽然没有标注健康警句，但也不把它作为资产阶级的享受。大多数共产党高层官员抽烟抽得很凶。邓小平甚至说吸烟是他长寿的十大秘诀之一。^[18] 邓小平逝世后，香港英语畅销书作者 Nury Nittachi 开玩笑说：邓小平享年九十二岁，让我们从中得到教训，他死于吸烟。

抽烟激发了力量和声望。它在社会关系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抽烟是社交的必要，中国是一个爱好抽烟的国度。我们热情地给客人提供香烟，并且礼貌地接受别人递过来的烟。香烟是最受欢迎的礼品之一。举个例子，在毛泽东时代，香烟以及毛泽东的小红语录被用来当作结婚礼物送人。香烟也是一种形式的货币。在早期，香烟可用来购买火车票、食物以及药材。如今，香烟能买来驾驶证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在中国如果没有这么一条香烟的话，“一个人将寸步难行”。抽烟也在性别身份的构建方面起着本质的作用。抽烟是男子气概的象征，有人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不抽烟，那么他就过不了有意义的男人生活。”而如果女人抽烟，却被认为是没有品味且不合适的。^[19] 更进一步地说，抽烟是一个人才华的象征，就如这么一句流行语所说：“如果你的写作很粗糙，那么让香烟为你润色。”



20 世纪 30 年代老刀牌香烟的日历海报



2004年北京一家商店里的香烟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抽烟是很酷的行为。大众媒体被明星和名流们抽烟的形象所蒙蔽。抽烟已成为中国少数前卫群体的象征。一个人的价值和财富能通过他（她）所抽的烟来体现。抽烟是成为专业人士的必需，因为很少有生意能够在没有香烟的情况下进行下去。越来越多的职业妇女开始有抽烟的习惯。香烟代表着灵魂的叛乱，也能为丢失的灵魂找到舒适，正如一首流行歌曲《奇怪的烟》的歌词所写：

妈妈睡着的时候，我爬到门外，
走向那奇怪的烟，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仿佛飘上了天堂。
爸妈的钱都买了奇怪的香烟，
我被快乐所引诱。
奇怪的烟让我晕眩，
我生活在梦里。
我醒了，向周围看了看，原来如此啊！
邪恶的命运向我展开了双臂，
我哭到眼泪流干。
爸爸妈妈必须遭受这些吗？
他们生命的希望必须因此而粉碎吗？
妈妈，把我抱回您的怀中吧，
将我从奇怪的烟中拯救出来吧！^[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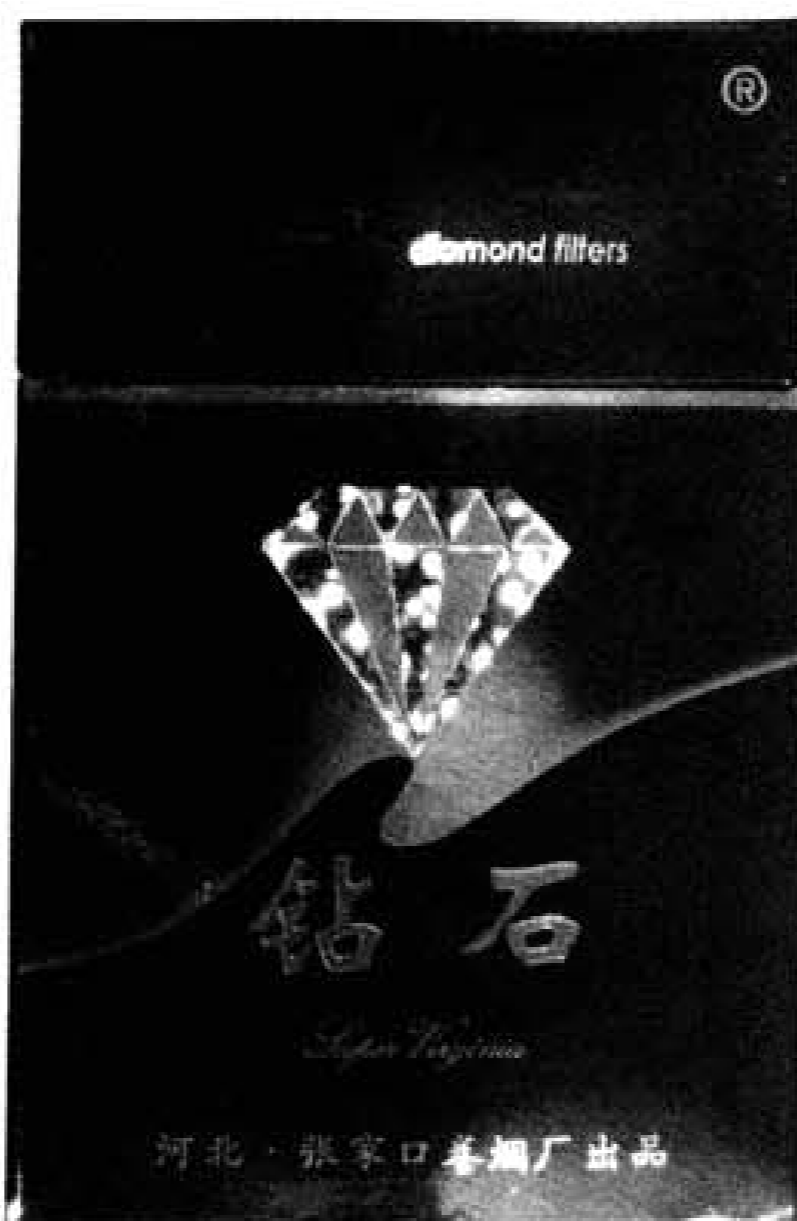
消费者主义在中国继续扩张，曲荡回肠的歌词及其现实性使得中国更进一步沉浸在烟雾缭绕之中。中国的现代史是和抽烟的文化史交织在一起的，从管烟到香烟，抽烟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注 释：

- [1] 齐思和《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北京, 1959: 69)。
- [2] 参见《清仁宗实录》，亦可参见余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上海, 1934: 72-73)。
- [3] 谭中《中国与勇敢新世界》(孟买, 1978: 144)。
- [4] 李桂《鸦片史略》，收入中国史学学会编《鸦片战争史料汇编》(上海, 1954: 203-250)。
- [5] 对于公共空间的一般了解，可参见奥斯卡·纽曼《防御空间》(纽约, 1965)。关于中国后帝国时期的公共空间和城市文化，可参见王迪《街头文化：晚清时期成都的公共空间和城市平民》，载《当代中国》XXIV/1(1998: 34-72)；李德英《城市的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现代中国城市公园的个案研究》，载《城市历史研究》XIX-XX(2001: 127-153)。
- [6] 蔡步柏《我对于禁烟的观感》，收入《禁烟专刊》(上海, 1935: 9)。
- [7] 威廉姆·洛克哈特《医学传教士在中国 20 年》(伦敦, 1861: 392)。
- [8] 马丁·布斯《鸦片的历史》(伦敦, 1997: 60-61)。
- [9] 谢照深《忆四川烟火》，收入《四川文史资料集萃》第 6 卷(成都, 1996: 499-500)。又见《旧成都的露馆夜》，载《龙门阵》第 6 期(1983: 17-24)。
- [10] 蔡步柏《我对于禁烟的观感》，1935: 9。
- [11] 朱湘《烟卷》，收入罗平编《名家笔下的烟酒茶点》(北京, 1994: 298-304)。
- [12] 欲更多了解国外烟草业在现代中国的情况，可参见谢尔曼·考克兰《现代中国中外烟草行业的竞争(1890-1930)》(剑桥, 1980)。
- [13] 如欲对现代上海的商业广告有更多了解，可参考谢尔曼·考克兰《20 世纪早期中国广告的跨国界起源》，收入谢尔曼·考克兰编《南京路：上海的商业文化(1900-1945)》(纽约, 2000)。
- [14] 参见 1926 年 12 月 15 日《良友画报》。
- [15] 《为金龙做的广告》，参见同上。
- [16] 汪精卫《对于女界的感想》，载《妇女杂志》X/1(1924: 106-108)。
- [17] 引自考克兰《现代中国中外烟草行业的竞争(1890-1930)》，1980: 199。
- [18] 张纯如、弗吉尼亚·L·埃斯特、何冠庆《北京东部 847 名居民中的吸烟者》，载《亚太公众健康月刊》IV/2-3(1990: 156-163)。
- [19] 同上。
- [20] 亚辛作曲、阿卜杜拉·阿不都·热衣木演唱《神奇的烟》，收入萨达《沉默的回声》专辑，新疆唱片公司发行。在此我要对伦敦大学的瑞秋·赫里斯表示感谢，感谢她与我分享这首歌。



中国香烟盒



现代日本的吸烟状况

丹尼尔·吉尔曼*

在一片寂静的原始森林里，一个英俊的日本人坐在一根大木桩上。他三十多岁，穿着一件卷着袖子的衬衫，正悠闲地抽着一根烟。他又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盒面印有“纯净的抽烟风格”字样的小盒子，把烟蒂放了进去，那个盒子的盒面早已褪成黑色。

这里包含了广告所需的所有内容：美人、美景以及由抽烟联想到的那种美好、放松的状态。它和传统的万宝路广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独特的地方在于那是一个牛仔独自漫步在美国沙漠中。在第一则广告里，并没有提到任何品牌的名称，对大部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纯净的抽烟风格”听起来就像一句很酷的时髦话。但你若问日本人如何看“纯净的抽烟风格（Smokin Clean Style）”这个英语表达时，你将听到与众不同的答案——“注意礼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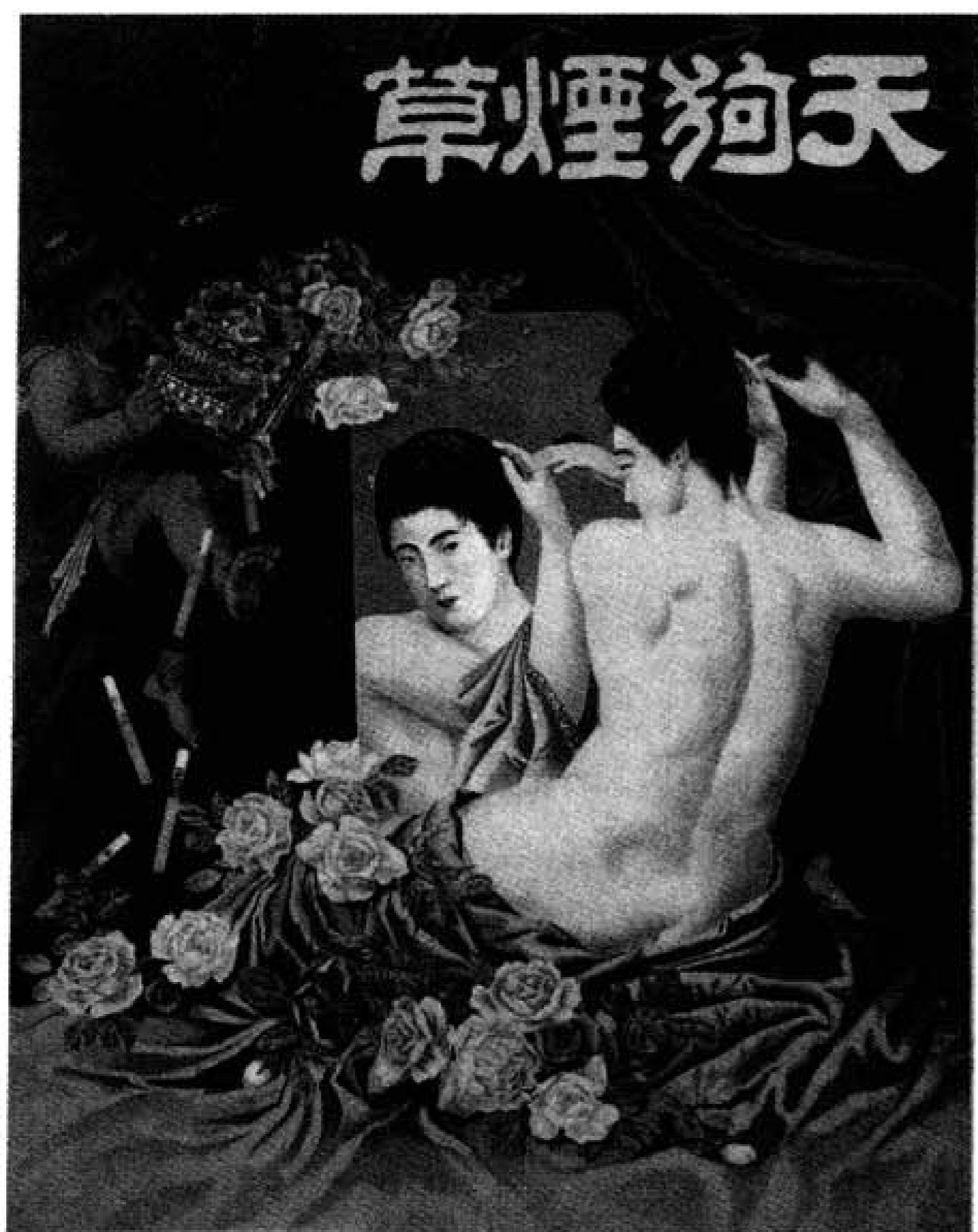
如果考虑到日本政府支持这些商业广告并已经持续了至少二十五年，你会发现万宝路和“纯净的抽烟风格”之间有着更大的不同。虽然美国公共服务界声明吸烟的害处，提出“吸烟有害健康”这样引人注目的口号，甚至展示裹尸布的图片，但日本同行却仍然反其道而行。

在日本，烟和盐已经成国家垄断商品。1985年，管制烟草的政府机构被改为“日本烟草”，这是一家政府占百分之六十六股份的伪自主公司。“日本烟草”仍旧垄断当地香烟，并已上市交易了。不用说，“日本烟草”是日本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按当地标准征收的烟税是市、区政府的重要收入。在公共责任和财政义务的交接处，日本烟草公司和广告业发展起来了。吸烟在日本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从16世纪起日本人就开始吸烟了，相关的健康问题迫使工厂创作广告宣传削减“有害烟”，制造“优质烟”。这样，当人们积极评论相关的社会问题时，政府可以为吸烟保持积极的形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烟草”引出了日本文化中的两大核心：社会责任和惯例。

有些日本艺术，如茶道，人们用“道（do）”来命名，意思是“径”或“道”。例如，“Sado”的意思是“茶道”，“Judo”的意思是“柔道”。这些艺术不仅仅是技术，而且是智慧和精神启蒙的潜在途径。在现代日本烟草广告中，“好的吸烟方式”的正面性和高贵性是不可比拟的。人们忽视上瘾、疾病等问题，将这些负面因素归到“不好的吸烟方式”上。

日本烟草业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烟草最早在1570至1595年间由欧洲贸易者陆陆

*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专攻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之研究。曾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习一年，于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获得爵士萨克斯和东亚语言学学位。



天狗烟草的广告

续续带到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早期，烟草意象就出现在日本画中。大岛纪人皇帝在1609年提到，“普通人、卑鄙小人和学者中，没有人不喜欢这种烟草”。^[1]在日本，外国进口的东西经历了一个快速的日本化时期。不久之后，这些东西就和传统之物一样，逐渐融入日本人的生活。例如，葡萄牙人介绍了油炸，不久后日本人把它发展为“天妇罗”——一种把炸过的蔬菜和虾蘸着美味的酱汁来吃的方式。不久烟草随着 Kiseru 迅速发展——Kiseru 是一根细长的管子，用来装切成精致细片的烟草。

明治天皇时代（1867-1910）结束了日本三百五十年的闭关自守，以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和时尚为其标志。在此期间，香烟变得非常流行。日本开始进口香烟，尤其是从美国进口。1874年，大量的日本香烟品牌涌现出来。由于日本政府在1904年对香烟进行垄断，这些企业寿命都很短，这是日本现代工业的开始。

在垄断之初，政府的影响就很明显。烟草包装很快成为宣传部门的延伸产品，比如纪念品牌“Glory（光荣）”，标志着裕仁天皇（明治天皇的儿子）的即位；还有仍然流行的“Peace（和平）”，标志着一战的结束。二战期间，日本禁止所有英文，包括香烟的品牌名称。直到战后，人们仍把“金拍”香烟叫做“kinishi”，它的意思是“金色的风筝”。

二战后，与政治有关联的烟草广告消失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开始出现。由于战后配给的需要，香烟和尼古丁在由黑帮掌控的黑市上发展起来。尽管政府纵容黑市，因为它通常是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唯一来源，但香烟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这期间，烟草税超过了百分之二十，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2]政府需要削减黑市，同时也需要

保持吸烟者的数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标榜社会责任和文化传统的广告业掺进了更多的传统因素。1948年，一则著名的反黑市广告词是“熄灭黑市香烟，点燃文化之火”。人们排斥黑市香烟，不仅因为它违法，还因为它破坏了文化，因为这不是“日本香烟”。透过这个理念，要求购买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香烟，这不仅仅是支持祖国，同时也支持了正在复苏的被二战摧毁了的文化。



纯净吸烟的广告

在“和平”牌香烟的广告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子：一个漂亮的、穿着时尚的妇女背对街灯，背景是慵懒的都市夜晚，它将烟同美女、财富和令人兴奋的夜生活联系起来，这反映了两种思想在今天仍被推崇着：一是政府试图卖烟；二是政府创造了好烟和坏烟的区别——在这则广告里，是黑市烟和政府烟之分。总之，好烟总是日本人设计的，承载着更有力的思想：日本文化和经济需要复苏。

伴随战后的经济繁荣，日本的吸烟现象空前普及。1965年，年满二十岁的日本男性中有百分之八十二点三的人吸烟。1967年，他们的一款“Hi—lite”烟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香烟。尽管吸烟女性的比例要低得多，仅占百分之十六，但相对于日本妇女的抽烟史而言，这个比例算是很高了。^[3] 相比而言，美国仅有百分之五十一·九的男性吸烟，而女性却有百分之三十三·九。^[4]

这是日本烟草业的黄金时代。政府的垄断排除了竞争，极力抵制香烟进口，而且全国有一半人都是烟民，钱都直接进入了政府的口袋。即使在今天，除了直接流入国库的利润外，香烟价格有百分之六十是税收，而其中一半流入当地市政厅。然而，黄金时代并不长。在吸烟人数缓慢下降了十年后（尽管香烟总销售量还在增加），1975至1985年间烟民下降的人数几乎是前十年的两倍，吸烟者比例从百分之七十六·二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四·六，且仍处于下降中。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每年下降百分之一，这次急剧下降的开端要和现代日本吸烟史上的两大事件联系起来。^[5]

香烟危害健康意识的增强导致吸烟人数的减少。1972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在香烟盒上贴了健康标语，这个标语直到现在还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而美国政府则有许多特殊且直接的广告语，如“吸烟会导致癌症”，而日本人的标语仅仅是“吸烟太多对健康不利，请勿过度吸烟”。政府再次尝试通过标语来区别好烟和坏烟，前提是不能破坏了烟草业本身。

随着1974年“纯净吸烟”运动的产生，烟民人数下降的趋势达到了顶峰。一个早期的广告将“纯净吸烟，美化城市，美化自然”作为特色标题，写在一幅大苹果图上。虽然日本人还不知道“一日一苹果，疾病远离我（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这类谚语，虽然吃苹果这种典型的健康生活的行为和抽烟的联系不大，但其健康暗示却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仅有利于他人，还能将抽烟变成一种

健康行为。这项运动以各种形式持续到今天，包括文章开头提到的“纯净的吸烟风格”运动。除了做广告，“日本烟草”和日本铁路局合作，在火车上和站台上设立了吸烟室。“纯净吸烟”的标语出现在很多地方，既强调了此标语，同时也保护了不抽烟的人。于是，“纯净吸烟”的广告被“注意礼貌”的概念所淡化了，相反却与政府权威紧密联系起来。其他公共服务信息也走同样的路线，比如，在便利店里贴着一幅广告，画着跳舞的啤酒瓶和香烟盒，标语是“投入二十元，就可以买到瓶酒和香烟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有大约五十万台自动售烟酒酒机器。

2001年，一场新的运动开始了：“日本烟草公司在改变！”这是二十五年禁烟运动中口号替换的第一步。新运动叫做“愉悦”（Delight）。面对吸烟人数的不断下降，此运动实际上有了微妙的变化。以下是其中一则海报：

人们说：“你完全可以抽烟！”我说：“谢谢！我稍后再抽！”我爱抽烟但不选择抽烟。比如经过几天的长途旅行后，我准备回家，在站台我想要抽根烟。我有点想抽，也有点困，在这种情况下，抽烟是令人愉悦的。当我坐在凳子上准备点烟时，突然发现和我坐在一起的人正吃着热狗。他注意到我停下点烟时，笑了笑，指着烟灰缸（意思是那是吸烟室）说：“去前面吧。”我谢了他，但把香烟放回口袋，心里慢慢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从那时起，抽烟是愉悦的，但不吸烟同样愉悦，这是我想拥有的一种心态。^[6]

这则广告强调了关心他人、自我控制和礼貌——这些都是日本社会强调的价值。同时，强调人们有权利选择抽烟，控制抽烟；作为成人，有权利吸烟。烟瘾者是没有控制能力的，好的抽烟者才有，而且他们的控制力是以他人的利益为前提的。最后，当保护人们不受二手烟伤害是通过公共服务的姿态来执行时，广告仍明确地说“吸烟很有趣，香烟很美味。”

考虑到吸烟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日本烟草公司的网站是一个不错的资源。一个部分叫做“吸烟：成年人的品位”，它引导人们进入日本烟草公司的世界，一个由爱吸烟的人（Aienshya）代替普通吸烟者（Kitsuensya）的世界。它有数百页内容，都通俗易懂。比如“烟草的其他名称”单元为读者提供了广泛讨论烟草术语的平台。这些网页显然不是随想，而是公司商业策略的核心部分。

日本烟草公司网站上“烟草的精神财富”部分告诉感兴趣的人们，“精神”一词来源于日语“kokoro”，它的意思是“内心、灵魂或思想”。按照日本烟草公司的说法，香烟有二十九种类似的作用，其中包括“格调香烟”、“放松香烟”、“休闲香烟”、“舒缓困惑和紧张的香烟”、“爱情香烟”、“友情香烟”、“幻想香烟”、“姿态香烟”、“加强与自然交流的香烟”、“个人香烟”和“会议香烟”等等。网页采用两个人用日本古文、田园式风格对话的形式，这种语言本身唤起人们对古老的日本乡村的回忆，增加了亲和力、友好、风趣的风格也唤起人们对老一辈的记忆。大部分关于吸烟的讨论都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烟草公司不仅向我们解释了抽烟丰富生活的无数种方式，也展示了抽烟怎样成为日

PEACOCK
Cigarettes



Manufactured
MURAI BROS. CO. LTD.

日本烟草株式会社
MURAI BROS. CO. LTD.

日本烟草株式会社
MURAI BROS. CO. LTD.



在京都一面看赛马一面抽烟的人

本传统的延伸部分。

从西方视角来看，这些词汇可能很独特，它却是日本文化的标准。日本茶文化中经常用类似的术语谈论不同的使用方法，如“无言茶”、“聊天茶”。茶道起源于佛教传统，最简单的行为都有其深远的意义。人们正在做的事情远远不如相伴而生的思想状态重要，最简单的泡茶方式能反映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是社会和精神的一种仪式。日本烟草公司基于同种原则销售其香烟。

就像茶道一样，一个人抽烟的方式已经成为内心和谐的表现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现实和精神的模糊分界是佛教思想的独特之处。当然，抽烟不仅是灵魂风格的抽象表达，也有其实际的用途，下面从《休闲烟草》中节选的一小段文字有所体现：

有那么些时候，你有一小段空闲时间，但不知道做什么，漫无目的。当你发现自己无所事事时，你会显得很窘迫。一旦你有了这种表情，你就会开始觉得别人看不起你，你的轻松感也随即消失了。在这个时候，正好点根烟。当你看到烟雾袅袅升起，你就不会注意到别人的目光了。这段时间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7]

对于日本上班族来说，他们的生活由繁重严酷的学习、密集的工作和社会环境组成。因此，“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观念对他们非常有吸引力，也是很实际的建议。在典型的日本办公室，人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即使站起来散步五分钟也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然而吸烟是被社会承认的休息方法，不被认为是偷懒。日本烟草公司更进一步称“吸烟可以将人们从需要甚至社会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比简单的一句“难道抽根烟休息一下不是很美妙吗”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所有部分都试图把抽烟作为“很日本”的东西。把江户时代作为抽烟的历史背景，

烟的营销便融入戏剧、书籍、电视节目等其他许多文化渠道中。例如第二十四号“爱情烟”产生于江户时代，描述了最初妓女如何用烟作为借口接近男人。紧接着引用了一系列的文学作品，阐述了在书籍和电影中香烟如何被用于不同的爱情场景里。20世纪日本文学名著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娘》中有一个场景，作者坐在茶店，正准备抽烟，这时候舞女将烟灰缸推给他。日本烟草公司把这一场景当成一个意义深远的时刻，并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评论：香烟让男女关系更近了，即使他们真正的意图不在抽烟。女人在男人要抽烟时为他点烟，或将烟灰缸推到他跟前，这会让男人感到愉快。

吸烟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它是社会精神发展的途径，是一种适应社会的工具和增加社会约束力的方法。但即使大部分传统方式和佛教（或神道）都有关联，日本烟草公司却未将烟草和宗教联系起来。唯一提到的只有“祈祷香烟”，它讨论了古玛雅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了香烟，还有人们与祈祷的关系。本段落用以下评论作结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祷告。通过祈祷，人们能暂时放松不安的情绪，可能是因为当人们看到烟雾升起时，会觉得香烟承载着他们的感情升入了天空。”

烟草时代开始于日本独立前，经历了将近三百年民族和文化的整合。在日本，烟草具有的文化意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当西方香烟出现时，文化和民族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抽烟的普遍性要求日本在开放西方市场的同时，也要保护自己的文化。撇开这种文化防御不论，烟草销售已经成为日本政府一百年来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烟草贸易法》在描述政府想限制烟草销售时如是说：“考虑到和烟草有关的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作用……因此，本法律允许国家烟草业适当增长。”^[8]然而，这样会忽视抽烟对健康产生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将抽烟列为世界上最危害健康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政府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试图保护正确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利益。既然不能公开支持抽烟，政府掌控的企业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抽烟方式”，这是具有社会责任的、可控制的（和上瘾有别）并且是一种在传统日本文化中定型的文化和精神模型。非吸烟者的抱怨也从来不会让抽烟者产生不好的印象或使其边缘化。抽烟可以同时受到抨击和赞扬——学校里有禁烟海报，火车上却有“纯净的抽烟风格”的宣传画。必须有一个文化平衡法案，在强调健康问题的同时，保障国库收入的来源，从而在这两者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对日本烟草公司来说，“吸烟就像一个成年人正迈出改变世界的第一步。”^[9]

注 释：

[1] 日本烟草集团编《烟草和盐博物馆目录》（英语版）（1988：18）。

[2] 同上，第43页。

[3] 参见日本国家癌症中心网页：<http://www.ncc.go.jp/en/statistics/1997/index.html>

[4] 参见美国肺脏协会网页：http://www.lungusa.org/data/smoking/smoke._ipdf

[5] 参见日本国家癌症中心网页：<http://www.ncc.go.jp/en/statistics/1997/tables/index.html>

[6] 参见网页：<http://www.jtnet.ad.jp/www/JT/jti/delight/welcom.html>

[7] 参见网页：<http://www.jti.co.jp/jti/tobacco/touzai/essay29.html>

[8] 参见反烟运动网：<http://anti-smoke-jp.com/keneneg.html>

[9] 参见网页：<http://www.jtnet.ad.jp/www/jt/jti/shikuhin/essay/23.html>

体验可卡因

阿尔贝托·卡斯多尔蒂*

20 世纪之初，欧洲和美国同时充斥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滥用毒品的呼声。早在 1914 年，美国就通过了《哈里森毒品法案》，这项法案对贩毒者进行严厉的压制。其实在这之前，毒品的快速流传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从 1903 年起，可口可乐就去除了可卡因这一配料。在接下去的十年里，公众被媒体鼓动，使去除可卡因一事得以强制实施。1916 年，法国议会一致通过一部反对毒品交易和使用的法律，这部法律在 1922 年被修正得更加严密。1970 年，法国政府健康组织决心打击那些既是病人又是罪犯的瘾君子对毒品的信赖。禁止毒品成为使用毒品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社会角色和行为关系问题。可卡因瘾者被人们认为是社会上没有用的、有病的并且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群，因为他们被迫非法寻找毒品，伙同犯罪组织进行非法毒品交易，并且快速建立起一个国际交易组织来滋养壮大不同形式的非法活动。

对可卡因瘾的治疗，使瘾君子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和社会集体生活的边缘人。可卡因瘾者并非因为从中取乐而被谴责，而是因为这种快乐不同于常人的快乐，是一种假象。西方文化倡导保护人类“天然的”、“原始的”身体，强调自我、良心、理智、自由、性别差异、潜意识、生与死、崇高、现实与法律等等。众所周知，法律的强制禁止使安托南·阿尔托在两个“官方文件”里做出偏激的回应——“给光荣毒品法的立法者的一封信”和“清除鸦片”。在这两个文件中，他认为法律是对他的个体存在和创造力的威胁。于是关于毒品的治疗作用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而对于其社会危害的毁谤往往忽略了其医疗角色这一点。

的确，可卡因的发现和使用有它有益的一面，南美洲居民把古柯碱当药物使用和白人把可卡因当毒品使用应该区别对待。在安第斯山脉贫瘠的土壤上，饥饿的土著人为了生存必须变成“征服者”，对他们来说“可卡因不是毒品而是一种食物。”

罗马天主教法庭宣布可卡因的使用是有罪的。1552 年，利马（秘鲁首都）的最高理事会的宣布吸食可卡因是“魔鬼行为”。^[1]然而，在接下去的两个世纪中，毒品却被经常使用，特别是在士兵当中。直到 1750 年，约瑟·朱西厄才将第一个样品带到巴黎。1786 年，让·拉马克赋予它植物学分类的名称“古柯叶”。大约一个世纪后，在 1859 年，阿尔伯特·尼曼第一个将植物碱基从古柯叶中分离出来。自 1862 年起，这种植物碱才变成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可卡因。^[2]休斯·韦德尔、约翰·贾可巴和保罗·曼特嘉莎证实了毒

*阿尔贝托·卡斯多尔蒂（ALBERTO CASTOLDI）：意大利贝加莫大学副校长，其著作涉及旅游文学、18 和 19 世纪小说、20 世纪 30 年代知识分子的作用、拜教物以及毒品等诸多方面。

品中含有特别的营养物质和滋补物质，17世纪初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印加人的王室评论》中曾有提及。值得一提的是，曼特嘉莎在南美时就亲自试用过这种药物，他在1859年写的论文《古柯叶的卫生学和医药学属性》中阐述了关于古柯叶治疗功效的观察评论。卡尔·科勒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可卡因的麻醉功效其实更大：当可卡因作用在神经末梢时，它首先消除了疼痛的感觉，其次是对冷热的知觉，最后连触碰的感觉都减轻了。因此可卡因在外科手术中得以最广泛的利用，还经常作为止痛药，甚至可以用在儿童身上。1886年，在巴尔的摩市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工作的威廉不仅将可卡因用于外科手术中，而且多年来每天给自己注射可卡因，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吗啡成瘾者。


从阅读希尔道夫的《临床观察》开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曼特嘉莎先前的研究中学习并决定亲自试验可卡因。他在1884年开始试验毒品，那时他是维也纳大学药品研究实验室的一名助理。他连续三年定期地进行实验，后来改成不定期的实验，一直持续到1895年。他在给未婚妻玛莎·柏雷斯的信中提到他的研究进展和对成功的渴望：“我希望可卡因能一直被使用并优于吗啡”。弗洛伊德以每克1.27美元的高价从位于达姆施塔特的默克公司购买可卡因。这段经历的结果是美好的，弗洛伊德很难表达他对可卡因的赞美，它能够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和一种长久的幸福感”，使人感觉不到疲惫和上瘾，能够从容执行紧张的工作。鉴于这些特性和麻醉的功效，弗洛伊德要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加入试验的行列中：他让自己的未婚妻尝试这种药品，使她变得“更强壮”、气色更好。^[3]

在这股“改变信仰”的潮流中，弗洛伊德劝说他的同事戒掉吗啡，改用可卡因取代。这个试验的结果是个悲剧，因为这个同事很快对可卡因上瘾，最终死于使用过量，这使弗洛伊德陷入深深的内疚中。腓特烈责备弗洛伊德传播了一种新的诅咒，因为酒精和吗啡的存在已经够糟糕了。

可卡因可以稀释在水中，这是19世纪末最普遍的使用方式。1863年，安吉拉制造了一种流行的滋补饮料“玛丽安的秘鲁古柯滋补酒”，这种饮品拥有众多支持者，如科莱特、托马斯·爱迪生、易卜生、维克多·雨果、儒勒·凡尔纳、查尔斯·古诺、马斯奈、左拉，甚至包括罗马教皇里欧十三世。也有人喝古柯碱制成的香槟。在美国，人们更喜欢可卡因和威士忌，但是最大的成功还是1885年约翰·彭伯顿发明的可口可乐。目前，最强大且最直接的效果是通过静脉注射，也就是将可卡因直接注入血液中。柯南道尔的虚构小说《四签名》（1890）中的侦探福尔摩斯使用的是浓度为百分之七的溶液。在他的朋友沃森医生的急切目光下，福尔摩斯将瓶子从壁炉灶的角落里拿出来，从整齐的摩洛哥盒子中取出他的皮下注射器。他用修长、白皙而又强健有力的手指调整细细的针管，然后反卷起左手的袖子。有那么一会儿，他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前臂和腕关节，上面布满了数不清的针孔。最后，他用力将针扎进去，压住小活塞，然后伴着长长的满足的叹息声倒在天鹅绒扶手椅里。

不久以后，可卡因溶液被白色粉末所取代，这种粉末被鼻腔吸入并且经由血管带到大脑。今天，最普遍的吸食毒品的方式是通过卷起的纸张、钞票或麦秆。可卡因的颜色增添了它的魔力：鸦片是蓝色的，大麻是绿色的，乙醚是透明的，酶斯卡林是黄色的，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II
AWARDS GOLD MEDAL
 In Recognition of Benefits Received from



VIN MARIANI
 MARIANI WINE TONIC

FOR BODY, BRAIN AND NERVES

Special Offer - To all who write us mentioning this paper, we send a book containing portraits and endorsements of EMPERORS, EMPRESS, PRINCES, CARDINALS, ARCHBISHOPS, and other distinguished personages.

MARIANI & CO., 52 WEST 15TH ST. NEW YORK.
 FOR SALE AT ALL DRUGGISTS EVERYWHERE. AVOID SUBSTITUTES. BEWARE OF IMITATIONS.
 PARIS - 41 Boulevard Haussmann. LONDON - 83 Northampton St. Montreal - 87 St. James St.

印有教皇利奥十三世(1810-1903)头像的文·马里奥尼酒，此酒是19世纪中期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一种添加了可卡因的酒。1886年，教皇约翰·彭伯顿在亚特兰大酿造第一批可口可乐的时候，他就试图仿造文·马里奥尼酒往可乐中添加可卡因，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原因是为了避免和节制组织有冲突。然而可卡因还是保留下来了，在接下来的至少二十年内可口可乐的生产都加入了可卡因。

迷幻药是半透明的，摇头丸是彩虹色的，而可卡因是白色的。由于其极高的明亮度，所以它又叫做“雪花”。

科勒着重于强调可卡因麻醉和止痛的特性，而弗洛伊德则完全利用毒品本身给人的快感，使人们在没有食物和睡眠的情况下达到一种身体和心理的至高享受。当瓦森医生质疑他利用鸦片的动机时，福尔摩斯回应说他“渴望得到精神上的兴奋”，或在没有深奥问题的情况下由毒品所带来的兴奋感。

比起其他毒品，可卡因似乎更可以唤醒人的意志力，赞颂人的活力，同时强化了人们欲望。毒品的使用是一个解释欲望理论的完美例证，这种欲望理论在人们的理解中总是受到抑制的。欲望是永远填补不满的，回应它只会跌入无底的深渊。每一次增加剂量都只能暂时减轻疼痛，获得一种消极的快乐。从这一点来看，所有的毒品，包括欣快剂在内，在瞬间镇定疼痛方面都是麻醉品。

弗洛伊德关于可卡因的试验和他的心理分析理论联系在一起，并非难以理解。可卡因是令人愉快、也是现实的。成长包括学会延缓幸福，并将其指向和世界的存在方式有关的事物，并学会自我保护。弗洛伊德在其心理分析学说中指出，愉悦是一种不饱和的、紧张的平静，可卡因满足了一种空虚，尽管它不能产生任何东西来增加愉悦感。而拉康也假设了一种欲望，一种总是精确地活着的欲望，它是贪得无厌的，其本质就是不满足。

就在那几年，弗洛伊德和柯南道尔因为可卡因见面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也被毒品的神奇作用冲昏了头脑，虽然他主要是用鸦片来对付失眠。他也用可卡因来刺激写作灵感，吉柯博士和海德先生这两个人物很可能就是可卡因汲取的灵感造就的。神奇的药剂使用后不会让人直接联想起可卡因，但虽然它本身的红色颇像鸦片酊的色泽，它完全不能起到镇静的效果，相反是使人感到欣快，就像瘾君子使用可卡因一样——“我全身感到更年轻，更轻快，更快乐”。^[4]

可卡因最早只限于一些知识精英使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它得以迅速传播，很快遍及整个西方世界，并在巴黎、维也纳、柏林、伦敦和纽约的街头自由贩卖。可卡因是武装部队最喜欢的毒品，也为所有的社会阶层享用，甚至出现了一些俱乐部，在那里人们为了“毒品聚会”和“五点可卡因时间”而聚集在一起。过度使用可卡因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其中涉及好莱坞男影星胖子阿巴尔克，于是在1920年代末，各个国家开始限制毒品。

知识分子对此的反应大相径庭，从愤世嫉俗的讽刺到最残暴苦难的叙述都有。在法国，艺术先锋最投入，因为这不仅和他们的创造性需求有关，也帮助他们解决了自身的社会边缘性问题。1919年，年轻的诗人罗伯特·斯诺斯（1900-1945）写了《颂可卡因》，在诗中他引用了“CoCo”这个词的许多押韵词：鸚鵡的叫声、公鸡的啼叫、单词“椰子”的发音、单词“妓女”的发音，直到最后的“可卡因”。虽然他本人说自己是喜好鸦片的，“我拥有具有欺骗性和有害的罌粟园，它比可卡因更能照亮我的眼睛！”

几年过后，同样是在法国，维克多·西里尔和一位蒙马特的可卡因商人一起出版了一个对话录《可卡因，现代毒品》。以前，在公众场所如酒吧很容易找到可卡因，它们可能放在洗手间或者放钱的抽屉里，以小瓶装的形式出售（在俚语中“放钱的抽屉”叫“药店”）。毒品被禁后，这种交易方式结束了，毒品通过转手交易，因为“这样才不会被发现！”每个人为自己调制鸡尾酒，把可卡因和海洛因、吗啡或者鸦片混合起来。报说其作用和弗洛伊德的感觉是一样的：每件事情都变得更加美好和容易，使人们有神仙般超人类的感觉，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上帝。

同样，在《死得艰难》中，年轻的勒内·克雷韦（1900-1935）举例说明毒品知识已经延伸到大众，不再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在杜蒙特·德弗家，儿子和母亲有一段有趣的对话。母亲斥责儿子注射可卡因的事情，儿子回答“不是用静脉注射可卡因的，是用鼻子吸”。母亲愤怒地说：“所有的毒品都是注射的！”儿子讽刺地说，“那你自己也注射过可卡因了？”1903年在《虚弱的真爱》一书中，乔治斯·诺曼底和查尔斯·潘索详细地描述了用液体形式吸食可卡因的戏剧性效果。首先是本人感到兴奋，就好像增加了他们的创造力，然后最痛苦的幻觉相继发生，人们感受到一种蠕虫入侵尸体的感觉。另一方面，在《文明人》一书中，克洛德·法雷尔评论了另一种吸食方式，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在西贡，一位医生给他想诱骗的女人开可卡因药丸。

1930年，M.阿盖夫的《可卡因的短篇小说》手稿在巴黎出现，不久便在俄罗斯移民群体中流行起来，后以《可卡因的故事》为名出版。没有任何关于作者的确切信息，但是小说叙述的口气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作者将自己描述成一个邪恶的、可恶的、被毒品带来的飘飘欲仙之感所吸引的人。小说对毒品的使用和作用的详细描述，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其他更多的信息，作者起初是被朋友麦克怂恿，研究如何使用可卡因去除他的鼻音。开始的效果是麻醉的：他的牙齿变得完全没有感觉，以至于“触碰任何一颗牙齿，就会感觉其他牙齿也跟着它一起松动起来”。逐渐地，这种感觉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分，直到整个身体“变得冷冰冰、僵硬起来，就好像身体和头部被切断开了一样。”接着，从脚底开始有一种戏剧性的空间知觉，使作者恐惧的是，房间开始旋转，

其中一边倒塌，“一个角落塌陷，在我身下倒塌，从我背后树起来，又在我头顶出现，重复如此，一次比一次更快，直至消失。”一旦毒品的药效消失了，最痛苦的心情就出现了，那是一种“痛苦的、撕裂般的不可避免的反应（医生将其称为‘低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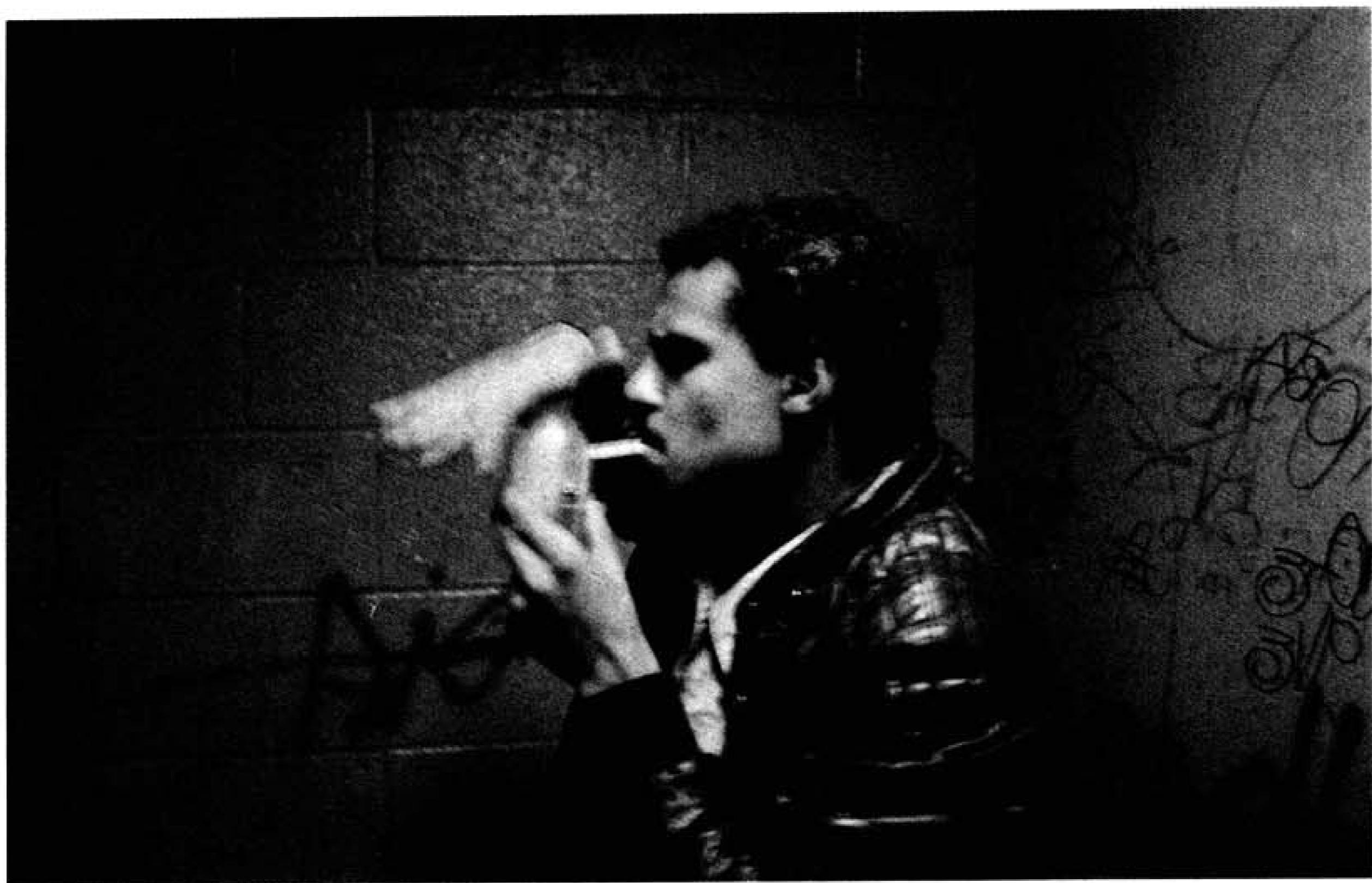
很快，对可卡因的上瘾减少了人们对幸福的最原始的感觉，且导致人们继续无用地吸食新的剂量，期待着找回第一次的经历，直至中毒。这也发生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在《吗啡》（1927）中，鲍加可夫也尝试着借助可卡因戒除吗啡，但是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主人公在第一次注射可卡因时确实感受到了平静的感觉，这种感觉慢慢转变成兴奋和幸福，但是不久药效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只有痛苦。鲍加可夫警告我们不要尝试用可卡因来代替吗啡，因为“可卡因是一种恐怖的、不忠的毒药。”

法国也为有关毒品的第一本意大利小说提供了背景：基诺·沙格瑞用 Pitigrilli 这个笔名出版了小说《可卡因》。小说的主人公阿诺蒂是一个客居在巴黎的意大利记者，致力于蒙马特地区使用可卡因和可卡因瘾者的研究。阿诺蒂所在的社交圈广泛使用可卡因，这使他有可能会观察到可用来概况整个可卡因使用的全套吸食仪式。Pitigrilli 特别被贵族们使用可卡因的氛围所吸引，不管是吸食可卡因还是吗啡，都是倒在高脚杯的香槟中享用的。在这个社交圈里，毒品的体验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男士和女士邀请对方参加“可卡因派队”，就像邀请对方共进午餐一样。对毒品的渴望支配着他们的社会习惯，可卡因给他们带来的快感就像性欲带来的快感一样：一个可卡因瘾者边吸食毒品，边亲吻女人“潮湿颤抖的嘴唇”，女人则将自己送入他的嘴巴，“享受地吸吮着他的上唇，把她的舌头戳入他的鼻孔”。

毒品的作用在身体和意识上都十分奏效。一方面，吸食者有一种欣快的效果，“狭窄的思维”被打开，就像“干燥的茶叶在沸水中”舒展开一样。另一方面，又有太多使人烦乱的效果，“双脚冰冷，大脑暴怒”，个体被分离，“在我体内，两个个体彼此蔑视对方，并且互相谴责，使我对自己的讨厌逐渐增加”。感性的说法是“可卡因演示了时代畸形的残酷戏法”。阿诺蒂二十八岁时与舞者 Maud-Cocaina 相爱后就死去，他的死亡被当作一个时代的象征，在无趣的仪式中有意识地自我毁灭。

巴黎又一次成为阿莱斯特·克劳利（1875-1947）的作品《吸毒者日记》^[5]（1922）中的背景。可卡因是唯一一种他尝试过的毒品，如果可能，他每次都从伦敦邮寄可卡因，因为这比通常可以得到的可卡因纯度更高。克劳利画了一幅炫目的可卡因图画，这是一种防止身体受苦的非常必要的麻醉，但同时他也认识到毒品“美味的反常”：人们感到非常好，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使人们从所有忧虑中解脱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体验毒品最多的是英语世界的国家。和蒂莫西·利里一样，威廉·巴勒斯把自己的生活献给了各种各样的毒品。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起初他只对鸦片剂感兴趣，特别是吗啡和海洛因，不久他便开始尝试可卡因，但是和鲍加可夫的观点相反的是，他建议将可卡因和吗啡一起注射。在《赤裸的午餐》^[6]这本书中，他坚称可卡因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毒品，但只能持续几分钟，这意味着即使它不使人成瘾，继续吸食新鲜剂量愉悦感迟早也会延续。这导致吗啡需求量的上升，解除了可卡因导致的神经紧张，并且防止过量服用。巴勒斯宣称可卡因瘾者经常熬夜为自己轮流注射海洛因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吸食强效可卡因者

和可卡因，或者将海洛因和可卡因混合在同一个注射器内，以此来达到“滚雪球”（药性更高）的效果。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伟大的科幻小说家菲利普·狄克（1928-1982）深入体验了可卡因，但和鲍加可夫不同的是，相对于鸦片他更喜欢可卡因和安非他命鸦片剂。在接受戒毒治疗后，他出版了《黑暗的扫描》^[7]一书，提供了一堆瘾君子吸食所谓物质 D 的药片的图片，这些药品的效果和可卡因的效果十分相似。毒品再一次回到新一代作家的小说中，比如布雷特·伊斯顿·艾里斯的《少于零》^[8]（1986）和《美国心理学》^[9]（1991），杰·麦金纳尼的《明亮的光，大都市》^[10]（1984），嘉丽·费雪的《来自边缘的明信片》^[11]（1987）等，这些作品都叙述了作者自己的戒毒经历。

同时，可卡因正以一种增长的趋势得以传播，它的普及范围包括音乐家和运动明星。但是，虽然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可卡因的吸食情况有据可考，但它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才变成人们使用的主要毒品。鼻吸可卡因成为公众想象中吸食可卡因的固定方式，也是雅皮士们采用的方式。就像电影中看到的一样，从奥利弗·斯通的《华尔街》（1987）到《锅炉房》（2000），在毒品的廉价副产品越来越畅销的时候，人们对它的理解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当然，比起注射，抽烟需要更大量的植物碱基。吸毒越来越多地与临近社会边缘的人群和城市的堕落一族联系在一起，白领阶层吸毒现象看来只是贩毒者和吸毒者之间的交换，可卡因点燃的“咔嚓”声与肮脏和绝望联系在一起。这并未因为杰出的政治家和运动明星们的加入而被打破。如果有什么的话，在斯皮尔伯格的《交通》（2000）

一片中，来自中产阶级的学生吸食并依赖加热的精炼可卡因，被工人阶级指责与他们的阶级背景不相符——他们不是犹太人贫民窟的孩子。正如吸烟背负着社会污名一样，吸食可卡因已成为人们尤其咒骂的对象。

注 释：

- [1] D. 斯特里特费尔德《可卡因野史》(伦敦, 2001: 29)。
- [2] 阿尔波特·尼曼《古柯叶的新有机基础研究》，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860。
- [3] E. 乔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生活和工作》3卷本(纽约, 1953-1957)。
- [4] R.L. 斯蒂芬森《海德先生的奇怪案例》(伦敦, 1886)。
- [5] 阿莱斯特·克劳利《吸毒者日记》(伦敦, 1922; 1979年再版)。
- [6] 威廉·巴勒斯《赤裸的午餐》(1959; 1991年于伦敦再版)。
- [7] 菲利浦·狄克《黑暗的扫描》(1977; 1999年于伦敦再版)。
- [8] 布雷特·伊斯顿·艾里斯《少于零》(纽约, 1986)。
- [9] 布雷特·伊斯顿·艾里斯《美国心理学》(纽约, 1991)。
- [10] 杰·麦金纳尼《明亮的灯，大都市》(纽约, 1984)。
- [11] 嘉丽·费雪《来自边缘的明信片》(伦敦, 1987)。

吸烟和社会性

列维·施特劳斯在其有关“人类与外部世界是一分为二的”理论中，把烟草放在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他在《从蜂蜜到灰烬》中写到，烟草既不是未加工的，也不是煮过的，它具备了人类能够在世界上发现的天然事物以及人们大量生产出的产品的所有特质。对人类而言，吸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午饭后，我们和其他人在俱乐部里一起吸烟，或者独自一个人吸烟。无论在什么场合，这种吸烟的行为加强了我们在人际圈中的关系，我们把它称作交际。甚至独自吸烟也能加强人际关系，虽然它强调了远离他人。吸烟促成了最佳的聊天环境，正如1782年约翰·威廉·席辛所观察到的：“随着缭绕的烟雾从烟斗中肃穆地喷出，一句话说上一半便足矣。”的确，据说在1833年，爱默森与托马斯·卡莱尔在一次聚会中共享一根烟斗，他们静静地坐到午夜，两人分别时，还互相祝贺对方拥有一个有收获的、愉快的夜晚。

吸烟塑造了最理想的丈夫。1881年，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写到：“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一个滴酒不沾或者不会抽烟的男人——女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把一个男人拴在花圈前，阻止他漫游的幻想和过分的野心，无论用什么方法促使他在沙发上懒洋洋地躺着，都没有比香烟更有效果的了。她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确保家庭的幸福。”

吸烟塑造了最出色的士兵。在1914年10月3日出版的《柳叶刀》中，编辑特别提到：“当我们考虑到那些长期投入在紧张战役中的海军和陆兵时，我们会想，对他们而言什么才是舒适的源泉。我们也许应该相信，那就是烟草。当一位士兵能为他的嗜好腾出一些时间来，那烟草一定是他真正的慰藉与愉悦。”五十年后，切·格瓦拉，一位阿根廷革命家回忆起在古巴山上打游击的经历时，认为“在游击队战斗生活中，抽一根烟是一种习惯，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安慰。在休息时间，一根烟就是士兵最好的朋友。”

吸烟使一切变得完美，直到人们担忧它的危险——这个担忧从西方使用烟草之初直到现在始终存在。吸烟本身被认为是个人、夫妻和社会的杀手。在被动吸烟的情况下，吸烟摧毁的不仅仅是社会交际圈，甚至是个体的全部生命。在此，吸烟的纽带作用作为个体关系的一个枢纽被摧毁了。但这也许是后现代化的另一个标志。D·帕特南在他的成名作《独自一人打保龄：美国社会的崩溃与复兴》(2000)中已经警告人们，社会资本的积累——人们与他人交际的情况——已经出现直线衰退，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和交流变得十分贫乏。人们之间已经越来越没有人情味。我们属于那些很少与他人会面的群体，我们对邻居们知之甚少，不再经常与朋友碰面，甚至跟家人的沟通也变得稀少。我们餐桌上的伙伴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我们甚至独自一个人打保龄球。比起以前，更多的美国人在打保龄球，但他们不属于联合会的成员，没有作为团队成员一起打保龄球。综合这些事实，我们或许不能再吸烟了，否则只能是一个人吸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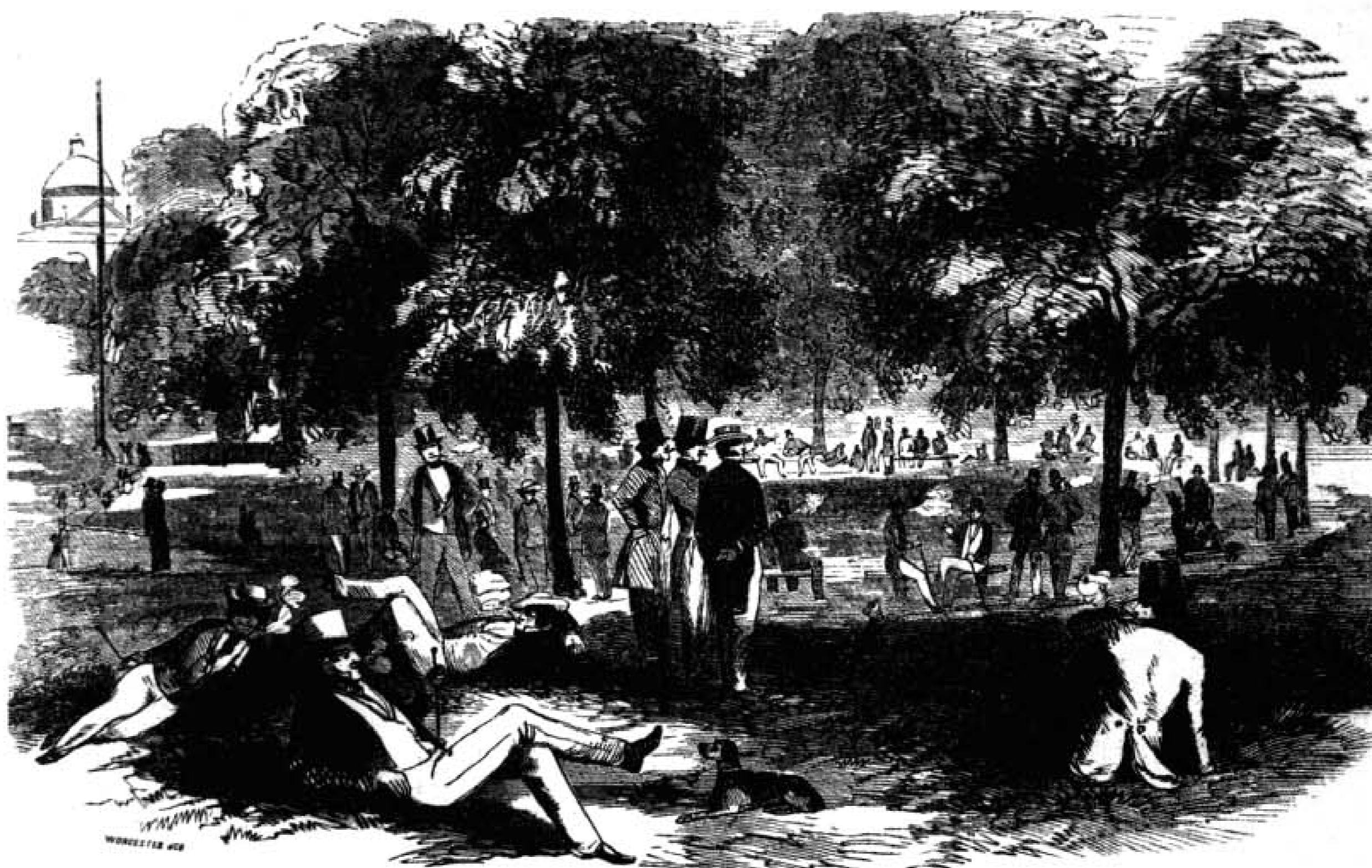
《弗吉尼亚可居住区的地图》的一部分（1775），图中是一个码头上的船工及工头正在抽烟



摘自约翰·史密斯船长的《弗吉尼亚地图》（1612），图中是1607年酋长保哈坦在一间小屋里抽烟管，这时约翰·史密斯船长作为囚犯被带了进来



一幅名为“记住活力小子”的插图，摘自弗兰克·莱斯利的《周日杂志》(1891)



内战爆发前的几年内，波士顿城总督在城内树荫浓密的公共用地上划出一块特殊用地作为吸烟区，许多波士顿人在此吸雪茄



美国某城市的街道上，一位男子正在为另一位男子点烟



THE SMOKERS .

H.R. 罗伯逊《吸烟者》



1917年，比利时某地军士们休息时躲在战壕里抽烟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抽烟的男人



1942年欧文·拉帕尔导演的影片《扬帆》中男女主角保罗·亨利德和贝蒂·戴维丝的剧照

艺术与文学中的吸烟

Smoking in Art and Literature

缕缕轻烟虽是短暂的，却同样反映了艺术世界的美感。吸烟——不管是吸鸦片、烟草还是大麻——不仅仅关联着艺术，甚至成为艺术的替代品。吸烟既热烈又清爽，它的作用也多种多样，不仅代表着创造力，还代表着它所存在的社会。

符号和意象：17 世纪以来绘画艺术中的吸烟

贝诺·坦布尔*

对画家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岁月。由于作品与社会舆论相左，画作被没收了，画家吃了官司。例如，恋童癖等社会变态心理以及社会对儿童色情文学的声讨玷污了以赤裸儿童为形象的艺术作品的名声。当时，虽然吸烟也是被攻击的对象，但描绘吸烟的艺术还不至于沦落到被没收的地步，但这也只是个时间问题。随着对香烟广告的禁令，凯斯·哈宁的《好彩香烟》（1980）之类作品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这意味着绘画艺术可能会丧失一个流行的主题。17 世纪以来对香烟的尖锐反应不绝于耳，但这并不意味着香烟在人心目中一直是不健康的，这也是它成为绘画艺术主题的原因。17 世纪以来对香烟的种种描绘反应了社会观点的变化，本文仅以几副引人注目的作品为例，着重说明烟斗、雪茄和香烟的象征意义。

荷兰黄金时期以吸烟为主题的绘画作品

17 世纪的荷兰一派欣欣向荣，被誉为“黄金时代”。那时，一种全新的荷兰派艺术形式诞生了，香烟的主题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们很难确定谁是第一个画吸烟者的人，但吸烟在黄金时代的作品中非常流行，以至于本文的论述难以面面俱到。南欧人认为太过现代的烟斗不适于体现神话和古典场景，因此，在荷兰画作中，现实常常成为隐晦地表现象征主义的借口，作品也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例如扬·斯丁的《如是听，如是唱》（*The Way You hear it is the Way you Sing it*）塑造了一个让儿子吸烟的父亲的反面教材，结果儿子年纪轻轻便涉足放荡生活。

这些绘画作品反应了一种社会现状：吸烟是属于贫穷阶层的。1601 到 1602 年在阿姆斯特流行的传染病和 1602 年的地震摧毁了穷人们一切快乐生活的可能，人们不得不相信，香烟的烟雾可以驱逐瘟疫，因此迫不及待地吸起烟来。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但吸烟却为他们带来希望、赶走饥饿。荷兰画家杰拉德·特博瑞奇以及佛兰德艺术家大卫·特尼瑞斯尤其擅长描绘社会底层掩盖在社会文明之下的粗俗，这些作品迎合了富人们取笑穷人的心理而创作。吸烟是绘画艺术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但是这并不是对吸烟的赞美，因为吸烟本身就是与社会的劣迹联系在一起。

现在已很难弄清楚，描述吸烟酗酒的画家们是不是经常出入酒馆和妓院。人们通常

*贝诺·坦布尔（BENNO TEMPEL）：鹿特丹康斯尔某博物馆馆长，2003 年曾组织展览《禁忌与烟草：从扬·斯丁到巴伯罗·毕加索》。



扬·斯丁《如是听,如是唱》,
1665, 油画

认为, 吸烟因为使体内的水分干燥而让人口干舌燥, 于是人们恰好可以通过饮啤酒来解渴, 于是恶性循环便形成了。荷兰共和国的加尔文教徒鼓吹人们节制这种行为: 吸烟让人萎靡不振, 纯粹是浪费生命。

相对而言, 女性很少出现在 17 世纪作品中。即使出现, 也是以惩罚那些烟民和寻欢作乐者的形象出现的。绘画中的女性通常是烟馆的老板娘, 她们自己头脑清醒, 却乘人之危占烟鬼酒鬼的便宜。在这些场景中, 女人将一切尽收眼底。艺术家们无意让女人担当反面角色, 而是要她们传达一种道德信息。她们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梁, 告诫人们这种愚蠢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另一主题是一名老妇人在灌烟斗, 不是为自己人, 而是为他人。这样的女人是老鸨, 动作很下流, 烟斗便是传达这种信息的符号。

自画像中也使用烟斗, 烟斗赋予画像以象征意义。当作品中的画家背对空白画布抽烟时, 他正在浪费时间; 当画家面对画布时, 则表示吸烟为他带来灵感。

随着荷兰烟草业营利的增长, 吸烟也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为。烟管变长了, 以便冷却和净化烟雾。烟草的社会接受度越来越高, 长颈烟斗成为地位的象征。^[1] 吸烟在富人中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把低俗的农民赶出了画布。吸烟甚至成为大众推崇的行为。在霍斯的作品中, 一个品味高雅的聚会上人们优雅地拿着烟斗——吸烟反映了优雅的生活。

17 世纪早期, 吸烟尚未染上不健康的污点, 烟草甚至被当作药品来使用。在俄斯塔德的作品《一个在室内吸烟的药剂师》(*An Apothecary Smoking in an Interior*) 中, 一个男人坐在一堆其他药品中吸烟。不过这样的画很少见, 作为享乐的吸烟比用来治病的吸烟享有更高的地位。

时间的流逝又成为绘画的主题。画家用静物——烟斗提醒人们生命的转瞬即逝和不确定性, 告诉人们尘世的欢愉无法拯救灵魂, 生命短暂得就像烟斗中的香烟。人体的功

能同时也被体现出来，比如描绘正在小便的人是强调身体短暂的一瞬，把吸烟者和一个大便的形象放在一起代表了气味。香烟频繁地被用来代表五种感观。

异国情调

随着荷兰黄金时代的没落，吸烟被绘画艺术冷落了一段时期，鲜见于18世纪的绘画艺术中。深受17世纪荷兰绘画艺术影响的法国画家夏丹偶尔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放一支烟斗，但他只是个例外。吸烟不仅失去了对绘画艺术的吸引力，在日常生活也逐渐失宠，取而代之的是流行于中产阶级和艺馆中的“嗅烟”。农民和乡下人吸烟似乎贬低了吸烟作为繁荣的象征意义，优雅地嗅闻手中的香烟或打喷嚏都鲜见于当时的绘画作品中。

纵观18世纪，可以说吸烟已绝迹于西方艺术了。但是烟斗仍旧在表现异域风情的作品中占一席之地，其中的代表画家如乔瓦尼·安东尼奥、约瑟夫·弗纳特和利奥塔德。画中吸烟的大家闺秀一边百无聊赖，一边却激情澎湃。锡塔琴、长须和烟斗表现了异国



俄斯塔得《一个在室内吸烟的药剂师》，1646，油彩画板



莫那尔《气味》，1637，油彩画板



利德塔德《一个穿着土耳其服装的法国女子在浴室中指导仆人》，1744，彩色蜡笔画

情调，满足了 18 世纪公众对奇闻异事的好奇心。这些作品也反映了欧洲和东方贸易的发展。很久以来，吸烟和不为人知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见到表现这种异域风情的作品。

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和艺术自由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艺术家视烟斗为娱情的工具。卢梭把乡下人的生活理想化，把那些融入大自然、宁静地享受烟斗的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描绘牧羊人在古迹中放牧的田园派作品中竟然也出现了烟斗。吸烟象征着无尽的思索，农民和牧羊人的生活是相似的，吸烟逆时光而行，是“消磨时间”的方式。

在清教徒式的 19 世纪，社会不赞成妇女吸烟。^[2] 一个女人应该待在房间里，做一名纯洁的情人、妈妈和天使。吸烟仅限于男人的房间或吸烟沙龙、台球室和图书馆。在这些地方，吸烟是一天当中无伤大雅的一个活动，是中产阶级的轻松一刻。德国彼德麦式作品的一个常用的重要元素便是烟斗，让人们联想起这些小资人士的闲适自在。然而，仅仅拿着一根烟斗并不足以表现世界浪漫主义背景下的豪情壮志。

浪漫主义时期特别强调艺术家的个性，于是艺术家们纷纷将个人的兴趣和情感引入绘画主题中，以在中产阶级面前独树一帜。吸烟在欧洲 19 世纪的绘画艺术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也证明在表现知识分子的个性方面，吸烟是一种独特的方法。在迷漫的



爱德华·马奈《诗人马拉梅》，1876， 油画

烟雾中，画家、作家和哲学家都陷入了沉思。他们吸着烟，专注的眼神中透露出思考的深邃。正如在爱德华·马奈（1832-1883）的作品《诗人马拉梅》中，升腾的烟雾为诗人带来灵感，让他写成一首诗。尼古丁的作用在这幅作品中得以体现：放松了身体，活跃了思维。与此同时，许多自画像也表明，吸烟是艺术家独立精神的象征。自觉又有点傲气的艺术家们把自己标榜为高高在上于中产阶级的波西米亚一族，正因为他们，早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吸烟行为突然变得现代时尚起来。

新时代的印象派艺术家很少表现烟民了。^[3]在他们的生活“快照”中，烟斗和拐杖、帽子、手套等一样普通，失去了作为符号的意义。然而，具有强烈象征主义心理倾向的后印象派们重拾对吸烟的兴趣，于是，新的关联出现了。现代社会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东西——吸烟和运动——却在从1900年开始的十年内成为社会和艺术中不成分割的孪生子。^[4]值得注意的是乔治·秀拉的名画《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中的两个人吸烟者。左边，一个吸烟斗的划船手斜倚在沙滩上，右边，一个衣着体面的绅士正吸着一支雪茄，这点体现了他与身边的女伴——妓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另外，秀拉用雪茄代表阴茎。

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在画里，香烟渐渐地出现在女人的唇间。亨利·德·土鲁斯-罗特列克和文森特·梵·高都画过酒吧里的女人。观众一下子便能辨认她们的行当：厚厚的白粉掩盖了脸上的梅毒粉刺。艺术家们捕捉住了映衬在诱人的却透着邪恶之气的烟圈

之下的灿烂笑脸，以及笑脸背后的神秘氛围。妓女们如飞蛾扑火般扑向嫖客，对于她们来说，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存在任何问题。进入了 20 世纪以后，吸烟却渐渐成为女人的一种“时髦”之举，并在“咆哮的 20 年代”达到顶峰，雪白的香烟总是与女人们如影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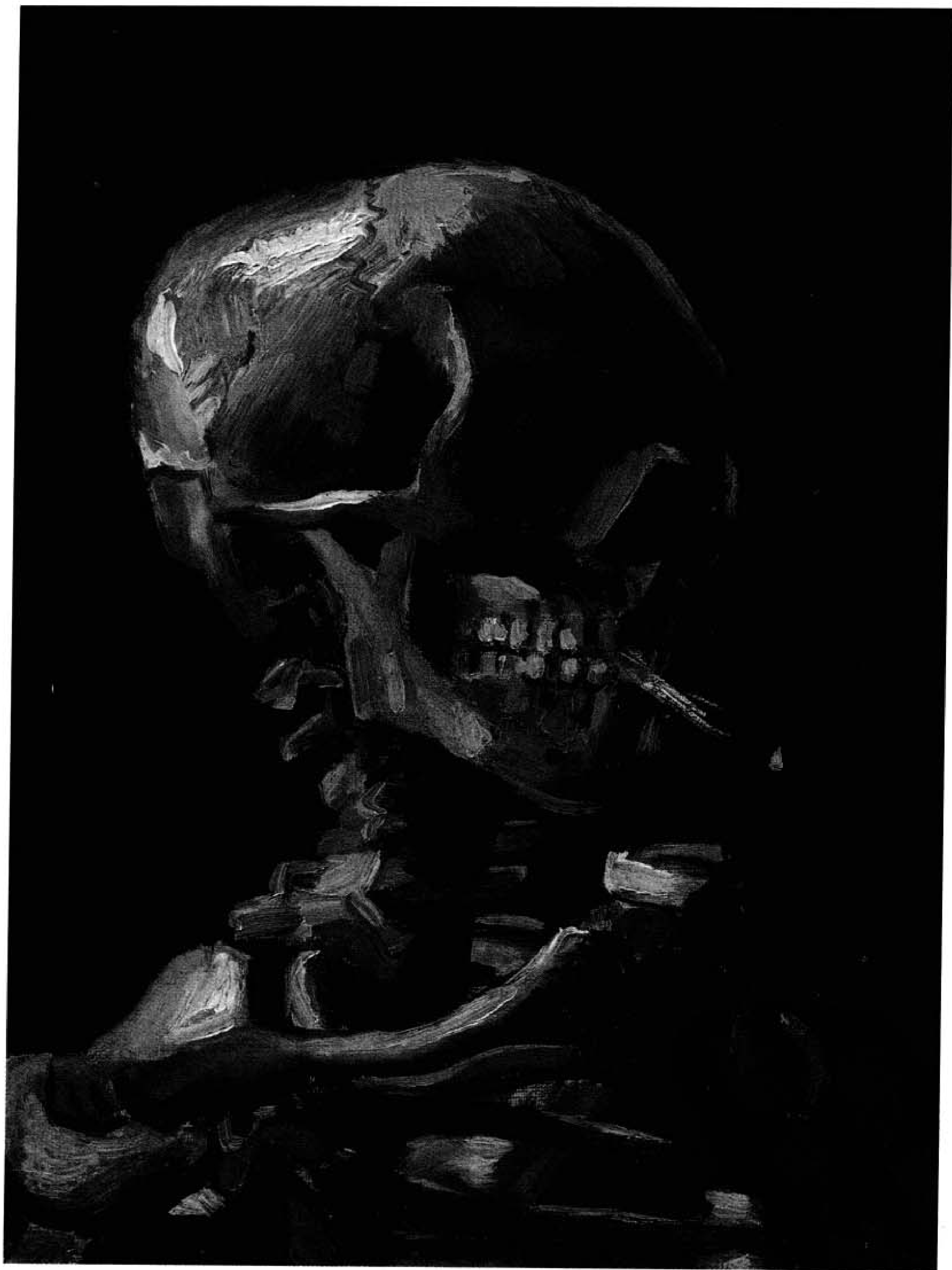
19 世纪末期的另一艺术主题是生活的阴郁面。正如早期代表作梵·高的《吸烟的骷髅》所示，香烟成了强化恐怖气氛的工具。有些人倾向于认为这幅画发出了反吸烟的警报——至少比印在香烟盒上的那些更为有力，但梵·高也只是“耍了一个特技而已”。画室中作为艺术家道具的骷髅在现实中却成为人们玩笑的工具。自己吸烟的梵·高不想说教，只是开了个不健康的玩笑。画家们有意表达颓废派的宿命论，如在爱德华·蒙克的作品《自画像》和《圣克劳地的傍晚》（均收藏于奥斯陆挪威国家美术馆）中，烟雾反映了内心的苦闷。这些作品似乎预示着弗洛伊德眼中本能决定行动的淫乱社会的到来。

阶级社会的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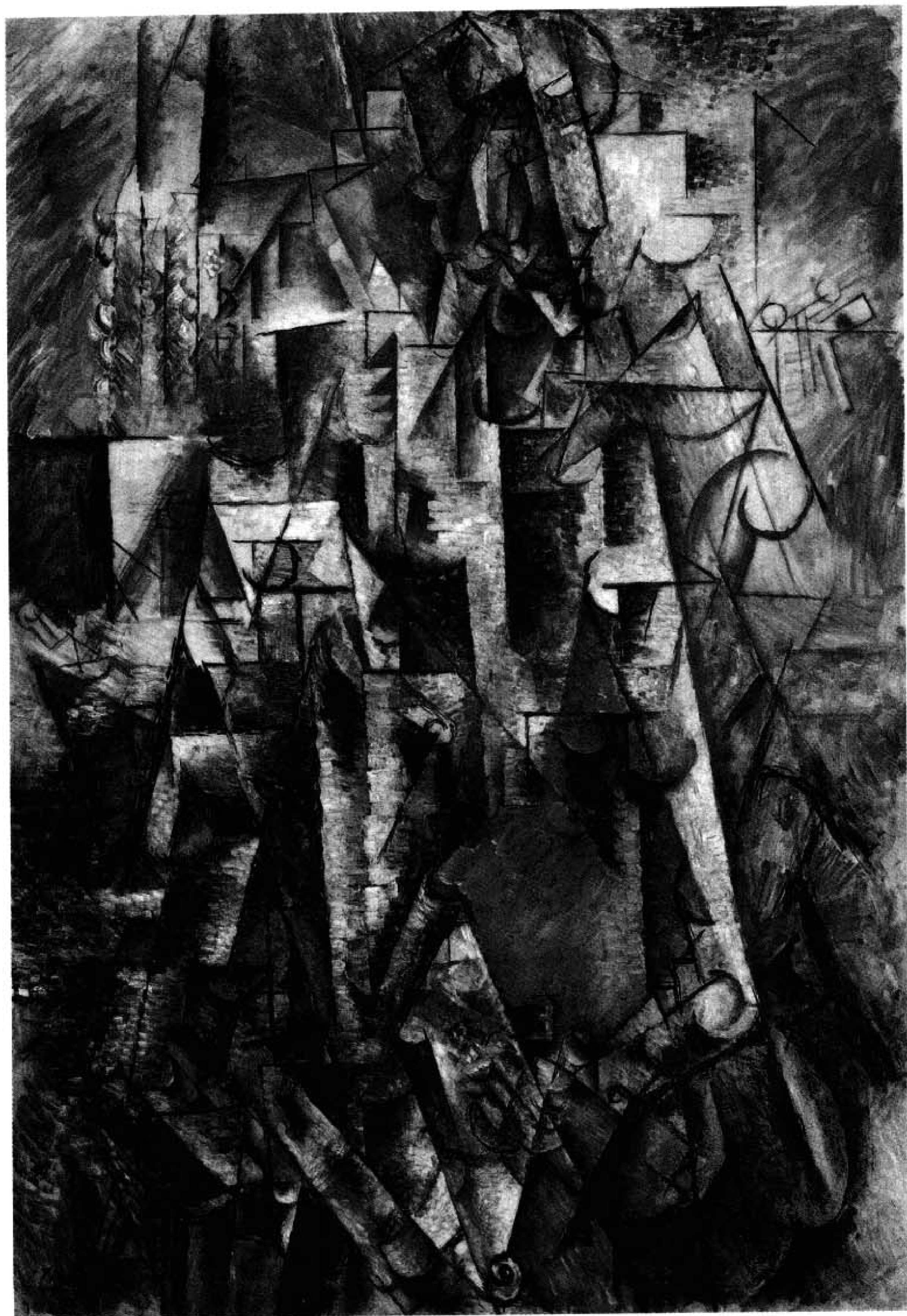
香烟和雪茄在 19 世纪传入欧洲，但是直到 20 世纪，不同类型烟草的特殊意义在艺术中才得以体现。不同的吸烟方式代表着不同的人物类型，由烟斗、香烟和雪茄代表的不同艺术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获得大众的认可。总的来说，烟斗和雪茄对应于有权阶级，不同的是雪茄烟象征着慎重和冷静。显然，烟斗和文学从来没有分离过。小说中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和梅格雷寸步不离烟斗，画家也采用了类似手法。毕加索的《诗人》叼着烟斗，马库希也给了诗人阿波里奈尔（藏于费城艺术博物馆）一支烟斗。另一方面，雪茄代表着财富：大亨和强盗头子都用雪茄表现他们的显赫地位，同时也突出了他们的卑鄙和无情。而香烟代表冒险、危机、力量和青春，这点反映在骆驼的复活和万宝路的牛仔等经典香烟广告中。但是，香烟同时也代表着忧虑和紧张。

烟斗在 20 世纪的立体派画家中特别流行，同吉他、报纸和眼镜一同经常出现在静物画中。这些常出现在酒吧里的东西表现了画家的小资情调，但是根据立体派喜欢扮成对手的习惯，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物品成为一种崭新的先锋艺术描绘的主题。因此，烟斗及其他物品代表了资产阶级。除了作为酒吧的元素，来源于古典艺术中代表情爱关系的吉他代表着女人的身体，而烟斗则比拟了现代的女性。有趣的是，艺术家们解剖了传统的吉他，却用现实的手法来描绘烟斗。

立体派用来玩智力游戏的东西却成为无情、冷淡的新客观主义者冷嘲热讽的对象，他们用雪茄、烟斗和香烟来代表资产阶级社会的角色分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噩梦击碎了人们的梦想，由于对现代社会缺乏信心，愤世嫉俗的心态十分普遍。在艺术上，传统社会照旧吸着烟，但却强调一种懒散的气氛。这些作品反映了男女之间、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吸烟的不同元素也被用来表现艺术家对资产阶级道德虚伪性的批判：工人阶级的劳苦和资产阶级的雪茄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亨利·玛丽亚·达瑞豪森的《黑商人》（*The Black Marketeer*）所展示的那样，雪茄是一种象征权贵的社会符号。19 世纪末期由吸烟的妓女们引入的黑色情爱主题继续存在着。乔治·格罗兹和奥托·迪克斯等艺术



梵·高《吸烟的骷髅》，1885， 油画



毕加索《诗人》，1911，油画



克里斯提安·查得《豪森贝恩医生的自画像》，1928，油画

家描绘了吞云吐雾的妓院。贝托尔德·布莱希特曾说过：“一个伟大的天才困在烟花柳巷里”，正好说明了有些画中妓女吸雪茄的原因。这些女人对男人的控制力巨大而且具有破坏性，他们把意志薄弱的客人投入了厄运的深渊。随着纳粹主义的兴起，险恶的烟雾笼罩着冷漠的社会：暴风雨快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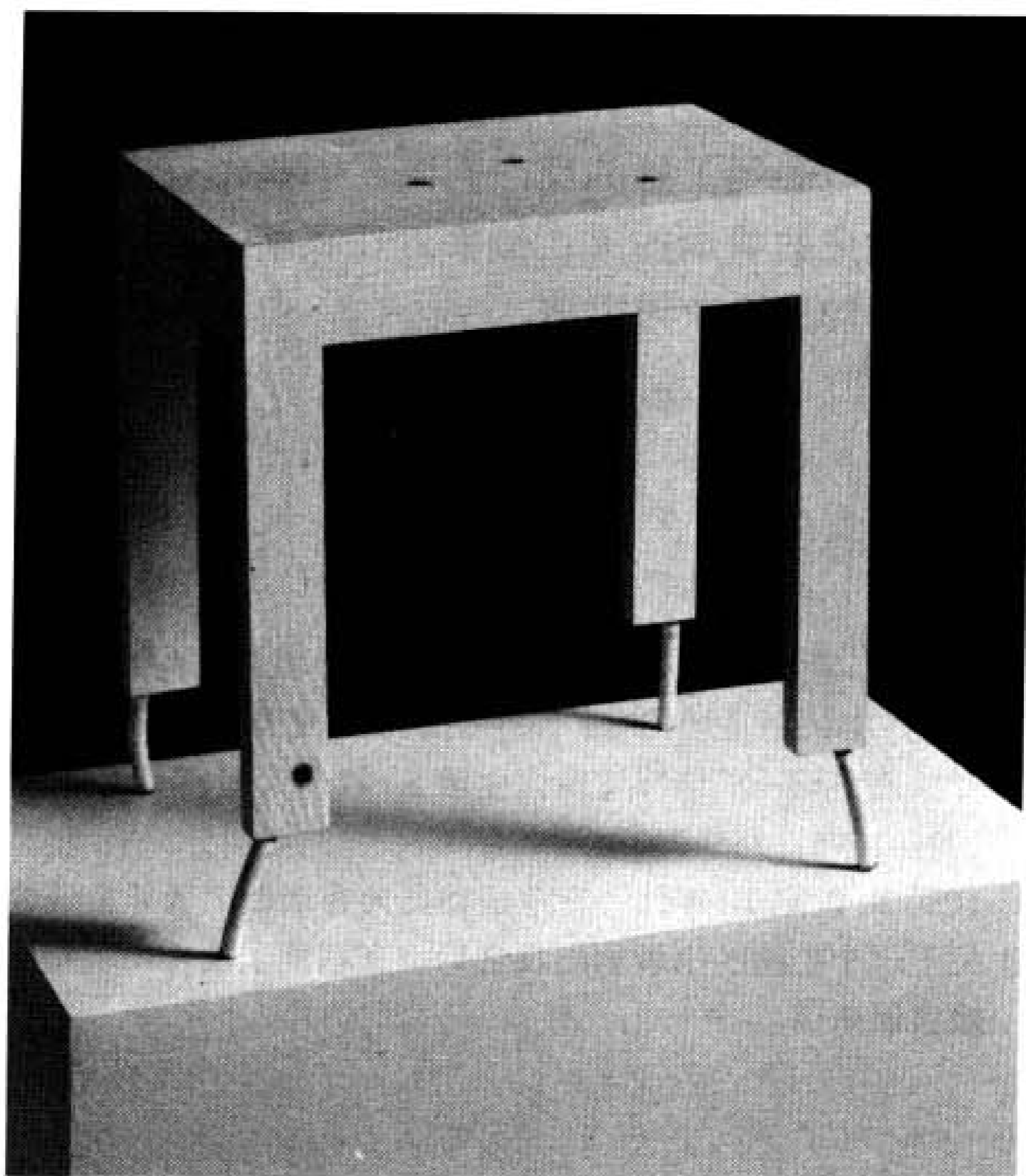
最后几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叛逆浪子们如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用点燃的烟卷表达他们在社会中的无助和代沟，吸烟也给他们带来了安全感。20世纪60年代，几乎每个人都在吸烟，香烟无处不在。艺术家们对普通的香烟广告进行了重新阐释。

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突出鲜明的形象。香烟盒本身便是迷你艺术品，成为收藏家收藏的对象。^[5]库特·史维塔斯早在二战前就在他的拼贴画中使用了香烟商标。流行艺术把库特作品的幽默和吸烟的旧习联系起来。墨尔·拉莫斯描绘了一个伏在雪茄上的裸女来取笑香烟广告及香烟本身的色情化。汤姆·维塞尔曼拿性和香烟的老一套来做文章，描绘了靠在放了一支香烟的烟灰缸旁的裸乳。但是消费社会的形象并不总是多姿多彩、轻松愉悦的。在丹尼尔·施珀里笔下的饭后餐桌上，烟头被掐灭在残羹冷炙上。在所有废物的衬托下，香烟成了消费社会最理想的代号。烟头、火柴、烟盒、卷烟纸和雪

茄烟盒统统都是废物。克拉斯·奥尔登堡的雕像《大烟头》(*Giant Gagends*) (1969, 藏于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反映了这个废物成堆的社会。奥尔登堡展现了不仅加重了烟瘾而且损坏人体健康的成堆的烟头, 他曾经描述自己的作品为“展示极度的平庸”, 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画烟头了。

艺术家用吸烟来表达当代人的焦虑和疲惫。在弗兰西斯·培根的画《乔治·戴尔的两份论文》(*Two Studies of George Dyer*) 里, 一个烟灰缸堆满了烟头, 但这还不足以阻止戴尔在另一个作品中又点起一支烟。这是个紧张、神经质的老烟民的画像。辛蒂·雪曼的摄像作品中也赤裸裸地表现了人类生存的孤



米罗斯劳·巴克《小心》, 2000, 多媒体



杜安·汉森《超市购物者》, 1970, 采用多种技术在聚酯纤维玻璃上用油彩绘画

独和冷漠。这些作品几乎成为标准, 香烟在其中常发挥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随着香烟管制的加强以及对其负面影响的宣传, 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 吸烟失去了它的魅力, 而随之而来的形象转变也是巨大的。理查德·普林斯曾描绘自由的吸烟者, 却发现自己成为一个伤心欲绝的牛仔。在美国的反吸烟运动中, 万宝路的牛仔形象无疑是最懦弱的。世界卫生组织还委托一些画家(如米罗斯劳·巴克)画宣传吸烟风险的画。正如杜安·汉森的《超市购物者》所示, 吸烟已经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 沮丧可怜的烟民是失败者: 毫无成就、肥胖、贪婪和意志薄弱。当所有的光环退去时, 剩下的只是街头那些由超市或电视销售的商品主宰生活的瘾君子。

日益高涨的禁烟呼声也遭遇了反对的声音。与萨特奇收藏有关的英国画家们对禁烟表示震惊。萨拉·卢卡斯拿着她的摄影作品，嘴角叼着一支香烟，作品的标题《以火灭火》明确地表明了她的反叛态度。但是，只有态度足够吗？在一切限制措施面前，生存了四个世纪的香烟的灭亡似乎近在眼前。或许卢卡斯的态度是对的：全社会都在反对香烟，艺术却从中获得突破。

注 释：

[1] 伊凡·加斯克尔《烟草、社会越轨和 17 世纪的荷兰艺术》（柏林，1987：133-134）。

[2] 乔治·本格斯《烟树叶：荷兰的烟草历史及吸烟》（格罗宁根，1964：196）。

[3] 可参见亨瑞·罗瑞特《现代生活》，收入大皇宫、巴黎及都市艺术博物馆编《印象派的源头》（纽约，1994-1995：265-293）。

[4]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专业运动员为香烟做广告非常普遍。

[5] 关于这个主题的出版物出现之后，互联网上涌现出大量的资料，出现了很多俱乐部，如英国的烟盒收藏家俱乐部。

后宫里的忽卡：吸烟和东方主义艺术

伊凡·戴维森·卡尔曼*

19世纪和20世纪初，烟斗是艺术家们用来冒充“东方”绘画的奇幻作品的一个主要元素。那时，“东方”特指伊斯兰世界。五彩斑斓的作品处处冲击着人的感观：七彩霓裳，或通常是女子的丰腴玉体吸引着人的触觉；乐器牵动听觉，再加一套咖啡茶具，味觉和嗅觉也被激发出来。像咖啡一样，烟斗散发着香气。烟斗在制造东方气氛中之所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吸烟可以作用于人的精神。据说，穆斯林人经常用大麻或鸦片来填充烟斗。但即使是最普通的介质——芬芳的烟草——长年吸食也容易成瘾。

悠闲自在的吸烟是东方艺术家想象中的理想状态。不管是后宫中的宫女还是士兵，都不慌不忙地倚在烟斗旁，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东方艺术中出现的两种烟斗均意味着“慢”——匆匆忙忙是吸不了通常长达一点二到一点五米的长柄烟斗的。“忽卡”(Hookah)是艺术家们最喜欢的东方烟斗，单单它的章鱼形状就要求吸烟者耐心地坐在它的周围，一个一个地吸。简而言之，西方的东方主义艺术家用烟斗赋予“东方”以一定的感觉高度，但实际上却给它很低的评价。东方人的享乐主义强调慵懒。

这种慵懒对习惯抱怨的西方“文明人”来说不无吸引力，从卢梭到弗洛伊德，代代都在抱怨现代社会让人连闻闻玫瑰花香的时间都没有。甚至在两百年前，忙碌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独特标志。因此，东方艺术表现出的庸懒气息触动了那些对形形色色的工作持怀疑态度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本能——他们包括贵族、相当多的靠利息或收租过活的“食利者”、花花公子、浪漫主义人士、波西米亚一族以及艺术家们自己。

当然，东方主义艺术并没有极端地批判资本主义，即使是那些真心实意地仰慕东方文明的人也没有极端地批判西方。东方人的慵懒快乐被看作懒惰无能的代名词，他们的纵欲被解释成缺乏理性。事实上，忽卡所代表的慵懒是东方人排斥勤劳工作的证明，或许他们就没能力工作。因此，伊斯兰国家的民众要想跳出西方国家所描述的“倦怠停滞”，西方的干预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有些人对东方文化舒缓、烟雾弥漫的快乐的崇拜也成为西方殖民统治合理化的借口。

因此，东方主义艺术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之时也是欧洲在伊斯兰世界扩张权力之日，其序曲是1798年拿破仑的东地中海之行，这引发了欧洲的“埃及风”。随后，1830年对法国阿尔及尔的占领更鼓舞了欧洲人的士气。东方主义的高潮在殖民统治的顶峰时期到来了：从19世纪的最后十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伊凡·戴维森·卡尔曼 (IVAN DAVIDSON KALMAR)：多伦多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一种文化的写照：托洛茨基、弗洛伊德和伍迪·艾伦思》(1994)，合著有《东方学：犹太篇》(2004)。

当然，浪漫东方主义者的幻想（如控制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欲望）持续的时间更长久。骆驼牌香烟，也就是电影《卡萨布兰卡》（1942）中汉弗莱·博加特和英格丽·褒曼吸的香烟来自于殖民统治没落的早期。或许东方主义者是借助电影来怀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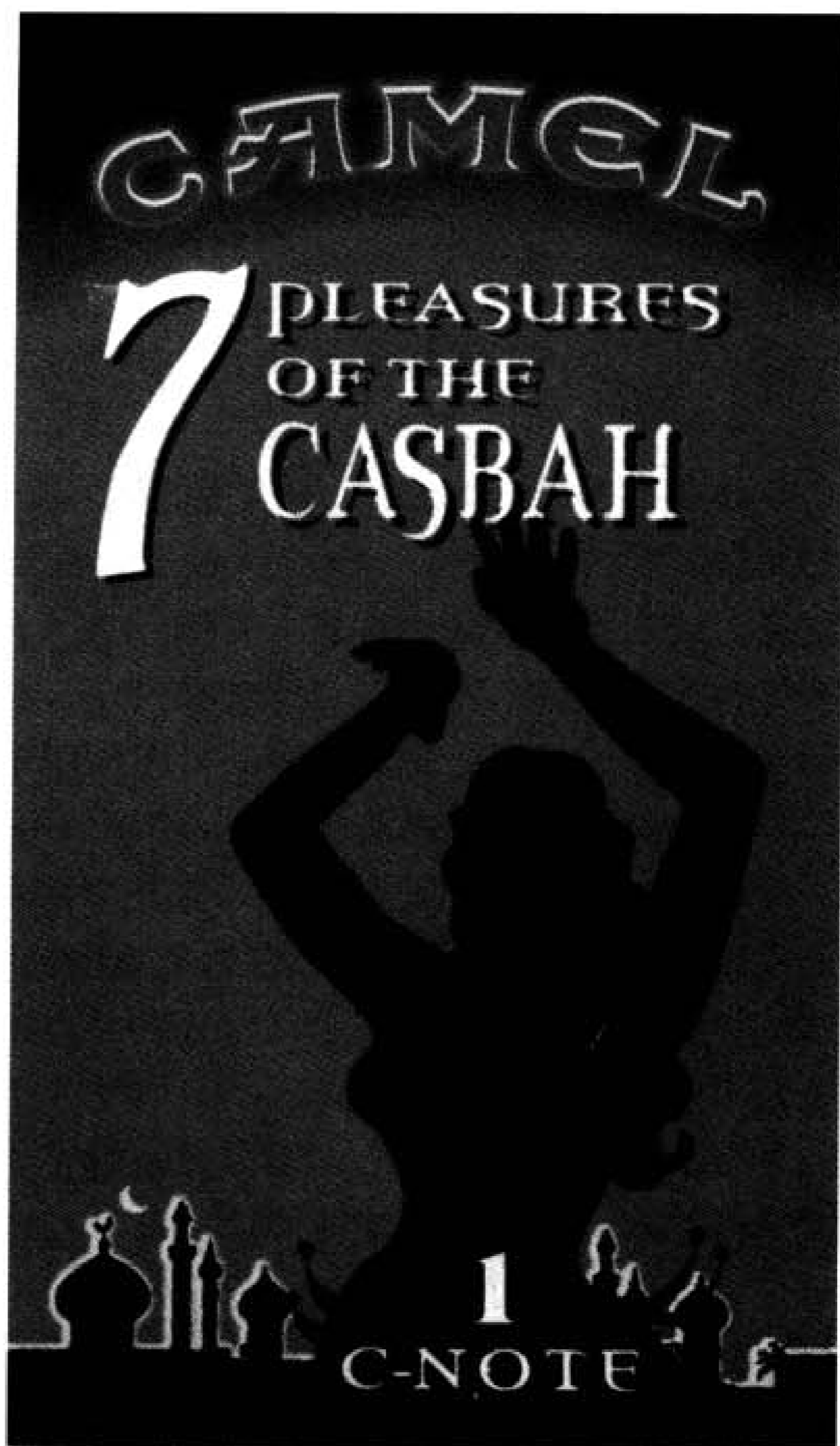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样，骆驼牌香烟的广告最好地体现了自19世纪早期以来兴起的东方吸烟绘画中的性别歧视。这种歧视不仅是西方歧视东方，而且是男性歧视女性。骆驼香烟奖券上的人物图案意味着人们要把吸骆驼烟的乐趣同在北非城堡中的享乐联系在一起。画面上曲线优美的女子应该是城堡中的肚皮舞女郎，或者酒吧里给欧洲人带来视觉享受的舞女。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图案很容易让吸烟者联想到他无法得到的“城堡快乐”——接近穆斯林男人独有的后宫宫女。

探秘后宫

毫无疑问，在东方主义绘画流行的时期，穆斯林后宫的香烟卖得很好。长久以来，后宫一直和烟斗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描绘后宫内室的作品中，烟斗是一个必要元素。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为这类作品确定了基调。精心绘画的身体加上质感丰富的画布，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去触摸，忽卡或其他类型的烟斗还象征着吸烟的另一种快乐。

或许后宫中的女子自己刚刚吸过烟，在一种比烟草更强烈的药品的作用下，她们浑身散发出一种懒洋洋的性感。但是，一种更大的可能是，烟斗是为女子的男性访客准备的，他进门后会拾起烟斗，坐在椅子上吸烟。女子注视的正是这位即将到来的男人。现在，我们把自己想象成那个男人：他就这样堂而皇之地闯入后宫，一位美丽的女子正在恭迎他。

我们先问问自己，我们占领了谁的领地？后宫的穆斯林主人从来没有出现在这类作品中，但我们可以把他们排除在想象之外。电视和电影已经拿这个社会形态大做文章，主题也与东方主义绘画有关。安格尔这幅作品中的场景是展现在一个欧洲男子面前的。他不费吹灰之力地闯进了穆斯林男人的私人领地（可能他已经打败了这个穆斯林对手），他才是这个女子正在迎接的人。



骆驼香烟的百元奖券



安格尔《奴隶陪伴下的宫女》，1839-1840，油画

同安格尔作品中女子相似，欧仁·德拉克罗瓦的《闺房中的阿尔吉尔女人》（*Women of Algiers in their Apartment*）也是关于穆斯林内宫的经典作品。虽然忽卡在阿尔吉尔的流行程度不及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但忽卡比单管烟斗更适合这类作品，因为忽卡可以立起来，便于放置于一个显眼的位置。另一个原因是，忽卡常用于多人吸烟，这样可以出现多个吸烟者。在德拉克罗瓦的画中，忽卡被放置在三个女人的中间，证明她们是在一起吸烟的。

群体代替个别，这暗喻了后宫的一夫多妻制。三个女人一起吸烟更加衬托纵欲气氛——从表情和姿态来看，三个人已经吸得醉眼迷离了，可是主人还没有来，但却来了一个欧洲男子。

在后宫场景中经常会出现一扇门，暗示着一个神秘的房中房。德拉克罗瓦和其他东方主义艺术家的标题中看不出这种嵌套性，他们暗指女人的阴道，同时也突出了这个男人——欧洲观众或艺术家——闯入穆斯林私密领地的高超本领。视野以外的房中房放大了这种“入侵”的感觉，同时也能勾起人们对男欢女爱的幻想。事实上有多少房间就有多少温顺的女子。如果画家把这些房间都画出来的话，那必定室室都有忽卡。



欧仁·德拉克罗瓦《闺房中的阿尔吉尔女子》，1834，油画

白人、黑人奴隶

在很多东方主义的肖像画中，注视入侵者的后宫女子可能是白种人。安格尔的《大宫女》(*Grande Odalisque*)是法国人，德拉克罗瓦极有可能采用了犹太人做模特，因为她们长得不像欧洲女子，这点或许也说明了黑人侍从之所以出现在德拉克罗瓦的作品中是为了衬托宫女的肤色，让她们显得更白皙。

没有人能比法国东方派重要人物让·里昂·热罗姆更会描绘宫女的象牙白肤色了。他去过很多次东方，个人也以求真著称，但他似乎也寻找皮肤同样白皙的女子来做模特，不管她们是来自尼罗河还是塞纳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后宫之浴》(*The Harem Bath*)，其中三个皮肤洁白的女子纵情吸烟，而前景中的另一个裸女则在悠闲地梳妆。毫无疑问，这些女子皮肤白得毫不含糊，但有时他仍然会在画中放一个黑人侍从，可见并不单单是为了衬托宫女。在《摩尔式洗浴》(*The Moorish Bath*) (现存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中，热罗姆描绘了一个伴在几个浴女身边的长相男性化的黑人侍从。她的男性化特征告诉观众

不能把她想象成主人的性伴侣，她不是与主人共浴、为他洒香水的人，忽卡也不是为她准备的。

东方派作品中有无数黑人服侍宫女的例子。欧洲女子甘心情愿地成为欧洲男子假想的穆斯林后宫中的囚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点正好和莫扎特的《后宫诱逃》中欧洲男人拯救白人女子的古老故事相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东方派的后宫画不是借西方反映东方，而是正好相反，用东方来反应西方妇女无助的性奴隶地位。这是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性别政治的一种反映。

然而，事实不仅如此。性别歧视和专制统治在东方派艺术中经常相伴而行，这就是为什么只画白人是不够的，一个不起眼的黑人仆从才能让作品显得完整。黑人仆从反应了不仅局限于欧洲的主奴关系。确实，西方的思想家一直将奴隶制和“东方的暴君”^[1]联系在一起。如果后宫中白人奴隶总是与一个黑人奴隶相伴，这证明穆斯林人也养奴隶，而且当时是非洲奴隶。西方世界早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奴隶制依然留存于穆斯林国家，这个事实改变了人们对西方人更喜欢圈养奴隶的看法。因此，穆斯林人显得比基督徒们更恶劣。人们不由得想，穆斯林人无法反对西方对他们的统治，因为他们本身已经主宰了别人几个世纪，到现在还在买卖奴隶，甚至是白人奴隶。

来自殖民地的明信片

然而，象牙白肤色的女子并非如画家假想的那样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因此，当19



《情景和类型：摩尔女人》，明信片



L.L 摄影工作室《情景和类型：后宫中的摩尔女人》，明信片

世纪末的摄影师们为迎合公众对“后宫”穆斯林女人的强烈好奇心，准备用照片来记录画家们一直在兜售的形象时，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西方人常通过旅游，更主要的是通过军事和商业扩张来认识东方，他们迫切想了解东方的“真实”情况。热罗姆追求最大可能的精确性和新颖性，他的作品比同时代的摄影作品有更强的现实性。但是，照相机的发明旨在引入一种靠捕捉时间和空间的真实一瞬来栩栩如生地反应目标事物的一种媒介。摄影师并不比画家能干，他们也无法进入真实的后宫，所以他们也效仿艺术家们，想象出一个后宫，让由妓女充当的模特们按前几代东方派画家如安格尔、德拉克罗瓦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穿着打扮、摆出一招一式。东方派一贯想象后宫的作法使得这样的照片看起来仿佛就是对现实的再现。

为了维护照片的真实性，照片上也被配上注释，装模作样地告诉大家这些模特并不是真实的“性伙伴”，而是东方人某种族或地域变体的代表。马洛克·阿卢拉对法国阿尔吉尔明信片的研究表明，同一个女人曾穿着相同的东方服饰出现在三个照片中，却分别代表“年轻的贝多因人”、“南方女孩”以及“卡拜尔女孩”。^[2] 这些照片的注释都保证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东方女孩”。一个假想的白人女奴生活的地方却出现了“东方女子”，虚假的后宫生活情景无意中掩盖了模特作为妓女被奴役的地位。

照片和画作一样总是不会忘记忽卡。在《情景和类型：后宫中的摩尔女人》（L.L 摄影工作室）中，吸烟用具非常唐突地打断了模特修长的腿部轮廓。^[3]

通常，忽卡旁边会放上一杯咖啡。注意这张照片中有三杯。这些宫女们并不是独居，



《阿尔吉尔的摩尔女人》，明信片



热罗姆《土耳其民兵在歌唱》，1868，油画



热罗姆《土耳其民兵首领》，1881-1882，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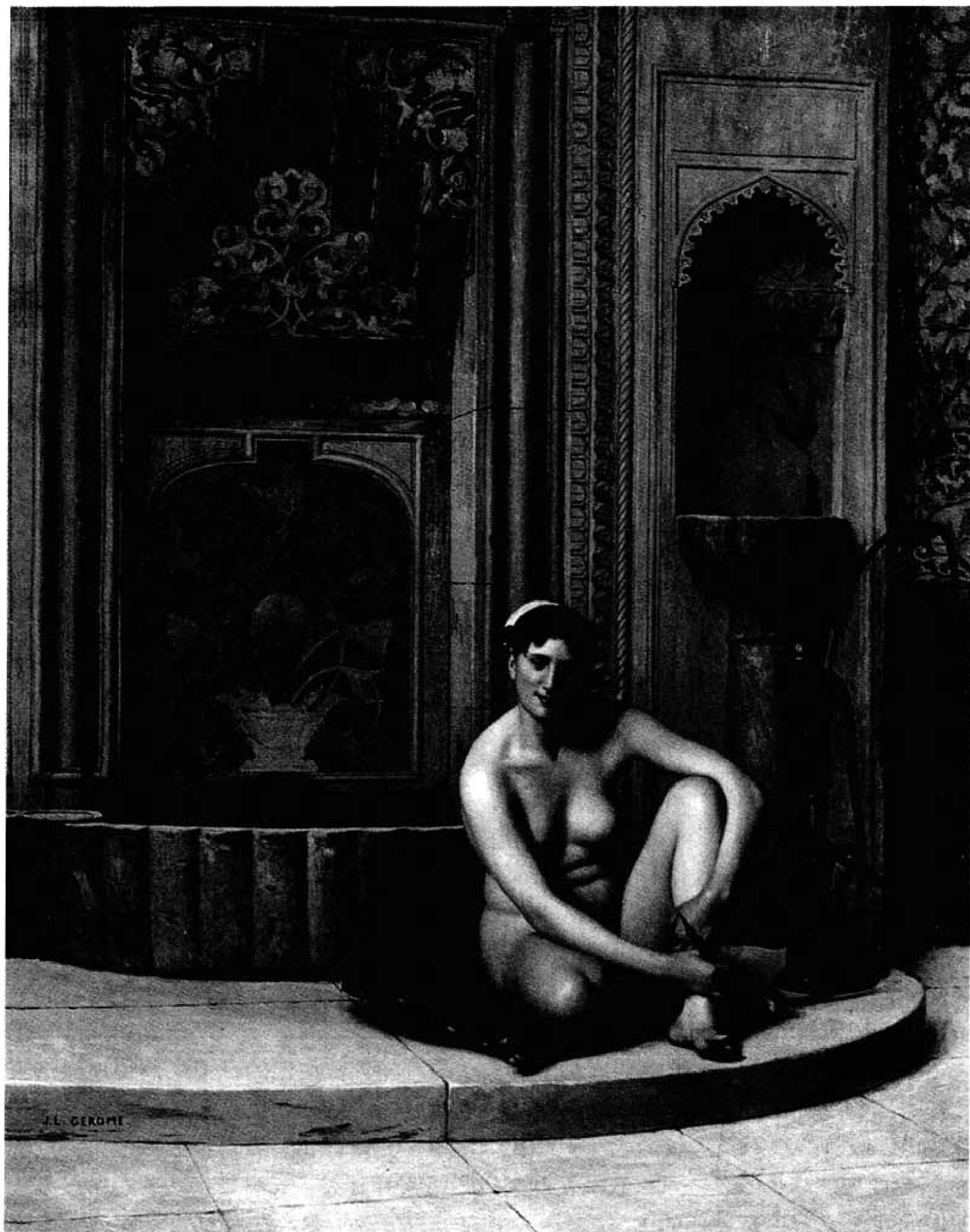
她和同伴们共享后宫，共享主人的宠爱。如果他喝咖啡和吸烟，一定是和照片中的女子及其他宫女一起进行的。

除了早期的艺术模特，用妓女作模特的宫女明信片通常被视为色情照片。因此，照片比画更清楚地暗示了欧洲男人们相当熟悉的一个地方——妓院。对于他们来说，穆斯林的后宫就是东方的妓院（无论是妓院还是戏院都会用一些“外国舞者”）。穆斯林后宫宫女的唯一吸引力就在于她们只属于一个男人，而在欧洲，男人逛妓院不但要花钱，而且要和其他男人共享这些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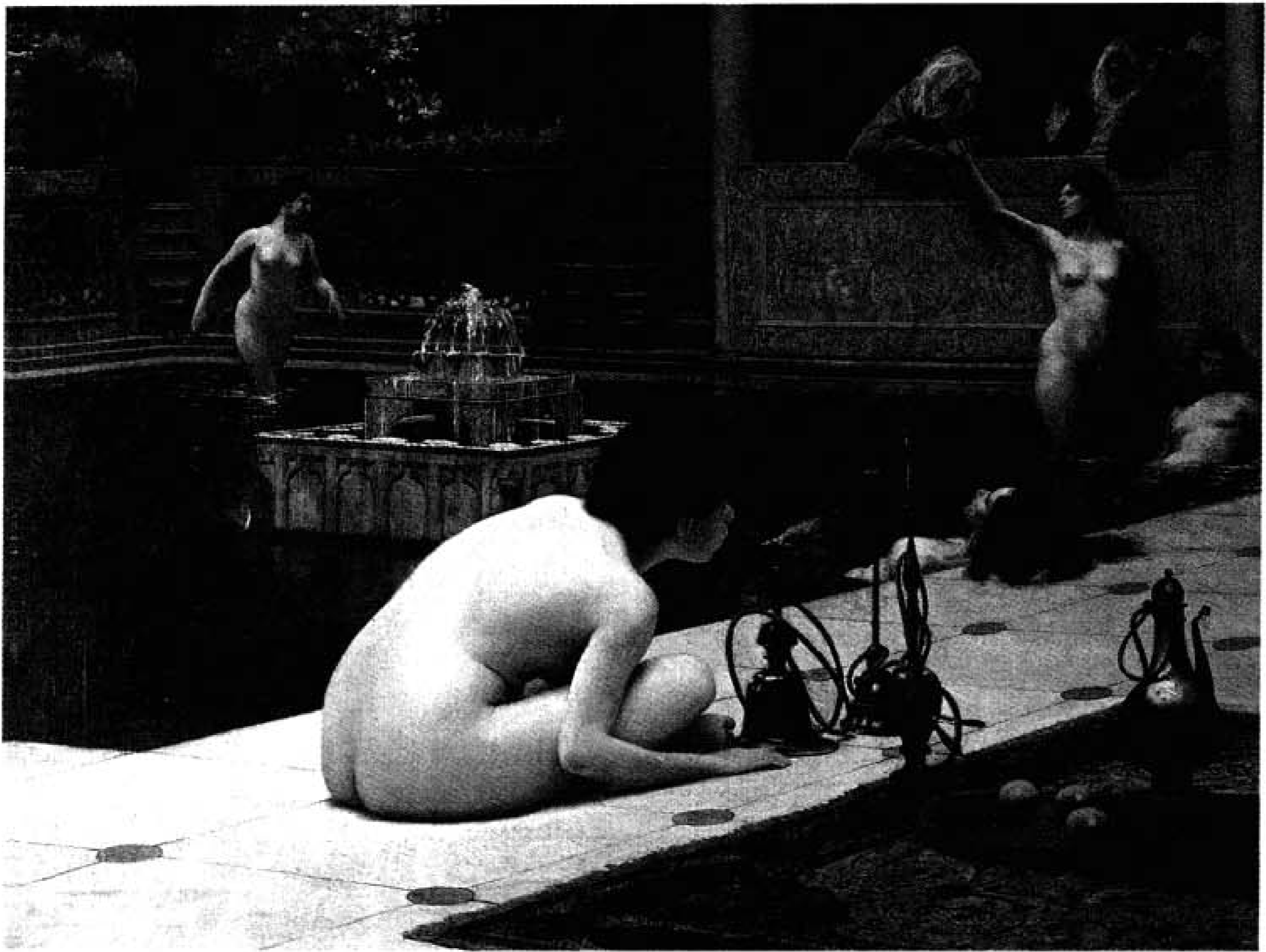
阿卢拉收藏的明信片中，也有一些“作品”放弃了安格尔、德拉克罗瓦树立的规范和传统，十分大胆地描绘东方的妓女。在穆斯林国家旅游或工作的很多欧洲男人包括许多摄影师都曾“惠顾”过她们。在这些“民族心理学”作品中，忽卡也常被大家所熟悉的妓女的标志——香烟替代。

和东方派画作和西方色情作品一样，摄影艺术也喜欢描绘多个宫女。照片《阿尔吉尔的摩尔女人》的标题让人想起了德拉克罗瓦的名画，也借此赢得了一点声誉。但是，照片中香烟以及人物的面部表情，尤其是右边女子的表情，暴露了只有妓女或“东方女子”才有的放荡。因此，它的标题只会让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人排除潜在的疑惑而深信不疑：阿尔吉尔的女人都是妓女。所有的都是，还是应该是？答案就在于欧洲人了。

即使是在殖民时期，穆斯林人也竭力保护他们的女人不受欧洲列强的欺辱，但这样



热罗姆《宫女》，时间不详，油画



珍尼《忽卡灯》，1898，油画

的信念遭遇了很大的挫折。然而这也代表了一种半潜意识的欲望：至少在性方面要无限地控制“东方人”。

士兵和裸体男孩

既然穆斯林士兵在政治和情爱方面都是欧洲男人专制的绊脚石，欧洲人便渴望在东方派作品中看到他们的对手和后宫中的宫女一样慵懒、憔悴、麻木。

这里，我们又可以感觉到表面的羡慕夹杂着潜意识中的鄙视。热罗姆的《土耳其民兵在歌唱》（现在巴尔地摩的华纳艺术馆）描绘了西方人喜欢看到的一群士兵。这一作品有浓郁的荷兰气息，让人联想起扬·斯汀的作品。

本杰明·狄斯雷利，维多利亚女王最喜欢的首相，曾在他的日记中愉快地回忆了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土耳其贵族家做客的经历。他写到：“我非常像个土耳其人：戴着斗巾，吸着一根六英尺长的烟斗，蹲在烟室里。人告诉我，我走得太慢了，一点都不像个英国人。”^[4]对于本杰明·狄斯雷利来说，与土耳其人一起吸烟意味着友谊以及人相随俗的意愿（哪怕是短期的）。这点让人想起“与美洲土著一起吸烟”意味着北美洲白人和本地人的友好关系。^[5]

穆斯林士兵的生活方式有点令人羡慕，可是他们的慵懒也意味着低效率：这样的士



夏尔·格莱尔《阿拉伯女人》，1835，
水彩画

兵最容易打败。在《阿那特向他的狗吐烟》（1882年，下落不明）这幅作品中，热罗姆笔下本以凶悍著称的穆斯林士兵变成了只会吓唬小狗的无能幼稚的胆小鬼。虽然贬低穆斯林士兵并非热罗姆的本意，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军队绝对构不成对西方的威胁。

认为穆斯林人阳刚气不足难以挑战西方人的想法，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同性恋这么迷恋。在《玩蛇人》（*The Serpent Charmer*）中，穿着土耳其不同地区服装的士兵观看一个裸体男孩如何用葫芦烟斗的声音来吸引眼镜蛇出动。他们懒洋洋地围在一个戴绿头巾的、手持一根长颈烟斗的长者身边。这只长长的烟斗暗指许多武器和长笛的形状，阴茎、同性恋和恋童癖的寓意也很明显。毫无疑问，借助这样的作品，西方男人（包括艺术家本身？）表现了自己糟糕的性生活。

可以想象，这样无能的穆斯林士兵很难将西方男子逼上绝路。东方派艺术那些无伤大雅的表面形象下，却暗指了一种将男人一网打尽、解放受性奴役的女子的军事胜利。在这种狂热的帝国主义梦想中，侵略者可以撇开穆斯林男人，自由进出令人垂涎的后宫。她们将会向胜利的欧洲男人投怀送抱，并在他准备吸烟时，为他轻轻地摇动孔雀羽毛扇。

注 释:

- [1] 关于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爱德华·塞义德的《东方主义》(纽约, 1978)。关于“东方暴君”对西方想象和政治哲学的影响, 请参见阿伦·戈瑞斯查得《苏丹宫廷: 东方人的西方幻想》(伦敦和纽约, 1998)。
- [2] 梅尔克·阿路拉《殖民地的后宫》(明尼阿波利斯, 1986: 44-45)。
- [3] 同上, 第 78 页。
- [4] 本杰明·迪斯雷利《给本杰明·奥斯汀的一封信》, 1830 年 11 月 18 日寄自希腊那普良。大英图书馆编号: MS 45908, fols 33-4。
- [5] 在西方, 人们经常把烟草和美洲土著及东方穆斯林联系在一起。欲更全面地了解北美土著和中东穆斯林的共同点, 请参考纳比·马塔《大发现时期的土耳其人和摩尔人》(纽约, 1999)。

歌剧中的吸烟

琳达·哈琴*、米切尔·哈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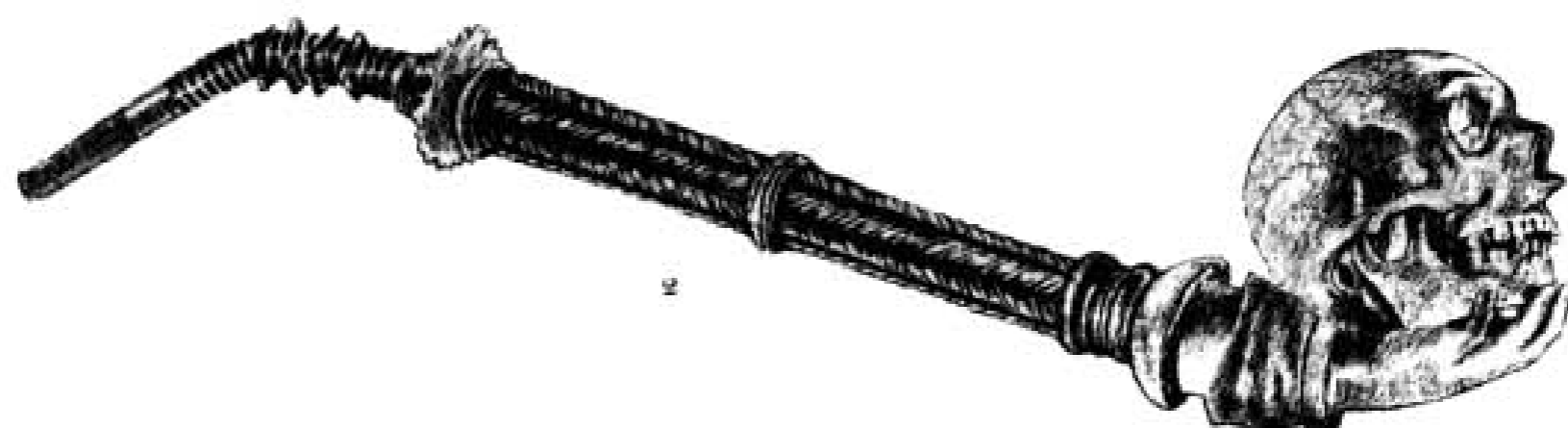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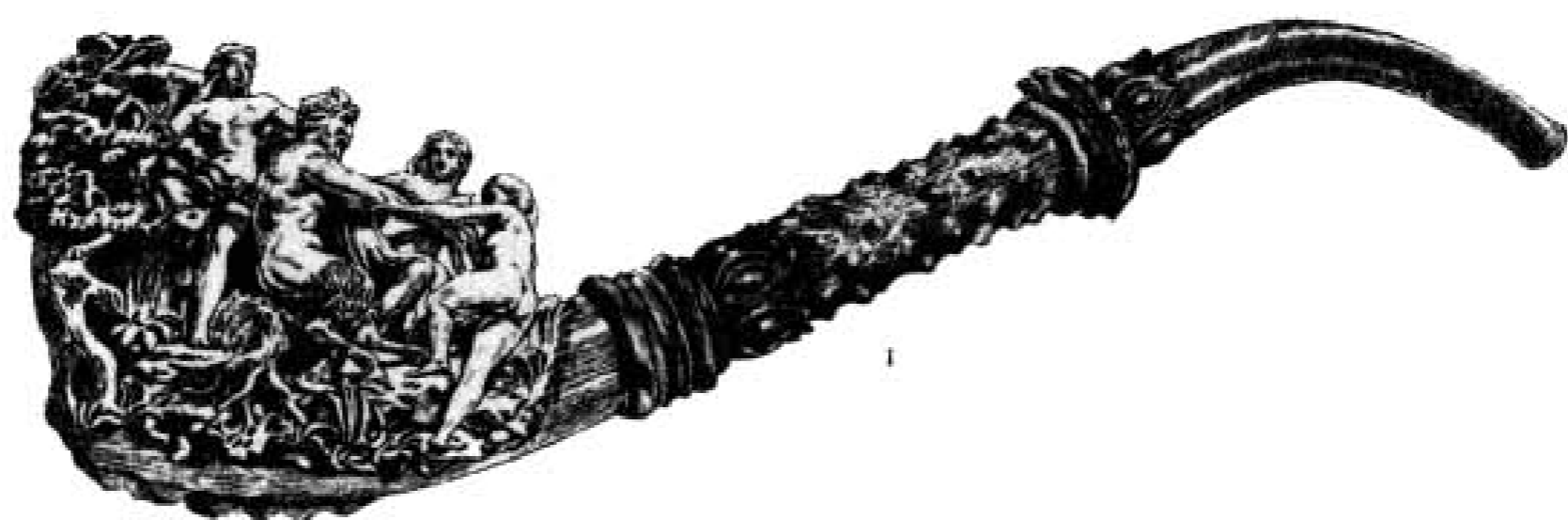
在西方文化中，吸烟一直是矛盾的结合体。作为兴奋剂和弛缓剂，吸烟既有医学功效也能置人于死地；吸烟既能带来声色欢愉，也潜藏着危险；吸烟既意味着友谊，也可暗指背叛。吸烟的双重性质也体现在性别问题上。我们知道，在16世纪的法国和17世纪的荷兰，男女都在吸烟。但是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吸烟渐渐在欧洲体面的资产阶级妇女中失宠。正如理查德·克莱恩尖锐地指出的，还有一些女人在吸烟，“尤其是那些靠出卖色相的演员、吉卜赛人和妓女”。^[1]有些妇女以吸烟和穿男人装向世俗特权挑战——可以想象一下乔治·桑穿着长裤，吸着雪茄烟的样子。泰奥菲尔·戈蒂叶在1852年写给玛丽·玛蒂的诗中清楚地指出，最强烈的性别联想存在于吸烟和性越轨之间——两者同样交织着兴奋和放纵。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展示吸烟矛盾性的歌剧登上了欧洲的舞台。历史证明，歌剧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反之也会影响社会。例如，历来香烟广告表现的西方人耳熟能详的友谊和兄弟情谊也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和雅克·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等。歌剧还采用了电影用吸烟塑造反叛形象的做法，吉亚卡摩·普契尼在歌剧《西部姑娘》中塑造的杰克·兰斯成为之后亨弗莱·鲍嘉、詹姆斯·迪恩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扮演的诸多电影人物的模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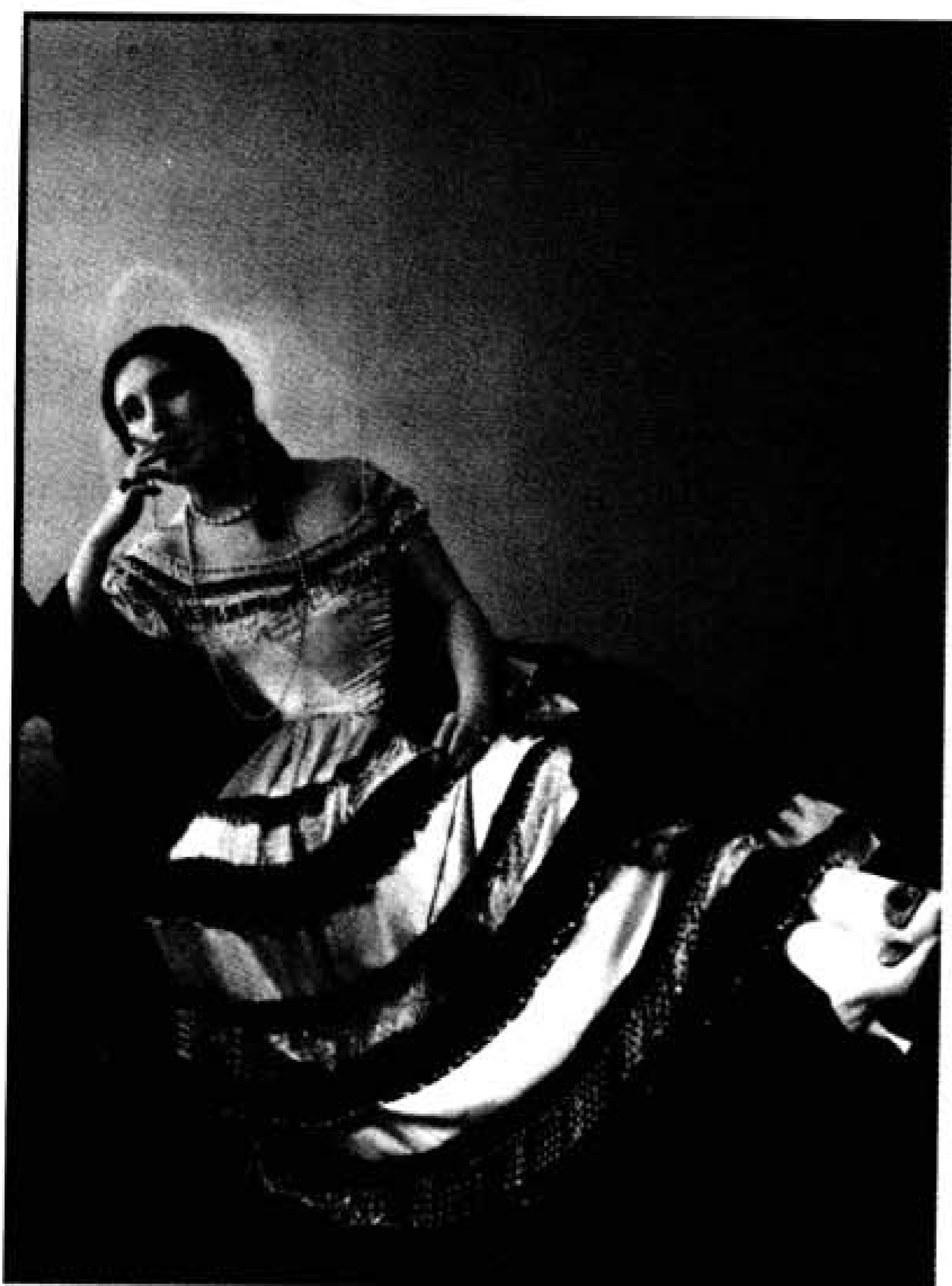
鉴于歌剧长期以来一直迷恋于生和死、激情与暴力的主题，因此吸烟主题的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歌剧保留并充分挖掘了吸烟与声色欢愉和色情的联系，并加入另一种令人忧虑的东西：男人的忌妒和暴力。这两种主题频繁地出现在当时的歌剧中，足以说明它们确实能让表演更加生动和深刻。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最初最温和的祈祷，最后都会暗藏杀机。例如，在沃尔夫—费拉里的《苏珊娜的秘密》中，我们见识了一个对香烟的芬芳怀着纯真无瑕的赞美之情的“叛逆”女子。被苏珊娜爱称为“我那带着香气的小毛病”的香烟，却是她向新婚丈夫极力隐瞒的东西，因为她知道她这个阶层的女子吸烟是多么的失态。妓女们可以叼着香烟来招客，但人们绝不会相信像她这样的资产阶级妇女也会有这样的嗜好，因为吸烟只是男人的事情。因此，当她的丈夫闻到她身上的香烟味便误以为她早有情人。在他以暴力宣泄了忌妒和暴力之后，最终真相大白。尽管他的过激反应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我们也知道这种暴力像奥赛罗的妒忌一样具有潜在的悲剧

*琳达·哈切恩（LINDA HUTCHEON）：多伦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

**米切尔·哈切恩（MICHAEL HUTCHEON）多伦多大学医学教授，并担任大学健康网络组织医学教育副主任医师。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出版过多部个人著作外，还与琳达·哈切恩合著有戏剧《欲望，疾病和死亡》（1996），《躯体的魅力：鲜活的戏剧》（2000）以及《死亡的艺术》（2004）。



代表性爱和死亡的烟斗，来自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阿恩慈特藏



费拉里的歌剧《苏珊娜的秘密》中由拉克嘉·波利扮演的苏珊娜



1910年，帕斯夸里·阿马图在普契尼的歌剧《西部姑娘》的首次公演中扮演杰克·兰斯

性。故事的最后，妒忌的丈夫认为妻子不应该放弃她的爱好，他要和她一起吸烟。然后，她为他点上烟，俩人一起唱着：真正的爱人，一刻不停地吸烟。然后他们又夸张地用一支蜡烛为各自点上一支烟，慢慢走向新房——被世俗认可的资产阶级享受新婚的地方。这部喜剧承认了香烟与享乐和色情的多种联系，同时也温和幽默地暗示了香烟对中产阶级秩序的威胁。

让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转向工人阶级，更加直接地面对暴力和妒忌的主题。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很多欧洲语言用香烟、吸烟和划火柴来比喻妒火中烧、燃烧的愤怒和疑虑重重等。吉亚卡摩·普契尼和阿达米的单幕剧《外衣》（1918）根据迪迪尔·格尔德的自然派情节剧改编而来，讲述了塞那河上船工之间“罪恶的激情”。戏剧开场时，夕阳下驳船船主麦克坐在自家的船上，手里拿着尚未点燃的烟斗。比他年轻许多的妻子乔洁塔走进来，提醒烟斗没有冒烟。麦克不失时机地接茬说，烟斗熄灭了，可是他的激情并没有熄灭。

麦克十分妒忌乔洁塔对年轻船工卢吉的喜爱，卢吉的妒忌心也很强，他扬言谁要接近乔洁塔他就杀了谁。吸烟的故事继续着，一只划着的火柴点燃了情人的激情，同时代表着“警报解除”——情人深夜幽会的时间到了。歌剧的高潮在麦克划着一只火柴（想点燃这只烟斗）时到来了，妻子与情人的偷情遭到了丈夫毁灭性的报复。吸烟作为一种有效的形象，或是一个关键的舞台动作，或是一种刻画人物的手段，在这部戏中的角色既非偶然亦非意外。

与香烟和吸烟有关的歌剧中最有名的要算乔治·比才的《卡门》（1875），一个由男人的妒忌和女人的独立引发的悲剧。整个故事发生在西班牙，但文化背景却是法国的。该剧改编自梅里美于1845年创作的流行中篇小说，该小说根据一个法国人在西班牙的亲身经历写成。《卡门》在巴黎歌剧院的首次公演由于打破了很多地方性舞台禁忌而惨遭失败，其中之一便是一群一边吸烟一边扭打在一起的女子的合唱，这些女子是故事中塞维利亚的一个著名卷烟厂（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个卷烟厂）的女工。在卷烟厂门前，歌剧拉开了序幕。19世纪时，这个位于塞维利亚郊区的厂房把守森严，因为里面成百上千的女工正在用纤细的手指卷着烟卷，酷暑难当时，一些人常常半裸着身体。一般男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确实有一些人为了得到通行证而惹了麻烦。事实上，卷烟厂很快成了许多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男性访客的必经之地。不久，随着戈蒂叶、比埃尔·路易士、莫里斯·巴莱斯等作家的造访，卷烟厂和里面的女工渐渐成为法国色情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作家对这些裸女的描述既让人向往又令人望而生畏。

法国的剧作家把他们的“卡门”安置在塞维利亚卷烟厂，并让她的工友们齐声歌颂吸烟和爱情，这其中的深意不言而喻。不同于偷偷摸摸吸烟的苏珊娜和她丈夫的资产阶级风格，认为持续的吸烟便是真爱，这些工人阶级的女工们认为爱情的短暂就如同吸烟的片刻，她们同样也强调了吸烟的乐趣，这正是吸烟超越社会阶层的意义所在。剧作家就这样把卡门放在吸烟的背景下，自己这个风骚撩人的女人是这样赞美香烟的：它变化莫测，如吉卜赛人般叛逆。这也是对她最恰当的描述。在许多版本中，卡门均以叼着香烟的形象出场。从卷烟厂门外吸烟的护卫及其他男人嘴里以及他们的歌唱中，我们知道



1952年于纽约城市大剧院上演的《卡门》中烟厂女工合唱的场景

卡门性感迷人。当因与工友打架而被捕时，她表现得激情澎湃而叛逆；当说服逮捕的士兵唐·霍塞释放她时，她的独立和决心彰显无遗。

卡门和霍塞的爱情家喻户晓，爱上了斗牛士的吉卜赛女郎最终被妒忌的前情人杀害。这个结局也撼动了另一个禁忌：卡门是第一个死在巴黎歌剧院的女主角。从观众的反应来看，显然这一越界加上卡门在诸多方面的冒犯让巴黎观众忍无可忍。巴黎歌剧院的总监卡米尔·都洛克勒这样说：“巴黎歌剧院这样属于家庭、举行结婚仪式的地方怎么能出现吸烟的吉卜赛女郎？”^[2]对首次公演的评论一边倒地谴责被谋杀的女主角，而同情被她勾引的那个可怜无辜的男人。为什么19世纪晚期的巴黎观众会站在唐·霍塞一边，认为卡门的死是她自己咎由自取，而不是他冲动、妒忌和欲望的后果？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当时法国人是如何看待西班牙妇女和吉卜赛人的。

雨果在于1829年创作的《东方诗集》中，从欧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将西班牙置于非洲和东方之间，为法国将“欧洲的这部分”东方化埋下了伏笔。^[3]西班牙妇女，尤其是安达卢西亚妇女以性感著称。但是在舞台和文学作品中，人们才对吉卜赛女郎有了完全的认识。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一样，是法国人可以在自家地盘上天天见到的外国人，是欧洲人眼中的“异类”。人们用动物形象来描述梅里美笔下的卡门的野性美、凶狠和异域道德观。她被表现得风骚撩人，同时也狡猾恶毒。为迎合巴黎观众的胃口，舞台上的卡门被“驯服”了许多，但她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吉卜赛女郎：性感、淫荡，既是万迷人



吉卜赛女郎牌香烟盒

又是危险分子。她是一个吉卜赛人的事实又让人们联想到游牧民族摆脱世俗约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历史上，罗马民族的语言、历史和道德准则都自成体系，可是在许多欧洲国家，罗马人却被迫害，被人们看作是凶险、迷信、令人恐惧的外国人。这种负面的印象从头到尾地出现在梅里美的小说中，尤其是在1847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在最后一章中描写了不讲道德的吉卜赛女人。

卡门的性别和社会身份中的独立性，使她成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法国中产阶级观众从道义上谴责她的走私行径甚至吸烟行为。怪不得法国有一种香烟叫“吉卜赛女人”牌。此外，卡门属于工人阶级，正如苏珊·麦克拉蕾所述，她的音乐表明她非常熟悉流行于娱乐场所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舞曲。^[4]

在21世纪，当从吸烟到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一切文化内涵都发生变化的时期，一个歌剧导演如何表现卡门的文化和道德出轨，才能既展示其中的魅力又不失其威胁？在我们这个年代，吸烟被视为对健康的一大威胁，而不像古代人们那样认为吸烟可以驱逐霍乱和瘟疫。然而电影资料告诉我们，时至今日吸烟女子在人们眼中仍然是性感迷人、散发着异国情趣的摩登女郎。上个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导演路西·安品特莱在为威尔士国家歌剧院导演的节目中，以自醒的方式向对历史背景知之甚少的观众揭示了《卡门》的意义。借助烟厂工人尽情吸烟时的歌声，品特莱用自醒式的讽刺和模仿突出了差异。性感的女子总是伴着成堆的烟卷走上台来，她们坐在旋转舞台上吸着烟，这些女工都很性感，一边吸烟一边卖弄风情。歌声结束时，观众会发现这些工人不全是女人，有些是由男人扮演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性别越界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

毫无疑问的是，观众的心中时刻牢记着吸烟的负面效应，导演必须十分警惕这一点。在为加拿大歌剧院导演《马里欧与魔术师》时，导演罗柏特·卡森和舞台设计迈克·李维纳在开场的一幕——慕尼黑的一场演讲——的主要背景上写上大大的字“禁止吸烟”。在背景为意大利的一个剧院、魔术师奇波拉正在表演的另一幕中，“禁止吸烟”四个字变成了意大利文。奇波拉自顾自地吸着烟走进来，显然毫不在意公众的安全和健康。作为一个法西斯政治家的化身，他毫不讲究地冲台上的演员、甚至台下观众席吐着烟圈。现代人都深知吸烟的副作用，如吸二手烟的危害和吸烟容易引发火灾。因此，不仅剧中的人物形象令人蔑视，观众对此的反应也是深恶痛绝。吸烟的双重性让位于独特的政治思想。

如同所有的戏剧形式一样，歌剧必须把观众考虑在内。在19世纪，剧作家可以借

助吸烟的两面性来复杂化、深化舞台表演的冲突。然而在吸烟的文化和医学意义都发生改变的今天，这种做法便显得问题百出。在现代版的《卡门》中，女主角和她的工友们仍然在吸烟，这或许是因为相对于吸烟与声色欢愉的联系，吸烟还象征着男性的暴力和妒忌。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歌剧的表现形式随文化背景、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改变。然而，或许仍有一些连续性是永远挖掘不尽的。

注 释：

[1] 理查德·克莱恩《吸烟赛神仙》（达拉谟和伦敦，1993：117）。

[2] 引自苏珊·麦克拉蕾《乔治比才：卡门》（剑桥，1992：16）。

[3] 见爱德华·塞义德《东方主义》（纽约，1978）。

[4] 见杰瑞米·唐博林《戏剧、意识形态和电影》（曼彻斯特，1987：37）；苏珊·麦克拉蕾《女性化的结局：音乐、性别和性》（明尼阿波利斯，1991：57）。

赞美尼古丁女郎：逝去的烟草文学时代

尤金·乌伯格*

正如 W.A. 佩恩所说：“除宗教以外，很可能没有第二个主题能像烟草和吸烟一样消耗掉打印机这么多的墨水和纸张。”^[1]不论是在佩恩发表此言论的一个世纪之前，还是在今天，事实都能证明其正确性。《芳香的药草：烟草的历史》一书指出，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烟草文学潮起潮涌，从未停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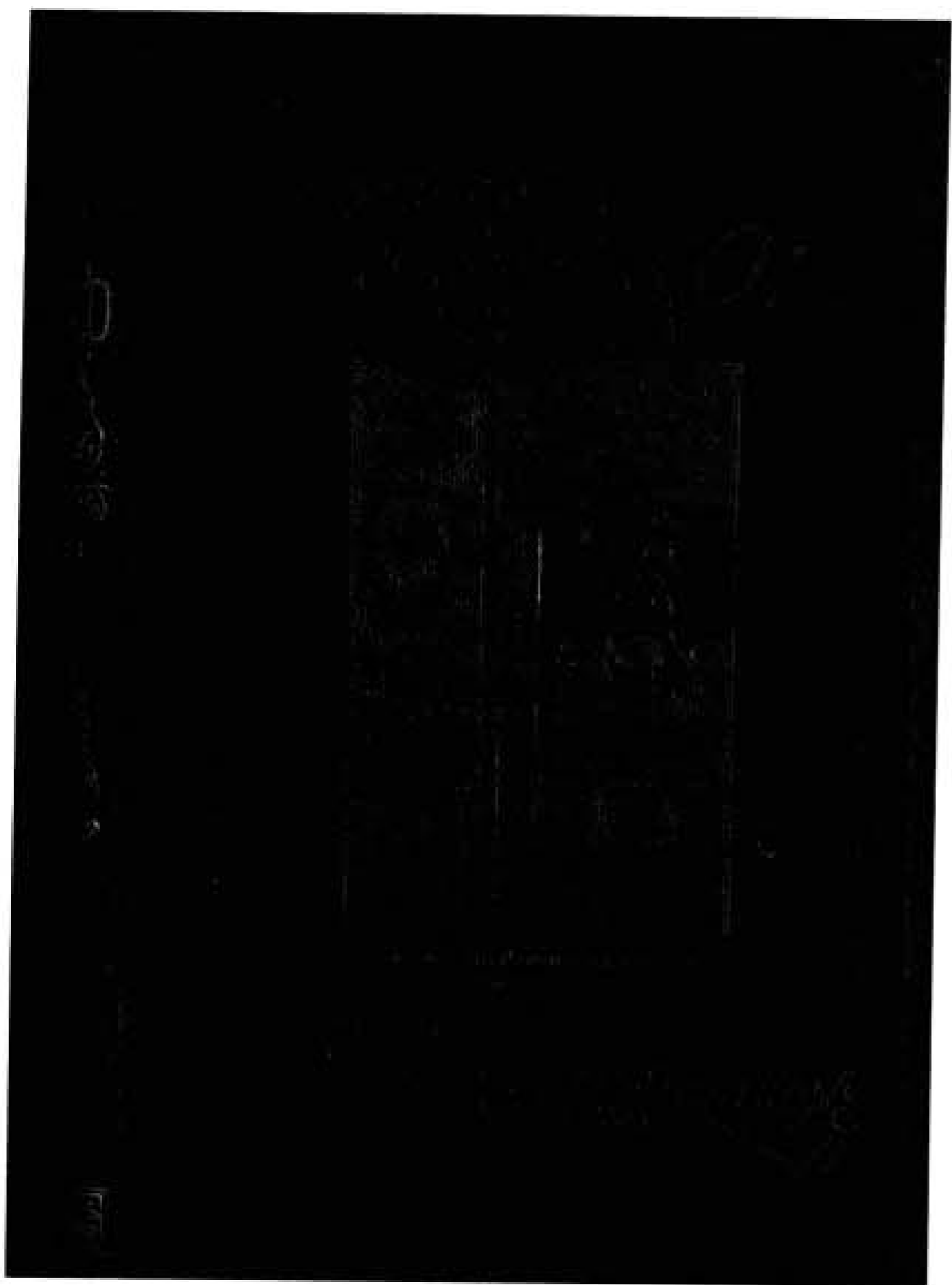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关于烟草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涉及烟草工业、广告、吸烟的社会文化历史、艺术中的烟草、参考资料（词典、百科全书及参考书目）、古代和现代烟斗的历史和鉴赏、吸烟矛盾论、吸烟的配套用具（从打火机到烟斗塞）、哈瓦那雪茄、陶土烟斗等等。这些书，尤其是外文出版物，通常内容充实，图解丰富。但是有一类书籍却无缘于烟草文学的持续繁荣。

在禁烟思潮活跃的今天，赞美烟草的散文、诗歌和歌曲显得格格不入，但它们也曾风靡一时，并以华丽的“外表”吸引起人们的眼球。20 世纪的头十年是这类以“男性烟民”为目标读者的作品的巅峰时期。19 世纪 80 年代这类书籍首次规模化发行，而到香烟逐渐盛行的 20 世纪 30 年代，它们便渐渐销声匿迹了。

显然，这类书籍的出现伴随着烟草人均吸食量的显著增加。当时人们主要吸雪茄、烟斗或咀嚼烟散草，男人构成主要的消费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面向军队的大规模供应带动了香烟在年青一代中的普及，香烟的经济效应才体现出来。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妇女也加入了烟民队伍。尽管现代反吸烟（反香烟）运动依然盛行，但吸烟的社会认知度越来越高，烟草工业的社会地位是当代人所无法想象的。总之，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挺烟派”书籍的发行。

乍眼一看，这些书籍并不是烟草的赞歌，但是仔细一瞧，其中确实包含大量的描述烟草魅力的散文、诗歌、奇文异事以及草药知识。这方面的经典著作要数 F.W. 法尔霍特于 1859 年创作的《烟草的历史及其关联》。该书 1876 年的再版足以说明读者对其的喜爱。这本书内容充实，与文学的关联贯穿始终。另一本类似的作品是 E.R. 比林的《烟草：历史、种类、文化、生产和贸易》（1875），该书材料翔实，被宣传为“烟草种植者”、“经销商”和“使用者”的必读书目，配合特定产品推出该书的限量赠阅版也成为烟草商们的营销手段。佩恩的《芳香的药草：烟草的历史》（1911）内容如出一辙，但其中有一章专门介绍烟草文学。

*尤金·乌伯格（EUGENE UMBERGER）：威斯康辛格林湾奈维尔公众博物馆临时馆长，发表过关于烟草和吸烟史方面的文章，著有《烟草及其用途》（1996）。



F.W. 法尔霍特《烟草的历史及其关联》(第二版, 伦敦, 1876), 布装本。封面上是略加改动的理查德·布拉斯威特的《吸烟时代》(伦敦, 1617)中一幅有名的英国烟草店的插图

1915年, W. A. 布伦南出版了《烟草叶: 吸烟者手册》一书, 他说: “为吸烟者创作的作品少之又少……因此吸烟者很难找到一本详略得当的书: 既提供了烟草或吸烟的必备知识, 又省略了那些看似有趣, 却无足轻重的内容。”^[2] 该书的内容没有一点吸烟的浪漫情趣, 内容包含大量的“烟民必备知识”, 作者讨论吸食烟草的类型、烟树的培植、化学成分、烟草的加工甚至烟叶的处理和发酵。

为什么与吸烟相关的书籍会扎堆出现? 马修·希尔顿的著作《极至的快乐: 1800-2000年英国流行文化中的吸烟》一书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吸烟大众化的核心原因是

吸烟仍是形成个人或集体身份的核心元素。然而, 这种身份感深深扎根在19世纪中晚期吸烟斗和雪茄的资产阶级烟民推行的特定的个人自由观念中。他们的吸烟观念诠释了烟草的意义, 并随后被其他社会阶层所接纳。^[3]

确实, 他认为我们依然继续着这种传统, 并受其影响。人们从期刊和书籍中了解的吸烟知识影响着他们对吸烟的态度。

这些信息的来源经常重复着相同的话题, 如烟草的历史、种植、生产、加工、使用以及人类学方面的知识。所有一切“形成了关于烟草的知识体系…为人们赞美他们钟爱的嗜好奠定了基础。”而且, 把这样一个嗜好放在男人的世界内讨论它的生产、科学和药学功效以及历史, 无疑是将它合法化, 这也意味着将吸烟同女性隔断。^[4] 希尔顿承认, 上述解释的基础是拥有独特历史传统的英国文化, 但他也认为, 强调个性和独立性的自由吸烟观至少部分适合于其他的西方国家(最明显的是美国, 美英两国的烟草史交织在一起)。

1890年到1909年的二十年正值烟草文学的高峰期, 那时出版的许多书籍由于共同关注这种“神圣草药”的乐趣、性情以及诱惑力而走到一起。^[5] 这些著作的出版一方面证明了他们的畅销, 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出版商如何不遗余力地让这些著作与读者见面。

约瑟夫·奈特曾通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出版社于1895年出版了《烟斗和烟袋: 烟民

自己的书》，该书以布装本和皮装本面世（包括二百五十本限量签售的大开本）。书中引用的凯特·加里顿的诗描绘了一个独自在屋中吸烟的女子，生动地表现了烟雾和烟草力量的力量：

就像一只温柔可爱的手，
有时悄悄地放在你的手中，
它柔柔地从敞开的门里飘来，
记忆苏醒了，
当雪茄的香味飘过。

它在呢喃着什么？哦，它只对我说，
只有我的心才能知晓，
但那颗心激动地颤抖起来，
泪水充盈着、模糊了我的双眼——
是那优质雪茄的香味啊。^[6]

塞缪尔·罗兰德创作于1611年的诗《喜欢烟草》提到了烟草带给人的满足感：

世上美味无数，
把贪吃的人变成肥猪；
他却很节省
一片叶子就可充饥。
无需纸巾擦拭，
指尖弹弹便可，
他把厨房放进一个盒子里，
在烟斗里烤肉。^[7]

奈特的书是这类文集中为数年后得以重印的少数之一（1970年该书由图书馆出版社重印）。

1896年，约瑟夫·奈特出版公司出版了布装本和皮装本的詹姆斯·巴里的《我的尼古丁女郎：吸烟的研究》。巴里的名气主要在于《彼得·潘》，而非这本关于烟草的书。但这本书是烟草题材中鲜有的虚构作品之一，被认为有真正的文学价值：“作者以难得的魅力和幽默讨论了烟草微妙的乐趣，吸烟的作用不仅在于人的习惯，更是一种有思想精神元素的宗教仪式。”^[8]巴里的未婚妻说得很明白：要想结婚，除非他戒烟。读读他下面的一段话就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

我知道并感觉到烟草的引入让英格兰从长睡中苏醒过来，生活突然被注入了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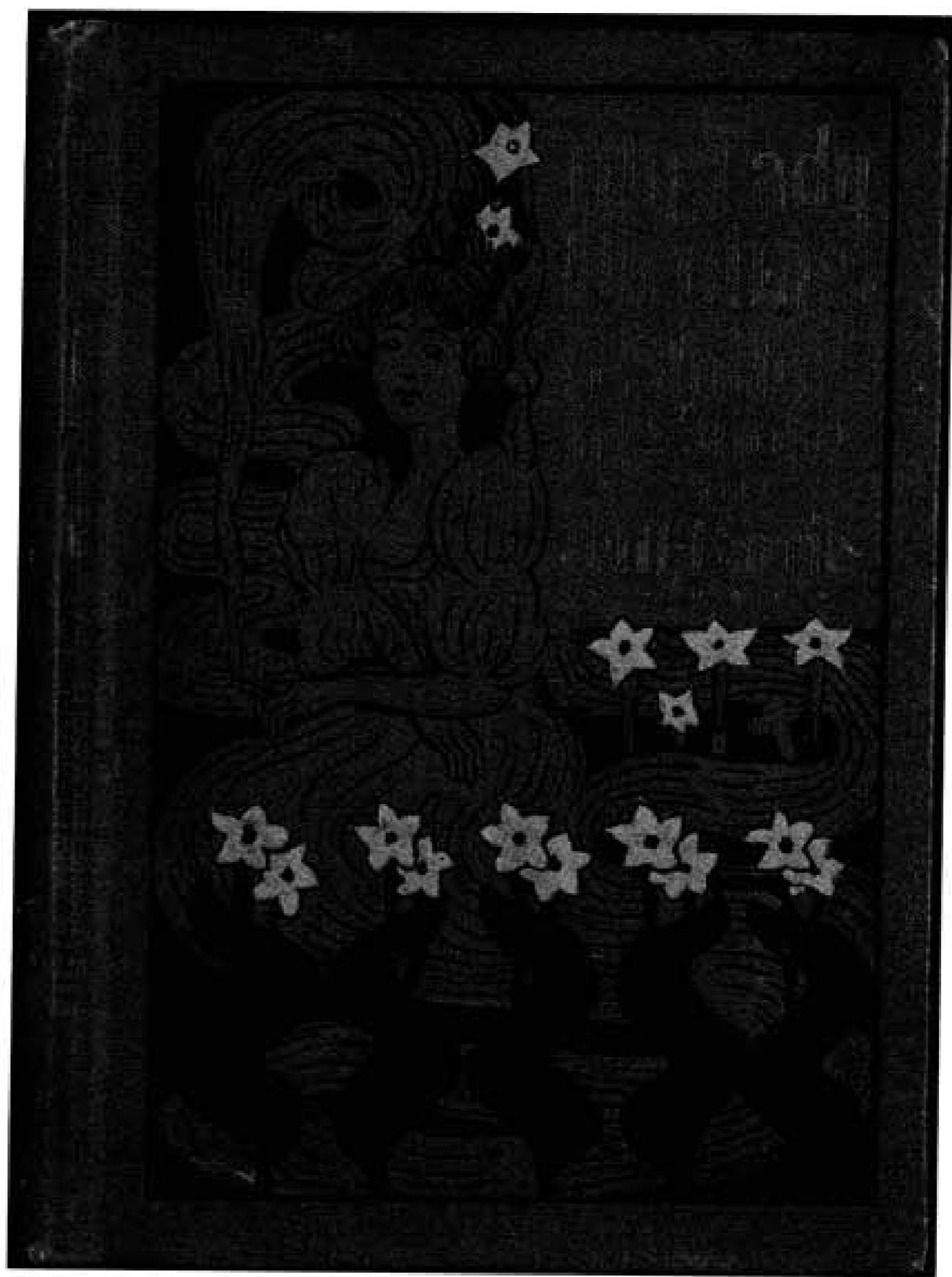
力。人们可以骄傲地谈论活着的荣耀，一直以来纠缠于家庭琐事的男人们把烟斗塞进嘴里，个个成了哲学家。诗人和戏剧家不停地吸烟直到走出低俗，全世界从未领略过的高尚扑面而来……整个国家都躁动着不让烟草失望的雄心壮志。简而言之，现在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涌动着高尚的思想。^[9]

1896年，亚瑟格雷公司出版了《歌曲和故事中的烟草》一书，作者约翰·贝恩也是美国最古老的烟草贸易书籍《烟草叶》一书的作者和出版者。该书包含了大量令人赏心悦目的诗歌和散文，其中有几章还专门介绍了吸烟的实用性：“卡莱尔认为，‘按我们欧洲人的礼仪来说，吸烟时男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静坐在一起，除了你不得不说的话，你不用多说一句……’”^[10]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态度，有人传说1833年在克雷克帕托的一个晚上，卡莱尔递给爱默生一支烟斗，自己也点上一支。俩人就这样静坐到午夜，然后他们握手告别，并为能共度良宵而互相道贺。^[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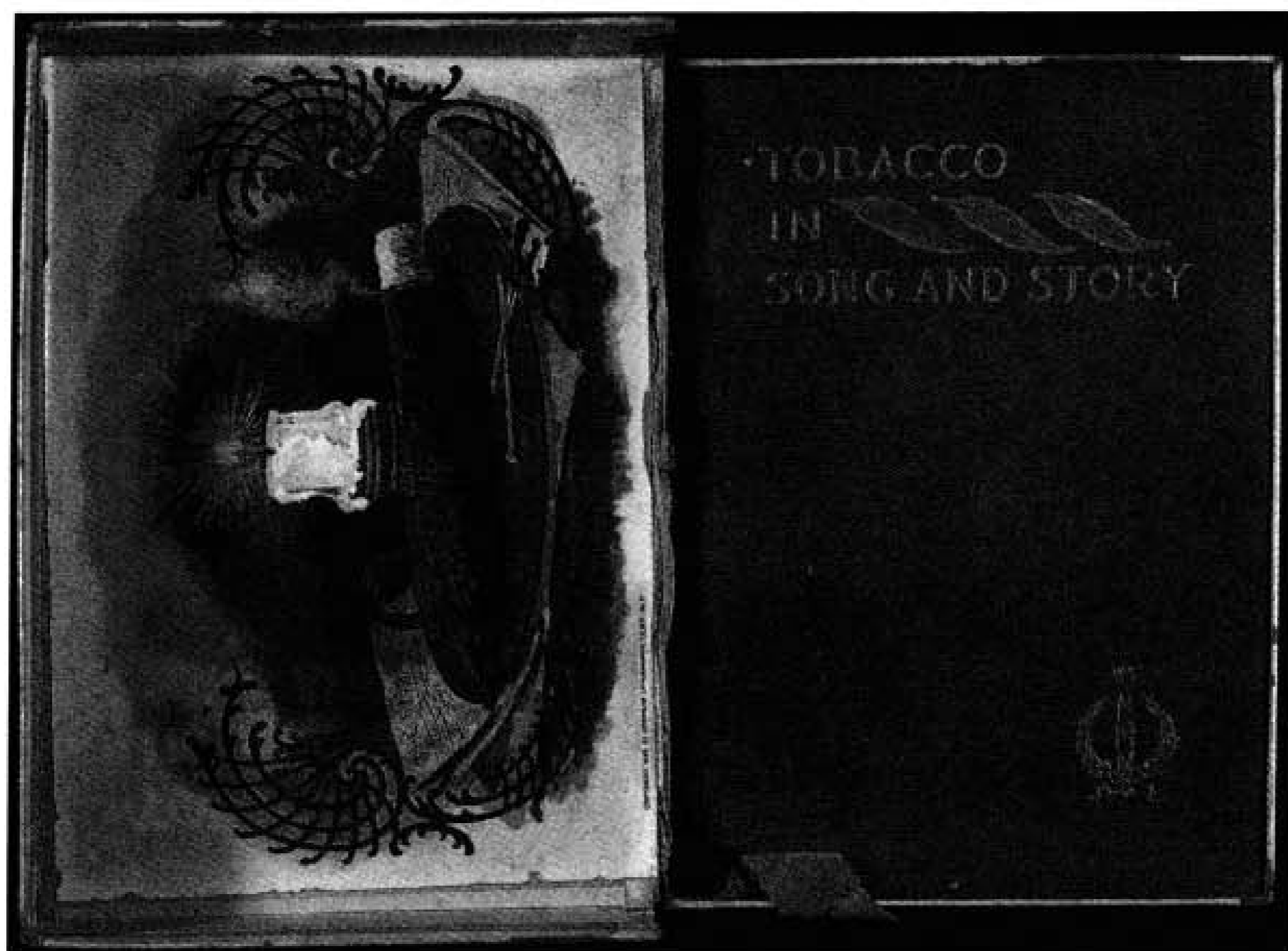
另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男人面临烟草和婚姻的选择。在爱德蒙·戴的《一个单身汉的独白》中，不读到最后一句，你不会知道单身汉并没有选择婚姻：

再见，再见——
直到婚礼落幕，
然后我会继续享受你的烟雾，
就像从前那样。^[12]

H.M.考德威尔公司以“推出史上最精美的装帧”为目标，专门重印文学经典、流行小说、儿童书籍等。1901年，布装版和皮装版的《我的尼古丁小姐：歌曲和故事中的烟草》和《浴袍和单身汉及其他》出版了（后者只是为亚瑟·格雷《地球上的好东西：为太阳下所有的男人而著》易名而已，原著还包含《我的烟斗》、《雪茄烟》这两篇文章）。这两本书的皮装版包装是一个纸板仿香烟盒，1902年，该出版公司换上了雪松木的“烟盒”，推出节日礼品版。



J.M. 巴里：《我的尼古丁女郎：吸烟的研究》（波士顿，1896），布装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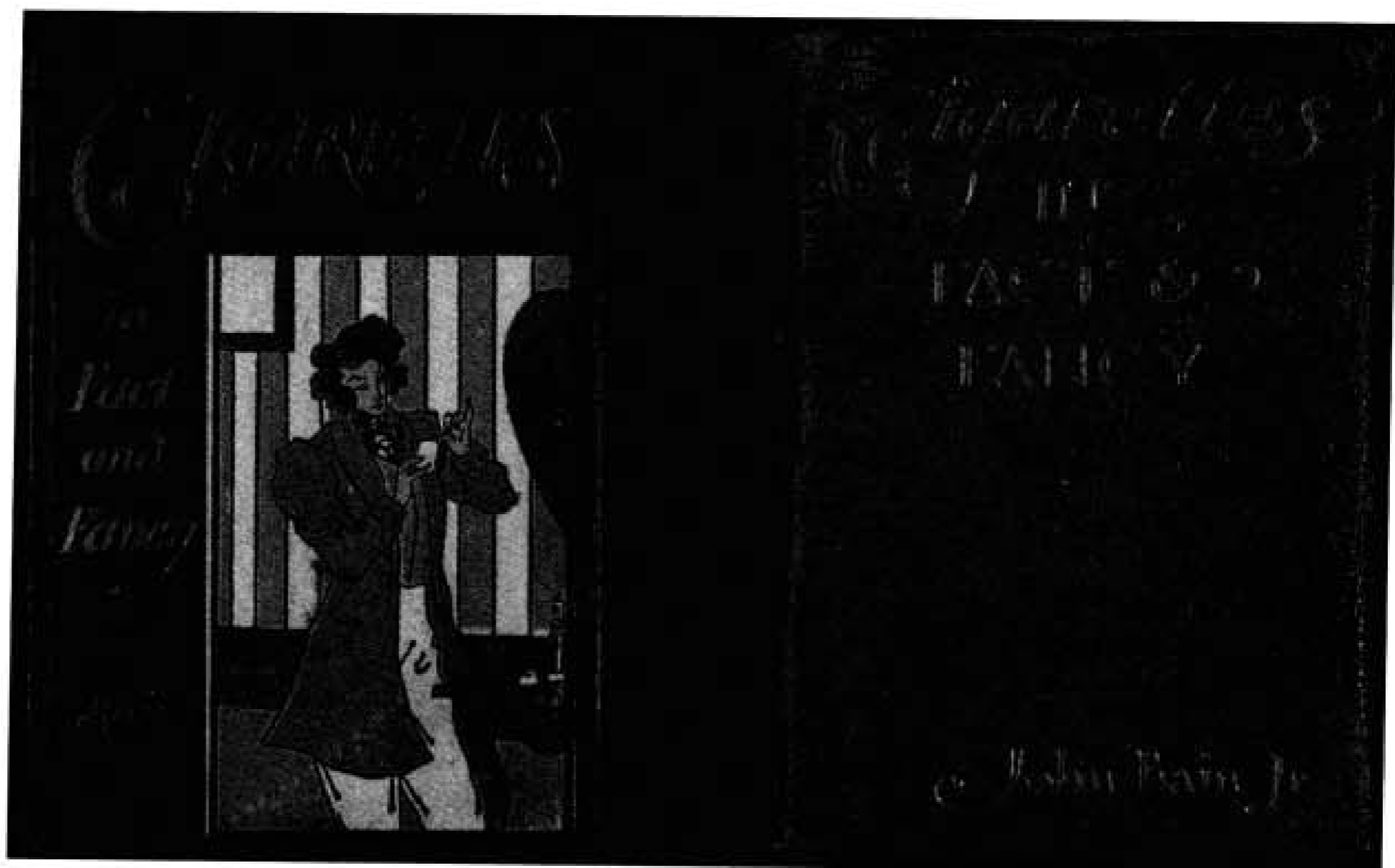


约翰·贝恩《歌曲和故事中的烟草》(纽约和波士顿, 1901), 植鞣绒面革装本, 包装为纸板仿香烟盒



约瑟夫·奈特《烟斗和烟袋：烟民自己的书》(纽约和波士顿, 1905), 布装本, 包装为皮制烟袋

约翰·贝恩《现实
和想象中的香烟》，
(纽约和波士顿，
1906)，左边是布装
本，右边是猪皮装



1905年，该公司又出版了畅销书《烟斗和烟袋》，购买该书的布装版可以获得一个扎有细绳的烟袋。同年，该公司又在上述节日礼物版的基础上，推出了“烟民图书馆”，其中包括四本书：《歌曲和故事中的烟草》、《我的尼古丁小姐》、《烟草叶》和《烟斗和烟袋》。

约翰·贝恩的《烟草叶》是他的另一部书《歌曲和故事中的烟草》的姊妹篇，也是卡迪威尔公司对烟草文学的三个新贡献之一。在《烟草叶》中，戴维·柯蒂斯题为“我的尼古丁小姐以及她如何勾引我”的文章与希尔顿的观点不谋而合。希尔顿认为，“17世纪末期对烟草赞美的独特性在于人们将烟草拟人化为忠诚的伴侣，女性化为妻子或情人，甚至神化为上帝”。^[13]柯蒂斯声称，“没有人会拒绝她亲密的拥抱，甜美的亲吻，以及沉浸在她慵懒、美味的烟雾中与她调情。不管如何，我就是爱她！”^[14]

三年后，卡迪威尔趁热打铁又推出贝恩的另一本书《现实和想象中的香烟》，这本书的独特性在于用猪皮装订，它的包装也很独特——纸板仿香烟盒。在这本香烟的赞歌当中，P.W.W哈特的《飘荡在韵律中的烟圈》比较了三种吸烟方式：

烟斗——躺在家中的床上一边读书一边吸；

雪茄——朋友聚会时；

香烟——最讲究的吸烟方式。^[15]

卡迪威尔的第三本原创烟草作品是由《烟斗和烟袋》的编纂者约瑟夫·奈特创作的《一个烟民的幻想：“烟斗和烟袋”的姊妹篇》。1914年，卡迪威尔被道奇出版公司收购，那时道奇对烟草文学的唯一贡献是1907年出版的查尔斯·威尔士的《芳香的野草：关于烟草的种种美谈》。这本书最初以草布装面世，后来推出的“烟民特别版”的包装中还赠送了烟草和烟斗，此后市面上的全是植鞣绒面革装本和布装本。



查尔斯·威尔士《芳香的野草》（纽约，1907），草布装



库伯《烟室小册子·烟民的花环》（利物浦，1889）；《烟斗和海泡石》（利物浦，1893）；《库伯杂谈》（利物浦，1890），纸装。绘图者真名为约翰·华莱士，曾为库伯公司的很多出版物和广告配图



沃特·汉密尔顿《吸烟者的古老书卷：赞美烟草的诗歌和仿制品》（伦敦，1889），布装；J.W. 康多尔《烟斗和烟草：关于吸烟和烟民》（伦敦，1901），布装；安德鲁·斯坦密兹《烟民手册：哲学家和朋友》（伦敦，18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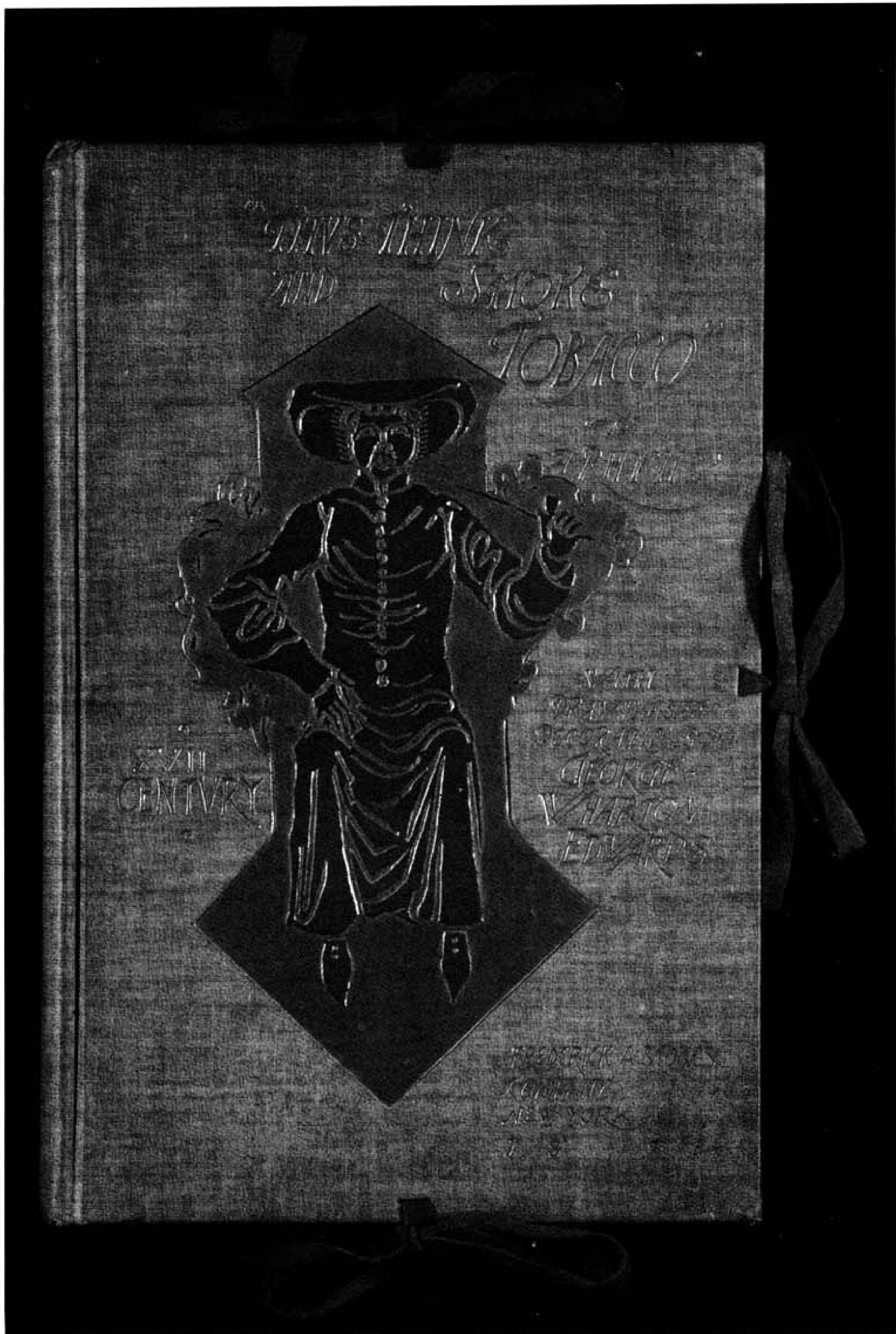
书中包含很多风趣的诗歌，如汤姆·霍尔的《一个单身汉的观点》。诗人质疑结婚的优点，尤其疑惑一个人到底应该拥有一支烟斗、一本书，还是一个温柔的陷阱。最后他得出结论：

因此，让我们为她干杯
顺便要想想养活她的那个他；
没有老婆
让我们过着单身生活；这样更实惠些。^[16]

道奇公司一直延续卡迪威尔的烟草文学路线，直到1917年，道奇以自己的方式再版上述书库中的书目，除了亚瑟·格雷的《浴袍和单身汉》之外。

同期出版的其他烟草系列作品也十分惹眼。1889年到1894年期间，利物浦的库伯兄弟公司出版了系列《烟室小册子》，书中内容主要来源于公司于1870年到1881年间发行的期刊《库伯的烟树》。该期刊主要反映了托马斯·库伯和约翰·弗雷泽（编辑兼印刷人）的文学品味，不仅旨在成为烟草业的专业杂志，也希望满足烟民的阅读需求。期刊从历史、地理、人种学、社会学、生理学、文学等角度讨论烟草，确实是一本学习烟草的百科全书。^[17]

小册子总共发行了十四本，用作者的话来说，“内容都是《烟树》的精华”^[18]，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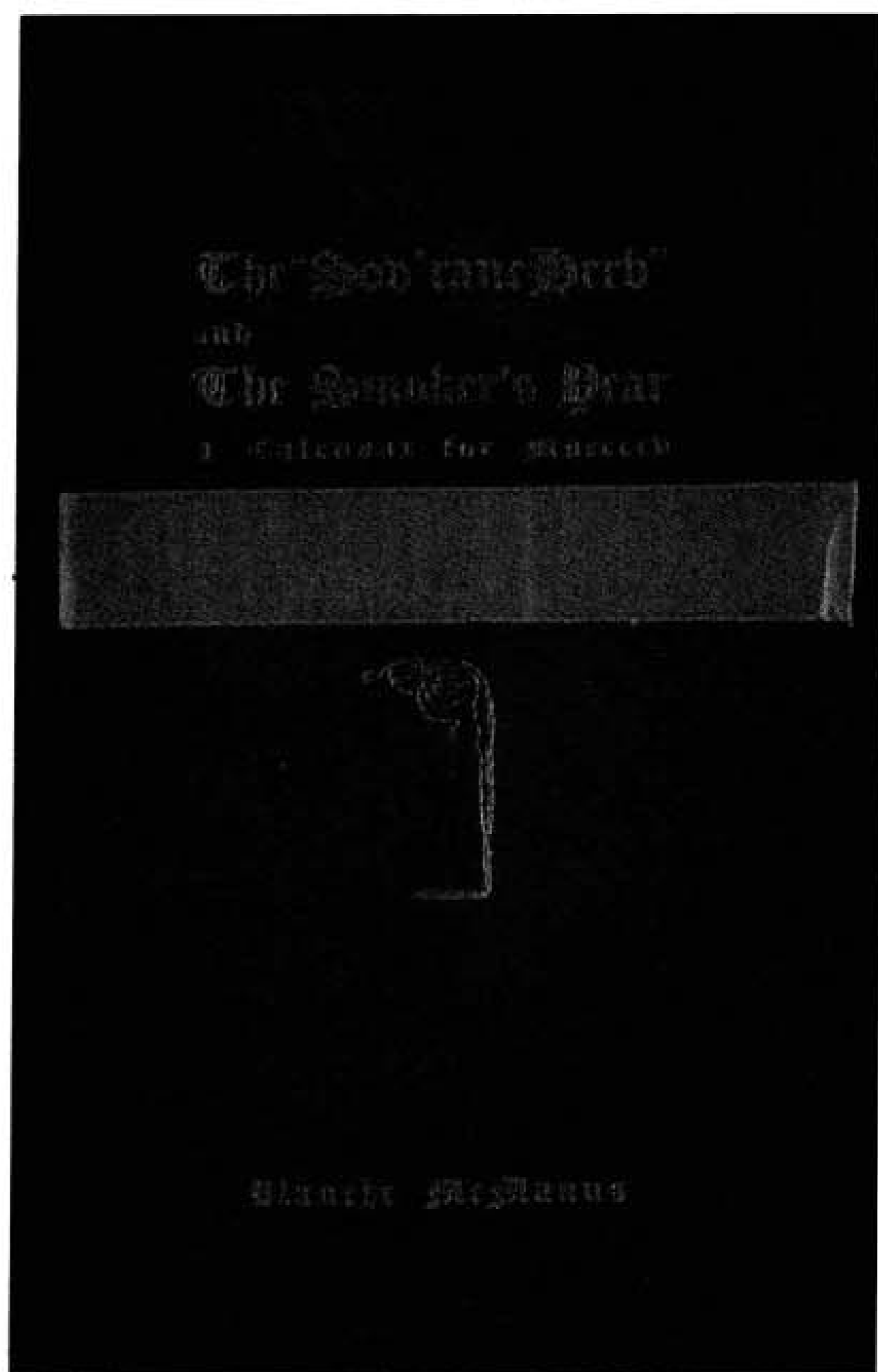


《“如此思考和吸烟”：17世纪的一首诗》(纽约，1891)，布装带皮绳

中的部分标题如“烟民的教科书”、“查尔斯·兰姆的一管烟草”、“琥珀：关于它的一切”（琥珀曾经被用于制做烟管和方头雪茄的支架）。这套书的意义在于，库伯超越了对烟草业或自有品牌的宣传，显然已经成功地推广了烟草文化。

和库伯的小册子同年发行的是沃特·汉密尔顿的《吸烟者的古老书卷：赞美烟草的诗歌和仿制品》。这本书分章收录了关于烟斗、雪茄烟、香烟和鼻烟的诗歌。“仿制品”一章中，全部是仿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朗费罗创作的诗歌，很多来自于库伯的《烟叶》。其中这样一首名为《吸烟的哈姆雷特》的诗歌是这样开头的：

吸还是不吸，这确实是个问题。
就道德而言，
把尼古丁珍视为密友更值得，
还是忙不迭地躲着它，
一个危险、所谓邪恶的、奴性的
习惯……^[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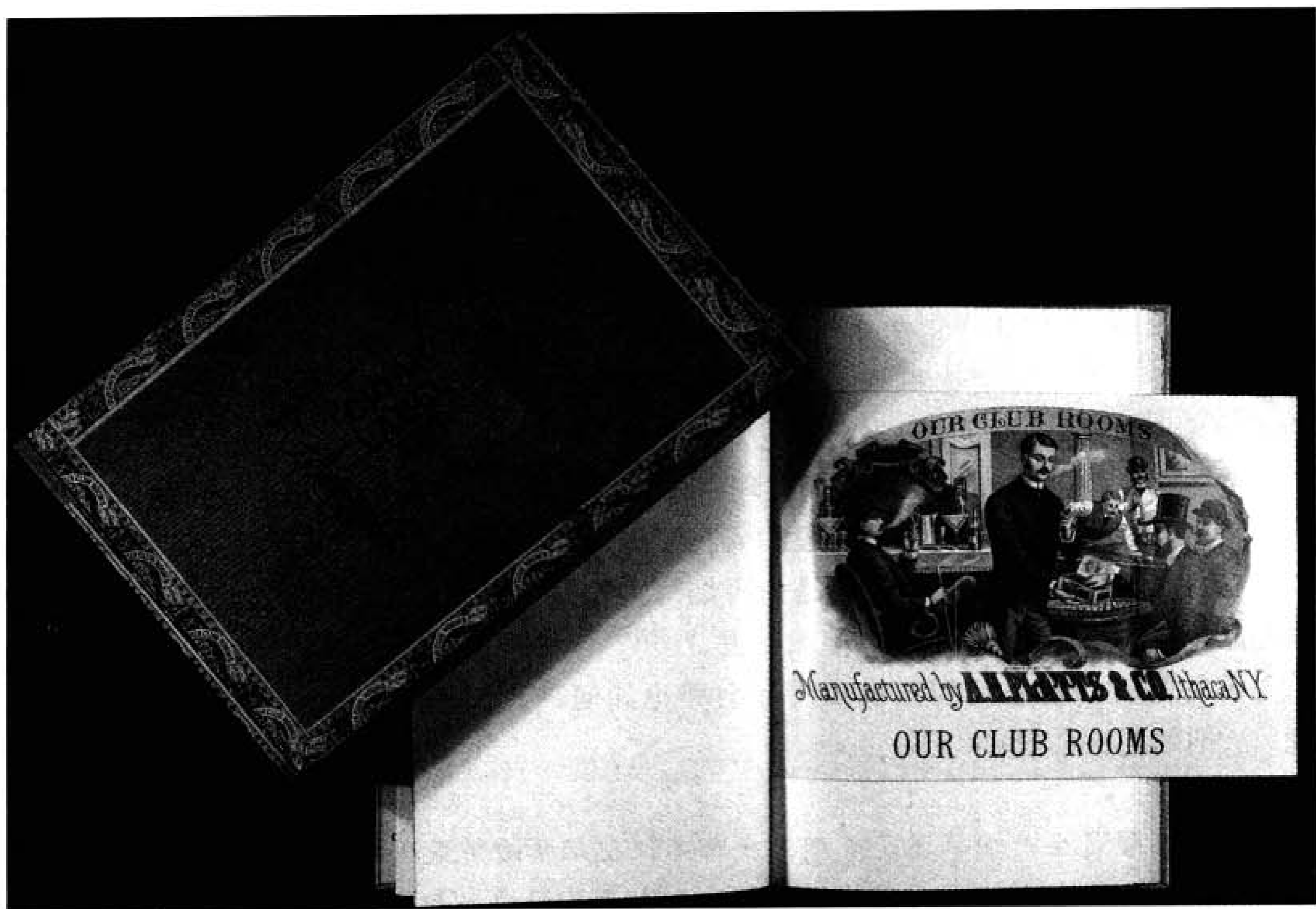


布兰奇·麦克玛鲁丝《芳香药草和烟民年：一本日历》（波士顿，1905），皮装

这首诗的作者显然在模仿莎士比亚。两年后，斯斗克思公司出版了《“如此思考和吸烟”：17世纪的一首诗》。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首诗，由乔治·沃顿在厚纸片上作注。该书不仅有醒目的封面，而且书的三面还用三根皮条将其绑牢。另一本由J.M. 詹金森编撰的诗集起初是用来宣传匹兹堡的雪茄生产商和零售商R&W. 詹金森的，三年后出版的扩大版不仅附带一张雪茄丝带书签，而且还夹带一种雪茄新品的商标“Duquesne Bouquet”。

许多书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散文。香烟元老之一安德鲁·斯坦密兹写的《烟民手册：哲学家和朋友》（1877）一书中有很多有趣的副标题，如“吸什么烟——吸烟的佐料——烟草的历史、培植、生产、民间轶事、社会学、医学等”，这本书的内容无非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J.W. 康多尔的《烟斗和烟草：关于吸烟和烟民》中的章节从“士兵和烟草”到“议会中的烟斗”，同时作者也不忘加上一章“烟草的种植和生产”。

曾推出自己的《烟斗和烟袋》的佩杰公司也推出了一本书式年历，名为《芳香药草和烟民年》。该书由弗朗西斯·密尔顿撰文，他的妻子布兰奇·麦克玛鲁丝用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吸烟者形象为每月日历配图。书的封面、脊部和背面都装饰有雪茄造型的丝带。1904年和1905年，该书以布装本和皮装本面世。最后，威尔弗雷德·乔治·帕金顿出



A.D. 费伯《香烟商标艺术》(1949), 布装, 包装为木制仿制烟盒

版的《烟圈和回旋曲：罗利时代以来诗歌散文杂集》代表着尼古丁文学繁荣时期的结束。这本以布装和皮装面世的书不仅包含关于烟斗、雪茄、香烟和鼻吸烟等的常规话题，而且还拓展到其他方面，如“女性和烟草”、“吸烟的哲学”、“快乐的附件”、“处方和线索”等。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是吸烟文学（包括装订和包装）的辉煌岁月，后人也有所努力来延续这个传统。香烟盒理所当然是最适合烟草类书籍的包装，显然，不只卡迪威尔公司一家不会错过仿烟盒包装现成的吸引力。1949年，豪斯公司出版的A.D. 费伯的《香烟商标艺术》就是装在一个仿香烟盒中的。为了吸引那些对凸版印刷术和平版印刷术感兴趣的人，书的一侧印制了大量的香烟商标和边饰。

十分凑巧的是，整整五十年后，澳大利亚出版了英格里德和彼德·米兰德的 *Habanos Mi Amor*。该书以三种语言（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出版，副标题是“向雪茄尤其是生产者致敬”，其包装盒是一个带滑盖的仿香烟盒。后来，纸板香烟盒也演变为一本书，如罗伯特·凯姆特的《完美烟书：三维参考手册》，打开封面，三维图解连同文字跃入眼帘，每一页均是如此。

在随后的岁月里，这种文选传统依然得以继续，只是规模大不如前，仅有如下作品问世：塞尔维斯特·C·沃金的《诗人表达的吸烟乐趣》、《从芳香烟草中获得灵感的诗人及其智慧》、《赞美烟草：众诗人诗歌集》（1960）以及詹姆斯·沃顿的《吸烟全书》

(2000)。

历史学家也为此做出了特殊的贡献。V.G. 凯尔南的《烟草：一段历史》不过是对题目进行了干巴巴的叙述。作者坦白地说，意图不在系统地描述历史，而是“有选择性地按照主题、时期和地区分类，收集了世界各地关于烟草的奇闻异事，收集男人、女人及各个国家对烟草的看法。”^[20] 近来，希尔顿的《英国流行文化中的吸烟》更是精彩地分析了关于烟草和吸烟的著作和刊物，激发了喜爱烟草文学的读者的兴趣。

上个世纪90年代“雪茄热”的直接后果，不仅是相关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且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更多挺烟派书籍问世了，如伊兰·泊斯的《烟民生活》，K.M. 昆兹的《吸烟：雪茄、香烟、烟斗及其他》。尽管这股“出版热潮”来得很意外，尽管人们的反吸烟运动愈演愈烈，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烟草文学将不断面世——或许不再那么公然地支持吸烟，但仍会以一种超脱的姿态流露对烟草的喜爱。正如沃顿在《吸烟全书》的前言中所说，他的研究远远不是为吸烟写墓志铭（研究的最初目的之一），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吸烟……可能要存在下去。”^[21]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也不管社会舆论如何，我们还是听听八十年前卡尔·艾弗理·沃纳的一番话吧：

不管是生产烟草还是吸烟，我都不仅把烟草看作是伙伴，更把它看作是一种广泛的民主：各个阶层、种族、信仰的人由于共同的兴趣走到一起，结下了友谊，这是一种相互同情和理解的纽带。我喜欢把香烟的制造和享受这种神奇植物的乐趣看成是一个王国，臣民是志同道合的灵魂，统治者是这种芳香的烟草释放的烟雾在人们心中燃起的善良的人类情感。^[22]

沃顿总结说，尽管吸烟副作用的严重性显而易见，尽管吸烟是一种堕落的、神秘的活动，但烟草文学将继续下去来，或是谴责、或是赞美，抑或记录这种最广泛的社会习惯。

注 释：

[1] W.A. 佩恩《芳香的药草：烟草的历史》（伦敦，1901：217）。

[2] W.A. 布伦南《烟草叶：吸烟者手册》（美纳沙，1915：7）。

[3] 马修·希尔顿《极至的快乐：1800-2000年英国流行文化中的吸烟》（曼彻斯特，2000：2）。

[4] 同上，第21页。

[5] 欲详细了解这些书的出版经过及其各种版本，请参考作者的文章《烟民的“图书馆”：世纪之交烟草文学的收藏可能性》，收入《书志目录：纽约公众图书馆公告》V/1(1996：118-146)。

[6] 约瑟夫·奈特《烟斗和烟袋：烟民自己的书》（波士顿，1894：61）。

[7] 同上，第52页。

[8] 佩恩《芳香的药草》，1901：231。

- [9] 詹姆斯·巴里《我的尼古丁女郎：吸烟的研究》(波士顿，1895：105-106)。
- [10] 约翰·贝恩《歌曲和故事中的烟草》(纽约，1907：28)。
- [11] 同上，第83页。
- [12] 同上，第70页。
- [13] 希尔顿《英国流行文化中的吸烟》，2000：32。
- [14] 约翰·贝恩《烟草叶》(波士顿，1903：148)。
- [15] 约翰·贝恩《现实和想象中的香烟》(波士顿，1906：147)。
- [16] 查尔斯·威尔士《芳香的野草：关于烟草的种种美谈》(纽约，1907：2)。
- [17] 理查·阿尔蒂克《库伯的烟树：维多利亚时代新闻学的一段插曲》，收入《美国书籍协会论文集》XI.V/4 (1951：337)。
- [18] A.V. 西顿《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库伯对烟草的推广》，载《广告历史期刊》IX/2 (1986：21-22)。
- [19] 沃特·汉密尔顿编《吸烟者的古老书卷：赞美烟草的诗歌和仿制品》(伦敦，1889：113)。
- [20] V.G. 凯尔南《烟草：一段历史》(伦敦，1991：4)。
- [21] 詹姆斯·沃顿编《吸烟全书》(伦敦，2000：xiii)。
- [22] 卡尔·艾佛理·沃纳《烟草之地》(纽约，1922：9)。

银幕中的香烟：从魏玛到好莱坞

诺亚·艾森伯格*

一帮赌红了眼的赌徒们焦急地游荡在某个私人赌场喧嚣的纸牌游戏间，他们不停地吸着烟，似乎深吸一口会让他们越战越勇。这是弗里兹·朗的早期恐怖电影《赌徒马布斯博士》（1922）中的一个镜头。每个人进出这个世界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要吸可卡因还是玩纸牌？吸烟不仅营造出幽暗、朦胧、虚无的氛围，也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好莱坞黑色电影确定了基调，而且吸烟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交流的基本手段。^[1]确实，魏玛电影中充斥着招摇的烟民，他们被笼罩在浓密的烟雾中，或是紧张或是镇定，或是迷惑或是开心。《赌徒马布斯博士》中有一个淘德女伯爵，她独自倚在华丽的沙发上，指间优雅地夹着一支香烟，一边懒洋洋地吸着，一边冷眼注视着烟民众生相。卡尔·格朗的《街》（1923）中，一个无名的庸人抛家弃妻、脱离乏味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别提禁烟）来到大城市，最终却不幸落入一个狡猾的女香烟贩子手中，这个女人还是一桩谋杀案和抢夺未遂事件的同谋。同样令人难忘的是战争期间德国银屏塑造的蛇蝎美人——出生在堪萨斯的路易丝·布鲁克在G.W.巴勃斯特导演的《潘朵拉宝盒》中扮演了风情万种的酒吧应召女郎露露，露露指间晃动的香烟强烈地传达着她的自信和天真。柏林的本土演员玛琳·黛德丽由于在约瑟夫·冯·史登堡1930年的《蓝色天使》中扮演罗拉罗拉——一个乌烟瘴气的酒吧的歌女和柔弱的浪女而一夜成名。吸烟在魏玛电影中是资产阶级娱乐的文化符号，无论是在罗伯特·西奥德马克和埃得加·乌尔姆导演的《星期天的人们》中，还是在反映大都市病态和癫狂的弗里兹·朗的《杀手就是M》中。

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魏玛银屏的一位典型的吸烟者，她曾风靡一时，不仅得到广泛的认同，而且引来无数效仿者和粉丝，引起如潮的好评——甚至有一个网站专门介绍她的银幕吸烟形象。^[2]在整个电影史上，或许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玛琳·黛德丽那样把香烟运用得炉火纯青。从她的成名作《蓝色天使》到后来在好莱坞和欧洲主演的后期作品，黛德丽的标签就是一个精通如何摆弄冒烟的香烟，惹人注目、快人快语的女主角。正如其他“黛德丽特征”（如她的美腿）一样，吸烟不仅勾勒了她的个性，而且也成为她彰显魅力的手段。回忆一下《蓝色天使》中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吧：虚伪的教授罗斯返回到罗拉罗拉的化妆室看她，在此前一天他在这里和他的学生——罗拉罗拉的粉丝们撞了个

*诺亚·艾森伯格（NOAH ISENBERG）：纽约新校大学人文科学系主任，著作有《在拯救与灭亡之间：德国犹太人近代思想的张力》（1999），编译阿诺德·韦格茨的作品《东方犹太人的面孔》（2004），并为以下刊物的撰稿人：《新德国批评家》、《电影杂志》、《杂文集》、《党派评论》、《不同政见者》、《国家》、《新共和国和纽约时代书评》。目前，他正在创作专题论文《永久的曲折：艾德加·G·乌尔姆的电影》并编辑《魏玛电影指南》。



玛琳·黛德丽出演约瑟夫·冯·史登堡的《金发维纳斯》(1932)中的一幕

正着，接着他竟鬼使神差地拿了罗拉罗拉的一条灯笼裤，闹了个大笑话。近景镜头下，罗斯坐在罗拉罗拉化妆台的对面，带着一脸的懊悔和孩子气向她求饶，此时罗拉罗拉冷冷地把一支香烟放在唇间，并把烟盒递给罗斯。罗斯看上去很紧张，再加上罗拉罗拉身体和未点燃的香烟散发的热气，他的手一抖动，几根香烟掉在地。此刻导演让镜头跟随罗斯去清理香烟，他的手扶在桌下，观众也能以罗斯的角度欣赏眼前的一切，包括罗拉罗拉的丝袜和内衣。与此同时，罗拉罗拉一边点燃香烟，一边说着她的经典语录：“嘿，教授！看完了寄给我一张明信片，好吗？”^[3]

在玛琳·黛德丽的无数银幕形象中，吸烟赋予她一种权威和性感，让她凌越于崇拜者之上。在约瑟夫·冯·史登堡执导的《摩洛哥》，也就是黛德丽继《蓝色天使》之后在好莱坞的处女作中，她扮演的歌女艾米·卓丽头戴大礼帽、梳着长辫子，一边傲气十足地吸着烟，一边迷离地环顾着旁观者。令人难忘的还有她在奥逊·威尔斯的《历劫佳人》中塑造的坦尼娅。同艾米·卓丽一样，烟雾总是缭绕在这个吸烟的吉卜赛女子的许多特写镜头中。经过这些电影的拍摄，黛德丽将吸烟带到新的高度。正如理查德·克莱恩在《吸烟赛神仙》一书中所说，吸烟既是感观愉悦的来源，同时也是女人情爱生活的象征。至少男人这么想。看见女人吸烟，男人们在感到压力的同时，也有一种强烈的、窥淫癖式的快感。”^[4]黛德丽那挑逗式的吐烟圈的形象是专门为男士塑造的，尽管银屏下的女观众也对她十分着迷。用评论家肯尼斯·特南的话说，就是“男女通吃”。^[5]确实，黛德丽已经同香烟散发的强大性感诱惑力联系到一起，在她四十九岁的时候，好彩香烟还邀请她担当1950年的形象代言人。同《赌徒马布斯博士》中的淘德女伯爵类似，黛德丽优雅地靠在一张绒毛沙发上，唇间漫不经心地叼着一只烟斗。广告词是这样的：“黛德丽说：我吸温和的香烟——好彩！”随着她的事业达到巅峰，黛德丽的吸烟形象也广为流传，被很多时尚照片复制（如马德琳·卡恩在梅尔·布鲁克斯的《神枪小子》中扮演的西部香颂歌手丽丽·冯·斯塔普，有很多黛德丽的影子）。

然而，不仅是魏玛的演员们如弗朗茨·考特尼、彼得·洛埃米尔·詹宁斯等像黛德丽一样与吸烟结下不解之缘，而且导演们对香烟的运用也是炉火纯青。例如，在弗里兹·朗的经典电影《杀手就是M》中，烟雾吞噬了整个城市的精神。从影片的第一幕——强迫性儿童杀人犯汉斯·贝克特（彼得·洛利饰）在逃的新闻席卷大街小巷，到最后几幕——各势力联合起来抓捕逃犯，镜头中总是烟雾缭绕。电影开场不久，五个男人围坐在社区酒吧的吧台边，一边大口咀嚼着雪茄大口喝酒，一边将信将疑地听着小报专版对谋杀案耸人听闻的报道。几幕之后，两股抓捕逃犯的力量——柏林的黑社会势力和警察及政府官员，分别聚集在各自的领地。弗里兹·朗巧妙地运用平行蒙太奇，熟练地在两个试图占对方上峰、烟雾缭绕的世界之间切换。随着双方同时敲定拘捕方案，更多的烟雾涌入镜头，增加了视觉冲击性。正如安东·凯斯所说：

画面的切换建立了各方抓捕儿童杀人犯的共同目标——浓烟模糊了地位和身份，吸烟更为男人（包括贝克特）建立了奇特的共性，最后贝克特竟是被留在犯罪现场的三个烟头败露了踪迹……《杀手就是M》中被浓墨重彩描绘的烟雾直指那个



玛琳·黛德丽 1950 年出任好彩香烟的形象代言人

犹太人的标签（实际上卓别林并不是），被污辱为政治、文化和种族贱民。^[7]然而，早在 1931 年《杀手就是 M》风靡德国影院时，人们就知道扮演超级流浪汉的男主角彼得·洛利是一个犹太人。当然，观众没必要根据演员的种族背景来看待洛利所扮演角色的病态的言行举动。然而，你若想看懂弗里兹·朗的电影，还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身份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吸烟。^[8]（洛利于 1933 年移民美国之后，继续扮演了一系列的令人难忘的反面烟鬼角色，如 1941 年在约翰·休斯顿的《马耳他之鹰》中扮演的约尔书·开罗，以及 1942 年在迈克尔·柯蒂斯的《卡萨布兰卡》中扮演的乌加特。）

同很多德国电影人一样，弗里兹·朗于 1934 年流亡到好莱坞，手里拿着一份可观的米高梅合同。一到美国，他继续着在德国实践多年的电影主题和拍摄手法，其中之一便是对吸烟巧妙灵活的应用。在他的第一部好莱坞作品《愤怒》（由斯宾塞·屈塞和西尔维娅·西德尼主演）中，弗里兹·朗让男主角乔·威尔森吸烟。由于身份被弄错，乔不幸成为别人的替罪羊，并成为随后群众暴动的导火索。香烟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友好的、纯美国式的装饰品，并代表着芸芸众生对婚姻和标准资产阶级幸福的纯粹追求。^[9]确实，在谈及他的一部电影《一个人只有一辈子》时，他表达了自己把吸烟作为电影手法的喜爱：“我这样做是想制造一点讽刺意味：方达和西德尼逍遥法外，她用香烟迷住了他从

不堪重负的社会。^[6]

嘴上不叼香烟便很难想象这是侦探洛曼，观众同样不会忘记凶手一边吸烟一边给小报撰稿来煽动公众的恐惧。更重要的是，最终正是他最爱的香烟品牌向警察暴露了他的身份。

就在弗里兹·朗的城市惊悚片即他的首部有声电影推出后不久，吸烟和个人身份之间的联系，更准确地说，是吸烟和电影人之间的联系披上了政治色彩。1937 年，纳粹发行了一本具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回顾四十年来的电影》。在各种煽动性的资料中有一张合成照片引起了电影诽谤运动。从这张照片中，人们可以一眼认出六个显赫的电影人士：从导演恩斯特·刘别谦和 E.A. 都彭到德国演员弗朗茨·考特尼再到享誉世界的卓别林。六个人都被标上犹

Der Mann mit der Zigarre



Ernst Lubitsch



Fritz Kortner



Otto Wallburg



E. A. Dupont



Kurt Ehlrich



Charlie Chaplin

《抽雪茄的人》，纳粹发行的《回顾四十年来的电影》（1937）中的合成照片

巴顿·凯斯（爱德华·G·罗宾逊饰），一个虽然有时不带打火机，却一刻不能不吸雪茄的家伙。众所周知，好莱坞有名的黑色电影都是由同期的移民导演拍摄的（如朗、王尔德、奥托·普雷明格等），不管是新手、上进的艺术家还是老道的导演，他们都在一次又一次地演绎上个世纪20年代德国电影里迷漫的明暗交错的灯光，在浓烟的阴影中锤炼着自己的眼光。

一部承袭了魏玛电影传统的地道的黑色电影代表作是乌尔梅的《绕道》。这部成本极低的电影由当时不起眼的制片者发行公司（PRC）制作发行，拍摄只花了一星期。^[12]乌梅尔安排男主角、神经错乱的阿尔·罗伯茨（汤姆·尼尔饰）当画外音的叙述者。和怀尔德的沃特·南夫一样，罗伯茨糊里糊涂地被逼上了杀人的道路，最后在一个烟雾缭绕、烟灰飞舞的夜晚不得不正视自己悲惨的结局。厄运来临之前，罗伯茨是纽约一个爵士乐俱乐部里训练有素、激情澎湃的艺术家，他展现的才能有望某一天能让俱乐部扬名。

而趁机跑走，这样香烟也成就了背叛的工具。我想让她买好彩牌香烟，讽刺香烟带给他的噩运”。^[10]在随后的电影中，无论是在《恐怖内阁》（1943）颇有戏剧性的开头中笼罩在主角（雷·米兰德饰）头顶的吸烟斗的影子，还是《鲜红的街道》（1945）中在主角克里丝·克罗斯走向灭亡的不归路前用一把精制雪茄来捍卫他的忠诚，弗里兹·朗都成功地赋予香烟以讽刺意味。

纵观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电影，吸烟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被认为是现实失落感的反映，如同一根心理和精神的手杖支撑起人们消沉的意志。想想比尔·怀尔德的《双重保险》中冷酷的保险推销员沃特南夫大口地吸着香烟，用焦油和烟草为自己疗伤，画外音是他用回忆的口吻坦白自己参加的谋杀案的始末。^[11]还有两个银幕形象同南夫一样值得注意：一个是一头银灰色长发、叼着香烟的浪荡女子菲丽斯·戴尔蒂克森（芭芭拉·斯坦威克饰），一个情感中夹杂着权力和欺骗的女子；另一个是南夫的男上司



斯宾塞·屈塞在朗执导的《愤怒》(1936)中的一幕

在其中的一个场景中，在俱乐部工作了几个小时后，他深深地吸了几口香烟，即兴猛按了几下琴键。然而，在前往与在好莱坞发展的女友苏（克劳迪娅·德雷克饰）团聚的途中，他不仅卷入搭载他的摩托车手的死亡案中，而且随之而来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名为维拉（安·萨维奇饰）的阴险荡妇设的圈套中（同一个摩托车手也搭载过维拉，她掌握了摩托车手不巧死在阿尔面前的事实，并想借此把他控制在股掌之中）。维拉这个女人油腔滑调、脏话连篇，不仅嗜酒如命而且吸烟成瘾。最后阿尔和维拉被困在一个小旅馆的房间里谋划着出路。他们呆在一个肮脏的世界里，烟灰缸已经满得不能再满，空酒瓶横行四处。从电影的整体氛围来看，吸烟对影片如此重要，以至于宣传海报上两个人（阿尔和维拉）手里都拿着香烟靠在一个灯柱上。

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现代电影中认出扎根于魏玛电影、好莱坞黑色电影及其他时代和题材电影中的吸烟艺术。这方面最抢眼的要数近年涌现的“新黑色电影”，惹眼的吸烟者都占据着镜头的中间位置，如科恩兄弟的《缺席的人》(2001)。这部复古式的存在主义影片用黑白胶片拍摄，同沃特·南夫和阿尔·罗伯茨一样，主人公理发师艾德·克雷（比利·鲍伯·松顿饰）最终落到悲惨的境地，在对烟草的渴望中备受煎熬、折磨和自责。松顿的搭档弗朗西丝·麦克·道曼说：“银幕上，松顿所做的就是吸烟和呼吸。”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举动体现了对黑色电影的承袭。无独有偶，近期《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了1990年以来吸烟艺术在电影中的复活，在此之前，吸烟艺



乌尔梅执导的电影《绕道》(1945)中的一幕



比利·鲍伯·松顿和詹姆斯·甘多菲尼在科恩兄弟执导的《缺席的人》(2001)中

术可是一直在走下坡路。文章把这种新的现象（当然也是老的）描述为：“打火机！摄像机！香烟！”^[13] 另一名记者在《西雅图时报》中用平实的语言描述了好莱坞的新嗜好：“吸烟确实很酷，很性感！”^[14] 尽管银屏上的吸烟遭遇激烈的反对（尤其是在美国），而且医学研究的负面报告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吸烟艺术却继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尽管反吸烟主义盛行，但作为一种文化标签，一种表达浪漫和反叛、内省和欢乐的重要手段，吸烟不会从我们身边消失。历史上，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电影为人们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方法，把人们带到一个纯美的、幻觉和想象仍能战胜死亡忧虑的世界。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人们对吸烟的种种否定在电影中却是真实的，吸烟确实很性感、很有魅力、很酷。在舞台上吸烟很成问题，香烟在餐馆也不受欢迎，但是在摄像机镜头下，没有比吸烟表现虚无更形象的手段了！”^[15]

注 释：

- [1] 欲对马布斯博士有更详细的了解，可参见汤姆·刚宁近作《弗里兹·朗的电影：视觉的寓意和现代性》（伦敦，2000）中《马布斯，伟大的宣言者：控制与协作》一章。另见洛特·艾斯纳在她的著作《弗里兹·朗》中的精辟分析（伦敦，1976：57-67）。
- [2] 参见网页：<http://smokingsides.com/asfs/D/Dietrich.html>
- [3] 本文引用的所有电影对白均来自德文剧本的英译本。见约瑟夫·冯·史登堡《蓝色天使》（伦敦，1968：58-59）。
- [4] 理查德·克莱恩《吸烟赛神仙》（达拉谟和伦敦，1993：160）。
- [5] 引自史蒂文·巴赫《玛琳·黛德丽：生活和传奇》（纽约，1992：74）。
- [6] 安通·凯义斯《M》（伦敦，1999：45-46）。
- [7] 汉娜·阿伦特在她1944年的论文《被贬为贱民的犹太人：被隐瞒的传统》中认为，查理·卓别林——公然承认在其电影如《大独裁者》中扮演犹太人的非裔裔演员——和卡夫卡、海涅等为同一血统。见荣·H. 费尔德曼编《被贬为贱民的犹太人：犹太人在现代社会的身份和政治地位》（纽约，1978：67-90）。
- [8] 见凯义斯对洛利及贝克特的犹太人身份的探讨，凯义斯《M》，1999：71-72。
- [9] 关于《愤怒》，可参见刚宁《马布斯，伟大的宣言者：控制与协作》，2000：212-234 以及艾斯纳《弗里兹·朗》，1976：160-176。
- [10] 引自蒂莫西·科力根《电影剧本写作概要》（纽约，1994：22-23）。
- [11] 欲见原剧本中对该幕的描述，请参见比尔·怀尔德《双重保险》（伯克利，2000：10-11）。
- [12] 欲了解对乌梅尔电影的精辟分析，请参见安德鲁·布里顿《绕道》，收入伊恩·卡梅隆编《黑色电影之书》（纽约，1993：174-183）。
- [13] 引自布莱恩·卢尼《明星吸烟，评论家愤怒：一项新研究发现电影中烟民多》，*ABCNEWS.com*，2001年1月19日。
- [14] 米沙·博森《好莱坞掀起新的吸烟热潮》，载《西雅图时报》1996年9月15日。
- [15] 米克·拉萨利《香烟又一次在好莱坞电影中点燃》，载《旧金山记事》1996年11月5日。

《妈妈和娼妓》中作为生活方式的吸烟

道恩·马莱恩*

1559年担任法国驻里斯本大使的吉恩·尼科特聪明地给烟草起了个学名：Nicotiana。^[1]他把烟草作为一种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介绍给法国人。因此，法国人开始吸烟与取乐无关，而是出于养生治病的目的。很多历史文献在提及欧洲吸烟史时，大多都会提到这个科学的、医学的前提，并强调烟草是否对人体有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渐渐变得道德化）。现代烟草史学家利德·瑞弗说：“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烟草的史前史中，竟无人把吸烟作为一种取乐或放松的方式提及。历史学家们最多认为烟草可以缓解饥饿、减轻疲劳、让人陶醉。”^[2]然而，能缓解饥饿、减轻疲劳、让人陶醉不就是带给人愉悦吗？显然，虽然烟草与享乐之间的联系大大被低估了，但编年史中也隐隐约约地提到了这种关系。当烟草被引进欧洲时，人们一概只谈其医学功效，但不论是对吸烟的接纳、抑制还是否定，其娱乐性功能总会发挥一定作用。正因为如此，法国同吸烟的关系始终无法摆脱与娱乐文化史的关系，因为法国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对吸烟的娱乐性也一直保持沉默。“何种体验才是娱乐呢？”理查德·克莱恩是鲜有的敢于在直面这个问题的同时大胆强调吸烟娱乐性的史学家之一。他的《吸烟赛神仙》是唯一的论及法国吸烟史的引人入胜的文章。克莱恩研究的范畴和观点也是笔者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对法国同吸烟的关系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克莱恩看来，吸烟是一种康德哲学式的升华体验，而我却认为，在法国文化传统中，吸烟首先是一种在空虚中享乐的方式。

虽然烟草史很少光明正大地讨论吸烟的娱乐性，但并不见得处处如此。1665年的法国反吸烟潮从监狱弥漫至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路易十四世演出了莫里哀的《唐璜》，而剧中表现的正是吸烟的娱乐性。唐璜说：“没有香烟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他这样说是为了引诱美色。^[3]这句话不仅表明了烟草和享乐的关系——诱惑者向往的鱼水之欢，而且还揭示了吸烟与围绕空虚构建的享乐主义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石夏奈尔认为，香烟让男人变得高尚、大度，人们脑子想也不想就主动向别人献烟，在欲望膨胀前就满足它可以先发制人地战胜空虚感。然而在努力克服空虚的同时，色诱者却把空虚

*道恩·马莱恩 (DAWN MARIAN)：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人类科学实验室副主任，从事欧洲小说和电影史的研究，在《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现代派/现代性》、《芝加哥评论》和《芝加哥论坛》上发表过大量文章和评论。

带到人们的头上。

肖桑纳·弗尔曼在《文学语言行为》(1983)中,从修辞手法“首语重复”的角度分析了唐璜。在这里,开头的重复是为了否定结局。^[4]唐璜不过重复着相同的伎俩勾引来无数的女人,这些无名氏女子成为他“公平、女人可换性”原则下无穷无尽的情人中的一个。对于他来说,恋爱的情节无需发展,必须要像他无数的婚姻承诺一样空洞。欲望的目标没有确定性。唐璜色诱女子的方法在于教育她们:“空虚是诱惑的主要方面。”^[5]这部作品开头对烟草的赞美突出了莫里哀“享乐就是情感的空虚”的哲学观点。

在法国的主流文学作品中,现代法国享乐主义的表现随处可见。例如,在莫里哀生活的17世纪,拉斐特的《深宫后院》(1678)中提出享乐是空虚的表现,女人只有从超现实的幻想中才能体验快乐。皮埃尔·拉克洛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危险关系》(1782)认为享乐是空虚的,因为它屈从于权力。19世纪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和尤斯曼的《反抗自然》均把享乐表现为空虚,因为享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感。

就是在19世纪,在老烟民拿破仑的带领下,以及鼓励吸食烟草的1848年革命的影响下,香烟开始流行起来。人们开始撇开医学功效,公开承认吸烟与美学的关系。克莱恩是这样描述吸烟的:“吸烟时,一支香烟往往意味着无数根香烟,这是因为烟民抽上一支便不能放手,一支接一支地抽下去。”他的这种描述与弗尔曼对吸鼻烟的唐璜的情爱生活的描写十分类似。^[6]在鼻吸烟向香烟过渡的几个世纪中,留存下来的是享乐的本质。

克莱恩的书收录了19世纪吸烟享乐主义的系列文献和评论。西奥多·贝瑞特把香烟比作一个顽皮可爱的少女;^[7]波德莱尔的作品中,低级妓女们总是手拿香烟出现;^[8]朱莉斯·拉弗格1861年的《赞歌》中,把香烟同美丽却危险的女子(如妓女)联系在一起;^[9]梅里美的《卡门》(1845)是文学中第一次出现手拿香烟的女主角的作品,香烟为卡门贴上了逃犯、女巫和妓女的标签。^[10]正如克莱恩所述,女性吸烟的始作俑者是

那些靠出卖色相谋生的人,如演员、吉卜赛人和妓女。这些女人公然违背了女性的传统角色……总是主动追求享乐,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给予……她们看起来无拘无束,也就更让男人喜欢。^[11]

克莱恩将吸烟妇女的形象异域化,他内心深处对吸烟的支持会误导读者的阅读。构建这些形象吸引力的核心元素——比这些形象的享乐意义更核心的——是空虚。^[12]空虚预示着矛盾。一方面,它提供对现实的想象,一种不受个人历史约束的情色交易;另一方面,当这种交易遭遇虚无(即由个人历史决定的空虚)时会变得痛苦不堪。尽管克莱恩的体系中死亡的角色很突出,但他的重点不是空虚,而在于一种甜美的权力。当吸烟被当成康德式的美妙、妓女们可以自娱自乐时,飘着香烟的茅草屋也显得熠熠生辉。“一种微妙的东西令烟民们兴奋不已,似乎每一口烟的威力都足以让死亡远离”。^[13]

虽然我和克莱恩都将吸烟当成一种美学行为,但不同点在于我认为吸烟是一种陈腐的行为。正因为它是陈腐的,便不可能提供持久的兴奋感,有时甚至被人遗忘。因为它

是陈腐的，我们便可以将很难代表自由和自我娱乐的妓女们的吸烟行为放在上述的法国文化体系中，吸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异域风情和空虚，而不是超越或自由。

我们可以把法国式吸烟和一种可以解读为“永恒的崇高宣言”^[14]的某种情色纵欲联系在一起。法式吸烟的永恒形象即脱离法国传统的形象，存在于电影中。法国新浪潮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此类形象，从1960年戈达尔的《筋疲力尽》开始，吸烟成为“巴黎式生活态度”的符号——性的、文化的以及精神的，这种态度主张自我毁灭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一种个性化的死亡方式。^[15]吸烟作为一种蔑视和自我满足的姿态，渐渐成为如加斯·帕尔所认为的法国新浪潮运动的一个特点。^[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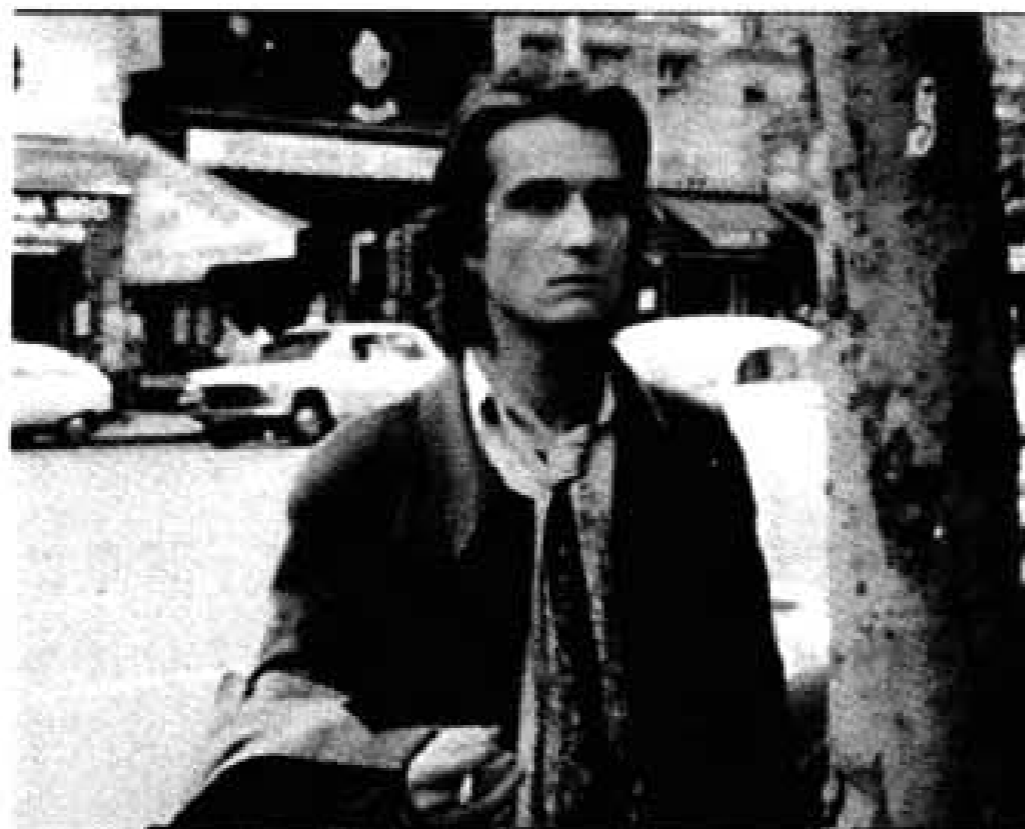
我一向认为法式吸烟的特点就是吸烟为享乐增添了空虚的色彩，当享乐脱离了与自由的关系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让·尤斯塔奇1973年在戛纳获奖的作品《妈妈和娼妓》把极尽陈腐的吸烟与1968年后的幻灭感联系在一起，影片用吸烟来表现学生起义及新浪潮运动（旨在摧毁传统享乐主义、建立以自由为核心的新享乐主义）。^[17]对于尤斯塔奇来说，吸烟打断了学生起义和新浪潮运动代表的自由享乐主义的进程，取而代之以同法国人推崇虚无的传统一致的新享乐主义观念。因此，影片旨在详细表现这种法国特有的吸烟与虚无享乐主义的关系。

《妈妈和娼妓》长达二百二十分钟，影片展开一系列毫无目的谈话，中间夹杂着性场面。几乎所有的对话——无论是在咖啡馆、公寓、租来的汽车中还是塞纳河畔——都伴着吸烟。男主角亚历山大是个居无定所的无业游民，与他同居的女友马利亚是个半老徐娘，很是看不惯亚历山大花花公子作风。英特·唯诺尼卡是一名护士，她除了拥有医院的一间宿舍外一无所有，但她风流成性，愿意和任何一个想要她的男人上床。故事的焦点集中在马利亚和唯诺尼卡的选择和对峙中。两个女人争风吃醋，最终导致马利亚试图自杀和不合时宜的求婚。

尽管吸烟在电影中有突出的视觉效果，但却很少成为谈话的话题，仅仅起到一点装饰作用。然而，背景中的香烟并不是只是摆设而已，吸烟是作为反映影片情节发展的视觉元素摆在镜头前的。尤斯塔奇把录音机都看作同亚历山大、马利亚等一样的角色，同样，香烟的中心角色不是人物，而是象征。

尤斯塔奇事业刚刚起步时担任戈达尔的助理，他的最高成就在于推波助澜地将新浪潮运动推向顶峰，因此，他对戈达尔式的“形象构建”颇感兴趣。彼得·沃伦是这样诠释这个过程：“意象从表征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在肖像符号——即巴洛克式的象征符号的范围内被赋予了一定的语义功能。”^[18]象征是指一种将抽象的品质、品德，或更恰当地说事物的状态寓意化。吸烟将身体的内在空间定义为充满烟雾的空间，从而将虚无具体化，通过突出价值观的虚无，表现健康和幸福之外的位置。吸烟为电影中意识形态和哲学观的冲突提供了答案，最后，虚无的吸烟看起来是自由的对立面，颠覆了新浪潮运动兴起时到学生起义结束期间人们对享乐的理解。

令人惊讶的是，正是由于这种对自由的颠覆——并不是转变成非自由而是虚无——才使这部电影没有被众多评论家认为是“反动电影”。有几条证据可以支持这部电影的反动政治意图：法西斯式的操场布景、对过往的怀旧、恶劣女人以及最终投向天主教。



尤斯塔奇于1973年拍摄的电影《妈妈与娼妓》中的镜头

然而，许多谴责其政治倾向的批评家们却同时为许多与他们的评论不相符的东西感动着——尤斯塔奇把反动政治表现得如此有诱惑力，而评论家们却用一种不恰当的政治观点填充了电影中的虚无。

亚历山大的观点从头至尾控制着电影，电影的政治立场就是在他身上形成的。他虽然与那个征服者同名，但却克服了名字的殖民冲动。他征服的不过是一个被蹂躏的女子，而他对唯诺尼卡的征服完全是败笔。所以他理论上是个帝国主义者，实际上却是个反社会主义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对消费社会、尤其是生产的反对把他变成一个极端的消费者。只有同消费经济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理解亚历山大的政治观点。

蓝火车咖啡屋的一幕确立了无效消费的主要立场。当电影将“吃”突出表现为一种无效消费行为时，香烟却不在场。在对唯诺尼卡的回答中，亚历山大将虚无作为他的经济原则。唯诺尼卡说：“你如何生活？”他引用了法国颓废时期的一句名言说：“我更喜欢无聊，无所事事。”但是虚无不只限于思想，它还被认为是身体的一种状态。在饭店外拍摄的一幕是这样开始的：借助旋转门将身体经济比喻为外部和内部的一条空荡荡的旋转通道，当他们揣着借来的钱走向饭店时，亚历山大和唯诺尼卡却都不饿，饭也吃得也毫无乐趣。饭是用来证明他们的空虚——代替饥饿的空虚的。

正因为吸烟已成为一种象征，那么为了把“吃”确立为一种已没有价值的消费行为，构建这一幕的思想的、身体的和经济的虚无主义必须依赖于其他符号。吸烟区别于旋转门的象征意义在于可移动性和灵活性，香烟的适应性也反应了亚历山大的适应性。

事实上，亚历山大对相互矛盾和排斥的世界观的适应使影片的政治倾向难以捉摸。尽管他借鉴了多种立场，但影片既不赞同法西斯也不赞同资产阶级。首先，亚历山大未署名的朋友和他的旧情人吉尔贝特（前者是法西斯分子，后者是傲慢的资产阶级）^[19]都没有控制影片的观点。第二，显然，亚历山大看到朋友书上某人被纳粹党卫军绞死的情形十分沮丧。最后，亚历山大和唯诺尼卡选择了其他政治方向，其中包括颓废主义、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

尽管这些政治方向不尽相同，但是他们与虚无的概念以及吸烟活动存在特有的联系。颓废主义者总是将感官的享受追求到麻木，作为一种极端随意的活动，吸烟也同任何矛盾情绪以及存在主义者的荒诞相融合。但是在亚历山大欣赏的各种观点中，虚无主义能最好地解释哲学世界观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吸烟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号召重新审视价值观或展现传统价值观的等级体系下，吸烟无意于折中幸福价值观，这点不同于那些企图推翻以健康和幸福为基础的价值观。虚无主义不会允许亚历山大和他的朋友吸烟，它坚持的吸烟文化在电影的每一幕中都展示着，这是一种健康和权力经济之外的文化。

反映亚历山大虚无主义价值观最好例子是他对工作的批判。他甚至拒绝工作，哪怕是为了自己能享乐——无论是勾引女人，还是与某人分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烟雾缭绕和人声鼎沸的饭店成了表现吸烟这种被动活动的最佳场所。尽管他宣布每个下午去花神咖啡馆看书就“像工作一样”，但他从未落实过，只说说而已。但是，他不是不停地对话，而是吐一缕烟，说一堆自相矛盾的废话，好像要证明他只是乱说一通，并把吸烟升华成对他而言最有益的行为。

正因为亚历山大说不出有意义、有思想的话语，他才对那些讲话滔滔不绝“如字典一样”的人如此感兴趣。这类人讲话时的自信是让亚历山大觉得他们像字典的原因。有这样一个“如字典一样”的人：

我想起了一个喜欢一字一句讲话的阿拉伯人曾说：“黑人妇女做爱的方式很特别。当男人把阴茎插进女人阴道时，它在那里产生了火炉般的热量。这是殖民地的一个首领告诉我的。”^[20]

这个阿拉伯人一边向往着首领的权力，一边又对得不到的东西心存嫉妒，他以权力者的身份同黑人妇女做爱，这种身份允许首领们将暴力之地变成个人享受之地。不管上述一番话中的“它”是指男性的生殖器还是女人的阴道，都是避而不谈热量的原因而强化黑人女子的性感，从而在事实上将暴力的殖民性转化成一种性感以及基于种族和性别的主观性。黑人女子被描述成空虚（炉子是一个容器）的、有吞噬危险性的人（如同20世纪20、30年代电影中吸烟的蛇蝎美人）。不足为奇的是，法语中火炉这个单词与烟斗的烟钵相关，用一种中性（或空虚）的快乐（吸烟）掩饰了虚无。火炉和烟钵之间的语义联系借用一个依赖黑奴运转的行为突出了殖民地暴力行为。阿拉伯人重复着殖民地首领的话，亚历山大又重复着阿拉伯人的话，亚历山大复制的不是他的言语内容，而是站在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边羡慕着对面的人，因为他不像阿拉伯人，无法持之以恒地、大胆地保持思想的状态。

在这个例子中，亚历山大对这个反叛人物言语的空洞模仿并不是要证明他的反动性，而是要证明他并不是反动分子。同样，在电影的结尾，本能的爱取代自由恋爱，这种天主教式的结局实际上是在批判这种幼稚的浪漫思想。如果忽略了唯诺尼卡皈依天主教的背景，就会将结局解读为反叛。

吸烟对空洞爱情的象征意义便是背景因素之一。比如，马利亚回家发现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满屋狼藉，她把这些解读为亚历山大和唯诺尼卡疯狂做爱的证据，以及她自己和亚历山大之间空洞的爱情。而有一次亚历山大把一包香烟丢给正在车里等他的唯诺尼卡做伴，自己跑回去与马利亚吵架，同时他告诉唯诺尼卡，他会一直爱马利亚。除了作为排遣寂寞的工具，香烟还代表不同目的的爱情。

如果说吸烟象征爱情的空虚，那么在表现电影核心事件的一幕中，爱情在以接纳吸烟为开局的构架下发展就绝不是偶然。当时，医生们既认为香烟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又认为它是一种“比毒芹更危险、比鸦片更致命的毒药”。^[21] 尽管公众在这些观点间徘徊，我们可以用雅克·德里达的“药毒”，即以毒攻毒的逻辑来理解吸烟在文化中的流行。同样，我们也可以依此逻辑理解“空洞的爱情”。

这一幕刚好发生在亚历山大把烟丢给坐在车里的唯诺尼卡之后，在此之前，正是他的嫉妒导致马利亚的晚宴不了了之。回到马利亚的公寓中，亚历山大对唯诺尼卡说了这番话：

亚历山大：你能治疗最不可思议的癌症疾病，难道你就不能找到治愈这种痛苦的良方？你知道，过去，开天辟地之时，人们做爱，结婚，一点问题也没有，想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这应该很好。直到有一天，某人决定某个女人只能属于他……他不知道他这是做了什么。哦，这难道就是一剂良药？打针、手术……忍受这样的痛苦……

唯诺尼卡：人应该吃点维生 M（爱情）。^[22]

亚历山大的一席话将爱情定位为引起痛苦的疾病，而唯诺尼卡则把爱情当成痛苦的疗方。观点的差异不仅表明人们不同的选择，也说明爱情既是毒药又是良方。这种僵局渗透着他们永远无法达到的自由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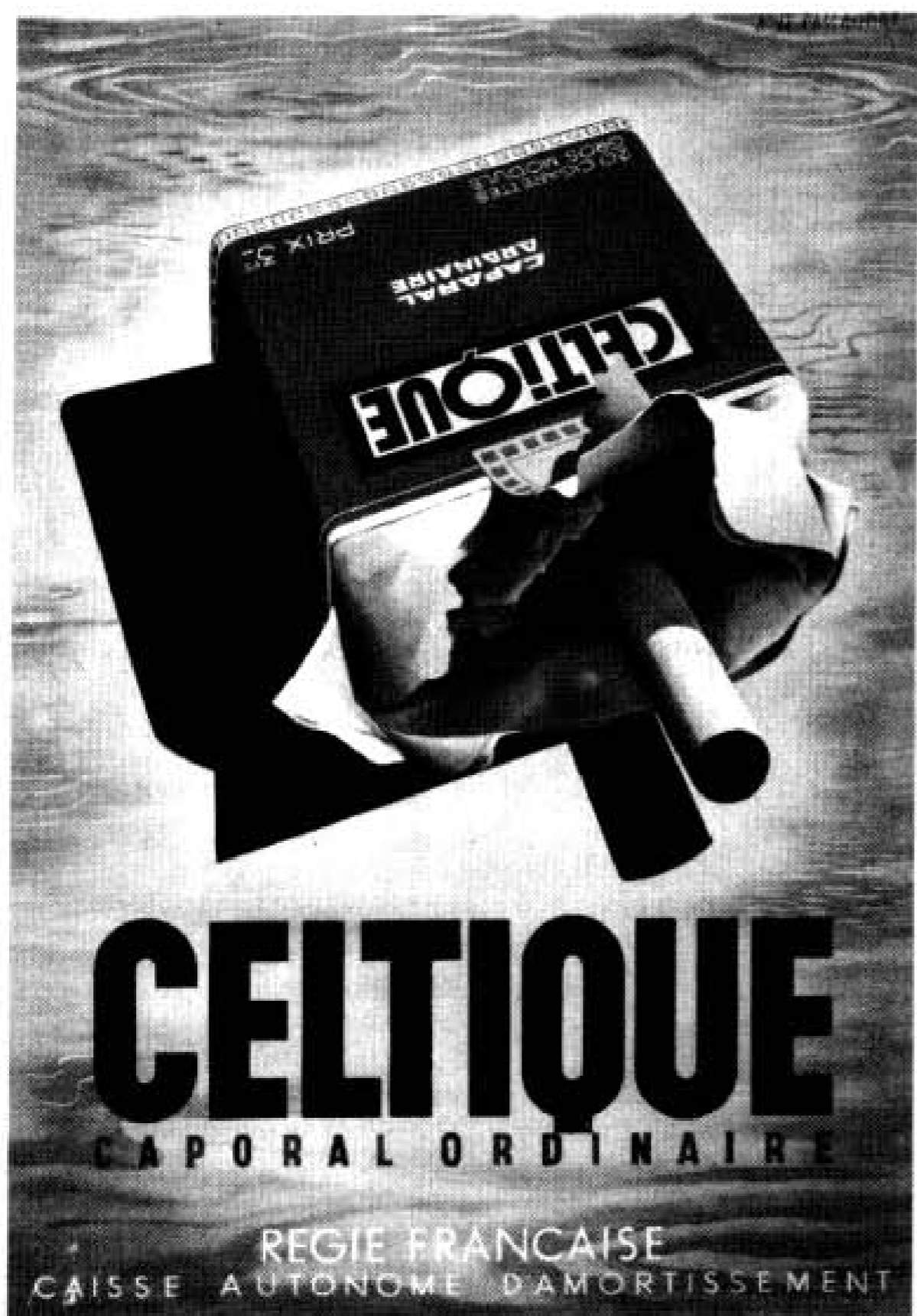
唯诺尼卡用来疗伤的空虚的爱情有可能既深化痛苦又治疗痛苦。我们回忆一下，唯诺尼卡曾表示她多想刺破亚历山大美丽的血管，这一幕解剖了唯诺尼卡内心的空虚。当她还没来得及取出卫生巾亚历山大便进入她的身体时，她说这样卫生巾会从她的鼻孔里钻出来。还有一个难辨疗伤还是致伤的情景：当亚历山大准备出门买烟时，马利亚宣布唯诺尼卡将以护士的身份来访。等他回来时，两个女人坐在床上。这时他把一件东西扔到两个女人之间的床上，不是香烟，而是玫瑰。“真漂亮”，马利亚带着讥笑的口吻说，“都是给我的吗？”如果送花是一种妥协的姿态，那么他要么把花送给两个女人，或者一个都不送，从而打消花的这种意义。他送的花实际是香烟——空虚——促使他的离开。最后，唯诺尼卡带给亚历山大治病的不是维生素 M，而是维生素 C，这样硬生生的现实主义最终取代了浪漫主义。唯诺尼卡告诉亚历山大，如果吃了药出现肿块，这全是他的问题，这进一步反映出治疗和病痛有时难分彼此。

但是如果电影为反对自由式爱情而将之表现为药剂和疾病的结合体，那么同样的逻辑——吸烟的逻辑——也反对出于生殖本能的爱情，为影片的天主教提供了背景。从始至终，唯诺尼卡是个淫荡乱伦的女人。亚历山大初次遇见她时，两人交换一下眼神，深吸了一口烟。唯诺尼卡是一个性战士，她打着自由的旗号，倔强地颠覆了传统的责任感。她怎么吸烟，就怎么谈论着没有一丝生趣的闪电式的一夜情。但是她却不为钱献身，淫乱的行为没有把她变更富有、充实，相反使她更加空虚：

我的恋人算最多了……他们搞我。或许我就是个慢性病人……慢性的做爱机器……你知道很多男人都想要我，他们不为什么，他们在空虚中搞我……但是某天总有一个男人会爱上我，和我结婚生子，因为他爱我。只有当两个人想一起生孩子时，爱情才不是虚无的。^[23]

唯诺尼卡喜欢滥交，她对此的迷恋同烟瘾一样强烈。她提出的解决方案“生孩子”需要做同样的事情——“在空虚中做爱”。一种莫名的空虚缓解了她的病痛，同样，这里也体现了一种毒/药的道理。

最后唯诺尼卡可能怀孕的结局并不是对保守价值观的支持。唯诺尼卡宣布她可能怀



1934 年克尔特 (CELTIQUE) 香烟的广告

来清楚地表明自由、非自由和享乐之间的关系。导演的本意是让马利亚和唯诺尼卡代表妈妈和娼妓，可她们都吸烟。空虚属于躺在床上孤独地吸着烟的妈妈，独自奔赴不可告人约会的妓女，以及无助的妈妈和娼妓。尤斯塔奇让我们审视空虚，虽然我们总是深表遗憾。如果妈妈们和娼妓们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毫无疑问，马利亚读懂了亚历山大自相矛盾的人性。在一个特定镜头下，亚历山大舞动着香烟，庆祝着“一个男人可以在街头疯狂”的时刻。这表明，如果空虚、脆弱甚至疯狂不被排斥的话，“有可能，一种有趣的事情将会发生。”^[24]

注 释：

- [1] 康特·科蒂著、保罗·英格兰译《吸烟史》(纽约, 1932: 60)。
- [2] 引自理查德·克莱恩《吸烟赛神仙》(达拉谟和伦敦, 1993: 11)。
- [3] 同上, 第 181 页。
- [4] 肖桑纳·弗尔曼《文学语言行为: 唐璜和奥斯汀》(纽约, 1983: 40)。
- [5] 同上, 第 43 页。
- [6] 克莱恩《吸烟赛神仙》, 1993: 26。
- [7] 同上, 第 56 页。
- [8] 同上, 第 8 页。

了亚历山大的孩子时，令她吃惊的是亚历山大尾随她进入房间。剧本中，唯诺尼卡对亚历山大的问题“你来到这里做什么？”有这样一句导语：“以包法利夫人的口气说话。”包法利夫人标志着偷情必死传统的终结的结局不是死，而是自杀。尤斯塔奇通过对比怀孕和自杀两种结局，把怀孕的破坏性和人为性当成解决方案。天主教式的方案则更乐观一些。唯诺尼卡开始呕吐，分不清是早孕呕吐还是饮酒过度。这让人们想起另一个镜头，亚历山大让马利亚呕吐出她企图自杀而吞的毒药。影片最后的婚约让观众想起亚历山大对吉尔贝特定婚的回应。最终，影片让我们重温了唯诺尼卡对浪漫爱情的嘲弄和诋毁。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亚历山大蜷缩在角落里，婚约没有任何保证。

尤斯塔奇的电影意不在于表达一种政治观点，反之他关心的是失败的政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新浪潮运动的失败，并借此

- [9] 同上，第 18 页。
- [10] 同上，第 114 页。
- [11] 同上，第 117 页。
- [12] 不足为奇的是，并不是通过填充法国传统欲望的空白来构建情欲，而更多通过模仿它来表现情欲。
- [13] 克莱恩《吸烟赛神仙》，1993：116-172。
- [14] 同上，第 2 页。
- [15] 加斯·帕尔《吸烟》，载《视野和声音》VII/12(1997：30-31)。帕尔同时指出，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吸烟就象征着自由，尤其是女性独立。但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是在《筋疲力尽》中，法律赋予的权力（如死亡权力）也不可避免地受文化秩序的奴役，从而令自我满足感大打折扣。
- [16] 同上，第 30 页。
- [17] 学生起义挑战了资产阶级的享乐观，推崇以自由恋爱取代“生殖本能”的恋爱，而新浪潮运动则以表里如一的自由观来挑战资产阶级的享乐观。导演戈达尔和雷奈也致力摆脱平铺直叙的电影拍摄方式。路易·马勒拍摄有关越界的电影，而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早期作品把“中心艺术自由观念”作为拍摄理念。许多人认为 1968 年 5 月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快乐”的法国诞生了，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克劳德-让·贝特朗《法国的新生》，载《媒体研究期刊》XII/3（1998：92-99）。欲全面了解新浪潮运动，可参见杰洛德·马斯特《电影简史》第四版（纽约，1986：349-368）。
- [18] 见彼得·沃伦《戈达尔和反电影运动》，收入菲利浦·罗斯编《叙述、设备和理念》（纽约，1986：123-124）。
- [19] 尤斯塔奇电影中的吉尔贝特来源于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吉尔贝特，她是妓女奥黛塔的女儿。
- [20] 尤斯塔奇，剧本，第 72 页。
- [21] 康特·科蒂《吸烟史》，1932：102-103、185。
- [22] 尤斯塔奇，剧本，第 103 页。
- [23] 尤斯塔奇，剧本，第 118-119 页。
- [24] 同上，第 94 页。这里我的翻译不是依据剧本[其中这剧话是“maybe something interesting will happen” (il va peut-etre arriver des choses interessantes)]，而是来自电影中的对白“il risque de passer des choses interessantes…”。

吸烟和艺术

魏玛文化评论家沃特·本杰明在一篇题为“单行道”的文章中说：“如果烟头的轻烟能轻盈飘出，笔头的墨水能挥洒自如，那么我将达到写作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16世纪之后艺术界着迷于表现烟民和吸烟不足为奇。吸烟——不管是吸鸦片、烟草还是大麻——不仅仅关联着艺术，甚至成为艺术的替代品。吸烟既热烈又清爽，它的作用也多种多样，不仅代表着创造力，还代表着它所存在的社会。从荷兰静物画家威利姆·赫达发人深省的作品《番茄、酒和怀表》（1637）、异域风情浓郁的《阿尔吉利亚女人》（1834）到雷诺·阿温的《悠闲地吸着香烟的克劳德·莫尼特》（1872），西方艺术用香烟来定格艺术家们向往的创造力。在夏丹的静物画《抽烟的声音》中，观众一眼就会被普通房间里一个不起眼的架子所吸引。一个吸烟者漫不经心地将他的长陶土烟斗搁在一个木盒上，“在这些物体之间”，艺术历史学家查尔斯·斯特林说，“夏丹找到并发现了广泛存在的一种平衡体系，这种平衡体系深埋在日常混乱的景观中，等待着发现它们的画家”。因此，缕缕轻烟虽是短暂的，却同样反映了艺术世界的美感。

轻烟飘到了电影中。比利·怀尔德的电影《落日大道》中，格洛瑞尔·斯旺森手里优美却陈旧的烟斗冒着轻烟，迈克尔·柯蒂斯《卡萨布兰卡》中，汉弗莱·博加特攥紧的香烟飘着烟雾，这些电影都勾起了人们对吸烟的回忆。烟雾中的倒叙让吸烟行为成为观众理解稍纵即逝的香烟意义的关键。甚至不同电影对吸烟的不同援引也说明了这些形象之间的联系。在《历劫佳人》中，玛琳·黛德丽扮演的世俗墨西哥女子塔尼亚一边嘴角叼着香烟，一边和沙里夫·威尔斯说话，这也让我们想起了约瑟夫·冯·史登堡执导的《蓝色天使》中吸烟和性同在的一幕。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得对——不只是关于饼干，“让曾经听到的声音，曾经闻过的香味，现在重新触动我们的听觉和味觉……这是脱离时空缚束的片刻自在。一个人会明白此刻‘死’对他毫无意义；如果他超越时空，又何惧未来？”依此看来，吸烟不仅表现了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在这个喜半掺忧的未来，我们避开现实而陶醉在回忆及其象征中，喜悦和危机都变得和谐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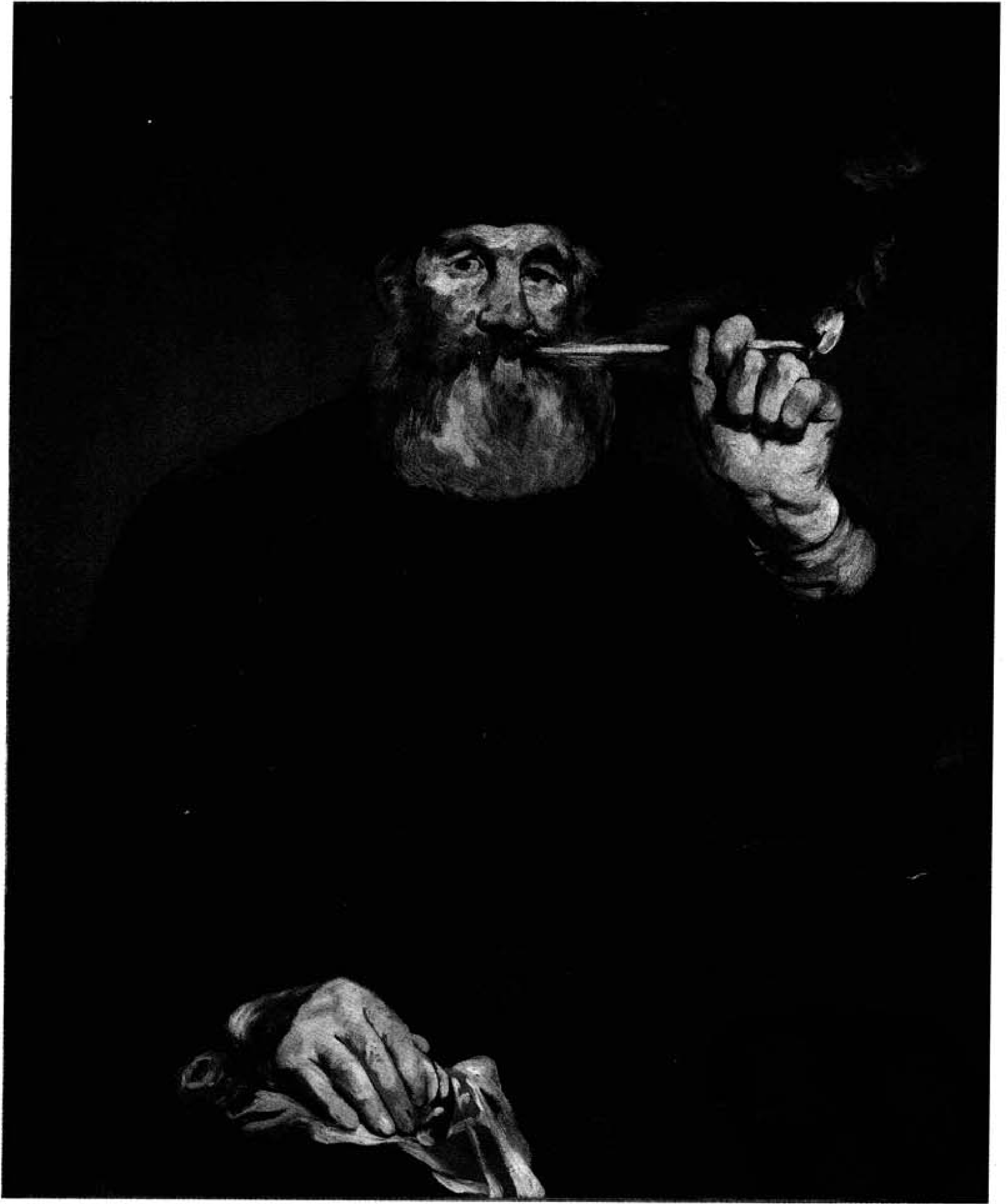
扬·斯汀《坐着拿着烟斗的男人》，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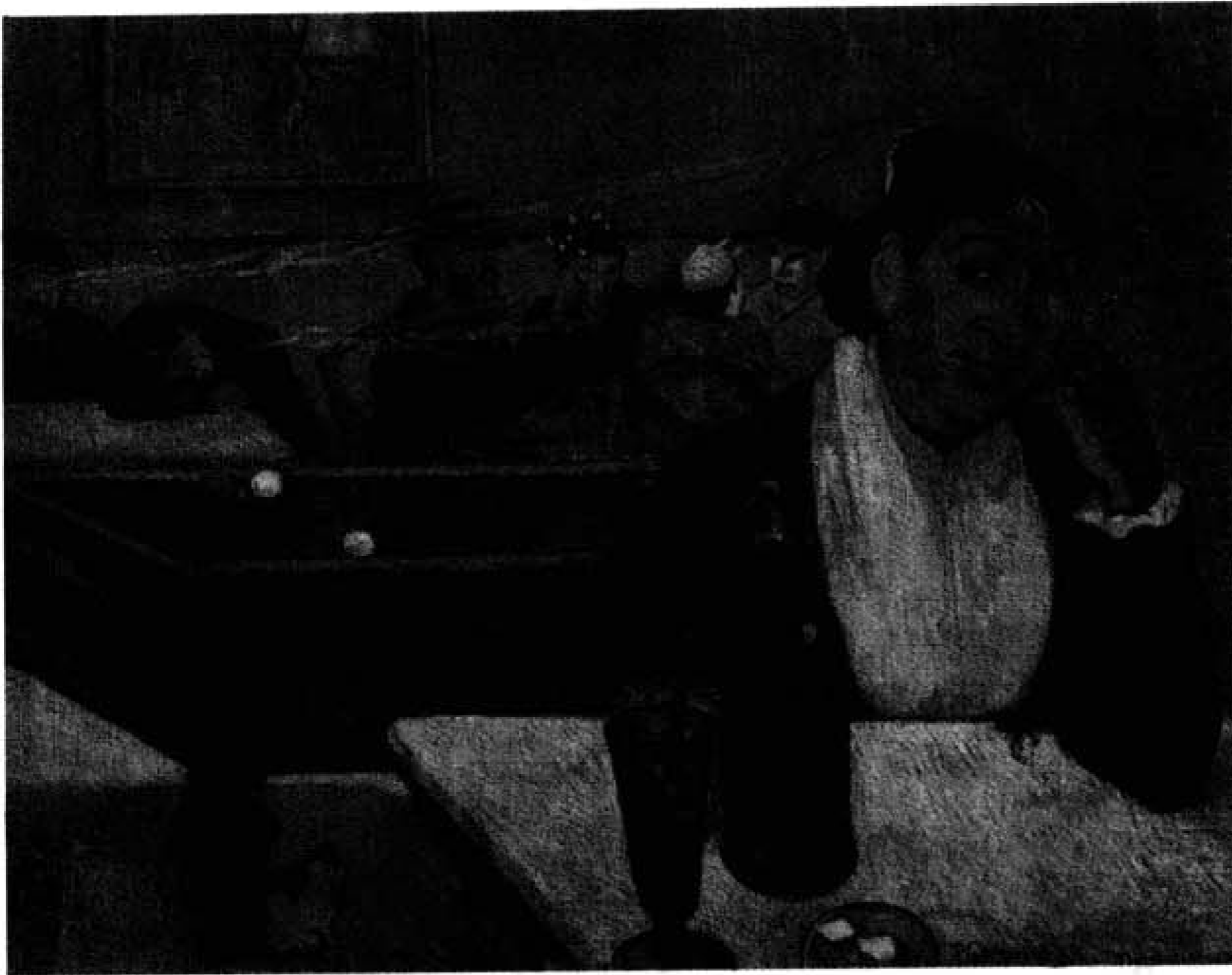
大卫·特尼瑞斯《吸烟斗的女人》，油画



詹姆斯·吉尔雷《失去奴隶比尔后的安慰》，1796，手工上色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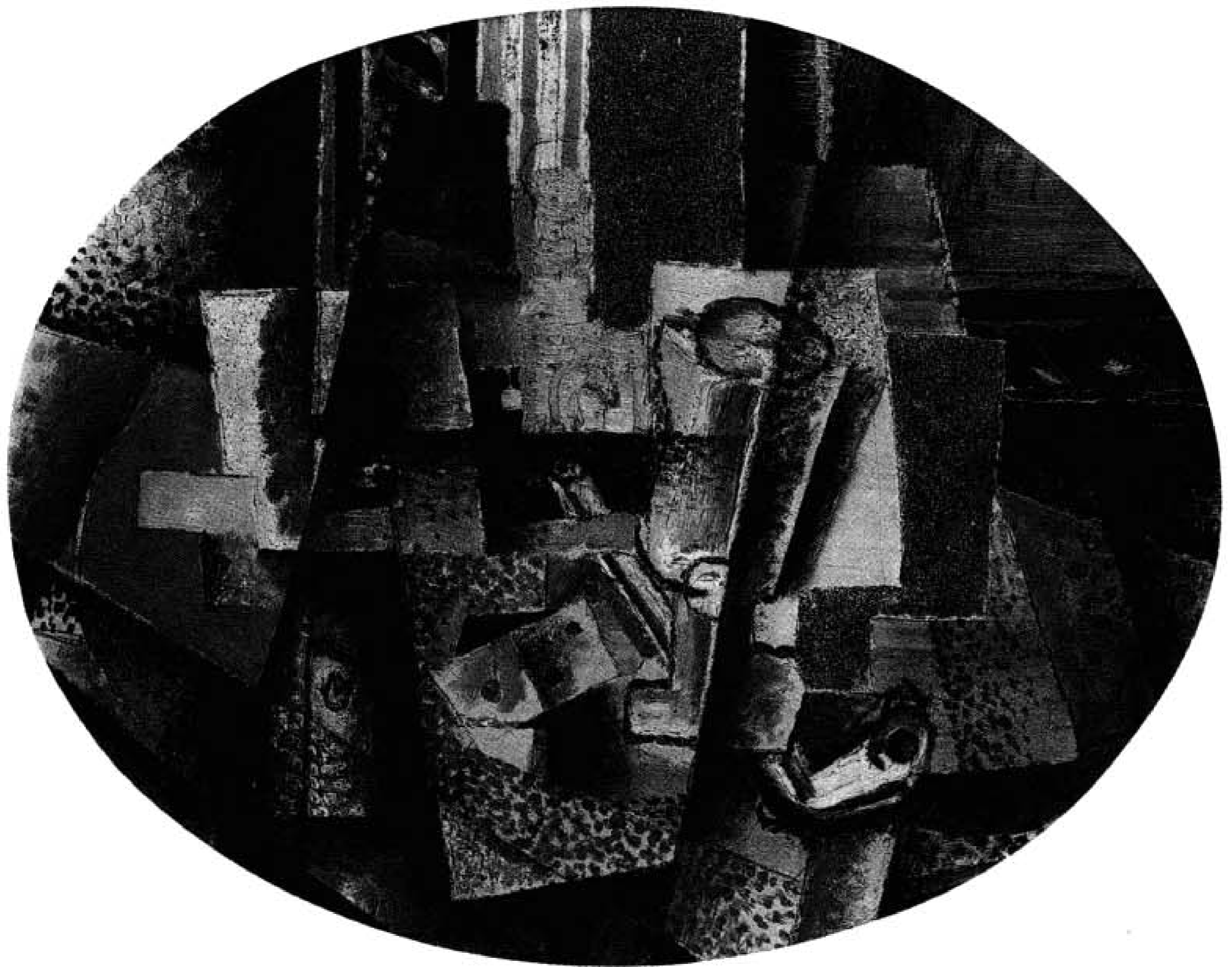
爱德华·马奈《吸烟者》，1866，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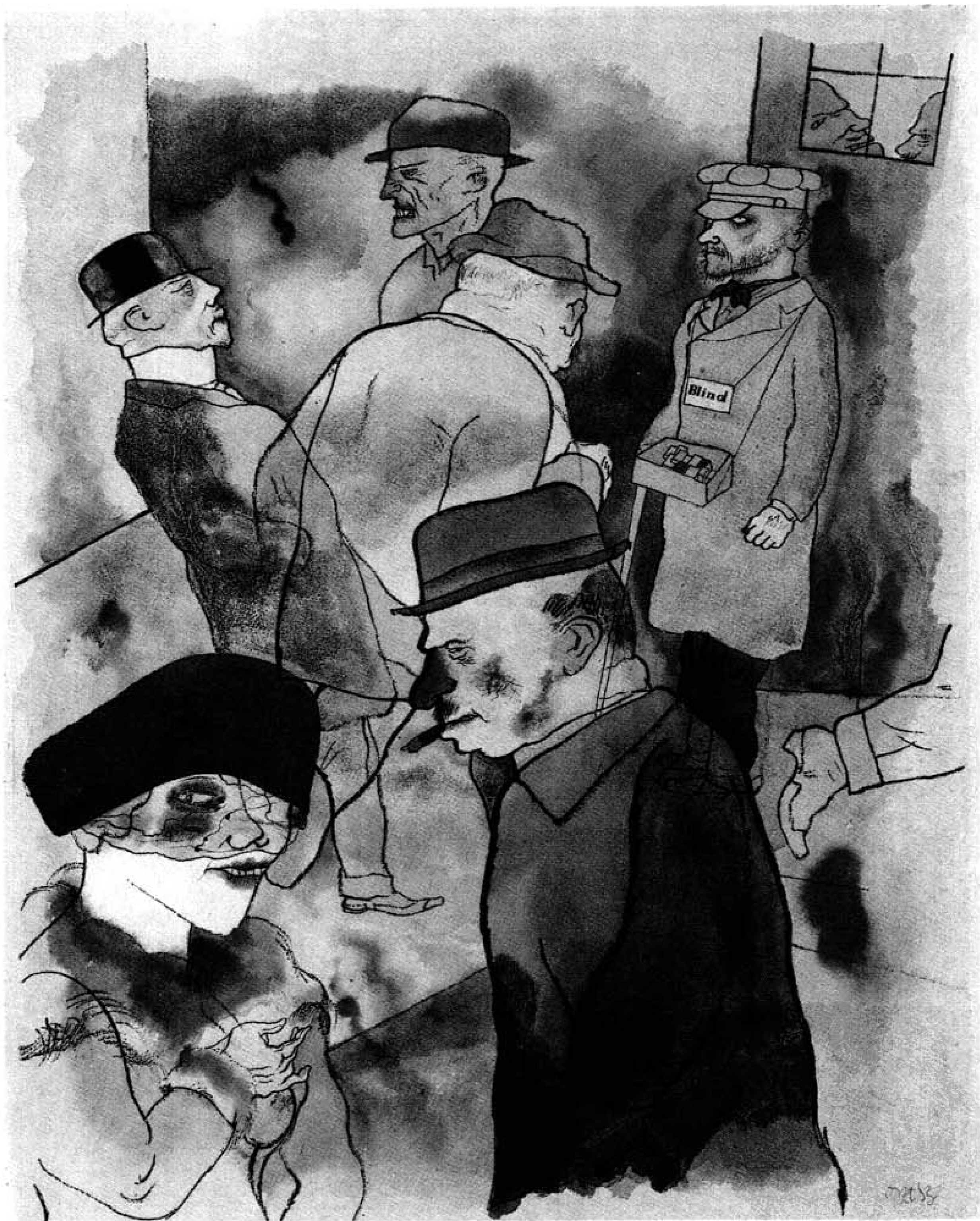
保罗·高更《夜总会》，
1888，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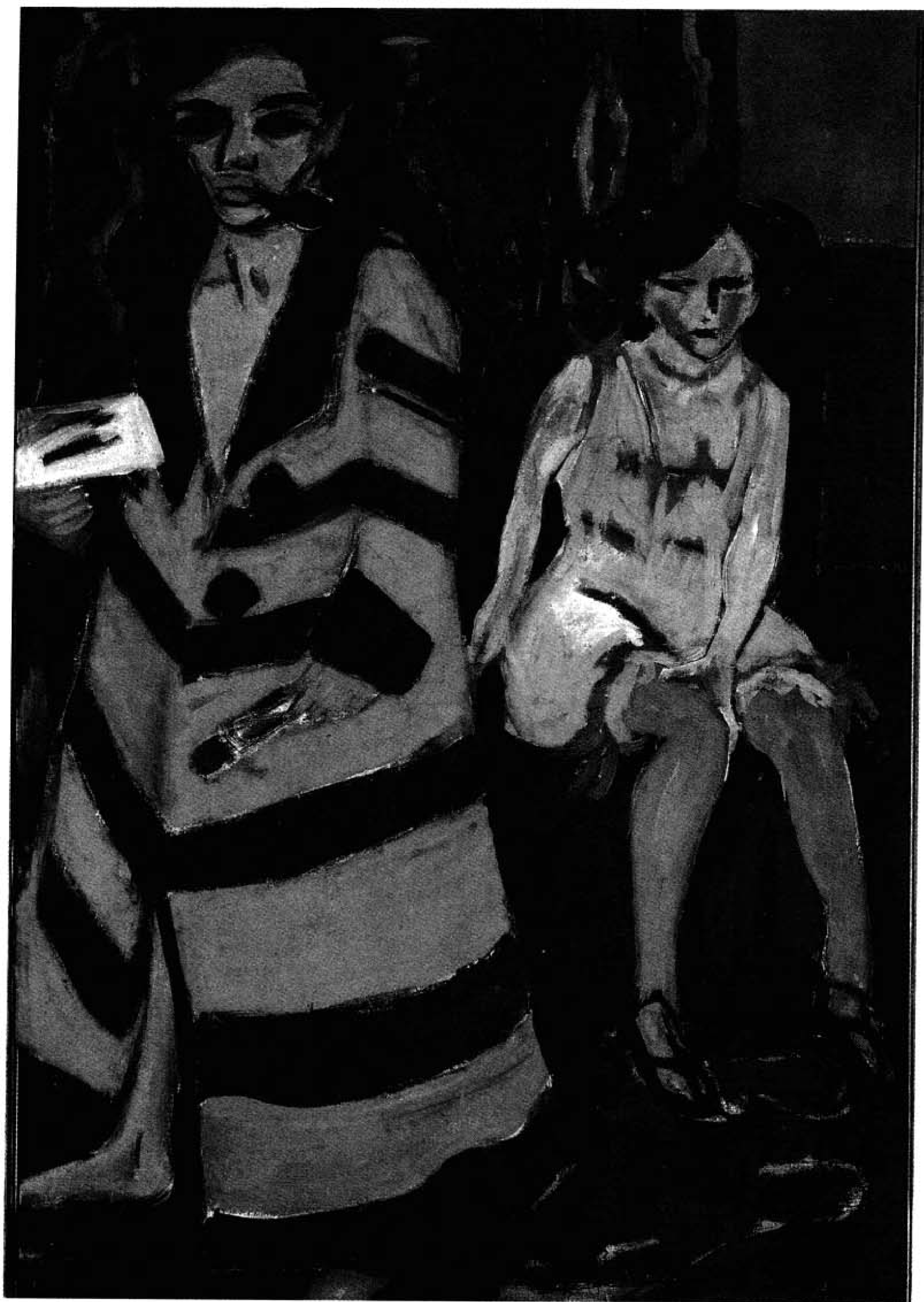
保罗·塞尚《打牌的人》，
1890-1895，油画



乔治·布拉克《静物：烟斗》，1914，油画



乔治·格罗兹《黄昏》，1922，水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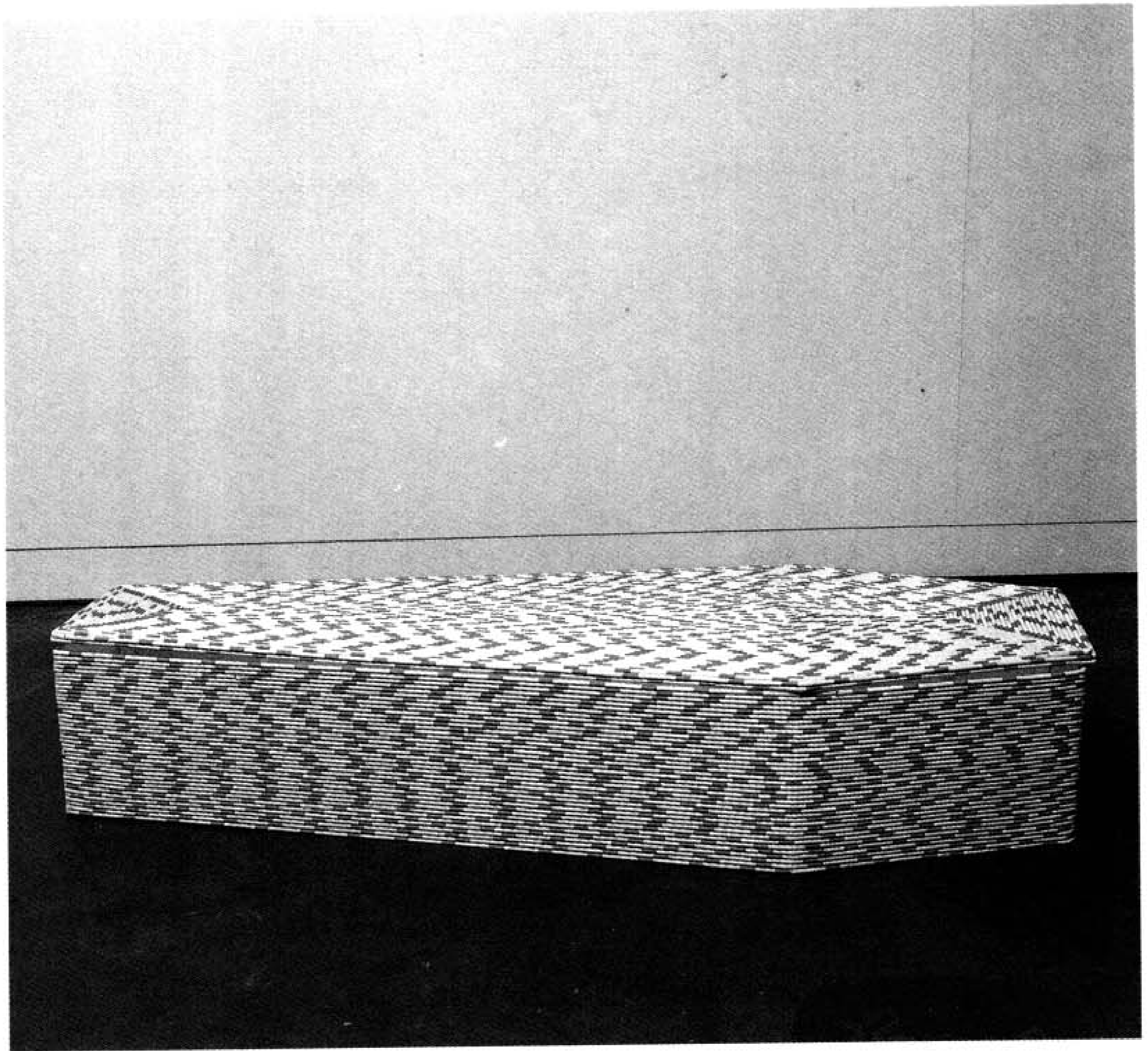
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模特自画像》，1910-1926， 油画



苏茜·弗雷曼、李治《一周一包烟》，2002，由尼龙单丝线、烟头编织而成



玛吉·汉布林《对话王尔德》，铜像，1998 摄于伦敦阿德莱德街



萨拉·卢卡斯《谢谢，晚安》，2003，由香烟、日光灯管和红灯胶制成的纸盒棺材

吸烟，性别与种族

Smoking, Gender and Ethnicity

在局外人的多重想象中，吸烟的妇女、异族和殖民者存在着强烈的世界感，吸烟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烟草在非西方的使用，尤其是在东亚，已经为一种和现代有关的新的意义搭建了舞台。

犹太人和吸烟

桑德尔·吉尔曼

似乎从开天辟地之日起，犹太人和吸烟之间就存在一种神秘的关系。早在1492年11月2日，刚刚登陆现今古巴所在地的克利斯托夫·哥伦布派两个船员去侦察情况。他们于11月6日返回并报告说他们发现一个“饮烟”的村落。他们把“tabuco”的一端点着，然后吸另一端……他们吸着吸着变得迷迷糊糊，甚至烂醉如泥”。路易斯·德·拖雷斯是两个船员中的一个，他是哥伦布的翻译，通晓希伯来语、迦勒底语（亚拉姆语），也会说一点阿拉伯语。^[1]传说中，就是这个路易斯·德·拖雷斯把烟草引入欧洲。^[2]专家们认为，这个拖雷斯就是当年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并在西班牙隐姓埋名留下来的犹太人之一。这段由哥伦布后来的随从、传教士拉斯·卡萨斯所写、关于广为流传的哥伦布日记的评论直到1825年才出版，这一点让这个传说置身于19世纪学者对犹太人和烟草关系的激烈讨论中。19世纪后期的学者们立即将拖雷斯与对东欧犹太人的驱逐联系起来，并认为人们不应该对犹太人和烟草之间强烈的负面关系大惊小怪。

在19世纪20年代卡萨斯的作品发表（早于犹太人和欧洲社会的文化融合）之前，人们认为犹太人和烟草之间的关系是正面积极的。这里的犹太人是指西班牙或葡萄牙籍的犹太人，主要是1492年被西班牙驱逐而在其他欧洲城市定居的犹太人。一张“外地人”的脸让他们成为大众眼中的社会边缘人。他们是外国人，而与吸烟的联系更让他们显得奇异。然而，犹太人与欧洲文化融合后，非犹太人伪科学家开始利用这种所谓的“联系”来支持他们的言论——犹太人有着与欧洲人不同的种族本质。他们这番言论已经不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而是瞄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东欧犹太人的身体和思想。这种联系形成一个种族类别，一个远离欧洲、存在于原始奇异的中东地区的种族类别。人们只有回头看，才会清楚这种别有用心的手段是多么具有政治性和悲剧性。

犹太人和烟草的联系从来都不只是停留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他们在现代欧洲早期的烟草工业中发挥着其重要的作用。早在1612年，汉堡市政府便允许葡萄牙犹太人在本市居住，但不能住在市中心以及犹太人聚居区。他们专门从事外贸交易，如烟草、糖、咖啡、可可、印花布和调味品。于是，塞法迪大离散与烟草这样的外国货联系在一起。西班牙犹太人于1683年来到荷兰的格罗宁根省，同样从事着烟草买卖。犹太人长期从事这种职业，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公众认识：犹太人和烟草的联系与生俱来的。

随着烟草成为欧洲市场的主打产品，犹太人也开始参与烟草的种植和加工。在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城市，这些犹太人在传统犹太人聚居区外从事农业生产，或居住、工作在小城镇。在19世纪早期的德国西南部省份如巴登，犹太人像他们在普鲁士、莱茵地区的同胞一样，从事烟草的种植、加工和贸易，这个地区成为德国的烟草生产基地。从

19世纪早期开始，犹太人在雪茄和烟斗烟草的中转、加工和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确实，到20世纪初期，犹太人已经占据曼海姆烟草业约百分之四十的份额，而他们才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四。在更加农业化的俄国，高加索犹太人（也被称作 Tats 和 Dagchufuts）直到19世纪才获得土地所有权。种植稻谷是他们的传统职业，随后他们也开始种植烟草，与烟草业联系在一起。在哈普斯堡王国，直到18世纪末犹太人才得以解放，并在随后被允许从事烟草贸易。西班牙犹太人裔的 Diego d'Aguilar 垄断了奥地利的烟草业，于1743年到1748年期间雇用基督教贵族当中间人；而以色列的 Honig 于1788年建立了国家烟草垄断公司。从19世纪开始，在东欧和美国，犹太人都被视为烟草商。

Loeser 和 Wolf（柏林）等公司是烟草业的领头羊。在分裂的波兰，1867年 Leopold Kronenberg 生产了当地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香烟和雪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和烟草业的关系逐渐发生着变化。波兰犹太人实际上被禁止参与国家烟草垄断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即1933年纳粹上台之前，纳粹冲锋队官员指责某香烟生产商生产“犹太香烟”，原因只是该公司的一名董事会成员是犹太人。^[1]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只有从排犹宣传的镜头中看见犹太人在烟草工业中的身影，人们再也不把犹太人同由外族人引入欧洲的这种奢侈品带来的享受联系在一起。

从17世纪开始，欧洲犹太人成为美国烟草业的生力军，当时烟草业的两大巨头便是犹太裔商人 Ashert 和 Solomon。雇用了两千名犹太员工的犹太人烟草公司生产的“Sweet Caporals”牌香烟是19世纪卖得最好的香烟。随着19世纪70、80年代塞缪尔·龚帕斯领导烟草制造商拉开了工会运动的序幕，犹太人开始投身于烟草零售业。犹太人与烟草的联系在美国的发展道路与众不同，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其在欧洲的演变。

然而，犹太人和吸烟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在于犹太人从事烟草工业。在20世纪前找不到犹太人踪迹的冰岛，有一件进口商品却离不开犹太人，这就是自从18世纪早期以来丹麦犹太人源源不断向冰岛出口的烟草。人们把这个事实解读为19世纪以来围绕欧洲犹太人和烟草产生的犹太人神话之一。这种联系甚至延伸到遥远的冰岛，足以说明这种联系的强大。排犹势力利用这种联系为自己服务，这帮人认为削弱社会根基的烟草追根溯源是犹太人制造的，这种观点被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记录在基督教排犹文学中。例如，诗人克莱门斯·勃伦塔诺在向创立于1811年的德国基督教餐桌协会的投稿中说，正是犹太人于1696年在马克·勃兰登种下第一颗烟草树：

就这样，他们阻碍了本国国民的发展，他们沉浸在这种在生长阶段就已经臭气熏天的植物散发出的邪恶蒸汽浴中，萌发了许多罪恶的、难以理解的思想。确实，我们可以细数这种恐怖植物的破坏性。秋天，他们像幽灵般笼罩着贫瘠的土地。那时那刻，人们会相信那个犹太教传说：耶稣警告所有的树木不要承载他的身体，于是凡是木制的十字架个个都垮掉了。后来，一个犹太人从魔鬼花园里来拿来一些烟草树树干绑在十字架下，这样耶稣被钉死了。

勃伦塔诺说，犹太人自己就沉迷于尼古丁中，甚至违背了安息日禁烟的规矩。他们



19世纪末，维也纳的一本排犹杂志“Kikeriki”（“Kikeriki”代表德国雄鸡的歌声）把犹太人的黑脸表现为一个烟斗。图中有两幅对比明显的形象：传统的宗教形象和现代城市人大礼帽。公鸡面目狰狞，令这个犹太人痛苦不堪

Das J - Er wird schon „jähren“!

在星期五便把烟存在桶里，这样星期六不用点火就可以把烟从桶里倒出来吸。勃伦塔诺认为犹太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天生的疾病”，这种病是对他们漠视耶稣的惩罚。渐渐地，吸烟成为描述犹太人内在生理和心理特点的另一种符号。

19世纪后期，关于吸烟和犹太人联系的讨论再度兴起，出发点就是勃伦塔诺等作家归结于犹太人的那种“恐怖的、不值一提的怪病。”

1858年，事业刚刚起步的让·马丁·沙可提出了“间歇性跛行症”。这种病的症状是小腿长期反复地出现疼痛和紧张，以至越来越僵硬直到无法移动，患者出现明显的一瘸一拐的步态。这种症状会在患者活动如行走开始一个半小时后每隔几分钟出现一次，症状即现即消，但是会反复出现。

沙可的医学结论竟被用来描述犹太人的病理特征，间歇性跛行症成为东欧犹太人的特有疾病之一。1901年，H.海格在华沙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就间歇性跛行症是犹太人的种族特征进行了总结。他调查的二十三个病人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他发现病源在于“患者”的神经病素因以及其周身循环系统的脆弱。这种病多发于东欧男性犹太人中。海因瑞奇·辛格认为间歇性跛行症正是“犹太人与生俱来的神经障碍”的证据。这不仅标志着排犹运动的兴起，而且也似乎证实了犹太启蒙运动的观点：东欧犹太人之所以生病，原因在于他们的宗教实践形式以及他们两千年来禁锢在犹太人聚居区。这些犹太人改革



《逾越节礼节手册》(Passover Haggadah)中的一幅画：好父亲不吸烟，而小偷是个烟民

者认为，要想改造疾病缠身的状况，关键是要把东欧犹太人从社会枷锁中解放出来。这些改革者们将疾病限定于东欧地区从而让自己脱离干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人竟然也从事种族活动。

曾试图打破疾病和现代犹太人身体弱点之间联系的是华沙的塞缪尔·歌德弗雷姆，20世纪前五十年最著名的神经学专家之一。歌德弗雷姆对间歇性跛行症的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患者并不一定是东欧犹太人，他们几乎全是大烟鬼。因此，承担神经病污名的不应该是犹太人的身体，而是烟瘾。

著名的犹太裔神经学专家托比·科恩在关于犹太人的“神经疾病”的论文中，将间歇性跛行症归类于“神经缺陷”的一种。在批评言论的虚构性以及援引犹太裔神经学专家库尔特·孟德尔论文的同时（他丝毫没有讨论“种族”的问题），他承认犹太人患这种综合症的风险更大，但并未提及病理原因。这样，两种极端不同的病源理论出现了：一边着重于犹太人的神经系统特质，尤其是与循环系统疾病相关的特质；而另一边歌德弗雷姆和科恩认为，病源并不在于犹太人的天生身体素质，而是烟草使用不当造成的循环系统梗塞。威廉·尔伯认为，正是烟草在间歇性跛行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发

תורה שבעל פה
 כל ימי חייך תעולם פניה. על ימי נתיבך לראות
 ליבות סמשים:
 ברוך סמקים ברוך תנא ברוך שקמן תור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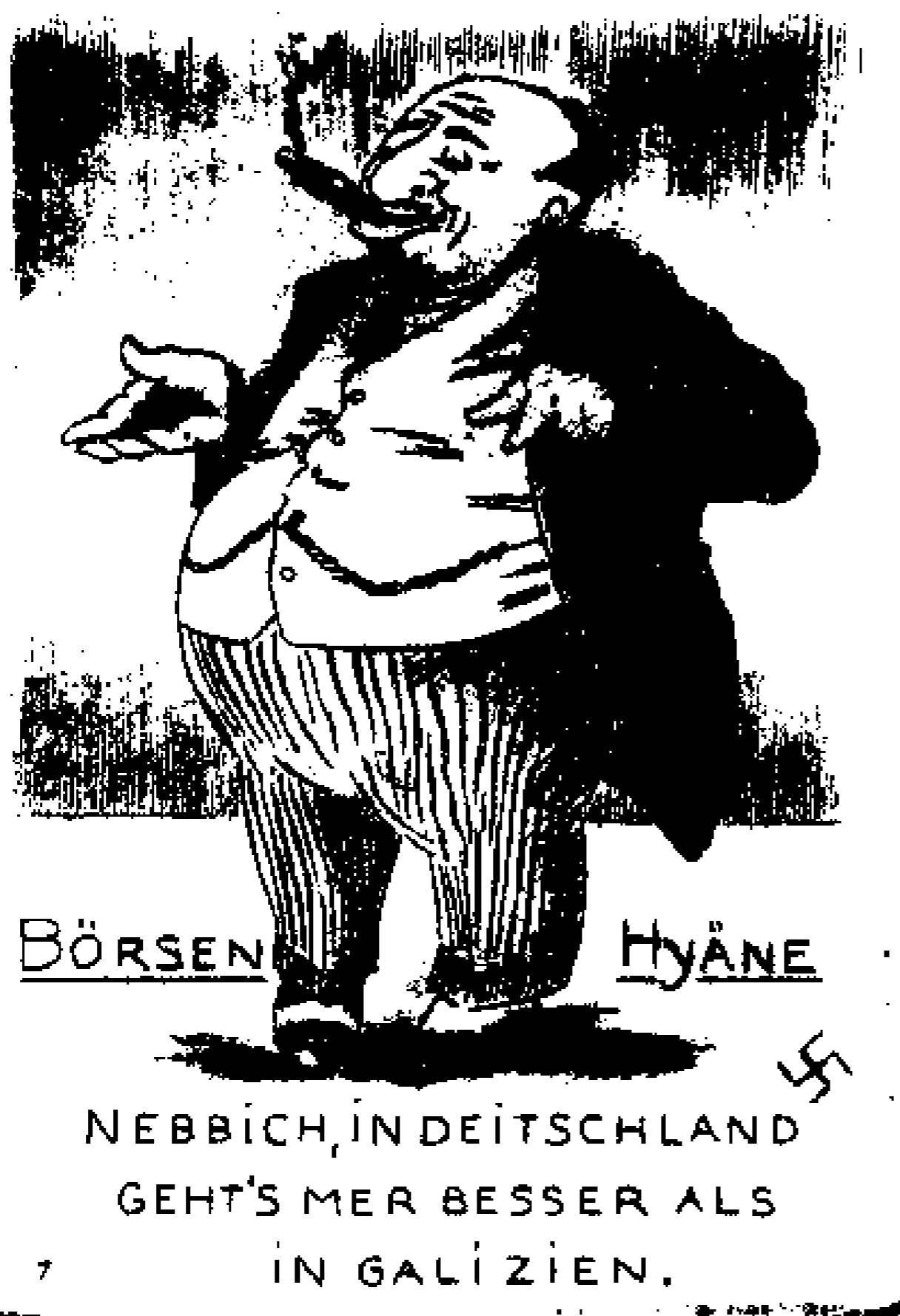


1879年,芝加哥的拉比·H·莱伯门第一次以希伯来文和英文出版了《逾越节礼节手册》(Passover Haggadah)。吸烟的儿童象征着邪恶,代表着现代社会的诱惑,包头巾的父亲代表着传统价值观

denotes this time only; but ALL the days of thy life, denotes even at the time of the Messiah.
 Blessed be the Omnipresent; blessed is he, blessed is he who hath given the law to his people Israel, blessed be he: the

现,在三十五个病例中,竟有二十五名患者吸烟过度(这是指每天吸四十到六十支香烟或十到十五支雪茄的人)。滥用烟草的是东欧犹太人,而非西欧犹太人。歌德弗雷姆的病人都住在华沙。柏林著名的神经专家赫尔曼·奥本海姆从他长达五年的研究中发现,四十八名患者中绝大多数的间歇性跛行症患者(三十五至三十八人)是俄罗斯犹太人。东欧犹太人的思想与社会格格不入,身体状况也与众不同,但是西欧犹太人却并非如此。换句话说,尽管被扫地出门的西班牙、葡萄牙籍的犹太人从事烟草业,他们并没有威胁到周围的社区。相反,正是因为西欧犹太人已经融入社会,不再是社会中的另类,那些伪科学家们才不得不挖空心思把东欧犹太人的帽子安在西欧犹太人的头上,那么想继续保持社会透明度的西欧犹太人就不不得不攻击东欧男性犹太人的身体了。

将间歇性跛行症的原因归结于滥用烟草的想法却中了当时种族理论的下怀。当时,犹太人已经被贴上了易烟草中毒的标签。19世纪末期烟草病理学的经典文献,如L.von Frandl-Hochwart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易患疾病,因为间歇性跛行症及某些大脑疾病如失语症大量出现在犹太人。连西欧犹太人也脱离不了间歇性跛行症,因为他们被称为呆错了地方的“东方人”。呆在东方的东方人是在露天吸烟,因此他们不容易患香烟疾病;但是当他们的迁徙到欧洲,他们的东方人本质无法适应新环境的挑战,加上他们在封闭条



纳粹描绘的 1933 年前在股市投机倒把的犹太人的典型形象。画中人物用假依地语说道：“无论如何，我在德国都比在加利西亚干得好。”雪茄是犹太资产阶级的标准配件

现代社会的最大受害者，因为他们天生就不能应对现代生活的压力。持这种观点的不仅是早期的非犹太裔伪科学家，连一些犹太人也如是说，如犹太人复国运动者、医生马克思·诺尔道。确实有这样一种观点：尚未确定病因的颓废症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尼古丁神经病（Nicotinismus mentalis）。如果吸烟导致癯病，那么按照医学常识来说，东方的犹太人就是典型的癯病患者。尽管过度吸烟会引起疲惫，利奥波德·罗恩菲德认为在现代社会，一天三只雪茄是抗疲劳的良方。看起来，犹太人似乎是患现代病最多的人群，那么吸烟或许会给他们治病！

现代病还包括吸烟、尤其是吸雪茄引起的癌症。当然，最著名的犹太人案例要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 年他被诊断出患有口腔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一只烟的意义远远大于烟本身，他甚至将自己的才华归功于香烟。1930 年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在写给桑多尔·费伦齐的信中称：“不抽吸就是自取灭亡，就如同陷阱中的狐狸咬断了自己的腿。不吸烟，我很不开心，感觉我不是自己。”^[4]对他来说，雪茄是“自我”的一种重要属性；没有香烟，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件下吸烟，所以经常生病。按这种观点来说，犹太人是脱离了故土——中东地区的东方人。这种观点一直曲折地延伸续 20 世纪 30 年代。弗里兹·里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的著作中声称，正是间歇性跛行症反映了烟草对犹太人身体的重要作用。他继续说，这种作用其实是一种社会作用，因为滥用烟草是反叛宗教中禁止饮酒的结果，然而很可笑的是，犹太教中并没有这种禁忌。

到底是谁用烟草毒害了谁？关于犹太人和吸烟引起的疾病关系的争论超越了间歇性跛行症的研究案例。在追溯现代人堕落退化的原因时，香烟也被认定为歇斯底里症的病因之一，而且被维也纳著名医生西奥多·比尔罗斯认为是现代社会“疲惫”的原因之一。现代社会生存竞争激烈，人们需要借用茶、酒精和浓烈的雪茄烟来刺激疲惫的神经。这里，犹太人又成了伪科学家攻击的对象。他们强调说，犹太人是现代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成就斐然的烟民榜样：“我相信我的工作能力和自控能力不断增强，全是雪茄的功劳。这方面我的榜样是我的父亲，一个终生吸烟的老烟鬼。”^[5]在维也纳，人们认为雅各布·弗洛伊德这辈东方犹太人滥用烟草，但是对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代西化的犹太人来说，硬顎癌已被称为“富贵病”，因为只有一天抽得起十五至二十根雪茄的人才有可能得这种病。^[6]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口腔癌同心肌梗塞一样被看作成功的象征。它不再象征着卑微，而是一种文化适应的表现。随着犹太人逐步融入维也纳的经济生活，曾经被归结为犹太人特有的属性开始和某一经济阶级联系在一起。确实，在弗洛伊德发病的1900年到1930年间，犹太裔科学家如莫里斯·索丝比发现，除生殖器疾病外犹太人的癌症发病率几乎接近非犹太人的水平。^[7]就生病而言，他们和其他人没有差别。

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早期，易患某些疾病如精神病一直被认为是犹太人的身体特征之一。随着科学将犹太人确立为一个种族，过去在宗教和文化领域讨论的犹太人与吸烟相关的某些特点被纳入医学领域。这个世界虽然喜欢制造神秘，但显然还不能把某些犹太人与烟草的种植、加工、销售硬生生地联系在一起。

注 释：

[1] 关于这一点有多种解释，可参见杰罗姆·E.布鲁克斯《强大的树叶：穿越几个世纪的烟草》（伦敦，1953：12-15）等。

[2] 布列拉·因凡特《圣烟》（纽约，1998：6，13）。

[3] 罗伯特·博罗克特《纳粹的烟草战争》（普林斯顿，1999：235）。

[4] 迈克尔·摩尔奈编译《弗洛伊德的日记（1929-1939）：最后十年的记录》（纽约，1992：69）。摩尔奈评价说：“背井离乡和节制吸烟可以引起相同的想象，这个事实就可以表明——如果需要更多的证据的话——吸烟对弗洛伊德的重要性。”

[5] 马克斯·斯图《弗洛伊德：生与死》（纽约，1972：86）。

[6] 莎伦·罗姆《不受欢迎的人侵者：弗洛伊德与癌症的斗争》（纽约，1983：38）。

[7] 莫里斯·索丝比《癌症和种族：癌症在犹太人群中的发病情况》（伦敦，1931：34）。

19 世纪烟草艺术中被商品化了的非裔美国人

多洛瑞斯·米歇尔*

随着动力印刷机的发明、纸张的批量生产、石版印刷术的发明以及铁轨的铺通和消费经济的兴起，19 世纪的媒体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这为美国的广告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促成了视觉意识的形成。在鞋油、烟草、漂白粉、香皂和其他产品的广告中，非裔美国人的形象暗指了深黑的颜色或深黑色被消除的情形。^[1]在以白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香烟和雪茄的广告中，以这样的形象与奴隶种植烟草的历史、与建立在感官快乐之上的心理暗示产生了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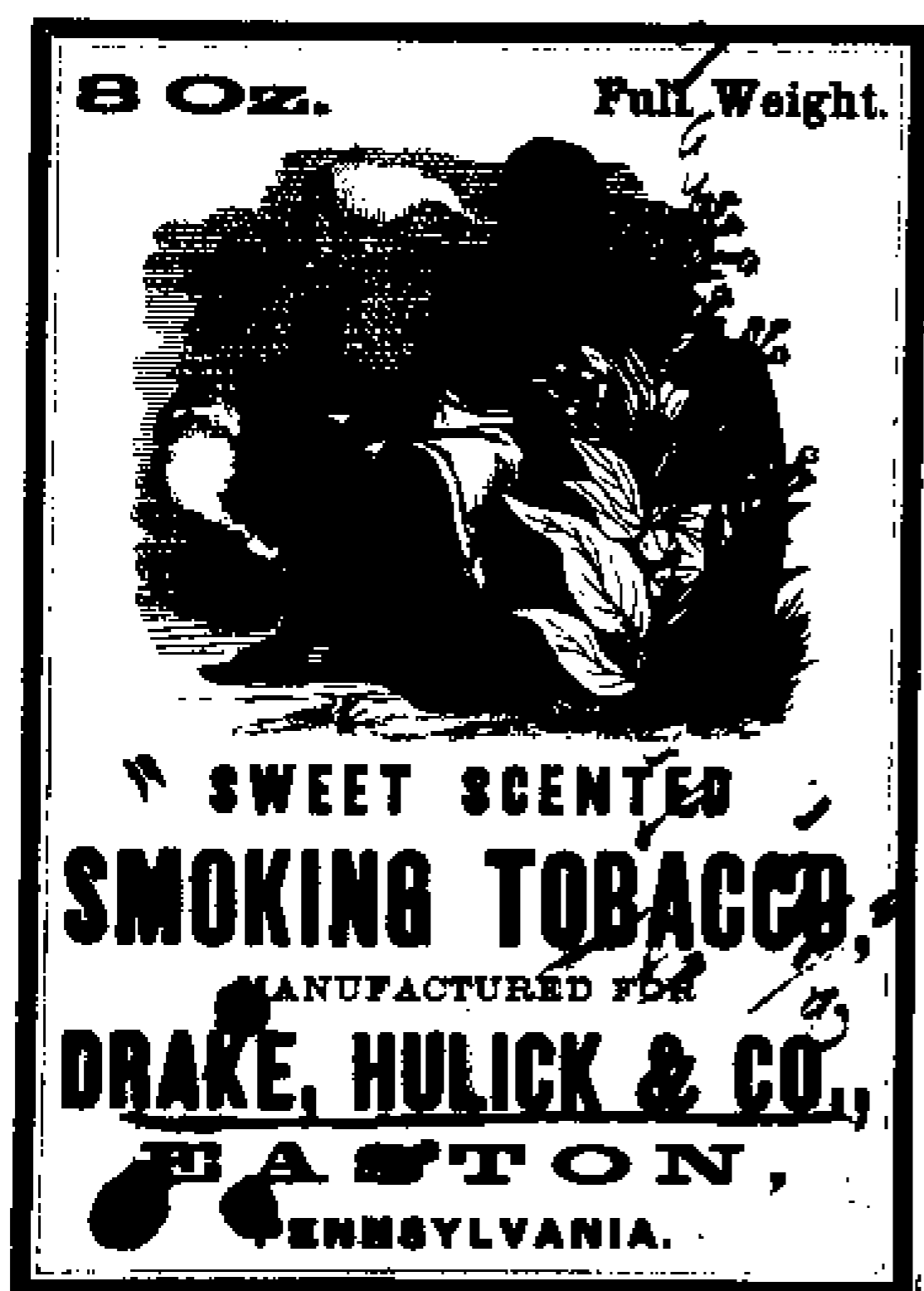
与靛青、棉花和蔗糖一起，烟草确保了切萨皮克湾居民的富有，也刺激了新大陆的奴隶贸易业。^[2]烟草在欧洲售价如此之高，烟草叶甚至常常被用来交换奴隶。^[3]在 J.S. 白金汉的《美国的奴隶州》（伦敦，1842）中有一幅雕刻画展示了这样一幕：在一间屋子里同时进行着奴隶和烟草拍卖会。

在 17 世纪，殖民地已经大量地使用黑奴集中种植烟草，于是在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一些烟草店的招牌上，黑人男孩的图像被用来表示销售弗杰尼亚烟叶。^[4]在一些招牌上，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特征被集于一身，比如一位黑人男孩常常穿戴着用烟草叶而不是羽毛制作的头饰和短裙，“一只胳膊下夹着一根烟草，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支长柄的烟斗”。^[5]在 1902 年的一张根据更早时候的原型制作的贸易卡片上，奴隶被与烟草联系在一起，他坐在烟草堆上，触摸着一株烟草。他茫然的表情和近乎裸露的身体表明，他和烟草一样都被视为原料。

19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是盒装雪茄商标的“黄金年代”，是激烈的雪茄业竞争中成百上千的制造商们“斗争”的年代。在美国，以纽约和费城为首的北方大城市是雪茄制造和广告宣传的主要地点。虽然与烟斗、口嚼烟草或香烟相比，雪茄很是昂贵，而且只有一小部分的消费者，然而在所有的烟草收入中它却占有近乎百分之六十的比重。雪茄成了白人肌肉发达、富有权利的象征。散装烟草、口嚼烟草和鼻烟的生产与包装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那些掌控着大量黑人劳动力的白人公司。垄断了此类生产的少数公司采用独具一格的标签和广告来确立他们的产品身份。^[6]

主要位于北方城市的十个大的石版印刷公司为大多数的烟草产品提供广告。在 19 世纪 70 年代，许多德国的石版印刷商移民到费城和纽约，为需要十种不同色彩的商标提供印刷以及镀金和浮雕花纹技术。^[7]他们带来的是欧洲美术中的传统，如大皮耶特·布

*多洛瑞斯·米歇尔（DOLORES MITCHELL）：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艺术史教师，研究领域是艺术的社会用途，发表过关于烟草艺术的文章。



“芳香……”，彩色石版画，宾夕法尼亚伊斯顿的德雷克哈利克公司制作的贸易卡片，1890年左右

怀旧的庄园生活情景，忽略了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移民到北方从事各个领域的工作这样一个现实。在“南方种植园”里，一个身影很大的白人主子占着最突出的地位，而在地平线以下，一群微小的、看不清脸面的黑人与庄稼和土地融在了一起。庄园主坐在一个直立的座位上，他的特征在蓝天的反衬下清晰可见，这种传统的搭配技巧强调了人类的理性和对自然的控制。他的雪茄烟雾很像将要把粮食运送到市场的蒸汽船冒出的蒸汽，这样的商标让欲购买雪茄的人幻想着自己控制着一群温顺的黑人劳动者，而他则得以忙里偷闲，以至可以抽上一支上好的雪茄。

有关黑人在庄园里快乐劳动的文字描述和画作起源于内战之前，当时，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批评实行奴隶制的诸州的奴隶制，从而引发了人们——奴隶主、牧师、报纸编辑和大学教授——对奴隶制的好处展开辩论。”^[8] 这些描述忽略了奴隶们通过破坏和逃跑这些方式表达愤怒和悲哀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杂志如《弹竖琴者》，也对庄园的生活给予了浪漫的描述，还画了黑人的漫画，暗示他们智商低，需要白人对他们进行父母般的控制。

在雪茄盒商标“红润的哈瓦那”上，热带背景和“哈瓦那”暗示了一种古巴的产品，但是商标是由费城的哈里斯石版印刷公司为一位美国制造商设计的，这位制造商使用古巴的树叶作为烟纸，里面的烟草取自于弗吉尼亚。^[9] “红润的哈瓦那”描绘了各种烟草干燥后的颜色，艺术家通过画出人物直立的姿态、正面的形象和白色得体的套装而建立起

鲁格尔和乔治·斯达波斯画作，表现的是低着头淹没在庄稼地里失去了个性的工人们，站在一旁的是他们的监工，监工们有时也坐在高高的马背上。这些印刷商大大丰富了当时美国的广告形象。

那些主要服务于白人烟草制造商和销售商的白人艺术家们，倾向于把非裔美国人“商品化”，尤其用在雪茄烟盒商标上以吸引富裕的白人消费者。即使那些用于廉价的烟草产品的艺术也很少使用高贵的黑人形象来吸引黑人消费者。“商品化”技巧包括把黑人放进令人怀念的内战前的庄园生活场景里，把他们的肤色和烟草的颜色作比较，把他们等同于农场的动物，向白人展示他们怎样为自己的主子提供快乐却满足不了自己的愿望。虽然非裔美国人的形象在19世纪的烟草艺术中只占了一小部分，然而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白种美国人很想与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群体友好相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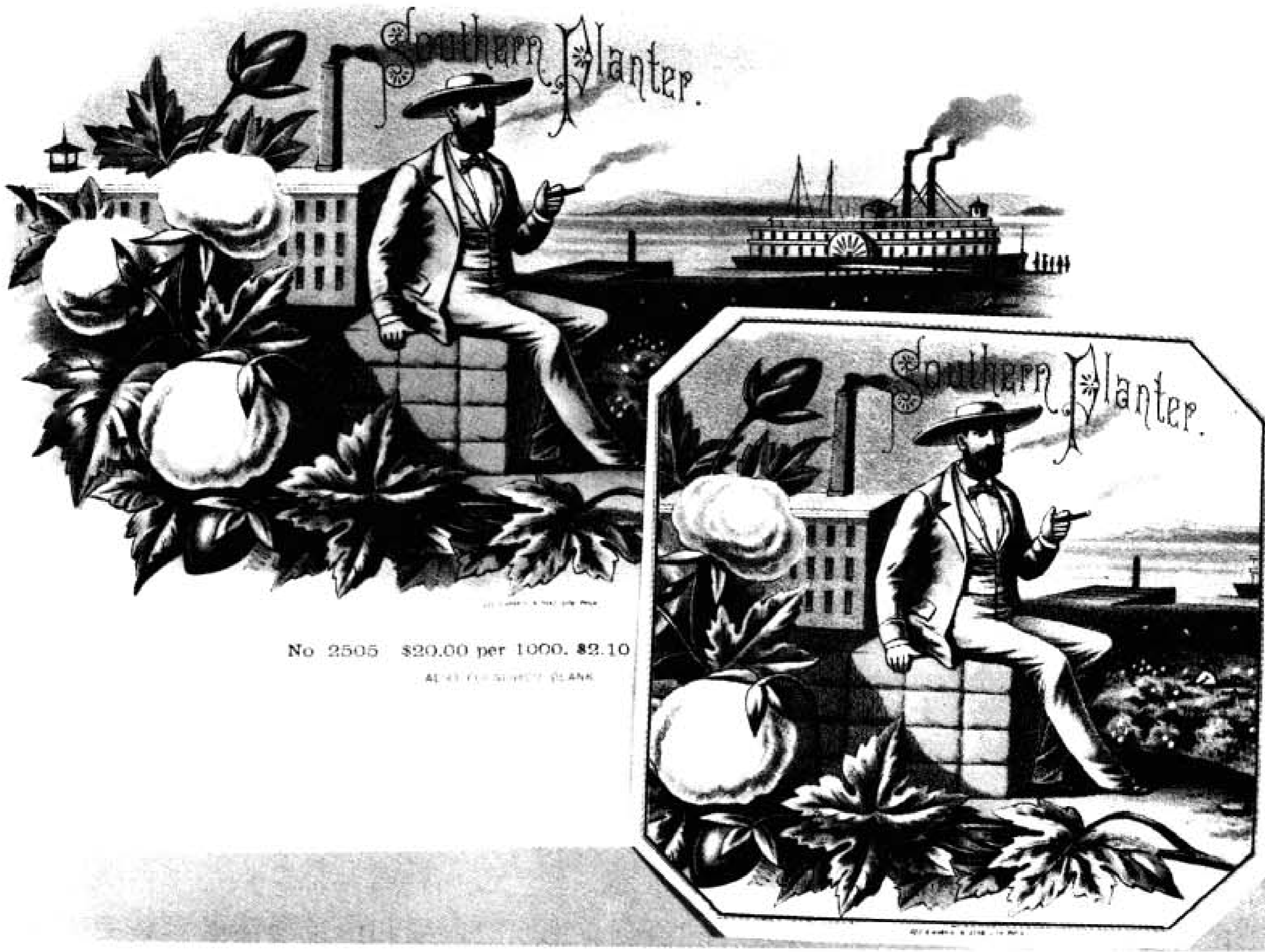
19世纪90年代，一家费城的石版印刷公司，乔治·哈里斯 & 桑恩斯公司，制作了大量

HAVANA RUDDY



TITLE & DESIGN REGISTERED

两幅彩色石版画均为乔治·哈里斯 & 桑恩斯雪茄烟公司的商标画，1890年左右



No. 2505 \$20.00 per 1000. \$2.10

ALWAYS GET THE BEST

白人主子掌控的尊严，而通过剪影、萎靡的姿态、颜色深而破烂的衣服以及依着锄头等待命令的场景来显示黑人劳动者的顺从。他们的角色十分分明：黑人劳动者种植了烟草，白人主子则独自享用。

非裔美国人的表征创建于奴隶解放运动和南方重建论兴起之后的几十年。当时，社会进化论理论开始流行，理论反映出种族姿态，促进了这种表征的形成。1885年，《弹竖琴者》发表了约翰·菲斯可的演讲《命中注定》，该演讲认为条顿族和“亚利安”人种注定要向前发展，而一些所谓的次等种族注定会衰退。^[10]按照美国优生学家推广的欧洲拉瓦托和朱莉安·约瑟芬·弗雷思的理论，非洲人被排列在进化论阶梯的底层，而且在许多描述里都被用来和猩猩相比较。^[11]同样，在杜克烟草提供的一份“奖品”上，一位黑人投下了和黑猩猩一样的影子。^[12]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黑人在进化论阶梯上所处的位置比白人低的观念使得他们非常适合某些类型的广告，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哑巴金发女郎”被认为很适合销售汽车。艺术家们善于简化和夸张一两个身体特征来创造引人注目的卖点。当人们认为非裔美国人“未开化”、贴近自然时，艺术家可以生动地把他们的皮肤和烟草的颜色相比较（烟草的原材料照例是由奴隶们种植的）。在标题为“满满一手”的标签上，相同的棕色墨水既用于人的皮肤又用于雪茄。这位上了年纪缺了牙齿咧嘴而笑的“大叔”是典型的无威胁的人群的代表。在烟草艺术中，黑人常常出现在生命周期开始或结束这样的脆弱阶段。在有些商标上，爬行着的婴儿使人想起有四肢的动物和田间劳作时下蹲的姿势，玩耍的儿童暗示了非洲人看上去孩子般的天性。艺术家们挖掘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展示黑人们无拘无束地快乐吸烟，而不为尊严发愁或内疚。

早在17世纪，非裔美国人和美洲土著都出现在烟草贸易的招牌上，在19世纪的烟草艺术里把他们的形象做一番比较很有意义。^[13]众所周知，印第安人和黑人不同，他们在欧洲人之前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出了烟草。雪茄烟盒商标上的非裔美洲人的形象大多源自于美术“高尚的野性”的传统，如本杰明·韦斯特画作中的传统。

非裔美洲人通常被描绘成充当奴役的喜剧人物，而美洲土著则被描绘成自由、游荡



“满满一手！”为耐帕公司设计的彩色石版画商标，1890

的人群，虽然在那些年代后者正受到限制。美洲土著被表现出与动物和谐相处或驾驭着动物，而曾经被视为牲畜的非裔美洲人则被表现出在畜生面前无能为力。许多将黑人和动物联系在一起的商标提醒人们奴隶已经被当成了动产。^[14] 动物经常凭借它们的体积和侵略性控制住了黑人，在一幅流行的标题为“驱赶苍蝇”的标签画里，仅仅一只苍蝇就能够让一位黑人摔倒。在一幅“印第安牌”商标画上，美洲土著骑着马闲适地奔跑着，而一群无助的黑人因为他们的骡子和电车相撞而被掀到了空中。到 18 世纪中叶，雪茄店中木质或金属的雕塑



“印第安牌”，为俄亥俄州托莱多的查斯·R·麦森爵烟草公司设计的彩色石版商标，制作商为底特律凯尔维特石版画公司，1890 年左右

已经随处可见了，它们大多表现的是罗马演说者令人难忘的尊严。如果一位烟草商想要与众不同，他或许可以叫来一位“黑人男孩”，一位当时北方街头的顽童，穿上花哨而破烂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把雪茄，^[15] 这样的形象很可能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有好笑，



一家美国烟草公司 1902 年制作的彩色石版画商标，广告的商品为“杜克混搭”和“老弗吉尼亚”牌方头雪茄烟



“火花”，为乔治·哈里斯 & 桑恩斯雪茄烟公司设计的彩色石版商标，1890年左右

有同情，唯独没有尊敬。

在烟草艺术中，黑人没有被表现出来的方面值得我们思考。没有哪一幅画通过吸烟的行为表现了黑人中精力充沛的男子、勇敢的历史人物、性感的妇女和完整的家族男性同胞们。^[16] 黑人很少被展示抽一支精品雪茄，即使真是如此时，艺术家也会挑明他不能带着尊严去做。这种将烟草产品的种类和阶级以及种族相联系的情形也出现在查尔斯·刘易斯臭名昭著的种族小说《嘉德乐兄弟的石灰窑俱乐部》中。这部小说发表于19世纪80年代，于19世纪90年代重印。在这部小说中，只有一位显赫而腐败的黑人政治家炫耀烟草，而小说里大多数的黑人使用烟斗或者口嚼烟草，暗示他们无法掌握白人文化。^[17]

虽然有许多黑人，尤其是北方的黑人，从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有的还创造了财富，然而在烟草艺术中他们通常都被描述成田间劳动者、侍者或者家庭奴仆，他们向主子或顾客供奉着他们自己不可以品尝的东西。在这些商标画上，黑人的怪异和边缘化存在——常常是男孩或老人——表明了一种低微的身份，延续了欧洲艺术中根深蒂固的传统。^[18]

在标题为“火花”的雪茄烟盒商标上，侍者用大腿夹着酒瓶，喷出的香槟暗示着射精。侍者背对着宴席，脸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他边缘化的位置暗示出他好像是一位奴隶，不能拥有他欲望中的一切。在1884至1900年期间，两千五百多黑人在美国被处以私刑，常常是因为涉嫌强奸了白人妇女。因此，这样的商标画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黑人性欲强的神话，不过年长的仆人会比年轻人的威胁小。^[19]

1784年，托马斯·杰弗逊在他的《弗杰尼亚备忘录》中呼吁道，比起理性来黑人更受感情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非洲人具有超强的味觉和嗅觉，加上他们受控于自己欲望的想法，使得他们非常适合表达享用烟草时产生的狂喜反应。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压塞机”，纽约石版画家舒文克和菲茨梅尔设计的彩色商标，1890年左右

者带来了同样的愉悦。侍者起到了替代“广告”的作用：他紧闭的双眼、张大的鼻孔和后仰着的头暗示出托盘上雪茄盒里的烟香使他产生了一种难以满足的欲望，然而雪茄的购买者却可以得到满足。

内战后期，种族间奴隶和主子之间的区别正在瓦解，因此在只针对白人男性消费者的烟草艺术中不存在让黑人妇女表现出渴望的商业动机。黑人妇女很少被表现出穿着时髦、和买主调情，她们常常有黑人男子陪伴左右。在“世界之最”这幅画中，一位穿得像吟游诗人似的花花公子在一位厨房女佣或曰“妈咪”模样的妇女面前吐着浓烟，^[22]她露出了愉悦的笑容。在“金色的拖鞋”广告画中，一对年老的、身材圆胖的黑人夫妇穿着睡衣在空中飞行，这让读者一看就会哈哈大笑。

19世纪90年代，随着选主权和国家制度问题受到人们激烈的争论，以及越来越多的黑人涌向北方寻找工作，白人的焦虑便通过更具有侵犯性的对黑人的嘲讽在吟游诗人的表演和一些百老汇的音乐片中表现出来。^[23]在一幅典型的商标画中，一位奴仆把象征着劳役的除尘器放在一边，然后脚放在桌上，靠在那里吸烟。这种局

的欧洲理论家朱莉安·约瑟芬·菲雷思认为：“黑人人种的前额在萎缩，嘴巴前突，好像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吃而不是为了思考一样。”^[20]在19世纪，那些看重社会地位的人受礼仪书籍的影响，小心翼翼地显示着自尊和进行自我控制。兴盛于19世纪90年代抵制烟草使用的节欲运动进一步约束着人们在吸烟时表现出感观上的享受。^[21]

在标题为“压塞机”的商标画中，黑人侍者的作用在于表现出了对该产品的强烈渴望，从而给白人购买

者带来了同样的愉悦。侍者起到了替代“广告”的作用：他紧闭的双眼、张大的鼻孔和



“世界之最”，为马尔堡兄弟公司北卡罗莱纳印章制作的彩色石版画贸易卡片，1890年左右



“金色的拖鞋”，为比提 & 惠特克烟草公司制作的雕刻画，由北卡罗莱纳温斯顿公司制作，1890 年左右

面对权利结构产生了威胁，然而，具有戏剧色彩的绘画风格却平淡了这种恐惧感。一个看上去如此懒散的奴仆在主子归来时胆敢要求获得自由吗？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

奴隶解放运动和南方重建论兴起之后的几十年是烟草艺术繁荣发展的时代。烟草艺术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的偏见，使人们洞察了白人在一群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态度。在收音机、电影和电视还没产生的年代里，烟草艺术商业广告被展示在商店的橱窗里或进入私人收藏的画册里，它们或许和博物馆里的美术作品产生了同样的社会影响。

注 释：

- [1] 黛博拉·纽曼·汉编《非裔美国人马赛克》（华盛顿特区，1993：26）。
- [2] 《艺术中的烟草与吸烟》（北卡罗莱纳艺术博物馆，1960：14）讨论了本杰明·莱伯特伯设计的老参议院圆形大厅，采用烟草叶和花的图案而非叶形的装饰：“使用玉米和烟草来象征这个年轻国家的物质文化十分有效，因为它们是印第安人引进到欧洲的饮食和文化中两种最重要的植物，构成了我们殖民经济的基础。”
- [3] 约瑟芬·C·罗伯特《美国烟草故事》（纽约，1949：15）。
- [4] 戴维·黛比狄恩《贺加斯的黑人：18世纪英国艺术中的黑人形象》（雅典，1987：18）：“正如安布鲁

- 斯·黑尔的提示，‘黑人的头’……‘黑人男孩’和‘烟草卷’是此类标示牌上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 [5] 艾尔伍德·帕里《美国艺术中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形象》(纽约, 1974: 55)。
- [6] 罗伯特《美国烟草故事》, 1949: 86-87。
- [7] 关于烟草艺术和标签画的历史, 见托尼·海曼《美国雪茄烟手册》(纽约, 1979); 乔·戴维森《雪茄标签画艺术》(新泽西, 1987); 克莱斯·马伦《雪茄包装艺术》(纽约, 1979)。
- [8] 道格拉斯·康顿·马丁《黑人形象: 一百五十年黑人可收藏品汇集》(西切斯特, 1990: 5)。
- [9] 罗伯特《美国烟草故事》, 1949: 86-87: “早在1810年, 费城的雪茄制造商年产雪茄达到三千万支, 每十支雪茄中便有一支使用‘西班牙’烟草, 实际上使用的是西印度的包装纸, 肯塔基的烟丝。”虽然主人公的服饰款式暗示出20世纪早期的样子, 然而哈里斯石版画公司却于19世纪末期倒闭。
- [10] 雷福特·W·劳根《奈第: 美国人生活和思想中的黑人, 1877-1901》(纽约, 1954: 252-253)。
- [11] 例如, 一幅关于拉瓦托理论的流行插图刊登在朱莉安·约瑟芬·菲雷思的画册《人类自然史》上, 1801年在巴黎首印, 1824, 1826, 1834年分别重印。有一幅插图把非洲人的轮廓和猩猩作了比较。
- [12] 在杜克烟草发行的保单手册“影子”上, 有一页题为《在此关键时刻》, 存于议会烟草艺术档案馆。
- [13] 关于美术中对比象征的深层讨论, 见艾伍德·帕利《美国艺术中印第安人和黑人形象》(纽约, 1974)。
- [14] 莱西《供白人使用的美国黑人》, 1972: 15-16: “正如罗马法典中所见, 18世纪南方殖民州订立的奴隶法视奴隶为电阻器、物件, 他们的人身和劳动均为主子有拥有。不论具体的个人关系如何, 在法律上主子和奴隶的关系不仅仅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而是主人和牛羊的关系。”
- [15] 帕利西亚·A·特纳《陶器叔叔和赛璐璐妈咪》(纽约, 1994: 65)。
- [16] 我的陈述基于对如下烟草艺术形象资料的研究: 议会图书馆档案, 纽约公共图书馆阿伦兹特藏, 纽约历史学会和都市艺术博物馆。帕利西亚·A·特纳在她关于物质文化中黑人形象的研究成果《陶器叔叔和赛璐璐妈咪》中下了同样的结论。
- [17] 查尔斯·刘易斯《嘉德乐兄弟的石灰窑俱乐部》(上赛德河, 1970: 202)。
- [18] 关于欧洲传统的讨论, 见简·奈德韦恩·彼特斯《白人优于黑人: 西方大众文化中的非洲和黑人形象》(新港口, 1992)中关于“奴仆”的章节。
- [19] 同上, 第134页。
- [20] 菲雷思《人类的自然史》, 1834: 92。
- [21] 罗伯特《美国烟草故事》, 1949: 107: “在1830至1860年间, 为了消除尼古丁的危害而掀起运动的三位主要人物也许是雷夫·奥瑞恩·福拉尔、乔尔·休博士和雷夫·乔治·塔斯克。[雷夫·福拉尔说道:] ‘人们不会放弃吸食烟草, 就像人们不会放弃喝兰姆一样’”。
- [22] 对这一典型的讨论, 见杰克·亚恩《黑人可收藏品: 妈咪和她的朋友们》(宾夕法尼亚, 1988)。
- [23] 托马斯·L·摩根、威廉姆·巴洛《从步态舞到音乐厅: 1895至1930年间非裔美国人流行音乐史插图》, (华盛顿特区, 1992: 16)。亦见罗伯特·C·托尔《闪亮登场: 19世纪美国的吟游诗人表演》(纽约, 1974); 亨利·桑普森《黑人歌唱家中的黑人》(纽约, 1980)。

女性与 19 世纪的吸烟形象

多洛瑞斯·米歇尔

随着 19 世纪香烟产品市场的扩展，广告艺术、漫画、美术、诗歌和小说的创造者描绘了越来越多的女性抽烟场景。广告商为了吸引吸烟者和潜在的吸烟者，使用迷人的女性形象作为诱饵，但却很少采用吸烟的女性形象。漫画家们确实也描绘女性吸烟者，但都把她们表现得丑陋和邪恶。尤其是在寻求现代主题时，画家和小说家也往往把女性吸烟者描绘成颓废的形象。只有少数女性艺术家和作家创造出了积极、自信的女性吸烟者形象。

19 世纪艺术作品中极少出现女性吸烟的形象与当时的社会习惯是一致的。吸烟是男性联络感情的一种重要形式，不管是在俱乐部的吸烟房或者在家里。饭后，女人们离开饭桌，男人们谈论性、金钱和当天的重大事件。对中产阶级的女性来说，在公共场合吸烟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一点体现在查尔斯·狄更斯 1846 年的一篇评论中。他发现自己被困于一家大旅馆的一个房间内，女士们开始点烟，“五分钟内房间里一片烟云……我从未这么吃惊过……因为在我所有的经历中还没见过一位家庭妇女或吉卜赛女人抽烟。”^[1]

19 世纪，烟管、香烟和高帽一样成为自信男性的一个特征——带有同样的生殖器崇拜意味。漫画中银行家的香烟与钱袋相伴；政治家们吞云吐雾而过，迎风飘扬的烟云显示了他们的活力。色情作品的作者，例如非理炫·罗皮斯，强调了吸烟突出的生殖器崇拜本性。爱德华·蒙克在他 1895 年的蚀刻画《面对面》中暗示了射精，在这幅画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坐在一个房间里喝酒，男人烟管里的烟飘过了她那微笑的脸庞。

当挺立的阴茎和香烟或雪茄之间的对应视觉艺术中得到强调时，文学中男人所抽的物体常常被描绘成女性化的东西，这一传统来自于伊丽莎白时代，那时烟草被拟人化为女性。卡尔·温勒的诗歌《她》写的是他的香烟：“我怜爱地把她印上我的双唇。”^[2]匿名作家的《通过一管烟草来选妻》中写到：“让她拥有和您一样美好的身材 / 让她的气息和您一样芬芳 / 让她的双唇在我亲吻的时候 / 像您一样火热，给我带来欢乐。”^[3]德亚特·克皮林称他的哈瓦那雪茄为“一群皮肤微暗的美女，五十系成一串。”^[4]

到 19 世纪走过四分之三时，香烟开始变得便宜易得，更多各个阶层的女性开始吸烟。许多妇女参权论者和“新女性”把吸烟看成是挑战“自然”女性行为模式的一种形式，男性艺术家则在女性吸烟者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现代的东西。她可能看起来精疲力竭和沮丧不堪，例如莫内特的《李子》（1877，存于国家艺术画廊）和梵·高的《在拨浪鼓咖啡馆里的女人》（1888，阿姆斯特丹梵·高基金会收藏），她可能是位妇女参权论者，冷落了她的家人而在酒馆抽烟喝酒，或者是一位深陷罪恶的情妇。漫画家嘲弄在公共场合——甚至在电车上——无顾忌地抽烟的“新女性”，她们对男性的否定态度视而不见。



19世纪90年代的一幅漫画，插图下方大字：男人·女人·事件

在19、20世纪之交，随着妇女参权者要求选票，新女性骑自行车、抽烟，中产阶级女性作为秘密的吸烟者或吸烟房的入侵者，成为流行的艺术形象。在马科斯·品伯顿1890年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新入侵者》中，一位年轻的妻子芭布斯对丈夫的忽视感到不满，于是女扮男装悄悄溜进他俱乐部的抽烟房。那天晚上她丈夫很沮丧地发现妻子没有在门口迎他，而往常“她常常在那里吻他的下巴尖，帮他拿帽子和报纸”。他发现芭布斯在他的书房里，一脸坏笑，靠在安乐椅上。就像他俱乐部里的男人那样，她抽烟时拿着一杯苦艾酒，从嘴里吹出一团烟雾，看起来让人哭笑不得。她复述在俱乐部里偷听到的对话，丈夫怀疑某些俱乐部成员给他开了如此无耻的玩笑，向他妻子复述吸烟室里的闲话，于是十分震惊地离开家。芭布斯非常后悔干了这件如此可恶的事情，故事以和好和重建两性之间的常规而告终。

这种自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女性”成为文学和视觉艺术的流行主题。一个女人



爱德华·蒙克的蚀刻画《面对面》，作于1895年左右



梵·高《在拔浪鼓咖啡馆的女人》，1888年作，帆布油画



她“像男人一样抽烟”，摘自英国《国家警察报》，1896

香烟上的烟环绕在海报四周，这是伦敦版的悉尼·格蓝迪 1894 年的戏剧《新女性》^[5] 的广告。格蓝迪把两性之间男人以香烟为武器的战斗戏剧化。剧中一位丈夫不喜欢他妻子写的关于性别平等的书，把“烟灰落在最后一章上”；一位中产阶级的未婚妇女“按原则”吸烟，认为女性应该有门钥匙，这样她们就可以像男人一样进出房子，因此她被一位体面的单身汉放弃，相反他选择了一位旧式的、不吸烟的当过女仆的女人。

1909 年第一次上演的戏剧《苏珊娜的秘密》中，苏珊娜的丈夫闻

到了她气息中的烟味，认定她有了情人，而苏珊娜的真正秘密却是她抽烟。在旧式文学主题中，女人把丈夫的香烟和雪茄看成对手。尽管夫妻俩在最后一幕中和好，苏珊娜情愿欺骗丈夫把香烟偷偷带进卧室，暗示着将来她也会这样处理情人。

19 世纪表现妇女在卧室中独自抽烟的漫画有时暗示着手淫——继而被认为是导致道德和身体毁灭的祸害。女性避开男人寻求私人的乐趣唤醒了男人的恐惧。在 19、20 世纪之交，作家亚瑟·辛农说道：“女人越深地投入到自身中，就离男性文明的力量越远，也就越危险。”^[6]

吸烟作为坏妻子和坏女人的标志出现在 17 世纪荷兰的道德说教艺术中。在扬·斯汀的绘画《一位向醉酒妇女吹烟的男人》（作于 1660 至 1665 年间，伦敦国家画廊收藏）中，一位失去知觉的妇女在酒馆里沉睡，她的烟管放在胯部。很明显，她无法抵御男人的侵犯，这对家庭的稳定是一种威胁。18、19 世纪的禁烟运动——常常和禁酒运动相随——谴责抽烟妇女，因为她们被看作是家庭道德的守护人。J.H. 库豪森告诫说：“随便抽烟和喝酒与道德的随便相随……吸烟摧毁的是美德和美丽。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抽，那就抽吧，迷途的女孩们。它会让你哭泣，这就是女性的命运。”



对在化妆舞会、台球室和闺 R. 委内所特《脱了衣服抽烟》，刊于《巴黎的生活》，1893

房里和男人一起抽烟的妓女、女工和少女的描绘为香烟赋予了危险的含义。在小说《娜娜》(作于1880年)中,艾米尔·左拉把情妇的性冲动和吸烟习惯联系起来:“娜娜一直卷着烟,抽的时候在椅子上前后晃动。”^[7]娜娜身上强烈的情人精液和烟草的味道增强了她的性魅力。许多作家,例如左拉,以及医学从业者警告说,卖淫——在巴黎很常见——会将“危险阶级的”疾病传播到中产阶级的家庭中。据说有些妓女散发出下水道和传染病一样的气味——实际上娜娜就在她最后的疾病中腐烂。^[8]左拉似乎在说,男人在娜娜身上浪费的不仅是精液也是他们的财富。娜娜或者其他一些女性诱惑者手上的香烟,是一种阉割的象征,代表了女人对男人权利的挪用。值得注意的是,娜娜既有男性也有女性的情人。

19世纪90年代,厂家和商业艺术家渐渐开始使用美女来销售产品,包括香烟及其配件。女人为烟草产品提供了重要市场,然而,即使女性吸烟量有少许上升,广告中女性诱惑的目标仍然是男性。于是,广告形象意味着非法的色情。海报上的女性常常是女演员或者舞女,海报中的香烟女孩们提供的似乎不仅是她们的烟草,还有她们的身体。

阿方斯·慕夏1896年为JOB香烟所画的金发女郎陶醉于香烟带来的飘飘然中,她的姿势——头往后仰,眼睛闭着,嘴唇张开——按照玛莎·金斯百瑞的说法,是“几乎只为女性而保留的,偶尔也会吸引男性,那是在他们也表现出一种淹没自我的自发的控制力时。”^[9]香烟成为这位女郎情人的替代品,通过挪用男性抽烟的习惯,她把作为生殖器崇拜的香烟为她自身的愉悦而用。

土耳其、非洲、美国印第安和西班牙妇女,均来自培育烟草或烟草成品的地区,她们常常在广告中出现。于是,香烟盒商标上的女人——她直白的性感只逊色于色情图画——开始等同于娱乐消费品,可插入嘴里亲吻和吮吸。一个男人可以在他的住所独自享受这种乐趣,或者作为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在酒吧、俱乐部与其他男性共享。

雪茄盒上的土耳其妇女在闺房中懒洋洋地躺着,水烟管就在近旁。艺术家很清楚地表明,这样一位精致的女性唯一的功能就是为一位对她有绝对控制力的男性提供愉悦。珍贵的雪茄一定要放在特别的容器里使它们保持最好的状态,就像闺房里的女人们常常描绘成娇宠的形象一样。

非洲妇女的深棕色皮肤在广告中被比作香烟的颜色,带有一种“原始的”



阿方斯·慕夏《JOB》,1896,彩色平板画

抽烟体验的意味。美洲土著妇女被描绘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完美形象，很像现在的万宝路牛仔。

尽管香烟艺术中的美女被用来链接性与抽烟的快乐，她们却很少以抽烟的形象示人。例外的是一个西班牙妇女的形象，一种大胆的抽烟和调情的卡门式的人物，这样的形象鼓励男性顾客幻想同时拥有香烟和女人。

在1845年的小说《卡门》中，梅里美把抽烟看成是蛇蝎女人的一种共性，尽管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了把香烟女性化为巫婆的图像。^[10]卡门，一个在香烟厂里工作的吉卜赛人在酒馆和妓院之间看到了一个十字。当梅里美的叙述者第一次遇到她时，卡门告诉他“很喜欢烟草的味道”。他给了她一根香烟并说：“让我们一起抽吧。”卡门对抽烟的胃口为读者了解她对性的胃口埋下了伏笔，香烟是她致命的变化无常的一个暗喻。她瓦解了他的情人对母亲和青梅竹马的爱人的忠诚，他只有把她刺死才能解脱对她的迷恋。

在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男性艺术家和作家把抽烟妇女描绘成不正常、危险和不诚实的人，而为数不多的女性艺术家和作家却把抽烟当成独立和力量的标志。深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玛利亚·刘易丝·德·拉·雷姆威达在她1867年的小说《两旗之下》中创造了一位有勇气的女主角西噶瑞特。西噶瑞特分享了梅里美的卡门对抽烟和性的随意态度。即使“她在军队里飘来荡去”，拥有“像最唐璜的唐璜那样多的风流韵事”，并且以“朝他吹一口烟”来应对一个男人的侮辱，她仍然被描绘成正面的形象。吸烟是她藐视社会传统，“对她滥性带来的毁灭的嘲笑，在喝酒、大笑中蔑视它，在烟草的火光中烧尽它”。她没有摧毁她所爱的男人，而是成为他的“武装起来的同志”，她为他参与了一次埋伏，在战斗中死去。威达自己在男人们点燃烟管和雪茄的时候拒绝离开房间，她说：“绅士们，现在就当我母亲和我不在房间里。就像你们在俱乐部那样抽烟喝酒吧，就像你们在吸烟室里那样说话吧。”^[11]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弗兰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和简·阿彻是少数描绘女性吸烟者的女性艺术家中的一员。约翰斯顿和阿彻是越来越多的挑战社会的妇女中的一员，她们的职业技能使得她们能够自食其力，作为艺术家，她们质疑老套的视觉艺术并创造出带有社会影响力的插图艺术。

弗兰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是最早获得商业摄影成功的美国妇女之一，她1864年出生于华盛顿，其父亲供职于美国财政部。1883年到1885年间，她在巴黎的朱利安学院学习素描和绘画，梦想成为一名插图员。^[12]回到华盛顿以后，她意识到报纸里的相片很快就会排挤掉绘画插图，于是她弄到了一台柯达相机，在史密斯·索尼恩学院的摄影实验室实习。她在1889年开始了职业生涯，拍下了许多著名人物如苏珊·安东尼的照片，并接受具有挑战性的记录任务，例如在仙纳度的科一诺煤矿里拍照等。

约翰斯顿创造了令人震惊的自拍像时大约是三十二岁，已是从业七年左右的成功者。1894年她在华盛顿家中的摄影室里拍的照片中，展现了自己作为有内涵的女性被包围在自己收藏的艺术作品和照片中，一手拿着一根香烟，一手拿着一个啤酒杯。她坐在那儿，一条腿轻快地跨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露出小腿和内衣，但她的衣服本身没有挑逗性，表情也没有诱惑性。约翰斯顿终身未嫁，她抽烟喝酒，朋友中既有吉卜赛人也有达



《白奴》和《艾尔·幕若》，雪茄盒商标上的两幅彩色平板画，作于 1890 年左右

官贵族。她的香烟和啤酒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她生活的真正面目。在她展现自己“性格”的浅浅的微笑和招摇的态度中，表明了她是有意地选取了这几个保守观众不可容忍的女性行为。她藐视社会传统，然而却保持着健康和其他中产阶级的优点。

1900 年的一幅漫画中，一位“新女性”在火炉边吸烟，壁炉架上摆着的艺术品就像约翰斯顿的《自拍照》。然而漫画里的“新女性”坐在地板上的一个坐垫上，大腿因为炉火的热度而张开——这是传统的情欲的平版画。^[13] 男性来访者皮鲁博士的台词是：“路西小姐！！抽烟！”路西小姐（被描绘成“一位先进的有古典知识的年轻女士”）回答道：“很古典很正确。”这幅漫画指出了教育和吸烟以及性习惯在大众的想象中是如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 世纪 90 年代末出生于图卢兹的简·阿彻以她的女性形象的彩色平版画闻名，这些画以商业广告和装饰镶嵌板画出版。关于她的生活资料不多^[14]。她 1896 年为 JOB 所做的海报与穆夏为该公司所做的海报截然不同。穆夏画的女人似乎吸入烟气如此之深，以至于充满了她的身体，使她头顶的头发升起，这模仿的是烟的样子。阿彻画的女人并没有完全被吸烟这一行为所吞没，尽管她的姿势、表情和手势表达了对这一体验的愉悦之情。阿彻笔下的形象让人想起玛丽·卡萨特的《在歌剧院》（1880，波斯顿美术博物馆收藏），画的是一位单身前来享受下午表演的女性侧面像。

盖尔·加宁翰在《新女性和维多利亚小说》中写到：“新女性被认为是尤物，这就更加危险，因为她不能被当作妓女或者堕落的女人来打发。”^[15] 确实，约翰斯顿和阿彻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没有轻浮的眼神或挑逗性的服装来暗示这些穿着体面的吸烟者决不是有名望的中产妇女。她们是那种使一些作者如马塞尔·普雷沃惊慌的女人，他在《半个处女》（1894）中警告妇女发出复杂的信号时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他哀叹自从时尚妇女举止开始像堕落的女人——开始，就很难区分好女人人和坏女人，潜台词是害怕这样的女人会把疾病和堕落带进中产阶层的家庭中。

约翰斯顿和阿彻描绘的形象共享过去常常为男性形象注入力量的一种克制的插图艺



弗兰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自拍像》，摄于1896年左右

术。侧面形象使女性抽烟者与观看者保持距离——没有一个吸烟者指望有仰慕的眼光。不像穆夏或者漫画者笔下放荡、头发狂乱的女性抽烟者，她们的头发安分地固定在头上。她们的衣服纽扣都扣上，胸部遮得严严实实。尽管她们没戴珠宝，但她们的衣着时尚甚至昂贵。她们的表情也是收敛的。约翰斯顿浅浅的笑意意味着她喜欢制造不受社会赞赏的形象。阿彻笔下的女人，头仰得很高，看起来就像波斯精于感官享受的世故之人和鉴赏家。

这些女性形象让人想起古典的浮雕：她们都是侧面，胳膊限制于浅浅的平面中——这样的手段使这些形象古典而高贵。这些姿势甚至可以暗指“新女性”受教育的地位，她们会为自己着想，因为19世纪的高等教育通常包括了古典艺术和文学的研究。这两位女艺术家都使用了传统上描绘男性的手法，例如，她们的女性形象都通

过手肘向外的胳膊位置来增大她们的身体。两人的作品都运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和确定的线条，而不是用她们的同代人常用的浅色、不确定的形状和游离断裂的线条。阿彻画中的黑色斗篷也作为一种有力的设计元素，就像约翰斯顿所穿的暗色格子花呢的外套一样。

19世纪艺术理论家们被线条的表达潜力迷住，垂直的线条往往带有权威的含义，也就是男子汉气概。例如大卫·苏特——一位影响了修拉艺术的理论家说道：“垂直线是贵族、伟大、王权和权威的线条。”^[16]阿彻画中由斗篷形成的垂直线是这张海报最显眼的元素之一，在约翰斯顿的《自照相》中，一个垂直的扶壁出现在她身后。这些形象都被放在中心的位置，一个掌控空间的位置。

为什么威达、约翰斯顿和阿彻要篡夺典型的表现男性形象的绘画手法并将其运用到对女性吸烟者的描绘中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吸烟意味着女性被排除在外的更广大的生活知识。女性参政运动在19、20世纪之交获得了动力并激起公众对妇女生活限制——包括吸烟——的辩论。通过抽烟，一位妇女可能公开获得——用威达的女主角西噶瑞特的话说——“做她喜欢做的任何事的权利。”^[17]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特别与这些女艺术家有关：19世纪的香烟知识认为，抽烟会刺激幻想、连接记忆，从而增强创造力（那时香烟的更强劲，加工也比较简单，有时还加进其他的药物）。许多19世纪的艺术家和作家，包括一些女性，都是烟瘾很大的吸烟者，



简·阿彻《JOB 卷烟纸》，作于1896年左右，彩色平版画

乔治·桑就是一个例子。查尔斯·波德莱尔赞扬烟管是作家的慰藉。在查尔斯·卢米斯的诗歌《我的香烟》中，作者说道：“我看到一个诗人的梦想 / 存在于上升的烟环中。”^[18]一位无名作家写到：“抽烟时我所有的思想在飞扬 / 不抽烟它们就沉降在地上。”^[19]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小说普及了这样的观念，即烟草引出深刻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无数期《笨拙》中，关于艺术家或哲学家被灵感击中或等候灵感的漫画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表现为抽烟的形象。迫切希望扩大自己视野的女性也可能把詹姆斯·巴里在《我的夫人尼古丁》中说的话应用到她们自己身上。谈起烟草在英国的引进，巴里说：“如今只关心家里琐事的男人把烟管放到嘴里，成为了哲学家。”^[20]威达、弗兰西斯·约翰斯顿和简·阿彻选择了以正面的形象来描绘用烟来滋养思想的女人，她们赋予这些女人以尊严，而她们自己似乎也拥有了值得滋养的思想。

注 释：

- [1] G.L. 爱博森《吸烟的社会史》（伦敦，1914：214-215）。
- [2] J. 拜恩《歌曲和故事中的烟草》（纽约，1896：51）。
- [3] 《通过一管烟来选妻》，载《绅士杂志》1757年6月，第45页。
- [4] 康普顿·马肯杰《崇高的烟草》（伦敦，1957：245）。
- [5] 悉尼·格蓝迪《新女性》（伦敦，1894：51-52）。
- [6] 布兰·迪克查《反面偶像》（纽约，1986：137-138）。
- [7] 艾米尔·左拉著、乔治·火登译《娜娜》（伦敦，1972：57）。
- [8] 阿兰·高宾《19世纪法国的商业性感》，载《再现》1986春季刊，第209-219页。
- [9] 玛莎·金斯布理《蛇蝎美人和她的姐妹》，收入托马斯·B·赫斯、琳达·尼克林编《女性作为性对象》（纽约，1972：87）。
- [10] 见杰弗瑞·科纳皮《伊丽莎白的烟草》，收入史蒂芬·格林布拉特编《新世界的遭遇》（加拿大伯克利，1993：271-312）。
- [11] 伊丽莎白·李《威达：回忆录》（伦敦，1914：44）。
- [12] 关于约翰斯顿的更多信息，参见安妮·彼得森《19世纪的侧面：弗兰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的早年岁月》，载《19世纪》1980年春季号，第58-61页。
- [13] 可参见弗兰克斯·鲍谢《La Toilette》（1742，马德里提森·波尔内米萨美术馆），画上是一位妇女坐在火炉边上寄袜带，裙子掀起，双膝张开。
- [14] 可参见爱德华-约瑟夫《传记辞典：现代艺术家（1910-1930）》（巴黎，1931：20）。
- [15] 盖尔·加宁翰《新女性和维多利亚小说》（伦敦，1978：14）。
- [16] 大卫·苏特《视觉现象》，收入《艺术》第20卷（1880：76）。
- [17] 玛利亚·刘易丝·德·拉·雷姆（即威达）《两旗之下》（伦敦，1912：469）。
- [18] J·耐特编《烟管和烟袋》（波士顿，1895：35）。
- [19] 同上，第36页。
- [20] 詹姆斯·巴里《我的夫人尼古丁》（波士顿，1895：35）。

直面同性恋者的吸烟史

拉宾·斯科夫曼*

罗斯尔芭摆出了一副流氓的架势，长长的烟斗里插着剑一样的东西。

——康普顿·迈肯锡，1928^[1]

在《忏悔录》第二册的中间部分，卢梭回忆了一个被描述成摩尔人的试图引诱他的男子。他怀着自己特有的诚实而天真的心态写道：

一天晚上，他努力地想爬上我的床，我抗议说我的床太小；他迫使我睡到他的床上，我又拒绝了。因为这个讨厌的家伙很脏，浑身散发着咀嚼过的烟草的臭味，让我感到十分恶心。^[2]

这件事情发生在18世纪20年代末期的某个时候，那时，十五岁的卢梭已经离开了日内瓦。在回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时，他坚持认为他不明白那个年轻人想干什么或者为什么会表现出那个样子。当卢梭向别人讲起这件事情时，有人向他提醒了袖口骑士一说，因为在18世纪初期，人们是这样称呼同性恋的。还有人强烈地告诫他要保持沉默。

这件事情对年轻的卢梭产生了深远而显著的影响。从此，他发誓要善待女人，因为他想象得出身处同样境地的她们会感到多么的可怕。但是，这段描述除了卢梭没有进行名副其实的讽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让他感到更为不安的似乎是那个人身上散发的烟草味，再加上他的肮脏，他便觉得很恶心了。实际上，在卢梭的印象中，烟草味和怪异的性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在20世纪中叶，也就是18世纪80年代卢梭的身后之作《忏悔录》问世一百多年之后，吸烟和同性恋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在克里斯多夫·伊莎伍德的自传体小说中，他描述了年轻时在柏林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生活。作者回忆道，他正坐在咖啡馆里，写着那本后来取名为《回忆录》（1932）的小说。伊莎伍德喜欢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认为烟草的味道仿佛是一种催情剂，使他想起了他与一位名叫布比的捷克男孩的初恋：

他的面前放着书稿，右边是一大杯啤酒，左边的烟灰缸里燃烧着一支香烟。他

*拉宾·斯科夫曼（ROBYN L. SCHIFFMAN）：正在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撰写一篇关于书信体小说在英国和德国兴衰的论文，曾经发表过关于查尔斯·狄更斯和心理分析方面的文章。

(克里斯多夫)一会儿呷着酒,一会儿写作,一会儿又抽着烟。当然,啤酒是德国品牌的:舒尔苔丝—帕钦沃夫。香烟是在柏林特别流行的土耳其品牌:撒冷·阿勒克门。这两样东西都是布比向他介绍的,所以,尝一口酒,闻一闻烟味,让他感到十分满足。^[3]

想起了吸烟和喝酒便意味着想起了布比,吸烟和喝酒的口腔运动让人联想起口交时的口腔动作。后来当我们读到布比曾经教会伊莎伍德他所知道的关于性的一切经验时,这种用吸烟和喝酒来替代性的用法便变得十分明显了。与卢梭形成对比的是,这里明显没有厌恶感,只有强烈的欲望,给人留下了既愉快又尖锐的印象。

在卢梭和伊莎伍德之间的那些年代,吸烟曾经与创造性活动,尤其是诗歌的创造联系在一起,还与异性恋联系在一起。罗思·钱伯斯生造了“诗人吸烟者”一词来形容著名的法国作家(如查尔斯·波特莱尔,斯特芬·马洛梅和朱尔斯·拉法戈)和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威廉·考伯和查尔斯·卡尔弗利),他们向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读者介绍了一种新的文学话题:香烟、雪茄、烟斗和吸烟。在拉德克利夫·怀尔臭名昭著的反映女性同性恋的小说《孤独之井》(1928)出版之后,同性恋文化和吸烟又一次被联系在一起。吸烟的简单行为和雪茄或香烟的存在引起了行为解读热,拉德克利夫·怀尔将其称作“性欲反向”,弗杰尼亚·沃尔夫为了区别男女而将之分别称作“鸡奸”和“同性爱”。因此,人们在阅读20世纪初期的精选文本时,很可能便把香烟理解为同性恋的男女们用来彼此认知的标记或符号之一。

的确如此,有许多吸烟的同性恋者,还有许多描述吸烟的同性恋者的文本。但是本文所表达的思想是,吸烟的历史在同性恋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换句话说,在某些视觉的和文本的媒体中,香烟能够使一篇文章打上同性恋的烙印。这种转变,在关于同性恋的现代主观主义诞生之时,在诸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马格纳斯·赫氏菲尔德的医学世界以及诸如怀尔德和怀尔这些新的文学对话人将目光重新转向越来越多的同性恋人群之时,获得了通行。因此,同样在这个时代,当“fag(同性恋)”变成了香烟的近义词,变成了男性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时,人们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香烟变成了复杂的时尚装饰品的一部分,这些饰件逐渐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同性恋风格和文化,变成了知情人一目了然的东西。历史学家乔治·昌西在他关于现代和城市同性恋文化的杰出著作《同性恋的纽约》一书中,记录了一些明显的同性恋特征。“有些衣服”,他写道,“比如一件绿色的西装,颜色太显露,以至于很少有人敢穿上它。”^[4]昌西提到的绿色西装在罗伯特·哈钦思关于奥斯卡·怀尔德以及艾弗烈·道格拉斯勋爵的同类小说《绿色的康乃馨》(1949)中被换成了无尾礼服的翻领上的一朵康乃馨。在哈钦思的小说中,佩戴康乃馨的是雷金纳德·黑斯廷斯勋爵和埃斯米·阿莫伦斯,其原型分别是道格拉斯和怀尔德。

在小说中,除了能够引起他人惊叹和评论的康乃馨之外,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饰品:一支金头的香烟。哈钦思在小说的序言中回忆起第一次与道格拉斯和怀尔德见面时对他们的印象,他写道:“我曾经……见过怀尔德先生……微笑的嘴角里叼着一支金头的香



保罗·卡德摩斯 《舰队来了!》，1934，帆布油画。画面上人物簇拥，令人浮想联翩，但是，引起讨论的部分是油画左边的市民和水手

烟。”^[5] 埃斯米·阿莫伦斯也抽着金头的香烟，换句话说，香烟和康乃馨使这篇文章带上了同性恋的色彩。

昌西继续列举着其他的特征：“其他类服饰……穿的更为常见。或许在本世纪初期最显著的莫过于红色的领带了。”^[6] 对于将红色领带和香烟联系在一起作为性交换经济中的一种媒介，昌西提及保罗·卡德摩斯 1934 年的画作《舰队来了!》。在这幅画中，一位市民男子向一位水手递过去一支香烟，两个人脸上的表情暗示出水手完全明白向他提供的是什么，因为从那个人修理过的眉毛、染了色的头发、脸上的胭脂和红色的领带中他能领会出来。香烟引发了这种联系，使得两个男人走到了一起，同时人们解读了他身体上的暗示。

关于系着红领带抽烟的同性恋者的最好范文之一也许是托马斯·曼恩 1912 年的著名小说《死于威尼斯》，它讲述的是一位名叫加斯德夫·冯·艾申巴赫的年老的德国作家前往威尼斯的故事。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塔孜犹的波兰男孩并且迷恋上了他。应该说批评家们早就认出了这部作品中的同性恋主题：1999 年 6 月，《死于威尼斯》在 20 世纪一百部最佳的同性恋小说中名列榜首。^[7] 曼恩作品的著名之处在于有两个人物：船上的一位乘客和艾申巴赫本人，他们符合了昌西在 20 世纪初期从衣着、行为和吸烟方面认同的男性同性恋的标准。通过仔细阅读这些不同的标准在故事中被表现的方式，我们发现这个故事成为 20 世纪初叶审视吸烟与同性恋文化之间联系的范本。

到达威尼斯后，艾申巴赫注意到“一个人……穿着花花公子式的光亮西服……系着红色的领带”。^[8] 这个脸上涂着彩，戴着假发的男子让艾申巴赫感到既恐惧又入迷。他的目光停留在他的手上，“他颤抖的指尖夹着一支烟”。^[9] 他同这个从未被提及姓名的男子

的神秘关系基于人们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同样的欲望。另一方面，艾申巴赫只被提及吸了一次烟，但是他的名字暗示有“灰烬”的意思（Aschenbach [艾申巴赫] 中含有单词 ash [灰烬]），从头到尾都包含着这种联想，因为故事的第一句话就道出了他的无可争议的头衔，很确定地称呼他“加斯德夫·艾申巴赫或者冯·艾申巴赫，自从他五十岁生日开始，他便拥有了这个正式的称呼。”^[10] 他不需要吸烟，因为他已经是灰烬了。随着他对塔孜犹爱的加深和具备了这种自知之明，他决定去理发店给自己“翻新”。他染了头发，修了眉毛，在脸颊上涂了胭脂，描画了眼睛，擦了唇膏。总之，艾申巴赫变成了卡德摩斯油画中的人物，变成了弗吉尼亚·沃尔夫 1925 年在给杰克斯·拉文拉特的信中提到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某些同性恋男人，他的事实依据是他们的脸上“涂脂抹粉”。^[11] 当艾申巴赫从理发店里出来时，作者写道：“艾申巴赫一路走去……系着红色的领带。”^[12]

《死于威尼斯》中还有一位系红领带的人物：塔孜犹，虽然他不吸烟。正是他的服饰使得艾申巴赫总是能认出他：“他一眼就认出了他，红色的胸结一目了然。”^[13] 通过解读和识别这三个同性恋男人的特征，现代同性恋文学的主题便诞生了。这种现代同性恋主题似乎和吸烟有很大的关系。

对于女同性恋吸烟者的真正记叙始于 1928 年出版的两部小说：拉德克利夫·怀尔的著名小说《孤独之井》和康普顿·迈肯锡的《非凡的女人》。1928 年，当沃尔夫出版了《奥兰多》并同维他·萨克维尔·怀思一同去度假时，有人宣称他们首次有了性关系。同性恋的行为变成更加个人化和地方化的现象，它从和衣服有关的明显的时尚行为——至少对女人来说是如此——变成了身体上的特征，成为身体的一种延伸。斯蒂芬·戈登，怀尔小说中的一位同性恋者，前去拜访瓦莱丽·西摩，一位以纳撒尼·克利福德·巴雷为原型的人物。一见到斯蒂芬，瓦莱丽说道：“终于见到您了，我真高兴，戈登小姐，过来坐吧。如果您想吸烟，请随便。”她很快地扫了一眼斯蒂芬露了馅的手指。^[14] 至此，是斯蒂芬吸烟的手指让瓦莱丽解读了她的身体，看出了她有同性恋的倾向。在迈肯锡的文章中，奥罗拉（罗利）·弗里曼特尔，一位抽雪茄的女同性恋者，使用真正的雪茄烟雾来创作油画。她在画上幻想了她同她所爱的女人罗索尔芭·丹桑特生活在一起的美景：“她（罗利）确实在雪茄的烟雾中想象了同罗索尔芭在一起的生活——她们将居住的房子，她们将设计的花园，从罗索尔芭的窗户里将会看到的风景，她们仆人的制服。”^[15] 实际上是雪茄的烟雾促生了两个女人能够彼此相处的幻境。

以这种方式对 20 世纪初期作品中的吸烟行为和某些饰件进行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同性恋现象存在于吸烟的历史中。不足为奇的是，随着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和文化实践的诞生，同性恋文化和吸烟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改变。一种不再需要依靠解码和象征手法的文化，例如 20 世纪末期的文化，以开玩笑和自我清醒的方式有力地寻找到了这些联系。加拿大女同性恋者、素食者、激进的动物权利保护者和乡村音乐家卡丝琳·多恩·朗，用恶作剧的标题 *Drag*（异性的服装或抽烟意思）出版了她的第七本专辑。她此作的暗示是，这种联系表现得真实而深刻，她要旗帜鲜明地大声呐喊。

虽然这本专辑既没有创纪录，又没有成为畅销书，然而 *Drag*（1997）却成为她先前

创下纪录的《你能吃下的一切》的十分看好的续集。在专辑的封面上，朗大做“*Drag*”一词的文章，通过穿着男人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和摆出吸烟的姿态来有力地增强两种语域之间的联系。以表演、装束和对老歌曲的情有独钟而著称的朗没有让歌迷感到失望，因为 *Drag* 专辑荟萃了许多著名的歌曲，如 1948 年潘提·李轰动一时的《不要坐在床上吸烟》，都以吸烟和烟瘾为焦点。换句话说，这本专辑是一本能让人回想起关于早些年代音乐和性别的专辑的再版。应该指出，朗并没有鼓励吸烟：专辑所表达的根本（和相当陈腐）的信息是，吸烟像爱一样既危险又让人上瘾。除了专辑的标题具有明显的双关含义之外，烟雾的隐喻又涉及了文本的多层含义，既暗示了作为女性的朗却穿着男人的衣服，又指出她是一位从乡村音乐转向流行音乐的音乐家，演唱和录制了大量并非由她创作的歌曲。

但是，朗发现自己使用和求助的丰富的词汇领域是什么呢？诸如 *Drag*（异性的服装）和 *Fag*（男同性恋）之类的词，查阅任何一部美国俚语词典都会发现，它们在吸烟和同性恋文化中都有语域。*Drag*（异性穿的服装）一词首次出现于 14 世纪末期，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才被用来形容男人穿着的女性服装。^[16]《同性恋大百科全书》里“异装狂/夸张的”之词条表明，“in drag”一词取自于“小偷”的暗语，意即把长袍的下摆比作公共汽车的牵引或刹车，又在 1870 年左右从对同性恋的蔑视语中走进戏曲行话。^[17]在我们这个时代，*Drag* 一词与服装的关联继续出现在实质主义关于同性恋的辩论中以及许多其他事情上，正如解结构主义者卢保罗所发表的著名论断：“我们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上，剩下的事情就是穿衣服。”^[18]至少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期间，*Drag* 一词便与吸烟联系在一起。在 17 世纪初期，从 *Drag* 一词中衍生的 *Dragoon* 或 *Dragon* 被认为是火枪的古老名称，扛枪的士兵被称作 *Dragons* 或 *Dragoons*。^[19]直到 20 世纪的前十年，*Drag* 才开始被用作“吸入”的近义词，或者被用来描述夹烟或抽烟的动作。^[20]虽然关于烟草文化的俚语使用有一个庞大的词库，但是直到 1961 年人们才生造了“追龙”（to chase the dragon）一词来形容吸烟的女英雄，因为人们认为，吸烟之后的烟雾运动颇像中国龙的尾巴。^[21]

Fag 一词的使用亦是如此。*Fag* 是 *Faggot* 或 *Fagot* 的简写形式，常常被用来举例说明男、女同性恋者们是怎样再造或挪用那些原本是贬义的词来形容新的、有些许解放意义的事业——同性恋即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但是，关于 *Fag* 词源的文献表明，该词的起源具有非常复杂的可能性。作为俚语，*Fag* 一词现在的意思是指同性恋的男子，但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它却和妓女有关。*Fag* 一词的演化就是建立在这种对妇女的联想意义之上的。更常见和更近的例子是在一战期间的英国，香烟被称作 *Fags*。^[22]有辩论者认为吸烟被认为不具有男子汉气概，因为在人们的理解中，香烟比起雪茄来更为弱小和低等。于是，如果你抽吸一根更小的阴茎，就成了缺少男子汉气概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美国英语中，*Fag* 被生造来作为男性同性恋者的俚语表达，^[23]从此至少在大西洋两岸，*Fag* 成了既指人又指物的词语。该词的其他一些引申义受到过激烈的争辩。华伦·约翰逊认为，*Fag* 一词与 19 世纪英国寄宿制学校中实行的同性恋制度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的关联，该校低年级的学生需要为高年级的学生履行某种义务（包括性服务）。他还认为，在现代早期，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是处以绞刑而不是火刑，这就消除了 *Faggot* 和燃烧的

柴堆之间的联系，因为在执行火刑时需要在同性恋犯人的身下放一堆柴。^[24]很明显，对于该词的演化仍需要进行解释和分析，但是，性别、性行为 and 吸烟的联系仍然包含在历史当中。

本文从跨国度的语言、文学和艺术媒介的角度进行了剖析，试图构建关于同性恋者吸烟史的框架。随着因特网的诞生，人们将会写出更新的篇章——只要很快地查看一下微软和雅虎的男性烟民网便会发现，在十三个男性吸烟者的专有网页中，有八个是为男性同性恋者创办的。最近，在纽约公民“市政演讲”论坛上，有人引用了CLASH组织（市民反对烟民骚扰组织）成员的话，考虑怎样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事业当中。这位成员面无愧色地提出了如下的建议：“我们不得不……让同性恋者加入进来，他们是一支吸烟大军。”^[25]这话也许对也许不对，但是，在综合考察吸烟在视觉文化和文学中的作用时，我们必须考虑香烟、雪茄和吸烟行为在同性恋者吸烟史的建构过程中作为必要的连接文本出现的方式。

注 释：

- [1] 康普顿·迈肯锡《非凡的女人：主题与变化》（纽约，1928：31）。
- [2] 让·杰克斯·卢梭著、安哥拉学者译《忏悔录》（牛津，2000：65）。
- [3] 克里斯多夫·伊莎伍德《克里斯多夫和他的仁慈（1929-1939）》（纽约，1976：22）。
- [4] 乔治·昌西《同性恋的纽约：性别，城市文化和男性同性恋世界的形成，1890-1940》（纽约，1994：52）。
- [5] 罗伯特·哈钦思《绿色的康乃馨》（伦敦，1949：vi）。
- [6] 昌西《同性恋的纽约》，1994：52。
- [7] 参见希乃尔·意达里的文章：<http://www.salon.com/books/log/1999/06/08/100gay>
- [8] 托马斯·曼恩《死于威尼斯及七个其他的故事》（纽约，1989：17）。在接下来对该作品的引述中，注释用的是德文。
- [9] 同上，第19、24页。
- [10] 同上，第3、10页。
- [11] 弗吉尼亚·沃尔夫著、尼吉尔·尼可尔森编《视觉的改变：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书信，1923-1928》卷3（伦敦，1977：155）。
- [12] 曼恩《死于威尼斯》，1989：69、77。
- [13] 同上，第37、32页。
- [14] 拉德克利夫·怀尔《孤独之井》（伦敦，1982：246）。
- [15] 迈肯锡《非凡的女人》，1928：51。
- [16] J.A. 辛普森、E.S.C. 韦乐编《牛津英语词典》第2版卷IV—V（牛津，1989：1010）。
- [17] 同上，第1318页。
- [18] 卢保罗《让一切随意：一部自传》（纽约，1995：VIII）。
- [19] 《牛津英语词典》卷IV—V，1989：1012。
- [20] 同上，第1009页。
- [21] 同上，第1012页。

[22] 同上，第 662 页。

[23] 同上，第 633-634 页。

[24] 华伦·约翰逊 *Faggot*，收入韦恩·R·戴茵编《同性恋百科词典》（纽约，1990：383）。

[25] 赫伯·艾伦《烟雾笼罩的房间：布鲁克林香烟会》，载《纽约客》2002 年 7 月 29 日。

性别与种族

1991年，杰克·德瑞达在其《伪币》一书中写道：“吸烟是象征之象征”。在他看来，吸烟具有同时存在的多层意义，在意义的多层体系中运行自如。如果此话当真，如果人人都吸烟，如果吸烟真的在同一时间无限地表达出不同的意义，那么我们需要区别一下那些在我们的想象中和我们一样吸烟的人——不管我们如何定义自己，以及那些只是模仿别人吸烟的人。1857年，古斯塔夫·福楼拜一边抽着雪茄，一边通过描写艾玛·包法利的吸烟动作来强调她虚伪的自由追求：“由于其仅有的爱的结果，包法利夫人的礼貌改变了。她的神情变得更大胆，言语显得更自由，她甚至嘴里叼着烟，很下流地同罗德尔夫先生一起外出，好像是在向人们挑战。”对自己的身份不自信的人选择吸烟以便使自己看上去像“真正的人”。于是，欧洲和亚洲的“新女性”模仿男人吸烟，如T.S.艾略特的“南希·艾莉科特小姐”，她于1915年“……抽着烟、跳着各种现代舞/她的阿姨们并不十分清楚她的感受/但是她们知道这是时髦的。”在局外人的多重想象中，吸烟的妇女、异族和殖民者存在着强烈的世界感，吸烟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它在20世纪初期仅表示为妇女和异族的模仿行为，而到了20世纪末期则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弗吉尼亚斯林香烟“你已走得太远，宝贝”的广告语，让位于更近的一则广告，上面有一位妇女拿着一支香烟，标题为“这是女人的事情！”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患肺癌的女性人数超过了患肺癌的男性。烟草在非西方的使用，尤其是在东亚，已经为一种和现代有关的新的意义搭建了舞台。人们不再认为这样的吸烟行为或许只是装酷，而觉得只有危险。然而，正是冒险刺激着人们去吸烟。



在巴西，安德烈·萨威特于1555年提出，烟草被相信“对许多事情具有神奇的功效”，其中之一便是药效。图为一位生病的男子正在被人用粗大的雪茄冒出的烟进行“熏疗”，另一个人手里摇着拨浪鼓——现在成了乐器而不是医疗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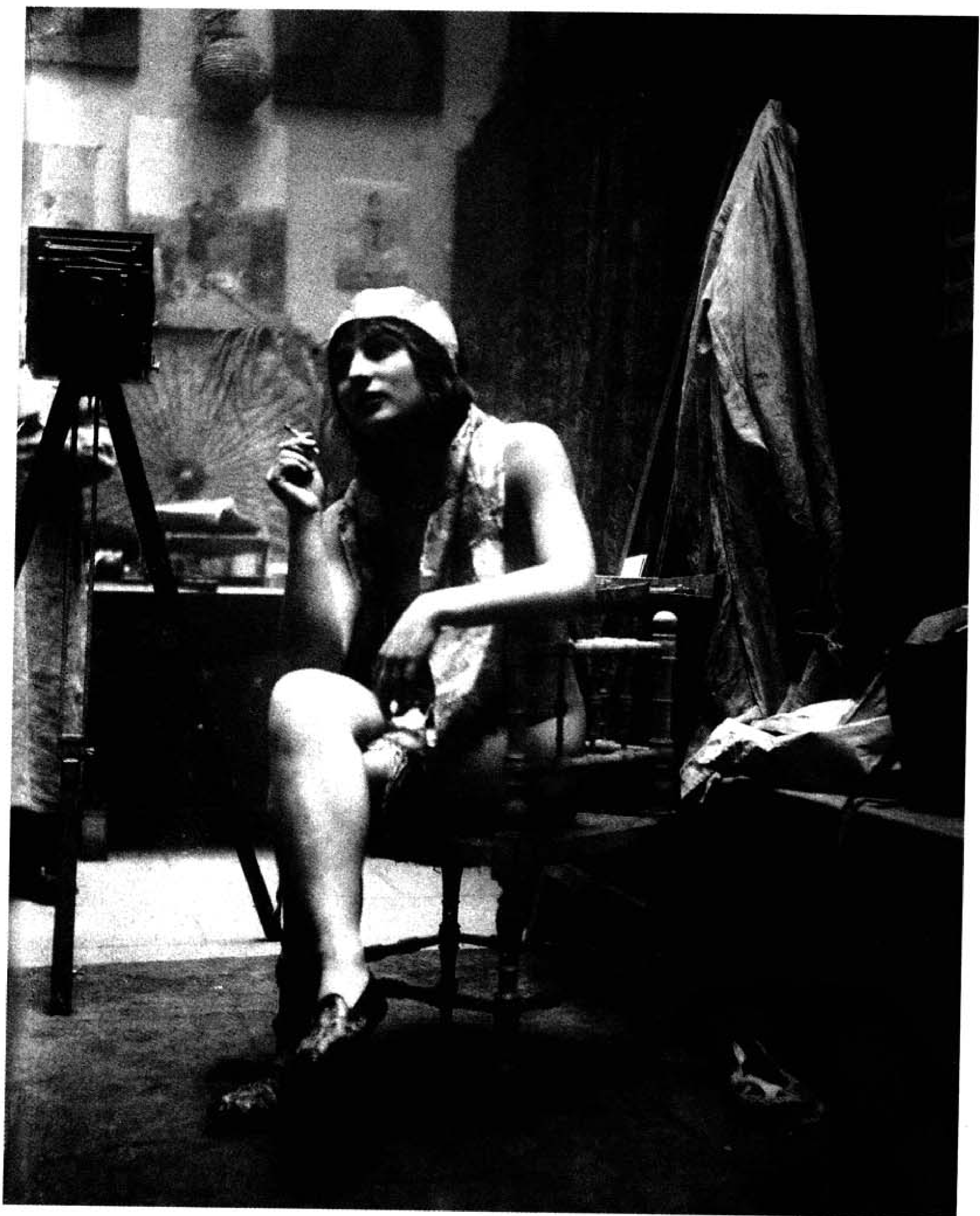
“名副其实的哈瓦那”，一则 1868 年的石版画广告



让·路易斯·福莱恩创办的周刊《短笛》上的一位妓女，标题为“终于清静了！”



德累斯顿雪茄制造商詹迪克和苏翰的一幅展示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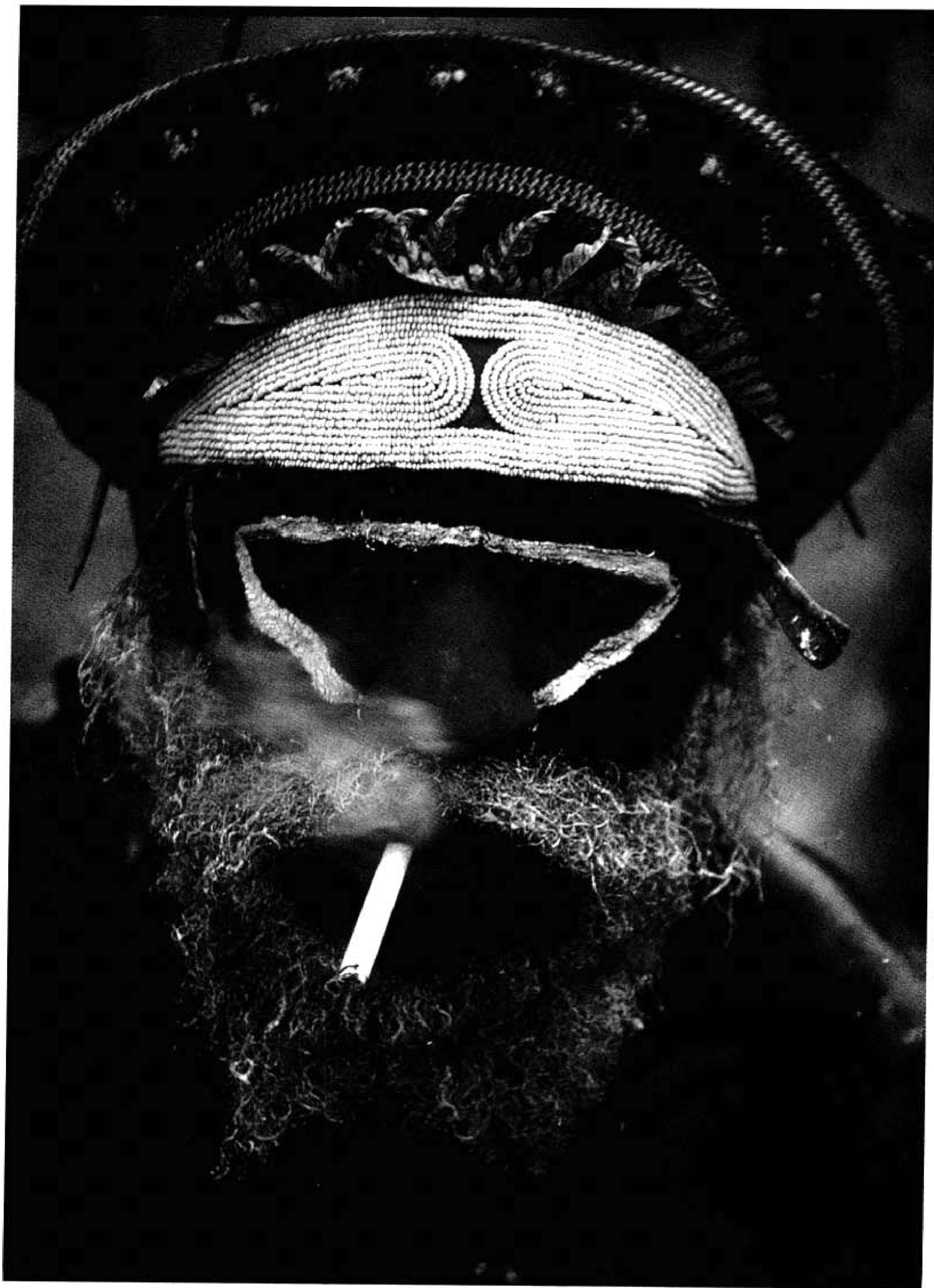
1900 年左右，一位模特手拿香烟坐在画家的工作室里



1910年左右，在阿尔及利亚人们用水烟斗抽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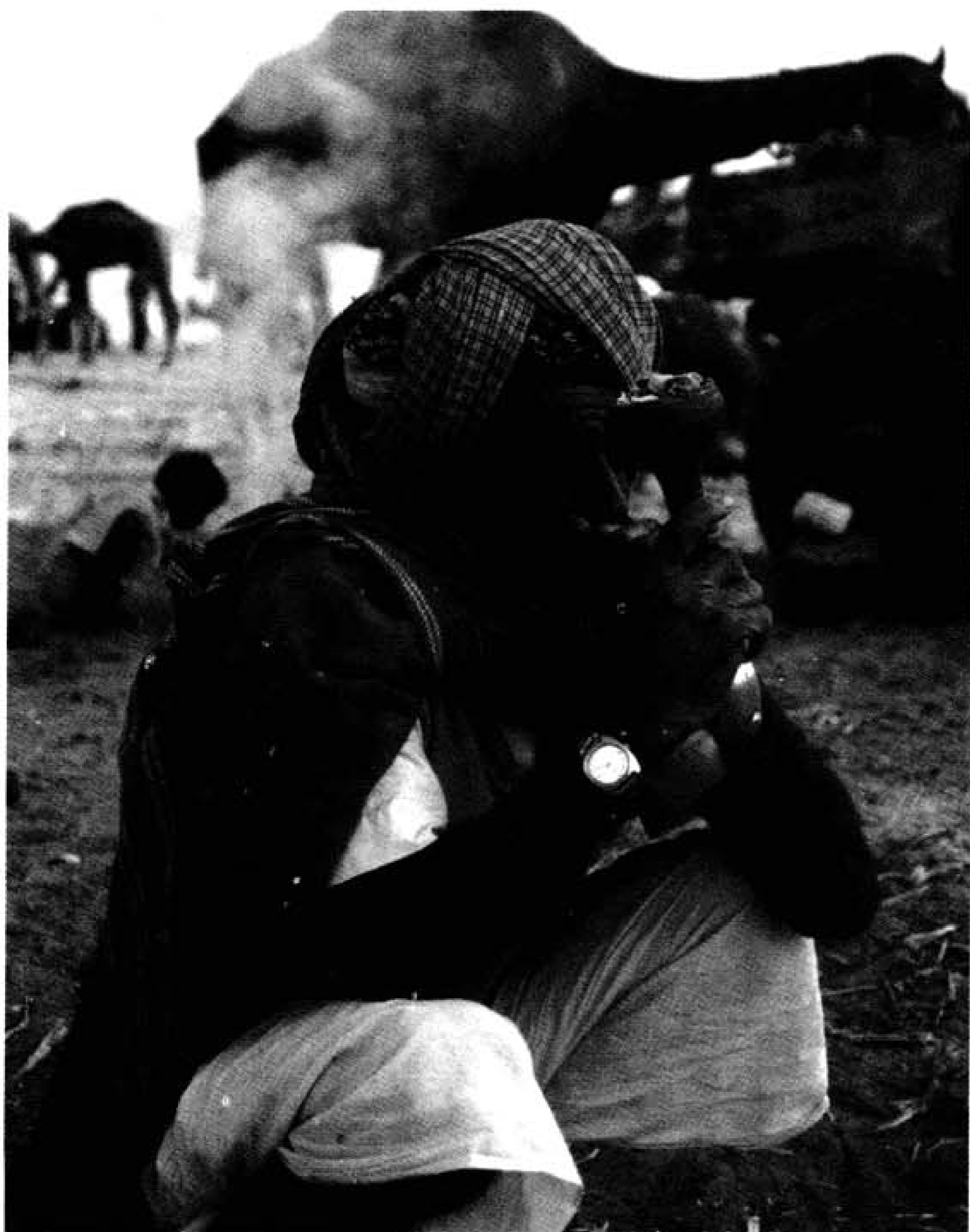


巴黎，一群抽烟的妇女们



1985年，新几内亚岛麦尔帕部落的成员正在吸烟

在菲律宾的一次节日
上吸烟



1995年，印度的一位男子正在抽烟斗



2002年，古巴哈瓦那的一位妇女正在抽雪茄

吸烟焦点谈

Smoking: The 'Burning Issue'

毫无疑问，烟草是 19 世纪末促进当代广告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 20 世纪中期，伴随着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人们对惬意感受的追求与 17 世纪并无大异。如今的烟草促销广告——当然是提倡吸烟的广告——被吸引人的反烟广告所威胁。然而它们并不是必然的反烟行动，因为它们强调的恰是吸烟的惬意所带来的危害。

我们为什么吸烟——吸烟生理学

莱斯利·艾维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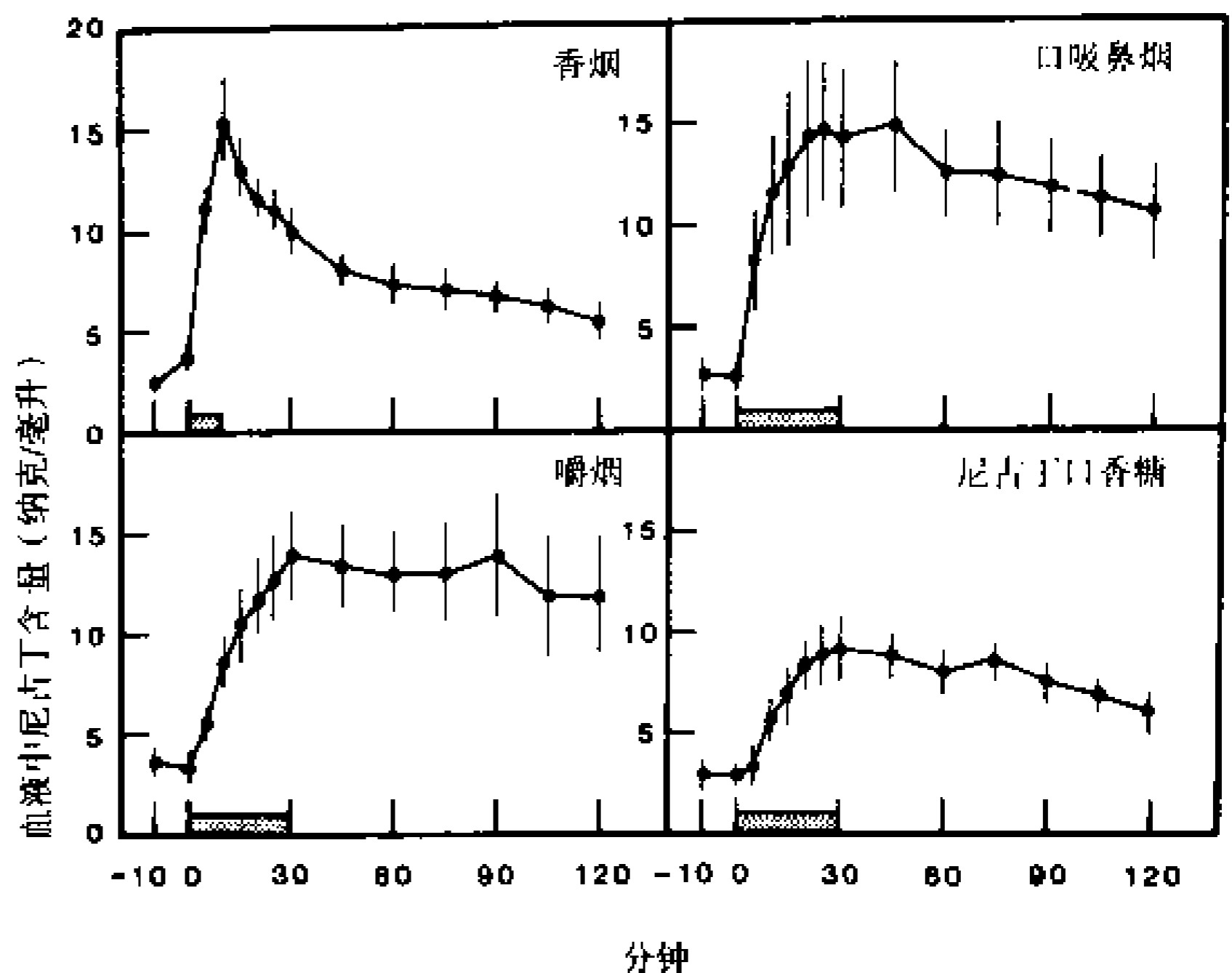
药品中的一些物质让人上瘾，这些物质通过许多途径摄入人体内部——口服、注射（有时候直接进入人体血液），使用眼药水、鼻腔喷剂，在皮肤表面敷药，或者直接吸入肺部。^[1]最后一种途径有很多优点，可吸入物质直接进入肺部，接触到肺部大面积的内壁，能够更快地进入血液循环。肺部有大量的分管系统（支气管），这些管子的末端是些微小的肺泡，这些肺泡吸收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人体的肺部有大约三亿个肺泡，这些肺泡的表面积总和大约为七十平方米（相当于两个大房间的面积之和）。吸入的过程是药品执行疗效的过程，吸入的气体包括气体麻醉和治疗肺部疾病（如哮喘）的药品。为使药品发挥效力，它们通常要以气态（如麻醉氟烷或者氮氧化物）形式传送，挥发性液体（如氯仿或者天空醚）则通过加热转变成气态（如用来吸食毒品）。在悬浮物仪器中，药品能以小滴的形式存在或以可吸入状的雾态存在（例如治疗哮喘的药物）。

本文着重关注通过香烟形式吸入体内、能对人体产生影响的神经类药物。这些药物的使用要有一些物理化学量与这种形式吸入量相配。香烟燃烧形成的烟气是以加热或者燃烧的形式产生的，燃烧所用材料是混有活性物质的植物或纯粹的植物，这种活性物质在高温（通常在 200-300℃）下能转变为气态。由于这样的气体温度过高不能直接吸入肺部，于是经过吸烟工具（烟杆或者香烟）使这些气态药品冷却下来，很快转变成液态或固态形式。这就形成了吸烟。香烟中包含着活性毒品，烟吸入肺部后，迅速将毒品传送到血液。正如众多吸烟者所期望的，吸烟能迅速将毒品传送到体内。相同的药物通过口腔服用，其被血液和大脑吸收的过程就要缓慢得多。除此之外，口腔服用需要经过内脏系统，药品进入人体大循环前要经过肝，部分药性可能被肝带走，效果也会减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药品都以气态形式吸入体内。例如，可卡因通常是硫化物的派生物，加热不能使之转变成气态，但粉末状的可卡因能通过鼻粘膜吸入体内。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粉末状可卡因成为分解可卡因的一种产品，也第一次使吸食可卡因成为可能。19 世纪中国流行吸食鸦片，但西方并不流行吸食这种人工合成的派生类海洛因，用嘴来吸食鸦片或者通过血液注射来吸入海洛因都是常见的方法。到了近代，随着获取高纯度海洛因技术的提高，吸烟或者吸入挥发性毒品变得更加普遍，被称作“雕龙”的吸食方法就需要大量的技巧：

*莱斯利·艾维森 (LESLIE IVERSEN)：伦敦皇家学院沃尔夫森年龄疾病研究中心主任，牛津大学药理学系访问教授，帕诺斯医疗集团药品公司创始人，为伦敦皇家协会成员、美国科学院外籍会员。近作有《大麻的科学》(2000)。

通过不同途径吸收尼古丁的量。到目前为止，吸食是传递毒品最迅速的方式，毒品通过肺部表面被迅速吸收



首先在皱纹银箔纸上加热粉末，用一个金属吸管在火柴盒外皮上将气体吸入。“雕龙”确实是一项技巧，加热可卡因的热量一定要适度，既要保证其能溶解，同时还要避免由于温度过高而被碳化。吸管还要同时跟上，蒸汽的小束就像龙尾一样。展开金属卷能见到烟的沉淀物，这也是变成蒸汽后最小的浪费物。通过这个吸食方法所获得的欣快感（忽然间的精神愉悦）与注射获得的欣快感基本差不多。但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并不经济，因为海洛因要以烟的形式挥发掉一部分，而且该方法对毒品的纯度要求比较高。^[2]

尽管毒品在燃烧中要失去一部分活性物质，吸烟中也要有一定量的蒸发，但吸烟却不失为一个迅速传递神经类药品的有效途径。有经验的烟草或大麻吸食者都知道如何控制毒品吸收量和毒品进入大脑的量。他们会通过变化吸食频率，控制烟草进入肺部的深度，延长烟在肺部停留的时间，来达到这种控制。大量的调查研究显示，当烟草和大麻吸食者得到不知名的香烟或者含有不同量的活性毒品时，他们会通过变化吸烟方式达到获得其所需要的活性毒品的剂量。在吸食弱性香烟或者混合物时，烟民会自动吸得更深、更频繁。表1列出了一些常见的吸食类神经性药物，显示了与其他摄入途径相比，吸服在效率上有哪些优势。

表 1——吸入的有害物质含量

统称	活性有害物质	沸点（摄氏度）
大麻叶（大麻）	四氢大麻酚	200
上等海洛因	可卡因	187
海洛因	二乙醚吗啡	272
鸦片	吗啡	252
烟草	尼古丁	247
苯甲胺、冰毒	甲基苯丙胺	参考 200

不幸的是，燃烧烟叶的过程中会对肺部造成危害。烟草在燃烧过程中产生一氧化碳，它是不完全燃烧产物，这种物质会削弱血液运输氧气的的能力。因此，如果一个怀孕的母亲是烟民，影响之一就是会削弱体内婴儿的生长能力——导致低体重婴儿出生，而且这些婴儿感染疾病的几率比较高。长期吸食烟草会引起更严重的疾病——二十几种疾病危害着烟民的健康，癌症就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3]与香烟有关的疾病，大多数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在美国，每年因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多达五十多万。最近一项对中国的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烟民最终将会死于与香烟有关的疾病。^[4]

吸食大麻（大麻干叶和花）产生的烟与燃烧香烟产生的烟有许多相同成分，长期吸食将严重影响健康——尽管还没有可靠的科学数据来支持这一论点。^[5]

吸食药物对大脑的影响

表 1 的数据体现了人类大脑对不同药品产生需求欲望的反应。与吸烟类似的温和刺激物能带给人与吸食大麻无异的麻醉感和吸食海洛因、上等可卡因、兴奋剂等带来的强烈的欣快感。体验者回忆道，吸食或者注射能将药物直接运送到血液，活性药品迅速到达大脑，能产生最强烈的欣快感，但产生这样效果的原因尚不清楚。吸入的神经类药物是由大脑神经细胞的特定部分来识别的——这些细胞表面有特别分子来吸附药品分子。在此过程中，药物能引起神经细胞交换，使神经兴奋或调节大脑活动，使用者称兴奋过程为欣快感。神经类药物“劫持”了大脑自然的工作机制。大脑的信息通过化学信息（神经传递素）储存于神经间的脑回里，神经传递素由神经末端产生和储存，当电流刺激传送到神经末端时释放出神经传递素。释放出来的神经传递素经过脑回，同时关闭大脑另一侧的感受器。神经间传送感受器时，会引发变化。因此，大脑感受器将尼古丁自然识别为正常的化学信息乙酰胆碱。这类化学药品能改变大脑注意机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恢复大脑正常的认知功能。感受器自然将海洛因识别为正常化学品脑内啡，它在调节大脑感受痛苦和愉悦的敏感性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都是通过引起脑部另一个更有效的正常化学信息多巴胺来发挥作用的。持续释放的多巴胺深深地占据前脑，它似乎是毒品上瘾的主要原因——使人们渴望接触更多的毒



品。最近的一项重要新研究发现，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不仅直接作用于多巴胺，而且作用于神经细胞，其他药品（大麻，海洛因和尼古丁）间接导致大脑区域释放更多多巴胺。一些科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认为此处释放的多巴胺代表着在“报酬”和“乐趣”的循环中最普遍、最终的路径，这是由多种药物滥用而产生的刺激。实验中的老鼠多次接近获得大脑中多巴胺电流刺激的水平，老鼠接受的刺激不断接近注射可卡因的水平——这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另一方面，许多滥用药物也能促进大脑中鸦片（脑内啡）系统的活跃性——这也许和使用药物的愉悦感有关。

为什么我们不断吸烟？上瘾和戒烟的机制

既然人们已经知道了吸烟能引起身体的危险，为什么人们还要继续吸烟？答案就是尼古丁是种能使人强烈上瘾的毒品。长期以来，烟草业努力否认这一点。但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任委员大卫·凯斯雷和美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迫使烟草业不得不承认上述观点。调查显示，多年来烟草业通过多种途径系统地操纵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包括培养尼古丁含量异常高的基因。^[6]

那么所谓的“上瘾”指什么呢？也许这个术语可以用一个更广泛的概念“物质依赖”来代替，两者主要的作用都是产生吸食毒品的冲动。戒烟过程中烟瘾发作时，戒烟者会感到心理和身体的不适。某些案例中，继续吸烟的冲动相当强烈——一些烟瘾重的人会在午夜起床，就是为了吸烟——也许有些人的烟瘾并不那么大。“渴望”毒品的刺激可

能强烈得能主宰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吸烟者将失去控制力，不能控制吸烟量。从消极方面考虑，“戒烟”带来的不舒适的感觉甚至可能威胁生命。因此，在戒海洛因毒瘾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肠胃疼痛感、头疼和痉挛。戒烟过程中，身体会出现霉菌，而且心理沮丧非常明显——包括情绪低落、不开心、易怒、焦虑、挫败感和注意力不集中等。这些由戒烟带来的不愉快的心理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此期间，老烟民非常渴望吸烟。但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尼古丁或者其他药物依赖的过程中，复吸的愿望产生于避免戒烟带来的不愉快的感觉。事实上，一些人认为只是每天的第一支香烟能让人产生真正的愉悦感，再抽烟只是为了避免戒烟。并发症之一就是吸烟带来的快感由于“忍受”而减弱——大脑内的鼓励机制不断阻止毒品刺激。每天的吸烟循环可以这样解释：

每天的第一支香烟所产生的药理作用主要是醒觉，与此同时，烟民的忍受也开始了。一会儿后，烟民可能会再吸一支烟，他会感到忍受感稍稍减轻。随后再抽的香烟就是积累体内尼古丁，吸香烟的间隔使烟民产生更大的忍受感。吸烟后大脑产生对尼古丁的暂时性的高需求，可能会克服部分的忍受感。然而吸烟所产生的主要作用即欣快感在一天中会逐渐减少。夜间不吸烟能再次促进尼古丁的作用。^[7]

对于烟民来说，至少每天的第一支香烟确实产生了积极作用，例如产生微弱的欣快感、提高能量、帮助清醒、降低压力和焦虑以及刺激食欲。这些积极作用在建立反复适应模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长期反复的模式使大脑机制适应且依赖烟草。科学家还认为所谓的二次强化刺激构成不断吸烟的需要。一旦吸烟，和香烟有关的随身工具——水烟斗和打火机——成为吸烟带来快感的标记。尼古丁依赖症影响了大部分的烟民——可能超过百分之九十。人们对不同毒品的依赖程度不同（见表2）。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对臭名昭著的氯乙烷海洛因和可卡因的依赖性竟没有尼古丁强，吸食大麻的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产生了依赖症。大麻吸食者并不经常吸食大麻——不同于每天大约抽十五至三十支香烟的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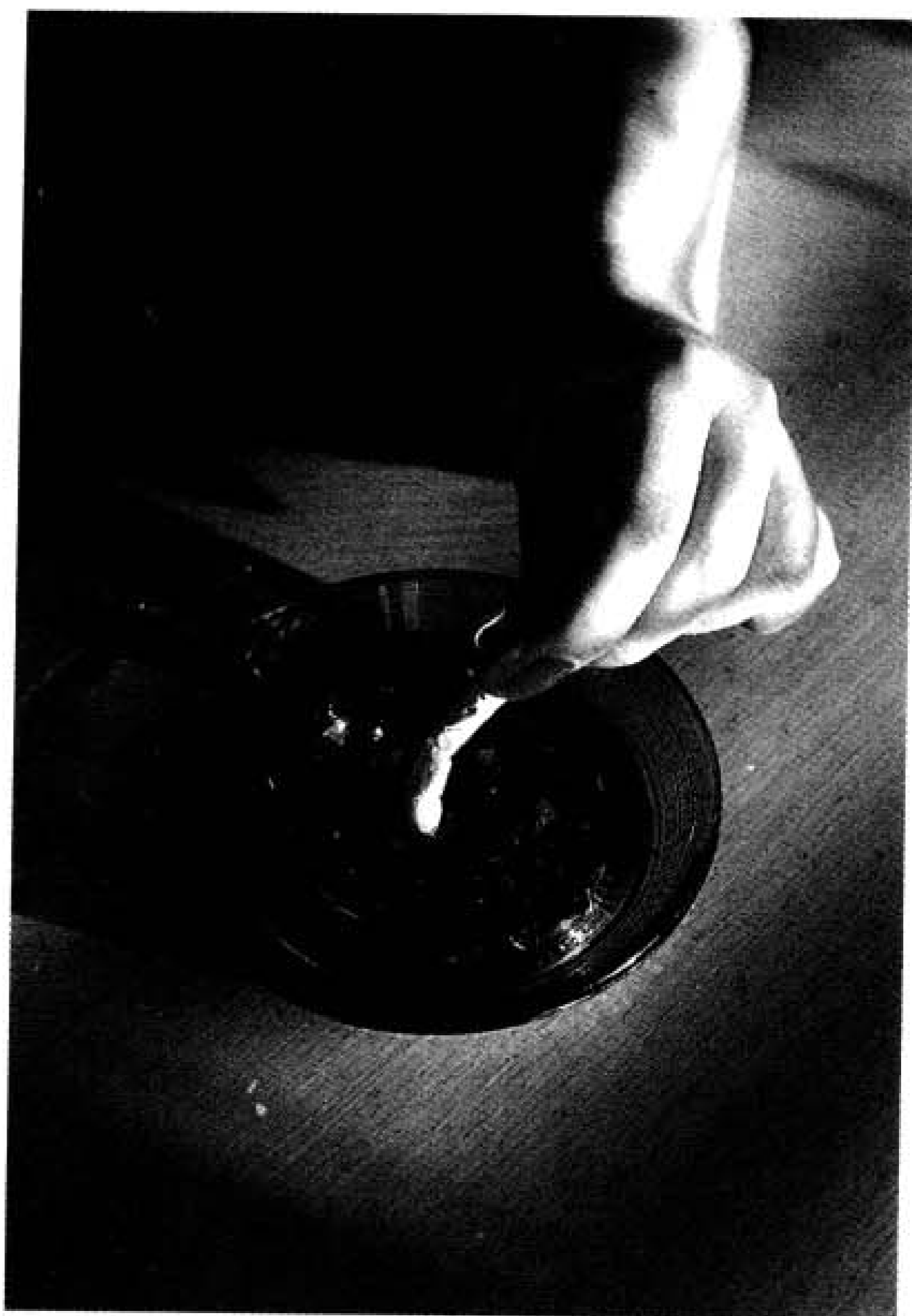
表2——依赖性药品上瘾者的百分比^[8]

药品	百分比
尼古丁	80
海洛因	35
可卡因	21
兴奋剂	11
大麻叶（大麻）	11
酒精	8

尽管有很多相关研究，科学家们还没有发现药物依赖对大脑产生的影响之本质。生物系统感到不安时将恢复原始的状态，处于化学平衡状态下的大脑不断接受药物刺激，

并启动补偿机制。毒品导致含有多巴胺的神经细胞过于活跃，例如导致多巴胺的大脑调节功能下降，在戒毒时，导致多巴胺神经的自然性故障不活跃。我们能清晰的认识到，毒品依赖所带来的基因图形改变调节着大脑的开关——现代技术研究了数以千计与大脑功能有关的基因，可能很快就能发现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

我们对戒烟产生消极特征的大脑机制没有很好的理解。一项重要研究发现，戒烟时常常伴随着大脑释放一种更多的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素（CRF）的荷尔蒙。CRF 发挥着协调者的作用，也是大脑和身体相互反应的最终、最普遍的途径。戒毒时身体发出危险的信号，这种信号通常只在身体遭遇紧迫事件时才发出。另有调查显示，CRF 能提高焦虑程度。新医学致力于阻止大脑感受器对 CRF 的反应——这些对克服戒毒产生的身体和心理消极的影响有积极作用。



怎样帮助打算戒烟的人？

正如上文提到的，大多数烟民发现戒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对于那些改变原有习惯的人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方法能帮助减少这样或那样的药物依赖。行为训练和催眠术对一些烟民有效，还有人发现药品的帮助比较明显。一个行之有效的戒烟方法就是用尼古丁来代替香烟。但问题是尼古丁不能被口腔很好吸收，所以才产生了其他方法。其中一种就是通过咀嚼尼古丁口香糖来吸收——这应用了人体口腔呈碱性这一条件（这与胃呈酸性不同），有助于尼古丁的吸收。除此之外，改变咀嚼频率和强度也能控制尼古丁的传送量。通过皮肤粘性贴纸来传递尼古丁是另一个比较流行的方法。这个工具能刺激正常的通过吸烟获得的血液尼古丁含量，然而这种方法却不能获得吸烟产生的快感。一项新发明的人工香烟克服了这个缺点。这个小巧的塑料器具类似香烟，还有一个装满尼古丁的弹药筒。当通过它吸烟时，相同量的尼古丁就回传至肺部。另一种通过迅速燃烧传送尼古丁的方法是通过鼻喷雾来完成。尽管尼古丁替代品在某些人身上已经试验成功，但是成功几率并不大。在治疗结束十二个月后，百分之九十的人会恢复吸烟，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的人会再次接受尼古丁治疗。

相同的治疗方法被用来治疗海洛因上瘾者，他们中许多人通过合成吗啡来治疗——

例如美沙酮。^[9]美沙酮通过口腔服用，而且吸收缓慢，不能产生可卡因一样的快感，但是它占据了大脑中相同的感受器，帮助降低渴望的程度。另一个更强的治疗方法是通过环丙甲羟二羟吗啡酮介入治疗，这种药物能和大脑中的吗啡感受器捆绑在一起，达到阻塞感受器的作用，能有效地阻碍由海洛因产生的快感。这一治疗方法也面临着上瘾的危险，但是应用环丙甲羟二羟吗啡酮来阻碍吗啡，能降低戒烟带来的暴力和危险。然而对已经成功戒掉海洛因毒瘾的人来说，继续环丙甲羟二羟吗啡酮治疗能帮助降低复吸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吸毒的人都避免采用这种方法来戒毒，只对主动请求戒毒的一个女性医师吸毒者群体应用了这种方法，她们如果复吸，就意味着将会失去行医执照和谋生的资本。

在地平线上，这是医学的另一项发展。它可能取代 CRF 药物，我们已经介绍了戒毒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另外一项进展就是应用反镇静剂的潜在优势来帮助戒烟，它在帮助缓解情绪方面有着显著疗效。药品布格席（[®]威博携）最初是以反镇静剂的形式出现的，最近它已经被批准为能帮助戒烟的药物。大量临床试验证明了该药品的疗效，并且作为戒烟药物通过了国家批准。我们注意到布格席是通过刺激大脑释放更多多巴胺来发挥作用的，这同样适用于尼古丁，布格席的这一功效能对尼古丁产生同样的效力。有人建议使用氟西汀（[®]百忧解），这是另一项新发明的镇静类药物，它可能对打算戒烟的人们有所帮助。从长远来看，人们可以寄希望于医学进步从分子机理角度研究更有效的方法来治疗烟瘾。另外，基因研究也能帮助人们识别哪些人群最容易成为娱乐性毒品的依赖者。

注 释：

[1] L. 伊弗森《药品简介》（牛津，2001：20-23）。

[2] P. 罗伯逊《禁烟》第2版（牛津，1999：185-186）。

[3] R. 倍塞等《英国1950年以来的吸烟、戒烟和肺癌：国家策略与两个案例控制研究》，载《英国医学杂志》CCCXXI（2001：323-329）。

[4] B.Q. 刘等《哈泽德烟草在中国出现：米尔顿死因的一个典型学说》，载《英国医学杂志》CCCXXI（1998：1411-1422）。

[5] L. 路森《大麻学》（纽约，2000：190-203）。

[6] R.D. 赫特、C.R. 罗宾逊《关于尼古丁的烟草业秘密大曝光：明尼苏达烟草审判》，载《美国医学协会学报》CCLXXX(1998：1173-1181)；大卫·切斯特《目的问题：美国和夕阳工业的伟大战争》（纽约，2001：191-197）。

[7] 尼尔·博内维茨的发言，参见 G·布莱克、J·马池编《尼古丁生理依赖》（奇切斯特，1990：199）。

[8] 《全国药品滥用研究年报》，全国家庭药品滥用调查（2000）。

[9] P. 罗伯逊《禁毒》第2版（牛津，1999：226-238）。



吉姆·马斯在 1992 年美国无烟日同时吸一百五十四支香烟，创下了一次吸最多香烟的世界纪录

吸烟、科学和医学

约翰·威尔斯曼*

2001年8月,《时代》杂志刊登了理查德·布伊登的故事。五十七岁的布伊登死于肺癌,万宝路香烟制造商被裁定支付给他三十亿美元的损害赔偿金,双方经协商最终同意将赔偿金缩减为一亿美元。^[1]我们很容易这样假设,从20世纪初期起,吸烟和社会的关系在吸烟文化史上长期占据着核心位置。这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在晚近也就是从1950年开始,人们才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探索了历史上“吸烟与健康”辩论的三个时期:1850至1930年间的辩论主要关注青少年吸烟的问题;1930至1980年这段时期,人们首次提出了吸烟和癌症有关的观点;此后的时期可以称为无烟阶段。本文以英美两国为例,验证历史学家用于探讨吸烟与社会关系的方法是否正确。关于“谁应该为吸烟负责”的问题,人们在烟草公司和国家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同时传染病学也给“风险”这个词做出了新的解释。近期提出的吸烟、社会和医学关系的问题,虽然远超出人们的理解范围,本文仍尝试性地加以回顾和概述。

烟管吸烟时代: 适量和混杂

毋庸置疑,烟草业的发展依赖于农业的进步、生产技术、工业组织方式的发展以及安全火柴的使用。19世纪,人们通过烟管——中产阶级使用雪茄——来消费烟草,这为烟草和健康之间的辩论做出了铺垫。1830年至1938年,《柳叶刀》集中分析了肠胃紊乱、精神错乱、瘫痪、歇斯底里症、软骨病、阳痿和记忆丧失这些大众抱怨的问题和烟草间的所谓联系。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唇癌与吸烟的关系,虽然这点从未经过系统的证实。人们仍然随意地将烟草和肌肉萎缩、黄疸病、舌癌、四肢虚弱、双手颤抖和步履蹒跚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人们对烟草表现出如此关注的根源在于烟草成分的混杂。《时代周刊》的报道中暗示了烟草中混杂着糖、铝、酸橙、面粉、大黄叶、淀粉、糖浆、牛蒡叶、苦苣叶和红黑燃料等多种物质。^[2]

与此同时,人们曾认一度认为烟草对健康有益,他们注意到吸烟者很少遭受“肺癆”也就是肺结核的痛苦,而且在体力劳动者和士兵中还广泛流传着香烟对缓解压力有帮助的说法。早在1872年,就有文章报道香烟是由尼古丁、氰化物、氨和硫化物构成的,保险精算师还提出对吸烟者和非吸烟者在死亡率条款方面应该加以区别对待。^[3]于是烟

*约翰·威尔斯曼(JOHN WELSHMAN): 兰开斯特大学健康研究学院大众健康专业高级讲师, 著有《市政医疗: 20世纪英国的大众健康问题》, 并发表了大量关于社会政策和健康医疗史方面的文章。



《烟草帝国》，1929年张贴于英国帝国市场布告牌的促销海报

管上开始装有过滤嘴，据说这样能保持烟草底部干燥，降低焦油含量。19世纪肺癌患者并不多见，仅有少数医生认为适度的吸烟也对成年人的健康有害。1879年，《柳叶刀》宣布：“如果在时间和用量方面加以适当限制，我们仍不反对使用烟草和酒精。”^[4]

令人吃惊的是，这场辩论对19世纪80年代吸烟的出现基本没有

产生任何影响。当人们被警告直接将烟吸入肺部有危险的时候，一些医生正在进行过滤嘴实验。在烟管吸烟时代，《柳叶刀》提倡适量吸烟，它的研究关注了传说掺杂了埃及烟草的香烟。一位历史学家暗示《柳叶刀》在很多方面的观点是主张香烟提纯而非废除香烟，针对的是滥用而非使用。^[5]1902年《柳叶刀》谈到：“当人们理性而适量地吸烟时，可能是吸烟量最少的时候，这个事实是便利和便宜相伴相随的结果，这也为香烟的广泛流行提供了充足的理由。”^[6]

社会上存在很多反吸烟组织，其中包括英国反烟协会、反烟军团和苏格兰反烟协会。在法国，反烟草滥用协会旨在鼓励人们适量吸烟以及反对儿童吸烟。《柳叶刀》却认为这些组织夸大了吸烟的危害，1872年它提出，“在这样一种廉价的乐趣上标以恶名是不明智的行为。”^[7]这些组织几次试图瓦解烟草支持者的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只有20世纪初期成立的反儿童吸烟组织才取得了小胜。这些组织包括英国少年反烟联盟、国际反烟联盟、卫生联盟以及抑制青少年吸烟联盟。

20世纪初期，反对青少年吸烟运动表达着吸烟和社会两者关系的文化背景。1904年，青少年体质下降跨部分委员会提出议案，禁止向儿童贩卖烟草以及禁止在糖果店内兜售烟草，这项提议最终于1908年在儿童法案上得到通过。然而，这项立法仅仅间接地与早期的反烟草运动相联系，而与童工和“国家素质”等相关问题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吸烟对儿童健康产生的真实影响总是模棱两可。中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者认为，香烟成了工人阶级年轻人身份的象征性标记，吸烟与发誓、赌博、流氓和一些成年人的副产品联系在一起，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鼓励男孩加入诸如国际反烟联盟这样的男孩俱乐部。大多数反对儿童吸烟的组织是由教堂和星期日学校创设的，它们以都市化和体质下降辩论为背景，目的是教给儿童基本的道德观念。关于青少年吸烟的辩论基本上围绕着道德和公民权进行，以一种偶然的形式通过医学证据而展开。

吸烟与肺癌

我们知道，烟草业的发展依赖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香烟商标集中代表了公司的资本、技术、市场和广告。如果 19 世纪是烟管和雪茄的时代，那么 20 世纪 50 年代就是香烟的时代。香烟的普及程度几乎让人忘记了它还是一种新的发明物。1883 年随着伯纳可机器的发明，香烟生产商 W.D. 威尔斯和 H.O. 威尔斯很快把它应用到生产中。这部机器为大规模生产香烟提供了可能条件，从此，和香烟消费一样，大手笔投资的广告迅速走红。来自英国的数字显示，到 1953 年为止，有百分之六十四的男人和百分之三十七的女人吸烟。在美国，人均香烟消费量从 1900 年的四十九根上升到 1965 年的四千三百一十八根。^[8]

众所周知，人们意识到吸烟危害健康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让我们对此加以简要的回顾。20 世纪 30 年代，受雇于保险公司的统计学家将吸烟减寿甚至可能致癌联系到一起。同一时期，德国纳粹展开了以吸烟为主题的鲜为人知的社会调查，该调查的背景是关注种族健康和身体纯净。吸烟与癌症、心脏病有关，并且对生育产生影响，社会上开展了健康教育、禁止吸烟广告和许多公共场所限制吸烟的禁烟运动。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也反对吸烟。这些运动由所谓的“卫生政策”或者“健康义务”构成。事实上，1939 年德国科学家就是最早发现烟草和肺癌关系的科学家之一。^[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肺癌引起了各国的密切关注。在美国，1935 年死于肺癌的人数是四千人，1945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一万一千人。在阿根廷，安吉尔·H·洛夫实验表明，烟草中分离出焦油的过程能使实验中的动物致癌。在英国，理查德·道尔和奥斯汀·布兰德福特·希尔阐述了死亡率的变化，尽管他们本意是想证明汽车的增加和道路上焦油的增多是导致高死亡率的显著原因。1950 年，一篇发表于《英国医学报》上的文章首次将吸烟和肺癌联系起来。道尔和布兰德福特·希尔的研究结论表明，“吸烟能引起肺癌，并且是患肺癌的重要因素。”^[10]同年，E.L. 文德和 E.A. 格兰汉姆在美国也发表了极类似的报告。

20 世纪 50 年代，吸烟在社交活动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人们了解吸烟危害健康经历了缓慢的过程，学界对道尔和布兰德福特·希尔文章的批评态度到后来才有所减弱。1962 年，医师皇家学院发表了题目为《吸烟与健康》的第一篇报告，该报告在英国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文章提出瘾君子比不吸烟的人感染肺癌的几率高三十倍。后来出任英国卫生部副部长的乔治·高德波爵士在这篇报道中起到了核心作用，然而这也符合皇家学院的“现代化”日程。无独有偶，1964 年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也作了相关的报告，该文章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提出与空气污染相比吸烟更容易引起肺癌和支气管炎。文章还暗示性地提出了行为、风险和健康三者关系的新意义。^[11]相关的行动再次逐渐得到实施。在英国，早在 1967 年就禁止电视播放香烟广告，1971 年香烟包装上出现了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美国 1965 年通过法律强制要求香烟包装上必须标注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性信息。

历史学家曾试图通过多种途径研究 20 世纪后期吸烟、社会和医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他们考察了科学和政治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国家只能对强大的烟草业做出很有限的控制。政府集中力量尝试改变人们的吸烟习惯，而非直接控制烟草业，因此划拨给卫生健康事业的资源变得十分有限。正如记者彼得·泰勒写到的，“烟草圈就是政治和经济圈，这样的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保护了烟草业”。^[12]在美国，国会提出的反烟政策也是有局限的，因为烟草补贴仍然存在。由于烟草创造的财富，政府和烟草业都希望人们吸烟。政府和烟草业的关系与它和食品、酒和药业之间的关系相似。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关注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英国卫生部和卫生教育理事会相关部门对吸烟问题所做的回应受限的本质。尽管 1950 年出现了道尔和布兰德福特·希尔的文章，但是直到 1958 年出版医学研究会的报告，卫生部才对吸烟问题采取行动，宣布了吸烟

和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如此，这个因果关系的真正意义却是地方主管部门争论的根源。对这些历史学家来说，这只是科学忠告的一个小故事，官员惰性、商业压力或者政府干预的一项措施。正如查尔斯·韦伯斯特写到的，“这些努力姑且算是国家卫生服务机构对瘾君子健康负责所做出的象征性的回应。”^[13]

一些人强调了劳工保护管理局记录上的连续性问题，另一些人提出劳工要比政治对手更加诚信。尽管还没有政府级的行动，据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劳动 MPS 部门就对反烟行动持积极态度，并且在禁止电视播出香烟广告的表决中发挥过影响性作用。帕欧罗·帕拉迪诺最近就此事认为，关于吸烟、健康和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督教会渴望，这也是英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问题。帕拉迪诺认为这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托尼·布莱尔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的赫里斯·朱里斯一样真诚。马修·希尔顿以更广阔的文化背景考察这些医学辩论，他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检测吸烟危害健康的方式。他认为人们会根据健康信息的传播媒介，按照重要性重新将这些信息塑形。《卫报》透彻而严肃地进行了报道，《每日快讯》认为吸烟者应该自己拿主意是否要戒烟，《泰晤士报》反对政府干涉此事。最令人瞩目的是有关吸烟和肺癌产生和扩散的众说纷纭的医学知识。希尔顿总结到，流行于书面、广播和图像的就吸烟和健康问题的争论，经历了解释、接受、拒绝、提出个人观点这几个阶段。^[14]



1947 年，挪威促销海报中大力宣传吸烟有利健康

无烟时代：被动吸烟和吸烟成瘾

1971年，皇家医师学院发表了题为《当今吸烟与健康》的第二篇文章，与此同时形成了一个叫做吸烟与健康行动（ASH）的压力团体。新发展受到了限制，但却在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一是人们认识到被动吸烟，如1981年《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瘾君子之妻被动吸烟患肺癌几率的重要文章。1986年美国公共卫生部的报告强调了“二手烟”的危害，扩大了地方管理局对公共场所禁烟公告的使用区域。20世纪90年代，国内航线基本全部禁止吸烟。另一个显著的进展是人们意识到烟草能让人上瘾，因为尼古丁能使身体对其产生依赖。吸烟本质上是自愿活动的观点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如同爱兰·布兰茨写到的，“无害的习惯变成有害的嗜好。”^[15]

战后，烟草公司凭借吸烟有益健康的宣传，在烟草竞争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美国很多诉讼案件要求烟草公司继续在产品包装上详细标注吸烟对健康的风险。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理查德·布伊登案例中，布伊登对飞利浦·毛里斯公司的诉讼案取得了胜利。与此相似，美国地方州法院要求烟草公司支付吸烟者医疗费的上诉案件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吸烟人数比率下降，尤其是在中产阶级中和发达国家中。在西欧，吸烟人群主要是女性工人阶级，因此烟草公司将市场确定在发展中国家。

历史资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人了解到香烟危害健康的科学依据却依然继续吸烟。马修·希尔顿认为，吸烟的个人和团体以“个人自由观念根深蒂固”为特征。儿童继续吸烟的理由是他们已经吸烟了，因为香烟是由儿童进入成人世界的标志。成人也如此，他们向往个人主义、反对标准化政策。爱兰·布兰茨认为，不能忽视吸烟在教育、社会阶级和道德观方面不断分层升级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以来，权威著作剖析了吸烟和社会剥削间的关系，包括工人阶级女性的典型案例。来自美国的数据显示，和白人相比，吸烟在黑人中更加流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吸烟的比率大幅下降。

结 语

二战前，对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只是烟草历史上相当微不足道的方面。19世纪，肺癌还是种罕见的疾病，烟草通过烟管和雪茄的形式被消费，有关辩论主要是针对适量和混杂问题的。此外，19世纪80年代香烟出现以后，人们关注的焦点聚集在青少年吸烟的特殊案例上，更多地关注道德和健康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吸烟和肺癌有关成为传染病学这门新兴科学的第一项成果，吸烟、科学和医学的关系成为公共健康的核心主题。一些人强调自由和吸烟彰显个性的本质，另一些人则侧重于贫穷和剥削的问题。不论持有哪种观点，香烟、社会和医学的关系在未来似乎仍将是重要的话题。

注 释:

- [1] 《烟民获得一亿美元赔偿》，《泰晤士报》2001年8月23日。
- [2] 《柳叶刀》1855年第2卷，第157页。
- [3] 《柳叶刀》1872年第2卷，第789页。
- [4] 《柳叶刀》1879年第2卷，第131页。
- [5] R.B. 沃克《19世纪英国吸烟与反吸烟运动的医学影响》，载《医学史》XXIV（1980：394）。
- [6] 《柳叶刀》1902年第1卷，第906页。
- [7] 《柳叶刀》1872年第1卷，第770页。
- [8] 艾伦·布兰茨《香烟，冒险和美国文化》，收入《代达罗斯》CXIX（1990：157）。
- [9] 罗伯特·普罗克特《关于癌症的纳粹战争》（普林斯顿，1999：173-247）。
- [10] 理查德·多尔《关于吸烟和癌症的第一份报告》，收入《灰飞烟灭》（阿姆斯特丹，1998：130-40）。
- [11] 布兰茨《香烟，冒险和美国文化》，1990：156。
- [12] 彼得·泰勒《烟圈：烟草政策》（伦敦，1984）。
- [13] 查尔斯·韦伯斯特《吸烟上瘾：国家卫生服务》，载《英国上瘾学报》LXXIX（1984：7-16）。
- [14] 马太·希尔顿《极致的快乐：英国流行文化中的吸烟（1800-2000）》（曼彻斯特，2000：202-220）。
- [15] 布兰茨《香烟，冒险和美国文化》，1990：169。

20 世纪消费者的信心

艾伦·布兰茨*

吐桶出现于 19 世纪，到了 20 世纪，吐桶成为美国都市和工业社会“当代前期”烟草消费的古董。“嘴上叼根香烟……这是 19 世纪中叶人们消费尼古丁的主要方式，不卫生而且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让人讨厌。这样的城市生活近似乎折磨”，1950 年经济学家理查德·泰纳特说道。^[1]相比之下，香烟的标准和价值观很好地切合了 20 世纪最初十年发展起来的“当代文化”。早在 1889 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批评香烟的文章这样解释到：

抛开香烟的优点和缺点不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名义上，麻醉药产生的影响不断加强。吸烟产生的焦虑、压力超荷等都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特征。^[2]

毋庸置疑，质量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士兵靠吸烟来减轻焦虑和打发无聊的时间。^[3]20 世纪 20、30 年代，香烟迅速传播，成为城市公共坐标的一道风景线——商店、商场、饭店和交通工具——形成了新的消费世界。因为一根香烟能在工厂、办公室、公交车、电车等地方很快被抽完，因此任何地方都能抽烟，任何时间都能抽烟——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告这样讲到。“现在，到了点燃一根香烟的时间了”，广告这样宣传。吸烟的优点就是适应当代流行文化。

对于吸烟人数不断增加的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强调这点是根深蒂固的，并将吸烟当作是美国 20 世纪头十年的文化实践。现代社会消费能力的上升、都市化的加剧、新媒体的胜利，都与香烟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数案例将香烟加以现代化的包装，这与“当代早期”的香烟消费方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分水岭。然而，与单纯描述烟草的出现与当代社会的自然契合不同，本文提出了在重塑文化形态方面，烟草业在烟草产品利润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调查了美国烟草消费上升时期这些变化的本质，以及作为工业的一部分，促进烟草消费的文化背景。

早期市场着重关注供与销的内部关系。当代广告则是一个临界面，在消费文化中，它既创造了需求也创造了欲望。政府决策者对创造消费需求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持积极态度，正如卡尔文·库里奇总统 1926 年在国际广告协会的演讲中说道的，“大规模的生

*艾伦·布兰茨 (ALLAN BRANDT)：哈佛医学院医药史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著作和编著有《没有魔术子弹：1880 年以来美国性病之社会史》(1987)，《道德与健康》(1997)。目前正在出版一本关于美国吸烟的社会和文化史的著作。



雷诺烟草公司
骆驼香烟广告，
1930

产只有在大规模的需求下才变得可能。”^[4]生产的增长早早超过了人口增长，这就使提高个人消费需求变得清晰可见。

许多观察者强调通过广告技术、促销、公共关系将香烟包装、再包装，使之变得时尚而且重要。一些烟草业人士对此提出令人印象深刻而坦率的评论，例如，1936年分析家在《广告与营销》中说道：

正如你所知道的，大部分的公众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挖掘人们的喜好，刺激大众的喜好，从而卖出我们的产品……公众一定要知道他们应该喜欢什么，令人吃惊的是，有时候人们在销售会上就像疯子一样。“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这句古老的销售格言，升级为“了解消费者应该需要什么，教给他们要有这样的需求。”^[5]

广告商很快明白了这一点，并且广泛利用了香烟的“功能”：香烟能安抚神经、有助消化、促进胃口，它是你最好的朋友。广告还说，香烟能舒解现代生活的节奏和需求。广告承诺吸烟能放松“神经”和舒缓都市令人发狂的生活节奏。“给你自己一道骆驼牌香烟屏障”，广告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有足够证据证明，云雾缭绕的骆驼香烟事实上是个极好的烟幕屏蔽。”在醇香的烟气外是迷人的光环，所有的担心和焦虑都盘旋而散，剩下的只是平静、愉快和满足。

促进烟草消费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强调某品牌烟草的口感：每个烟草公司的最高机密就是烟草和香料的配方。口感同时有着双重含义，这两点都关系到香烟成功与否。香烟广告一方面吹捧香烟的口感，另一方面暗示到吸烟不仅仅是吸烟者单独的经历：他们微妙地暗示选择这个牌子的烟民是有“品味”的，这点现在已经得到公众的证实。在消费文化结构中，消费是带有重要意义的公共行为，香烟——正如广告中的——为跨越阶级界限的显著消费提供了重要机会。

市场回应并引导着时尚和品味，成功的侵略性促销需要了解 and 探索社会改变。然而，香烟曾经有过许多含义。对男人来说，香烟代表着男子汉气概和力量，以及敏感和敏锐。

香烟表示着男性，因此产生了女人专用香烟，来增加女性的魅力和吸引力，这也是新社会和政治的平等。

将香烟市场对女性开放、以女性为目标消费群体，是创造性需求的一个主要案例，如果她们曾经被 19 世纪的道德观念束缚，现在她们懂得了回应消费力量原则^[6]。正如一位广告心理学家解释的那样：“广告商，尤其是那些不断使用大空间的广告商，他们的力量不仅可以在当时影响人们，而且能建筑起永恒的他所期望的并且被一部分大众所接受思想和态度。”^[7] 这涉及风格和审美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例如，他们选择用广告来做宣传，烟草业——在 20 世纪头二十年得到了长足发展——清晰地意识到女性占据了他们的一半市场后，因为性别差异而将占一半市场的女性排除在产品消费之外变得不可理喻。烟草商意识到了这一点，努力将女性确定为目标消费者，这样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充满竞争的文化领域。这是一个产品和文化表达互相适应的领域，即便从最好的方面考虑，这也不是完美无瑕的。^[8] 20 世纪前十年，反对女性吸烟的呼声还是很坚决的。广告商和市场经营者意识到，如果吸烟将成为一个大众行为，他们需要塑造这片领土。关于女性吸烟的意义，早期的辩论为此提供了机会。

1928 年，美国烟草业的“好彩”香烟展开了“香烟替代糖果”运动，以女性为消费团体的香烟广告对风格和审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形成强而有力的风格符号。作为 20 世纪 20、30 年代深入人心的尤其关注性别的社会政治符号，女性吸烟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香烟的象征含义——醇香、美国式的自治和平等——成为香烟广告传达的有力形象。

除了塑造萌芽的消费者市场文化的技术以外，广告这样构成，以美国烟草公司老板乔治·华盛顿·希尔为例，他明白大规模的广告只是市场符号的一方面，有效的市场调配需要从公共关系到合作设计各方面的现代化技术来调配。在一次促销运动中，希尔加入到爱德华·博内斯的团队中。博内斯 1891 年出生于维也纳，是西蒙德·弗洛伊德的侄子，他们一家人于 1892 年搬到美国。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一战期间他供职于公共信息委员会，在那里他的交流技巧、公共观点理论和宣传学知识第一次得到了训练。^[9] 战后，博内斯接受了新心理学和新合作秩序训练，热情地加入到控制宣传技术和合作资本主义的大规模辩论中。与公共舆论的前辈不同，他并不把自己定位为“学者”，而是凭借对心理学的研究去塑造公共行为和价值。

一战时期，凭借香烟出现并成为文化核心的经验，博内斯迅速将自己标榜为“公共关系协商”第一人，不久他就成为公共关系的首席提倡者和政治评论家。他将此定义为“团体”和“草药”反应学，其学说的核心是强调对传媒的利用。博内斯尤其强调他所谓的“创造事件”，公共关系协商不仅清楚新闻价值，而且明白其“创造新闻”的价值。^[10] 博内斯热切地指出创造新闻不仅省去了广告成本，而且免去了对广告业业已质疑的操纵和对自我利益的预期问题。

公共舆论、利益、价值和信仰有效的操纵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消费者文化出现的主要方面。模糊广告和新闻之间的界限，是市场的一个崭新却至关重要的技巧，它的重要性在整个 20 世纪都得以体现，国家广告和国家“新闻”两者都是国家文化出现的重要

因素。博内斯准确地赞扬了媒体的力量，因为它疏远了——甚至隐藏了——工业利益。他反对那些“不参与社交或有害”的客户，认为公共关系协商一定要有引导合作政策的核心地位。

博内斯是代表美国民众工作的。在1920年，他就筹划出针对公共关系的美国烟草蓝图。他建议到，“烟草信息服务局”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告知公众新闻和信息，“服务局应该以科学的角度不时地给外界提供特定的科学背景。”博内斯将自己的观点和希尔的观点结合起来，用以提高“好彩”牌香烟的名声和销量。例如他建议把照片、新闻报道和香烟、女人以及以一系列与香烟有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同时动员时尚编辑将有关香烟重要性的封面故事和衣着光鲜的美女放在一起，用图片和宣传来讲故事。

“如果你赞同这些观点，”他总结到，“我们很高兴将其在你身上实施。”^[11]

一年以前，博内斯为希尔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他掀起女性吸烟运动。博内斯在报告中解释到：“这就像在我们面前开发一个金矿。”据希尔所述，好彩牌香烟赢得广泛的女性消费市场，博内斯功不可没。20世纪20年代，好彩牌香烟认识到女性时尚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重视身材的苗条，“好彩”的广告宣称其产品能帮助人变得更加美丽和有吸引力。博内斯在在时尚圈占有一席之地的《巴黎人》上刊登了数百张身材苗条的模特的照片，为了更进一步证明其观点，他还求助于医学论文，阐述香烟对人体的影响。掌握了这些资料之后，他充分利用媒体来鼓吹这些拼凑在一起的发现。他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就是为连续的广告创造一个社会背景，以接近那些消费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大力推崇公共关系的影响，支持用明显的市场来帮助吸引公众注意力和形成公众意见。博内斯应用的另一项工具就是调查——公共态度和实践方面迅速而见不得光的投票。在博内斯手中，调查不再是衡量公共意见的工具，而是塑造公共意见的一种技术。“调查显示”，支持博内斯的一个出版社宣布，“和胖女孩相比，选择用身材苗条而时尚的女孩做销售员，能给老板创造更多的价值，她自己也能挣得更多。”

到1929年，希尔企图用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干涉方法来扩大对女性吸烟的理解，从而吸引广阔的新市场。博内斯认出并损坏了烟草和女性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联系。他引用心理学家A.布里尔的话解释道：“一些女性认为香烟是自由的象征。吸烟是口头性欲亢奋的一种升华；嘴上叼根香烟对嘴巴能产生刺激，女性有吸烟的欲望是很正常的。”^[12]

博内斯对香烟改变消费模式方面的调查表示惋惜。正如布里尔建议的“今天女性的许多解放都超出了女性的欲望。更多的女性和男人做一样的工作。许多女人不生孩子，同意生孩子的女性则决定要生更少的孩子。女性特征蒙上了一层面纱。香烟，男女生来平等，成为了自由的火把。”^[13]博内斯抓住了这束自由的火把，把女性在公共场所吸烟奉为反传统的象征。



美国烟草公司好彩香烟广告，1930

DO YOU INHALE?



Certainly...

7 out of 10 smokers inhale knowingly...
the other 3 inhale unknowingly

Do you inhale? Seven out of ten smokers *know* they do. The other three inhale without realizing it. *Every* smoker breathes in some part of the smoke, he or she draws out of a cigarette.

Think, then, how important it is to be certain that your cigarette smoke is pure and clean—to be sure you don't inhale certain impurities!

Do you inhale? Lucky Strike has dared to raise this much-avoided subject...because cer-

tain impurities concealed in even the finest, mildest tobacco leaves are removed by Luckies' famous purifying process. Luckies created that process. Only Luckies have it!

Do you inhale? More than 20,000 physicians, after Luckies had been furnished them for tests, basing their opinions on their smoking experience, stated that Luckies are less irritating to the throat than other cigarettes.

"It's toasted"
Your Protection—against Irritation—against Tars



O. K. AMERICA

TUNE IN ON LUCKY STRIKE—60 modern minutes with the world's finest dance orchestra.

“吸一口吗？”美国烟草公司好彩香烟广告，1932



美国烟草广告，摘自《文摘杂志》，1930年4月5日

指导调查，所有的一切给他自己和他的客户赢得了恶名，女权主义者鲁斯·海尔发出参加纽约复活节的邀请：

女人们！
燃起另一束自由的火把！
点亮另一个性禁忌！

年轻的女性们象征“好彩”牌香烟，沿着第五大街游行，高调地将象征解放的拍击物和策略符号结合在一起。报纸广泛报道了他们的发现，引起了在全国范围的辩论，博内斯急切地期待着反对的声音。对女性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报道冲出全国，博内斯记述到，“我知道，这是老传统，可能被强烈的呼吁和媒体网所打破。”^[14]博内斯对自己代表客户和他们的市场利益所做的负面新闻和矛盾洋洋自得。

1934年，博内斯再次涉足美国烟草业持续的对女性的促销中。希尔认为那些绿色包装与当今的时尚不和谐，于是督促博内斯改变时尚。博内斯解释道：“这只是本人精彩六个月活动的开始——将绿色确定为时尚的颜色。”^[15]他制定了折中的长期计划，出资赞助舞会，并要求出席的客人穿绿色的礼服，秋季“绿色时尚”使绿色成为时尚业的主打色，与此同时，艺术家和心理学家对“绿色”的意义大加讨论。博内斯后来解释到：“我想立刻知道科学家、艺术家和专业人士在这种事情上的态度。我知道他们乐于享受

反对

通过女性来增加香烟消费，为“好彩”赢得了公众的喜爱，尤其是在《复活节后星期一》和纪录片中刊登的吸烟女性的形象。作为一条合法的新闻，如果处理得得当，他们都将从中获利。

博内斯说到，一定要小心选择女性，“在选择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他计划着故事应该和公众密不可分，他建议“这些人要长得漂亮，但看起来不能像模特”。博内斯召集《星期五不错》这个节目的女性们开会，给她们最终的指导，并用好彩牌香烟装饰场景。为了防止新闻记者不能拍出表达自己意图的图片，博内斯甚至派出了自己的摄影师。

在计划、组织这一事件的时候，博内斯一直躲在幕后，支持公共关系观点的一群人跟着他。他热衷于安排事情，为媒体创造新闻，

能有机会讨论他们喜欢的主题，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在这样一个交流的时代，他们的效率常常依靠公共的眼光。”^[16] 消费者时代是可以预言的，博内斯发现并为各种声音提供了一个论坛。

博内斯很早就了解到这些新文化中介的力量。与广告不同，他更喜欢消费文化中的其他形式——强而有力的力量。例如，许多人关注马迪逊大街，他却望向西侧的好莱坞。博内斯意识到了电影在塑造文化和消费期望方面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在一篇为方向和程序作准备的文章中，博内斯臭名昭著地（这是必然的）回顾了香烟被高效利用的疯狂含义。“香烟成为哑剧或有声电影的主要演员，一根香烟所传递的含义，通常需要很多话才能表达清楚”，他解释道。

博内斯电视备忘录的目的曾经是将吸烟的电影进行分类。电影对香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心理需求。害羞的英雄点燃了香烟，能更好地把持住自己去见他的人民；坏人匆忙地叼上香烟，来掩饰内心的紧张或用来放松。但恐怕最戏剧性的场景就是香烟并未点燃。当一个烟民感到不安而抽烟时，能传达出多少信息！赌场里的赌徒将最后一块钱换成筹码，香烟从他颤抖的手边落下；被狠心妻子抛弃的丈夫，拿起一根香烟，对落地的香烟视而不见，以此来强调他的巨大失落……所有心事都能用香烟在演技高超的演员手中和嘴巴上表达出来。

正像博内斯计划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香烟完全成为电影中的一个重要道具，用来表现演员们一系列吸引人的性格特征。从某个角度来说，20世纪30、40年代用香烟讲故事再次印证了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电影在创造风格和流行时尚的同时还反应了具体化了的社会文化。

1948年，《大西洋月刊》全面记录了屏幕舞台上的香烟道具（这与博内斯早期的备忘录相符）对表达情感的影响。这条评价认为，香烟能更容易地表达自信、害羞、焦虑或吃惊。为了表现焦虑，作者评论道：“快速而频繁地抽烟，在舞台上欢快地跳舞。扔掉刚吸一半的香烟，再点一根新的。”为了表现一个“可爱却不幸”的人，演员要“用力地碾灭吸了一半的香烟”。不断摸索香烟和火柴能表现一个悲伤的形象。最后，从身上擦出激情能通过下面的举止表现出来：“嘴里叼两根香烟。两根一起点燃，吞云吐雾之间，拿出一根他最爱的香烟。”凭借这样的动作，保罗·海恩海德在《新航程》（1942）



美国烟草广告，摘自《文摘杂志》，1930年4月5日



汉弗莱·博格特在吸烟

中和完美的贝特·戴维斯演绎了一段浪漫故事。^[17]

毫无疑问，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阻止女性吸烟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随着 20 世纪烟草消费的急剧增加，女性成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烟草消费者。通过广告公共关系的努力，以公共关系业和心理学的专业化为基础，形成为了解操纵人类行为的方法。希尔和博内斯将香烟的形象塑造并促销成为独立的女权主义者的象征，香烟揭示了创造消费意义和动机这种新技术的重要性。也就是，塑造能力——探索——文化变化依赖内心里成功的消费动机——博内斯把这个叫做“机械赞同”。

如果博内斯是杰出的市场操纵者——大众动机的主宰者——他深深地明白保证个人独立选择的重要性。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博内斯认为广告是关注和怀疑，他相信反射性合理的个人选择。

使用“机械赞同”这个术语，博内斯明智地呼应了消费者文化。

烟草业创造了香烟，这种实质上适合所有人的产品，留给人们一种“弹性意义”的印象，相对香烟的特征来说，这种印象更多地是被促销而包装出来的。香烟的成功不容小觑，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商业作家、社会批评家和文化观察员就完全认同香烟是新消费文化的核心符号。烟草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本土文化和殖民扩张时代，而在新消费者文化的作用下，香烟成为令人印象深刻、传播最为广泛的消费形式。

香烟在 20 世纪头五十年出现，极其“符合”现代文化的意义和道德风俗，这绝非偶然。消费者文化的特别代理发现了让产品适应文化或让消费者印象深刻的技巧，或许让文化来适应产品能留给人们更深的印象。没有什么案例比烟草更能清楚地观察和分析上述观点。烟草业在广告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创新迅速成为国家“标准”；应用新的广告形式、新媒体和公共关系，烟草业稳固地在消费文化中开辟了新的殖民地。

尽管消费文化取得了胜利，但各种批评仍不绝于耳，这些批评常常牵扯到传统美国文化价值，强调制约和顺从民意。消费文化被代理本质、个体和风险、正反两面情感并存的状态团团包围。上个世纪后期，人们广泛了解到吸烟有害健康，对吸烟的正反感情并存的状态将以强而有力的方式重新为烟草铺平前进的道路。

现代烟草业的上升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化变化的本质和特征。毫无疑问，价值观改变的历史、信仰和实践都是复杂而多元的。仔细反思 20 世纪早期烟草商的促销策略，

可以发现它阐述了一个复杂的文化观念及其实践体系。不仅如此，这些活动代表着社会和文化工程的创新理念。回望 21 世纪头十年，也许对这样的操纵方法的期待类似于创造形式上的需求。但是，正如本文所提及的，这些市场方法是“发明”与香烟产业有关的日用品。在这些例子中，文化标准和期待成为障碍，答案就是改变文化。这样的方法为“消费者的信心”提供了更加黑暗的寓意。

注 释：

- [1] 理查德·泰纳特《美国香烟业：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载《耶鲁经济研究》1（纽黑文，1950）。
- [2] 《吸一口香烟：烟草的使用和种植》，载《纽约时报》1889年3月10日。
- [3] 可参见埃德文·L·詹姆斯《统战部将会下发烟草配额》，《纽约时代周刊》1918年月23日。
- [4] 引自法兰克·普莱斯布雷《广告的历史和部门》（纽约，1929：598）。
- [5] 彼得·安德鲁斯《香烟市场，过去和将在》，载《广告与销售》1936年1月16日。
- [6] 见杰克逊·利尔斯、罗兰德·马钱德《美国梦广告：为现代化让路》（博克雷，1985）。
- [7] 卡尔·那艾尔《针对女人的广告》（纽约，1928）。
- [8] 见卡珊德拉·塔特《香烟战争：小白人奴隶的胜利》（纽约，1999）。
- [9] 《讣告》，载《纽约时代周刊》1995年3月10日。另见拉里·泰《旋转之父：爱德华·博内斯和公共关系的诞生》（纽约，1998）。
- [10] 理查德·泰德楼《保持合作形象：公共关系和商业（1900-1950）》（格林威治，1979：43）。
- [11] 爱德华·博内斯写给乔治·W·希尔的信，1929年2月7日。
- [12] 爱德华·博内斯《思想的传记：爱德华·博内斯对公共关系忠告的回忆》（纽约，1965：383）。
- [13] 同上，第386页。
- [14] 同上，第387页。
- [15] 同上，第390页。
- [16] 同上，第391页。
- [17] 圣伊莱斯·珀雷法尔《无火吸烟》，载《大西洋月刊》1948年4月。

万宝路牛仔和吸烟恶名

帕特里克·科里根*

还记得万宝路牛仔吗——坐在马背上吸烟的帅小伙？五十多年里，这个肖像成为美国广告中一幅永恒的画像，激励着和他一样的潜在烟民和真正烟民。他明确地传递了这样的消息：吸烟很酷！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西方人内心的一个新形象正在向万宝路牛仔发出挑战——令人垂头丧气的口臭。今天早晨我开车上班遇到的事情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通往芝加哥的路上，沿途有这样一个广告牌，上画着鸭子、狗、猴子叼着香烟，写着：“你吸烟时也一样愚蠢。”书的封皮、手册、键盘按钮、海报、T恤衫和冰箱门都发出同样一条信息：

“为什么不把他们直接称呼为：癌症烟、炎症烟、呼吸障碍烟……”

“如果你在我身边吸烟，还不如……”

“别让我因为吸了你的二手烟而难受。”^[1]

也许这些形象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最近举行的一场万宝路牛仔的角逐。模特大卫·麦克林的妻子起诉飞利浦·莫里斯公司，称其丈夫死于吸烟。诉讼称，有演出的时候麦克林一天最少要抽五包香烟。

不论反烟运动还是早期对香烟的正面宣传广告，都不能一笑置之地把这些举动简单地看做是改变人们行为方式而做出的一些微弱尝试。万宝路牛仔和坏男人在性格上天生有些相似之处。举个例子，这个含义超出了用简单行为的含义——“吸烟的味道很好，而且很有意思”或者“吸烟闻起来很臭，而且能致癌”——来描述烟民。一方面，烟民喜爱万宝路牛仔，另一方面，吸烟上瘾的人是没知识的，他们游戏人生。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通过坏男人形象来传播香烟的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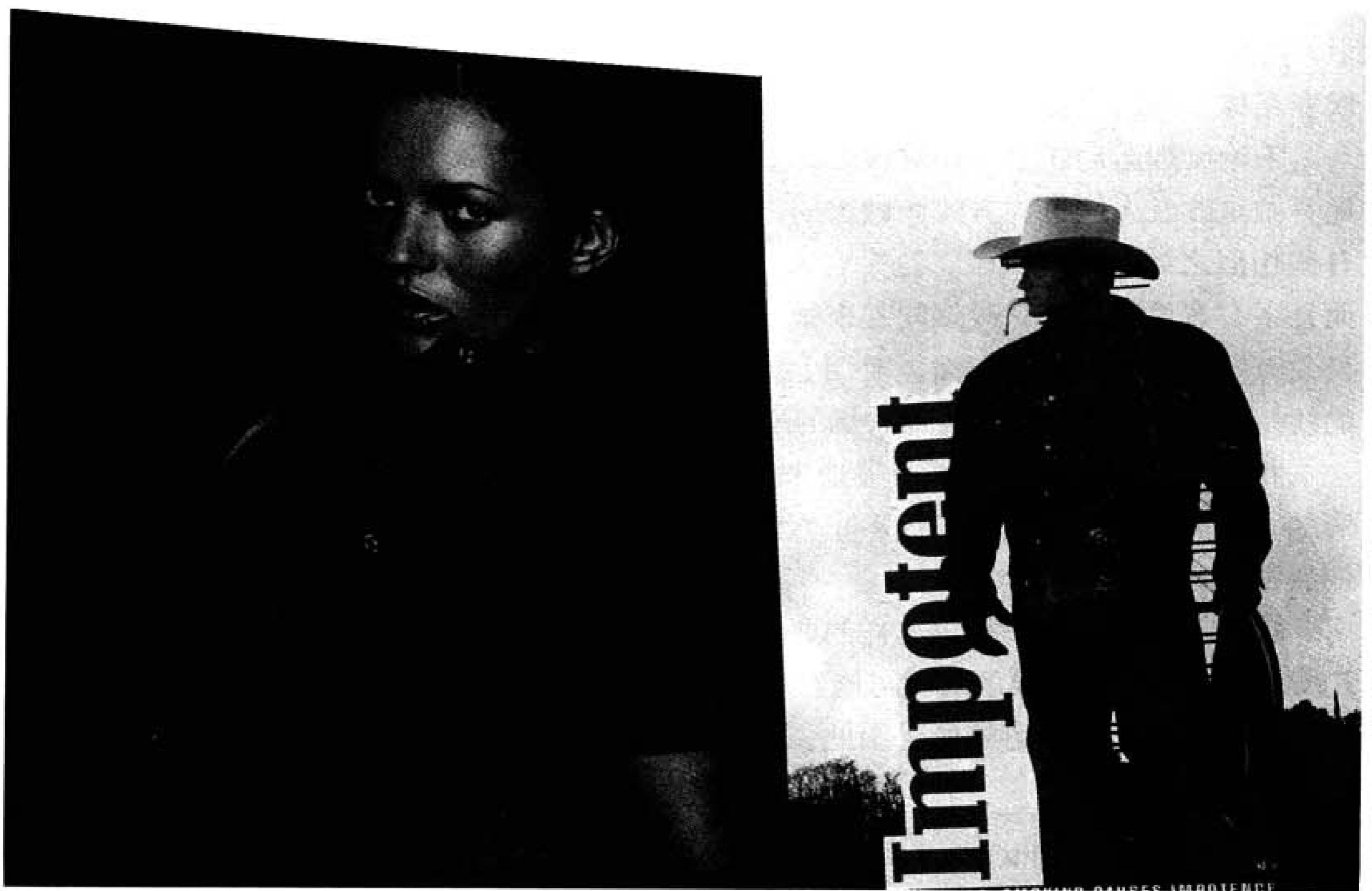
我们早已经抛弃了用是否吸烟来判断人品、给人打上烙印的年代。“被冠以懒惰色彩的一代人们”表达的含义远不止人们工作速度缓慢，而是对社交群体构造的一种惊人的忽视。

也许不应该向烟民提出这样的要求？反烟战役似乎意味着英勇。然而，与烟民的经历类似，在美国，奴隶的后代可能经历些不仁道的对待，二战时韩国人被强制送去日本，这些事情似乎是荒谬可笑的。因此，本文的首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烟民是否被冠以了

*帕特里克·科里根 (PATRICK W. CORRIGAN)：芝加哥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近作有《别当我是白痴：与精神病作斗争》。



万宝路牛仔跃向东方，中国，1998



万宝路牛仔发现吸烟人数减少，洛杉矶日落大道广告牌，1999

恶名？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顾恶名的定义。讨论得出了模棱两可而奇怪的答案：名义上，吸烟这个曾经被西方文明吹捧的行为，现在遭到了众人的谴责。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变化？问题的答案引导到了最后一轮质疑。

吸烟被打上烙印了吗？

从希腊时代开始，社会思想家就对恶名加以关注。在这样的红字下，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带着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或者有着性格缺陷的人们（例如：瘾君子，失业者和犯人）被聚集在一起。从此，产生了恶名的定义。让我们加以回顾，首先来确定吸烟是否被打上了烙印。测定标准是，将聚集的吸烟者与经验主义标准相比较，以此来确定他们是否符合恶名的定义。

恶名的定义

艾文·霍夫曼，加州大学的社会学者，关注 20 世纪学术界的恶名。在他的著作中^[2]，霍夫曼将恶名定义为集结在一起的一群不名誉的人。他这个思想的核心观点就是“不名誉”：这个群体里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完整的人，他们不能完成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如此剥夺人性产生了大量可怕的后果。他认为少数人是下等的、没有能力的、危险的，这样的逻辑将那些对恶名团体的愤怒或者憎恶合法化。^[3]在这样的感情支配下，他们盗窃那些本应由全人类共同分享的合法权利。例如，房东将不安全的房屋出租给恶名团体。更糟糕的是，大众对此的反应是错误的。恶名导致了令人极其憎恶的犯罪，这包括在美国重建过程中对黑人的中伤，二战时期强奸中国妇女，宗教审判所以对异教徒的迫害。

霍夫曼将恶名的起源归因于个人。黑皮肤让人们在非裔美国人产生了偏见，轮椅让人们产生了对残疾人的固有偏见，对烟民的恶名则产生于香烟。香烟的外部特征使它产生了恶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恶名的内在本质似乎增加了它的耻辱，这也是对人产生偏见的结果。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非裔美国人不是黑人，那么他们能不能摆脱这样的偏见呢？爱德华·琼斯、阿尔伯特·哈斯道夫和一队来自斯坦福大学行为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人员在原本意义上对此产生关注并且对恶名加以重新定义。^[4]他们认识到定义的本质部分是对标签的理解，人们对恶名的反应并不是自然而来的，这个记号是呈现在大众面前的，而不是大众将记号标记在标签上。因此，黑皮肤不是继承而来的标签，而是欧洲人感知到的黑皮肤意味着“卑劣”，这导致了偏见。这样的歧视存在于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们眼里。布鲁斯·林克，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将这些讨论以在四个关键实验中加以概述：

1. 人们将人类加区分。
2. 优势文化将性格特征加以标签，从而产生了否定的老套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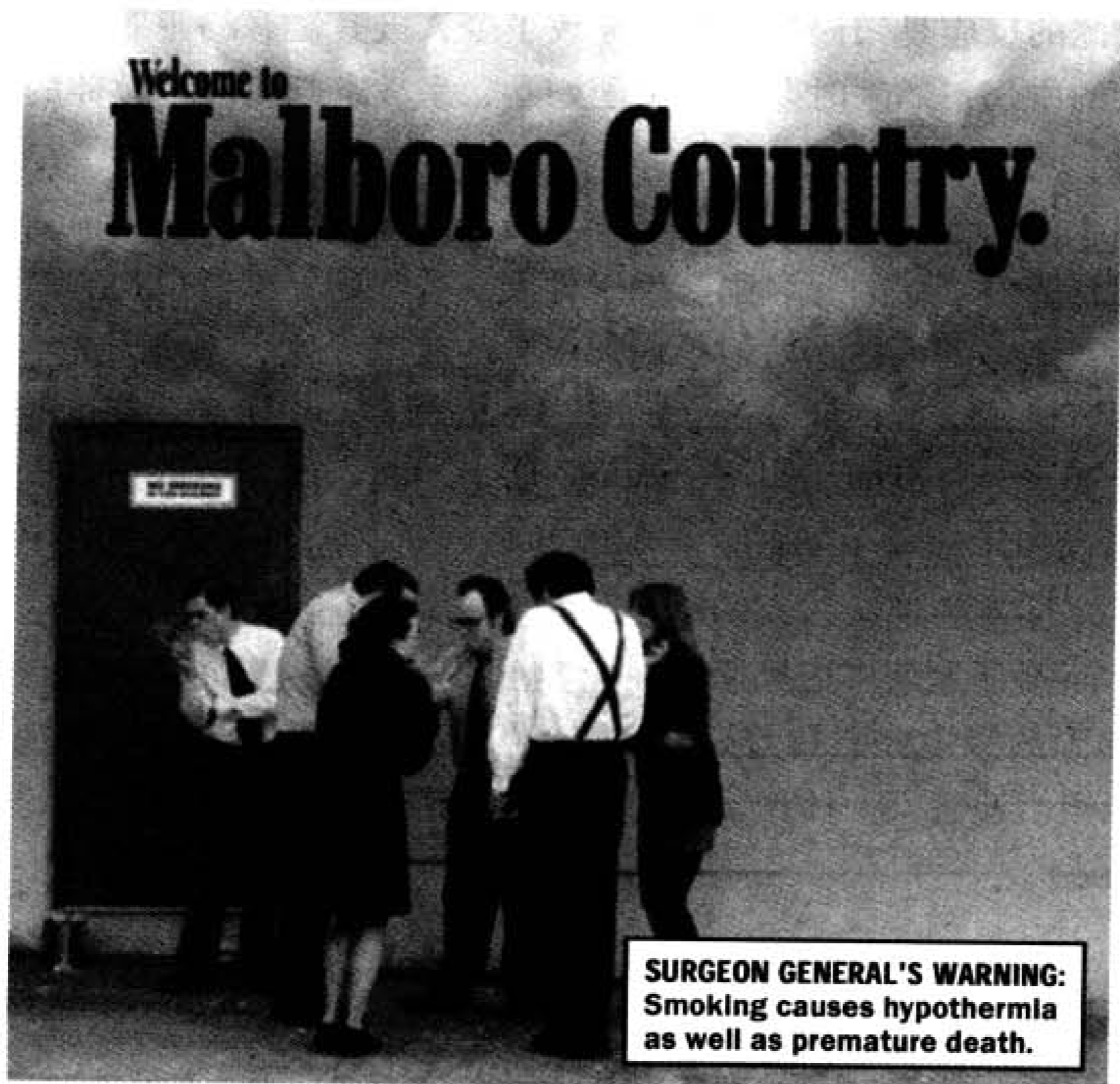
3. 冠以标签的群体遭到大众的歧视待遇，我们反对他们。
4. 被冠以标签的人们经历社会地位的沦陷和歧视。^[5]

烟民符合恶名的定义吗？

吸烟似乎符合第一条标准。显然吸烟者有一个公开的明显的标记（吸烟），大众对此加以标注。实际上，这个标记符号多由政府健康机构和私立机构联合设立。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世界上全部国家都发展一个多目标的熄灭香烟的项目^[6]。此外，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已经将戒烟的理念传达到普通百姓，这些国家的在校学生已经知道吸烟的危险性，而且他们知道“那些烟民”和他们是不同的。

第二个标准——将标签和消极老套联系到一起——得到充分的经验性的工作支持。各种各样的研究强调了人们对烟民的否定态度。加拿大卫生部门一个初步的定性调查结果显示，吸烟者是极度受人讨厌的，因为烟闻起来很臭；另外一些人对烟民没有好感；吸烟导致早熟，吸烟也会使人变得忧郁。这在整个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共识，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得以普及。^[7]

烟民是否符合第三和第四条对恶名的标准还不是很明显。第三条对恶名的标准是“我们”在精神上反对“他们”，这将被冠以恶名的烟民群体和其他大众区别开来。这样区别是很明显的，例如在饭店、剧院、机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吸烟区都设有明显的标志。吸烟区是烟民（“他们”）表现其不光彩一面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常常伴有耻辱的标记，



一则反烟广告，画面上的“欢迎来到万宝路家园”暗示这不是抽烟的地方

就像人们在公共建筑前羞怯地辗转，每小时都要点着香烟吸上一根一样明显。

然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吸烟区的出现是我们/他们区分的证据。另外，限制吸烟区也许能理解为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的侵害，因此这种行为本质上并非以人们的区分为目标。吸烟和不吸烟的人所呈现真正的“我们/他们”的最终评判标准一定是符合吸烟恶名的：名义上，被冠以烟民的人们经历了社会地位的丧失和歧视。显而易见，烟民承受了公众的鄙视等悲惨后果。烟民参加健康保险的保险费比非烟民要高，烟民不能获得一些租用设备，也错过了许多工作机会。对类似这样极端事件的关注是很有意思的。例如，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员工，要跨越足球场那么大的距离，穿越一条繁忙的马路，到地下室去吸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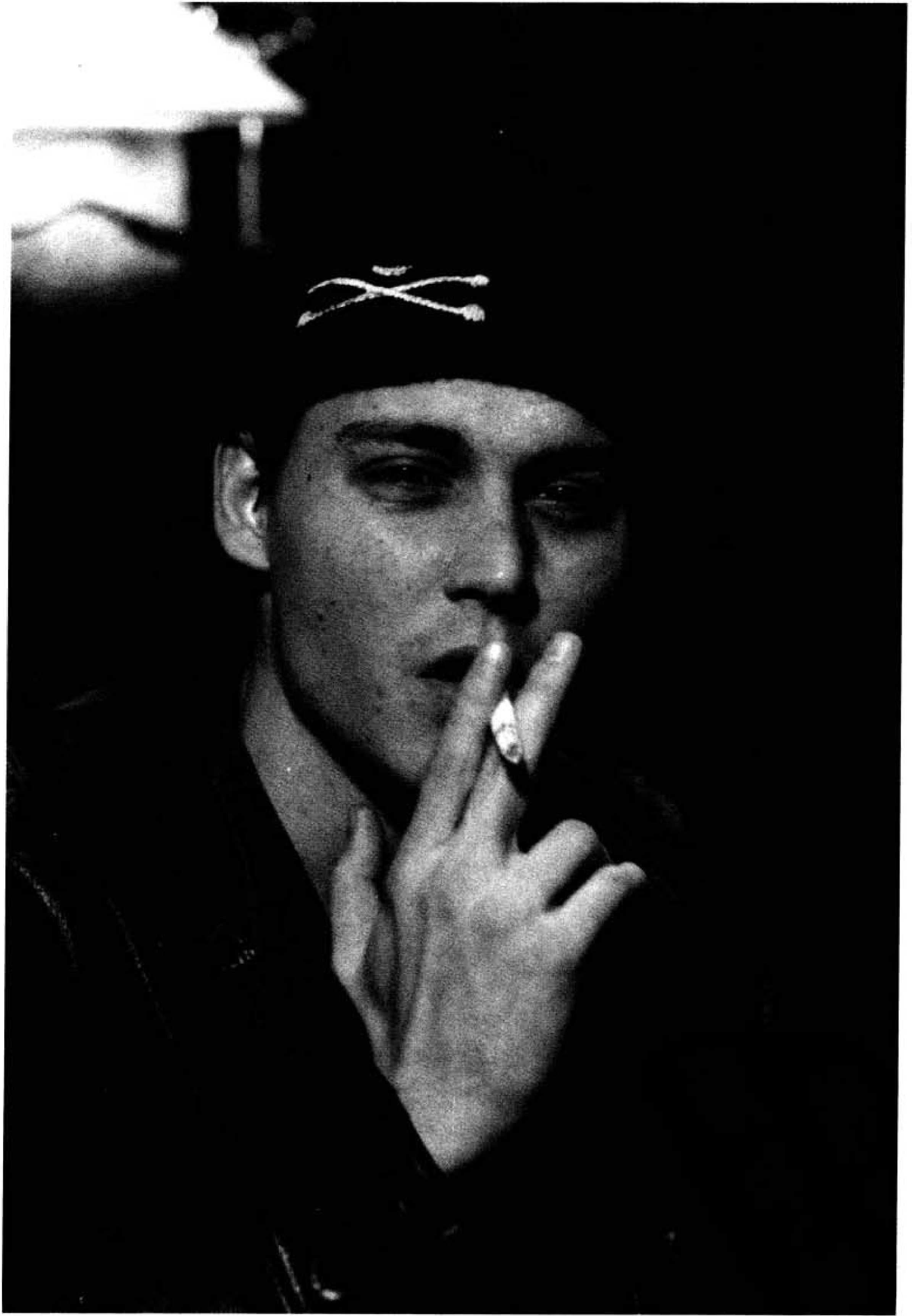
再次，对冠以恶名的烟民的态度和对吸烟带来的危险的自我保护策略不明确。将吸烟区和公共区域分开，是出于保护非吸烟者的初衷，也是因为烟民并非受人欢迎的人群。问题的关键是哪个是主导因素——社会恶名还是健康行为——和标签相联系。公众认可这种歧视是因为人们给烟民贴上了个性软弱的标签，他们不受欢迎而且散发着臭味儿，这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诚然，公民认可吸烟禁令，单纯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因此可以将吸烟确定为一种行为，而非将烟民冠以一组打上烙印的群体。



劳伦·巴卡尔在《逃狱雪冤》中

从珍贵到贬值的行为

也许更有意思的不是将吸烟打上烙印，而似乎是香烟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巨大变化。曾几何时，吸烟被当作是文雅和诡辩的象征，现在却代表了愚蠢和粗野。这样的变化可以在电影院见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吸烟的积极表现在电影和电视里明显消失了。电影里常见的是翰弗雷·波噶特或贝特·戴维斯对话中对香烟强烈的中伤。早期的电影中常常插播情景喜剧和动作剧，里面的演员常在吞云吐雾之间说台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流行反映了人们对这些快活而神秘的烟民的文化偏见。另一方面，出现于电影电视中的香烟是帮烟草公司做广告：它们需要为演员在剧中抽它们的香烟付费。或者说，香烟只是一个道具，演员们拿在手里，以免显得那么别扭。不管怎样，吸烟曾经处于西方



好莱坞“坏男孩”约翰尼·戴勃在荧屏画面中的吸烟镜头，1994

媒体最前沿、最中心的位置。

从那时起，电视电影荧屏上的吸烟行为明显减少。从1971年开始，美国媒体禁止播放香烟广告，随后许多其他国家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更微妙的是，这对删减电影和电视中的吸烟情节起到了显著作用。现在很难发现电影明星和电视演员借点燃香烟来强调对话了。然而媒体上的吸烟似乎有种回流的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雪茄的吸食量显著上升。电影再次将吸烟作为表演策略引入，特别被西恩·本和约翰尼·戴博这样的“坏小子”演员所应用。^[8]

与此同时，反烟形象却无处不在。公共服务公告以各种形式向大众传递着吸烟的危害和烟民令人讨厌的讯息。不仅如此，美国几个主要香烟生产商和二十多个州最近展开了一场关于烟草的决议，决议提供数额巨大的资金来深化这些活动。其他国家抓住这个时机，大力推行反烟口号。世界卫生组织提倡在公共教育方面做出努力从而预防年轻人吸烟。除此之外，有证据表明，这些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例如，密歇根大学的全国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青少年对吸烟持更强烈的否定态度，养成吸烟习惯的可能性更小。^[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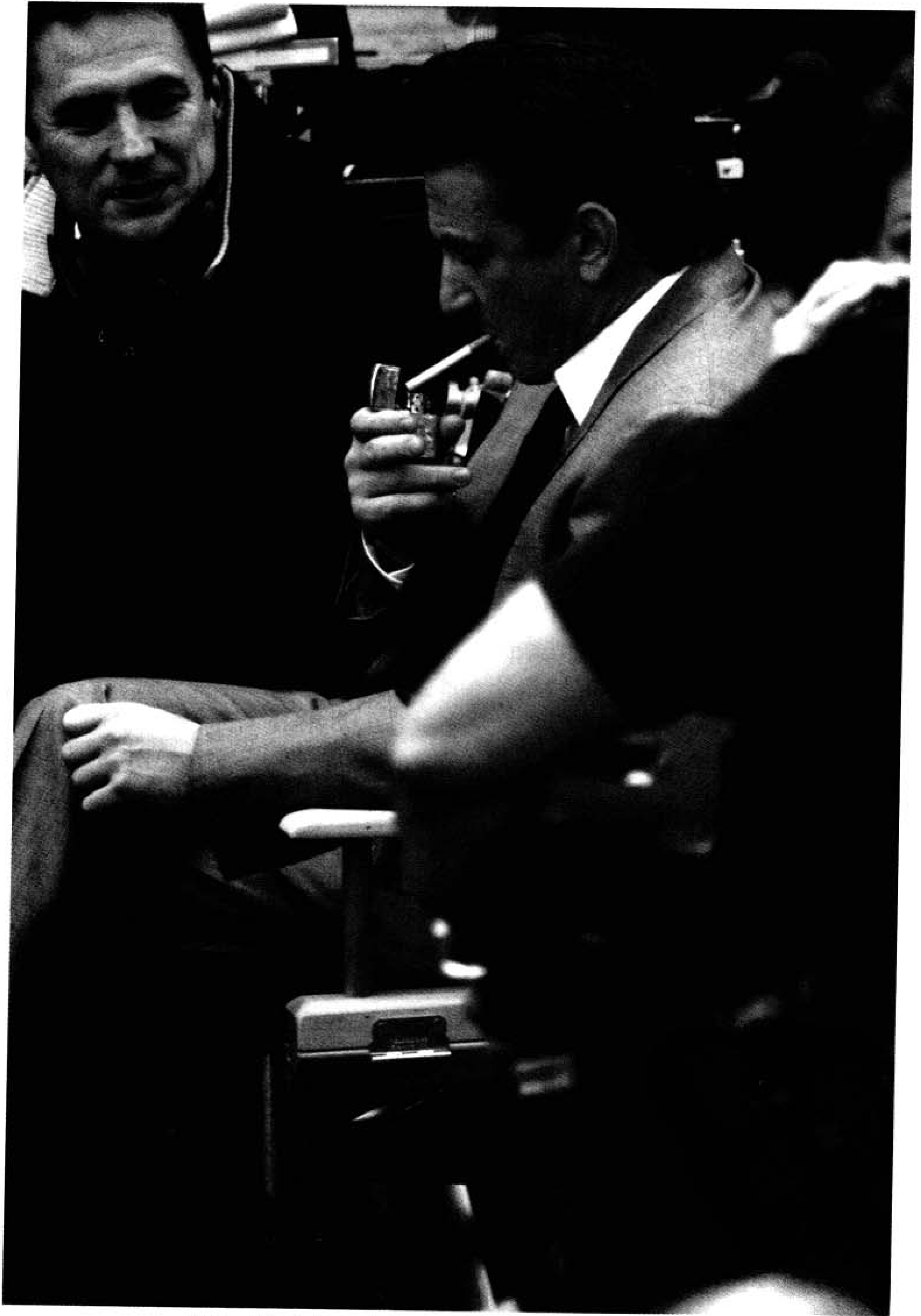
从最近的反烟活动能看出来，新出现的对香烟的辱骂和与烟民有关的恶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已经出现了。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怒斥烟草的恶行。例如，一百多年前威廉姆·麦金利总统禁止一位摄影师拍摄他吸烟时的照片，因为这将对国内青年产生破坏性的影响；^[10]19世纪的英国文学界压倒性地批评当时作品里吸烟的角色。因此，我们不能得出吸烟的恶名是新产物的结论。

撇开历史不论，现在的问题由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吸烟如此快的贬值，变成为什么吸烟——而非其他与健康相关的行为——被公众所唾弃？为什么烟民被冠以个性软弱和冒险者的标签？为什么不嘲讽终日赖在家里的懒虫缺乏锻炼，或者吃肉的人冒着动脉硬化的危险呢？再次，对吸烟的偏见可能导致读者忽视其他一些不健康的行为，如吃易引起肥胖的食品、过量饮酒、不运动等。

另一个加剧人们对吸烟成见的是二手烟。与其他和健康相关的恶习不同，吸烟是少数能对他人造成影响的恶习之一。对不吸烟者来讲，吸烟是种困扰，能使他们眼睛流泪、喉咙发炎。不吸烟者还控诉，吸烟产生令人作呕的气味，使幔帐和墙壁变色。调查显示，接触二手烟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11]

从与传染有关的方面去理解二手烟独特的恶名可能更容易理解，这就意味着它可能传染给其他人。一个古老的例子就是存在了几个世纪的麻风病和新风病患者。为了防止传染给其他人，麻风病患者的余生注定要与家人、朋友、邻居隔离。我们不能认为麻风病患者仅仅存在于远古时代，或者这个现象不会发生在西方。夏威夷的卡罗帕岛就是个放逐麻风病人的地区，直到1969年，美国才废除了强制驱逐令。

吸烟传染在烟民之间很流行。调查表明，二手烟能致癌并且导致其他相关疾病。公众关心的是，是否会从病菌以外的其他途径传播，这也反应了道德方面的败坏。研究表明人们更加关注心理疾病患者，以免被精神错乱所影响。例如，1981年关于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赞成如下观点：我不会和心理疾病患者在同一个游泳



肖恩·佩恩在电影《翻译风波》后台吸烟，纽约，2004

池游泳，而且认为与心理疾病患者接触过后一定要洗手。^[12]人们担心被传染的焦虑超过了病原体本身。琼斯和他的同事对身体传染和道德传染加以区分，字面上，疾病和上瘾有关系能把他们的一些不合情理的想法传递给其他人。^[13]

难道恶名冤枉香烟了吗？

大多数社会正义的拥护者迅速回答到，任何恶名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罪过。

任何一个剥夺公众敬意和个人机会的群体对文化都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这样就出现了不公平。这样反射出的答案就是恶名确实冤枉了吸烟！

该观点的反对者提出，这肯定提醒读者想起古希腊恶名的起源。人们身上有记号（面颊上的烙印，服装上的标志或者肩膀上的伤痕），这样大众能把他们和危险联系到一起。“小心！”，符号暗示着这个信息，“这个罪犯他是疯子吗？他有传染病吗？”尽管这个原因似乎很古老，西方文化却认可了公共标记的观念。美国大多数州一般有六名通缉犯，这样人们能注意到自己的邻居中是否有恋童癖者。刑事法庭的法官命令醉酒的司机在汽车保险杠帖纸上加以注明，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世。无独有偶，人们还讨论着公共服务机构是否该对烟民和吸烟区加以标注。人们能保护自己避免感染香烟引起的道德和心理方面的疾病。因此，类似于吸烟的恶名是否正确似乎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答案。

吸烟的恶名和道德心理学

道德心理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心理学层面上引起人们对公正和罪恶的关注。道德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对人的行为的评价和人分开，尤其是动作条件和人文主义理论方面。决定行为好坏或者恰当与否的答案（推广好行为以及惩戒恶行为）是使之成为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相适应的价值。按照这个思想，以孩子为例，他们知道打人是不对的，而上课举手发言是正确的，同学们也能从这些老实排队的同学身上受益。相似的，戒烟的人不仅改善了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且为整个社区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当人们误会了动作含义的时候，就会发生认识论错误。这就是恶名的本质：等同玷污了这个人。许多吸烟的形象超出了行为状态本身，它暗示吸烟者不值得我们尊重。这就是我们上文讨论过的道德传染病。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归因理论以区别为特征，将吸烟的坏处和不道德吸烟者联系在一起。^[14]归因理论是人类一切动机的基本道德，它以个体为对象，以研究时事消费为基础，“为什么不给我加薪？”“共和党是怎么在投票中从议会中下台的？”“那个家伙为什么不断吸烟？”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责任归因。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的人，大体上能得到别人的怜悯和帮助：“倒霉的哈雷是癌症的受害者，我能开车送他去看医生吗？”相反的，人们常常讨厌或者惩罚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海里尔特吸烟是因为她是个软弱的人，我们不要为她的健康买单。”公众是否将吸烟和其他类上瘾看作是个人的责任（烟民选择吸烟），或者作为一种不可控制的疾病过程（烟民身体内基因导致易患疾病），是清晰可见的。^[15]持有吸烟是个人选择行为观点的人容易给

烟民冠以恶名。

结 论

吸烟曾经被认为是一种诡辩的行为，现在成为了粗俗的行为，人们认为这是诡辩的中心：“香烟闻起来很臭而且具有杀伤力！”在这个过程中，与吸烟行为有关的消极态度超出了个人行为的犯罪感。烟民有恶臭还令人闷闷不乐并且威胁社会，他们在身体和道德方面相互传染。因此，人们认为烟民是带有恶名的群体。然而应该思考的是，为吸烟冠以恶名是不是搞错了。

烟民呼吁社会给予其社交机会，吸烟的恶名如其他的歧视一样，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吸烟者的公共标识能帮助人们避免身体的疾病和道德的败坏，保护公众免遭二手烟的侵扰，这是合理的公共健康目标。因此，由恶名而引起的歧视似乎又是合法的。

注 释：

- [1] 详细口号见如下两个网站：<http://www.buttout.com> 和 <http://www.kickbutt.com>
- [2] 艾文·霍夫曼《恶名》（纽约，1963：147）。
- [3] 伯纳德·维那《责任的审判：社会导向理论基础》（纽约，1995：301）。
- [4] 爱德华·E·琼斯等《社会恶名：标记关系心理学》（纽约，1984：347）。
- [5] 布鲁斯·G·林克、乔·C·法兰《定义恶名》，载《年度观察》XXVII（2001：363-368）。
- [6]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与健康：全球情况报告》（日内瓦，1997：312）。
- [7] 同上，第383页。
- [8] 弗莱德·安德森《吸烟和商业》，载《美国传统》7-8月号（1998：75）。
- [9] L·D·约翰逊等《青少年吸食烟草人数降低》，《密歇根大学新闻信息》（2000：76）。
- [10] 麦克·斯达《万宝路男人：美国吸烟和男子汉气概》，载《流行文化月刊》XVII/4（1984：45-57）。
- [11] S·琼斯等《工作上的二手烟》，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共健康杂志》XXV（2001：90-93）；R·斯通《二手烟研究》，载《科学》ccxiv/5155（1994：30）。
- [12] 爱美丽·法里纳等编《社会交往的不愉快影响》，载《社交和临床心理学研究》X/4（1991：351-371）。
- [13] 琼斯等《工作上的二手烟》，2001：347。
- [14] 维那《责任的审判》，1995：301。
- [15] 杰弗雷·斯格雷《沉溺是一种选择》（芝加哥，2000：179）。